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以相思林之名—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史
(1 9 8 7 — 2 0 0 5)

**By the name of missing trees—the
student and urban movement in
Tunghai University**

研究生：李杰穎

指導教授：蔣淑貞

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 1987--2005 年間，在台灣私立東海大學校園內持續發生的，以校園空間為主題的學生運動。雖然東海大學素來以其校園景觀而聞名，但是考察校史文獻與學生運動的論述，筆者認為這些運動的發生，並不只是為了護衛「最美麗的大學」之名。學生的行動和東海過去的歷史有著幽微的聯繫，並且蘊含著深刻的對台灣社會現狀及高等教育發展的批判。

本論文第一篇首先回顧東海過去的歷史，以突顯學生當下的行動和過去的連結。第一章指出在 1970 年代東海大學因校園內外環境的不變，開始對校務發展方向進行一連串的爭辯與改革。這場爭辯並延伸為關於東海大學乃至整個高等教育，在台灣社會的定位和意義的反思。雖然東海大學的轉型工作，在梅可望擔任校長時期可說宣告完成。但是這場發軔於 1970 年代的「未竟的探討」，卻對東海的校園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第二章中則分析視東海校園為一個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包括對這個「共同體」在 70 年代後逐漸消失的追懷與反思。本文認為這個想像建基在對當下現實的不滿和批判，未必吻合於東海創校初期的歷史實況。但在這種想像中存在著透過「大學民主化」以克服校內的疏離感的積極意涵。

第三章則先分析在各種文學作品中，東海校園被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方式。使得「美哉東海」成為東海人乃至整個台灣社會對東海校園的第一印象。但校園景觀除了作為東海和其他學校區別的差異外，也是校內對公共事務、高等教育、乃至校園發展方向進行討論時的「論述場域」(discourse field)，這使得校園景觀的重要性不斷的被反覆加強。

第四章則是描述在關於校園公共事務的討論中學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自 1970 年代以來，學生關於校園空間議題的論述模式發生的變化。雖然東海學生在 50、70 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並未有積極的參與，但我們可以發現東海在 80、90 年代後的學生運動，和創校初期的榮譽制度推行委員會 (簡稱：榮推會)、東風社的歷史傳統，有著密切的關連。

第二篇則詳述自 1987--2005 年間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本論文將這段漫長的歷史粗略的分為四個時期。第五章首先討論自 1987--1990 的「東潮時期」，這段時間是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的開端，東海學生以地上或地下的形式，對威權時代的校園管理機制進行批判，東海校方也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制度變革。並由於社會環境的變化，發生最早的關於校園空間問題的爭議

第六章則討論在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意義重大的「相思林時期」，這段時期起自 1990 年的相思林事件，以 1994 年「三次相思林事件」確定無法要回校地而告終。這段漫長而讓人扼腕的歷史，確立了學生介入校園空間議題的正當性，累

積了龐大的歷史記憶和情感，不斷召喚後來的東海人繼續進行對校園空間的保衛戰。

第七章則討論 1993--1999 的「校園民主重創時期」，在這段期間東海於 1989 年間建立起來的校園民主機制，其侷限性已充分顯露。同時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大量「自主性群眾」的出現，對既往學生運動的實踐造成挑戰。面對這樣的情勢，部分東海學生仍嘗試改造利用學生會，而另外有些人則開始嘗試一些新的實踐方式，包括：美學化的運動策略、社區運動理念的引入等等。

第八章從 1998 年的「小惠事件」談起，分析東海校園周遭社會環境的變化——由非正式部門運作形成的「東海別墅」（簡稱：東別），以及正式部門失效的都市計畫機制促成的「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及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之最大侷限——對校園周遭社區環境的缺乏關注。這種侷限性的形成，來自於東海校園處身的社會空間結構，也和整個校園空間運動的論述發展中潛藏的深刻的共同體想像有關係。

第九章則探討尚在進行中的「後 118 時期」。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壓力下，東海校方進行的一系列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因為「合法化危機」的作用而事倍功半。而學生的行動則受限於共同體想像造成的「地域主義」的侷限，不過共同體想像以及過去運動累積的歷史記憶、文化論述，仍然使得 2000 年「V 大樓事件」、2003 年「東海保衛戰」表現出驚人的運動能量。而隨著開闢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校園的壓力劇增，也帶出東海大學如何和周遭的社區相處的問題。

第三篇則嘗試著從結構性、整體性、歷史性的視角，分析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意義。第十章分析隱含在東海校園空間議題中的結構性因素，分別是戰後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變化，大台中地區都市空間的發展，以及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而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也因此具有凸顯、改變這些台灣社會的結構性矛盾的意義。

第十一章則從 P. Freire、H. A. Giroux 的批判教育學 (critical pedagogy) 以及柯司特的都市社會運動理論的角度，去分析東海空間運動的意義。本論文認為對內而言，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具有對抗主流的教育文化霸權，進行批判教育學實踐，以創造具批判意識的公民的作用。對外而言，則是一種對於台灣高等教育以及台中都市空間發展的雙重背景下，大學校園呈現的集體消費、文化認同、以及草根民主的問題的抗議。雖然由於歷史的侷限，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仍無法有效突破「地域主義」的限制，將「抵抗性認同」轉化為「計畫性認同」。但長久而持續的歷史實踐，也為東海的校園文化累積了豐厚的資產

第十二章則從本論文的研究成果，試圖和目前台灣的學生運動論述、公共領域理論、柯司特的「認同轉化」理論進行對話，最後則以建議將看待學生運動的視角，由「三月學運」的為民請命轉換成視學運為校園內的批判教育學實踐做結。

謝 辭

據說一個文本應當是不能自我指涉的，如果進行自我指涉，則只能是在該文本的序言之中進行。換言之，序言是一本書唯一能夠談論自己的地方，序言具有固定書本的意義的作用。與此相對應的，謝辭則是一本客觀中立、超凡入聖的論文中，唯一能夠吐露自己世俗、污穢、模糊的出身的地方，謝辭具有呈現論文寫作的社會關係的作用。

謝辭經常也是論文的讀者最先看，通常也是唯一會看的部分。相較於此，論文作者在寫作正文所投下的大量心力簡直是沒有意義。爲了終結論文體裁中謝辭和正文這種不對等的關係，本文作者決定採用一種全新的謝辭書寫形式...

-----沒事，這只是分隔線而已，請繼續耐心的看下去-----

首先，提到一本論文的身世，當然就要先感謝賦予作者生命的父母，感謝他們允許已過而立之年的長子，還可以不事生產的在學院中胡搞。同時自從高中畢業後離家求學，我都長居外地，陪伴照應父母的責任一直落在我的弟弟杰席身上。在此對我這唯一的手足表示衷心的謝意。

其次，提到生產一本論文的社會關係，就必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蔣淑貞老師，感謝她對我這個個性頑劣、外務繁忙、好高騖遠的學生的支持和照護。我尤其必須感謝她經常從非東海人的角度，對我的論文提出的許多問題，讓我得以突破一些思考上的盲點。

談到社會關係，就不可避免的要談到權力關係。在此感謝口試評審委員趙剛和陳信行兩位老師，撥冗閱讀我這篇長度是一般碩士論文三倍的大作，並在口試時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建議我未來可以繼續深入研究的方向。

所有的生產都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在此特別要感謝石岡的黃程逸爲我尋覓、組裝了這台物美價廉的電腦，使我不必承受論文寫到一半，電腦忽然當機的夢魘。(不過這台電腦的硬碟竟然剛好在碩士論文口試完成後數週就燒壞了..我只能說：程逸，你真厲害...)

-----這個還是分隔線啦！精采的要來了，趕快再看下去-----

除此之外我還要感謝社文所的同學李進益、陳盈璇、(以上請見第 12 頁)、家儀、仕弘、家弘、王維資、吳哲良(以上請見第 12 頁)，特別感謝林封良(第 20 頁)，還有提供過期的《島嶼邊緣》雜誌給我的陳筱茵同學。

東海校解社的張志遠學長(第 43 頁、68 頁)，東海圖書館特藏組的黃文興學長(第 173 頁)。

東海人間工作坊和台灣文化研究社的劉欣恆、杜憶如、關亦然、林倬立、趙

延德（以上請見第 69 頁）、徐文彥、吳錚、林馨洲（以上請見第 158 頁）、黃國治、鍾瀚樞（以上請見第 68 頁）、林育群（第 189 頁、270 頁）、李彥旻（第 125 頁）、吳明孝（第 169 頁）、陳慧中（第 223 頁、第 347 頁）、王俊凱（253 頁）。

東海校友友 Nancy 林、Eno 陳、poetic（以上請見第 312 頁）、朱逸恆（第 67 頁）、陳信祐（第 251 頁），東海建研所的厲卓正（小厲）、林麗蓉、簡心昱、顧崇信（第 256 頁），以及東海書苑的廖英良、吳孟如（第 186 頁）、張菁芳（第 67 頁）。

中興大學黑森林工作室的黃貞瑋、彭梅涵、蔡明賢（第 72 頁），尤其特別感謝台大的好友林純瑜（第 288 頁）。

社文所的劉紀蕙老師（第 202 頁）邱德亮老師（第 11 頁）、東海建築所的郭奇正老師（第 178 頁、240 頁）、世新社發所的王志弘老師（第 53 頁），以及楊祖珺老師（第 307 頁）、小蔡老師（第 181 頁），還有在論文完成後仍願意撥冗和我討論的清大李丁讚老師。

網友 Brahams6、firstsociology、師公（以上請見第 169 頁），苦勞網以及管理者孫窮理和卞中珮（第 211 頁）。南華大學的曾心怡（296）、何佳燕（第 340 頁）。交大創意空間的祐嘉、聖軒、偉榮、兆映（第 45 頁），還有交大劍道社（第 43 頁）。

石岡鄉的陳秀柑、劉永逸、「石岡鄉社區文化發展協會」、「大牛庄」、「東勢愛鄉協進會」、楊麗琴、邱晨、梁梅珍，這些我在參與九二一災區重建工作時認識的好朋友們（以上請見第 11 頁）。

最後的，也是最先的阿偉（第 1 頁）。

至於沒有在這上面發現自己名字的朋友，請耐心期待我的下一本論文，如果確定我寫得出來的話....。

謝謝小吵，提供了我這麼一個頗負創意的謝辭體裁的寫作靈感，也感謝她在我寫作過程中的耐心陪伴，和在我感到沮喪、失望、灰心時給我的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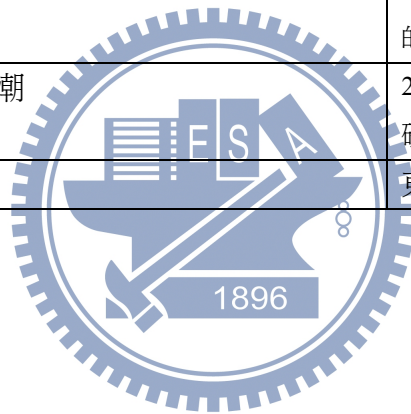
-----分隔線、分隔線，不管講幾次，這就是分隔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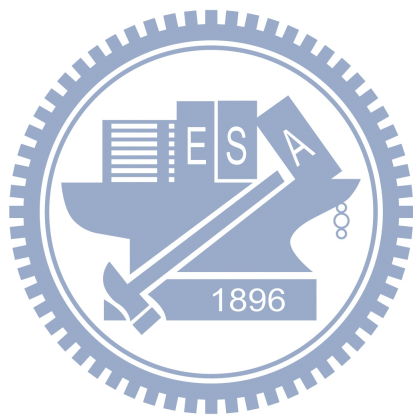
沒有過去那段盪氣迴腸的歷史，就絕不會有這本論文的產出。嚴格的說來這本論文不只是屬於我個人的，也屬於當時一起戰鬥的同志們。但是各位同志，且容我狂妄而獨斷的將這份共同的資產獻給未來，期待未來能有人能把這段歷史繼續接續下去，希望他們不要犯下和我們過去相同的錯誤，而可以走得更穩健、更踏實。

引用文獻縮寫說明

因本文引用文獻甚多，為方便閱讀，特將重要文獻出處縮寫說明如下

縮寫	文獻全名	出版者
東史	東海大學校史	東海大學
東行	東海大學行政會議記錄	東海大學
東海風	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	東海大學
東風	東風	東風社
大度風	大度風	榮譽制度推行委員會
人間	人間札記	人間工作坊
思想枝	思想枝	東海台研社
大度山	大度山	大度山社
采風	東海采風	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
東潮	東潮	1987年由「吹浪之鯨」社發行的地下刊物
新東	(新)東潮	2003年後由人間工作坊和台研社合併出刊的刊物
東海成報	成報	東海成報新聞社





目 錄

目 錄	I
緒 論	1
I	1
II	2
III	5
IV	9
V	11
楔 子	13
第一篇 夢谷啼明	15
第一章 未竟的探討	17
第一節 東海大學創校	17
第二節 爭議與轉型：東海要往哪裡去？	20
第三節 新方向：尋求獨立、走入社會、校園改革	23
第四節 爭議的深層意義	28
第二章 伊甸園與巴比塔	31
第一節 東海大家庭的鄉愁	31
第二節 共同體的想像與真實	33
第三節 校園民主化的呼聲	37
第三章 美哉吾校	42
第一節 大度山頂的神話仙境	42
第二節 校園景觀的深層意義	48
第三節 校園空間論述的變化	52

第四章	呼嘯的東海風	60
第一節	東海最早的學生自治組織--榮推會	60
第二節	東海人文批判傳統的象徵--東風社	65
第三節	東海裡的吹浪之鯨--異議性社團	68
	第二篇 吹浪之鯨	75
第五章	Leviathan：東潮時期（1987—1989）	77
第一節	80年代的東海校園與台灣社會	78
第二節	東潮與80年代東海學生運動的發軔	81
第三節	校園空間運動的萌芽	90
第四節	結論	95
第六章	雷霆之路：相思林時期（1990—1994）	97
第一節	劇變中的台灣社會	97
第二節	相思林事件	100
第三節	東海是誰的？--校園民主論戰	110
第四節	第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前期）	118
第五節	第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後期）	125
第六節	第三次相思林事件	132
第七節	性別問題的發軔	137
第八節	結論	139
第七章	最複雜的訓練：校園民主重創時期（1993—1999）	143
第一節	新國家、新教育、新運動！？	144
第二節	農牧場事件	150
第三節	德耀路大石頭事件	153
第四節	科技大樓事件	160
第五節	學生會與校園民主的困境	164
第六節	《東海風》與校園社區意識	171
第七節	東海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	176
第八節	結論	180

第八章	嘆息之牆：從小惠事件談起	184
第一節	女人來了，烏龍滾開--小惠事件	185
第二節	非正式部門作用下的東海別墅	188
第三節	失效的都市計畫與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	192
第四節	共同體想像下的校園/社會關係	197
第五節	結論	203
第九章	雲豹躑躅：後 118 時期（1999—2005）	205
第一節	公共化、全球化、教育市場化	206
第二節	啼明鳥的叫聲：118 事件	208
第三節	東海希望聯盟	222
第四節	東海保衛戰：2003 年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切割校園事件	236
第五節	第二教學區爭議	247
第六節	Leviathan 的伏筆：反東大路拓寬到「平安夜救東海」遊行	251
第七節	結論	257
	第三篇 無盡相思	261
第十章	相思三嘆：形塑校園空間問題的結構性因素	263
第一節	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嬗變	264
第二節	投機城市：台中市都市空間的轉變	270
第三節	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	277
第十一章	燃燒的荊棘---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之意義	283
第一節	相思林做為一種學生運動	283
第二節	相思林做為一種社區運動	296
第十二章	結論	304
校園空間運動的發展歷程		304
為何「三月學運」不再重現？		306
「共同體想像」與「公共性」的矛盾糾纏		308
從「抵抗性認同」向「計畫性認同」的轉化		309
學生運動做為批判性的公民教育		310

跋	313
參考文獻	314
附 錄	329
附錄一 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事件年表	330
附錄二 東海大學相關人員任期	338
附錄三 〈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芳威廉	340
附錄四 〈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東風》第40期社論	344
附錄五 〈阮大年的第一場仗〉--陳政亮	347
索 引	351



緒論

這種期望很不理性，完全瘋狂，因為沒任何東西，沒任何事物—沒世界新聞，沒全國新聞，沒一件事會肯定你所做所為…我們日日夜夜不斷告訴自己：「我們很好，我們得這樣做」--- Marcos¹

I

在戰後的台灣高等教育史上，私立東海大學無疑會有極重要的一頁。它是以繼承之前中國大陸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名而成立的學校，也是戰後台灣唯一一所完全由國外教會資金捐助成立的基督教大學。由於擁有國際建築泰斗貝聿銘在台灣唯一的作品，以及結合中國文人傳統和現代主義風格的獨特校園空間，使其擁有「台灣最美的大學校園」的稱號，這些都是為東海師生不斷傳頌的事蹟。

但除此之外在台灣學生運動史上，東海也具有極獨特的地位。雖然未能來得及參與日據時期的反帝、反殖民運動，在 60 年代保釣運動中也不是非常顯著的角色。甚至 80 年代末期的學生運動校際網絡中，東海的團體也是出現較晚，沒有趕上台灣第一個全國學運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簡稱大革會）的成立。不過很快的東海學運立即成為台灣學運，特別是中部學運，一個極重要的角色。尤其在 90 年代後東海的學生更以校園空間議題為主軸，不斷展開各種校內運動。這其中 1990 年的「相思林事件」遊行是最著名的，但 1994 年的「德耀路大石頭事件」引發的彩繪石頭的抗議行動，以及 1999 年因為校方意圖砍伐相思林地興建停車場，引起學生佔領校長室近 12 小時的「118 事件」，以及 2003 年為反對台中市府計畫開路穿越校園的「東海保衛戰」等，都是引起當時媒體及社會注目的重要事件。

東海校方對於這些事件的成因，其解釋是非常簡單的：

東海校園林木扶疏，人文氣息濃厚，根據統計，第一志願選擇東海的學生，百分之四十是因為本校具有美麗的校園，學生對校園景觀的規劃也因此有較強烈的意見（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1998：38）。

但仔細分析歷次運動中學生的訴求，就會發現學生的動機並非這麼簡單，例如在 1999 年「118 事件」發生後，由學生編成的《從相思出發》一書的前言：

¹ 《拉美地誌，魔幻行腳》，第 128 頁，舒詩偉譯著，2003.6 改版，作者發行。在此同時感謝阿偉在我於北埔大隘社工作期間，給予我的支持和訓練。特別是當時為了編輯「地震誌」時，所學到的一些工作方法，對寫作這本論文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痛惜的，絕不僅是一棵棵倒下的相思樹.... 簡單的說，整個相思林事件的爆發，清楚的暴露出校園民主的崩壞，教育資源的缺乏，以及整體校園景觀長程規劃的闕如（人間/台研，1999c）。

同時翻查東海校史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早在 1970 年代，東海學生就開始以校園景觀建築為主題，在討論大學的社會角色與大學教育的意義²。可以明顯的看出來，東海學生這一連串的行動，並非只是為了護衛「最美麗的大學」之名，其中含有對台灣社會現狀以及高等教育發展的深刻批判。同時在校園空間議題的行動上，不同世代的東海人之間有著幽微的歷史聯繫。這些都是校方片面而單一的解釋所無法呈現的。

對於學生運動進行片面而單一的解釋，其實是整個台灣社會的通病。由於「三月學運」重要的政治和象徵性意義，「野百合」幾乎是台灣社會對學生運動的唯一想像。人們將目光集中在中正廟的廣場上，以是否能重現當年野百合學運的盛況來衡量運動的成敗，緊盯住幾位當年學運的領導人物，以他們現在在社會上的表現，放大成整個運動對理想的堅持或背叛。在已走向多元化的台灣社會，對於學生運動還只有如此單一而薄弱的想像，暴露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但對於目前仍在各大學一角負隅頑抗的團體或個人來說，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具有社會整體視野的對過去歷史的紀錄與反省，而這是仍殷切期盼「野百合重現」的台灣社會與媒體，所最不能給予這些校園的理想主義者的資源。

以我個人有限的時間精力，我只能利用寫作碩士論文的机会，嘗試以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紀錄和反省我和我的同伴們所曾經走過的歷史，以做為未來的理想主義者的踏腳石。期盼台灣的學生運動能夠走出中正廟廣場的束縛，而能在各個校園的土地上，種下屬於自己環境的自由之樹。

II

放大視角面對整個台灣社會，如果把東海大學十餘年來持續不斷的校園空間運動歷史，放在 90 年代台灣社會變化的背景下來觀察，則這些看似只發生在特定校園內的事件，究竟具有甚麼樣的社會意涵？

台灣的學生運動在日據時期以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議題初試啼聲，而後逐漸發展，在 50 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遭到撲殺，於師大的四六事件後的一連串鎮壓逐漸銷聲匿跡。在 60 年代時因為保釣運動而再起，透過 70 年代部分學生個別參與《夏潮》、黨外運動而得到思想啟蒙，於 80 年代開始突破政治禁忌，而在組織和活動規模上有大幅度進展。在 1990 年的「三月學運」後，台灣的學運取得

² 請參考本論文第三章。

了正當性，不再被視為會導致亡國的洪水猛獸，並逐漸往前發展邁進。³

「三月學運」不論對於台灣社會，以及學運本身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目前關於台灣學運完整的分析與記錄，也只到「三月學運」為止。出版於1993年6月，由鄧丕雲著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本對台灣80年代後發展起來的學生運動進行完整記錄的著作。在「三月學運」之後，90年代幾個重大的學運事件，例如罷課長達一個月的「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以及持續性的「反高學費運動」，至今都沒有專門的論文、書籍予以紀錄。

這幾年因著媒體炒作，出現大量以世代建構做為青年身份的詞彙，而有「學運世代」這樣的稱呼出現。同時還有對「學運不再」的惋惜，彷彿台灣的學運已成為一種過去的理想、只能作為「過去完成式」而緬懷。2004年4月一場以「重現野百合」為名的中正廟廣場上學生絕食靜坐抗議活動，因為後續動員不足而黯然落幕，似乎又更加深了社會大眾對「學運已死」的認知。

然而台灣的學生運動真的消失了嗎？在2003年10月因為台中市政府意圖開路穿越校園，引發了東海大學學生激烈的抗議行動，從連署、網路攻擊到遊行、公投，持續了一個月的行動。在美國攻擊伊拉克事件發生後，許多大學的社團也紛紛響應校外反戰遊行、音樂會。再遠一些，在1999年921地震發生後，中部東海、中興等校學生，也組成「新社會學生鬥陣」，協助災區居民重建工作，進行社區居民訪查。而反高學費運動，幾乎成為北部輔大「黑水溝」⁴社等社團，每年下學期必定推動的議題。以筆者個人看來，台灣的學運並沒有消失，只是不再出現在中正廟的廣場上。

那麼在野百合學運之後，台灣的學生運動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又面對著甚麼樣的課題呢？

雖然記述時間只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和其後的「反軍人干政」為止，然而在書末，鄧丕雲以其有限的觀察提出了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幾個新的面向：中區學生運動、女學生運動、台語文與台研的串聯、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鄧丕雲，1993：390）。

在鄧丕雲看來，三月學運之後校園草根群眾（grassroots）⁵的大量出現，為既有的學運團體帶來新的挑戰。由於這些草根群眾自主性高，會形成自己的行動方式，因此不是學運團體所能控制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校園群眾自主動員系統由於組織化不夠，因此在行動上呈現暴起暴落，而在校際合作的代表權上，往往又為

³可以參考，陳福裕〈從反帝的人民運動到右傾機會主義〉，對這段歷史過程有個簡短但脈絡十分清楚的說明。該文刊於夏潮聯合會網站 <http://www.Xiachao.org.tw/>

⁴「黑水溝社」：原為輔仁大學「中國大陸問題研究社」，在80年代末期更名為「黑水溝」社。

⁵草根（grassroots）是個在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中被使用得很頻繁的字眼，具有某種相對於代議政治的形式民主，更進步的實質民主、參與式民主的含意。不過在這裡主要指的是非原有學運性社團幹部或成員，自發性的參與各類社會運動的學生。

學運團體所壟斷。因此在平時學運團體無法吸納這些群眾，而當運動或抗爭發生時，由於這些群眾是自主動員的，和學運團體間又有著微妙的關係。

90年三月學運後，學生運動雖然取得台灣社會的認可，但是學運本身的「主體性」的問題，並沒有因此獲得解決。1992年楊明敏在〈學運的精神分析〉（楊明敏，1992）一文中，利用繁難的拉康、德勒茲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出「三月學運」及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次年的「反白色恐怖」活動，都凸顯了學運本身主體性的貧弱，只能透過鏡像式的模仿天安門學運，或將自我神聖化，在激烈的排除異己過程中，肯定自身的存在。

那麼要如何克服學運團體和校園草根群眾間的斷裂？設法建立起學運真正的「主體性」呢？在這方面90年代的許多學生運動參與者，在實踐和論述上都做出些許嘗試。其中「大學社區運動」方向的提出，或許是和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最有關係的。

1992年一群「三月學運」的參與者，曾發行一份名為《野百合通訊》的刊物，期望透過持續的討論和交流，進行各學運團體間的資訊交流，對過去運動經驗的反省，並進而思考未來的運動路線⁶。

在1993年2月出版的《野百合通訊》第2期上，黃新高為文指出當時學運的主題，主要可區分為1.校園議題的開發，2.透過學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進而將社會議題拉回到校園裡頭兩種類型。但是不論哪種類型的議題，都共同面臨一個問題：如何長期經營？⁷（《野百合通訊》第2期：19）

黃新高建議如果要克服這個困難，有必要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它將不再訴諸學生的道德性」，也就是台灣學生運動的方向不能完全集中在以「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的形象為整體的社會議題發聲，而要將議題拉回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並藉此進行校園內的組織（同上：20）。

黃新高的文章刊出後，立即得到當時文化大學的學運團體「草山學會」的陳柏偉等人的呼應，認為「大學社區運動」或許是之後學運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⁸。並從學運幹部和一般學生的關係、議題如何選擇與深化、如何和大社會的主要矛盾扣連等面向，提出往這個方向進行的學運可能必須思考的問題。並在文章結尾時提出：

學運份子如何調整以往大規模動員、期待狂熱的政治衝突的心態，潛心於發

⁶ 這份刊物並未公開發行，而是以在各學運團體間的「小眾刊物」的方式流通。編輯委員主要是以三月學運時，非台大系統的前民學聯的幹部為主。以筆者手上現有的資料看來，這份刊物從1992年11月12日創刊號，到1994年9月共發行7期。

⁷ 黃新高，〈先鋒隊、校園群眾與校園運動—思考校內長期經營的面向〉，《野百合通訊》第2期：19—21，1993年2月

⁸ 陳柏偉、周倩而、顧家銘，〈大學社區運動：校園運動長期經營的進一步思考〉，《野百合通訊》第3期：41—42，1993年9月

展新的運動形式，乃是當前的重要課題。…面對隨著政經結構的變遷而轉變的校園，學運團體必定得在貼近「物質基礎」的思考上，做出「世俗化」的準備。而一切基進行動的可能方向由此產生（《野百合通訊》第3期：42）

並樂觀的認為：

除了文化之外，這幾年在輔大、東海等校已開始思考「大學社區」的理論，並有各自不同的論述與實踐方向，有理由相信其他各校在不久的將來必會有這方面的重大發展。

將東海大學自1987年後發生的一系列以校園空間問題為主題的運動，擺在前述的背景下來觀察。其實可以視為是台灣學運的部分團體，企圖透過「大學社區」的運動方向與議題，克服90年三月學運後學運社團和校園群眾間的斷裂，進行長期的校園經營的實踐嘗試之一。認真的分析和反省東海校園的歷史經驗，有助於我們思考和掌握9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可能性與限制性。⁹

不管是黃新高或是陳柏偉等人，在其文章中都是把「大學社區」作為一個運動實踐的路線在討論，而缺乏完整、具體的理論視野。在《野百合通訊》中這樣的寫作方式，有其現實實踐上的需要。但是做為對「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歷史的研究分析，這兩人的文章所能提供的理論視野顯得相當的有限。

關於社區運動的論述大約是在1993年之後，由於文建會大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運動」才開始在台灣流行起來。有趣的是「大學社區」作為一種學運實踐的可能，卻在1987年就見於南方朔的文章中（南方朔，1991：113-125）¹⁰。在這篇名為〈學生運動的理論變遷〉的文章中，南方朔回溯了哈伯瑪斯、馬庫色對60年代歐美學生運動的分析，以及相關的基進學生運動理論。並在反省了60年學生運動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問題之後，以柯司特（M.Castells）的社區運動理論作結，強調抗議運動應從校園走向社區，並認為有幾點好處：

一、以社區為發源地，使得整個不滿運動比較容易減少校園主義的盲動色彩，也可使抗議和改革更為落實。

二、以社區運動為基幹，使得否定性的運動更有自主性，並有更大的內涵和外延。

三、以社區運動為基幹，乃將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都吸收了進來，從而可以

⁹ 這裡並非表示「大學社區」是三月學運後台灣學運唯一或最具代表性的主題，筆者認為90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呈現多元而豐富的樣貌，除了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外還有像性別運動、反高學費運動、台語文運動等，都有待後來的研究者整理探究。

¹⁰ 該書原名為《近代新反抗運動》，1991年再版時更名為《「反」的政治社會學》

更加促進廣泛的民主運動。(南方朔, 1991: 124)

南方朔這篇文章宛如預見了「三月學運」後台灣學運所要面對的問題。這同時使我們注意到柯司特的社會運動理論在分析、探討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中所可能具有的作用。

在柯司特的理論中, 空間並不只是客觀的物理事實, 而是雜融了文化、權力、經濟的社會生活基本向度, 關於空間的結構、形式與意義, 充滿著持續不斷的衝突。這些衝突圍繞著關於文化意義的溝通、公共服務與設施的提供、日常生活的管理控制等主題而展開。而這些主題一方面既吻合東海學生在運動中的訴求, 也和 80 年代學生運動中, 有關於「大學社區」和「學生政府」的議題有相呼應之處¹¹。

雖然在東海校內通常以「校園規劃」、「校園景觀」問題, 來稱呼類似「相思林事件」之類的運動, 不過這樣的稱呼容易使我們忽略了學生的行動背後, 對高等教育乃至社會現狀更深刻的批判和訴求。「社區」雖然在柯司特的理論中具有十分基進的意涵, 如前所述東海的運動也具備了「大學社區」運動的意涵。但是在東海發生的這些運動, 在時間上遠早於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 同時「社區運動」這名稱也容易使我們將其和整個 80、90 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歷史割裂開來

為了呈現這一系列的運動所具有的豐富意涵, 我決定使用「校園空間運動」這樣一個連過去東海的學生都不曾使用過的名詞, 來稱呼這些校內的學生運動¹²。並在柯司特的意義下, 將「學生政府」、「校園民主」的議題也視為「校園空間運動」的一環。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既是 80 年代末期發展出來的學生運動的一環, 但同時具有強烈的柯司特所稱的「都市社會運動」的性質¹³。

柯司特非常重視「社區」的作用, 他認為社區是透過「抵抗性認同」(identity for resistance) 的建構而促成的, 這種認同建構的形式存在著變成「計畫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 的可能。而「計畫性認同」則能使社區中的個人, 透過一個「不同的生活」的計畫, 變成能促進社會轉化的「主體」(subjects)。但在過去做為產生「市民社會」的「正當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 建構形式中, 柯司特

¹¹ 關於柯司特的都市社會運動理論和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實踐路線的關連性, 請參見本論文第三章。

¹² 趙剛老師在口試時指出, 東海的學生運動在性質上其實更趨向於一種以地域 (Local) 或地方 (Place) 為核心的運動, 而「空間」一詞特別是在大衛哈維的脈絡下, 往往具有一種烏托邦的、理想性的意涵。確實如同本論文第八、九章所描述的, 地域主義的想像對東海校園的學生運動實踐, 產生很大的侷限。我個人是在論文快完成時, 才理解到東海的學生運動和地方感、地方認同的關連, 但已經沒有時間對這個內涵豐富的議題多做探討。在這裡使用「校園空間運動」來稱呼東海的學生運動, 首先是在柯司特、列菲伏爾等人的意義下, 強調空間作為社會的基本物質向度, 作為社會鬥爭的戰場的意義。另外也是為突顯校園空間的意義、規劃、配置作為運動實踐過程中衝突、議論的核心的重要性。感謝趙剛老師提出的意見。

¹³ 關於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這種雙重性質, 請參見本論文第十一章

認為看不出任何轉化為「計畫性認同」的可能。

不過「社區」(community)也經常是部落(tribes)的委婉的代名詞。「抵抗性認同」意味著遭遇到危機的群體，透過建立清楚的邊界，以內部和外部的對立來抵抗無法忍受的壓迫，這幾乎是所有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必經的過程。但是這也可能讓運動成為基本教義派和共同體想像的俘虜，走入排他性的宗派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死路。但另一方面如果能以社會整體的轉化為目標，延伸產生在抵抗社區之內的利益與價值以對抗資本、權力、與資訊全球化的支配利益，則運動就能持續的組織與發展，並提升參與者行動與反思的能力，因此核心的問題是：如何讓「抵抗性認同」轉化成「計畫性認同」？

這其實也是 1990 年之後台灣的學生運動所要面對的問題。「大學社區」的路線雖然把焦點放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但並未因此放棄了對整體社會制度的關注，而是希望透過對日常生活議題的經營，進行學生的組織與意識提升——一個在 P.Freire、H.A.Giroux 的意義下的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的實踐。

這個批判教育學的實踐發生在組織活動與日常生活之間，一個由論述與運動網絡的連結形成的想像性的領域中，即巴西的學者 Sonia E. Alvarez 所說的「另類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aces)。這個「另類公共領域」並非是原本哈伯瑪斯意義下國家的公領域和個人/市場的私領域之間的一個理想的論述空間，而是一個和公共領域(或說是主要的公共領域)平行的空間(Alvarez, 1997: 87)。

更具體的來說，學生運動所要進行的是讓被壓迫者或具有批判意識的師生，在另類公共領域中透過批判教育學的實踐，發明自己的符號和論述以建立自己的認同和立場，再進入為支配利益主宰的「主要公共領域」，和主流文化霸權對民主與教育的想像相抗衡。

關於公共性、公共領域等概念，近年來成為批判與理解台灣社會現狀的關鍵詞彙。有學者認為：

如果台灣政治演變的既有進程。可以分為「自由化」到「民主化」，那麼接下來一個階段，應該就是民主生活以「公共化」為目標的深化質變。

(錢永祥，2004：112)

或是主張將台灣公共領域無法產生的問題，帶進對之前社會改革的反省中：

檢討台灣公共領域的難產，會讓我們對於社會改革更具有現實感和歷史感，也促使我們面對改革事業不斷面對的問題。

(吳介民，參見《當代》雜誌 188 期)。

不過環顧既有相關的研究文獻，對於台灣的公共領域實踐的研究，大都從論述模式出發，往往把分析侷限在國家威權統治遺緒、上層政治或文化界精英的互

動等探討上，缺乏對民間日常政治生活經驗的理解。李丁讚¹⁴因此提出應該把眼光投注到：

基層社會民眾政治對話與實踐的場域，觀察現代性公民社會的建構形貌，分析其樣態以及所遭逢的行動困境。(李丁讚，2004：2)

同樣的關於台灣在 80 年末期萌發的社會運動，雖已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但李丁讚、林文源注意到，這些論文大多偏向以外在環境作為解釋社會力量興起的原因，但這種研究方式並未觸及到民間部門的自主性。雖然在 80 年代末期，台灣確實出現政治控制力量鬆動的現象，但是「外部控制力量鬆動了或不見了，社會內部的力量也不見得會自發地萌生。」(李丁讚與林文源，2000：141) 他們認為應該把社會內部自主力量如何出現作為研究焦點，而不只是當成被解釋的對象。

而莊雅仲¹⁵注意到目前對 1990 年代後社會運動的抗爭文化的討論，都描繪出

一幅失去了著力點與被昔日盟友背叛的落寞無助景象；另外則有人談論「成年」後的台灣社運，開始朝專業化與制度化的非營利組織之路邁進，相關的經濟管理技術也應運而生(莊雅仲，2003：13-2)

但是莊雅仲從對 1997 年白曉燕事件後的「五月運動」的組織過程的研究中，認為實際的狀況可能遠比這兩種圖像要複雜且多元，這裡面夾雜著對達成目標的手段的猶豫，社會/文化與政治的辯證、組織動力與政策形成的技術與文化等問題。

總結以上的討論，關於柯司特的理論中，「計畫性認同」如何從「抵抗性認同」中浮現的問題，放在台灣的情境下，和台灣社會公共領域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特別是在社會運動中，一種使得「計畫性認同」有可能浮現的批判教育學的實踐，通常是發生在社會運動的「另類公共領域」之中的。但是關於台灣的公共領域和社會運動的研究，如同李丁讚、莊雅仲所指出的，必須轉換視角，透過類似民族誌的研究方式，去瞭解行動者日常政治經驗的構成--他們的追求與失落、希望與挫折、可能與限制。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從 1987 年以來一連串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或許只是東海大學，甚或少數關心東海校園環境變化的師生的問題。然而東海校園並非孤立於台灣整體社會環境之外，以東海的歷史經驗為出發點，可以協助我們重新理解 9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面貌，發掘台灣社會邁向「公共化」的可能性與限制性。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W. Mills)殷切的期待社會科學可以成為一種公共智

¹⁴ 感謝李丁讚老師於百忙之中還撥冗和我討論論文研究以及口試時遇到的一些問題。

¹⁵ 感謝莊雅仲老師於論文寫作過程中提供的意見。還有客家社會運動研究案的助理張灝方，專程趕來聽我的口試，並祝灝方的碩士論文能順利完成。

識的工具，能向人揭示公共議題與個人煩惱之間的關連，及隱藏於其間的結構性趨勢 (Mills, 1995: 242)。東海的創校者曾期許這所學校能夠成為「一所為台灣人民服務的大學」，若能從東海校園個別的問題，去理解掌握整體台灣社會邁向民主化的可能與限制，或許是這所學校服務台灣人民的另一種方式。

IV

在此對於這本論文的主題和章節內容作個簡單的介紹。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 1987--2005 年間，在台灣私立東海大學校園內持續發生的，以校園空間為主題的學生運動。雖然東海大學素來以其校園景觀而聞名，但是考察校史文獻與學生運動的論述，筆者認為這些運動的發生，並不只是為了護衛「最美麗的大學」之名。學生的行動和東海過去的歷史有著幽微的聯繫，並且蘊含著深刻的對台灣社會現狀及高等教育發展的批判。

本論文第一篇首先回顧東海過去的歷史，以突顯學生當下的行動和過去的連結。第一章指出在 1970 年代東海大學因校園內外環境的不變，開始對校務發展方向進行一連串的爭辯與改革。這場爭辯並延伸為關於東海大學乃至整個高等教育，在台灣社會的定位和意義的反思。雖然東海大學的轉型工作，在梅可望擔任校長時期可說宣告完成。但是這場發軔於 1970 年代的「未竟的探討」，卻對東海的校園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第二章中則分析視東海校園為一個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包括對這個「共同體」在 70 年代後逐漸消失的追懷與反思。本文認為這個想像建基在對當下現實的不滿和批判，未必吻合於東海創校初期的歷史實況。但在這種想像中存在著透過「大學民主化」以克服校內的疏離感的積極意涵。

第三章則先分析在各種文學作品中，東海校園被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方式。使得「美哉東海」成為東海人乃至整個台灣社會對東海校園的第一印象。但校園景觀除了作為東海和其他學校區別的差異外，也是校內對公共事務、高等教育、乃至校園發展方向進行討論時的「論述場域」(discourse field)，這使得校園景觀的重要性不斷的被反覆加強。

第四章則是描述在關於校園公共事務的討論中學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自 1970 年代以來，學生關於校園空間議題的論述模式發生的變化。雖然東海學生在 50、70 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並未有積極的參與，但我們可以發現東海在 80、90 年代後的學生運動，和創校初期的榮譽制度推行委員會 (簡稱：榮推會)、東風社的歷史傳統，有著密切的關連。

第二篇則詳述自 1987--2005 年間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本論文將這段漫長的歷史粗略的分為四個時期。第五章首先討論自 1987--1990 的「東潮時期」，

這段時間是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的開端，東海學生以地上或地下的形式，對威權時代的校園管理機制進行批判，東海校方也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制度變革。並由於社會環境的變化，發生最早的關於校園空間問題的爭議

第六章則討論在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意義重大的「相思林時期」，這段時期起自 1990 年的相思林事件，以 1994 年「三次相思林事件」確定無法要回校地而告終。這段漫長而讓人扼腕的歷史，確立了學生介入校園空間議題的正當性，累積了龐大的歷史記憶和情感，不斷召喚後來的東海人繼續進行對校園空間的保衛戰。

第七章則討論 1993--1999 的「校園民主重創時期」，在這段期間東海於 1989 年間建立起來的校園民主機制，其侷限性已充分顯露。同時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大量「自主性群眾」的出現，對既往學生運動的實踐造成挑戰。面對這樣的情勢，部分東海學生仍嘗試改造利用學生會，而另外有些人則開始嘗試一些新的實踐方式，包括：美學化的運動策略、社區運動理念的引入等等。

第八章從 1998 年的「小惠事件」談起，分析東海校園周遭社會環境的變化--由非正式部門運作形成的「東海別墅」(簡稱：東別)，以及正式部門失效的都市計畫機制促成的「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及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之最大侷限--對校園周遭社區環境的缺乏關注。這種侷限性的形成，來自於東海校園處身的社會空間結構，也和整個校園空間運動的論述發展中潛藏的深刻的共同體想像有關係。

第九章則探討尚在進行中的「後 118 時期」。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壓力下，東海校方進行的一系列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因為「合法化危機」的作用而事倍功半。而學生的行動則受限於共同體想像造成的「地域主義」的侷限，不過共同體想像以及過去運動累積的歷史記憶、文化論述，仍然使得 2000 年「V 大樓事件」、2003 年「東海保衛戰」表現出驚人的運動能量。而隨著開闢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校園的壓力劇增，也帶出東海大學如何和周遭的社區相處的問題。

第三篇則嘗試著從結構性、整體性、歷史性的視角，分析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意義。第十章分析隱含在東海校園空間議題中的結構性因素，分別是戰後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變化，大台中地區都市空間的發展，以及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而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也因此具有凸顯、改變這些台灣社會的結構性矛盾的意義。

第十一章則從 P.Freire、H.A.Giroux 的批判教育學 (critical pedagogy) 以及柯司特的都市社會運動理論的角度，去分析東海空間運動的意義。本論文認為對內而言，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具有對抗主流的教育文化霸權，進行批判教育學實踐，以創造具批判意識的公民的作用。對外而言，則是一種對於台灣高等教育以及台中都市空間發展的雙重背景下，大學校園呈現的集體消費、文化認同、以及草根

民主的問題的抗議。雖然由於歷史的侷限，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仍無法有效突破「地域主義」的限制，將「抵抗性認同」轉化為「計畫性認同」。但長久而持續的歷史實踐，也為東海的校園文化累積了豐厚的資產

第十二章則從本論文的研究成果，試圖和目前台灣的學生運動論述、公共領域理論、柯司特的「認同轉化」理論進行對話，最後則以建議將看待學生運動的視角，由「三月學運」的為民請命轉換成視學運為校園內的批判教育學實踐做結。

V

著名的後殖民文化理論家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在其名著「東方主義」一書的緒論裡，引用了葛蘭西《獄中札記》的一段話：

批判論證的起始點便是意識到個人真正是什麼，而這種「知道你自己」是歷史過程的產物，它有無限的軌跡存放在你身上，但卻沒有留下任何的目錄。因此，在最初就絕對需要編纂這樣的一種目錄（E.W.Said，1999：34）

除了題目也有一個「東」字之外，這本論文和薩依德乃至各門各派的後殖民理論都沒有甚麼關係。但是這本關於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研究，其實也是一個要把加諸於我身上的所有軌跡編纂目錄的嘗試。決定選擇這個研究主題，不只是出於這個題目在學術上的意義，也來自於個人在大學時代參與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經驗。

在進入研究所之初，我原本是想以「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作為研究主題，並已花了一學期的時間蒐集相關文獻¹⁶。不過在研一下學期時一場課堂的讀書報告改變了我的想法，一種強烈的情緒--彷彿不試著為自己發聲的話，則將被世界所遺忘、所拋棄一般，使我決定放棄原來的研究計畫，以東海大學的校園空間運動作為研究主題¹⁷。某種程度上寫作這本論文或可算是一個心理治療，一個透過寫作進行自我驅魔的過程。不過也因為過去的記憶所連接的感情和友誼，推動著我在面對論文寫作過程中，必然會有的寂寞、煩悶、沮喪來臨時，還能夠繼續堅持的將它完成。

寫作過程中最大的幫助和困擾都來自於東海。東海圖書館特藏組保存的校史文獻，讓我有充分的資源可以從更長遠、更寬廣的角度去省視東海校園在 90 年代的這段歷史。但同時我的論文研究時段卻因著運動的發展而不斷後延。從最先

¹⁶ 感謝陳秀柑、劉永逸以及「石岡鄉社區文化發展協會」、「大牛庄」的朋友們在我於石岡工作時給予我的協助。同時也謝謝「東勢愛鄉協進會」的楊麗琴理事長以及邱晨、梁梅珍，在我研一上研擬論文計畫書時，提供給我的各項文獻資料。

¹⁷ 感謝進益當天關於學生運動的報告以及盈璇的回應，還有我在研一下期末提出「長篇累牘」的東海學生運動的研究計畫時，封良、家儀、仕弘、家弘給予的寶貴意見。邱德亮老師和博士班的王維資、吳哲良都曾給予我的研究計畫許多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提出研究構想時的「1987--2001」，因著「東海保衛戰」的發生，而在提研究計畫書時改成「1987--2003」，到論文寫作時又因著「第二教學區爭議」和「東大路拓寬」事件，改成了「1987--2005」。在論文即將完稿前夕又發生了「平安夜救東海」遊行，使得論文不得不多加篇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表示我書寫的不是已經僵死的陳跡，而是還活著、正在發生的歷史。能有這種困擾其實也是研究者的福氣。

「回顧歷史的目的，不就是要重新回溯，汲取力量」¹⁸，希望除了我個人之外，還有更多的人也能夠從這本論文中汲取到力量。



¹⁸ 郭紀舟，1999，《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海峽學術出版社

楔 子

西元 2003 年，民國九十二年，歲次癸未。

陽曆十月，時值寒露。

斗指南甲為寒露，斯時露寒而冷且將欲凝結，故名寒露。

台中，東海大學。

杭立武見校地適在台灣海峽東側，傾向使用「海東」兩字，經凌純聲先生建議「東海」一名更佳，遂定校名為：東海大學。

中台灣的暖陽照在相思樹林間，看不出有甚麼寒氣將要凝結。但在瀕臨期中考前夕，應是十分寧靜的校園裡，一股怨憤之氣倒是呼之欲出。

連署、遊行、公投，校園裡傳來一聲聲的吶喊，一連串的行動為的是要阻止將讓東海校園斬頭截尾、開膛破肚的都市計畫道路規劃案。

10月9日，中國時報、蘋果日報等媒體報導：台中工業區策進會，為解決交通問題，計畫於台中市都市計畫會議時，提出貫通東海校園的聯外道路案。計畫中的道路共有三個方案，方案一要穿過東海大學牧場，方案二要穿過東海的路思義教堂，方案三則要穿過位於東海校園的相思林地。

學生們因為這則新聞而騷動起來，在網路上熱烈的討論著。畢聯會、研究生聯誼會和數個系學會立即組成了「東海精神團結陣線」，發佈消息，號召同學加入網路連署，捍衛校園。他們在聲明中說：

相思林、路思義教堂、東海牧場為東海人之精神指標，東海人為維護其完整性，勢必反對到底！！

回憶起以前為了相思林奮鬥的諸多學長姐，今天的我們是否繼承了那份勇氣與榮譽？

在相思林的一隅，郵政總局的「電腦備援中心」高高地矗立著。那是多年孤立無援的負隅頑抗的見證，也提醒著抗議的學生，若是行動失敗會有怎麼樣的悲慘後果！！

眾多校友、老師、學生紛紛在媒體上發文，抨擊工業區和市府的不當決策。一場場的說明會在校園裡召開，參與的師生們紛紛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分析事件的成因、可能發展以及校園環境變化的歷史。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在說明會中被傳揚開來。一些新生開始理解到，原來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東海的學生為了對抗各種破壞校園的力量挺身而出。

媒體上的攻勢連綿不絕，除了師生和校友的投書外，學生發出數波的文宣。「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分割東海校園事件問題集」的文宣，向校內師生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分析地一清二楚，儼然是一本態度嚴謹、資料完備的專業學術報告。「十三問胡市長」則對台中市長胡志強的市政規劃理念，與任內對改善大眾運輸系統的輕忽提出強烈的質疑。加上網路的「電子郵件戰」、市府前的記者會和行動劇、與中客罷工司機的串連聲援，密集而又尖銳的攻擊，維持了媒體上對於「聯外道路事件」的熱度。讓人訝異，深鎖於大度山上的東海學生，竟對外在社會環境有這樣的瞭解。

然而在 1989 年東海學生爲了改善東別惡劣的環境品質，曾有人提議發起「落籍運動」以擴大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在 1992 年也有學生參與附近新東社區居民，反對在社區內設立納骨塔的抗議事件。

11 月 4 日百餘名學生在校園內舉行遊行，喊出「愛台中，請別傷害東海」、「砸錢幫財團開路，沒錢救大眾運輸」等口號。遊行隊伍在綜合教學大樓集合，走進當年「118 事件」中，從校方的停車場設立計畫中搶救出來的相思林地，再一路沿著文理大道直下路思義教堂。文理大道兩側的老樹搖曳，似乎還記得當年的「相思林事件」--東海校園的第一場遊行，走的就是文理大道。遊行隊伍最後在東海牧場，面對著當年「農牧場事件」後開闢的道路，發表一段感性的宣言後解散。

11 月 5 日東海學生會聯合各系學會，在校園內舉行公投，就市府提案希望開闢穿越東海校園的聯外道路一案，讓同學們圈選贊成或反對意見。共有八千九百人參與投票，其中反對票八千八百四十人，贊成者僅二十六人，另有三十四張無效票。媒體報導：「東海公投護校，首開校園先例」。只有一些老校友還記得，當年校內爲了「綜合教學大樓」的興建與否吵得沸沸揚揚之時，曾有社團主張以全校公投的方式來做決定。

自諷「沒吃過豬，也看過豬走路」的胡志強市長，只怕從沒看過拉著白布條的學生在校園裡高歌「We Shall Overcome!!」。他指稱整件事簡直是白天遇鬼，懷疑有心人幕後操縱，要求影武者站出來！在這個善於遺忘歷史的島嶼上，人們往往只從表面上斷裂而孤立的事件去誇大議論，「陰謀論」就成了這樣的視角下，唯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釋方式。

胡市長猜對了一點，是有股力量在整件事情背後運作著，但不是他所想像的恐怖的「影武者」。而是歷史在東海校園中，透過一代又一代的實踐所累積出來的力量。用「傳統」來形容似乎太沈重，用「經驗」來稱呼又太鬆散，但不論如何稱呼，這些力量在東海校園環境可能發生變化的時候，總會不知不覺的冒現出來。

寒露過後，秋風吹起，穿越相思林，響起一陣陣歷史的回聲...

第一篇 夢谷啼明

心裡的鳥啼聲並不是快樂的，但他必須諦聽



——司馬中原



第一章 未竟的探討

這個既存的环境永遠是不完美的，問題是永遠存在的，因此我們的探討也就是「未竟」的

--- 《東風》45期專欄

只有一次，我被問得啞口無言，那是有人問我：「你是誰？」

---卡哈里·紀伯倫，〈沙與泡沫〉

第一節 東海大學創校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

在中國近代史上，基督新教教會對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曾做出很大的貢獻。自從 1865 年於上海成立聖約翰大學以來，基督新教教會在 1949 年以前在中國共成立了十三所頗負盛名的基督教大學¹⁹。

1919 年的「五四運動」發生後，中國的大學生開始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對國家重大議題發出他們的聲音。由於基督教大學多半秉持自由主義的教育傳統（liberal education），使其學生往往積極參與對國家或行政機關爭取自由的行動。例如設在北平和清華、北大鼎足而立的燕京大學，就是當時學生運動的中心，在 1920-1940 年間發動了多起的民權運動。這樣的歷史經驗使得國民黨在 1949 年退守台灣之後，嚴密監視大學生的活動，並對於基督教大學的運作施加強烈的影響力（Chang，1982：12-13）。

¹⁹ 這十三所大學分別是：

華北：燕京大學（北平）、齊魯大學（濟南）

華東：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南京）、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上海）、東吳大學（蘇州）、之江大學（杭州）

華中：華中大學（武昌）

華西：華西協和大學（成都）

華南：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福州）、嶺南大學（廣州）



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只有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五所大專院校，高等教育資源十分貧乏²⁰。雖然在 1946 年時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曾致函成立於 1932 年，負責襄助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希望聯董會可以支持在台灣成立一所基督教的學院（college）。但聯董會當時專注於現有學校在戰後的重建工作，因此拒絕了長老教會的請求（Chang：20）。

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抵台灣海峽，穩定了國民政府在台灣汲汲可危的局勢，國民政府此時才有心力關注高等教育的發展。但由於擔心之前在中國大陸的經驗重演，仍對私人興學採取十分謹慎小心的態度。不過在許多原來中國基督教大學校友的努力下，1954 年蘇州大學（東吳大學）於台北市的市中心復校，1955 年在桃園成立中原大學，但這些大學的成立都缺乏國外教會的資助（Chang：15）。

好事多磨

1951 年聯董會開始認真考慮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University)的可行性，並在次年 2 月由執行秘書芳威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專程來台，與台灣教育界及宗教界領袖討論設校條件。

4 月 2 日芳威廉博士向聯董會提出〈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的備忘錄〉，建議聯董會對於在台設立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他認為這所大學不應是中國大陸任何一所教會大學的翻版：

這是一個開始，我們有機會去創立一個不同形態的大學（東史：4-5）

聯董會對芳威廉博士的提議表示熱烈支持，同時根據芳威廉的備忘錄擬定了〈計畫中的基督教大學之方針與目的說明〉。之後聯董會於台北成立籌備處，積極推動設校的工作，在和各方人士聯繫討論後，決定將這所學校設立於台中的大度山²¹上，並命名為「東海大學」。

曾參與東海大學籌備設校工作的台灣長老教會黃武東先生，回憶籌備處初次赴台中看察校地時的感受：

八十餘甲土地當中，有大約三分之一被占耕，其餘全是一片淒涼的荒埔。我記得初到現場時，眼見這塊不毛之地，即是建造象牙之塔的地方，內心不禁自問：「這否作夢？」（黃武東，1989：222）

²⁰ 這五所學校分別是：台北帝國大學（今台大）、台北經濟專門學校（今台大管理學院）、台北女子專門學校（光復後停辦）、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今台中中興大學）、台南工業專門學校（今成大）（花松村，1996：796）。

²¹ 東海所在地為台中的「大肚山」，第一任校長曾約農將其更名為「大度山」，故東海師生多以「大度山」稱之，但校外的西屯、龍井地區的居民，還是多半以舊名「大肚山」稱之。

雖然聯董會懷抱著高度的熱情和理想，但是官方對成立私立大學還是有很多政治性的考量。1953年6月籌備委員之一的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 Graham)就東海設校問題和教育部長程天放會面時，教育部仍表示 1. 考量戰時經濟，希望學校的建築規模不要超過燕京、金陵大學的範圍 2. 人事安排上要減少左翼(left-wingers)人士涉入，並盡量選取本地人士 3. 雖然有安排課程、教學內容的自由，但仍必須遵照教育部規定行事(Chang: 15)。

同時除文、理之外的第三學院，聯董會雖傾向成立「社會科學學院」，但教育部則希望東海能發展醫學、農業或工程等實用技術的學院，而不要成立關注現實政治，可能會引起爭議的社會科學院(Chang: 35)。對教育部來說「社會科學」就等同於「社會主義」，使得「社會科學學院」的成立，因為名稱問題而暫緩²²。

東海董事會²³原先議決延請曾任福建協和大學校長，並積極協助籌備工作的陳錫恩博士擔任校長。但是由於陳錫恩具有美國國籍，教育部建議最好另行物色，同時陳個人也堅辭，校長人選問題遂擱置。經過多次協調後，最後決定由曾約農先生擔任首任東海大學校長。

1953年11月，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華，並於11月11日應邀至台中大度山校地，為東海大學舉行奠基破土典禮。

不過籌備設校的工作仍然一波三折，黃武東先生回憶：學校雖已破土施工，然而教育部卻遲遲未批准立案，為此籌備會幾乎每週開會，但仍然不得其解。

據說：因政府某機關人士反對，其理由，是認為東海大學是一所外國人斥資興建的學校，設在某軍事基地(指台中水湳軍事機場)鄰近山上，事關國防機密，不應核准。

籌備會為此甚覺困難，進度陷於膠著。最後，記得是瑞典籍的宣教師 Rev. Dr. Sovic 委員心生妙計，建議設法請蔣夫人協助。由於當時台灣尚未退出聯合國，而且還接受美援，籌備會以「該校已經請友邦副元首(指尼克森)破土，且木已成舟，萬一設校不成，無以向盟國政府及聯董會屬下的美國基督教會交待」為由，透過蔣夫人的管道，才倖獲核准(黃武東，1989: 222-223)。

1955年10月31日東海大學第一屆新生正式入學，創校之初只有文理兩學院共七個系，只招收了兩百名學生。在聯董會的構想裡面，東海大學「將是一所不超過五、六百人的小型大學，因為人數太多會危及基督教理想氣氛的發展與堅持」(東海風: 8)。

²² 「關於第三學院，四十五年四月董事會雖通過設立『社會科學學院』，但因名稱問題，並沒有正式成立。」(東史: 62，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³ 由於東海創校初期受到兩個董事會的管理：美國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和台灣的「東海大學董事會」，本文凡稱「董事會」或是「東海董事會」之處皆指稱後者。美國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則簡稱「聯董會」。

享譽國際的校園環境

東海大學的校園是由貝聿銘建築師設計，1954年4月邀請陳其寬、張肇康共同參與。初步設計均在美國紐約進行，同年11月全部草案決定，寄回台灣獲東海大學籌備處通過，並委託台灣本地建築師林澍民繪製施工圖，招標興工，由楊介眉建築師、范哲明工程師負責執行。1956年8月以後，再由張肇康、陳其寬負責後續工程的進行。在設計之初，張肇康即想在校園規劃中結合傳統中國的人文理想，因此採取中國傳統三合院式的校園設計，這成爲東海校園建築的一大特色。

由於東海是一座教會學校，聯董會認爲「在校園中要有一座教堂，而且要矗立在校園中最重要和最適當的位置，經常開放給全校師生，接受主耶穌的精神啟示。」（東海風：209），因此在創校八年後路思義教堂(Luce chapel)²⁴正式動工，並於1963年完工啓用。

特出的校園空間設計，使得東海校園享譽國際。尤其是路思義教堂，被視爲是現代建築的經典案例。同時也是後來因爲設計香港中國大樓、法國巴黎羅浮宮玻璃金字塔而享譽國際的貝聿銘建築師在台灣的唯一作品。

第二節 爭議與轉型：東海要往哪裡去？

校園發展方向爭議

1966年到1972年，根據《東海大學校史》的分段是東海大學的「爭議時期」，而1972年到1978年則是爲東海的「轉型時期」。鄭禎樺則從校園景觀空間變遷的角度，認爲東海在1971--1977年間進入了「校園景觀空間轉型期」，他的分段意涵著東海的轉型爭議並未在1972年就中止，而是一直持續到1977年梅可望接任東海校長後爲止。

觀諸校史，即使在轉型時期仍存在許多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因此可以說東海從1966到1977年間，由於內外環境的丕變，校園內部一直處在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和轉型調適的過程中。這麼長久的過程，對東海的校園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²⁵。

但是不論如何分段，關於爭議和轉型產生的原因，卻是非常清楚的：

有關東海方向的爭議，其關鍵端在財源一事。也就是本校財政面臨困難，引

²⁴ 「Chapel 指的是建築物本身，通常是附屬於學校或社區的小禮拜堂。而 Church 指的是有組織性質的教堂。內設有唱詩班、查經班等組織。」（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2：99）

²⁵ 我是在研二修習劉紀蕙老師的「神聖與賤斥」，於課堂上聽到林封良學長的報告，才猛然醒覺到這段70年代的歷史，對日後東海的校園文化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在此感謝封良的報告提供給我的靈感。

起了如何以最好的途徑和方式發展東海的爭論。本校財政面臨的壓力，起因於年度預算日益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聯合董事會對本校政策又有轉變，促請本校儘早謀求自立自足。結果財政壓力終又導致本校教職員由原有的優勢轉為劣勢，最後竟不能與公立大學相比，於是爭論因之轉劇（東史：245）

由於東海大學創校之初，全賴聯董會提供財源，台灣本地幾乎毫無贊助。1956年聯董會更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致力以更多力量發展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1958年聯董會積存的基金（此款係由大陸教會大學的結束而結存著）幾乎已用罄，因此投注在東海大學的資源更少，對東海在財務上能完全仰賴台灣本地捐助的期望也更殷切。

然而要求東海大學在財務上完全獨立自主，談何容易？在東大創校第十年（1964）聯董會提出的《東海大學調查報告書》在財源一項即指出：

東海太過依賴外國財源的贊助...每年大約新台幣一千萬元的總預算中，外國的資助占了72.9%，而台灣本地的財源只佔27.1%（東史：232）

1966年東海財務問題日益嚴重，《東海大學校史》稱當年為「本校財政面臨困境而必須尋求突破的轉捩點」（東史：248）雖然東海大學於當年進行首次的募捐活動，但是僅得四十五萬元，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對於東海的財務危機要如何解決，連繫到東海未來的發展方向的問題。就目前的文獻資料看來：「本校發展方向之爭議的主要內容為擴大招生、成立研究所及創辦夜間部」（東史：256）

當時東海教授會自1966年起，即多次提案，認為為增闢財源、滿足社會需要、提高學術研究水準，東海應考慮擴大招生及成立研究所、創辦夜間部。校長吳德耀先生初時表示：「牽涉問題甚多，尚須從長計議」（前揭書：257）經過多次討論後，董事會才在1968年5月31日董事會議上，做出四年之內增收學生至一千兩百人的計畫。但是關於成立研究所以及夜間部的計畫，吳校長則表示，雖然現在已是東海必須重新評估它的理想和教育目標的時候，但是關於這兩項提議，必須審慎考量學校教學品質是否能維持，以及這些措施是否能有效解決財務問題後才能進行（前揭書：258-260）。

吳校長的意見並未獲得教授會的同意和諒解，同年10月23日時教授會召開全體會員大會，與會教授對校務發展停滯不前甚為憂慮，因此投票表示對吳校長領導校政方針的不滿，並致函董事會各董事及芳威廉博士（前揭書：262）。

1969年4月，吳校長才在經過一連串的爭議後，於「本校今後之發展方針」報告中表示，擬增加學生人數與增設院系成立研究所、研究中心。至於夜間部的開辦則尚未有決議（前揭書：263-264）。

東海的新時代！？

1970年，東海的催生者，聯董會執行秘書芳威廉博士退休。

東海之能順利成長且贏得佳譽，芳威廉博士之全力支持，功不可沒。隨著芳威廉博士的退休，東海步入了另一個新時代，一個極其艱苦的時代（東史：252）

次年，擔任第二任校長長達14年的吳德耀校長辭職，由教務長唐守謙代理校長職務。

種種爭議的問題最後還是獲得解決，1970年東海大學正式成立中國文學及歷史兩研究所，並開始招生。1972年5月9日，董事會通過由謝明山擔任東海校長，並正式成立東海大學夜間部，由謝明山校長兼夜間部主任，呂士朋教授任副主任。同時由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宿舍不敷使用，首次開放部分學生外宿，東海學生全體住校的傳統就在此時被打破了。

同年聯董會開始實施五年遞減計畫，逐漸停止對東海大學經常費的補助

這所以繼承前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名而成立的學校，必須開始摸索一條新的道路...

學生對爭議的參與

除了校長與教授外，東海學生們也透過各種方式，參與了對學校未來方向的討論。

針對東海轉型的爭議，在1970年出版的《東風》第四卷第一期，刊出由金惠敏翻譯自《Saturday Review》雜誌，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 Jacques Barzun 撰寫的一篇文章〈未來的大學--返回中古？〉。文章主要是在美國60年代風起雲湧的大學學生運動發生後，重新思考學校管理與學生權力的問題，其內容充分應合著當時東海所面對的問題。

1971年5月，由東海「榮譽制度推行委員會」出版的第7期《大度風》雜誌，收集了各方學生對東海轉型問題的意見。學生們的意見不一，不過大體上集中在質與量如何兼顧、小班制和全體住校制應否廢除、是否應設立研究所和夜間部等問題上。

1973年，富有歷史的東海學生社團刊物《東風》第40期，也以專題討論東海的校園變化。其中刊出了由溫肇冬、張滄舟翻譯的一篇訪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務長威廉鮑文的文章，在這篇名為〈私立大學的財政危機〉的文章中，威廉鮑文以他身為經濟學教授及教務長的身份，討論私立大學的財務問題，校務發展計畫及行政管理的基本方向，以及學生在其中可以參與扮演的角色。



而在當期的社論〈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中則提出：對於東海發展方向的討論不應集中在小班制、住校制等實務問題上，真正重要並需要思考的是：

東海如何以一個現代大學的身份，在現今世界的潮流和台灣的現實脈絡裡生存發展。只有以這樣的考慮，一所大學才可能對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精神上的抱殘守缺，理想的忽視才是一所大學破落的根本

（《東風》第 40 期：1）

該文同時提出兩個建構現代大學教育價值的方向，「大學民主化」以及「大學社會化」。「大學民主化」是指現代大學在本質上所表現出的師生共同參與的精神，而「大學社會化」是指大學以對社會的貢獻作為存在的價值。東風社希望校內師生秉持著這兩個基本的方向，認同東海，參與東海，對同胞以及社會培養更寬廣的關懷，對社會付出大學生應盡的貢獻和義務，對大學本身發揮共同參與的熱誠。

緊接著在第 44 期、45 期《東風》，則以「未竟的探討」專欄，對東海因轉變所帶來的問題，做了原則性以及實質性的探討。其後各期的《東風》也一直持續針對東海校園內外環境的變化，進行專題討論，舉辦相關活動。一直到 1978 年梅可望擔任東海校長後，雖然校史上認為此時「轉型時期」已結束，開始了東海的「擴展時期」，但《東風》仍針對校外「台中工業區」的設置，舉辦專題討論座談會。

十年來東風一直討論著東海的變遷，謀求在變中完成崇高莊嚴的教育理想。...我們並不追求陶醉，而是在找尋覺醒（《東風》53 期：1）

這十年找尋覺醒的努力，寄存在終年吹拂大度山的東海風中。直到 1990 年因為一棵棵倒下的相思樹，當年學生關注校園環境的熱情驀然散發開來，成就了一場持續不斷的校園運動。

第三節 新方向：尋求獨立、走入社會、校園改革

從現有的文獻看來，70 年代的東海，在面對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除了表面的財務危機和擴大招生與否等問題外，基本上是朝著尋求獨立、走入社會、校園改革三個目標在進行，而對這三個目標的思考與實踐，也深遠的影響了後來整個東海校務的發展。

尋求獨立

東海在創校之初就訂定了明確的董事會組織章程。董事名額訂為十一至十五

人，並由董事互推董事長一人，常務董事二至四人。同時為使東海能夠充分和本地社會結合，又明訂董事的產生分別由甲、本地基督長老教會提名三人，乙、各差會及本省其他教會提名三人，丙、由聯董會代表創辦人提名三人，丁、本校畢業生協會（即校友）提名三人，戊、董事會連同聯董會特約三人。董事名額訂為 15 人至 20 人（東史：85）。

但東海是在聯董會的支持下創辦的，雖然在東海創校籌備之初，聯董會即聲明：聯合董事會係一支持之機構，並不直接處理行政。只對每一計畫開始前，是否值得予以經濟上的援助進行決定，至於計畫之實施與執行則不加干預²⁶。但以東海在創校之初，財務上有七成仰賴國外資助的情況來看，聯董會也承認：「這種對外國財源的依賴，很不幸地造成了外國團體在決策上的投入（involvement）」（東史：232）。由於聯董會對於校務運作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此時的東海連行政會議的討論都用英文²⁷。

兩個董事會的存在，使得東海的校務運作呈現某種矛盾的狀態。這具體的表現在創校初期「會計長」（controller）的職位上。這個職務的人選由聯董會指派，並直接向聯董會及董事會負責，加上其含糊又廣泛的工作內容（行政管理、會計出納、庶務），使會計長和由董事會選出的校長的職權必然發生衝突。東海首任校長曾約農即曾表示，首任會計長畢律斯（Miss Elsie Priest）的存在，使他感覺自己並未受到充分授權（Chang:144）。但會計長必須同時向兩個董事會負責，並夾在校內教職員和聯董會之間，基本上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而除了首任會計長畢律斯外，後面幾任會計長都在處理財務問題上碰到極大的困難²⁸。

吳德耀校長接掌東海校長初期，因為聯董會的支持，尚能主掌校務運作。但是在面對校園發展方向爭議時，他事事仰賴聯董會的態度，看起來簡直是「無為而治」。例如：在 1966 年 4 月教授會提出增收學生名額、開辦夜間部等建議後，於 1968 年時教授會又再提出類似提議：

吳校長答覆：「…研究所之開辦問題，應提請行政會議，從長計議，再約請專家，繼續研究，俾得集思廣益，做成結論，提供聯董會考慮與採納…有關夜間部之設立非一蹴而幾。尤應採納周諮各方卓見…不過夜間部開辦後，如果賺錢，則聯董會方面之捐助，可能不予繼續，此點頗值吾人考慮。」因此研究所與夜間部的設立又成懸案（東史：258。底線為筆者所加）。

²⁶這種作法其實是承襲過去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傳統---雙董事會系統（dual-Board system），地區性的董事會負責日常行政事務，而教會組織的董事會則負責財源的籌措與管理，支援必要的人員和進行計畫審核（Chung：157）。

²⁷前東海理學院院長、生物系教授歐保羅先生：「當時的行政會議，開會都用英文，這一點我一直覺得不是很好…謝校長一上任，第一件革新就是行政會議改用中文」，（歐保羅，2000）

²⁸從 1955 到 1971 年聯董會共委任四位美籍的東海會計長：畢律斯 Elsie Priest（1955-1960）、樂安倫 Allen Lovejoy（1961-1963）、賈克德 Carl F. Jockheck Jr.（1964-1970）、楊格 Herrick B. young（1971）（Chang:144 或參見東史：510），1971 後聯董會就停止指派會計長的職務。

這種情況就長期而言，對東海來說當然是不利的，尤其在東海處在內外環境丕變，亟需有所革新的時候。1972 出版的《東風》中，即有人提出批評：

東海大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兩個董事會。以前大多數的議案是由美國聯合董事會決定。但是外國人到底是外國人，他們不能清楚地認識我們的社會潛能，文化背景等種種因素，怎能給學校作一正確的方針？（《東風》4 卷 4 期：7）

從這個角度看，從 1966 年開始面對的財務危機，對東海大學而言正好是個獨立的契機。東海大學必須擺脫「外國人捐助的有錢大學」的形象，讓校務決策自主獨立，並設法在台灣社會的土壤上生根，走出自己的道路。財務問題是自主獨立的物質基礎，但東海的獨立之路並不只是財務上的獨立，更重要的是思考自己在台灣社會的角色如何？必須和整體台灣保持甚麼樣的關係？早在 1961 年 11 月 20 日的董事會上，就有董事嚴正指出：

必須在物質與精神上，有所作為…否則此地方校院，將永非本地所固有者，其理想亦絕難在本地生根

周聯華董事長亦謂：「…吾人必須殫思竭慮，使本校與台灣發生關連。」是以董事會也已警覺到謀求自立的重要性，而東海與台灣社會的良好關係又為自立的先決條件（東史：247，底線為筆者所加）。

但是東海要如何和台灣發生關連呢？

走入社會

雖然各方意見不一，但是必須設法走入社會，消除過去東海的「孤立主義」形象，似乎是參與爭論的各方最大的共識。教授會認為開辦夜間部是為服務社會，並回應台灣社會經濟發展後對大學的需求。（東史：255），吳校長也認為：

東海本身的利益必將藉由與地方需要的結合而增進，我們不可能在孤立繁盛起來（前揭書：261）

但是關於如何走入社會的爭辯，則集中在關於小班制存廢、夜間部與研究所的成立上。也就是說東海走入社會的程度是以「學生人數」來衡量，似乎這是東海作為一所大學，對於社會所能提供的貢獻。問題只在於學生人數增加的速度要多快，如何同時維持量和質的平衡，以維持東海所生產出的高等勞動力的品質。這樣的看法有當時台灣社會結構轉變，對於高等教育人才需求增加的背景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和引發東海轉型危機的起因，是來自嚴重的財務問題密切相關。所謂東海的孤立主義的說法，必須放在東海過去財務上受外國資助太多，而本地捐助太少的背景下來看。而學生人數的增加，立即的效果就是東海財務困窘的解除。

無怪乎東海大學校史，會把強調「邁向社會」，積極進行各項硬體建設，增收學生、開辦各項社會推廣教育的梅可望校長任內，稱為東海的「擴展時期」。因為就統計數字而言，東海在這時候和社會的連結，確實比創校初期維持小班制的時代來得大多了。

東海校園內部對這樣的「走入社會」方向，並非完全沒有異議。例如東風社就多次的提出：

如果東海的發展計畫或教育目標理想的更弦易張，僅只是一種對於外在社會環境趨勢或內在經濟壓力所作的因應措施，僅只是著眼於配合社會上某段時期內的特殊需求；那麼我們必須嚴肅的指出，東海未來的發展是極其有限的。

易言之，我們以為如果未來新東海的發展前途，僅著眼於新增了幾棟教學大樓，增建幾個配合社會需要的「熱門科系」，多招收了幾倍學生，而將這種擴充變化的成果解釋為新東海光明遠景的保證，那麼這種基礎、保證都是膚淺而且脆弱的（《東風》46期：2）

對於如何走出東海的「孤立」，東風社也有不同的看法：

以往我們將東海的孤立歸罪於地理因素，然而事實證明，我們的閉鎖是來自於心靈方面，環顧四周，就有很多直得我們就近服務的地方，譬如對我們校園周圍的鄰居們的生活，我們了解了多少…（《東風》41期：3）

社會系的練馬可教授，(Mark C. Theliu) 在1967年5月題為「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的演講中，首先承認東海革新的必要，同時強調每個人的「投入」(involvement)，是東海變革的過程中的關鍵因素，但是投入並不僅只是針對東海校園：

東海必須要把眼光超越校園之外，注視那些需要東海的地方，這種投入也許夠更接近我們建立一所好大學的理想

我們必須打破我們這種象牙塔式的隔絕，並尋求一種對今天台灣生活的更深入的投入。這種投入可以有許多形式，可以包括各種生活方式的人，比方嶺上的村民、散居在台中的各個孔道的住戶、工廠工人以及商店店員（東史：292）

練馬可教授建議可以透過將學校的清潔日擴大到校園以外的社區，甚至是校門口對面實施，或者可以由東海學生在台中進行志願性的長期服務工作。透過種種非財務性的投入方式，讓東海與校園以外的世界更密切關連。透過這樣的聯繫關係逐漸取得社會的認同，得到社會資源的支持。

東風社和練馬可教授，都承認東海必須在變革的過程中設法和廣大社會做出更深刻的連結。但這個連結並非只有學生人數、科系設置等表面物質的層次，更重要的是校內師生在心態上和行動上，是否願意更深入社會平民的日常生活中。

對於很多人來說，特別是對面臨財務困境的東海校務行政當局，東風社和練馬可教授這樣的想法，可能都失之於陳意過高、緩不濟急。觀察之後東海校務發展的方向，這樣的想法似乎也沒有成為校務運作思維的主流。不過在每一次校園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特別是 90 年代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中，這樣的聲音總是一再地被提出來。

校園改革

在 1966 年以前，東海大學的校務發展可以說是處於平穩狀態，創校之初建立的行政規章、組織在運作上都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在 1966 以後，由於面對內外一連串空前的挑戰，行政與校務運作上的大幅改革也就勢所難免。

1964 年的校務會議上，教授會就已提出「制訂本校四年發展計畫」以及「創辦夜間部以服務社會並藉以改善同仁之待遇」兩案，提出要求「全校各單位員工應有一定編制」等八項建議。（東史：255）

聯繫著當時對發展方向的爭議，校務會議通過教授會的提議，成立了「校務發展委員會」以研擬「四年發展計畫」。討論的核心除了增收學生、設立夜間部及研究所等重要議題外，還包括學校設備的修繕、行政法規組織的訂定等。教授會並在校長和校務會議同意下，成立了多個和校務運作管理相關的委員會，例如：「校園管理委員會」、「經費預算稽核委員會」、「章則委員會」、「福利社管理委員會」等。

另外為了加強學校與校友間的聯繫。在 1968 年 1 月成立了「校友聯絡室」。並於隔年 3 月 15 日創辦了《東海校友通訊》，期望藉這份刊物將學校與校友完全融為一體。

1973 年謝明山接任東海校長，教授會於次年先後多次向謝校長提出，依據教育部「大學法」及「大學規程」的規定，儘速完成本校「組織規程」及各項行政章則的修正。

為了救亡圖存，東海校教授會及行政單位戮力通過各項決議，積極針對校內各項行政工作進行興革工作。但問題關鍵在於校內一般章則修訂，都與「組織規程」有關，需俟「組織規程」核定後，始能討論修訂，以免抵觸。而「組織規程」的修正權在於董事會，他人無法越俎代庖。由於「組織規程」修正案一直到 1977 年 9 月才經董事會議通過。所以在謝明山校長任內，對於校內一般章則的修訂，也就未竟全功（東海大學，1985：96）。加上長久的困境使東海在校務上呈現鬆弛的狀態，因此在改革的同時，校內的行政組織及人事制度上仍有許多問題發生。當時推動的改革工作，其成效也就打了些許折扣。

1978 年 6 月梅可望接任東海校長，在見過他有生以來最冷清的交接典禮，頭

一次進入冷冷清清，連一具電話也沒有的校長室幾天後，他看到的東海校園的狀況是：

凡事缺乏制度與規則，零零落落，稀稀鬆鬆。真令我這個經教會學校長大的人大吃一驚！因為在我的記憶裡，教會大學是以嚴肅負責著稱的
(東史：399)

梅可望擔任校長後，積極進行各項校內行政組織及規章的改革。這時距 1966 年東海開始發生校園發展方向爭議，已經超過十年了！！

第四節 爭議的深層意義

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

回顧台灣在二次戰後的發展歷程，70 年代正是逐步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時期。在東海創校（1955）的 50 年代時期，台灣農業生產值還佔總生產的 35%，到東海發生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 60 年末，農業生產值已經降到 18%，到 70 年代末期再降至 10%。農業從業人口則從 50 年代佔總人口的 56%，降到 70 年代末的 20% 左右。

相反的台灣社會的工業生產值以及從業人口卻不斷大幅提高。工業生產在總生產中的比重，從 50 年代的約 18% 上升至 70 年代末期的 45% 左右。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值，從 50 年代初期的 16% 上升到 70 年代末期的 42%（《人間》雜誌第 37 期：87）。

跨過「進口替代」時期，逐漸走入以「出口導向」為發展策略的台灣，透過「加工出口區」等政策，被納入了國際分工體系的邊陲角色，成為低技術勞力密集品的加工與出口基地。經濟和社會的變化成長，帶來對專門技術人員和管理階層等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的強烈需求。而在台灣國家對高等技術勞動力的再生產嚴重投資不足的情況下，這些需求是透過私立大學來填補的（黃敏禎，1995：78、83）。

在戰後工業生產還不甚發達的台灣，東海還可以以重質不重量、集體生活、通才教育等原則，在大度山建立起一座純然為尋求真理，建立完人而存在的學術研究園地。到了 70 年代，已不容許再有這樣的奢侈存在。增收學生、成立夜間部與研究所，雖然有藉此抒解內部財務壓力的因素，但是也表達了經濟起飛中的台灣社會，對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勞動力的強烈需求。

在 1971 年，雖然當時東海大學已逐漸增加招生人數，但是教育部仍然透過督學表示：

教育部每年分配大專院校學生時，壓力甚大，而東海於招收新生上，則稍覺保守。...教育部深知東海之財務處境，但感覺以東海之現有設施、校舍、教員以及來自海外之支助，則對於增加社會之服務，自屬優為之（東史：301）

同時為回應勞動力需求而新設的許多大專院校，也挑戰了東海在創校初期具有的優勢。吳德耀校長在 1964 年創校十週年校慶時發表的「東海大學之使命」一文就說：

處今日之台灣，本校已為二十七所大專院校之一，而非昔日六所之一矣。教育情況亦已變遷，民四十三年間，僅有約萬名學生，有志進入大學，今則數達三萬五千名，其中約一萬二千名，經過僅舉行一次之聯考而被錄取（東史：237）

到了 1967 年 11 月，吳校長在校長報告書中，則以相當具有危機感的語氣表示：

十二年前，在台灣具有大學體制之學校，僅有兩所，本校佔其一。時至今日，已有七所大學與二十三所三年制與五年制之專校。換言之本校必須急起直追，否則將無足數，平淡無奇（同上：250）

在外在環境劇烈的競爭和挑戰下，又逐漸失去聯董會的外援，也難怪東海大學會顯得進退失據，顧盼徬徨了。

然而面對已經快速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台灣社會，一所大學所能扮演的角色，難道就只是生產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高等技術勞動力而已？60 年代歐美的學生運動，曾用基進的行動對這樣的趨勢表達了質疑。依著

這所學校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它不是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學生應生活在思想的氣氛中，課程不是為了技術性的職業，而應著眼於各種範圍，避免嚴格的分科²⁹

的構想而成立的東海大學，在新的歷史環境下應如何調整自己的角色？是要完全放棄創校的理想，還是透過「自由和不斷的尋求」³⁰的精神找到新的實踐理想的方式？這是在表面的財務危機之下，關於 70 年代的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爭議背後更深刻的問題意識。在這個問題意識的引導下，東海人文批判傳統的象徵--東風社，在 1973 年提出了擲地有聲的〈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後，又持續舉辦「東海週」活動，並透過刊物專題省視東海校園的變化：

我們的目的，不在否定東海過去的理想；相反的，我們是在否定「沒落的東海」這一無稽之談。我們是以「心要熱，腦要冷」的態度，面對東海赤裸的現實，

²⁹芳威廉博士，1952，〈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參見《東海風》：7-8，或本論文書後附錄三

³⁰「一個良好社會的各項制度和民主理想，只有在這樣自由和不斷的尋求中能保證其維持和發展」引自〈私立東海大學設置的目的和方針〉，1953 年 11 月 10 日，參見東海大學校史：13

作一深切的反省。誠然，這一反省在情緒上是痛苦的；但是，只有勇敢地啜飲這一赤裸裸現實的苦汁，東海人才能深切體驗到東海建校的崇高理想。

（《東風》44期：14）

俾使東海在轉變中，能對於傳統制度，原本的建校精神與目標，有相當的保留；而對於未來的轉變亦有其完備的規劃工作，不至於在轉變過程錯亂了我們的步伐（《東風》49期：42）

一直到二十年後，東海的學生還繼續這樣說：

我們對於今天的東海所進行的反省，並不在於以古非今，或是單純懷念被大家以傳說建構的美好過往。我們的意圖毋寧是這樣的：藉由對於過往東海創設時所堅持的超越性理念的思考與肯定，希冀對在今日環境條件的變遷下，能夠再度提出一個新的、且具超越性質的理念。做為東海未來教育發展與整體制度設計規劃的探照燈，這正是東海的歷史傳統所向我們顯明的（侯念祖，1993）

70年代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並沒有隨著擴大招生、夜間部與研究所成立而被解決。相反的在每個歷史的關頭，在每次東海校園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類似的聲音總是會再次的響起。而創校初期的理念，究竟和當下現實的關係為何，也就再次被討論。正如《東風》45期專欄中，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

這個既存的环境永遠是不完美的，問題是永遠存在的，因此我們的探討也就是「未竟」的。

只要東海和台灣的歷史還在繼續往前進，這個「未竟的探討」就會不斷持續。

仔細觀察從1966--1977年間，關於「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各項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幾個討論上的特徵：

首先是東海校園做為一個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以及對這個「共同體」在70年代後逐漸消失的追懷與反思。

其次東海的校園景觀，一方面做為創校初期的黃金時代的記憶留存，又是東海和各大專院校間重要的差異所在，成為東海師生對校園認同感的重要資源，也成為對校園問題進行討論時的論述戰場。

最後是東海學生，相較於態度較務實的師長們，學生從校園現實的問題出發，往往提出了更具想像力的藍圖和激進的批判。同時有些學生不滿足於只是在文字上進行辯詰，採取各種更直接的行動以求其理念的實現，甚至不惜和學校師長乃至廟堂的高官大員們發生嚴重的衝突。

如同「未竟的探討」，這三項特徵也不斷的重覆出現在後來東海的歷史中。

第二章 伊甸園與巴比塔

不要以為我是帶和平到世上來的；我並沒有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刀劍。我來是要使兒子反對他的父親，女兒反對她的母親，媳婦反對她的婆婆。

---耶穌基督（馬太福音第 10 章 34、35 節）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那種革命危機的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第一節 東海大家庭的鄉愁

1975 年《東風》44 期，在「未竟的探討」專題的開頭，先丟出了這麼一段話：

「東海在變，東海的傳統被破壞了，東海在沒落」這在同學們私下的談話中是屢見不鮮的，當我們談話觸及到東海的一切，我們就會有這種感慨，然後我們不假思索地對這一情勢找到一個原因：東海在擴大（《東風》44 期：6）。

雖然東風社認為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答案！」，但看起來這種感慨在校園裡是很常見的。在 1978 年 6 月，化學系四年級的李元同學在校刊上發表感言：

記得從前總是老是聽老大哥們提起東海大家庭的溫暖，師生間的關係有如父子，彼此地緊緊相連在一起。而今師生間雖非至如同路人，卻也冷淡許多，同學們除了同系和同一宿舍之外，彼此各自為政，不再情同手足了（東史：374）

這種對於昔日東海特質正逐漸消失的失望之情，練馬可教授在一篇名為〈「東海傳統」必然要消失嗎？--漫談東海的未來〉的文章中，提到有兩位舊日的同學向他抱怨東海的傳統已經消失殆盡。特別是因為學生人數增加，原來那種隸屬於一個充滿活力的「小團體」的感覺隨之消失：「他們不喜歡這種改變！」（東史：374）。

類似的言論在處於爭議轉型期的東海校園內，可說是屢見不鮮：

從第一期五年計畫實施以後，東海從實質上擴大了，人數一下子增加了數倍，從一個「小型大學」變成一個「中型大學」，過去所標榜的「以校為家」、「全校就像個大家庭」的精神逐漸泯滅...（潘世偉，《大度風》第10期：11，）

1978年東風社對校內同學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37.2%的學生，認為學校較以前退步了。

對於這些反應，《東海大學校史》認為這只是東海處於轉型期時的暫時現象：

轉型期中呈現了濃厚的過渡性格，這種過渡性格反映在心理的認同，對新環境的適應，以及因為擴大發展而產生的連帶問題等各方面，這些問題都是成長過程中的痛苦反應（東史：372）

不過即使到了90年代，類似的文字和情感仍然出現在校內的學生刊物中：

教職員宿舍的客廳特別大，以便師生能情感交融；採小班制，師生全體住校，希望造就一種家庭式氣氛；校園裏每一個角落都是師生共同清掃，每一棵草木也都是師生親手栽種的，從此大度山風沙再大，也吹不散這所載滿愛和理想的東海大學...。然而這些都是屬於「老東海」了。你所看到的東海會是一所大型大學...系所、建築物多了，學生和博士級教授增加了，但是東海卻比創校時更為貧瘠，東海成為你我的職業訓練所，你成為東海的過客（張芳玲，1990）

連學校行政單位也有類似的想法：

東海的早期校友喜歡談論當時的校園生活...那時的師生關係非常緊密。老師們經常邀請學生到家中來一起享受家庭的溫暖，並由此創造了一種促進互動和啟發思想的氣氛。...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東海的規模擴大。今日已擁有一萬四千名學生。然而隨著成長而來的是師生關係的日益淡薄³¹。

東海創校初期的歷史被視為是東海的「黃金時代」：在小班制以及全體住校制的施行下，校內師生相處融洽，大家互相扶持。而在進入70年代後，由於內外環境的變化，這些過去的美好特質逐漸消失，東海已不復為過去優秀的東海。而東海創校初期建立的校園建築、空間規劃，就做為東海「黃金時代」記憶的物質

³¹東海大學校牧室β計畫英文網頁 <http://mail.thu.edu.tw/~better/english/e-better.htm>，原文為英文，筆者自行翻譯為中文。

化，具有著獨特的地位。

但和轉型時期的文字不同的是，90年代的這些文字並不只是惋惜已經消逝的過去，而是在肯定過去的同時，號召校內師生一起行動，參與改變校園環境的行動：

今日的東海是老東海人的嘆息和遺憾，除非有所努力，否則東海也將成為你我的遺憾，不管你滿意或失意，畢竟你來到了東海了，讓我們一起耕耘這塊屬於你我的園地（張芳玲，同上）

在這些論述中呈現出一個存在於過去的美好、和諧而寧靜的東海校園，由此對照出當下現實的問題重重。從單純的團體工作到基進的學生運動，都在追懷與重現過去的東海的名義下，召喚校內師生一起參與行動。創校初期的歷史成為凝聚東海人的認同，激發改造環境力量的重要歷史記憶。而校園建築做為這段歷史記憶的物質化，就更具有獨特的重要性了（參見第三章）。

但是這種對過去的想像，是否屬實呢？

第二節 共同體的想像與真實

與世隔絕的「東海大家庭」

1970年9月，梅可望校長於行政/校務聯合會議上提出〈本校發展的方向〉專文，對於小班制教學和學生素質高低的問題，認為兩者間並不必然相關：

「小班制」對素質的絕對良好影響，已經成為了神話（myth）。似乎只要採取小班上課，便可化腐朽為神奇，化頑劣為良才。...學生素質優劣的要件，不是學生人數的多寡，而是教師的好壞。...如果師資不佳，即使一班只教十個學生，也不能提高學生的素質（東史：499）

梅可望校長認為「小班制」的實施，應考慮課程的內容進行。例如外國語文、樂器演奏和某些實驗室的操作等，仍以小班制教學為佳。但學校的教學好壞，可以說完全為教師所決定。他嚴肅的表示：「一所大學寧願沒有大廈，卻不可沒有大師！」，禮聘優秀師資應為東海未來發展的第一優先。

前述東風社的問卷調查結果發表後，當時的建築系系主任詹耀文表示：

舊的不一定是好的，新的也不一定就不好。當初使用小班制、通才教育，只是說這樣更容易達成辦大學的目的，但也應該有缺點，否則不會使教出來的學生都出國去，對台灣的社會沒有很大的貢獻。...過去的師生關係可說是較親切罷了，但也不像大家所想像中的那樣美好（《東風》47期：6，）

更深刻的來分析，從爭議轉型時期參與校園發展方向討論的各方，都一致同意東海必須走出孤立，和外在台灣社會有更大的連結來看，創校初期的「東海大家庭」如果存在，也是建立在和外在社會的隔絕之上的。這種隔絕不但有背於東海創校時強調的：「這所大學應與其所屬的環境密切聯繫...以最廣泛又最富意義的話來說，這所大學應以服務台灣島上的居民為目的。」³²的理想，而隔絕對東海大學造成的許多負面影響，也是爭議轉型時期的討論重點之一。如果創校初期的東海確實吸引了很多優秀的菁英來就學，那這也是建立在戰後初期台灣農業社會的不發達基礎，以及龐大的聯董會國外資源的挹注上的。一旦社會情勢轉變，聯董會的資源消失，大度山上的精神貴族就勢必要從天上降到地下，而從創校初期的理想來看，這對東海而言未必是件壞事。

大度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在「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中，東海大學宛如一座處於大度山上的美好、和諧而寧靜的校園，特出的校園景觀又強化了這種意象的形成。部份東海的學生採取了基進的行動，以重建逐漸失落的美好特質。而 80 年代後的東海校長，也以維持校園的和諧寧靜為由，抨擊或制止學生的行動。梅可望校長在 1987 年，為了避免「外力」破壞、干擾東海校園的和諧安定，還通過了「東海大學維護校園團結和諧方案」（可參見第五章）。

然而做為一所綜合型的大學，東海除了沒有醫學院之外，從文、法、商，到理、工、農、社科院，各種多樣的科系和研究取向都並存在校園中。雖然有可能由此形塑出一種寬容開放的校園文化，然而不同的學術文化薰陶出來的師生，要一起在校園內共事討論，要說不會發生歧異或衝突，只怕沒有人會相信。

再者，東海大學是以繼承前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名而成立，過去十三所基督教大學各有不同的人事運作經驗和教育觀點。創校之初聯董會芳威廉博士即屬意吳德耀擔任首任校長，但董事會卻屬意籌備處的陳錫恩，另有人則支持杭立武，可以說創校之初就埋下了人事和教務發展方向衝突的伏筆（陳鍾文惠，1992：81）。其後雖在陳錫恩堅辭下，董事會打消提議，但吳德耀仍因年齡和資歷問題，不獲董事會信任，因此由曾約農擔任首任校長。從這角度來看，1957 年東海學生以絕食方式要求曾校長留任，其實已經直接挑戰了聯董會和芳威廉博士的意志。

而創校初期兩個董事會在決策上的扞格，台灣董事會在募款和財務支持上的貢獻太少，乃至 1970 年代，東海教授會和吳德耀校長之間，關於學校未來發展方向的劇烈爭執，這些都可見於校史的記載中。在 1978 年謝明山校長任滿退休

³² 〈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型態備忘錄〉，芳威廉（William P.Fenn），1952 年 4 月 2 日

後，董事會欲召開大會選舉新校長卻流會，以致新校長難產，經過再度召開會議才選出梅可望擔任校長。

恍若是歷史的玩笑，在一波三折中上任的梅可望，於 1992 校長任滿後欲出任東海的董事長，卻遭到校友抗議。事發不久，梅可望即以書面辭去東海校長職務。而新任董事長則由曾經擔任過東海董事長的周聯華牧師擔任。³³

即使是作為東海校園認同的象徵之一的「校歌」，在 1958 年制訂後，由於歌詞中的「求仁與歸主，神聖本同工」引起了嚴重的爭論，以致於周聯華董事長在次年的董事會上聲明：「去年所採用之校歌業經決定不用，此後學校無論在任何集會之中亦不再唱。」，延至 1975 年 10 月才由董事會重新決議定為東海校歌。

觀諸東海校史，最少從 70 年代以來，東海校園都像是個喋喋不休的學院社群，而不太像是大度山上的世外桃源。甚至「東海大家庭」的想像是否適用於創校初期的真實情況，恐怕也是可疑的。如果東海校園顯得不寧靜，看起來多半是由於校園內部的多元異質性的衝突，而少有是因為不當的「外力」。

一個美好、和諧而寧靜的東海大學，其實從未在大度山上出現過。在歷史中真實存在的，只是關於一所設在台灣的基督教大學的理想，以及無數人為了實踐、反省、衛護這個理想所發出的吶喊與嘆息，流下的汗水與淚水。

對於某些人而言，這些曾存在於東海的歷史事實，是令人尷尬、羞慚，會引起爭端的，只是多餘而無意義的內耗，不宜被大聲張揚，而應用路思義的光芒加以掩蓋和忘卻。為。畢竟，對一所私立大學來說，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換個角度想，不正是因為這些頻繁的爭議和衝突，才證明了東海是一座有生命力的大學嗎？不停地在理想與現實，過去與未來之間擺盪，既不願意盲目承襲前人的傳統，也不願完全順從既定的現實，而總是處在不停地反省和抉擇之中。這不正是〈私立東海大學設置的目的與方針〉中所深信的，確保東海能夠維持及發展的「自由與不斷尋求的精神」的表現嗎³⁴？

³³ 「除了逼退校長外，校友會對於長年未改選的董事會也感不滿，認為很多董事尸位素餐，與校務脫節太遠，積極地運作汰舊換新。校友會對監督校務能發揮這麼大作用的，東海是少見的一個。」（財訊雜誌，1988，11 月號：213，底線為筆者所加）

³⁴ 「這個宣示，首先表明全體同仁深信『基督教的信仰能夠產生一種道德力量，不但足以支持最嚴正的教育理想，而且會時時啟發吾人試在自由和不斷的尋求中來實現它。一個良好的社會的各項制度和民主理想，只有在這種自由和不斷的尋求中才能保證維持其發展』。同時也深信『透過了耶穌，人生是有其固定價值和尊嚴。個人思想，受了他的靈感以後，一定能自由地、誠懇地去尋找真理，以達到真善美的境地。』就是在這兩個信心上，大家才聯合力量創造這一所東海大學。」（《東海大學校史》，13-14，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解構共同體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考察共同體(community³⁵)的字源，認為這個自14世紀開始被使用的字彙，在19世紀以後變成許多意圖尋找另類集體生活方式的人，主要想像力的來源。當人們在描述另類的社會和社會關係時，community經常做為一個溫暖又富說服力的詞彙而出現，以對抗國家和市場力量的不當擴張(Williams, 1988: 75)。

如果注意到共產主義(Communist)和共同體有相同的字根，就不用訝異法國哲學家尚呂克儂曦(Jean-Luc Nancy)所說的：

無論過去或現在，所有共產主義式的反抗，都深受人類共同體這個目標的烙印。...這樣人對人的絕對內在關係以及共同體對共同體的絕對內在關係，其實根深蒂固的貫穿所有的反對勢力所提的各式各樣的共產主義主張，以及其他所有左派、極左派甚至工人議會式的典範(Nancy, 2003: 5)

儂曦敏銳地注意到「共同體的瓦解與重建」，幾乎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主題，使西方陷入了嚴重而反覆的鄉愁情節。他認為即使人類曾享受過和現代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關係；從盧梭、馬克思以降的西方文明所影射的那種「親愛精誠」的共同體，也從未曾存在過。

新興社會不是建立在古老共同體的廢墟上

共同體與其說是社會所衝刺或失守的固有有機關係，不如說是社會建立以後所發生的問題(前揭書: 5)

如同儂曦對歐洲文明做出的批判，東海人對於創校初期歷史的共同體想像，也不是建立在對當時複雜歷史情境理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當下生活環境的批判和改進的意願上。

這麼說並非是要完全拒斥「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這種選擇性對待過去歷史的「鄉愁」，反映出從1966年以來，東海校園內由於環境急遽變化產生的焦慮。但是這個「共同體想像」也給予後來的東海人思索校園未來方向的資源，仍具有某些正面的積極意義。被尚呂克儂曦視為「共同體主題」的傳承者之一的馬克思，在其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一文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發展階段上，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過舊約全書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當真正的目的已經達到，當英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實現時，洛克³⁶就排擠了哈巴谷³⁷(Marx, 1992:)

³⁵ Community一字在台灣有社區、社群、共同體等翻譯，本章為求討論的連貫性，一律翻為共同體。其後則依上下文關係，翻為社區或共同體。

³⁶ 指洛克的「政府論」，或是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形式。

³⁷ 指舊約聖經中的「哈巴谷書」。

603、604)。

不論東海的基督教氣息已有麼多淡漠，只要路思義教堂還存在，就很難想像這所學校會有排擠掉哈巴谷的一天。不過洛克倒是早在 1973 年，《東風》第 40 期的社論中就已出聲。

那是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就相信的可以挽救社會的良方--民主。

第三節 校園民主化的呼聲

用民主克服疏離 (Alienation)

如果東海原本就是多元而異質的，70 年代之後增加的學生人數，全體住校制的廢棄就更擴大了這個趨勢。要如何重新克服生活和心理上的分隔，建立起對校園的團結感受呢？雷蒙威廉士在其《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曾經表示，在一個日益專門化、多樣化的社會裡，如果不想透過暴力來建立社會的基礎，則只能透過日常生活中，持續的民主實踐建立起一種「共同文化」，以此做為團結的基礎 (Williams 1989: 365-366)。

在關於「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中，除了透過對「黃金時代」的緬懷，對照出當前環境的不足外，還存在著對師生、同學之間人際關係日漸疏離的惋惜，為了重建團體的連帶以克服這種疏離，一種要求強化校內意見溝通的管道，擴大師生對校務的參與的聲音，就經常跟隨著「東海大家庭」的緬懷而被提出。

1973 年 6 月，第 15 屆歷史系學生秦葆琦在接受校刊訪問時就表示：她頗為擔心今後在學生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如果學校不積極設法在學生與學校間加以溝通的話，幾年之後，很可能就流於一般的「大」學之道，變成學校做學校的，而不再問問學生的意見。

1975 年「發展委員會」的會議上，高承恕、馮滄祥兩位列席的校友教員也表示：學生與學校行政當局之間普遍缺乏溝通，學校應該讓學生瞭解擴大的計畫，最重要的是對學生的生活表示關切 (東史：372--373)。

不只學生對學校運作產生疏離，連教授會也認為學校和教職員間的溝通太少。在 1974 年時，即有教授表示校務會議每學期才開一次，似嫌太少，宜增加次數，俾有機會表達意見。也有教授建議，校長可採早餐會方式，與教職員分批、分職等見面，藉以溝通意見 (前揭書：365-366)。

事實上從東海大學成立以來，要求師生對校務的更深入的參與與瞭解，就一直東風、榮推會等學生團體努力的目標。他們的要求從單純的期望校長能抽空

多到學生餐廳、宿舍或是校園裡走走，關切同學的生活，到基進的要求每學期召開一次全體同學都能參加的大會（《東風》3卷1期：15、16）。其出發點都是基於做為東海大家庭的成員，全體師生都應關切、參與校園共同的事務，以克服隨著環境變化而不斷擴大的疏離感：

在現代機構中，隔離感(Alienation)〔原文如此〕是最大的傷害，更不論教育機構了（《東風》40期：2）

在「公共性」、「公共領域」等概念還未為人熟知的時代，東風社和部份的東海師生使用素樸的「參與」、「投入」、「民主」等詞彙，表達出他們對建立起權力機制和日常生活空間的中介地帶的呼求。人與人之間思想上的差距無法藉著實體的距離來彌補，如果不透過民主的方式，建立起團體的連帶，那麼在這山上的小社會中，雖然人和人的距離很近，仍然會有孑然一身之感。至少對東風社的學生而言，只有透過校內師生對公共事務積極參與討論的方式，建立起對團體的關切，才能使東海的每一份子團結一致。

我們深信，學校的每一個措施、每一項政策都必須經過縝密的思考和探討，都有其充分的道理。因此當學生基於愛校的情懷對學校的措施提出關心的質疑的同時，校方似應以坦率的態度讓同學充分的瞭解。也唯有這樣，才能使東海的每一份子團結一致，共同熱愛和關切自己的學校（《東風》47期：27）

為了實現「大學民主化」的目標，讓參與的精神能深入到師生日常的生活中，東風社在70年代即要求開放學校的行政會議讓學生代表參加，持續籌辦師生座談會，以促進師生之間的溝通。要求學校重視社團活動，因為社團可以培養民主精神、發展社群生活，促進學生對社會現況的瞭解。要求盡可能的開放審稿制度的限制，給予學生更大的言論自由，以提升校園刊物的功能，以促進校園內意見的溝通、討論。這些意見都可見於70年代各期《東風》的內容中。

梅可望的改革與矛盾

梅可望校長在1978年到任後，認為在當時東海校內、師長學生之間、院系本身都沒有正規溝通意見的管道，形成了嚴重的隔閡與排斥現象。因此採取了一連串措施，以建立意見溝通管道，包括：

第一，強化會議功能。除正規的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之外，另外每月舉行一次由行政會議委員、各系所主任及各單位主管參加的「擴大行政會議」，每學期並舉行一次「校務、行政聯席會議」，並視實際需要成立為解決某一特定問題的「專案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每學年並舉辦「校務發展會議」，邀請教授代表及行政單位主管參加，提出學校今後發展的新構想與新措施。

第二，擴大學生參與。自1980年起，邀請三位學生代表列席行政會議、校務

會議，發表意見。

第三，溝通師生意見，舉辦師生座談會。由校長和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共同主持，各系所學生派代表一人參加。原先是每兩週一次，後改為每月一次，分成全校性和各學院的師生座談會兩種。另外並鼓勵各系所自行召開師生座談會，校長表示會隨時參加各系所的師生座談會。

第四，創辦《東海雙週刊》以及《東海校友》月刊。鑒於原有每月發行一次的《東海簡訊》內容不夠充實，每學期發行一次的《東海校刊》發行不夠迅速，梅可望校長將兩份刊物合併為對校內發行的《東海雙週刊》，另外將原本由校友聯絡室負責的《東海校友通訊》，改編為專門對畢業校友發行的《東海校友》月刊。透過這兩份刊物分別向校內師生、畢業校友報導校內動態，說明學校政策。

同時為了凝聚師生感情，強化對學校的向心力，梅可望要求恢復停唱二十三年的東海校歌，並自 1978 年起每半個月舉行一次全校升旗，要求日間部全體學生一律參加。並在升旗完後，由校長進行校政概要報告，並進行各項活動的頒獎，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生（東史：403-408，東海大學 1985：97-98，梅可望，1998：237-240）。

在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東海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參見圖一），校園內各項建設也不斷進行，可以說是東海校園景觀變化最為快速的時期。（鄭禎樺，200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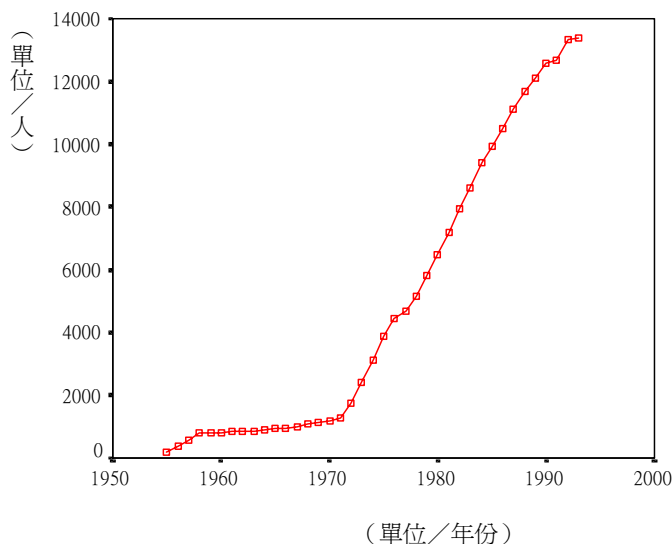


圖 1：〔東海大學歷年學生人數成長趨勢圖（1955～1993）〕

（圖表來源：林育群，2001b）

而在一系列的建設中，大部分的工程都是興建教室和教學大樓，而學生宿舍的興建速度，卻遠遠趕不上快速增加的學生人數。在床位短缺的情形底下，每年約有 9,000 名左右學生必須尋求校外住宿（林育群，2001b：10）。

這些在外住宿的學生，大部分都居住在附近的「東海別墅」區（簡稱東別），平均的空間大約是到 5 坪左右，偶有 7 到 8 坪的空間，各個套房間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同時由於東別逐漸發展成爲商業區，消費社會的文化氛圍也將學生吸納進來。雖然名義上都是東海學生，卻以個別的消費者和套房居住者的身份生存著，彼此間缺乏感情、思想、生活上的聯繫。在 80 年代外宿化趨勢下的東海學生，就像是馬克思筆下十九世紀法國的農民，是一袋同質但又個別分化的馬鈴薯。

在開放學生代表參加校務、行政會議，舉辦師生座談會的同時，學生的任何活動，從從刊物的出版、演講與座談的舉辦到海報的張貼，都必須得到校方課外活動組的核可。而戒嚴體制下黨團及情治系統對學生的監控也沒有放鬆：佈建、分化、教官約談，這些當時瀰漫在台灣各大學校園內的白色恐怖氣息（鄧丕雲，193：4），在大度山上依然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梅可望所推動的唱校歌、全校升旗、動員月會等活動，變得帶著濃厚的黨國法西斯主義氣味。

在學生大量外宿促成的原子化以及白色恐怖的壓抑下，東海學生並非是以有組織、具批判意識的公民身份，和學校行政單位進行對話。在學生和學校之間，也缺乏一個具反思性的中介。80 年代初期的東海，雖有近 40 份的刊物在校內流通，但 90% 都是院系所的學報，具有輿論功能的媒體，只有《東風》、《大度風》等幾份刊物（東海大學，1985：102）。

梅可望校長一方面努力暢通校內意見溝通管道，一方面又壓抑著校內師生的民主潛能，一方面積極加強校內師生的團結，一方面又加速了學生的原子化，這些矛盾在 80 年代末期逐漸萌發，使他最後以背棄東海傳統的名義被批判³⁸。

公共領域與公共論述

梅可望校長認爲他推動的民主溝通體系，有效地減少了校園內匿名黑函的數量，各學系中的派系對立，也逐漸消失於無形（梅可望，1998：240）。但從所有的意見溝通、動員認同的活動，都是由行政機關發動來看，這些措施比較像是校園行政體系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展現，而不像是真正的「校園民主」實踐。雖然這些措施未必是出自於威權政治體制的直接要求，但是台灣長期遭受威權統治的經驗確實是有影響的：

在長期的威權體制下，民間社會早已被國家滲透，自主意識早已蕩然無存，每一個人所能想像的都只是如何嚴格管理，或如何接受管理，卻從來沒有人想像社會可以自我管理，更別說碰到危機或分裂時，能主動地把社會集合起來，進而做反省性的公共論述（李丁讚，1997：28）

³⁸「梅可望主持校政期間…把很多東海的傳統打破，引起很多教授及校友反彈」（《財訊》雜誌 11 月號：212，1988），或參見本論文第六章第二節。

這裡並非否定行政機關強化意見溝通管道，以及採取更靈活、彈性的管理措施的必要性，只是在梅可望的「校園民主」方案中，缺少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任何民主體制都需要有健全的公共領域，才能有效運作（李丁讚、吳乃德等，2004：1）

依據李丁讚的界定，公共領域有六個構成的要素：

（一）公共論壇（forum）；（二）私人（private people）；（三）會合（come together）；（四）公共意見或輿論（public opinion）（五）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六）合法性（legitimation）（前揭書：3）

雖然公共領域的存在需要刊物、沙龍、民間社團等物質基礎，但公共領域不一定指涉特定的制度或物理空間，而是以議題為中心構築的。環繞著對特定的議題的討論，不同的層次、團體、制度間也可以形成一個公共領域，只要他們彼此間的互動，能夠滿足前面六個構成要素。從「空間生產」的角度，夏鑄九特別著重公共領域中的論述實踐，他認為：

象徵的實踐（symbolic practice）、論述的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與意識型態實踐，以支配與改變城市的空間與社會，這就是公共領域（夏鑄九，1997：123）

李丁讚也認為：

一個事件的發生，如果沒有經過語言論述，那麼它只會是一種發生（occurrence），我們並不會因為這個事件而獲得意義，或是說，我們並不能從事件中學習。…公共論述正是人類得以突破習慣性的重覆，並進而獲得新的實踐模式的重要機制（李丁讚，1997：6）

梅可望的改革措施，在威權政治的社會背景下，並不能提供建立校園民主的基石。然在從 70 年代以來有個議題在東海校園內一直被討論，以致於從威權時代走到千禧年，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形成了東海校園內歷史最悠久，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公共論述。

這個議題就是校園空間問題！！

第三章 美哉吾校

美哉吾校，東海之東

——東海大學校歌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著，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的名字叫做美麗，在汪洋中最瑰麗的珍珠

——陳秀喜 詞，李雙澤 曲，〈美麗島〉



第一節 大度山頂的神話仙境

校園景觀認同感

2005年3月有人在「奇摩知識」網頁上丟出了這麼一個問題：「台灣哪所大學最美？」，不到半小時就有人以篤定的語氣回答他：「絕對是東海！」。

這位網友接著以感性的語調訴說自己的親身經驗：

東海有牧場、有教堂、有大片草原、有文理大道、有相思林/我曾經在冬天有陽光的日子，在教堂草坪上，看著梭羅的湖濱散記，看到睡著/陽光繼續暖暖的曬著..../這種幸福一輩子難忘^^

之後有幾位不服氣的網友，也提到了淡江、中山和真理大學。但另一位網友立即轉貼了一本旅遊手冊上面的資料：

東海大學位於台中市中港路，以校園的廣闊優美，和路思義教堂聞名，夾道的鳳凰木宛若綠色隧道。

校園座落著中國傳統合院的學院建築群，是一所最富於風雅的學府，有“最美麗的校園”的封號。路思義教堂則是東海大學的代表景觀；造型獨幟一格的教堂為貝聿銘之經典傑作，恰似航向天堂的飛帆，引領著心靈飛揚。

校舍景觀規劃得力於貝聿銘、陳其寬及張肇康等知名建築師的設計，依地勢而建的學院系所，多為合院格局，迴廊轉折，花樹輝映，頗有典雅韻味。校園地形分布更有多種型態；如河溝、人工湖、草地、灌叢，吸引平地鳥類棲息，成為台中熱門的賞鳥聖地³⁹。

根據統計，第一志願選擇東海的學生，有 40% 上是因為東海有一個美麗的校園（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1995：6）。許多電視連續劇以東海做為拍攝背景⁴⁰，一年當中更有 1,700 多對的新人到東海來拍攝婚紗，而自從創校以來更有數千萬人到過東海一遊。東海校園的意象價值已經超過單純 143 甲（133.3096 公頃）⁴¹校地及地上物的有形資產，而成為台灣社會的無形文化財。

在路思義教堂完成後，陳其寬建築事務所在高雄也蓋了一棟和路思義教堂有諸多雷同的聖保羅教堂，並在 1981 年間負責交大光復校區的校園規劃，但是都不曾像東海校園和路思義教堂那樣受到矚目⁴²。鄭禎樺在其論文中，提到東海人對於校園景觀的重視程度：

已將景觀圖騰化，特別是相思林、文理大道和路思義教堂區，任何可能改變校園景觀的工程，都會招致學生的關心與質疑（鄭禎樺，2001：135）

東海的師生對於學校的校園景觀具有某種強烈的感情，甚至可以說東海人對自我的認同感乃是建立在校園景觀之上的。連東海校方也承認：

東海校園的價值認定不只是一個單純景觀的問題，而且是一個事關學校的認同感（identity）的問題（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1995：6）

純粹就建物設計和校園規劃而言，東海的校園景觀有其特殊之處。但是只以這個原因，很難完全說明為何會產生這種強烈的「校園景觀認同感」。台大和清大的校園，也早為人所稱道，並也和東海一樣成為台灣著名的觀光景點。台大校

³⁹ 以上資料參考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005030204787>

⁴⁰ 例如 1989 年時，「中國電視公司來函，希望借校園供其拍攝連續劇，可否照借？請討論決定。」（東行，民 78.5.29）經行政會議討論後准予中視借用拍攝。依筆者個人記憶，這部連續劇應該是「楊貴妃」。

⁴¹ 這是依照東海大學所屬土地有權狀計算出來的面積，可以參考教育部統計處網頁：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user4/u8293.htm

但是如果包括：國有財產局之中央河溝地、水利地之大社支線（約農河）、協和派出所旁之共有地和國有地，以及校地東邊台糖舊五分仔車路和台中市代管國有地等在校園範圍內，但產權不屬於東海所有的土地，則東海校地總共約為 150 公頃，感謝張志遠學長提供這個資料。

⁴² 感謝交大劍道社創社第一屆的小傅、博仁（可魯）、彭大、步青、小卷、阿北、家瑋（一姐）、阿吉、麗貞、玩一玩、YoYo 等人，在我寫作者這篇論文感到疲憊之時，能和你們一起打劍道，參加對外比賽，絕對會是我研究生生涯中珍貴的回憶。

園建築還擁有比東海更悠久的歷史，及足以和東海校園的「中國文人」風格分庭抗禮的大正式巴洛克建築風格。但如類似東海師生對校園景觀強烈的關心和質疑的現象，在這兩所學校中卻不多見。這其中涉及了一系列複雜的歷史和社會實踐。

最美麗的校園

東海大學的創立曾被視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新地平線」，不只創辦東海的聯董會希望學校的辦學宗旨和運作，能突破過去中國基督教大學的窠臼。同時受命進行校園建築規劃、設計的貝聿銘、陳其寬、張肇康都是現代主義設計的健將，又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體會，也希望能走出過去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宮殿式設計，摒棄注重裝飾的明清式建築風格，而強調結構、材料的直接表現。他們於是運用現代主義的建築手法——結構體外露的框架系統，結合中國園林以及合院的佈局精神來設計東海校園。

設計者之一的陳其寬曾表示：

東海校園是以中國園林所謂的「虛實相間」的意境，作為設計最初起點；建築則融入合院形式，卻又暗含現代建築線條簡潔、無華麗雕飾的風格。整體感覺內斂且含蓄，不能一眼看穿，更不是一個景就能涵蓋的，真正要表達東海的情境，必須在裡面「遊」，步移景動，心領神會，才能體會出它的美感。

（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2：6）

一般的東海學生不見得能清楚理解陳其寬等人的匠心獨運，但就從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他們是生活在一個非常特別的校園裡：

很少見的，這樣的女生宿舍，它不是一棟死灰灰的樓房，或是光線敞明的大廈，而是一種類似古代閣樓的建築，屋頂是傳統的飛簷，看來斑剝的木柱卻紮實得很。若是住在二樓，會有一種風滿樓的雅致，那麼若是住在一樓，門一開是長廊，走廊外是稀疏的草皮和古老的樹木，若妳放個蘋果在枝頭上，還會引來一、二隻身手敏捷、模樣靈巧的小松鼠（郭映君，1997：11）

雖然在1964年創校十週年的畫刊上，並未對校園景觀有任何著墨。但當時的《東風》就已提到本校：「擁有一個本省名勝『觀光區』的東海校園」（《東風》3卷1期，1964.6）。

在1974年3月22日，郵政總局將路思義教堂列入台灣風景區郵票系列中，製成郵票發行、廣為流傳。可能是受到這個事實的激勵，1975年的《東海大學建校廿週年特刊》上，頭一次以驕傲的口氣寫著：「校園美麗，全國第一」。

東海大學的校園景觀真是全國第一嗎？也許出身中原建築學士、哈佛大學建築設計博士，擅長前衛的「數位建築」設計的交大建築所劉育東教授的說法，會

比較客觀些：

東海大學的校園規劃，說全世界前十名可能太誇張，但說排前五十名或說是排前十分之一絕對沒有問題！⁴³

凝固的音樂與流動的文字

歌德曾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雖然一代又一代的東海人，努力用他們的身體在聆聽校園的天籟。但是飄渺美麗的東海校園，也提供了許多騷人墨客創作靈感，更培養出幾位出身東海的優秀作家。

余光中可說是最早以東海校園為題材進行創作的作家，在其寫於 1950 年的詩作〈大度山〉中，東海被描寫成遠離都會的世外桃源：

天狼星比台北更近

至少，那些打領帶的那些動物

很少在山上作祟

（余光中，1981：11）

而次年完成的〈重上大度山〉裡：

姑且步黑暗的龍脊而下

用觸覺透視

也可以走完這一系列中世紀…

撥開你長睫上重重的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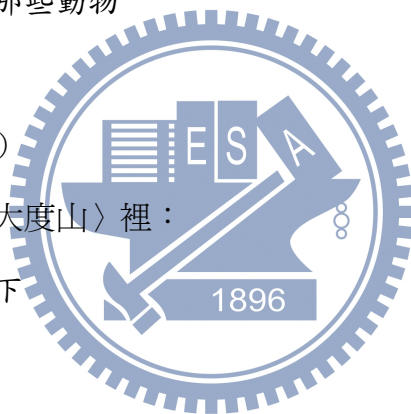
就發現神話很守時

星空，非常希臘…（47）

其中「星空，非常希臘」這段文字，還在文學界引起一場筆仗，但同時也把大度山的地景，抹上一層濃濃的詩意。

司馬中原的《啼明鳥》則是第一部以東海校園為場景，東海人為主角的長篇小說。書名來自一個早年在東海校園流傳的故事：大度山有一種神秘的小鳥，天未亮即成群在相思林啼唱，負責喚醒東海人，日出後就躲到密林裡不再出現。這

⁴³ 摘自劉育東教授在 2004 年 5 月 19 日，由交大 N.C.T.U. 創意空間小組主辦的〈交大建築與校園規劃〉演講之內容。在此同時感謝 N.C.T.U. 創意空間小組的伙伴祐嘉、聖軒、偉榮和經常義務幫忙的兆映，在我寫作論文期間，承擔起讓計畫繼續運作的責任。同他們合作執行這天上掉下來的計畫，為我平淡的學院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



部發表於 1970 年的長篇小說，可說是鹿橋《未央歌》的東海版：

有人告訴我，那裡的學生走在路上，可以自由自在的吹口哨。有人還告訴我一些旁的事，比如夢谷⁴⁴、土地公、啼明鳥…。我想人進大學了，除了唸書還該念念感覺，東海會有哪種感覺的。認花、認樹、認那些石頭，多有意思（司馬中原，1987：9）

大度山的味道，硬是跟都市裡不同，他空曠、寧靜，本身就充滿了靈性（371）

東海是個有靈性的高等學府，我的憂煩，可能也是屬於靈性上的憂煩（493）

這裡的「感覺」、「靈性」對應著聯考制度下台灣教育的「功利」和「僵化」。對生活中充滿壓迫和禁忌的中學生來說，大學是一個跳脫當下現實中所有痛苦的地方，而如詩如畫地孤立於市塵之外的東海大學，正符合這種想像。前東海建築系系主任漢寶德曾在一次演講中，明確的指出：

老實說，東海大學在大家心目中是一座尚過得去的大學，是修道院的影像所造成的（漢寶德，1970：11）

東海歷史系第四屆校友許達然，在《含淚的微笑》一書中，將校園詩意的景觀和個人情感的投射，描寫得如醉如癡：

霧裡在山林中散步，就彷彿散步海底。遠處，校舍消隱；近處，相思樹像浮在一團棉花堆裡，有一種神秘而迷人的美。覺得自己就像在神話裡的仙境漫遊，不禁想起開天闢地時的混沌，想起童年時所幻夢的神仙騰雲的威風，而不覺飄飄然了（許達然，1982：5）

大度山，兩年半來，你使一個從小生長在城市的孩子，得到了他渴望的靜。使他憔悴的靈魂出了微笑，使他生命的湖水得到平靜而澄澈。他愛藍天，你使他更親近藍天；他愛鳥，你的鳥使他的心歡唱；他不一定愛風，但你的風替他翻書吹走他的憂傷。你使他可以恣意的放開腳步，讓腳步鮮明的印在芬芳的泥土上（46）

大度山並不高，但豐富的自然和人文地景，卻使得位居其上的東海校園，宛如超越、俯瞰著人間一切煩俗的苦惱和吵雜。活在這樣的校園裡的學生，被想像成是浪漫而敏感的，他/她們在學人宿舍區裡走著，踏著一地淡紫色的小小棟花，日子過得像孃孃的青煙：

「可是我回去的時候就得再經過那條落滿棟花的小路」我說：「而我非踐踏它們不可！」

⁴⁴ 夢谷：現今台中工業區用地，原為充滿石礫的乾河谷，為當時的東海學生舉辦迎新、烤肉、聊天、築夢、尋求理想、憧憬愛情之地。第一屆校友阮淑珊在〈夢之入口〉一文中說：「大一時發現一條幽靜的河谷，命名為『夢谷』」，參見《東海風》：144-145。

「那是一個問題。」她說

「那很殘忍」我說。

(楊牧，1998：94)

做為一個在大度山生活過四年，還曾參與編輯畢業紀念冊的東海人，楊牧非常清楚校園空間和人的活動的關連：

東海人到底還算風雅--至少和我一樣風雅--知道把個別的每一片森林弄乾淨，剪草枝葉，使你可以穿行其間；更知道在森林中擺設錯落的木桌木椅，好讓你坐下休息，讀書，寫字，談情，吹牛，發呆。做為一個東海大學的學生，除了讀書，寫字，談情，吹牛和發呆以外，其實也沒有很多別的事情可作的了。

(楊牧，1999：47)

豐富的人文氣息

然而東海校園並不只是避世的桃花源，哲學家孟東籬點出了東海校園蘊藏的另一種意涵--豐富的人文氣息。

在鹽寮，我們有大片的海，有大片的時間與空間，就是缺乏人文的氣息，缺少文化，也缺少樹木。就我所知，東海大學是最能解除我這種渴切的地方，校園裡建築與樹木都配合得很好… (孟東籬，1986：97)

當我在東海大學清晨的校園中，走在覆天蓋地的行樹間，我仰著頭，我的感覺不是我在散步，而是在領飲生命的甘汁 (180)

受中西哲學薰陶的孟東籬，恐怕是所有以東海為題的作家中，最能深解陳其寬、張肇康的用心的人：

而今我想到東海大學這平房或二樓三合院的仿唐式建築。她的建築必當是與劍橋或牛津或其他歐美建築多麼不同啊！沒有層層疊疊，沒有高拔。沒有硬壁，而只是平靜，只是明淨，只是安穩、和穆。這其中蘊含著多少與西歐建築不同的人生觀！ (175)

雖然最後孟東籬一家因為無法忍受東海校外賃居的惡劣環境品質，而搬回鹽寮⁴⁵，但是住在東海的那段日子仍是值得回味的：

有時，我真的是好富有。

像現在，我以東大為我的庭院。這庭院有多大呢？有八十甲。這庭院，有這

⁴⁵ 關於這段過程，請參閱論文的第八章第二節

麼好的樹木，而樹木之間有這麼好的建築（209）

但在藝術家蔣勳看來，就連大度山的自然環境也充滿著豐富的寓意：

大度山，沒有叢林峭壁，沒有險峰巨石，沒有雲泉飛瀑，渾渾鈍鈍，只是個大土堆。

因為不堅持，山也可以寬坦平和，也可以擔待包容，不露山峰，卻處處是山，是大度之山。

…大度·山，大度山上的一切，有前世的盟約，也都可以一一告別，唯一想謹記於心的，還是它連山的姿勢都不堅持的寬坦大度啊！（蔣勳，1987，243--244）

原本就十分特出的建築空間和規劃，再透過種種文學的描述，以及師生日常的生活軌跡，讓東海的校園環境，充滿了濃得化不開的詩意和情感。以這樣強烈的情感為基礎，從 70 年代以來，一場又一場以校園空間為題的議論不斷的展開。

第二節 校園景觀的深層意義

大學校園建築傳達的訊息

1968 年 1 月，當年還是台大二年級學生的鄧維楨創辦了《大學》雜誌，1970 年楊國樞擔任《大學》雜誌總編輯，進行內部人事的改組，邀來學術界、中小企業界、知識份子及部份國民黨「開明派」的黨務精英參加編務，使當時在政治、經濟、學術方面學有專長的人物，都齊聚在《大學》雜誌底下，對台灣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人間》雜誌第 37 期：98）。

在《大學》雜誌各期的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在 1970 年 7 月份發行的第 31 期，其中有一篇漢寶德發表的〈教育精神之象徵-學校建築所傳達之訊息〉，文中把學校建築看成是教育精神象徵，並從台灣及美國大學校園建築形式中，去分析其中顯露的教育精神，反省現代大學教育的發展方向。

文中認為東海大學在台灣校園建築中具有顯著的地位：

在本省，只有東海大學的學校建築有一個構想，代表一種象徵的追求。…事實上國內其他大學校舍無不凌亂不堪，這種凌亂說明了我們在大學教育精神上尚缺乏歸趨（漢寶德，1970：11）

不過在漢寶德看來，東海大學的校園建築體現的是一種中世紀時的修道院形式的大學傳統：

它象徵的教育精神，是一座孤立的修道院。老實說，東海在大家心目中是一座尚過得去的大學，是修道院的影像所造成的，它的立學宗旨中充滿了孤立的精

神，比如師生一定要住校……孤立於市塵之外，加上生活的管理。對於女孩子們小心翼翼的家長是一副定心劑。因此東海大學是一個女性味很重的學校（同上）

漢寶德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報告為例，認為封閉式的修道院大學已經成為過去，現代的大學要向社會開放，以社會做為教育的實驗場所。但同時必須避免機械式的訓練，解除老師對學生的威權，增加師生的共同感，創造能讓心靈舒展的教育空間。

同年 10 月《建築與計畫》雙月刊，刊出一篇由夏鑄九撰寫的〈台灣的大學建築〉，比較了台大、師大、文化、東海、聖心、輔仁、逢甲等數所學校的校園建築設計，文中認為相較於許多抄襲混亂、盲目復古的大學校園：

東海大學的學校建築有一個構想，代表一個象徵的追求，他是一座孤立的修道院，在修道院的大學中與我們的倫理觀念互通聲氣，使學生過著一個被保護、封閉隔絕的生活。……東海大學的校舍象徵著一種封閉的教育精神。

（夏鑄九，1970：18）。

文中延續漢寶德的觀點，認為現代大學不能再囿於心如止水的修道院，而必須及時的向社會提供服務。

文中特別提到路思義教堂（該文翻譯成魯斯教堂），認為它已超越了內省沈思的宗教意涵，而成為屬於東海師生，甚至整個台中市民的精神指標：

沒有了它，整個東海，甚至整個台中都失去了光彩。

這兩篇文章都強調東海大學的校園建築，是台灣少見的體現完整的教育構想的校園。但同時其建築中表現的孤立的修道院精神，已不符合現代大學的發展方向，必須要有所改變。

校園景觀與創校理念的反省

漢寶德和夏鑄九的文章發表的時間，正是東海大學處於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時期。文中對東海大學的分析和批評，很快的就得到校內的回應。

1970 年 11 月，榮推會在其刊物《大度風》第 6 期，為了「檢討過去，珍視現在，策勵未來，使東海大學日新又新」（《大度風》第 6 期：3），特別製作專題訪問三位畢業校友對母校的觀感，刊出校長在校務會議上的報告，以及陳其寬先生對東海大學校區規劃構想的說明。在訪問陳其寬先生一文的「後記」中，榮推會的成員表示

這次我們試圖以建築的觀點來重新體認一下我們的學校，並不是我們覺得東海的建築特別怎麼樣，值得介紹。而是希望由其當中更了解我們學校的一些精神

和理想，進而能夠深切的檢討他的是非對錯…（前揭書：7）

「在本省，只有東海大學的學校建築有一個構想，代表一種象徵的追求…」榮推會引用漢寶德的這句話做為文章的開頭。對榮推會而言，校園的建築規劃之所以重要，並非由於它在建築設計和規劃上的優越性，而是因為它體現了創校初期的教育理想。而關於創校初期的教育理想的內容，以及在 70 年代後應進行怎樣的調整，一直是關於東海校園發展方向辯論的主題。

對於一般的同學而言，去談論學校每年的財務收支平衡，聯董會的備忘錄，都顯得太過龐大而抽象。然而從校園建築物的動線安排，區位規劃，去理解當初創校的構想，卻是十分貼近其日常生活的。

例如在這篇文章中陳其寬先生於接受訪問時表示：

一個學校建築都有一個中心，象徵學校的精神。…因為我們是教會辦的學校，所以我們有兩個中心，一是教堂，一是圖書館，環繞這中心，教室，學生活動中心，學生宿舍，教職員宿舍，散佈於其四周。

因為我們是設計一所「大學」，一所「中國的大學」，而我們希望學校的建築能表現出這種精神。因此我們採取了最能代表中國的唐代建築…

唐代木造四合院最能表現一種純樸，泱泱大風…因為我們要的不是旅館，不是觀光遊覽的地方，而是一所大學，一個適合學生活、成長、學習的地方，這種純樸，大方的建築正適合我們的要求（《大度風》第 6 期：5）

在這篇文章中並回應了漢寶德和夏鑄九，對東海大學體現的「孤立」精神的看法。文中首先引用陳其寬的話：

外國有很多大學就在市區內，甚至和外界沒有很明顯的界限，也有很多在城外的學校，所謂隔絕與不隔絕是人的問題，而不能全歸罪建築本身。

同時在比較了東海和其它的學校之後，編輯者表示：

事實上如果是講距離上的隔離至臺中二十分鐘的路程並不算遠，想想政大、輔仁、淡江、逢甲、文化、清華、交大，想到城內（所謂社會），即使臺大到西門町也都不止要二十分鐘。那麼所謂隔離，是否只因為我們自己的固步自封而無的放矢，是否只因為下山看電影玩樂交通不夠方便的一種自嘲，這似乎和參與社會的可能性是兩回事。

除了回應漢寶德等人的文章外，這些論點都和當時東海校內關於「如何走入社會」以及「如何克服疏離感」的討論密切相關。

做為重要區別標誌的校園景觀

如同第一章提到的，東海在 70 年代後必須面對多所新設大學的挑戰，而不復有其創校初期的優勢。在眾多的大學校園中，東海如何能夠突顯出自己的特殊性呢？雖然東海有著輝煌的歷史以及創校理念，還有頗具特色的校園文化。但是這些對外人而言都顯得太過遙遠而抽象，獨特的校園景觀就成為和其他學校之間最顯著的區別。

漢寶德的那句話：「在本省，只有東海大學的學校建築有一個構想，代表一種象徵的追求」，清楚的說明了東海和其他學校的區別所在。在前述《大度風》第六期的文章中，也有這樣一段話：

只要回想一下我們的小學、中學，每個人能分配到活動空間有多少，就可以知道大學之所以為大，不妨再看看其他大學他們終日處身所在為何？

而在建築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之路思義教堂，當然更足以凸顯東海的特殊性。

時序進入 90 年代，由於高等教育政策的轉變，全國各地普遍設置大學院校，使得東海遭到另一波衝擊。在激烈的高教市場的競爭中，東海大學校方認定自己的競爭優勢之一是：「唯本校校地廣大，環境優美，位居台中市交通便利之處，此為他校所欠缺者。」（東海大學發展白皮書：45。底線為筆者所加）

校園景觀因此具有區別東海和其他私立學校，強化東海大學在高等教育的競爭優勢的作用。同時相較於許多剛成立的私立院校，東海悠久的歷史傳統，更是其一大優勢。在召喚過去的歷史的同時，也可以凝聚校友和師生對校園的向心力。因此校園景觀，特別是路思義教堂，也就更具有重要性了！

對內，校園景觀代表了創校理念與歷史記憶的物質化，對外，校園景觀則是東海最能和其他學校進行區別的象徵。校園景觀因此成為「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中的核心，而關於校園發展方向、校園問題的各種討論，也就經常以空間、景觀做主題。校園景觀問題形成了一個「論述場域」，讓各種校園議題在其上進行討論。

鄭禎樺敏銳的注意到在東海校園內任何可能改變校園景觀的工程，都會招致學生的關心與質疑。但是學生們關心和質疑的不只是校園景觀的變更，而是整體校園發展方向與治校理念，這個從 70 年代就在東海校園不停被討論的問題。校園景觀之所以對東海人具有極重大的意義，不只在於設計和規劃上的特出，以及累積其上的生活記憶與情感，還在於它也是一個校內公共議題的論述場域。

第三節 校園空間論述的變化

從景觀論述到空間論述

在 70 年代爭議時期，東風社在 1972 年出版的《東風》40 期中，除了提出〈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這篇擲地有聲的社論外，還刊出一篇由王左元、趙重生共同執筆的〈從學生觀點看東海建築〉。

相較於榮推會的《大度風》第六期，只是訪問校園空間設計者陳其寬，這篇文章則強調從「良好的大學建築是良好教育制度的表現」的立場出發，先在文章前言中，從實質環境的反省回溯到對大學教育理想的重估。接著透過問卷調查校園空間的使用者—學生，對實質環境的看法及親身之空間感受、對未來的期望。再依校園整體環境、教學區、宿舍、學生活動等四單元，整理使用者的意見，分析各單元問題的核心，最後在結論中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這篇有十八頁篇幅的文章，儼然是 90 年代後，由於校園空間問題日益嚴重，東海校方製作的許多校園環境規劃調查的先聲。

在文章內容中可以發現一些看似和建築無關的問題。例如在討論校園整體環境問題時，質疑學校雖有設置「校園環境美化委員會」但卻不常開會。在討論教學區問題時，提出了非建築的「共同科目編班應不分學院混合選課，以增加不同院系同學認識的機會」的問題。在關於宿舍問題的分析中，則用了兩頁多的篇幅，討論校園男女關係的問題：「身為東海人，感受最深的恐怕就算東海校園內彘扭的男女關係」（東風 40 期：53）。這種討論方式並非無的放矢藉題發揮，而可以在當代的都市社會運動研究中獲得佐證。

如同這篇文章結尾所引用邱吉爾的話：「人類創造了空間，空間反過來塑造人類」。當代的都市研究學者多認為空間不是和社會活動無關的純粹物理事實，西班牙裔學者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認為：

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應，而是社會基本的物質向度。把空間放在社會關係之外考量，即使有意研究它們之間的互動，也是把自然從文化中分離出來，因此摧毀了所有社會科學的首要原則：物質與意識乃相互關連（Castells，1999：260）

柯司特強調社會行動和空間形塑的相互作用，並認為空間的形式與意義，乃是社會鬥爭的戰場與表達。而都市社會運動更是直接與空間的形塑密切相關。

柯司特認為都市社會運動雖然有多樣的動員形式，但整體看起來，幾乎都共同追求著三個目標：

1. 對居民而言，使城市環繞著使用價值而組織，以對抗城市生活及服務做為

商品、或交換價值邏輯的觀點。這個使用價值的內涵…它可能是提供足夠的住宅做為公共服務，可能是歷史建築的保存，或要求開放空間…。我們稱這類動員為**集體消費工聯主義**。

2. 我們在都市社會運動中發現的第二個目標為：尋求文化的認同，以維護、創造來自種族或歷史的地方自主文化。…。我們稱這種運動取向為**社區**。

3. 我們發現的第三種目標為尋求增強地方政府的權力、鄉里分權化和都市自我經理，以對抗集權國家和一個庸屬的、劃一的國土管理。我們稱這種自由城市的鬥爭為**市民運動**。

(Castells, 1999: 273, 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從都市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任何空間的議題都具有集體消費、文化認同、自我管理，三個分屬經濟、文化、政治的面向。觀察學生刊物對校園空間問題的討論，在第六期《大度風》談到的校園景觀體現創校理念與歷史記憶的作用，其實是空間的「文化認同」問題。而《東風》40期看似借題發揮的空間討論模式，是對「集體消費」⁴⁶問題的關注。而學生對校園空間變化的熱烈討論，及對校園環境管理機制的質疑，可說是對空間的「自我管理」的呼求。因此從柯司特的理論看來，從70年代以來東海校園內對校園空間議題的討論，其實具有某種「都市社會運動」的性質，而在90年代更由學生發起的一連串行動，變成具體的都市社會運動實踐。

可能有人會質疑，雖然東海校地廣大，但畢竟仍是一所大學。將發生在大學校園內的運動，視之為「都市」社會運動是否恰當？然而我們若能跳脫校園圍牆的分隔，將東海大學及其周邊社區，視為整個大台中都市發展的一環，則其「都市社會運動」的性質就十分明顯了⁴⁷。但和一般都市社會運動案例不同的是，東海校園空間變化的動力，除了來自台中都市發展的歷程外，還有台灣高等教育環境變遷的影響。從運動的主體主要是學生來看，東海的「都市社會運動」又具有學生運動的性質。而這種持續不斷的以校園空間議題為戰場的運動形式，在80、90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中是很少見的⁴⁸。

雖然東海校園置身於大台中都市空間的發展歷程中，但由於位在台中市的邊陲，因此觀諸70年代關於校園空間議題的討論，很少談到和校外環境的互動問

⁴⁶集體消費在柯司特的理論中，應是指由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在這裡則指涉東海校空間問題中和日常生活各項資源提供有關係的面向，例如食、衣、住、行。如果只針對東海校園來看，這些問題，只涉及到東海行政單位和學生的關係。但放大視角看，國家的教育政策、住宅環境政策也是「集體消費」的一環，特別是東海學生的「集體消費」問題，涉及到關於東海別墅區以及台中市都市發展的關連，這部分更是直接和國家及地方政府密切相關。(感謝王志弘老師的提點)

⁴⁷ 這個想法來自於王志弘老師的提點，特此致謝。

⁴⁸就筆者目前所收集的資料看來，只有台大的舟山路事件、台中中興大學的小禮堂保留事件，以及曾經在文化大學和淡江大學發生過的抗租事件等。但這些事件都是零星的個別事件，而不是像東海大學這樣在運動論述上具有強烈的關連性，並持續性的因校園空間議題而產生的校園運動。

題。一直到 1979 年《東風》49 期的〈轉變中的東海〉專題討論台中工業區的開發，以及中港路拓寬可能對東海帶來的影響，才開始有對週邊環境問題較深入的討論。同時因為工業區計畫開闢穿越東海校區的聯外道路，東風社在 1980 年 12 月 2 日舉辦了「台中工業區發展對東海校園環境之衝擊」之座談會。並將座談會紀錄刊載於第 51 期的《東風》上。

到了 80 年代，由於住宿校外的學生日益增多，鄰近的東別和「理想國」社區的環境問題，也成為《東風》關注的焦點，而在 1988 年第 58 期《東風》，以文字和攝影專輯的雙重呈現方式，製作了「學生外宿社區問題」專輯。

從《東風》40 期開始，由於東風社在 70、80 年代的持續努力，關於東海校園環境的討論開始從一個感性、美學的校園景觀論述，轉變成兼有公共說理、社會批判意涵的校園空間論述。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⁴⁹，但是當 90 年代東海學生的實踐，使得校園空間論述變成具有說服人的力量時，一股足以改變物質環境的物質力量，也就隨著東海風而湧現！！

異議性社團⁵⁰的校園規劃論述

在 1990 年「相思林事件」發生後，關於校園空間問題的討論被校內「異議性社團」統稱為「校園規劃」問題。而其論述方式可從當時學生社團「人間工作坊」發行的刊物《人間札記》第 3 期做為典型。當時人間工作坊針對「相思林事件」，製作了一個「相思林專輯」，共有四篇文章，分別是〈不判刑的判決〉、〈從搶救相思林到搶救東海〉、〈解構「後梅時代」的東海校園〉、〈從相思林事件談私有制的侷限性〉（《人間》第 3 期：2）。

〈不判刑的判決〉主要是針對校方的行政和管理手段，尤其是「秋後算帳」⁵¹問題的批判。

〈從搶救相思林到搶救東海〉則進行對東海校園景觀、人文精神象徵的詮釋，這部分並聯繫上對過去東海「黃金時代」的追懷，同時往往帶有今非昔比、藉古諷今的味道。

〈解構「後梅時代」的東海校園〉和〈從相思林事件談私有制的侷限性〉則是由相思林事件，進行對東海大學發展缺乏長程和整體規劃的批判，並聯繫到對

⁴⁹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引自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Marx, 1992：9）

⁵⁰ 在東海課外活動組的學生社團資料內，並沒有「異議性社團」這個分類。但是東海學生多半以「異議性社團」指稱東風社、人間工作坊、台研社、大度山社等較具有批判思想，常對校內外事務提出批判意見或採取抗議行動的社團。可以參考《東海新聞》第 25 期上的專題（東海大學學生會，1991b）。

⁵¹ 指事件結束後學校對參與 620 遊行學生的懲戒，參見第六章第二節。

台灣高等教育政策和台灣社會發展的批評。

對校方管理學生手段的批判、對東海創校理念與傳統的追懷、對校園發展缺乏長期且整體性的規劃的批判、對台灣高等教育及社會發展的批判，這四個方向成為後來「校園規劃」問題主要的論述方向，在後來的學生刊物、文宣中一再地出現。除了由於學生更積極的行動引發和學校的衝突，而出現對校方「學生生活管理」⁵²手段的批判外。其他都和發軔於 70 年代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校園空間問題的討論有高度的相似性。

雖然討論的方向相近，不過 90 年代的異議性社團在討論校園規劃問題時，展現出強烈的將問題扣連上外在制度環境變化的傾向。例如：在 1993 年《人間札記》第 14 期，將校園空間問題扣連至公私立大學資源分配不平均的問題。1996 年第 17 期，則吸收了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提出「參與式規劃」的主張。在《人間札記》停刊後，2000 年由台研社、人間共同發行的校內刊物《(新)東潮》⁵³創刊號（台研/人間，2000a），對當時校園宿舍問題的討論，還拉到「全球化」的層次來談。這都是延續 80 年代末期台灣學運萌芽後，學運團體嘗試透過校園議題的討論，將學生的視角拉向對外在社會環境的關心的實踐。

鄧丕雲認為 1988 年 7 月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隱然浮現出大學改造、社會實踐、政治抗爭三個實踐場域，而其中大學改造又是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最主要的運動場域。

大學改造的議題可以追溯至 1987 年 3 月的「大學法改革請願」，並催生了 80 年代學運史上第一個全國學運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簡稱大革會）。而在 1988 年之後關於大學改造的內涵，不再僅限於大學法的法律制度層面，而產生更豐富的內容。而私立大學的地位、大學社區、校園民主（學生政府）等，可說是其中的核心議題（鄧丕雲：210、213--256）。

而東海大學作為一所私立大學，在空間區位上又偏向「社區型大學」⁵⁴，同時聯繫上自 1970 年代以來，所不斷建構的校園空間論述，在大學改造、大學社區的議題上，更有非常不同於北部各校（尤其台大）的表現。

而從柯司特的理論看來，大學社區議題涉及的日常生活環境問題，校園民主問題涉及的參與管理問題，以及東海的校園景觀問題涉及的文化認同問題，都和都市社會運動中的三大目標有密切相關。而私立大學的地位問題，雖然指向要求改變國家的高等教育政策，積極介入私立大學的經費補助，但其實凸顯了東海校

⁵² 簡單的說，就是解嚴前所謂的「訓導處」，解嚴後更名的「學務處」所進行的工作。

⁵³ 2003 年時，人間工作坊和東海台研社合作發行刊物《東潮》，為了和 1987 年地下社團「吹浪之鯨」社（東潮）發行的《東潮》相區別，本文凡提到 2003 年後出刊的《東潮》之處皆稱《(新)東潮》。

⁵⁴ 關於「社區型大學」與「都會型大學」的分類，請參見本論文第四章。

園空間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⁵⁵。

這種和都市社會運動的密切聯繫，使得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具有雙重性質，它既是一種以大學社區為主軸的「學生運動」，但同時也是一個以學生為主要行動主體的「社區運動」。由於東海的異議性社團的發展和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關係較密切，因此在論述上更為強調其「學生運動」的性質，積極的希望把對校內空間議題的討論帶離校園圍牆的視域。相對於此，一個較為強調「社區運動」性質，特別是和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相關的論述，則在 90 年代中期由新生的「校園解說員社」發展起來。

校解社--社區人文取向的空間論述

相較於異議性社團嘗試讓校園空間論述突破校園圍牆的視域。於 90 年代中期成立的校園解說員社，則仍站在校園範圍但是卻更歷史化、更細膩的去討論校園空間的問題。在其所出版的各期《東海采風》中，透過大量的口述歷史、文獻調查，重新建構東海校園的歷史記憶。並出版《東海校園建築步道》手冊，協助校方編輯《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一書，以浪漫而富人文色彩的語調述說著東海校園的面貌。

「校園解說員社」（簡稱校解社）的創辦人張志遠，受到當時台灣社會開始重視本土文化的風氣影響，以及「九份文史工作室」等地方文史團體的經驗的啟發，於 1994 年 1 月以「從土地出發，進而瞭解、尊重土地上的人、事、物，更加關懷在土地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為宗旨，創辦了「台灣鄉土文化社」（簡稱台鄉社）。

然而在運作一段時間之後，一方面感覺到「台灣」的領域太過廣泛，台鄉社很難進行深入的探討。另一方面從 1989 年到 1994 年間，在東海校內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以及東海建築系洪文雄老師舉辦的「東海校園巡禮」等活動，使得他感覺到有必要將重心集中到東海校園本身。

從 1989 年到 1994 年間，東海校園內又產生了許多有關校園空間的運動，當時有一些學運社團積極參與，然而我卻發現這樣的運動都是刺激、反應式的，有事件發生的時候，校園規劃議題才會被討論、提醒，而且參加的人員來來去去，都是不定的，真正關於東海最基礎的資料卻很少人去碰觸，而如果只用抗爭的方式其實是達不到校園空間論述深化的目的，於是我想還是有必要，回到最基本的方式--教育，教育大家如何去瞭解自己的學校--東海大學。

（張志遠口述，參見林佳臻/王映涵，2004：13-14）

⁵⁵ 參見本論文第十章。

1994年9月起，台鄉社開始培訓「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到1997年共培訓了三期共57位同學。由於解說員人數眾多，遂有人提出另立社團的意見。於是在成立籌備小組，報請學校核備後，於1997年10月14日正式成立校園解說員社。

校解社的日常運作中，「校園解說員」的培訓佔很重要的一部份。想要成為校園解說員的學生，除了必須按時參加各種關於東海校史、生態、口述歷史調查、解說實務訓練的課程之外，還必須在結業之前，自力或和組員協力完成一篇關於東海校園的文史調查報告。每一期的解說員結訓調查報告，都發表在校解社的社團刊物《東海采風》上。

透過持續運作的校園解說員培訓機制，以及和東海圖書館特藏組、建築系等單位的積極合作，校解社累積了大量關於東海校園空間、生活的歷史記憶，以及景觀建築環境生態的紀錄。從該社團成立的宗旨和發展方針來看，校解社的校園空間論述，受到90年代中期台灣的社區運動影響甚深，並接合了東海傳統的「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

校園解說員社成立宗旨：

1. 為大一新鮮人解說校園特色，使其對東海歷史、教育理念，植物、鳥類及建築特色有粗淺的概念，加深其對東海「根」的認同。
2. 為在校同學和畢業校友解說服務，使大家有做一輩子「東海人」的認同與驕傲。
3. 為社會人士和其他機關團體解說服務，使其溶入東海校園生活，愛護校園環境
4. 從社區主義出發，堅持校園成員對校園有「知」的權利
5. 揭示東海精神，喚起東海意識，鑄造東海傳統。
6. 推廣、實踐「生態東海」、「人文東海」

校園解說員社的發展方針：

1. 從東海土地出發，透過田野調查方式記錄，由內而外，建構社區自主文化。
2. 校園史料文字化、影像化、資訊化。
3. 充實校園解說員內部基本訓練，加強與台灣各地文史工作者之交流結合。

（林佳臻/王映涵，2004：22，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在社區主義的影響下，在校解社的校園空間論述背後，有著強烈的關切鄉土的情感，並要藉此召喚出「家」和「自己人」的認同。對比於異議性社團的校園規劃論述在空間視角上不斷外擴，校解社則在時間視角上不斷回溯。

初期的《東海采風》中，除了對於「相思林事件」、「德耀路大石頭事件」等重要的校園空間運動過程進行記錄外，大部分都是在記述校園內各棟建築物、環境、景觀的歷史。

在第 4 期時首次出現了關於校外東別地區發展的訪談。第 7 期時由於對校內興建「第二教學區」問題的關注，在〈第二教學區規劃之反思〉一文中開始出現將校園環境問題與外在社會環境變化扣連的論述方向。

而在 2004 年 5 月出版的第 8 期，除了對創社十年的歷程進行反省之外，另外有長達 61 頁，對台中市的都市計畫過程與工業區規劃進行批判的〈東海保衛戰--「2003 年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地底」事件之省思〉一文。

而從 2000 年「東海希望聯盟」的「V 大樓事件」開始，校解社成員也開始參與校園空間運動，並和具備社會運動視野，長於群眾動員的異議性社團有議題上的合作。在 2003 年之後校解社針對「第二教學區」規劃案在校內舉辦了多場座談會。另外並籌辦「東海週」、「六個角度看東海」、「從社區角度看東海--談東海的文地產景的另一種想像」等活動。

雖然有和異議性社團在運動上的合作，但在運動實踐上校解社仍偏向以刊物、座談會等方式介入對校園空間問題的討論，儼然延續了東風社在 70 年代對校園環境問題的關注與實踐（參見第四章第二節）。

看起來校解社的校園空間論述與社會實踐，概括承受了 90 年代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實踐的成果與侷限。但從公共領域形成的角度來看，不論是異議性社團的校園規劃論述乃至校解社的社區人文取向的論述都是必要的。李丁讚認為一個公共領域的締造，必需兼顧二者--動之以情，說之以理：

假如說公共領域是說理論辯的場域，民間社會就是常識與情感的場域，公共修辭或公民修辭（civic rhetoric）的作用，就是有機地聯繫這兩個場域，把常民世界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其所承載的共通感受，轉化提升到公共說理的層面，融會常識語言和論辯語言，而有助於推動公共事務的改革。換言之，公共修辭是將一個社群中個體之間、或團體之間殊異的生活經驗串連起來、召喚起來，成為某種共同經驗、集體記憶、以致形成某種公共感的重要行動環節。

（李丁讚，2004a：7）

雖然異議性社團在論述上對於校園運動的歷史記憶、創校理念的重述下了很多功夫，但如果要人們為了改變自己周遭的環境而行動，除了公共說理與對運動的認可外，對於生活環境的情感與成員的社會信任也是必要的。而這種情感和信任不能完全來自於勞作制度、大一全體住校制等慣例性的生活實踐，也需要持續性的論述建構。

整體看起來，關於東海的校園空間論述，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關於校園建築形式、創校理念、沿革變遷的歷史與建築的面向。這可從 50 年代台灣建築界對貝聿銘主持的「東海大學校園規劃案」的期待，以

及日後「路思義教堂」建築形式所造成的震撼為開端（賴人碩，1999：2-5）。聯董會創校時寫下的大量文件，更是這個面向的論述的重要寶藏。完成於1981年的《東海大學校史》，則可以說東海校方對這方面的史料進行有系統整理的開始（參見第七章七節）。

第二個面向是由各種文學作品以及師生的生活記憶，所建立起來的情感的、美學的面向。這可見諸於本章第一節所描述各個以東海為題的作家的作品，還有東海學生從勞作制度、大一全體住校制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種實踐中，所累積起來的情感。

第三個面向則是以校園規劃體現的教育理念為基礎，對校園發展、權力關係乃至整個高等教育進行批判的面向。如本章第二節、第三節所言，這個面向的論述最早可見於70年代東風社、榮推會對漢寶德、夏鑄九等人的校園建築論述的回應，而後隨著東風社在70年代持續製作的「未竟的探討」專輯，更深化了這方面的討論。

而90年代的東海學生，則在這些前人的基礎上結合了社會運動、社區運動的理念，更擴充了校園空間論述的內容。

透過在漫長的歷史中不同形式、立場、視角出發的論述實踐，不斷擴充了對校園空間問題討論的深度和廣度。校園景觀的重要性也就在東海校園內外一直不斷地被強化，而關於路思義教堂的獨特性、全國最美麗的大學的稱號等等，也就在過程中不知不覺的被確認下來，同時形塑出東海獨特的「校園景觀認同感」，這些都為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建立了豐厚的文化論述基礎。

凡是看到矗立在校園中的路思義教堂的人，大都忍不住要為其所表現出來的莊嚴和寧靜而感動。但是在神聖的光芒之下，卻是亙古以來以校園空間為議題的論述戰場。在這眾聲喧嘩的戰場中，湧現出一群又一群學生的身影…。

第四章 呼嘯的東海風

如果風沈默，則四時不調

如果有人沈默，這種和平只是表面的、暫時的

風終歸是會來的，你，為什麼你不也呼嘯

請把想說的說出來，把你認為該說的說出來

像風一樣的坦白

——《東風》3卷12期

第一節 東海最早的學生自治組織——榮推會



樹立優良校風與推動榮譽制度

由於東海創校之初即明白宣示：「我們透過了耶穌，相信人生是有其固有的價值與尊嚴。個人思想，受了他的靈感以後，一定能自由地、誠懇地去尋求真理，以達到真善美的境地。」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也表示：不願制訂繁瑣的學規與嚴厲的法則，來迫使學子就範。因為這不是大學教育的正途，不能使學生成爲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如何誘導學生自己從心底湧現靈性，自覺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因此創校初期東海的訓導處不採取傳統由學校制訂規章的作法，而促勵學生制訂生活公約，以啓發學生「自覺、自發、自治之精神與守法負責、推誠合作之習慣」。於是在1956年春季，由學校邀集各系代表，經數次商討後，決定由學生代表自行執筆草擬公約，經全體學生集會通過後而成爲生活公約（東史：121、153）。

由生活公約的共同制訂，進而討論到關於如何樹立優良校風的問題。生活公約制訂兩年後，《東風》在多期社論中，針對圖書館書籍的偷竊、男生餐廳餐具的大量遺失、非法搶佔座位、禮貌不周等問題，檢討了制訂生活公約二年來的實施成效，認爲並未發生匡正補救的作用。

1959年三月出版的英文版東風（East Wind）第1期上，首次出現了關於東海是否要實行「榮譽制度」以建立優良校風的文章。並介紹了「榮譽制度」在國外運作的情形。

而在1959年6月《東風》第8期，又以「點燃明亮的燈光—呼籲本校輿論的建立」為題，強調建立輿論對學生自治、自覺精神的養成的重要性。認為一方面透過師友的指導奠定個人自覺的基礎，同時透過輿論建立全校師生對某一問題的共同意識，兩者相輔而行，學生的自治能力才能提高，優良的校風才能樹立。至於如何建立本校輿論，該文則提出三種方式：第一、學校要鼓勵同學說話。第二、要給同學們有說話的機會和場合。第三，由學校辦一張小型的週報或旬刊，供同學們發表意見（《東風》第8期：4）。

同期的英文版《東風》第2期，則將贊成和反對建立榮譽制度的意見加以比較。強調榮譽制度的建立，需要同學自己主動發起、主動配合，而不能依靠師長由上而下的推動，否則必然要面臨失敗的命運。

《東風》連續數期的社論，引發了校內對於是否應建立榮譽制度來樹立優良校風的論辯。1960年1月，學生生活促進會刊物《自覺》創刊，開放給學生共同討論建立榮譽制度的可能性，將這個討論帶向更高峰。之後第11期的《東風》以「自作主宰的氣概—兼談本校教育精神」為社論，指出：

東海大學的創建，自始便有一原則——便是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同學自作主宰的氣概。

自此以後，雖然有同學認為或可合併於學生活公約實施，或質疑此來自西方的制度未必適合於本地，不過「榮譽制度計畫小組」在經過數月的努力，參照美國最先實施榮譽制度的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資料⁵⁶，擬定草案，經系代表修正同意後，由全體同學投票通過。1960年3月28日正式成立「榮譽制度推行委員會」（簡稱榮推會），報准學校施行，並選出第一任榮推會主席，成為東海第一個經由全校學生普選出來的代表組成的學生自治團體。

從榮譽考試到公共事務行動組織

榮推會在其規章中界定其成立宗旨為：

以砥礪人格，增進團體生活教育為本，透過「東海大家庭」的完善構想，使同學對日常生活行為，乃至人生所避不可免得困難障礙，做深刻的反省、檢討，因而導致對「正確觀念及行為」的體認及興趣，終將榮譽觀念自然流注並表現於其舉手投足之間（《大度風》第1期：5）

⁵⁶ 可以參考維吉尼亞大學榮譽制度（Honor Committee）網頁：<http://www.virginia.edu/honor/>

可見其出發點仍是種強烈的倫理學的自我克制、自我訓練。事實上榮推會成立後，初期推動的重點工作就是：無教師監考的榮譽考試，這也是當初校內關於是否建立榮譽制度的爭論焦點。由於爭議太大，榮推會成立後決定對榮譽考試的推動採取循序漸進的作法，慢慢爭取同學的認同和支持。而除了榮譽考試外，榮推會還推動了多項生活制度的改善工作，例如：榮譽售賣郵票制度、設置失物招領箱、試行取消飯票制度、發起不踐踏草坪運動等。以及新生服務隊、油漆女舍交誼廳等校園服務工作。其後並發行刊物《大度風》，做為校內師生發表意見，討論公共事務的管道。而在1969年修訂的「榮推會規章」中規定榮推會的工作項目為：

一、收集、檢討校內同學所提的意見，代表同學向學校作有價值且有效的建議；真誠協助學校推行校政。

二、代替及代表同學諮詢學校各方面有關事項；每月不定期公開回答同學提出的問題。

三、直接與學校有關單位接洽，使飲食、交通等事宜利於求學，切合需要

四、協助各社團之成立與發展及幫忙解決同學私人困難，使全校同學能順利完成學業，人才輩出，彬彬稱盛。（《大度風》第1期：6）

榮推會由原本的生活教育與服務團體，逐漸變成校內公共事務的重要行動組織。以致於夙有傳統的東風社，甚至曾界定彼此的差異為：

東風社僅為思想的提倡與觀念之啟發，至於榮譽之推行與制度之改善，屬榮推會工作範圍，非本社職責（《東風》40期：46）

而榮推會的刊物《大度風》，也成為《東風》以外，東海校內重要的討論校園公共議題的刊物之一。甚至在刊物內容上，偶有較著重思想觀念啟發的《東風》更激烈的言詞，例如：

千萬記住，如果友校的同學們問你，為什麼東海大學要創辦夜間部。你一定要引用老師的話：「應台中各界的需要，提供社會服務」（杜蘅之先生）：「推廣教育與服務社會，適應時代潮流」（呂士朋先生）。但是，不要提到一個字：Money。

…東海校長這個位置非常曖昧，不是容易當的。然而新校長畢竟選出來了。但願小學民們從此可不作夢了。（見第七期課外活動報導「大學生不要作夢論」）

（《大度風》第9期：11）

對東海的發展來說，現在有多少錢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頭腦清不清楚的問題（《大度風》第8期：13）

在1971年前後，東海校內因為校園發展方向產生嚴重爭議時，《大度風》也以多篇文章報導，訪問校內師長、同學、校友、刊載校長於校務會議的報告等方式，幫助同學瞭解並參與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

這種積極參與校內公共事務的精神，獲得東海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的讚許，他於卸任後收到同學寄贈的《大度風》後，回信表示：

各篇內容，不注重歌頌校務之進展，而著眼於具有建設性之批評與建議，尤為精采，亦足徵全校師生對東海參與之深（deep sense of involvement），殊為欣慰（《大度風》第9期：2）

榮推會的衰微

榮推會作為東海第一個學生自治組織，可說是東海校園公共領域發展的先行者。會有成立榮推會的提議，原是出於校內圖書失竊率太高等公共問題而引發。不過在東風社推動榮推會成立的論述中，似乎將公共利益視為先驗而自然形成的。雖然強調輿論的重要性，但輿論並非首先作為對公共權力的監督，也不是公共利益形成的機制，而是作為同學之間相互監督和管理的機制。

嚴正的輿論，往往可以收到法律上所收不到的效果…我們主張本校輿論的建立，不是從「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觀點來看；而是從本校的政策上和實際上，覺得本校輿論的建立，對本校樹立優秀的學風，將有很大的貢獻

（《東風》第8期：4）

在「樹立優良校風」的道德說詞下，關於校園內的公共利益的內涵，已經被預先決定了。雖然強調學生的自主性，但前提是要能先自覺到公共利益的內涵，在這點上推動榮推會的先行者們，倒很像哈伯瑪斯所描述的盧梭：

每個公民只有作為普遍意志的參與者才能獲得自律。因此普遍意志不是私人利益衝突的結果…普遍意志與其說是一種爭論，不如說是一種心靈的默契

（Habermas，2004：126）

在這種觀點下的輿論，是一種透過公共監督把規範內化到每位同學身上的機制，而缺乏李丁讚所說的有不同立場的當事人參與討論、內容涉及實踐細節的公共論述的性質（李丁讚，1997）。反而關於是否成立榮推會、實行榮譽考試制度的爭論，由於涉及正反兩方對於實踐細節的激烈辯論，倒比較有哈伯瑪斯、李丁讚等人所界定的輿論的意涵。

榮推會的創立者們，似乎有考慮到這種問題，因此在制度設計上預留很大的彈性：

至於制度的細節，則當以目前的環境和問題，隨時增減或刪改。這是一種不斷的、創造性的工作，沒有人能預見到界限，所以每一屆的榮推會都應付予〔原文如此〕榮譽制度它當時的意義，才会有延續存在的價值（東史：161）

事實上榮推會成立後，除了推動「榮譽考試」制度與「樹立優良校風」之外，並沒有明確具體的目標。這雖然為榮推會的運作，留下很大的空間，但也容易讓其後繼者感到無所適從。

隨著時代的變化，榮推會似乎逐漸要擺脫盧梭式輿論觀的限制，因此而有《大度風》的創辦，舉辦書籍、蚊帳義賣活動，設立自助郵箱，推動禁踏草皮、圖書館禁佔位置運動等。但基於推廣「榮譽制度」而成立的背景，使其對於校園公共事務的參與，仍以帶著濃厚道德色彩的「服務」居多。以致於有人連隔壁寢室收音機太響，都要求榮推會協助解決。

定位和運作上的模糊，使得前物理系主任孫景富曾很不客氣的批評：

似乎榮推會的光輝時代已經過去了，假如榮推會只是賣賣東西，倒不如變成合作社算了。榮推會應以身作則，推動每個人的榮譽心（《東風》45期：30）

而原由社團和學會代表互選成立的「學生活動中心」，在改由全校學生普選總幹事後，榮推會的體制內公共事務協調、服務的角色逐漸被學生活動中心取代。但由於缺乏東風社深刻的人文社會反思，以及後來的異議性社團明確的權利意識與社會運動理念的導引，榮推會也無法負擔體制外的觀念啟發、行動先導的角色。反而因為《大度風》的部分內容和《東風》重疊，校內曾有是否要將兩份刊物合併成為東海校刊的議論⁵⁷。這些環境的變化都使得榮推會的角色更加模糊不清。

由於缺乏足夠力量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並進行自我調整，使其內在制度逐漸僵化。榮推會所要推動的「榮譽」，變成了徒具形式的口號。本來強調啟發同學自治、自覺精神的組織，反而變成了強制性規定的犧牲品，最後在「不知道要做甚麼」的情況下，無聲無息的消失在東海的歷史中。

⁵⁷ 這方面的議論可以參見《大度風》第9期：13--18

第二節 東海人文批判傳統的象徵--東風社

驕傲的傳統

東風社成立於 1956 年 7 月，本來是直屬校長室，經費也由校長室直接撥給⁵⁸。當時東風社的成員多為中文系學生，社團刊物《東風》也較偏重於文藝性質，出版至第 5 期，開始改為雙月刊，同時內容走向「綜合性刊物」：包括文藝創作、人文譯介、社會科學及人文思想的評介等。

《東風》的創辦可說是屢仆屢起。1956 年出版兩期刊物後旋即夭折，次年重行復刊，但出版一期後又因社團人數不足宣告中斷。雖然在得到校長支持後復刊。並維持在一年出一到兩期的出刊頻率，但還是常因為人力物力不足而中斷。

1961 年 1 月發行的《東風》第 2 卷 1 期，於社論〈苦難時代青年的新德性〉一文中，歷述東風社六年來的歷程並對東風社的角色重新界定：

本社成立的目的與工作，雖然時有變更，但是本社絕不做一件無聊的工作。出版東風雜誌只是我們工作的一項。…我們做過更多有意義的工作：出版英文版東風…創辦過英文東海新聞…創辦自覺月刊…倡導榮譽制度…主辦學術演講，提倡學術風氣（《東風》2 卷 1 期：3）

這段文字顯現出，東風社並不想做為專門出版綜合學術性刊物的社團，而期望能對周遭環境進行主動積極的介入。東風社並在社論中，清楚表明社團介入與議論事情的立場是：

雖然我們對校長負責，對師長負責；但我們更對東海的歷史負責，對千千萬萬的校友負責。我們的立場是：永不屬於任何學派、任何黨派。我們永遠立足於良心、真理與理性之上（前揭書：4）

自此以後，東風社的活動與《東風》的內容，日益關心東海及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在 1973 年，東海面臨擴大招生、增設新系、廢除小班制的變局之時，《東風》40 期以名為〈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的社論，提出「大學社會化」與「大學民主化」兩個目標，做為建設新東海的方向。並以空前絕後的達 160 頁的豐富內容⁵⁹，分別從不同角度分析東海校園、台灣社會的變化。並舉辦「東海週」活動，重新檢討創校精神、校園和社會的關係。

⁵⁸ 東海大學創校初期，有三個學生社團直屬校長室--榮推會、東風社、工作營，東海校友秦葆琦認為這意謂著這三個社團是全校性的，好似東海學生就該是這些社團的一份子，這三個社團也象徵著榮譽精神、學術自由、社會服務的東海人特質（東海大學，1985：64）。

⁵⁹ 《東風》創刊初期，每期篇幅大約 20 餘頁。之後每期大約在 50--80 頁的篇幅，《東風》46 期曾有 120 餘頁的篇幅，1991 年出版的《東風》60 期也不過 110 頁。因此第 40 期的《東風》160 餘頁的篇幅絕對是「空前絕後」，也可見得當時東風社對東海校園問題的關心。

《東風》40期所揭櫫的「大學社會化」與「大學民主化」兩個目標，以及對處於轉型時期的東海的關切，成爲之後數年《東風》的主題。其後第44期和45期《東風》的〈未竟的探討〉專題，46期的〈我們對東海人文教育的期望〉、〈東海人的社團教育〉，一直到49期的〈轉變中的東海〉、51期的〈台中工業區發展對東海環境之衝擊座談會〉，類似的旋律都不斷重複著。

然而東風社並非只忙於對周遭環境發表意見，每一期的《東風》仍有比重不輕的學術思想引介與文藝創作發表。東風社其實一直設法在人文社會思想的研習、校園事務的探討、文學藝術的賞析三方面，努力做出一些有限但卻屬於自己的貢獻，期望讓社團成爲一個「東海裡讓學生自由進行人文綜合性探討的空間」。

因此除了定期出版刊物外、舉辦學術演講外，東風社內部還固定舉辦茶會、讀書會。80年代末期由於社員興趣不一，社內又分別組成「思想讀書小組」、「時事小組」、「文學小組」、「電影小組」及「音樂欣賞小組」，針對各個專題定期討論。社內的「筆戰簿」則是東風社員進行思想觀念對話的論辯場域。

東風社盡量設法鼓舞社員進入對話的狀況：「只為了在面對面的交談與討論之中，總有些什麼東西會被創造、被發想，也總有可能會激發出一些有深度、有啟發性、能豐富生活的談話。」（《東風》59期：4）

多元而開放的精神，以及思想和行動的交融，使得《東風》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別於榮推會編輯的《大度風》。也讓東風社成爲戒嚴時期的東海最富批判力的社團，從中產生了許多日後發起東海學生運動的成員。

東海大學的東風社，一向是該校自由學風的象徵，從1986交關之際起，在校內積極扮演著一個改革派的角色，將社團由抽象層次的關懷拉轉至現實面，努力傳播台灣本土意識。這是屬於校園文化批判的範圍。（鄧丕雲，1993：43）

東海校友楊牧雖然開玩笑的說，在東海校園這樣優美的環境中，學生們除了讀書、寫字、談情，吹牛和發呆以外，其實也沒有很多別的事情可作的了。不過他馬上補充，除此之外東海學生還是有許多的思想和行動，擁有許多讓人驕傲的傳統：

我們東風社也是我們最驕傲的傳統之一，它的出版品敢說話、能批評，那是進取的讀書人的精神（楊牧，1999：51）

《東風》與校園公共領域的轉型

德國思想家哈伯瑪斯在其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認爲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公共領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產生出來的。公眾通過文學討論，對源自私人領域的主體性有了清楚的認識，開始有了相對於君主權威的「個

人」的概念。透過在沙龍、咖啡廳、文化批評等機制的運作，個別的私人經驗經由相互的交談，變成具普遍性的共同議題，產生了「輿論」的概念，也使得「文學公共領域」慢慢轉換成「政治公共領域」（Habermas，2004：35-39、68）。

東風社與《東風》的歷史，似乎也呈現著相同的歷程。由原本文藝、學術的綜合性刊物，開始討論東海學風、呼籲學生關心東海校園，並進而透過刊物、舉辦活動，對具體的校園公共事務進行議論。而東風社內部的活動也像極了哈伯瑪斯筆下 18 世紀的沙龍——一群充滿熱誠的學生在社團裡進行著文學與思想的對話，進而形成對現實環境的關心，而用文字或活動介入改變。

但是東風社與《東風》看來又像是介於「文學公共領域」與「政治公共領域」之間的混合物。它一方面試圖擔任啓蒙者的角色，但又想擔任校內不同意見的交流的角色，一方面想做為思想文化的傳承研究者，但又想成為改變環境的行動者。這些看來相互矛盾的傾向，全都共存在東風社中：

東風裡面有其主體性上根本而一致的價值——它是個促使人有所關懷、思考和成長的地方。它堅持『盡可能嘗試、辯難、釐清、及說明彼此的觀點和立場』，而這也是東風幫助我們建立個人自主性的基本磨練功夫。它是東海裏讓學生自由進行人文綜合性探討的空間。

（《東風》59 期：4）

這種「自由、多元、對話」的傳統可說是東風社的一大特色，但也容易分散社團的力量。《東風》59 期的社論曾表示，社團太過廣大的關懷面及太過多樣的小組，可能使得社員的關係渙散、相互隔離（《東風》59 期：4）。另一方面，新起的社會運動風潮，又要求具有現實關懷的學生必須更專心地、持續地於特定議題上。東風社員姜雲峰評論 1989 年時的東風社，雖然人力尚稱充沛，但是工作上仍十分吃力，因為幹部們都

被「多元發展」與「專業地、持續地」聯手夾殺了...前者是傳統的風貌；後者是當道的潮流（《東風》60 期：99）

同時東風社向來長於以文字呈現理念，面對 80 年代末期新起的人間工作坊、大度山社、環境生態社等以更直接的方式，將理念具體落實於對象的社團時，則東風社的實踐方式不免會遭到質疑，導致人才大量流失，使得社團運作更形困難。

1993 年《東風》61 期出刊之後，陳俊霖、蕭旭智、朱逸恆、劉本全等社會系學生都曾努力維持東風社的運作，其間哲研所研究生李元章亦曾參與社務。但因為人員少、流動性大，使得刊物編輯工作變得十分困難，因此東海校園內一直未再見到《東風》出刊⁶⁰。

⁶⁰ 感謝人在英國的前東風社社員朱逸恆（小朱）接受我用 Skype 作線上訪問，提供這些資訊。同時也感謝以前一起在東海書苑工作的好朋友菁芳，幫我居間進行介紹聯繫。

1998 年間，和東風社同一間社團辦公室的「文學欣賞社」幹部黃國治⁶¹接到一通電話，請他擔任東風社社長。由於黃國治也是人間工作坊的幹部，並積極參與「118 事件」、「東海希望聯盟」等校園空間運動，過去一直困擾東風社的文學、思想、行動的多元發展問題，此時以一種象徵性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1999 年 12 月 31 日，東海大學為迎接 21 世紀的到來，於文理大道校友鐘樓前設置「時光膠囊」⁶²。而在隔年，東海校園內就未再看到「東風」的名字出現在海報牆或活動傳單上，東海最驕傲的傳統之一——東風社就此消逝於大度山上。

第三節 東海裡的吹浪之鯨——異議性社團

東潮的出現與分化

雖然是受國外教會資助而成立的學校，但東海大學並非威權統治下的避風港。事實上東風社的活動，經常遭遇到校內訓導單位或明或暗的壓制和干預。1970 年代初期，《東風》編輯林載爵一篇訪問台灣文學家楊遠的文章，被學校禁止發表（鄭鴻生，2001：151）。校方也曾以「有鼓勵婚前性行為的疑慮」為由，要求東風社撤除社團辦公室內鋪設的榻榻米。據傳教官室也曾幕後策動學生加入東風社，意圖趁東風社改選社長時將社團「質變」。

在 80 年代末期，東海校內部分學生已不滿於純文字的論辯，希望採取更直接的行動改變周遭環境。部分法律系、政治系還有東風社的成員相互結合，以經費公開、重新定位學生活動中心為訴求，推出候選人參與 1987 年 5 月的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的選舉。同時在 1987 年 6 月發行地下刊物《東潮》，以體制外的行動爭取言論免審稿權、校園民主，在校內造成很大的衝擊。

《東潮》是一份地下刊物，其發行團體名為「吹浪之鯨」⁶³，但是東海學生多半以「東潮」稱呼這個團體，後來連團體成員都不使用這個名稱，而以「東潮」為名參與校內外的活動。

由於東潮採取地上及地下的雙線行動，地上的行動是以學生活動中心推動學生自治，地下則是運動造勢。這種雙重行動大約持續了半年，由於體制內和體制外行動在思考和實踐上有許多衝突，隱埋了東潮成員分化的伏筆。約在 1987 年

⁶¹ 感謝黃國治和鍾瀚樞在論文計畫書寫作期間接受我的訪問，並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⁶² 這個膠囊內以真空方式存放校務發展資料、跨世紀宣言與各系提供的紀念物件，基本上每隔 50 年開啓一次，「開啓時都將再置入當時的努力痕跡和新的夢想，提供每隔 50 年後的東海人檢視」（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2：81）。

⁶³ 「吹浪之鯨」之名，出自東海第一任校長-曾約農先生，於 1957 年 7 月 31 日任期屆滿退休時，所寫的〈留別東海〉一詩：「兩載桃畦手自栽，橫渠孤負扣鐘來。舞城弦誦慚宗緒，沂水風雲愜素懷。借得寒鶴耽落拓，非關雞肋委塵埃。相期東海鯨吹浪，一為中原洗劫灰。」（東史：132），感謝張志遠學長提供這個資料。

底，東潮決定公開化，由於公開化意味著抗爭的激進化，使得成員內部的分化更凸顯，到了 1989 年東潮正式分化成爲「人間工作坊」和「大度山社」兩社。（鄧丕雲，1993：116、167）

分化後的東潮，原先參與學生活動中心幹部運作，偏向體制內抗爭的成員，在 1988 年 9 月成立「青年中國學社」，發行社團刊物《大度山》。和東潮的狀況類似，後來東海學生多以「大度山社」稱呼，青年中國學社之名則僅遺留在東海學生會社團部的檔案中。

另外一群較偏向體制外抗爭的學生，則於 1989 年 9 月 21 日成立了「人間工作坊」⁶⁴（簡稱人間）發行社團刊物《人間札記》。在 1991 年間，部份人間工作坊成員又另外成立了「台灣文化研究社」（簡稱台研）發行刊物《思想枝》。但和東潮後來的情況不同，人間和台研雖然各自獨立招生運作，但在校內各項議題的推動，以及社會運動的參與上，合作十分密切，東海學生多以「人間/台研」並稱兩社團。

校園基地論與東海學運

東潮、人間、台研、大度山社等社團的興起，當然和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連。這些社團都曾參與 1990 年的「三月學運」，並加入其後成立的「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不過東海的學運極強調其和北部（尤其台北）學運的差異。特別是人間/台研的幹部，經常會以「我們較重視校園經營」來和北部的社團做區隔。例如：前東海人間的幹部劉欣恆就認爲「東海的幹部一直會有要拉回來校園經營的焦慮！」⁶⁵（訪問記錄：2003/5/14）。對東海的學運幹部來說，在校園外的社會參與，是爲了累積進行校園內運動的資源：「我們出去外面亂搞的目的，是爲了能回來學校亂搞。」（同上）。

雖然在「三月學運」之前，東海的學運團體如：東潮、人間等社團就提出過學運應以社會實踐爲方向，以校園爲基地的「校園基地論」（鄧丕雲，1993：271）。但是學生運動畢竟是以學生爲主體的社會運動，不管是北部還是中部，即使對政治社會議題投入再深的學運團體，都不可能忽略校園經營的重要性。以「校園經

⁶⁴ 非「大度山社」的部分東潮成員，其實早在 1988 年 12 月份就已經籌組社團，並舉辦數次活動。但是因爲原先呈送的社團名稱：「台灣問題工作隊」，訓導處（現在的學務處）以「台灣」一字太過敏感尖銳爲由，希望更名。社團內經多次討論後決定以「人間工作坊」爲名，以減少不必要的非難。但後來學校又要求學生必須具結：「保證東潮從校園消失」才可放行，經多次公文往返、協商之後，終於在 1989 年 9 月 21 日正式成立，並召開第一次社員大會。整個過程可參見《人間札記》試刊號，1990.1.12。另外「大度山社」成立時，據說也遭受過學校類似的非難，因此才會以「青年中國學社」這樣的名字成立社團，可參見鄧丕雲，1993：168。

⁶⁵ 感謝東海人間的學妹劉欣恆接受訪問，在此同時感謝寫作過程中，人間/台研的同志們給予的支持和鼓勵！！杜憶如、關亦然、林倬立、趙延德，並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提供不少寶貴的意見，特此致謝。

營」、「校園基地論」做為北部和中部的學運發展的差異，並藉此進行自我區別，其實是有點奇怪的。

關於中部和北部學運的差異，《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一書的作者鄧丕雲認為：中部的學運在90年代後發展出很強的區域自主性，

區域的自主性不僅是在組織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對全國性議題集中台北的抗爭方式，有著以區域為考量的判斷基準（鄧丕雲，1993：390）。

從環境的條件來看，由於交通的問題，中部的學校不容易像北部那樣，能輕易的為全國性議題向中正廟、或政治機關進行大規模動員集結。就以1990年「三月學運」來說，北部學校的學生甚至可以在晚上回宿舍洗澡、更衣、開會，但是對中部學校的學生而言就沒有這樣容易。同時台中市幾乎沒有任何社運團體，除了寒暑假出工作隊之外，中部的學運團體在平時很難像北部學校一樣，和社運團體進行議題或組織上的合作，多半只能透過校園議題對校內同學進行組織。

而就東海大學來說，以空間區位上來說，是屬於和例如台大的「都會型大學」不同的「社區型大學」：

社區型大學是指大學與周邊自成一個系統，通常在都會生活圈外或是邊緣…如東海旁的東海別墅區與校園形成一個獨立的社區即是典型的例子。

（鄧丕雲，1993：227）

鄧丕雲認為和政治中心的都會區的疏離，使得「社區型大學」往往比較不偏好政治議題，但也使得學生的生活和消費不容易分散，而集中在校園周邊。而以東海來說，「全體住校制」雖已在1972年廢除，但是校方仍盡量維持大一學生全體住校的慣例。對於東海的學運團體而言，將心力集中在校園內的組織和宣傳，是比北部學校要容易的多。

空間區位上的差異，使得東海不容易為全國性議題向都會政治中心進行動員集結。缺乏社運團體的環境，使其心力集中在校內議題的開發。「社區型大學」和「大一全體住校制」更讓其在校內宣傳和組織上，較位居都會區的大學更加容易。因而東海的學運在運動實踐上，會傾向於校園議題和多花心力在校內宣傳組織上。

相對而言位於都會區的學校（台大是最明顯的例子），則容易傾向全國性議題以及向政治機關集中、爭取外界媒體注意。這並非表示北部的學運團體較忽視「校園經營」，如前所述沒有一個認真的學運團體會這樣做。但是在操作上由於環境條件的差異，北部傾向於透過校外的議題與媒體來進行校內的宣傳組織，因此會讓人感覺到其心力較集中在校園外部。類似「校園基地論」這樣的自我描述，其實突顯的是東海和北部學校，因為客觀條件不同，表現在校園經營的切入點、操作方式上的差異，而非那個地區比較重視校園經營的問題。

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使得東海大學在校園空間議題上累積了大量的歷史記憶、情感、論述。校園空間問題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共鳴，論述發展上可深可廣，自然會成為東海的學運團體專注的校園議題之一。而在 1984 年後東海開始進入「校園景觀巨變期」（鄭禎樺，2001：42），快速而巨大的校園景觀變化，不但對校內師生的視覺和心理上產生極大的衝擊，也讓前次事件累積的資源⁶⁶，可以在兩三年⁶⁷內立即轉移到下一次的事件中。這一方面擴大了東海校園空間論述的廣度和深度，同時也推動著校內學運團體持續關注校園空間議題，強化了「我們比較重視校園經營」的自我想像，進而創造了東海大學獨特的學生運動歷史：

一個以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討論、校園民主程序的建立為中心的運動模式。

（侯念祖，2003）

文化論述與運動實踐

如同前文所述，在 70、80、90 年代不同時期的東海人都使用類似的論述模式在討論校園的未來發展與公共議題。雖然 90 年代初期的「異議性社團」成員，多半出身自東風社或和東風設有密切的關連，但是由於筆者研究時間和能力的限制，目前並無法確切的說明不同時期的校園空間論述如何相互影響⁶⁸。但可以見到的是，由於相同的論述模式不斷地出現，因在東海校園內形成了一種「文化氛圍」，在外在環境的配合下，而有助於 80 年代末期校園空間運動實踐的形成。

在這個形成的過程中，異議性社團對於過去歷史的重述，實踐經驗的傳承自然是運動實踐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有助於將個人對於環境劇烈變化產生的「不適」或「苦惱」轉換成公共論述的實踐，並採取各種手段進行改變現狀的實踐。但是另一方面，異議性社團的重要性也不宜被過度放大，它們的實踐也是奠基在東海長久歷史和社會實踐形成的文化氛圍中，否則 80 年代末期至 90 年代，在台灣各大學校園內，類似東海的異議性社團的團體所在多有，但何以東海大學卻能獨特不斷以校園空間議題作為其運動實踐的核心？

事實上，在校園空間運動實踐中，例如：1993 年的農牧場事件、1994 年的「德耀路大石頭事件」，還有 2003 年的「東海保衛戰」，雖然後來異議性社團成員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最先發起行動者卻是校園內的一般同學。而從 2001 年後的「東海希望聯盟」、「東海保衛戰」的運動實踐來看，由於校園共同體想像中存在的「地域主義」限制，也使得許多異議性社團幹部在面對校園空間議題時，呈現矛盾而複雜的態度。

⁶⁶ 這裡所謂的資源包括：情感記憶、運動經驗、人脈、論述，甚至是物資等等。

⁶⁷ 根據筆者統計，從 1989 年起東海各次的校園景觀爭議之間的時間，最多不超過三年。

⁶⁸ 這需要對於當時校園空間運動的參與者進行深度的訪談，筆者在進行研究之初，本來有此計畫，可惜因為個人能力所限，沒有辦法進行這個重要的研究工作。希望後續的研究，能有人補足這個缺憾。感謝陳信行老師於口試時提出這個問題。

如果拿東海的異議性社團比喻成魚的話，那麼正是存在著共同體想像、校園景觀認同感與空間論述、學生批判行動傳統的文化氛圍所形成的水，使其可以在大度山上持續進行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在文化論述和運動實踐兩者之間，其實存在著相互支持但也可能相互衝突的緊張關係。

參與的困境

相較於台灣許多公私立大學，至少就校園空間議題來說，東海學生在行動上的積極性和延續性確實是相當特殊的⁶⁹。有人認為東海最初是接受國外資助的教會學校，受到國家機器的干擾和壓制較少，在行政和管理上都較一般大學更為自由。同時早期東海的聯考排名和國立院校不相上下，由某種菁英文化想像產生的對於獨立思考、自由開放的文化空間的重視，都影響到東海校風⁷⁰。

不過如同本文第一章所描述的，東海在創校過程中並沒有因為是由國外教會出資，而受到較少的政治干擾。而其做為菁英學校的地位，也早在 1965 年以後就因高等教育環境的變化而受到挑戰。而《東風》早在 70 年代就提出批判，認為所謂浪漫人文的環境與自由開放的校風，其實隱含著對現實的冷漠與疏離：

東海人對東海校內活動與事務，普遍缺乏興趣與關切，而且對問題的獨立思考與相互辯難研討的風氣極其沈寂寥落。由此例多少可反應出，昔日東海人因人寡地偏而形成的逸散與對周遭社會環境的冷漠並未因今日東海學生人數倍增而有改善（《東風》48 期：2）

同時對東海人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表示失望：

參與（Involvement）這個時髦的名詞，我想對東海人一定不會很陌生的。學校現在有兩千多學生，但是榮推會本學期兩次的生活座談會，參加的同學前後不到一百人，使我對東海人的參與不得不打個問號（《東風》43 期：16）

而在 1980 年 12 月 2 日，校內第一次針對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舉行的「台中工業區發展對東海環境之衝擊」座談會，現場參加的同學卻不到十位：

我們不禁懷疑，難道東海學生一點也不知道工業區之擴充發展，不僅將破壞東海環境之外觀，更會威脅到同學本身的健康！而同學的冷漠與置之不理卻是到了令人心寒的地步！（《東風》51 期：2）

⁶⁹中部地區除東海外，於行動和理念上較突出的學運團體，只有中興大學的「黑森林工作室」。1999 年位於霧峰的健康管理學院（現更名為：亞洲大學）的學生，成立了「田中央文藝工作室」，和東海、中興等校社團採取聯盟行動。在此感謝向來和東海人間/台研互動關係密切的中興黑森林工作室的黃貞瑋、彭梅涵、蔡明賢於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的支持與鼓勵。

⁷⁰東海校內傳說，曾任中央警官學校校長的梅可望之所以會來東海擔任校長，是國民黨派他來壓制東海校內的自由批判學風。例如：在鄭禎樞的論文中，一位受訪者即表示：「68 年梅可望校長來了以後，學校有了很大的轉變，那時我們稱他為『東海警官大學』」（鄭禎樞，2001：111）

如同第二章所說的，這種對於校內師生和公共事務疏離的批判，結合著 70 年代衍生的對「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分裂的焦慮。因此如何去除對公共事務的冷漠、促進同學積極參與，成為東風社乃至 90 年代的異議性社團一直要面對的問題。

有人以為這種冷漠源自於獨特的校園環境形成的校風：

在這個美麗的校園裡，東海人慢慢形成一種很特殊的生活方式，企求一種自我封閉的小天地。希望這個小天地永遠不要受到別人的干擾。這種生活方式造成東海人冷漠、不參與、自我封閉的性格，是一種相當自我封閉的個人主義。但東海人卻美化這種生活方式，說東海人是讀感覺的、唯美的、詩意的…，但什麼是詩？什麼是美？（《東風》44 期：9）

但也有人認為同學參與不足的原因，來自意見不受學校重視促成的惡性循環：

「參與得不到重視，得不到重視，不再參與，不再參與，更得不到重視。」我們不能讓它惡性循環，大家要試著扭轉它。榮推會、生活促進會沒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同學不熱心參與的緣故（《東風》43 期：17）

這兩種看法指向了不同的實踐方式。第一種將學生對校園公共事務的疏離歸因於校園文化的看法，將解決之道指向教育或說是主體轉化的問題。這種解決辦法呼應了大學做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性質。東風社因此在當時呼籲學校應重視課外活動的發展，因為課外活動不僅是學生於繁重的課業之外所做的一種「調劑身心」的活動，更是教育功能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們認為學生課外活動的功能既如上述，不但可以輔翼課堂上之講授，而達到培養學生完整人格、氣質及思考判斷能力之目的，更形成一種獨立的教育形式。則學生刊物的出版、各種學術演講之舉辦，皆應在課外活動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東風》44 期：13）

第二種看法，則將問題指向學校行政管理制度的壓制，特別是關於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的選舉方式，以及學生刊物出版前的審稿制度的問題，因此要求進行學校制度的改造：

我們認為，這一情勢的造成，同學的不努力固應負最大的責任，而輔導單位執行政策時手段的偏差也難辭其咎，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便是「審稿」所帶來的各種困擾（同上）

這兩種觀點未必是完全互斥的。但是關於「主體轉化」與「制度改造」兩者間的權衡與辯證，成了後來思考校園師生公共事務參與的主要問題意識，甚至延續到 90 年代校園內對於「校園民主」實踐的討論。

在 80 年代末期學生運動初起時，「制度改造」的看法由於頗合於當時挑戰威

權、開創自由空間的社會氣氛，因此成為異議性社團討論「校園民主」問題時的主張，我們可以在後來關於「學生會權力位階」問題的討論中，看到這樣的問題意識的浮現。但關於「主體轉化」的問題，其實也深刻地決定了「公共參與」、「校園民主」實踐的成敗，這在 90 年代末期東海學生會的運作中被充分的表露出來，由此又產生了對「制度改造」的再思考。在 80、90 年代的東潮、人間、大度山等社團爲了「校園民主」問題而和校方產生許多衝突時，沒有人注意到這其實是一個自 70 年代以來就在東海風中迴盪已久的探問--「未竟的探討」的延續。

關於創校之初東海所具有的各種優勢，已爲校史和各屆校友不斷傳述。但不論有怎樣優越的環境，大度山畢竟不是應許之地，如果東海真的存在所謂「異議傳統」、「自由學風」的話，那也是無數人在千辛萬苦中努力堅持的結果，而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這種持續的努力和堅持從創校之初就已存在，屢屢在艱難的環境中瀕於中斷，卻又未完全死絕。在 70 年代如是，在 90 年代亦如是。

歷史經常被想像成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然而仔細湊近歷史的現場觀察，倒不如用一長串的骨牌來形容更爲適當。在社會生活的背後並不存在著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而是每一個主體面對其當下(here and now)的情境做出相應的行動，不斷地連綴成一種類似歷史長河的意象。而之前形塑的歷史記憶、文化論述就成了主體在當下行動時，可以取用的旗幟、彈藥，在創造性的挪用、接合這些既有的資源的同時，行動者也再生產了自身的主體性。

筆者在第一篇中已考察了自 70 年來，東海由於特殊的歷史情境所形塑的文化「經驗」。在這段歷史的基礎上，90 年代的東海學生繼續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歷史。在下一篇筆者將繼續分析，自 1987--2005 這十九年間複雜而又持續的創造歷史的行動。

第二篇 吹浪之鯨

相期東海鯨吹浪，一為中原洗劫哀

——曾約農





第五章 Leviathan：東潮時期（1987—1989）

今夜我要走進這片海岸
去聆聽各種不同的聲音
今夜我要走進這片海洋
讓海風用力吹動我
如果愛這片海有罪
我情願變成那飛魚
泳向惡靈登陸的沙灘 擱淺

我的心像太平洋的寧靜
倘佯在美麗的海床上
我的心像太平洋的寧靜
盪沈在古老的傳說裡

—胡德夫〈飛魚篇〉



東海大學最早因為空間環境問題而發起的校園運動，應可追溯至 1984 年的「火葬場事件」。不過筆者認為 1987 年東潮出現後，發生的「電鍍廠事件」、「新宗教中心事件」，在組織和論述上都和 1990 年後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有密切的連結性。同時受當時政治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在行動和論述上都顯得較有規模和深度，而不像「火葬場事件」比較像是單純的自力救濟。如果將東海校園空間運動視作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一環來看待的話，則東潮的出現更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筆者將「火葬場事件」視為運動的前驅，而將 1987 年視作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真正開端。由於東潮是此時期頗為重要的學生行動團體，同時地下化、非組織化的行動，也是當時學生行動的特色，因此我將這個時期命名為「東潮時期」。這個階段起於 1987 年，終止於 1989 年東潮成員的分化，並成立地上化的正式社團為止。

第一節 80年代的東海校園與台灣社會

梅可望時代

雖然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對東海校園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但在 1972 年東海美籍資深董事白樂德（Mr.Belt），邀請他擔任東海大學的董事時，他先是當場愣住，最後才回答：「…東海會歡迎警官學校的校長去當董事嗎？」（梅可望，1985：2）

在白樂德等人的極力遊說之下，梅可望才答應擔任東海的董事。在 1974、1975 年他駐外工作時，還以身在海外，無法過問東海事務為由，數度向東海董事會請辭都未獲准。1978 年 5 月，由於謝明山堅辭東海校長職務。董事會在繼任校長人選難產後，決定邀請梅可望擔任東海校長。於是曾任中央警官學校校長的梅可望，就成了東海的第四任校長。

此時東海正面臨內外劇烈的挑戰：聯董會在 1977 年正式停止對東海的直接補助，教職員的待遇比國立大學低百分之二十，缺乏信心的教職員紛紛離校他就，校園硬體設備破舊，制度欠缺。

最令人震驚的是：七位最重要的一級主管（三長與四學院院長），只有一位在正式上班。其餘六人不是在國外，便是病假，或是請人代理。校長室沒有自動電話，整個學校已瀕崩潰的邊緣！（同上）

在甫上任的校長眼中，當時東海校務的鬆弛、散漫，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

透過積極的向政府及社會各界爭取資源，梅可望校長先緩和了東海的財務危機，並力求讓學校的財務能夠獨立自主。同時調整教職員待遇，積極進行校內各項規章、制度的修訂。在梅可望校長主政期間，東海的設備和教室大幅擴充，共進行包括「中正紀念堂」與「圖書館」等 30 多項校內重大建設，可說是東海校園景觀變化最劇烈的時期。同時學生人數也不斷增加，由 1977 年入學的 4,762 人，到 1984 年時，已達到 9,000 多人。由於「全體住校制」的廢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東海學生必須在校外租賃房屋。這使得原本規劃為「高品質的休閒住宅」的校外「東海別墅」區，逐漸轉變成學生的生活消費空間。

1985 年，東海看似已擺脫爭議轉型時期的陰霾，正逐漸走向「擴大發展，邁向社會」的光明大道上。在創校 30 週年的特刊上，梅可望校長表示：

讓我們進一步的思索，再過三十年的東海，應該是怎麼樣的一所大學？

（前揭書：3）

同時在行政會議上表示：

學校的財務制度現已非常健全，今後將不貸款，不募捐，自給自足。

（東行，民 74.5.25）

台灣社會的變化

在東海逐漸邁開新的步伐同時，台灣社會也慢慢的在轉變中。「亞洲四小龍」、「東亞奇蹟」成爲舉世矚目的重要現象，而過去經濟發展過程隱藏著的矛盾，也慢慢的浮現開來。在政治上雖然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重挫了台灣民主運動的進程，卻也造成反對勢力的劇烈反彈。新一代的反對運動領導者，質疑過去以康寧祥爲主的溫和/理性路線，走向更激進的群眾路線。強烈的「本土意識」抬頭，台灣的民族主義於焉誕生，讓 1970 年代初步浮現的台灣市民社會的性質起了微妙的變化。而在文化上，龍應台的《野火集》在出版後一個月內連續加印 14 版，顯現著一股對社會現狀強烈的不平和批判的聲音正逐漸在形成（李丁讚，2004：38）。

1982 年新竹水源里居民不滿附近「李長榮化工廠」一再排放廢氣，危害民眾，且毫無誠意解決，於是衝進工廠辦公室，打壞廠房玻璃，毀壞影印機，使得市府出動警方維持秩序。1986 年水源里居民開始有組織的「自力救濟」行動，先後發動多次圍堵活動，且一次比一次長。同年並發生「鹿港反杜邦」運動，「自力救濟」成爲台灣重要的社會現象。

李丁讚指出在 1980 年代初期到中葉，由於社會公共論述的變化，台灣民眾對於環境問題的感受，由原本「受苦的身體」變化成「不可侵犯的身體」，不再等待國家、公權力的間接解決方式，而多採取直接的攻擊和暴力行動，來解決、表達他們的不滿。這種不滿並在 80 年代末期形成了一股挑戰國家力量的「社會力」（李丁讚，2000：171、186）。

火葬場事件

1983 年台中市政府決定將市立火葬場遷建至東海正門口旁的示範公墓。東海大學在知道消息後，立即安排由訓導長率師生九人組成的代表團，拜會台中市長林柏榕，說明火葬場一但啓用，將會嚴重污染空氣，危害師生及社區居民健康。但林柏榕市長以火葬場儀器設備先進，不會造成污染爲由，拒絕改變計畫。而後在東海校刊上，刊載了兩位環科系及化工系教授對人體燃燒產生的毒素，以及火葬場設備的缺失的分析，要求台中市政府無限期延後計畫，但是不爲市政府所接受。

由於 80 年代的媒體大量出現對於各種公權力行使不當的質疑，以及對切身

相關的消費問題的大量報導，讓社會大眾對環境問題的感受進一步轉變，由感覺受害轉變為有權利反擊污染，東海大學也處身在同樣的社會氛圍中。同時東海本身設有環科系、化工系，因此有充足的發言能力和發言位置可以挑戰官方的政策說詞。除此之外大學做為文化文明象徵的想像，更強化校內師生抗議的正當性⁷¹。反對火葬場遷建大度山的聲音，也就在校園內強烈的散佈開來。

1984年1月10日，東海師生及附近社區居民，擬定請制止台中市將火葬場設於大度山上的陳情書，以及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人的陳情簽名簿，上呈行政院長等相關部院首長。但是市府仍不願採納東海的建議，同時計畫在5月份發包動工，讓校內反彈的聲浪逐漸升高。東海的學生活動中心在包括校門口等多處地點，張貼「反對在校園附近興建火葬場」的海報、散發傳單、發動全校師生簽名運動。梅可望校長亦指示成立「火葬場遷離本校促進委員會」，由曾博文訓導長擔任召集人，負責向各級單位陳情、爭取火葬場遷離本校事宜。一直延宕至1985年，由當地居民聯名向內政部申請訴願，於當年4月19日將訴願決定書函達再訴願人等，表示「原決定撤銷，由原決定機關（台灣省政府）從實體另為決定」，此事件才告一段落⁷²。

除此之外，當年的行政會議上也討論了台中市府重提為開闢「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要求徵收東海校地一事。經討論後決議為維護校地完整，一致反對興建，並努力爭取變更或保留此案（東行，民73.7.9）。

同年東海大學以互贈名義，撥交郵政總局興建第五支局使用的校地二千坪，以及另外提供的校地三百坪，「均已完成法律手續，地點亦已擇訂。」（東行，民73.6.19）

這件事將在日後改寫了東海的歷史！！

⁷¹ 例如當訓導長拜會林柏榕市長即表示：「大學是人類文明的場所，更是文明開化的象徵，東海大學更代表著文化城的內涵..」

⁷² 關於「火葬場事件」的詳細經過，可以參考《東海風》第100頁

第二節 東潮與 80 年代東海學生運動的發軔

衝創校園自由空間⁷³

在經過長久的沈寂後，台灣的學生運動在 80 年代再度崛起，首先由 1986 年台大「自由之愛」事件為開端，緊接著從南到北的各個大學紛紛出現地上、地下等各種形式的學生行動團體。

關於這波學生運動的崛起，鄧丕雲認為雖然國民黨在 1986 後推動的一系列「政治自由化」的政策，為學生的行動提供了可靠的掩護作用，降低了其行動的危險性，給予學生行動和心理上的鼓舞。但是「政治自由化」政策並沒有普及到校園，當國民黨研擬五大政治議題，準備開放人民的言論、集會及結社自由時，校園還處在「特別權力關係」⁷⁴的籠罩下，沒有做相應的開放。所以校園的自由化是學運興起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學運反映了學生在政治開放後，試圖用自己的力量，讓校園的民主化能追趕上社會腳步的努力（鄧丕雲，1993：59）。

由於校園並未隨著社會的腳步開放，初期的學運參與者，在行動上必須承擔許多未知的風險，因而多採取體制外以及匿名的方式行動。而其主要的抗爭對象則是校園內的控制體系，包括校方行政機構與校園黨團。議題上大部分是關於特別權力關係的規範、軍訓教官及政黨勢力退出校園、學生政府成立、言論及學術自由的保障等和校園體制改變相關的議題。學生們透過這些訴求，批判校園的控制體系，以求實現理想中的大學校園（前揭書：61）。

鄧丕雲的描繪大致掌握了 1986--1988 年之間台灣學運的樣貌，但是這些共同的議題在實踐上仍會因著各校具體的狀況而有所差異。以東海來說早期學運的參與者，除了直接訴求言論自由、學生政府成立之外，校園空間環境問題的探討，也是接合宣傳這些訴求極好的議題。尤其在 1987 年東海別墅社區問題的萌發、1988 年的「電鍍廠事件」，都帶給學運團體利用這些議題在校內進行宣

⁷³ 「衝創意志---Will 這個字有多重含義。我們選取了尼采「衝創意志」（引用陳鼓應譯名）的引申詮釋。一方面是為了這譯詞所表達出來的精神，恰是東方文化涵泳中的民族最缺乏的部份。不怕改造一切的衝勁和決心，敢與大自然（天地萬物）奮起一戰的勇氣，融合著初生之犢不畏艱險的本性。包括了堅持、毅力、韌性、決斷力、意志力、不達目標不休的大無畏精神。」（王榮文，1989：6）

⁷⁴ 在戒嚴時期有關各級學校學生之懲戒，均是以行政法上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為其依據，認為學生與學校之關係，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中之營造物利用關係，學校可以在無法律依據下，限制學生之基本權利，對於違反義務之學生，亦可施以懲戒，並且學生對於有關特別權力關係之爭議，亦不得請求司法救濟。這種反民主的學生管理觀念，經過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強烈的批判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民國 84 年 6 月 23 日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文中，承認凡受校內處分，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有提出訴願及行政救濟之權利。之後在大學法修訂過程中，「特別權力關係」的條款，被強調學生參與、學生自治以及學生權利救濟制度的必要性及價值的觀念所取代。

傳、建立行動正當性的機會，以對抗校方的抹黑與反撲。而「約農河加蓋事件」、「新宗教中心事件」中，透過公聽會、說明會等機制，讓學生能針對校園公共事務，在公開場合質疑師長及行政人員。在這些零碎、片段、不成熟的實踐過程中，東海的學運份子慢慢提昇自己的能力，建立起自己的傳統，累積出後來在 1990 年「相思林事件」中展現的實力。

吹浪之鯨湧現東海

雖然《東風》做為東海人文批判的傳統，一直存在校園中，但是東海大學並不見得比其他學校更開放、更民主，例如學生刊物出刊前的審稿制度，對涉及政治和社會批判的言論的壓制，還有對於社團活動的各種限制⁷⁵，都和戒嚴時期的台灣各大專院校如出一轍。

1987 年部分法律系、政治系以及東風社的成員，推出李若蘭和方孝鼎競選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以經費公開、重新定位學生活動中心為選舉訴求，並在當年的選舉中獲勝。

這個被視為由「改革派」主導的學生活動中心，於當選後立即創辦了《東海新聞》，做為代表全體學生的刊物，評論報導範圍包括校內一切制度措施及校外政治活動。另外邀請李鴻禧、林玉體等當時的「敏感人士」到校演講，於下學期時又邀請張忠棟、姚嘉文等人到校演講，其嘗試突破校園言論自由空間的意圖十分明顯。

1988 年 4 月由於《東海新聞》報導女生宿舍生活管理輔導問題，使得訓導處召集女舍棟長、蘭心會及生促會、生輔組幹部舉行座談會。梅可望校長甚至在行政會議中提示，要求各單位詳閱新出版之《東海新聞》，如有係相關單位之改進事項，需改進或處理、說明（東行，民 77.4.18）。

雖然學生活動中心有體制內的資源和代表全體同學的優勢，但是在下學期 5 月預定邀請呂昱（《南方》雜誌編輯）、邱義仁、朱高正、張曉春（台大社會系教授、工黨發起人）舉辦「蛻變中的台灣」系列演講時，除張曉春演講外，其他的活動申請都被校方駁回。而除朱高正以「已進入司法程序」為由外，學校也未說明演講被禁止的原因。

不過「改革派」學生除了推選活動中心總幹事外，還另外以「東海吹浪之鯨」為名，發行地下刊物《東潮》。1987 年 6 月 17 日及 24 日，《東潮》發行試刊號第一期及第二期，抨擊當時校內興建「新宗教中心」地點的不當，批評校方在

⁷⁵「茲重申下列四點，希切實遵照：1. 不准發行刊物 2. 不准成立跨校之組織 3. 不准成立地區性之組織 4. 不得參與校外地域性之政治組織或在校內從事政治性的活動。如有違反，訓導處應加議處。」（東行，民 74.11.15。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整個處理過程中的反民主作風。並舉台大為例，質疑現有學生活動中心的定位問題，要求成立學生自治組織。

1987 年 9 月 29 日《東潮》正式創刊，到 1988 年 5 月 25 日共出版了四期。其間在 1987 年暑假、開學時，還針對大一新生發行了一份名為「給你、大一---兼給中區所有的大學新生」的傳單。

雖然東潮的成員有部分和東風社、學生活動中心重疊，但是東潮的成員到底有多少，恐怕是東海歷史上的永恆之謎。這是因為為避免校方打壓以及可能的政治迫害，東潮除採取匿名的秘密行動外，還使用單線聯絡的方式組織。除了幾位較著名成員外，其他成員都不曾曝光，同時彼此間也未必認識，因此連東潮的成員都不知道這個團體有多少人。1990 年代的東海學運團體，（包括筆者寫作論文過程中）在校外經常會接觸到一些自稱曾是「東潮」成員的人，對於這些成員身份的真实性，既無法否認也無法證實。

校方的反撲

東潮的行動引發校方行政單位，尤其梅可望校長，非常強烈的反應。1987 年 9 月 9 日、10 日東海教職員和學生代表共百餘人，在谷關舉行的發展會議上，通過為求校園和諧安定，不受外力干擾而制訂的「東海大學維護校園團結和諧方案」。方案中首先揭示一心一意愛東海、共同實踐校訓和達成本校教育目標、以民主方式解決問題、師生團結一致，維護團結和諧，不受外界影響和利用等東海師生的「共同守則」。

其次強調落實師生溝通管道、強化師生情誼與互信、輔導學生自治組織、防範外來勢力操縱學生活動等重點事項。

最後具體說明三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透過「文字評議委員會」解決文字著作的問題，透過「申訴委員會」解決獎懲的問題，透過「說明會」解決有關意見的問題（東海風：105）。

由於校內對東潮議論紛紛，甚至有謠言稱東潮是民進黨的外圍組織。另一方面由於梅可望校長對大學法所提的建議案，和其在師生座談會上的內容不符，東潮成員在看到報紙後感覺受騙，因此決定以公開的方式說明，同時澄清校內同學的疑慮。

1987 年 11 月 4 日中午，東潮在校園的「信箱間廣場」舉行說明會，由沈發惠、施威全出面說明東潮成立的宗旨，澄清外界的疑慮，回應校長及訓導單位的指控。在當時這是極大的挑戰，因為曝光的成員很可能會受到學校懲戒甚至因此退學。沈發惠在發言時還因壓力太大，情緒激動而當場落淚。現場有數百名東海學生，至於有多少人是東潮成員就不得而知了。由於東潮事前曾貼出海

報宣傳，東海校方在當天還如臨大敵般的封閉校園對外出入口，以防止有外來力量進入侵擾校園。可能由於此事受到媒體關注或其他原因，曝光的成員事後並未遭到任何校方的懲戒，當然強大的家庭壓力，是絕對免不了的。

但是梅可望校長對於東潮的攻擊，並未因為東潮舉辦說明會而停止。1988年2月24日，梅可望校長以國民黨中知青黨部主委身份，出席在校內中正紀念堂舉行的「黨員大會」時，對東潮進行點名批判，指稱其與民進黨掛勾，並在次日的開學典禮致詞中又對全校學生重覆了相同的內容。在3月7日舉行的行政會議上，與會人士並「一致舉手」通過：

全校師生建立四點共識，以維護校園和諧安定

1. 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2. 東海是「東海人」的東海不容外力干預破壞
3. 全力保障學生、師長和學校的權益
4. 「東海人」光明正大，不做任何任何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動

（東行，民 77.3.7）

之後梅可望校長又於校刊上撰文〈東海人，光明正大的站出來〉表示堅決反對類似東潮等以地下刊物名義進行的活動，並重申「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反對學校社團從事「地下化」活動，甚至接受外力經濟及各種形式支持，將學校做為政治「鬥爭」或「競技」的場合（東海風：111）。

對於梅可望校長的指控，《東潮》立即做出回應：梅校長在高喊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的同時，卻身兼國民黨中知青黨部主委，還在校內舉辦全校黨員大會，究竟是誰政治和教育不分？誰和外來力量掛勾？《東潮》採地下化形式出版，是為抗議現存審稿制度的不合理、校內對異議言論的壓制，如果校園制度合理了，東潮當然可以地上化。反而是東潮經常遭受校方「扣帽子」，進行沒有證據的的指控。甚至東潮曾有 200 餘份放在信箱間的刊物，全數被人抱走，幾小時候又出現於信箱間，同時背面被加印上反制的文字，如此看來究竟是誰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呢？（《東潮》第 4 期：2）

《東風》的反省

梅可望校長及訓導單位視東潮受外來的操縱，嚴重破壞校園安寧秩序的激烈言詞，表現了既有校園控制體系的反撲。而其和東潮之間的爭辯，除了相互謾罵之外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剎時籠罩在整個大度山頭。

從 70 年代以來一直關心東海校園發展的東風社，當然不可能在這個時刻缺席。在 1988 年 12 月於社團內部成立了「校園事務觀察小組」，每週固定聚會討

論，討論議題從「校園民主」、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到操行評鑑、校規修訂等（《東風》59期：97-98）。站在過去一向堅持的反省批判的立場，東風社認為：

防止較大行政單位之不正當的權力運用，重要的還是在於把議題從空疏的常識帶到嚴謹的知識層次上，來做較為精緻的處理；這樣所提出的東西，才能實質地促進更多人的認識和瞭解及其行使自由選擇的意願和力量。至於採不採取行動，則依個人意願而定（同上：5）。

相對於梅可望校長和東潮之間的隔空交火，1989年6月出版的《東風》59期刊載了三篇文章，針對東潮在校園內引發的各種現象，進行反思與討論，這三篇文章分別是：

〈建立一個健康開朗的政治文化——兼論東海的自由傳統與學風〉記錄校內徐振國老師的演講，從創校初期的張佛泉、徐道鄰、徐復觀三位老師的風範，對照現今校園內外的政治氣氛，最後以期望校內能建立容忍異議，支持言論自由的文化做結。

〈權利與義務之間的走索人——與林載爵老師談東海早期學生自治的榮譽推行委員會〉，則回溯榮推會的歷史，反省校內推動學生自治過程中，過度強調制度架構的建立，可能忽略了同學的參與和自覺的問題。

〈畢聯會事件——一個爭取權益成功的例子〉，則紀錄和分析1987年11月到12月間，部分社研所和社會系學生對東海畢聯會（畢業生聯誼會）強制學生繳納會費，購買畢業紀念品的慣例，提出質疑和推動改革的過程。該文作者認為《東潮》的議題有泛政治化的傾向，和同學生活相差甚遠，未必能獲得同學普遍支持。而類似畢聯會會費等問題，因為和學生生活權益相關，容易為同學理解關注，因此可在兩個月內迅速獲得解決。雖然對《東潮》的內容取向提出批評，該文也強調容忍異議和學生集體行動的必要，並對畢聯會事件處理過程中，校方行政單位採取中立，不干涉學生事務的立場表示讚揚。

相較於校方一面倒的負面抹黑與批評，《東風》從歷史和具體的事件反省中，去探討《東潮》出現的意義以及侷限性。《東風》59期的這幾篇文章暗示著東潮的行動，雖然頗具爭議性，但沒有背離東海的歷史傳統，而且符合創校以來一貫傳承的「自由和不斷尋求的精神」。但如果完全無視於過去的歷史經驗，忽略校內同學的自覺和參與，一廂情願的推動任何制度的改革，可能會面臨和榮推會相同的困局。同時任何校園改革的推動，都應緊扣住同學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免因為曲高和寡，得不到同學的支持而失敗。

《東風》這幾篇文章對話的對象，不只是東潮，也包括當時正努力推動「學生自治」的東海校方和學生活動中心。不過從東海學生會成立的過程來看，校方並沒有真正理解到這幾篇文章的意涵。

學生力量的公開化和多元化

如前所述，東海學生運動在初期採取地上及地下的雙重行動方式。表面上看起來這種雙重行動可以相互支援，透過地下刊物為學運創造聲勢，而以學生活動中心名義的地上行動，可以因為這樣的聲勢而取得與校方溝通時更多的籌碼。但是由於東潮不是個內部緊密結合的組織，這種雙線行動反而刺激團體內部的分化。在 1987 年 11 月的東潮說明會使得東潮的行動公開化，但公開化同時意味著行動的激進化，使得體制內外行動的差異更大，兩方更難以合作（鄧丕雲，1993：116）。

東潮成員中的學生活動中心的幹部，由於得不到體制外的奧援，必須選擇有條件的和學校結盟，但此舉又加劇了體制外抗爭者對他們的不信任，這在東海學生會的成立過程中表現最明顯。體制內的抗爭者既無奧援可以推動學生政府的成立，又不願為校方背書，於是憤而退出東海學生會的制憲過程。其後在 1988 年 9 月以「青年中國學社」名義成立社團，不過東海學生一般多以「大度山社」稱呼之。

另外一批偏向體制外抗爭的學生，則在校方百般刁難之後，於 1989 年 9 月 21 日成立「人間工作坊」，並於 1990 年 1 月 12 日發行社團刊物《人間札記》試刊號，在 4 月 12 日發行創刊號。

除此之外，東海學生馬士元、蔡孟君等人也創立「環境生態社」（簡稱環生社），發行刊物《綠色大地》，以在校園內推動環境生態運動。另外東風社內部除了「校園事務觀察小組」之外，也於 1990 年 3 月間，由李珏英老師擔任指導老師組成「女性主義讀書會討論小組」，並在後來獨立成「東海女研社」⁷⁶。

這些社團的出現，顯現了學生運動力量的壯大，以及校內環境的開放，也意味著學生運動不必也不能再以地下行動的方式運作，而必須公開的表明自己的立場，對同學進行有系統的組織和宣傳工作，而後才能擁有在「三月學運」和「相思林事件」之中所展現的力量。

說明會——嶄新的校園文化實踐

在東潮出現引發的校園對峙氣氛中，一種嶄新的文化實踐卻不知不覺的建立起來——說明會。

如前所述，說明會制度源起於梅可望校長於「東海大學維護校園團結和諧方案」中，設計的解決校園意見問題的機制。第一次的說明會舉辦，據說是在 1987

⁷⁶ 參見第六章第七節

年的「約農河加蓋事件」，但東海行政會議記錄上可考的第一次針對校園空間問題正式舉辦的說明會，應是在 1987 年 5 月舉行的「興建宗教中心」座談會。

而後在「相思林事件」以降的校園空間運動後，東海校方則將公聽會、說明會的機制納入校園規劃制度中。甚至在「德耀路大石頭事件」發生後，行政會議決議：師生對校園重大工程有異議時，可經由參加行政會議之代表提出要求召開公聽、說明會（東行，民 83.11.23）。也就是說，校園內只要發生任何重大爭議事件，師生都可透過行政會議要求校方召開說明會。

由於「說明」兩字帶有由上而下、公事公辦的意味，因此參與校園空間運動的學生，多半要求學校舉辦具有聽取意見性質的「公聽會」，但其實在具體的實踐中，公聽會和說明會的界線是很難區分的。如果沒有學生社團的強力動員，學生的積極參與，再開放的公聽會，也會變成學校單方面的說明會。而一但有學生積極的提出異議，甚至不惜和學校力爭到底，再保守的說明會，也被迫要變成公聽會。

除卻學生活動中心、學生會舉辦的說明會外，如前所述，東海學生運動第一次舉辦的自發性說明會，應是在 1987 年 11 月 4 日的「東潮說明會」。自此以後說明會也成為校內學生運動對同學說明立場、進行宣傳、相互溝通的重要實踐，甚至透過直接討論的方式，和現場同學決定未來的行動步驟。1990 年「相思林事件」的 620 遊行前，於 6 月 19 日舉行的說明會即充分顯現了學生運動自發舉辦的說明會的多方作用。一直到 2003 年的「東海保衛戰」，在工業區聯外道路計畫消息見報後，學生第一個進行的活動就是發起連署簽名，以及，連續在校內舉辦三場說明會。

學校和學生舉辦的說明會雖然目的、形式略有差異，但在向校內師生進行廣泛的宣傳、溝通的面向上卻是相同的。從「新宗教中心事件」以來，說明會/公聽會就一直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實踐的重要戰場，也是東海校園民主的溫度計。

東海學生政府的誕生

東海創校初期即有成立「學生生活促進會」（簡稱生促會）由學生選舉代表組成，負責學生的膳食、住宿等生活管理事宜。由於學生社團數目增加，之後又成立「學生活動中心」，負責統籌全校性的學生活動，並協調各社團活動的場地經費等事宜。榮推會雖是東海第一個學生自治組織，但在學生活動中心成立後，功能日漸減縮，詳細經過已見於第四章。

學生活動中心和生促會對外代表東海全體學生，由梅可望擔任校長後，只准予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生促會會長、研究生聯誼會主席列席行政會議，就可

見得這兩個學生組織的地位⁷⁷。但是在持續運作十餘年後，由於學生事務日趨複雜，活動中心和生促會之間，對於學生事務的自我管理的分際，以及面對學校時的代表性的問題遂引起學生的討論。加以當時台灣各大專院校幾乎都有「校園民主、學生自治」的呼聲，關於改革學生組織，成立學生政府的議題，遂在東海校園內持續發酵。例如當時東潮提出的多項訴求中，其中之一即是「成立學生自治組織」。

1988年8月17、18日，新任訓導長陳陽德邀集師生代表十多名，在谷關召開研討會，即有學生反應，學生生活促進會與學生活動中心事權不統一，建議以學生（自治）會替代既有組織。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王國翹於谷關研討會後，即擬定「制訂學生自治制度代表選舉辦法」，用比較通俗的話來說，即是學生會制憲代表的選舉辦法。

10月24日《東海新聞》披露學校研擬中的階段性推動學生自治流程表，共分「籌備階段」、「研議階段」、「完成階段」等三階段。學校並成立輔導小組，由校內老師郭榮趙、游文卿、溫豐文、丁一豪、李聲庭、施宗雄、洪永泰、呂士朋、歐保羅、魏吉助、胡昌智、許玉秀、謝廷庚、陳楊德及劉渝生等人組成，並由陳陽德訓導長兒擔任召集人，以協助、輔導學生會籌組事宜（《東新》7期）。

1989年1月召開「新學生自治制度代表大會」，也就是學生會的制憲會議，並選出工作幹部，開始正式規劃東海學生自治制度。

1989年5月18日舉行了第一屆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投票，共計有三千六百四十八票，投票率為48.7%。選出公行所二年級郭達鴻，與國貿系二年級蔡百誠擔任學生會正副會長，並在6月6日完成交接儀式。學生議會則在6月12日，舉行成立大會、宣誓就職、選舉正副議長，東海的學生自治制度開始正式運作。

東海校方把成立學生會視為學校民主、開明管理作風的表現，因此大力協助並宣傳東海學生會的成立。從宣布制憲到研擬、完成、選出第一屆學生會，不過九個月的時間，即使東海學生會的成立並非像學校宣傳的「全國第一所學生政府」⁷⁸，其速度也是快得驚人。同時學生會還擁有設備完善的辦公室，專用的學生議會議場等，可說是全國各校學生政府中最豐沛的資源。

不過如同《東風》59期文章中提出的質疑，在熱熱鬧鬧的學生會籌組過程背後，到底學生對學生會的關心和參與有多少，是個很大的問題。為了擴大校內同學對成立學生會的關注和參與，「學生自治籌備委員會」曾挖空心思，於一

⁷⁷ 東海學生會成立後，生促會被併入學生會中成為生促部。但生促部長仍可以和學生會長、議會議長、研聯會會長共同出席行政會議。很多人以為這是因為生促部負責學生的日常生活管理等具重要性的事務之故，但這個理由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就像東海校內的許多事物一樣，這裡面其實是一個歷史傳統的延續。

⁷⁸ 北醫、陽明、輔大都比東海要早成立學生政府（鄧丕雲，1993：250）。

夜之間張貼了三、四十張大型海報，使得隔天一早校內處處可見大型顯目海報「你的聲音、權力被閹割了嗎？」，「還我自治權，還我學生權」。還因為被誤以為是民進黨張貼的海報，而被人撕下數張。

但在《東海新聞》上早就有人對制憲過程提出批評：

籌備委員會經常僅有九、十人出席，包括現任正副總幹事四人，前任兩人，現任生促會正副會長等，活動推展全由這些委員承擔。

觀承擔此推動大任的「自治籌備委員會」，每星期二固定開的會議，代表涵蓋各種意見的學生，然出席僅四分之一不到..一個有關東海師生萬人利益的自治推動，豈可斷送在七、八所謂「意見領袖」手中

（《東新》第 8 期）

其實像東潮、大度山社等社團，在訴求「學生政府」、「學生自治」的同時，也非常清楚校內同學對公共事務參與的冷漠。他們當初的策略其實是希望透過「學生自治」這樣一個具高度正當性，且又易為同學瞭解的議題，在不斷的衝突、對話的過程中，逐漸提升同學參與的意願和能力，從而建立起能獨立自主、參與校務決策的「學生政府」。但是校方的態度完全打亂了這些學生運動團體的設想。大度山社成員即因校方強力主導制憲過程，退出「學生自治制度代表」（制憲代表）的選舉。

事實上東海校方表現民主、開明管理作風的背後，有著害怕學生運動失控的考量。1989 年 5 月 29 日行政會議上陳訓導長報告：

鑑於最近媒體報導成大、台大學生自治會都發生嚴重的衝突事件，特別說明學校主動推動學生自治組織的結構調整，是為了因應時代的轉變與需求，不然，我們的學生團體有可能會受到其他學校的不良感染。

（東行，民 78.5.29，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學生會成立後，方孝鼎為文指出東海學生會完全是透過校方「由上而下」的過程建立的。成立過程中校園社群的社會關係、政治文化都沒有經歷任何衝擊與辯論，甚至連最起碼的全面性討論都做不到。建立在舊的社會關係與意識型態基礎上的學生會，只是充斥了新職位、新機構，但卻少有進步的內涵。學生會一方面從屬於校方的董事會、校務會議、行政會議之下，學生事務的運作仍然受制於校方行政機構。另一方面學生會又疏離於學生群眾，使得學生會幹部和議員成為凌駕於學生之上的權力菁英：

學生社群選出了東府〔註：東海學生政府〕，而東府的運作卻獨立於學生社

群之外，甚至反過來宰制學生社群。⁷⁹

東海學生會成立後，學生議會就發生嚴重的流會問題，半年後校園內又出現大量海報，抗議學生會的官僚作風。曾為校方在媒體上大力宣傳，做為學校開明管理作風的表現的東海學生會，成立不到一年，就已顯現其體質的貧弱。

第三節 校園空間運動的萌芽

約農河加蓋事件

東海大學的校地有部分為日據時期開闢的「神原農場」，日本人為提供種植甘蔗所需的灌溉用水，乃開發水圳引大甲溪葫蘆墩圳水源經神岡大社、大雅橫山等地，至西屯林厝永安（今台中榮總）、水堀頭（今東海大學）、龜山（今台中工業區）等地。本地人稱這條水圳為「新圳」，正式名稱則為葫蘆墩圳大社支線。1980年後因台中工業區開發，水圳廢棄，僅留下在東海大學校內的這一段（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2：33）。「大社支線」因為在校門入口的約農路旁，因此被取名為「約農河」，東海學生戲稱為「約農大水溝」。

1987年間東海大學和台中農田水利會協調同意，要將這條上游時有廢棄物流入的「水溝」加蓋（東行，民76.2.23）。有學生張貼海報表示抗議，要求用「民意調查」方式收集同學意見，並要求學校舉辦說明會。另有學生擔心加蓋工程會破壞約農河和約農路兩側的大樹。其後梅可望校長對學生表示，加蓋工程東海亦需負擔經費，但學校經費並不充裕，因此加蓋工程尚言之過早，而且即使加蓋也不會砍伐約農路旁的大樹。

翻查東海校內各項相關文獻，對「約農河加蓋事件」的過程記錄都非常稀少，但都強調「約農河加蓋事件」是「東潮時期」校內最早關於校園空間環境問題的爭議。在1991年的「綜合大樓公聽會」中，也有人援引「約農河加蓋事件」為校園規劃問題討論的開端。因此這個事件看來對當時的學生行動有很大的影響，但由於缺乏文獻資料，關於這個事件的紀錄，只能留待有心的後人去發掘了。

新宗教中心事件

東海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在創校之初即設有校牧室，並成立「宗教中心」以供教會活動、聚會使用。由於校園師生人數遽增，原有宗教中心空間逐漸不

⁷⁹ 〈論東海大學學生政府之侷限性〉，方孝鼎著，參見《新生代的自我追尋》第212—214頁，范雲等編，1993年，前衛出版社出版。

敷使用。1986 初，年東海校牧室擬議「宗教中心擴建計畫」，計畫在女舍門口附近草坪興建「新宗教中心」，由於該地為居住女舍學生出入的通道，因此引起校內議論。

1987 年 5 月 29 日，學生活動中心舉辦「興建宗教中心」座談會。由設計人東海建築系詹耀文教授，現場說明「新宗教中心」的建築形式和功能，以化解學生強烈的反對意見，師生出席踴躍但並未獲具體結論。學生活動中心總幹李美華於同年 6 月 2 日行政會議上表示，出席的同學已不再持強烈反對意見。但是校內的學生刊物，如《東潮》等仍對興建新宗教中心一事提出抨擊。剛成立的環生社也從環保觀點出質疑。

緊接著又在 6 月 17 日舉辦第二場座談會，同年 11 月活動中心暨生促會又出面舉行第二次說明會，但因出席學生人數不到十人，會議草草結束。

1988 年 4 月 18 日，再次舉辦興建宗教中心說明會，並邀請簡春安教授、詹耀文系主任等解說增建原因，但是學生出席參與情況仍然不見改善。雖然兩位教授的說明勉強獲得在場同學支持，但是反對意見仍然很多，例如有學生質疑，宗教中心是專門蓋給基督徒用的，一般同學用不到，是否有必要犧牲校園綠地，興建只為少數人使用的建物。

1989 年 2 月，新宗教中心在寒假動工，由於是利用假期時間動工，很多學生在開學回來後，發現校園景觀發生重大變化，引發強烈的不滿情緒。然因木已成舟，無可挽回，只能徒呼奈何。因應校內同學對新宗教中心於寒假動工的不滿情緒，《東海新聞》於同年 3 月製作「新宗教中心面面觀」專題，訪問不同立場的校內師生，對新宗教中心施工一事進行探討。

在該篇訪問中，東海校牧盧牧師表示，之所以新宗教中心會蓋在女舍附近綠地，是因為之前選定的銘賢堂東側（現有宗教中心及新建學生活動中心之間），因為產權問題無法取得建築執照。後來再選在教堂西側、舊圖書館附近，但因該地屬教學區且離原宗教中心太遠而放棄。現有宗教中心改建或擴建雖然影響最小，但是因為該地產權不全屬於學校而無法獲得建築執照。女舍門口附近草坪這塊地，是舊宗教中心周圍唯一可以蓋的一塊地。而在設計、施工過程中已考慮到同學的質疑，為避免影響女舍生活，把較有可能產生噪音的動態活動置於地下層，靜態活動置於地上層。同時在設計時把底層往地下發展，使地上物不至破壞景觀，並和教堂、鐘樓成三位一體的之效果，顏色也和教堂相輔相成。而在蓋屋時所必須波及的樹木，也準備以移植方式處理。

不過校內同學對於「新宗教中心」動工的不滿，並不只是盧牧師所提到的技術問題而已。同文中受訪的環生社副社長，說出了整個問題的關鍵：

校園環境整體規劃將是東海即將面臨的重要課題，必須全體師生共同努力，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今天只要有錢想在這裡蓋房子就在哪蓋，如此的

話——東海校園美景將成為明日黃花（《東新》第10期）

雖然事件的規模不大，但在整個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新宗教中心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東海大學建築整個大環境的演變過程中，基督教活動中心的興建，促使學生開始想到自身和學校的關係，開始獨立思考並適時地表達意見；而校方也首次舉辦校園新設建築物的公聽會，建立一套新的意見溝通管道，學生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事實，而能主動地提供意見。這個事件在東海大學校史上的重要性，是無可抹煞的（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2：121）

同時學生由於學校突兀地動工而產生的不滿，和對學校決策不信任的情緒，並沒有隨著整個建物完工而消失。這些累積和蔓延的情緒，構成了引爆1990年「相思林事件」的火藥。

電鍍廠事件——80年代台灣學運中最早的「大學社區」議題⁸⁰

1986年經濟部工業局、台灣省建設廳、台中市政府及台灣土地開發公司（簡稱台開公司）開始規劃「電鍍工廠專業區」，並於隔年定案，地點選定距離東海約八百公尺（在農學院、夜間部、圖書館後方）的水源區空地。

1988年元月下旬東海大學輾轉得知消息，對在學校附近設置可能嚴重威脅師生身體健康的電鍍工廠，竟從未告知東海，表示相當憤怒。元月27日由校長室秘書魏吉助、教授會代表郭旭明及學生代表共五人，前往台中市政府就「電鍍工廠專業區」設置，向張子源市長及台開公司表示抗議。

3月2日東海校方邀請台中市政府、台開公司等相關人員和生物系、化學系、環科系教授進行溝通，對「電鍍工廠專業區」開始有了更清楚的瞭解。出席的教職員要求相關單位將規劃過程中的會議資料送交東海，由東海法律系、環科系、生物系相關教授進行審查，並強烈要求台開公司必須要先做「環境污染評估」。台開公司雖再三強調一定會妥善規劃專業區，降低污染至最低程度，並願與東海進行建教合作。但在師生強烈要求下，答應先做「環境污染評估」。

次日晚上課外活動組就「電鍍工廠專業區」問題，於校內題舉辦說明會，由生物系林俊義博士主持。會中師生發言十分踴躍，有人主張採取「自力救濟」，也有人認為尚可對相關單位進行理性說服工作，暫不宜採取「自力救濟」行動。

⁸⁰ 「在1987~1988年間，由改革派主導的東海學生活動中心，即為反對電鍍廠設立在校園附近而污染環境，曾向台中市政府請願過，並在校內舉辦說明會，算是八〇年代台灣學運史中最早關於大學社區問題的紀錄。到蛻變期，這種事件也跟著多了起來，不過，學運對此的討論很少，幾乎也沒有文獻資料可供參考，當然更不用說形成一套論述。」（鄧丕雲，1993：224-225，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3月15日晚上七點，台中市長張子源受邀出席東海大學「師生座談會」，強調若是台開公司無法降廢水處理做到零污染，他會採取適當行動維護東海淨土。

東海校方對「電鍍工廠專業區」問題極為重視，在行政會議上通過成立三個委員會，分別是由校內專家學者組成的「反對電鍍工廠專業區設置研究委員會」，由廠商代表、居民代表、地方民意代表、校友代表組成的「反對電鍍工廠專業區設置執行委員會」，以及由台大、師大、成大、中興、中央及本校專家組成的「電鍍工廠專業區專家評估委員會」，並通過制訂「東海大學反對設置電鍍工廠專業區實施計畫」（東行，民 77.5.9）。並由學校撥款六到八萬元，用以聘請工讀生從事台中工業區內各類工廠家數及台中市電鍍工廠家數之廢氣、廢水、環境污染、遷廠意願、工業區附近居民意見反映等調查工作。（東行，民 77.7.11）。

11月11日《校刊》公布「本校師生決反對在台中市工業區內設置電鍍工廠專業區的說明」，以對校內外表達學校的立場。學生活動中心以及學生社團，也舉辦座談會，並多次貼出海報，要求學校和同學關心火葬場遷建問題。

雖然相關單位包括省府主席邱創煥都答應設廠之前會先做環境影響評估，但是東海大學感覺到政府部門各個單位都未積極配合。尤其台開公司私下委託逢甲大學張柏成教授進行「調查報告」，更讓東海校方覺得工業區企圖矇混過關。這時校方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可能必須提昇到中央層級來解決，而不能等待省府和台中市府作結論，於是動作更加積極（東行，民 78.1.23）。

1989年4月18日經濟部工業局局長楊世緘及台灣省政府建設廳長李存敬親至東海，並在上午11時親自宣布廢止電鍍專業區的開發計畫，隨後台中市長張子源和議會議長林仁德也趕到東海，一致同意設置電鍍工廠專業區必須審慎評估，梅可望校長並對後續處理問題提出建議。「八〇年代學運史中最早關於大學社區問題的紀錄」的東海大學「電鍍廠事件」，遂就此告一段落。

學生外宿社區問題

如前所述由於東海外宿學生增多，鄰近的東別逐漸成為學生校外的住宿區與生活消費區。同時在1987年間原在台中市內的靜宜大學遷校至沙鹿現址，以及鄰近的弘光護校改制、增收學生，兩校部分學生也選擇東別做為住宿地區，使得這地區的住宿人口大量增加。

但是在缺乏妥善規劃和適當管理的情況下，東別的生活品質日益下降，居民、商家、學生之間也產生摩擦。1987年6月中旬，由於遠東街、國際街地區居民對於少數東大學生的「不當行徑」表示不滿，遂以「東大學生十大罪狀」為名張貼海報及投書媒體表示抗議，引起媒體一連串的報導。接著有學生在東

別通往東海校內的旋轉門出口，張貼海報抗議校外住宿問題，使得潛藏已久的東海學生校外住宿問題展開了序幕。

向來關心東海校園事務的東風社，於這些事件發生後，立即在《東風》58期製作了「學生外宿社區問題」專輯。這期專輯訪問了生促會會長、張貼海報抗議的同學以及東別的住戶和商家，並有美術系同學以「紀實攝影」的方式，紀錄東別的生活樣貌，對學生校外住宿地區的環境問題，作了多角度的分析。

由這期專輯可以知道，當時生促會曾多次和建築系詹耀文老師及訓導長商談，計畫成立「校外地區學生自治委員會」，而後因為人數、經費、組織等方面的問題而取消。另一方面東海訓導長也邀請東海校內都市計畫中心主任吳介英以及社會工作研究所李增祿教授，於1987年11月間擬出兩份計畫案，後由學校以「台中縣政府東海大學示範社區建教合作計畫草案」為名向台中縣政府爭取經費補助，以聯合縣政府各局處以及龍井鄉公所等共商解決東別問題。也有學生提出針對東別地區的環境問題，成立像「消基會」那樣的組織。

1988年2月29日，東海大學行政會議通過，在東別成立「東海大學新東社區學生活動中心」，並在訓導長召集相關人員研擬相關辦法後，於3月19日上午11時，舉行「新東社區學生服務中心」開幕茶會，開始正式運作。之前東海行政會議並通過李增祿教授、楊健臣主任、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李若蘭、生促會會長黃郁雯擔任新成立的「龍井鄉新東示範社區發展理事會」的理事（東行，民77.3.14）。

但除了環境問題之外，和東海學生更切身相關的則是東別的房租問題。1989年10月，由於東別房租價格上漲，東海學生會邀及相關人士及東別房東代表，舉行「別墅房東協調會」研商房租上漲問題。

在1990年5月，由於東別房租上漲幅度過大，許多大二以上東海學生決定登記校內學生宿舍居住。以致在5月19日、20日晚間，有數千名東海學生為爭取一千二百個床位，在男女生指導室前徹夜排隊。人間工作坊於刊物《人間札記》第二期中批評：「這種一席難求的情形，直可與一些國家的民生食品短缺相互比擬！！」

人間工作坊認為整體東海校內外生活品質的低落，和學校近年盲目的增加學生人數，卻未做出妥善的校園規劃計畫以因應人數的激增，又無力對抗土地資本對東別環境的破壞有關：

由於學生人數的激增，資本的急劇介入，始作俑者的校方並沒有以其所擁有的資源介入社區的規劃，而反應在政治的權力結構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由於學生沒有落籍，沒有選票，故沒有基本的壓力對抗整個政治實體——台中縣政府，相反的，財團、別墅的地主房東與商業資本擁有者，雖然只是佔少數，但是卻竄奪了整個社區意志…新東社區學生服務中心和守望相助巡邏隊只是成為

無實權的花瓶…質言之，學生在整個校外的組織是沒有實力基礎的。

（陳政亮，1990：3）

對於東別房租上漲問題，梅可望校長表示將支持學生抵制別墅房價狂飆的運動，必要時將在牧場置貨櫃做為代用宿舍，與惡房東長期抗爭到底，並聯合靜宜、弘光兩校共同行動。不過大度山社成員劉坤鯉以研聯會主席身份在行政會議上發言表示，為維護學生權益，增加長期抗爭的籌碼，除了增加居住單位的供給外，應該還要推動「落籍運動」：

從大一開始由班為建制，發動同學遷戶口到學校及別墅，並聯合靜宜、弘光共同行動，以我們目前的實力，將在八十二年的縣市議員選舉中，分別在台中縣、市各拿下兩席議員，如此將有力量直接改善學生在外居住的環境品，並確保東海大學的權益、強化學生與學校間、人與土地的感情（東行，民 79.5.14）

隨後由於 6 月中旬發生「相思林事件」，緊接著是「綜合大樓事件」、「第三次相思林事件」，關於相思林的議題成為連續五年校內學生運動的焦點。「落籍運動」的構想遂為人所遺忘，沒有人對其內涵與實踐的可能做進一步的探討。

第四節 結論

對於從 1989 年開始的校園運動風潮，其實只要光從那些團體的名稱所串連起的意象，就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氣氛：野火、自由之愛、春雷、抗體、怒濤、東潮、民風、平等域、望春風、創造（鄧丕雲，1993：101）

鄧丕雲用視覺化的描述，點出了 80 年代末期的校園運動氛圍。而在中台灣的東西海大學，從制度性的要求放寬社團負責人資格、校外人士到校演講以及學生刊物出版規定，到激烈的在校內速食店招牌噴漆⁸¹，現實的一切事物都遭受到質疑和批判，即使是夙有傳統的勞作制度也不例外⁸²。大度山上的神話仙境，突然進入了「東風吹，戰鼓擂」的諸神交戰時代。而「東潮」這個地下社團，正站在校內這股風潮的最前端。

面對校內要求改革開放的風氣，梅可望校長一方面指示行政單位，積極的研擬「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學生生活促進會組織章程」等方案，並推動東海學生會成立，主導了校園改革的進程。另一方面又透過「維護學校團結和諧實

⁸¹ 「四福頂呱呱」交誼廳，在上週六 10 月 10 日晚上，其招牌、新鋪地磚及鐵門都被噴漆寫上『破壞景觀』以及『髒話』，請學校處理。」（東行，民 76.10.12）

⁸² 1988 年時，勞作室朱書炎主任在行政會議上表示，目前有同學不但不喜歡勞作，甚至表示要求取消勞作，「此一論調，已使本校此一優良傳統制度的存廢問題受到挑戰」（東行，民 77.6.6）。另外在 1990 年 3 月出版的《東海新聞》第 17 期也曾以專題方式，檢討、反省勞作制度的存廢（東海大學學生會，1990a）

施辦法」、「學生社團邀請校外人士到校演講原則」、「學生社團申請發行刊物須知」等規定，對校內的學生活動進行法制化的管理，儼然是一種「開明專制」式的校園控制。

東海校方主導的校園改革措施，顯現了 80 年代末期黨國機器的「校園控制體系」的變化。鄧丕雲認為在 1986--1988 年間，台灣逐漸進入「後蔣經國時期」，原本以懲戒、鎮壓為主的校園控制方式，逐漸讓位於軟性、精緻、以行政干擾或不作為，以增加學運運作的成本為考量的方式。其中東海大學學生政府的成立，即是最典型的例子（鄧丕雲：209）。

校方主導的改革措施，雖然在一方面縮減了學生運動操作議題的空間，但類似說明會、公聽會等制度的建立，也給予了學生表達異議，和學校衝突，以進行宣傳的空間。而像 1986 年的「電鍍廠事件」，雖然不完全是由學生的力量促成，而有東海校方積極的介入運作。但是學校對「電鍍廠事件」採取的積極介入的態度，也給予了學生介入校園空間議題的正當性，這些都影響了日後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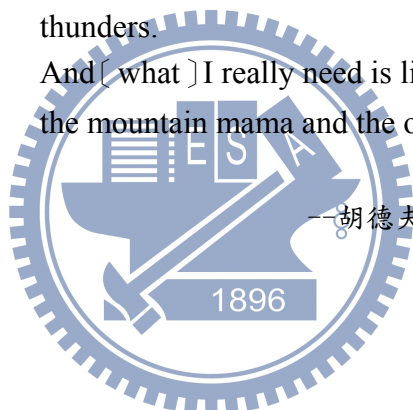
處在 80 年代末期「重估一切價值」的氛圍中，梅可望校長採取的態度似乎是在向學生說：「不論你們要思考多少，思考甚麼，用理性去思考吧！但是要服從！」，但東海學生沒有康德那般玄思冥想的氣質，他們要成為吹浪之鯨，用行動洗盡威權政治掩蓋在大度山上的塵埃，對抗國家的巨靈！！

在「東潮時期」這股批判、反省的力量只能用匿名的形式，在校園控制體系的夾縫中載浮載沈，或是隱沒在「大革會」等跨校性學生組織的光芒中，一直到 1990 年，這股力量才得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名字——

相思林！

第六章 雷霆之路：相思林時期（1990—1994）

Standing on my land, I feel like a stranger.
 I hope you know how I feel now while I'm singing
 this blues.
 You know that I'm strong, yes I am!
 But I don't have the power, hope become to my
 mountain forest, and on riversides.
 At the breaks of day, I fall down like the timbers.
 And I'm afraid not any more wake to see the horizon,
 neath the rainbow bridge.
 Well I roared! Oh! Yes! I'd been roaring put loud
 thunders.
 And [what] I really need is lighting to light the road to
 the mountain mama and the old-old heart.



—胡德夫 〈Standing on My land〉

1990 年的「相思林事件」堪稱是台灣學生運動史及東海校史上極為重要的歷史事件，對後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發展具有無比深遠的影響。回顧這段時期的校園空間運動，包括「綜合大樓事件」都是圍繞著相思林地為主題，因此將這個時期命名為「相思林時期」。

第一節 劇變中的台灣社會

民間社會論戰

八〇年代，台灣展現了二次戰後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針對在戒嚴時期所承受的壓迫，以及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以低糧價、低工資、高污染的政策，所導致的農村破敗，環境污染，工農生活的困苦，這一切的社會矛盾隨著政治解嚴轉化為社會運動，在台灣的舞台風起雲湧的演出著。雖然在 1990 年後，由於資本集團以停止投資、產業外移的方式要脅，使得國家重新向資本

靠攏，但是這段時期的社會運動實踐，還是開啓了台灣社會一些新的空間。

面對著當時台灣各種新興的社會運動，大約從 1986 年起藉由在《前進》、《中國論壇》、《南方》等雜誌的論述，由南方朔、江迅、木魚等人鋪陳出整個「民間社會論」的圖像，並企圖在此架構下替台灣的社會運動勾畫出一個藍圖。

首先出現的「民間社會論」，以南方朔為代表，認為當時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主要在於黨國體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支配與反抗關係，而不在於民間社會內部的群體之間的齟齬。社會各種力量發揮動能，追求「人民-民主」的戰果，則可望促成民間社會相對於國家取得主動地位（錢永祥，2004：115）

「民間社會論」提出後，引起不少社運人士，特別是左翼人士的批判，主要是質疑將社會矛盾定位在「黨國 VS 民間」的說法，有整合新興社運團體來對抗國民黨政權的企圖，而其政治效果便是讓社會運動被整合進當時新起的民進黨的政治反對運動中。同時一方面強調「人民-民主」認為各種人民主體一律平等，但又強調「黨國 VS 民間」的基本架構，兩者間明顯有矛盾。

在這些質疑挑戰「民間社會論」的聲音中以「具後現代傾向之人民民主論」（簡稱「後民論」）⁸³規模最大，持續最久：

另一方面「人民民主論」——應該以卡維波為代表，則根本反對「國家與民間社會二元對立」這種思路，主張眾多社會運動，才是廣泛的社會鬥爭漫長戰線上的紛雜多樣主體。不過一旦認定了社會運動具有主體與主動的地位，自然會反對上述民間社會論將政治戰線——黨國體制的民主化——掛帥的取徑，主張社會鬥爭乃是多集團、多樣結盟、多戰線的，其中國家體制的民主化，並不具有優先地位

（錢永祥，同上）。

「後民論」的提出有其現實政治策略上的意義，除了當時主張「民間社會」的學者日益和民進黨美麗島系合流外，也和民進黨內獨派在各個社運部門積極發展，影響力漸大，提出「政運社會化，社運政治化」的理論，表現出意圖收編社運進「獨立建國」陣營的強烈企圖。但同時在 1988 年五二〇事件後，政運和社運的緊張關係益加被突顯⁸⁴。因此對社會運動團體而言，確立其發展與自主性乃成為人民民主論的重要課題，而「後民論」更具有濃厚的現實策略的意義（蔡其昌，1991）。

⁸³ 「人民民主」在 80 年代的社運、學運部門是個經常被使用、引起討論的概念，錢永祥在其文中把卡維波等人的理論視為人民民主論的代表，但如同本文所示，至少在學運圈中，對於人民民主的界定就和卡維波等人稍有不同，也可以參見陳信行的文章（陳信行，2004）。為了以資區別，本文主要以蔡其昌的分類，將錢永祥所說的卡維波等人的理論稱為：「具後現代傾向之人民民主論」（簡稱「後民論」），參考蔡其昌，1991

⁸⁴ 「如五二〇對在這〔社運〕而言乃致命之打擊，但對政運而言卻累積了更多資源」（蔡其昌，1991）

這波「民間社會 VS 人民民主」的論戰在當時影響很大，並且具有非常濃厚的現實策略意義。因此包括一些學運團體也加入這場論戰中。東海的異議性社團「人間工作坊」在 1991 年出刊的社團刊物中《人間札記》第 4 期中，特別製作了「人民民主專題」，刊載由社員蔡其昌、郭紀舟、沈發惠撰述的討論「人民民主論」的文章。

蔡其昌在〈打造美麗島的新圖像--從「民間社會」到「人民民主」的歷程〉一文中，簡要的反省了台灣 80 年代末期的社會運動論述，從「民間社會論」到「人民民主論」的變化過程，以及兩方的爭辯內容。

而在社員沈發惠所發表的〈邁向人民民主實踐之路--「後現代人民民主論」之反省及人民民主之實踐意義〉一文中，對卡維波等人的「後民論」提出強烈質疑，認為「後民論」由於過度強調反對基礎主義、反對鉅型論述，完全否定了為不同的人民主體創造一個「團結形式」的可能，還可能造成不同社運間的對立。沈發惠認為就現階段實踐之可能性、可聯合最大多數宰制人民、避免形成絕對性的權力關係等三個條件來考量，「全面對抗資本主義之宰制體制應成為現階段人民民主抗爭之聯合基礎」(沈發惠, 1991) 同時主張學生、知識份子及草根工作者應扮演接合劑之角色，換言之學生/知識份子除了積極拓展校園(教育)/文化(意識型態)領域之抗爭外，亦應積極介入其他場域之抗爭。

郭紀舟則將「人民民主論」運用於東海校園運動的分析中，並參與了當時校內關於「東海是誰的？」的辯論(請參考本章三節)。

學生運動：從三月到後三月

這段時間中對於台灣的學生運動發展影響最大的，首推 1990 年發生的「三月學運」。起先是 3 月 16 日傍晚，數位台大學生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抗議總統選舉期間老國代過度的要求，之後演變成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廣場學生人數最多時高達七千多人。廣場學生最後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大、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事會議、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21 日由 53 位學生代表會見李登輝總統，呈遞國事聲明。22 日，學生撤離廣場，持續六天的抗議活動和平結束。

鄧丕雲認為 1990 年「三月學運」在台灣學生運動史上，具有四點重要的意義：

(一) 學運開始有學生群眾的認同參與，由此學運進入群眾運動的型態，學運才有真正的草根經營的問題。

(二) 三月學運時各股學運力量都維持在一個共同的架構下運作，這種合作團結形式，表示學運整合是有可能的。由於三月學運時的團結，使八〇年代學

運發軔時就有的夢想——學生成為一股獨立的社會力終於實現。

（三）八〇年代的學運是一種身份制運動，三月學運把這種特性推到極致，同時也蘊合了學運走出身份制的格局，切割出八〇年代與九〇年代台灣學運的差異。

（四）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即學運正當性的確立。

（鄧丕雲，1993：298-301）

雖然記述時間只到 1990 年的「三月學運」和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為止，然而在書末，鄧丕雲以其有限的觀察提出了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幾個新的面向：中區學生運動、女學生運動、台語文與台研的串聯、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鄧丕雲，1993：390）。

關於中區學生運動的出現，已於本論文第四章進行討論。至於其他三個面向，在東海校園內也有相應的變化：1990 年東海女研社成立、1991 年台灣文化研究社成立。而校園草根自主性群眾的出現，則成為 1993 年之後校內異議性社團在運動實踐上必須面對的課題，同時也考驗了當時學生運動所提出的「學生做為接合劑」，「為不同人民主體創造團結形式」等主張在校園內具體被實踐的可能。

第二節 相思林事件

三月學運中的東海

三月學運發生後，16 日晚上，東海大學人間工作坊、大度山社、東風社及長青團契等即會商要有抗議行動，並接到由台北傳來廣場靜坐的消息。並預定在 19 日於校內舉行「抗議國大惡行說明會」。

17 日下午東海第一批學生抵達廣場支援靜坐，人間工作坊等社團成立「東海學生自主聯盟」。次日，東海大學前往廣場參與靜坐的人數持續增加，人數最多時據說有 200 多人。

19 日，東海大學行政會議擬定了一份東海大學師生的聯合聲明，由梅可望校長對外發表，對學生在廣場靜坐的行動表示支持。「東海學生自主聯盟」於校內舉辦「共赴國難說明會」，有 400 多名學生參加。同時各社團幹部開始陸續北上支援。

當天上午 10 點 50 分，東海社研所學生方孝鼎，於廣場上宣佈絕食，並發表絕食聲明，要求李登輝與李煥在 21 日凌晨前達答覆廣場的四大聲明。該項聲明獲得九個人的聯署，並在短短三天內擴大成有六十人參與的龐大絕食團。

20 日，「東海學生自主聯盟」於信箱間前舉辦「中正紀念堂廣場報導說明



會」，由廣場回校的學生親自報告，當場東海學生蕭武昌、羅裕欽兩位學生宣布在校內絕食，與廣場同學同進退，之後聯盟改採快訊方式向校內報導廣場動態，並負責照料廣場上的學生。

根據東海校方的記載，東海學生在三月學運中表現突出。動員人數龐大，約佔廣場學生總數十分之一，僅次於台大⁸⁵，同時校內也有持續不斷的演講、絕食、海報抗議及肥皂箱等活動持續不斷（東海風：109）。

在「三月學運」結束三個月後，由於梅可望校長以「交互贈與」方式，將相思林地賣給郵政總局，產生了東海校內第一宗的遊行抗議事件--「相思林事件」。

怒吼的東海人

1990年6月14日，東海學生發現郵政總局僱請的工人和怪手，正在砍伐校內從別墅旋轉門、沿著圍牆綿延至中港路的一大片相思林地。翌日，環生社立即張貼巨幅抗議海報，呼籲同學支援搶救相思林，並連夜在遭到摧殘的相思林地圍上抗議布條。其後數日校內「海報長城」⁸⁶馬上被大量的護林海報佔領，搶救、抗議的字眼充塞在校園各個角落。

6月16日，環生社公佈一份由內政部簽發的公文副本，文中明確指出，東海校方以二千坪校地「贈與」郵政總局，作為興建國際水陸郵政轉運中心之用，該局則「贈與」東海新台幣四千萬元興建大禮堂（即東海的「中正紀念堂」）。同時由環生社、野鳥社、食科系、生物系數名同學，發起組成「搶救相思林聯盟」。原本計畫於次日（17日）畢業典禮時於校內發動遊行，然因校內聯繫不夠以及校方揚言只要遊行便記大過，因此取消。

然而學生搶救相思林的行動並未因此而中止，18日晚間「搶救相思林聯盟」在學生宿舍展開連署行動，並計畫在19日中午於信箱間前廣場舉辦說明會，另外有社會系四年級學生，發起在校內舉行「搶救相思林大遊行」，獲得聯盟的支持。

19日當天上午，東海大學校方召開行政會議，梅可望校長於會議中報告：

本校最西邊靠近「東海別墅」一塊土地，約兩千坪，郵政總局於六十八年來函，要求本校提供，以便在該處土地上興建「台灣中部水陸郵件轉運中心」，此事與本校洽商，復由該局呈交通部轉商教育部，轉奉行政院核准，並經本校董

⁸⁵ 依據東海大學行政會議記錄，東海參加靜坐人數最多的時候有200多人（東行，民79.4.2）。最精確的資料應是鄧丕雲引用21日中午，廣場「生活組」對各校人數的統計，38所學校按在場人數可分成三級，第一級是100人以上，共6校，分別是：台大（250）、東海（242）、清大（195）、輔大（110）、玉神（110）以及中興法商（106）（鄧丕雲，1993：369）

⁸⁶ 指校內約農路到紅林餐廳的小徑，因為沿路兩側布滿海報牆，東海學生稱此路為「海報長城」，和校外沿中港路圍牆邊人行道上的「機車長城」，並譽為東海兩長城。

事會同意，以互贈方式，由郵政總局贈本校新台幣四千萬元興建圖書館，本校則贈前述地點兩千坪土地給郵政總局興建「郵件轉運中心」（東行，民 79.6.19）

面對校內學生的反彈，梅可望徵詢行政會議出席人員的意見，究竟應如何辦理？最後做成決議：1.要求郵政總局同意東海收回該塊土地，由東海分期償還郵政總局贈與學校的之經費及利息。2.如郵政總局無法同意東海收回土地，則未來關於「郵件轉運中心」之興建、工程內容，必須先與東海磋商。3.在未獲致共識前，請郵政總局先停止砍伐相思林地。並推派訓導長劉渝生等八人，向校內外宣布此三點決議，並在中午學生舉辦的說明會上代表發言。

中午在信箱間聚集了約三百多位同學，頭綁白布條，表示護林的決心。現場由環生社、生物系及食科系同學揭露學校自 1976 年至今，處理相思林地的經過。訓導長劉渝生到現場報告行政會議決議，並向學生保證，校方必定盡一切力量「贖回」相思林地，但由於未提出具體的收回方式及承諾，反而堅定了學生發起遊行的必要。現場學生情緒高亢，於當場進行捐款及連署活動，以集資購買各大媒體頭版廣告，喚起校友關注、支持護林行動。學生並決定翌日中午 12：00 在校長室前集合，要求梅校長出面公開說明。

當天晚上決定發動遊行的社會系學生以及部分「搶救相思林聯盟」的社團，舉行遊行籌備會，擬定「620 行動宣言」，決議由社研所學生侯念祖擔任遊行總指揮。

6 月 20 日清晨，梅可望校長發佈公告，說明當初准予郵政總局使用相思林地的原因，以及校方對於此事的因應措施，但是仍未能阻止學生的行動。當天上午 11 點，近二百名學生頭綁綠色布條，由圖書館出發，沿文理大道前進。隊伍由數名手持標語及被砍死的相思林樹幹的同學前導，並沿路向各學院的同學喊話，一時「收回相思林」的怒吼，響徹東海校園。遊行隊伍行至校長室前，由侯念祖宣讀「620 行動宣言」的五大訴求：

- (1) 公開出賣相思林地的決策過程，並追究責任。
- (2) 公布學校動產與不動產狀況。
- (3) 列出相思林地收回時間表與方式，並植回同等樹齡的樹木。
- (4) 重大校務決策應舉辦公廳會。
- (5) 因應校務長遠發展，由師生組成具公信力的規劃委員會規劃。

梅可望校長在現場對於學生訴求，除第一點「公開道歉」持保留態度以外，其餘四個訴求均表示答應。然而在遊行宣布解散後，梅可望卻當場指責侯念祖：「違反倫理，應痛加檢討！」，當天下午總教官並電告四位參與遊行的社團幹部學生的家長，要求到校會談，後經學生抗議才不了了之。

6 月 22 日，校方指派參與遊行的「人間工作坊」三名社團幹部以及侯念祖等九名師生代表，北上至郵政總局洽談相思林地處理事宜。討論結果，郵政總

局與校方協議暫緩施工兩年、以地易地。但在場學生代表則強烈要求，絕對不能施工，不能用其他校地交換相思林地。並表示任何協議需與在校同學磋商，不能在當場決定。由於整個討論過程中梅可望校長並未出席，人間工作坊懷疑這個協議其實乃是校長事前和郵政總局局長磋商而得的共識⁸⁷。

6月23日，東海大學校友會召開代表大會，會中強烈要求東海校方收回校地。

6月25日，梅可望校長要求侯念祖對於遊行一事提出解釋，訓導長則要求侯念祖張貼海報公開道歉，但侯念祖表示無法以他個人名義做出任何說明。

7月9日，東海大學「訓育委員會」委派「五人小組」研討懲處事宜，決定由侯念祖繳交「相思林報告書」一份，若拒繳報告書，則送交訓育委員會議處。

7月上旬，校友會與梅校長會議，嚴重關切校方出賣校產一事，並針對校內傳聞，質問校長是否將對參與遊行學生「秋後算帳」，梅可望校長當場否認有此事。當天校友會會議並提議成立「校務發展委員會」，學校當局、校友會、董事會各派代表參加，並在月底會議形成決議。

7月30日，由當時擔任立委的東海校友林正杰居中斡旋，以及其他校友江銘鍾、阮大年、吳文建等大力協助，會同梅可望校長與交通部長張建邦、郵政總局局長夏荷生商討取回校地之事，決定由東海向台糖購買土地來交換原本「贈與」郵政總局的相思林地，夏荷生局長也承諾三年內暫停施工。

8月，梅可望校長頻頻向社會系高承恕主任施壓，要求高老師迅速向侯念祖拿報告書，但侯念祖堅守不妥協立場，認為這是無理的要求，不肯屈服。

8月13日，人間工作坊社團幹部會同侯念祖，邀請梅校長、劉訓導長、高老師及校友代表一同便餐。會後針對相思林事件，學生主動與校方溝通，痛陳愛校護林的立場與對懲處案的不滿。並因意見相左而和梅可望校長產生激烈爭辯。

8月25日，東海校方召開「訓育委員會」，劉渝生訓導長表示不會處分侯念祖及遊行學生，但要求同學對於「620行動宣言」之強烈措辭，對校園倫理所造成的傷害痛切反省。

10月5日訓育委員會以公文形式，將對參與相思林事件的學生的獎懲結果，送交訓育委員會委員及侯念祖、陳政亮、史哲、郭紀舟等四人。公文中表示：

本校社研所學生侯念祖、資訊系學生史哲、歷史系學生郭紀舟、陳政亮等，

⁸⁷ 「校長報告：關於收回本校二千坪相思林土地事，經我與交通部長、郵政總局夏局長等密切聯繫，本（六）月廿日上午九時，本校師生代表劉渝生訓導長等九人已與夏局長面談，據告商談過程相當和諧，其結果亦頗樂觀，甚以為慰」（東行，民79.6.25）

於本（七九）年六月二十日在文理大道，率眾遊行，嚴重違反校規，有損校譽，應予嚴厲糾正；並交由該生等之師長嚴正開導，務盼徹底反省，改正錯誤，永不再犯（《人間》第3期：2）

對於這種「不判刑的判決」，侯念祖等四人表示無法接受：

如果參與支持相思林遊行是如此罪大惡極的的話，那又何必在6月22日第一次與郵政總局談判時要選我們四人為學生代表？（同上）

認為遊行時所抗議的校方專斷、父權的心態，在判決書中表露無疑。並對校方這種別有用心，可能是秋後算帳的序幕的開刀方式，表示絕不會退縮。

為甚麼是相思林？

「相思林事件」是東海學生運動史的里程碑，對後來整個東海校園的空間運動，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如同上一章所述，在這之前還發生過「約農河加蓋事件」、「新宗教中心事件」以及東潮用地下刊物爭取言論自由的行動，但是都未能促成類似「相思林事件」這樣巨大的行動規模和對校園的影響力。為何「相思林事件」會產生這樣巨大的運動能量？其中原因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1. 三月學運後的社會情境與氣氛

從資源動員論的角度來看，自東潮分化、地上化之後，校園環境逐漸開放，學生挑戰校園威權的風險大為降低。加上「三月學運」充分樹立了學生運動的正當性，肯定學生取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必要性，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鼓勵了校內學生的行動。因此相較於之前的校園空間運動事件，學生會在「相思林事件」中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其實並不意外。

另一方面從校方應對學生行動的態度，也可以看出社會氣氛的轉變。在「東潮時期」嚴厲抨擊學生行動的梅可望校長，面對校內對「出賣」相思林的反彈聲浪，不是明快直截的壓制，反而先徵詢行政會議意見，討論應如何辦理，還要求訓導長至學生公聽會上說明。從「搶救相思林行動聯盟」組成之初，東海校方就對學生遊行一事採取否定的態度。但當學生再次集結，決定繼續進行遊行，校方卻未馬上祭出校規，反而梅可望校長還在校長室前等候學生。雖然事後證明校方對待遊行的態度是「前恭後踞」、「先君子，後小人」，但是這種精細拿捏進退分寸，以免事態擴大的行政管理手段，顯現了對待學生運動、群眾運動態度的轉變，同時也創造了許多模糊的空間，間接地鼓勵了學生的行動。

2. 外敵入侵與背叛者的想像

筆者認為整個「相思林事件」的文化邏輯，和當年梅可望校長領導的「電鍍廠事件」其實是很近似的，兩者都奠基在一個界線分明的共同體想像上，學生

們對校地分割、出賣給郵政總局的憤怒，和對電鍍廠可能帶來的污染的恐懼，在情感上都出於對侵入共同體的外力的強烈拒斥。這個「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起源於 1970 年代的「未竟的探討」，而梅可望擔任校長後，又試圖強化這個共同體想像。雖然在很多老東海人看來，梅可望校長帶領東海走向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路。

但和「電鍍廠事件」不同的是，「相思林事件」多了一層對共同體背叛者的聲討。在共同體想像樹立的內/外、自我/他人的界限中，逾越界限的背叛者是會引起強烈的恐懼和憤怒的。在「東潮時期」制訂的「東海大學維護團結和諧方案」中，就可以看出類似情緒動力的運用。而在「相思林事件」中這樣的動力則指向領導全校的梅可望校長，則其所引發的情緒反應更是強烈。共同體想像的情感除了刺激學生的行動基進化之外，同時也把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拉進事件過程中--東海校友。

3.校內多元團體的聯合與校友的聲援

前一章中曾經提到，東潮的分化與地上化，意味東海校內學生運動由草莽的單打獨鬥走向多元的連結，這可從參與「相思林事件」的學生團體包括了：人間、環生社、生物系、社會系、野鳥社等各種不同性質的團體看得出來。參與團體的多元化使得資訊的傳遞更快速，論述內容更深化，群眾動員的規模也更龐大。

尤其在「相思林事件」中，學生運動還取得了校友的支持，增加了學生行動的正當性，同時也對校方和郵政總局形成更大的壓力，很快的使事件上升到媒體全國版的地位。因此東海校方雖然否定學生遊行的行動以及「620 行動宣言」中的強烈措辭，但又委派領導遊行學生代表學校北上和郵政總局談判，充分顯現了面對學生和校友連結的力量的兩難。

4.新宗教中心事件的餘波

最後，我們必須考量到在「相思林事件」之前，1987-1989 年間的「新宗教中心」事件的影響。這可從發起遊行的社會四學生，於行動結束後發表的〈紛亂的告白〉一文中得出來：

6 月 18 日，我們一群女人有個小聚會，一如往昔的，沈浸在笑鬧歡樂聲中，有人起個頭，談及相思林遭砍伐一事，我們疑惑、心慟、氣憤，然而我們覺得無力，無力為此事有任何置喙的餘地。來東海三年，校園每每在我們驚疑中起了變化，新宗教中心在抗議聲中於暑假動工的經驗，況且三天後就要期末考了，勢必將眼睜睜看到這件事的發生，再也按捺不住，決定對此事做強烈的反應，不然一切將太遲，我們是多麼懼怕新宗教中心類似事件不斷重演！

（搶救相思林遊行發起人，1990）

如同前一章所述，由於「新宗教中心事件」而起的爭執並未隨著建物動工而落幕，反而製造了學生對校方工程建設的不信任，以及對校方利用寒暑假動工「強渡關山」的提防。而學生發現相思林被砍伐時正在期末考前一週，緊接著就是無法進行任何動員的考試期間和暑假。「新宗教中心事件」的陰影，加上期末考前的時間壓力，使得學生的行動快速地基進化，促成了東海校史上第一宗校內抗議遊行活動。

一個最不適宜學生行動的時間點，促成學生最基進的行動，這樣弔詭的結果在九年後的「118 事件」再度重演，而事件發生地點一樣是在相思林。

相思林事件的歷史意義

1. 東海學生運動的象徵

如果說「自由之愛」是台大學運傳統的里程碑與象徵的話（鄧丕雲，1993：77），那麼「相思林事件」就是東海學運傳統的標誌，是東海學生運動的里程碑。「相思林事件」的參與者侯念祖，曾在一篇訪問中充分說明了「相思林事件」所開啓的東海學生運動的特殊性格：

我想相思林事件在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它使東海的學運和其他學校的學運有所區別。在過去學運沒甚麼兩樣，因為早期在校園內、政治上戒嚴時期，在社會上有這樣的鎮壓氣氛仍然存在，在校園內學生的一個矮化，是這樣的情形。普遍來說，台灣的大學面對的都是這樣的結構性壓抑，所以在當時的學運的性質都很類似，都是在爭取學生的權力，爭取學生參與校務公共事務的權力。

但在相思林事件之後，東海的學運開始有一個不一樣的意義跑出來，使得東海的學運開始具有一些特殊性，主要是在相思林事件發生之後，對於東海的歷史和創校理念的討論開始進來，後來到了第2次、第3次之後這個東西越來越明確，去思考東海之所以為東海，東海做為一個大學，是要一個什麼樣的大學，這個東西開始進來，使東海的學運具有它的特殊的歷史性格。

（侯念祖口述，王嚴鴻、黃雅崎等訪問，1998：213）

「相思林事件」開啓的意義可說是多方面的，首先這是學生首次以行動，正面且成功的挑戰了校園管理者的權威。學生們對學校的決策進行強烈的批判，並由於「交互贈與」暗含的私相授受意味，對在《東海大學校史》中近乎傳奇英雄般的梅可望的地位提出質疑。

其次透過後來校友的響應，以及學生和校友、校方行政人員擔任代表和郵政總局協調「償回校地」事宜，並爭取到暫緩三年施工的承諾。這使得 620 遊行的性質不能以校方所謂的擾亂校園秩序、破壞校園倫理來界定。連帶的學生對

校園空間問題提出意見，採取行動介入的正當性也被確立，引領了後來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發生。

最後，「相思林事件」確認了台灣最美麗的大學校園不只是教育、休閒的文化場所，也是校園民主運動的實踐場域。東海學生除了在「海報長城」張貼海報外，還可以在校園內遊行抗議，這在當時除了台大「自由之愛」事件外，幾乎還沒有其他學校的學生做過類似行動。在風雅的東海校園中，東海學生除了讀書、寫字、談情、吹牛和發呆以外，現在又多了一件事情可以做。進取的讀書人的精神開始具體化為批判的行動者的實踐。

2..對梅可望治校方式的批判-

純粹從經濟和物質的層面來看，梅可望不啻為一個優秀的校長。在他手中東海一洗之前數年因為財務困境、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陰霾。大量的社會資源湧入東海，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各項軟硬體建設也依次完成。梅可望自認為自己的努力讓東海這所教會大學「浴火重生」（梅可望，1998：251），這話雖然聽來有些自吹自擂，然而無可否認的，東海在他手上確實有了一番嶄新的面貌。

然而積極推動省府員工進修班、建教合作等教育推廣工作，雖有擴大社會聯繫，增加學校收入的作用，但也帶來了「辦學商業化」的批評。不斷增加的學生人數，及由此而進行的各項工程建設，改變了校園的風貌，也抵觸了師生對校園景觀的認同感。而「擴大升旗」、「動員月會」等活動，以及身兼國民黨「中知青校園黨部」主委的身份，更帶來「辦學政治化」的質疑，縱使他在治校期間一直強調「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事實上在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就已有有人對其治校方針提出批評：1982年暑假，東海應屆畢業生由畢聯會主席領銜，共十九位系代表聯名簽署發表一份給母校的建言，慨嘆建校理想的失落（鄧丕雲，1993：16）。

在1989年時，曾為東海大學籌備委員及第一任董事的長老教會黃武東先生，也在其回憶錄中指責梅可望擔任校長以後：

這所提倡自由學風的的基督教大學已與創校原旨背道而馳，和臺灣其他的學校一樣，終也免不了政治污染的命運，把「喊口號」、「升旗」等全搬進校園。「黨化教育」終於侵入東海了（黃武東，1989：224）

梅可望出身中央警察學校情報科的背景，以及在「東潮時期」強烈壓制學生爭取言論自由行動的作為，使得他成為當時反威權的社會氣氛中，威權政治進入東海校園的表徵。而校園景觀認同感所帶起的對於東海創校時期的校風的緬懷，又更加强了對於梅可望代表的政治化、商業化色彩的敵視。

在1977年就任校長之初，即能很快掌握住東海的問題所在並施以針砭的梅可望，在面對80年代末期東海校園內外環境的巨變的時候，一樣很快的做出反

應：建立公聽會、說明會制度、推動成立東海學生會、支持學生參與三月學運...。但和 1977 年不一樣的是，此時梅可望本身也是東海校園問題的一部份，在積極推動改革的同時，他也要被改革、被批判，而「相思林事件」正是這個批判的表現之一。

「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梅可望在東海的聲望遭受嚴重打擊。此後面對學生要求「中知青黨部退出校園」⁸⁸、「綜合大樓事件」（第二次相思林事件）時，他都只能被動的因應學生的批判和質疑，而不復當年壓制東潮時的威勢。最後在部份校友和學生，抵制他擔任東海董事長的聲浪中⁸⁹，這位擁有雄厚社會資源，曾權傾一時的校長，黯然的離開東海⁹⁰。

平心而論，梅可望確實對東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如果說「對偉大團隊的批判，乃是一個偉大城市的象徵」，那麼對偉大校長的批判，就更見證了這所學校的偉大。在「自由以及不斷尋求」的精神指引下，除了路思義教堂之外，所有位於大度山頂上的事物都要接受歷史以及理性的檢討，更何況是一位校長呢？

3. 對校園科層/父權管理的批判

在「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梅可望校長以及校方高層不斷在各項會議以及校內刊物上，強調將相思林售予郵政總局的過程完全合法，並出示各項相關文件以示所言不虛。梅可望校長並在行政會議上強調：

這項土地的互贈先後辦理了兩年之久；經過了本校董事會、教育部交通部、內政部、財政部、行院主計處及行政院等七個機關，任何個人都不可能獨斷獨行，也絕不可能隱瞞事實（東行，民 79.6.25）

本校校園民主做得不錯，但相思林事件竟未循民主管道溝通，而以非民主行動進行訴求，應切實反省、檢討（東行，民 79.9.3）

⁸⁸ 1991 年 10 月，由於媒體報導及校內學生張貼海報，指責東海不許教師在課堂上談論政局，卻允許國民黨在校內設立中知青黨部，梅可望校長除再度重申「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之原則，並表示歡迎各合法政黨在校內設立黨部、招收黨員。但在學生強烈的海報言論質疑下，梅可望校長在 10 月 31 日的行政會議上，決定各合法政黨皆不得在校內設置辦公室，參見東海風：110-111。「這是繼台大後第二個國民黨校園黨部因學運抗爭的壓力而遷出校園的例子。」（鄧丕雲：272）

⁸⁹ 1991 年 12 月，東海大學董事會召開會議前夕，由於盛傳梅可望於校長卸任後，企圖爭取董事會支持，擔任東海董事長。部份校友聯合學生力量，在校內散發文宣，並前往董事會，對東海高層人事異動表示關心。另有由旅美校友謝善元具名，同 17 位校友聯署致國內校友會會長吳文建一封公開信，對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的校政提出批評。東海董事會開會當天，部份東海校友於媒體首頁刊登半版廣告，要求梅可望校長知所進退。1992 年 2 月 23 日，東海董事會通過周聯華牧師再任董事長，校友阮大年博士擔任校長。

⁹⁰ 關於相思林事件前後，梅可望校長姿態的變化，或可以參考《大度山》第 9 期上一篇有趣的文章〈東海「土地公」傳奇〉：「回憶那時所展現的目無餘子的神情，與現在的略顯龍鍾相比，只能說歲月催人。」（顧憲成，1991：25）

確實就各項文獻看來，整個「出賣」相思林的過程都有明文紀錄並符合各項法令規章。但在「相思林事件」中，學生要批判的正是整個程序本身。在「相思林事件」之前，「新宗教中心」的興建也完全符合程序，甚至還舉辦了公聽會、說明會，但是仍然引起學生強烈的情緒反彈，間接促成相思林事件的發生。

正如哈伯瑪斯對 60 年代歐美新社會運動的分析，社會運動要對抗的正是行政權力和商品經濟對於生活世界的侵擾，「相思林事件」也體現了相同的意義。現存的科層體制運作既然是問題的來源，學生當然更不可能依循校方的「民主管道」進行溝通。

但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除了科層理性的異化外，又多了一層父權管理的陰影。乍看之下東海校方對率領遊行的學生的處分作為，簡直是前後顛倒、自相矛盾，完全缺乏科層理性運作的一貫性。不過梅可望校長在 620 遊行結束後脫口而出的：「違反倫理，應痛加檢討！」這句話說出了其中關鍵——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居於法律規章之上的，乃是校園管理者的家父長式權威。任何對公權力的挑釁，也比不上挑戰賦予師長權威的「校園倫理」來得嚴重。而所有違反法律規章的行為，都可以在默認家父長權威的前提下被寬容。

參與 620 遊行的學生當然不會就範於這套潛藏的遊戲規則，除了在社團刊物上揭露整個處分過程外，並堅決表示絕不退縮。整個衝突最後就在「務盼徹底反省，改正錯誤，永不再犯」的空洞措辭，以及學生對「秋後算帳」的警戒中收場。

在「相思林事件」之後，一直到「東海希望聯盟」、「第二教學區爭議」，乃至東海上下齊心對抗台中市府聯外道路規劃的運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做出荒謬、錯誤決策的一方永遠都在強調：程序完全合法，任何人都不可能獨斷獨行，也不可能隱瞞事實。而採取抗議行動的學生，也永遠不會理會這些空洞的措詞和程序。惱羞成怒的校園管理者永遠在指責學生「違反校園倫理」，但種種「違反校園倫理」的文宣、海報、乃至遊行活動也永遠在校園裡持續發生著。

第三節 東海是誰的？--校園民主論戰

議會流會問題的反省

東海學生會在成立之初即面臨嚴重的議會流會問題的困擾。由於「學生政府」乃是 80 年代末期學生運動的重要訴求，學生會的運作不良引起了東海校內關於「校園民主」的內涵與實踐的討論。

除了大度山社的方孝鼎於學生會成立後，首先為文指出東海學生政府運作的異化外，在 1991 年 5 月第三屆學生會會長、議員選舉前夕，人間社員李彥旻在《人間札記》第 5 期，以〈校園民主的一齣戲--談學生會學生自治的侷限性〉為題，對整體東海學生會的運作進行檢討。

李彥旻於文章中指出，學生會運作不良、議會頻頻流會的問題根源在於「學生會的定位錯誤」。一方面學生對於校方的權力位階太低，只是「學校訓導處下的課外活動組輔導之學生機構」，因此並無足夠權限發揮具有主權、能獨立運作的學生政府的角色。另一方面學生會在日常運作上繼承前學生活動中心的模式，呈現出一「超大型服務性社團」的樣貌，不斷地在處理事務性的行政工作，而非一發揚學生主體性的學生政府，學生會既然未能對參與影響校園事務發揮實質的作用，學生自然對其參與意願不足，議會頻頻流會也就不足為怪。

將學生會運作不良的癥結、鎖定在「權力位階太低，角色定位模糊」的觀點，一直受到人間、大度山社等社團的支持。而「新宗教中心事件」以來的校園空間運動中，對於校方「黑箱作業」的指責，與要求開放決策權力的訴求，也和這種對學生自治運作的批判相互應合。大度山社成員同時是研聯會主席的劉坤鰲亦曾在行政會議上直言：

由於目前東海大學學生自治辦法之權力位階從屬於學校校務會議、行政會議之下，站在研聯會立場，在權力結構未改變之前，亦無實現願望之能力。

（東行，民 79.5.7）

這種要求更多的權力，更大的參與空間的想法，其實是和當時「反對威權統治，要求政治自由化」的社會氣氛有相關連的，這可從李彥旻文章結尾的這段話看得出來：

長久以來，台灣校園在黨政威權體制下定義價值觀、教育觀，學生被定義在被教育者，而所接收之內容則是符合黨政機器限定之意識型態。學生自治即要反抗此一意識型態強迫灌輸，學生會絕非民主實習場，而是學生主觀意識在校園中凝聚之具體呈現（李彥旻，1991）

學生自治既是反抗黨政意識型態灌輸的一環，那麼反對學生在校園中的角色被矮化，要求更高的權力位階，自然會變成異議性社團學生在分析校園民主問題時重要的問題意識。

在李彥旻的文章發表之後，東風社社員李孟浩也在同年 10 月，於《東風》60 期發表〈學生議會反省〉對議會流會問題的深層原因進行探究。文中認為：

政治系統的制度運作若無公民意願養成的政治文化來支撐的話，系統運作的成功機會就會相當渺小

…議員的疏離倦怠和選民的冷漠本來就是公民文化中一般人既存的政治取向。因此政治系統的制度設計不是為了滿足形式的立憲主義，以讓有興趣搞政治遊戲的民主菁英去操作這些「背著服務之名」的政治機器；而是要把制度設計成具備有「政治歷練」的教育功能，以及把校園民眾的任何言論和訴求都匯編為政治能裡訓練題材（李孟浩，1991）

強調學生會的「政治歷練」的教育功能，並非表示東風社贊成李彥旻所批評的校方將學生會視為「民主實習場」的觀點。李孟浩在文章中也從東海學生會創建的歷史，指出當時急就章的態度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議會流會並不是偶然的，有其成立的歷史背景因素。由於當初在「校長的善意」下，學生會便有了很濃厚的「把握時機」先搞出來「量上具代表性與合法性的架構」之傾向，而有意地忽略了在「權力再分配」的秩序變遷中提供一段思想衝盪期的重要性。因此，在急於讓這個「模仿」西方學生會的法律形式通過的情況之下，一方面對制度運作的法律形式與社會活動的實際運作規則（傳統所講究的社會關係及混官場、搞社團那一套）的相互配當性沒有進行探討之外；另一方面也不容許緩慢地進行各種意義的溝通與整理，以催生許多草根性的議題小團體，讓同學能在團隊工作中逐漸把「政治參與的無力感情結」轉化成「維護自由、尊嚴與權益的公民意願」

這段話的立場其實和當年東潮、大度山社對學生會制憲過程的批評相差無幾，只是在分析上更為精細。由於強調學生政府在公民文化養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李孟浩雖未在文章中明白否定人間、大度山社所謂「學生會權力位階太低」的歸因，但為達成健全公民訓練的目的，他主張透過強化「議會調查權」（考察行政及細究相關文件的權力）和「新聞權」（對公共事務的特定訊息進行議題設定，而向選民告知並監視政治環境）的充分運作，讓議會變成強而有力的「議會調查團」以改善學生會運作不良的問題。

由於「議會調查權」的運作還有助於形成議員社團/教授間的合作關係，解除「特別權力關係」與校方行政系統對教授及學生的學術自主權的侵害。李孟浩以東風社的名義建議學生議會，可以經由調查委員會的運作，來推動一些相關於全體師生權益的議案，並訴諸於教授和學生全體的公民投票。

這些學生社團之間關於學生會運作問題的討論，雖然意見不一，但在不斷發生的校內學生運動的刺激下，整個討論走向更深刻的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本質的反省。這個反省首先見於以「東海是誰的？」的問題開啓的辯論中。

東海是誰的？

「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校園內出現各種關於事件討論的聲音。除了東海校方不斷強調決策的合法性、公開性，並對部份學生偏激的行動表示「遺憾」外，也有校內學生認為搶救相思林行動雖出於愛護校園環境，但是行動太過激烈，熱情淹沒理智，焦慮化成莽撞，忽略了對當時決策過程的考量，破壞了校園的師生倫理。

其中政理所三年級研究生孫治安，發表在 1990 年 9 月份的《東海新聞》上的〈東海是誰的一對最近校務問題之省思〉一文，指責參與「相思林事件」的學生提出的訴求，忽略了東海教學設施不足的問題根源，來自於教育部對私校經費補助的限制，而非特定個人的辦學方向或領導方式的問題。同時這些學生對於學生和學校間的關係也有錯誤的理解：

學生與學校真正的權利義務關係，在於知識的傳授，學生交了錢，為的是學習，享受優美的校園景觀只是附帶的。對於師資、教學設施，學生應有較大的建議權，甚至參與決策。但對於校地變更、籌措經費等，則只應站在監督、溝通的立場，若也要參與決策的話，未免有點「喧賓奪主」了（孫治安，1990a）

孫治安的文章刊出後，校內大度山社立即在社團刊物《大度山》第八期，由社員周盈成執筆為文〈東海到底是誰的？〉提出批評⁹¹。

〈東海到底是誰的？〉一文刊出後，孫治安又於 12 月份的《東海新聞》上，發表〈另一個角度看「東海是誰的？」〉（東海新聞第 23 期，1990.12.22），對大度山社的文章做出回應，認為不能用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來想像學校和學生的關係：

學校並不如政府一般為全民通過所產生，而是由主辦者依其理念或需要來成立，因此校方自然是名義上的擁有者，不然我們為何要區別「公、私立」學校？但這僅意味著校方在行政方面可享有近乎絕對的權力，對於其於知識傳播或學生生活，便不該有管轄之權（孫治安，1990b）

大度山社並未針對此文進行回應，但是另一個異議性社團--人間工作坊的社員郭紀舟，在《人間札記》第 4 期上以〈你的名字是人民〉一文對大度山社和

⁹¹ 在郭紀舟、孫治安等人的文章中，都有提到周盈成的這篇文章，不過筆者遍尋相關資料，始終找不到《大度山》第八期，因此對其內容只能採取保留態度。以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孫治安和郭紀舟的論辯上。

孫治安的辯論提出批評。

郭紀舟要求從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角度，來看待所謂「東海是誰的？」的問題。即從所有教育制度與資源，是不以校園主體——師生的需求為考慮中心的觀點去思考，而不是以形式上的參與決策權力的多少去分析。

郭紀舟借用了拉克勞(Ernesto Laclau)以及穆芙(Chantal Mouffe)的理論，認為從把「校園民主」做為學生運動的抗爭場域來看，要探討校園是誰的，則必須細緻區分抗爭場域內各角色配置的從屬關係，政經結構式的理解方式來看校方、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的社會位置，構造出關於校園的整體圖像。

「東海是誰的」不能泛談主體—師與生的權限範疇，應當注意「宰制集團/主體」內的意識形態矛盾。

類似像「全體師生」的號召，都必須要注意到背後的意識形態的「召喚」作用。而校園知識份子的任務，即在於透過意識形態的接合工作，和校內外不同的群體（被宰制集團）結盟，建立對抗校園宰制勢力的「(反)文化霸權」。

(郭紀舟，1990：2)

郭紀舟批評孫治安：對學生的角色自我設限，視學生為「學習」的角色，完全內化了主流權力集團的宰制想像。對於大度山社周盈成的論述，他批評只停留在要求學校以「一種更公開、更民主的方式」讓師生參與校務，卻沒有進一步闡述校務公開的形式，與民主的內容所圖現的具體制度是甚麼？在支配體制的運作下，體制的修改始終是欺騙的，即使是民主，也不過是投票箱式的民主而已。

孫治安馬上在《東海新聞》24期上，發表〈學術的歸學術，人民的歸人民——並答你的名字叫人民〉對郭紀舟進行回應

最近很流行一句話——「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此。還須讓「人民的歸人民」？如果中國的知識份子肯放棄他們的使命感，不再將關懷社會的責任「壟斷」。讓人民自己站出來提出他們的要求，那中國的民主之路可能就不遠了（孫治安，1991a）

孫治安和郭紀舟兩人針鋒相對的辯論，引起了當時第三屆學生會新聞部編輯的興趣，在分別跟兩方聯繫之後，於1991年5月25日印行的《東海新聞》第25期同時刊出兩人進一步的論辯與回應。

在該期《東海新聞》中，郭紀舟以筆名「救濟船」發表的〈知識學生與人民民主——簡答「學術歸學術，人民歸人民」〉，再度強調校園事務無法被抽象進行學校/學生的劃分：

就以「大學自治」來看，學生與學校是息息相關的整體，所有的校園生活都

離不開校園內任一主體，舉凡宿舍、餐廳、校園、社團、上課、歐遊旅行…，都無法分裂成學生歸學生，校方歸校方的明顯切割界線（郭紀舟，1991a）。

並對「人民民主」的概念進行釐清，認為人民民主是一種對於現有以投票為中心的形式民主的批判：

人民民主絕不等同於哪種一人一票的投票式民主，把人民的意見割裂成只是贊成和反對。而人民民主聯合的契機就落在知識份子身上

同時批評孫治安要求知識份子放棄對社會的使命感的提法，在分析上混淆了不同的歷史情境，在政治效果上等於在鼓勵校園和社會疏離：

把中國傳統士人提出來當「封建的殖民式思想」、比附人民民主的知識份子，然後要求知識份子不要再壟斷關懷社會了——這樣企圖混淆知識份子在各種不同進程的發展規模，不經意地或刻意漏掉歷史條件的不同階段的因素，其中隱含著呼籲知識份子（學生）用不著太關心社會（校園）民主的改革工作，已成為自由思想的法西斯了！

孫治安也以筆名「Untouchable」發表〈再論知識份子與中國社會-並答「知識學生與人民民主」〉做出回應。他批評郭紀舟強調知識要走入社會、走入民間的說法，會使得實用性和社會關懷壟斷了學術發展，讓與現實無關的學術、技術受到人們的忽視，妨礙學術發展。同時考察歐洲民主運動的歷史，知識份子並非實際執行社會改革推動者的角色：

和平的革命往往是藉助掌握實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工商階級來加以推動，知識份子最多能以旁觀者的角色來建立理論，提供建議，甚至像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驅者—洛克便是以資產階級的立場來發表言論。事實上，那也應該是知識份子應該做的（孫治安，1991b）

他並批評郭紀舟一直強調的「人民民主」的概念太過理想化，又頗為主觀、虛幻，缺乏明確定義，無法變成具體的制度。同時在強調人民自主、各個主體平等的同時，又賦與知識份子特權：

同時一方面強調從生活底層的、人民自主的、各主體平等的民主，但是又強調聯合的契機落在知識份子的身上，不是又複製了知識份子自視高人一等的心態？

爭論的深刻意涵：甚麼是公共？甚麼是民主？

緊接著由於「綜合大樓事件」發生以及其他不明因素，這場關於「東海是誰的？」的辯論並未再繼續下去。但以現在的角度來觀察，特別是聯繫上後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實踐以及校園民主運作的問題，這場「東海裏的風暴」有許多

值得深思和討論的地方。

整個關於「東海是誰的？」的論戰過程，環繞著兩個核心的問題而展開：

第一個是由「東海是誰的？」的題目所暗示的，關於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界限的問題，由此引發出對於校園的權力關係與社會關係的反省。這裡面其實是一個關於政治哲學上的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線如何劃分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主要是在郭紀舟加入論戰後，由於「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引發了關於「民主政治」的意義的爭論。其中做為論辯核心的，則是關於知識份子在民主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的問題。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孫治安強調一個明確的、先驗的關於公/私領域的界線，由此推演出學校/學生事務的差異，而在私立大學中這差異可以用商品提供者/消費者的關係來比擬。因此孫治安認為學生有權對於於師資、教學設施提出建議，但對於校地變更、籌措經費等問題則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因為在現實中消費者只需關心商品的價格、品質的好壞，無權也無需介入商品提供者的資金籌措、經營管理等問題，這裡面暗含著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對私有財產權的重視：

一所學校的硬體設備、財產所有權是屬於校方的，而在其中的知識傳播則屬於全體師生的(孫治安，1990b)

對於孫治安來說理想的大學校園應是：校方、教授、學生各職所司，互不侵權，因此認為學生不宜過度干涉學校事務。但基於相同立場他也反對校方對學生事務的不當管理，甚至最好學校不要去對學生作任何生活管理。所以他也反對夙有傳統的東海「勞作制度」，因為學生應是交學費到學校受教，而清潔費、設備管理費用都在學費中無形支付了。

私不能害公，公也不能假借教育之名妨害私人生活，從這個論點上來看，孫治安並不是威權政治下所謂「學生沒有完全的自由」的保守主義觀點的支持者，而是接近於古典主義傳統的「守夜人國家」，甚至是諾齊克(Robert Nozick)等人所謂「最小限度政府」的自由主義。

但人間的郭紀舟則強調，公/私領域的界線應從具體的社會關係、社會實踐中去考察，而不能從私有財產、抽象的個人權利等先驗的規則去劃分。學校和學生的關係雖不能簡單地用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來比擬，但也不是那麼容易簡單二分的，即使是用孫治安的市場模型也不可能。這裡面蘊含著自馬克思主義以降的左翼傳統，要求對事物進行歷史的、現實的、動態的考察，而不輕信任何非社會、非歷史、形而上規定的立場。

郭紀舟又充分發揮了傳統左翼「不只是解釋世界，更要改變世界」的實踐精神，而以拉克勞和穆芙的理論為武器，認為學生更應該積極的挑戰既存的權力關係界定下的公/私、學校/學生事務的分野。而「學生自治」、「人民民主」則

是做為團結學生力量以對抗校園宰制集團的接合論述。這使得後來的辯論中，郭紀舟和孫治安開始針對「民主」的意義產生爭論，論戰主軸開始由第一個問題滑向第二個問題。

對孫治安來說，民主意味著一種「物各付物」的狀態的達成，不同的群體在清楚而合理的規範下，進行權力和責任的分配，彼此互不干涉。但從郭紀舟所借用的拉克勞和穆芙的理論立場來看，民主做為一個戰場的意義，可能遠大於其做為一種理想狀態和規範的意義。因此「人民民主」的概念也只能是批判的、永遠未完成的計畫，而非是一個清楚的、明確的制度藍圖。

因為強調民主政治的動態、衝突的層面，郭紀舟要求知識份子應積極介入社會內部的反宰制集團的鬥爭中，並執行接合不同反宰制群體的作用。但就孫治安的立場來說，這是破壞了民主政治追求人人平等的價值，賦予知識份子凌駕於各個社會群體的位置。

孫治安和郭紀舟都同意知識份子具有反省、思辯的職能，但不同於郭紀舟的是，孫治安認為知識份子應充分發揮其職能，在政治社會改革中擔任觀察者和建言者的角色，而非直接參與社會鬥爭。知識份子應該要放棄擔任「群眾代言人」的角色，要讓人民自己發聲、自己提出他們的要求。這裡面隱含著來自 20 世紀極權主義歷史經驗，對任何訴盧梭式「普遍意志」的事物的戒懼。

從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孫治安以市場行為的想像，劃分出一個清楚的公/私領域的界線。而其理想中的校園民主，即是在這個界線的規範下，學校與學生各盡其能互不干擾。而知識份子在社會改革過程，應擔任觀察和建言的角色，讓人民自己發聲行動。

而從左翼的思想傳統出發，借用拉克勞和穆芙的後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對於社會運動和權力關係的敏感，郭紀舟認為這個公/私領域、學校/學生的界線，永遠都是既定社會權力關係下的產物，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中。民主政治的內容需要具體的社會運動的過程與結果來填充，沒有辦法事先給予先驗的界定。唯一能夠肯定的只是受壓迫群體，以民主的理念和制度為戰場，改造既定社會權力關係的批判與實踐。知識份子則應在民主運動過程中擔當積極接合、協調不同受壓迫群體，建立反宰制集團的聯盟的角色，而不能逃避於現實的社會鬥爭之外。。

雙方的盲點

當「東海是誰的？」辯論在《東海新聞》上討論正熱烈之時，東風社的邱炫元以旁觀者的身份，指出了這場辯論具有的深刻意涵：

早期校園內素樸的單一政策抗爭，到解嚴後學生與社運在校園外的接合。所

有曾經出現過的抗爭議題，或多或少都略曾牽涉到對於大學理念和自我身份認同的探問。隨同政治、社會風氣的變動，校園內的「空氣」似乎日趨清新自由，校園控制機制鬆弛，早先學運力倡的普選、言論自由，「學生自治」，都好像真的樂觀地實現了。但是對於很多學生而言，這機〔原文如此〕的轉變所具備的實質意義究竟是什麼？「東海是誰的？」這樣的討論不正顯示出學生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大學在台灣社會中所呈現的國家〔原文如此〕，猶仍非常迷茫和模糊。

（邱炫元，1991a）

事實上，在「東海是誰的？」辯論中涉及到的公/私領域的界分、民主政治的意涵乃至知識份子在民主運動中的角色等問題，不只是在東海的校園民主實踐中，一直到 2003 年總統大選、關於公投的爭議都是台灣社會十分重要的課題。不過從後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校園民主實踐的情況來看，雙方的論辯過程中明顯忽略關於學生主體內部層次的問題。

就孫治安的立場來看，他強調應讓人民自己發聲，知識份子不應越俎代庖。不過問題是從歐美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代議民主制的特徵反而是在極低的投票率，所顯現的人民不參與。尤其在東海學生政府運作的過程中，學生主體參與意願的低落，乃至議會頻頻流會一直是嚴重的問題，終於造成了校園民主實踐的崩潰。

從孫治安的立場或許會認為，即使學生政府運作不良，也是學生自己選擇的。但問題是：如果由於學生政府運作不良，使其對於學校妨害學生生活或權利的決策不能進行監督或阻止時，這樣的情況應是要被接受或是採取行動阻止呢？而當異議性社團學生對此問題進行介入時，算不算是他所謂的「壟斷關懷社會的責任」、「賦予知識份子特權」呢？

郭紀舟的立場看起來賦予知識份子或是異議性社團，在校園民主過程中更積極的主動性，但明顯分享了當時台灣社會關於人民民主辯論的侷限：忽略了人民團體內部的矛盾，也未提出在甚麼樣的情況下，不同的反宰制群體可以在甚麼樣的條件下進行合作（錢永祥，2004：118、119）。在《人間札記》第 4 期中，沈發惠雖有提出以「反對資本主義」做為不同群體連結合作的基礎的論點，但看起來比較像是道德姿態的標榜，而缺乏具體的歷史社會的分析。

尤其是放在東海校園中，就算承認東海校園的問題是由於資本主義運作問題所引起，但是由此仍然很難說服：女研社、環生社、乃至校園內不同的自主性群眾加入反對宰制集團的聯盟中。而這正是在「相思林時期」結束後，異議性社團所要為之苦鬥、思索許久的問題。

這些被忽略的問題在當時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然而後來的歷史證明，正是這些問題深刻地決定了東海「校園民主」實踐的命運。

第四節 第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前期）

雖然郵政總局「電腦備援中心」和東海大學的「綜合教學大樓」，是兩棟出資者、使用者、用途都完全不同的建築物。不過因為「綜合大樓事件」發生地點、時間和1990年「相思林事件」⁹²非常接近，因此許多東海教授、學生、社團刊物都稱此為「第二次相思林事件」。其實東海學生對「綜合教學大樓」的興建，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相思林事件」的影響絕對不容小覷。八年後，相同的情感結構再度引發了「118事件」。

只許東海蓋樓，不准郵局砍樹！？

1990年7月31日，東海行政會議在由建築系詹耀文教授進行簡報後，通過在圖書館與中正紀念堂之間的西面上方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簡稱綜合大樓）。並決議由劉渝生訓導長擔任召集人同林總務長、詹耀文教授及五位學生代表組成小組，就該樓興建地點、設計構想及相關事項舉辦說明會，向各系所及學生社團代表進行說明。

由於「相思林事件」甫落幕，在反對郵政總局砍去相思林地之後，學校竟要自己來砍樹，興建綜合大樓的消息公布後，校園內立即出現質疑的聲音。研聯會主席劉坤鰲於行政會議上提出數點質疑意見：

1. 學校說，蓋大樓是為改善教學研究環境，但是校方淘汰不良師資的具體作法迄今未見實現，如何可能改善師資水準？
2. 之前「相思林事件」中，基於生態維護與水土保持理由，要求郵政總局暫停施工、歸還校地，但如今東海卻要自己砍樹蓋大樓，恐難杜外界悠悠之口。
3. 學校對於系所的空間需求的判斷標準模糊不清，往往都是在事後作自我合理解釋，缺乏前瞻性的規劃。
4. 學校在現有系所未具社會週知的特色與專長前，不應擴大系所數目。同時應積極並提升空間使用效率，校園房舍空間使用如果完善，就不用蓋大樓。

（東行，民79.8.13）

但梅可望校長仍提示：校園教學使用空間不夠，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勢在必行（東行，民79.9.3）。

⁹² 如同後面章節所述，「相思林事件」前後綿延數年，同個時段又在相思林地上發生「綜合大樓事件」，甚至也有人稱1999年的「118事件」為相思林事件。本文凡未特別說明，單稱「相思林事件」之處，即是指1990年的「相思林事件」。另以「第二次相思林事件」稱呼「綜合大樓事件」，「第三次相思林事件」稱呼1993-1994年間再度要求索回郵政總局相思林地的運動。

1991年6月出刊的《大度山》第10期，大度山社在社論中除重述劉坤體之前在行政會議中的意見外，並建議採取「公民投票」方式，解決興建綜合大樓與否的紛爭：

我們認為諸如此等重大校務爭議應透過全校師生「公民投票」的方式進行，以解決這種各執一詞的爭執與衝突，「公民投票」的結果便為我們對興建大樓的取捨仲裁，同學不但有意見參與感，校方亦可去決策專斷之嫌。

（《大度山》第10期：1）

1991年6月14日，甫就任的第三屆學生會舉行「綜合大樓公聽會」，雖然校方邀請多位校內教職員說明綜合大樓興建源由。但是持反對意見的學生，仍要求學校對校園要進行長期整體規劃。

第三屆學生會並透過《東海新聞》刊出校內學生對於興建綜合大樓的反對意見，除了劉坤體於行政會議上表達的意見外，也有學生從空間區位的角度提出批評，認為綜合大樓一旦興建完成，往後住在東別的學生其經常活動線將不超過圖書館，會導致學生經常活動區往西移動，構成「禮堂-圖書館-大樓-別墅」的生活圈，導致學生往西抽離整體校園（解構群，1991）。

也有學生建議建議在V大樓前小廣場蓋一中小型綜合大樓，以取代砍去相思林興建大樓的計畫，一方面V大樓拆遷不涉歷史建物保存問題，而且建物量體規模小，拆建所需時程快速，同時接近校園中心區，不會產生學生生活動線偏離的問題（護林者，1992）。

其中曾參與「東海是誰的？」論戰的郭紀舟，在1991年10月5日於《東海新聞》上發表〈東海的校園規劃〉，對自「新宗教中心」事件以來，頻頻發生的校園規劃問題進行結構性的剖析，認為東海校園空間結構的變遷，逐漸受到學生人口膨脹的壓力、校舍的不足、經費來源、國家教育政策等四項因素的影響，使東海逐漸失去創校時期原有的風貌。

郭紀舟認為校園規劃問題的解決，並不只是個景觀維護的技術性問題。大學教育的完成應要能夠培養公民具備草根民主實踐的能力，而台灣傳統的大學只是一座座「沒有學生的校園」。他建議東海校方應積極開放師生參與校園規劃決策的機制，擬定替代性（alternative）的校園規劃方案，以能在規劃過程中培養真正的公民。否則持續性的校園規劃問題，將成為東海校園中隱藏的地雷：

替代性的校園整體規劃，勢必繼續成為校園抗爭的主戰場，假如校園決策依然只是黑箱式的運作，透過權威單方面決定的事實，那麼被忽略發言權力的萬人師生，在得不到可以掌握的民主決策實踐場域下，抗爭的緊張關係勢必逐漸增加。

（郭紀舟，1991b）

借用柯司特的理論語言，郭紀舟將校園規劃與校園民主相互扣連，但在專業性的規劃與開放性的民主參與之間，其實仍有許多環節尚待釐清。這個釐清的工作，則將由新起的「濁水溪社」和異議性社團間的論戰來完成。

濁水溪社開啟戰端

綜合大樓的興建之所以會成為校內的公共議題，除了「相思林事件」的影響外，和人間、台研支持的經濟系學生蕭武昌，贏得第三屆學生會會長選舉也有關係。標榜「改革派」的第三屆學生會對校園民主、校園規劃問題的態度和異議性社團完全一致，並在行政會議上對校方決策提出質疑，積極籌辦公聽會、於《東海新聞》上進行專題討論等等，對校方興建綜合大樓的計畫造成極大的壓力。但是另一方面第三屆學生會的強勢作風，也引起校內部份學生的不滿。對立於異議性社團和第三屆學生會主張的學生聲音，也開始出現在校園的公共領域中。

1991 年間，有東海學生（主要是政研所的學生）創辦「濁水溪社」，同時在發行社團刊物《濁水溪》，針對第三屆學生會的施政主張，以及異議性社團的刊物內容與運動實踐進行強烈的抨擊。

例如：在 5 月間發生「獨台會事件」⁹³，各大學校內正針對調查局藐視大學尊嚴、迫害言論結社自由的事件展開批判的行動時，濁水溪社則貼出海報要求全校同學保持「理性客觀」，靜待司法審判。而在 10 月間發生「中知青黨部退出校園」事件時（參見第二節），濁水溪社也貼出海報表示支持梅可望校長讓「中知青黨部」繼續存在校園，並歡迎各政黨進入校園活動的主張。

對於校園空間問題，在《濁水溪》第 1 期中以專題討論「校園土地糾紛問題」，即創校時由於台中市府並未與民間交割清楚，便以贈與的名義把土地劃歸東海大學，造成東海和民間的土地糾紛問題。這是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首次有學生社團討論到學校的「地籍問題」。

而在《濁水溪》第 2 期中，則以 2、3 版跨版的篇幅，刊登〈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一文，在文章的開頭以斗大字體的引言，說明該社報導綜合大樓事件的立場：

邇近，學校爭議焦點的綜合教學大樓興建計畫。其決策過程到底如何？興建

⁹³ 「獨台會案」：1991 年 5 月 9 日調查局以涉嫌參加「獨立台灣會」為由，逮捕了廖偉程、陳正然、王秀惠、林銀福等四人，其中清大歷史所學生廖偉程更是由調查局幹員於清晨進入學生宿舍，直接將人帶走。事情發生後，全國各大專院校的教授、學生、學運團體立即對抓走的四人進行聲援。5 月 15 日，10 餘所大專院校約一千多名學生進駐台北火車站售票大廳進行數天的靜坐抗議。5 月 17 日，四名被捕的年輕人交保獲釋。5 月 20 日，在火車站靜坐的學生以各界聲援團體共 5,000 多人走上街頭，參加「反白色恐怖」遊行。

與否對東海將造成何種影響，以及學校未來整體發展計畫？我們以理性、客觀的角度，做了如下的報導（《濁水溪》第2期：2）

該文中認為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同學意見，大致可以分成四點：（一）興建綜合大樓決策是學校「黑箱作業」，未尊重同學意見，（二）興建綜合大樓缺乏長期、專業的規劃（三）綜合大樓位於於集水區，興建綜合大樓將會破壞相思林的水土保持，並嚴重破壞環境景觀，（四）興建綜合大樓乃因學校漫無目的增加學生人數，造成學校空間不足所致。

濁水溪社根據梅可望校長在1991年6月1日第108次校務會議的發言，以及訪問教務處課務組高主任，並表列出東海目前的教室使用率，指出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是為解決確實的東海教學空間不足問題。同時「綜合大樓」興建過程都經校園規劃委員會討論，提送校務會議通過，過程中有建築、景觀專業科系的老師擔任委員，並有學生會長、議長、生促部長等學生代表出席，並非黑箱作業。並轉錄訪問梅可望校長的內容表示：

兩年前，學生會長、議長皆參加討論，校務會議都有決議文怎麼算是「黑箱作業」？如此重要的事務，經過近百人討論，校長如何能黑箱作業？所以這些指責的同學純屬誤解。學校做事向來是公正、公開的，從來沒有哪一個人可以決定那件事，東海今日的校園絕不是偶然，而是經過精心規劃的，每件事我們都經過周詳的考慮，絕不是個人決定，希望同學今後能查明事實，再下結論，不要一開始誤解，而亂下名詞

該文中又訪問了景觀系主任以及豐原高中地理教師宋宏飛先生，認為相思林地旁的山溝平時並沒有自然流動的水，所以並不處在水源地，在該地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對生態平衡不致造成重大影響，且離現有教學區聯繫十分方便。

而對缺乏長程規劃的質疑，濁水溪社認為：

東海創校初期規模甚小，每年僅招收新生人數二百人，在創立前十年內學生總數僅八百人上下，後因大學在大學在平民化、社會化的衝激下，大學的「象牙塔」形象已成為被譏諷批評的對象，大學的大門已經不能不向大社會敞開，大學已被動或自動地對社會提供實用而迫切的知識，以作為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因此自吳德耀校長以來，東海大學的學生人數一直不斷擴張，因而必須積極興建新校舍以容納增加的學生。而近年來學校針對人數擴張，都設立有專門小組進行相應的校園規劃計畫的研究與設計，在經過多方考量後，認為在現時的相思林地設置綜合教學大樓，足可應付學校未來人數的擴展。可見學校興建新校舍的計畫，都透過一定的程序進行有系統的規劃。

濁水溪社認為第三屆學生會上任後，雖主動辦理公聽會，讓正、反意見能在

陽光底下進行辯駁。但是質疑興建綜合大樓的同學動輒對學校扣以「黑箱作業」的帽子的非理性作態度，則恐怕會讓校園成為惡質的政治競技場：

儘管對該案不滿意，或對該案的決策過程不滿意，皆必須道出你的理由與事實依據。否則今後校園有如政治惡質面的政治競技場每人不說理由與事實，即開始互扣帽子，這樣的校園會成為怎樣的狀況？

異議性社團的回應

〈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的內容完全針對反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學生的主張而來。在該文刊出後，異議性社團的成員立即以筆名「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在1991年11月18日發行的《東海新聞》上發表〈回應濁水溪「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一文--誰的理性？那一門子客觀？〉一文回應濁水溪社。

對於濁水溪社自我標榜的「理性、客觀的角度」，這篇文章首先舉出在「獨台會事件」以及「中知青黨部退出校園」事件時，「濁水溪社」一面倒的偏向黨國威權的言論，指出「濁水溪社」的報導不過也是某個立場的代言人：

如果我們很理性客觀的遵奉濁水溪社所提出來或秉持的「理性客觀原則」來面對，那麼結果或許會是很「理性客觀」的變成這樣…因「獨台會案」而被扣押的四人到現在還是很「理性客觀」的待在牢裡；而陳年惡法「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依舊會「理性客觀」的存在厚厚的六法全書裡。

（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1991）

對於濁水溪社舉出大量「理性、客觀」數字表格，強調興建綜合大樓的必要性，同時強調學生人數擴張，乃是為符合走出象牙塔，提供社會需求的高等教育發展方向，而必須進行的調整。這篇文章認為濁水溪社在這些概念價值的連結上，顯得過份簡單：

我們只要用膝蓋想想就可以問出這麼一大串問號：招生人數少就是象牙塔？平民化就是增加招生人數？向大社會敞開就是對社會提供實用而迫切的知識？大學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就是大學的實用性質？先就應然的層面上說，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濁水溪社」的同學們敢理直氣壯的一一說「是」，那我們只有用悲哀的眼神（同時搖一搖頭）來憐憫他們了

並批評濁水溪社的立論方向，明顯的將東海的發展抽離開整體台灣社會發展的脈絡，忽略其中隱含的結構性問題：

大學的變遷其實是與整個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息息相關的。就算他們可以辯稱，私立大學之所以不得不增加招生人數乃是因為得不到國家的補助而必須仰賴增加學生以增加學費收入以供財政上的維持。但是這個問題一方面牽涉到的

是國家的性質以及國家資源分配的合理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則關乎我們這個社會中「唯利是圖的」，「短視近利」的資本家…因此「濁水溪」社的以上論述之簡化、粗劣由此可見好幾斑。

而對濁水溪社指證歷歷表示整個「興建綜合大樓」的決策過程，事前有經過縝密的規劃和討論，並且有學生代表參與的說法。這篇文章也提出強烈的反駁：

東海有「校園規劃小組」，現在還有所謂的「四年發展計畫」。但是這樣就算得上有整體的發展計畫了嗎？我們是不是還應該考察「校園規劃小組」組成成員的性質？其在校園行政體系中的位置如何？對於校園規劃的落實措施有無最後，或至少最有力的決定權？對於教育是否有一個理想抽象的理念或目標（或至少是東海的創校理念）？或只是具有所謂的「專業的」技術能力？規劃內容對於學校的行措是有何影響力？其獨立自主的程度又為何？如果不去深入的討論這些問題，而只是很表面的告訴我們東海有一個規劃小組存在有所運作，那麼這是哪一門子的理性客觀，除非，理性客觀只是「膚淺」的同義複詞而已。

由對於學校的規劃程序、發展計畫以及參與成員的結構性限制的質疑，這篇文章同時回應了濁水溪社認為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學生，亂扣「黑箱作業」的帽子的指責。「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或說異議性社團）認為，濁水溪社以一種專家的、純技術取向的思維，認定「綜合教學大樓興建案」乃是經過專家的規劃，不是「黑箱作業」的看法，是把技術、專家給中立化、神聖化了，遮蔽了其中隱藏的權力結構問題：

這正如同這幾年爭議頗為劇烈的核四興建計畫一樣，政府所持的觀念是，因為這是經過眾多專家學者所規劃完成的，你們一般老百姓不懂得這當中許多的技術問題，所以接受並閉上你們的嘴巴吧，我們自然會好好的去進行的。

…同學所指的「黑箱作業」即是在這種無能力決定政策的情況下所發的一種指控。專家學者一定可靠嗎？他們一定就是在完全自主的狀態下本著專業的技術訓練來做抉擇的嗎？技術這東西一定是完全中性的嗎？沒有任何的價值或利益為前導嗎？這些都是值得再三商榷的。

認為濁水溪社以專業、程序為由，隔絕了一般同學參與決定影響其生活的重大決策的可能：

雖然一般同學比起這些專家學者而言較缺乏所謂的「專業素養」，但是，作為一生活於其中的「行動者」而言，卻有十足的理由可以來決定接不接受這對於我們所生存的環境將產生影響的重大政策。我們不反對在政策的擬定及形成之初的確必須由少數的一些人來進行計畫，但是政策或計畫是否應該實施，要作甚麼樣的修正，甚至是否應該要全案推翻重作計畫，卻不是應該只由少數人--不管他具有何種代表性--來作最後的決定，而應付諸全校同學的表決。

總之，「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認為，專業技術不能做為阻止人民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理由，同時也不能忽略對技術與程序背後的價值和社會結構的反省：

換句話說，在實際人類生活中，專業或技術只是其中一小部份，並不是全部，也不應該由它來做判準。人類使用技術只是要用來增進生活，如果反倒讓它來決定一切思考與選擇，倒過來宰制了人，那麼，這絕對是一種異化。

綜合大樓論戰的意義

從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提出「權能區分」的主張，就可以看出關於民主與專業的關係，是一個民主政治實踐中極為尖銳的問題。而在西方於二次大戰後，從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對工具理性與納粹大屠殺的關連性的批判，到 60 年代以後生態運動對科學技術的反思，都可以看出這個問題牽涉層面的複雜。在「綜合大樓論戰」背後，其實是這一個深刻的問題意識在起作用。不過和「東海是誰的？」論戰不同，濁水溪社似乎缺乏孫治安那樣深厚的理論素養與反思能力，以致在「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浩浩蕩蕩數萬言的陳詞後，竟沒有再繼續辯論下去。

但是連結郭紀舟對「替代性校園規劃」的呼求，異議性社團在「綜合大樓論戰」中表達出專業技術並非民主討論的屏障，在技術考量之前還有關於價值理念的反省，而這不是由貌似客觀中立的數據分析能夠決定的，甚至數據本身可能就表達了某種有待商榷的價值、意識型態。專業技術的考量容易把問題分割、孤立，但東海大學不是大度山上的孤島，東海的問題反映了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對校園規劃問題的討論、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的質疑，並不著眼在個別單一學校的困境上，更重要的是由此延伸出對大學教育的目的以及台灣社會結構的反省。

這裡面暗含一種米爾斯所謂的「社會學想像力」的運作，企圖透過連結「整體社會結構的知識」與「較長時期的歷史分析」，將個人的「苦惱」轉化成為「公共議題」。在這樣的討論轉化過程中，個人才有可能變成民主社會所需的積極、主動的公民，而不會成為消費社會下的「快樂機器人」，或是「民粹政治」下為妒恨所動員的群眾（趙剛，2000b）。

東海學生對校園空間問題所開展的一系列運動，因此不是無理取鬧，更非小題大作，而是培養具有批判意識的公民的批判教育學實踐⁹⁴。短暫的「綜合大樓論戰」開啓了校園空間運動豐富而積極的意涵，而其中關於大學教育的價值目標的反省，則在事件後期的文宣中繼續被討論。

⁹⁴ 參見本論文第十一章第一節。

第五節 第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後期）

1992年2月23日，東海大學董事會通過周聯華牧師再任董事長，校友阮大年博士接任校長。阮大年校長是東海化工系第三屆校友，是東海首位具有校友身分，並具法定任期限制的校長。這兩項特徵顯示著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對東海校務發展的影響，但也意味著他是在學校制度亟待興革之際就任校長。在1978年梅可望校長推動的校務改革之後，校友出身的阮大年校長必須帶領東海進行再次的改革，因此其任內一直為來自校園內外的重重紛擾所苦，特別是學生關於校園空間問題的質疑。龐大的現實壓力使得他成為行政會議記錄上，最常講「愛東海」的校長。而「綜合大樓事件」則是這位校友校長上任後，第一個要面對的挑戰。

烽火再起

1993年3月初，由於校刊報導即將在原本的相思林地上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搶救相思林」、「搶救東海精神」的呼聲遂再次在校園響起。人間工作坊、環生社等社團紛紛以海報、快訊等方式，針對綜合教學大樓的設計、規劃過程，以及校方獨斷的決策方式出批評。甫成立的台研社也張貼「文化戰報」，論述東海校園空間規劃的人文精神，並質疑校方的校方砍樹蓋大樓的決策過程，明顯背離創校之民主原則。其後辯論社、野鳥社、多媒體研究社⁹⁵等社團，也紛紛加入社團聯署，對校方的決策提出質疑。

3月9日，社會系、資訊系及化學系部份同學於全校升旗時，拉起「校方決策草率、不公開」、「先斬後奏，違反民主」等白布條以抗議校方堅持砍伐相思林，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的決策。社會系學生並於會場上散發「社會人聲明」，認為學生為學校之主體，關心並參與校園事務是學生的權利，學校重大事務以及校園規劃等決策不能專斷獨行。

3月10日，人間、台研、環生、東風、女研、野鳥、辯論、多媒體、長榮中學校友會等學生社團，中午於信箱間前舉辦「緩建綜合大樓，搶救相思林說明會」。會中重申緩建綜合教學大樓，要求學校公開決策過程的立場。甫上任的阮大年校長亦親自到場公開說明。

1993年3月11日，東海學生議會於良鑑廳舉行「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公聽

⁹⁵ 由於「綠色小組」等團體以紀錄片等「小眾媒體」挑戰官方主流的媒體，對當時台灣社會運動產生的正面作用，使得人間、台研的幹部亟思成立「小眾媒體社」（簡稱：小媒社）。但由於校方認為「小眾媒體」名稱太過敏感，因此後來以「多媒體研究社」之名成立社團。不過該社團於成立不久後即因後繼無人而倒社。感謝李彥旻提供筆者這個訊息。

會，並請建築系洪文雄副教授到場說明，但仍無法化解學生對興建該棟大樓的質疑。

3月12日，東海學生會邀請生物系林俊義教授，進行題為「從綜合大樓的興建談大學生應扮演的角色」的演講。

連署要求緩建綜合大樓的學生社團，共同成立了「保護相思林行動聯盟」，並於三月中旬及下旬邀請校建築系、社會系、生物系等系所老師及校內同學舉辦了多場的說明會，並在校內持續散發海報、快訊、文宣等進行宣傳。

3月15日，聯盟成員與「校園規劃委員會」洪文雄教授會談，3月17日，與阮大年校長會談。會中學生提出要求決策民主、公開校務方向、重視人文精神、建立「校園景觀保留區」等訴求。阮大年校長表示：「綜合大樓將是東海最後一棟規劃之外的『應急』產物。」

另一方面學生會和聯盟的學生，則發生劇烈的意見衝突。聯盟學生指控學生會以《東海快訊》形式散發佈不實言論，製造黑函，攻擊聯盟的行動。並於3月24日發表聲明，反駁《東海快訊》（以上過程記錄參見《人間札記》，第13期）。

3月16日，之前在社團刊物中支持興建綜合大樓，並質疑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學生是在亂扣帽子的濁水溪社，發行《濁水溪快訊》，呼籲「沈默的大多數，是挺身而出的時候了」。認為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學生社團，忽略了學生代表的角色定位，淪於情緒性的反抗，要求同學肯定阮校長的能力及識見，共同攜手為東海的未來團結努力（濁水溪社，1993）。

3月22日，阮大年校長於行政會議中表示，本校興建綜合大樓案，業經3月20日校務會議中詳細說明討論後表決，結果在場92位師生委員，有91票贊成，一票因註記不清作廢。認為學生「不顧事實真相，妄加臆測判斷，動輒抗議批評」的行為，是所有真正「愛東海」的人所不願見的。

但現場出席的學生議會議長鄧道鴻則表示：學生和師長對於「民主」的認知不同。同學們認為整個決策應由校園規劃委員會規劃後，提請校務會議決議，才符合民主程序。希望師長多去了解學生自治的運作，才能減少彼此認知上的差異（東行，民82.3.22）。

但差異恐怕並不只是對「民主」的認知而已，還包括了對整體大學教育的理念與發展方向的態度，當天出刊的台研社《思想枝》第3期，用這樣的文字描述了之前3月11日「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公聽會現場的狀況：

同學們蜂擁而致，準備了許多的問題要請益各「長」們。只可惜阮大年一開始說了一些話之後便離去了。只剩下他愛東海的詞句仍不斷流傳，以及專家長達一個半鐘頭的專業說明。從建築技術的眼光來說，專家總是有道理的，可惜

的是同學們反對的意見仍然旺烈，聽不下所謂專家的話語。

…同學繼續問道：好吧，東海到底將來要往甚麼方向走？是要教育甚麼東西呢？或是說，大學到底是要幹啥？同學硬是不從技術層次計算每一個東海學生要有多少平方公尺的教學空間，偏偏從教育的理念性的、原則性的角度質問，「甚麼是教育？」

…歷史縱使是弔詭的，但此次卻不止是弔詭，而是上下顛倒；是學生關心甚麼叫教育的理念，而不是辦學的人在思考教育的理念，當然更不可能要這些辦學者實踐其教育理念。由一個從不反省甚麼是教育的辦學者來教育已經開始反省甚麼叫做教育的同學，當然只好不斷強調要「愛」東海了，或者瞪眼看著學生在抗議，除了束手無策之外，恐怕便只能強調自己的苦處，以使用痛苦的臉龐博取學生的同情。一個大學，是學生在思考上走在前面，只好一切都相反過來，用頭在走路，而荒謬的用腳在思考（陳政亮，1993）

3月26日，「保護相思林行動聯盟」出版行動特刊，對校內同學再次說明對相思林的整體看法，以及反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的理由，並指出事件過程暴露的問題。

4月1日，聯盟舉辦「哀悼相思林說明會」，會中批判校方堅持得到教育部貸款，即使以草率決策來應急也在所不惜的作法。並有50多名學生從信箱間出發至相思樹林，在樹林間繫起黃絲帶及連署簽名白布條。

學生訴求：

一、建立法制化的「校園規劃委員會」：使校園規劃委員會之權利，能有法規之依據，避免人治色彩或淪為行政制度下的犧牲品。

二、落實民主參與之正當性：拒絕校方以專家治校之理由，剝奪學生自主參與校園民主之權利；且提升學生自治體制，確實監督學生代表，以免因其「疏失」而成為校方背書工具。

三、確定校務發展方向：公開論教育理念，重視創校理念，並對於目前扭曲的校務發展，提出改善、導正之道。

四、保留東海人文精神：成立東海景觀保留區，保留具有東海人文精神之建築景觀（廖敏達，1993）。

反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搶救相思林的行動在校園內引起很大的震撼，東海的畢業生郭映君在其小說中，略微描述了當時的景象：

任任（註：小說中的女主角）沿著相思林走，她趕上傍晚六點的選修課，意外發現相思林的樹枝上掛滿白色的長形布條，每隔數公尺就有一段，布條上寫著「祭文」、「吊唁生」、「還我相思林」的字眼。

天空泛著紅紫交雜的怪異顏色，任任好像聞到了暴風雨的味道，風吹動著凌亂的白布條，那樣簡陋，粗心地被懸掛，就像隨時能吹蓋到任任臉上的覆屍布，膽小多心的她頭皮發麻。

快走到了學校後門的時候，她看見五、六個男女學生坐在樹下，頭綁著白布條，模樣狼狽但神態嚴肅

任任不知不覺停下腳步，她想到這些學生是在抗議學校砍伐相思林的事，校方為了蓋綜合大樓，決定使用部份相思林土地（郭映君，1997：146-147）。

1993年4月14日，行政會議正式通過興建綜合教學大樓。

同年5月，綜合教學大樓正式動工。

1995年4月12日，行政會議通過新綜合教學大樓空間代號為「T」。

11月15日，行政會議通過依據綜合教學大樓捐獻人--經濟系賈培源校友及其服務機構花旗銀行之建議，將中間一棟命名為「家淦樓」，以資永久紀念嚴前總統家淦先生。

一曲相思夢未了

阮大年校長認為整個興建綜合大樓的決策完全符合程序，但和第一次「相思林事件」一樣，制度程序本身就是被質疑的對象。學生最強烈的質疑，來自於學校對於校園空間的發展，完全缺乏長期整體的規劃。事實上阮大年校長上任後，有感於整體校園規劃的重要性，在1992年8月即依建築系建議，成立「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小組」（參見第七章第七節）擬定整體校園規劃計畫，因此才會承諾學生：綜合大樓將是東海最後一棟沒有經過整體性規劃而興建的校舍。

但既然學校早已在進行整體性的校園規劃計畫調查擬定，為何「綜合教學大樓」不能等待「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小組」完成規劃報告後再行提案、動工呢？即使是純粹從行政運作便利的角度來思考，如此做不是可以有效降低學生對整個決策過程的憤怒與質疑嗎？這裡牽涉到伴隨興建綜合大樓而來的一筆教育部補助款。阮大年校長在面對學生的質疑時曾表示：

這是筆好不容易向教育部爭取到的補助，不趕快動工便會被收回去

（柳琬玲，1993.10.14）

在311公聽會上，負責報告的校方代表亦坦承搶建綜合大樓是為申請教育部補助款：

〔公聽會上〕專家說，其實他本來也不想蓋在相思林地上，而且本來對於校園長期規劃方案他也不喜歡此事，只不過阮校長為了申請教育部的一億九千萬

經費，一定要趕在六月開工，所以不得不趕出一份「假的」設計圖，交給教育部以便應急，同時東海教室實在不夠用，於是要有一個地方能夠「假的」給教育部，又能「真的」對東海的教學空間有所幫助（陳政亮，1993）

支持興建綜合大樓的濁水溪社亦於《快訊》中表示：

從資金運用的考量而言，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方案之確定馬上可以為東海籌集一筆來自教育部一億九千萬的貸款補助。阮校長做此一方案之決定，必然從整體角度盱衡擘劃。某些犧牲是必將有的，但若所得的回報數千甚或數萬倍於東海大學，公平正義必將因少部份的犧牲長存而永新（濁水溪社，1993）

雖然東海大學師生咸認校園景觀乃是學校的重要資產，但是為了學校未來的發展，東海校長必須犧牲整體的校園規劃以保住教育部的補助款。這裡面顯出校園空間問題和台灣高等教育資源分配間的關連：

由於私立大學之學雜費受教育部所設定高低標收費標準之約束，又難以向教育部申請到足夠的補助，使得私校辦學時財務上捉襟見肘。遇上不具教育理念之堅持的校方行政人員，便往往大鑽旁門左道以圖一時之高枕無憂：擴大班級人數、加設系館、加設夜間部、設立各種名目之進修班。這些非有遠見之教育家所能採取的應急步驟，往往隨之而來的是教育品質的迅速惡化。

（柳琬玲，1993）

因此在「綜合大樓事件」中，除了延續第一次「相思林事件」中對決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批判外，還加上了對於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功利化、實用化的批判。侯念祖於「綜合大樓事件」結束後，將兩次發生於相思林的校園空間運動中，校方對外的說詞進行對比，認為其中顯示出整體高等教育功利化、實用化的趨向：

民國六十九年，東海校方根據「私立學校法」的規定法，將這塊的土地，以相互贈與的形式，換得了郵政總局的四千萬，而這四千萬的，是計畫用來興建「中正紀念堂」。

第二次的相思林保衛戰則是發生在今年（註：1993）三月，由於校方宣布將在「靠近」相思林的土地上，興建綜合教學大樓——事實上，也將有不少相思林將因此而消失，憤怒的東海學生為此舉辦的第一場的說明會，阮大年校長也到場作了說明，他不解的問：為什麼大家每天吃豬肉就不會怎樣，一但樹被砍了就哇哇叫，這次相思林變成了豬肉。所以正如同人為了需要吃豬肉一樣，相思林為了蓋房子的需要，就應該被砍，相思林的存在是為了死亡。

…現在讓我們細細的品味這兩句話這樣的觀念：「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無使用價值」，「為了吃豬肉的需要可以殺豬，為什麼為了蓋校舍不能砍相思林呢？」

…另一方面，賣地所得的收入其用途是用來興建龐然醜陋的「中正紀念堂」。於是我們終於可以明白，原來是否與教學直接相關，或是否具備使用價值，這兩者的判準乃是在於：是否是明顯可建的校舍硬體建築！而另一句名言——「相思林等於豬肉」，背後所隱含的意義，不也正是這樣的一個邏輯嗎？而隱身在這樣的邏輯之〔後〕的，竟然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實證主義的、功利主義式的思考模式。

…當然東海的問題絕不只是東海的問題。在功利化、實用化與物質化傾向強烈的台灣社會，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不都是具有這樣的性格嗎？大學的發展重商工而輕人文，重近利而無遠見，這等教育的養成過程只是為了訓練出一批批的專業人員，而精神的、全人的教育理想，也只有到焚化爐裡的歷史課本中去找尋了。

（侯念祖，1993，10月）

如同第三章所述，東海創校時期的校園規劃，被認為體現了創校時的教育理念。因此對校園空間問題的討論和關於學校未來發展方向、高等教育的價值意義等問題經常是結合在一起的，這在70年代《大度風》、《東風》等校園刊物的內容中就可以看到。在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結束後的學生刊物內容中，雖然有所討論，但主要仍是以對決策過程的批評為主。而在「綜合大樓事件」中，關於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方向的反省開始成為重要的課題。

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學生要的不只是一座美麗的校園和更多的決策參與權力，他們喊出和60代歐美學生運動類似的聲音——要求一個全新的高等教育。而這樣一個對未來的呼求，在東海特殊的歷史情境下是弔詭地以對過去的懷念而表現的：

這一串動人的信念，而今安在？當初創校的人無論有多少宏大的理想終究也是擋不住時代的洪流的；因為在今日的任何一所大學裡，沒有任何一所是如此做，包括東海在內。今日的大學要培養的是有技術的人，是要徹徹底底的白領階級，要造就能為各大公司所用的人，而非能夠投入生活的人，今日的大學愈來愈發展，規模愈來愈大，就愈像是一所超級的補習班，或是職業的訓練所；而也不管訓練所中有多少談情說愛的故事，但是學生只是要學習如何降格去適應社會，而不是學習如何去創造新的理想。

東海創校的精神宛如昨日之夢。

有些學生們卻仍然往此夢想艱苦的挺進。

…如果說兩年前的保衛相思林遊行是學生對學校強悍的爭取：學生對於校內任何事務要有一個原則性的決策權的話，那麼此次相思林事件正是學生反省教育是什麼的開始（陳政亮，1993）

從 1990 年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發生後，不斷頻繁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變成連東海大學校方都無法否認的事實。甚至必須在《東海大學發展白皮書》中，以專門章節討論「校園規劃與土地利用」問題。但校方對這些事件成因的解釋卻是非常簡單的：

東海校園林木扶疏，人文氣息濃厚，根據統計，第一志願選擇東海的學生，百分之四十是因為本校具有美麗的校園，學生對校園景觀的規劃也因此有較強烈的意見（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1998：38）。

但是考察東海師生強烈的校園景觀認同感的形成，其實是在 70 年代關於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的爭執的情境中產生的。同時在 90 年代頻頻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中（所謂「較強烈的意見」），最晚從「綜合大樓事件」開始就已跳脫單純維護校園景觀的目的，而指向對整體高等教育價值和方向的反省。從 70 年代到 90 年代，因著校園重大工程建設以及景觀變更而起的各項爭議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矛盾並不是校方或一般同學所想像的：「景觀 VS 發展」的衝突，而是對於高等教育理念的不同觀點，以及由此衍生的不同的校園發展想像的衝突。

阮大年校長上任後的第一場仗，就在對「高等教育是什麼？」的探問中落幕。然而相思林的惡夢並未就此完結，勝利的果實將要變成苦汁，讓往昨日之夢挺進的學生飲下...



第六節 第三次相思林事件

嚴格的來說，「第三次相思林事件」只是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的延續而已，不過學生和校友的反應一樣很強烈，使得郵政總局動工的期限又延緩了六個月，同時兩個事件中間又間隔著「綜合大樓事件」，因此被當成一個獨立事件看待。

無言的結局

1993年8月12日，郵政總局去函東海大學，表示將於近期內整地興建「電腦備援中心」⁹⁶，並於次日派員來東海勘仗界址。

8月26日，郵政總局派員自東海別墅出入口進入校內，砍伐相思林地。東海學生才發覺原來此二千坪林地在三年內未曾取回。

翌日，郵政總局繼續派工將該地樹木全部砍除。但報章媒體已披露此項消息，東海校內再度發起保護相思林的抗爭。

人間、台研、環生等社團於8月28日當晚組成「保護相思林行動聯盟」（簡稱保林聯盟），並發表「捍衛最後相思林行動宣言」，宣示號召同學收回校地之決心及追究校方失職造成林地被毀的責任。

8月30日，阮大年校長自美返國，經和交通部長協調後獲三項承諾：「1. 即刻停止整地施工建。2. 留一段時間供學校師生溝通。3. 未來興建工程讓本校參與規劃，以配合本校的景觀。」（東行，民 82.9.6）

8月31日，保林聯盟代表和阮大年校長見面。阮大年校長除向學生說明事情原委，以及校方絕不放棄「以地易地」之努力外，並保證今後學校絕對不再轉讓校產。

9月6日，社會學系系學會、東風社、大度山社等學生社團加入保林聯盟。東海大學校方則於行政會議中，要求總務長邀請訓導處校友會、學生會、學生議會等有關單位及師生代表組成「相思林事件專案小組」（後來正式定名為「校產保護及處理委員會執行小組」），研商處理辦法。另請訓導處及各院系導師，對學生對相思林事件之意見，多加關心與溝通，讓學生在「愛校」的前提下與學校同心協力，共商對策（東行，民 82.9.6）。

9月8日，周聯華董事長到校瞭解此事。

⁹⁶ 在東海大學和郵政總局完成「交互贈與」手續後，郵政總局原先是要在該片相思林地興建「水路轉運中心」，後來更改為興建「電腦備援中心」。

9月10日，「保林聯盟」北上交通部、立法院、東海大學董事會，針對相思林事件一案陳情。獲謝長廷、林正杰、余玲雅三位立委接見，表示支持，並決議召開協調會議。

9月15日，「保林聯盟」代表參加由校友林正杰立委召開的「東海大學相思林地爭議」協調會。校董、學生、校方行政人員、交通部、郵政總局及立委列席。會中郵政總局承諾停工六個月給予校方處理時間，並由教育部協助採「以地易地」或「以錢購地」方案解決。

9月20日，「保林聯盟」印行之《保護相思林行動特刊》出刊。

10月13日，人間、台研於校內演出行動劇：「舞·相思」，並於校內發起捍衛校地連署簽名行動。

次年（1994）3月9日，阮大年校長於行政會議中報告：對於相思林用地及聯外道路案，攸關本校利害，學校必定堅持立場，據理力爭促使取消，惟相思林用地產權已屬郵政總局所有，學校則須依據法、理、情，對方也能接受的方案來協調處理，希望全體師生貢獻智慧，不要有不負責任的批評或抗爭。會中並通過由總務處、訓導處同學生會、學生議會等舉辦「相思林郵政總局用地」收回處理情形之說明會（東行，民83.3.9）。

3月15日，東海學生社團認為和郵政總局約定的六個月期限已至，但是校方卻仍未提出任何償回相思林地的作法，因此在校內張貼「倒數計時」海報以喚起同學關注。另外學生議會期初大會時，則有資訊系議員吳錚等提案要求校方針對相思林處理狀況舉辦公開說明會。

4月1日，校方於校內舉辦說明會。會中總務長報告處理交涉過程中遇到的幾個困境：土地價格太貴、台糖配合度低以及郵政總局不願降低條件等。總務長報告完之後，資訊系議員吳錚表示，在當初協調會中郵政總局曾誠意十足表示願意成全東海，甚至關於土地面積、地點，都可以吃虧包容無妨，為何現在態度又轉變，百般刁難？總務長則表示郵政總局於法站得住腳，校方在交涉過程中也難以理直氣壯。

社會系議員柯汶昇則表示，郵政總局曾多次變更這塊地的用途，代表這塊地的有無對郵政總局是有彈性的，但對東海則是教育無可分割的一部份。這塊土地不能純粹以經濟價值做考量，國家應以情理考量，成全東海。

由於現場出席學生不斷要求學校拿出堅決的態度取回校地，總務長最後只能以無奈的態度，反問學生是否可以拿出具體方法來解決？這使得現場一位資訊系同學十分激動地表示：土地的解決應要求當時（十年前）賣地辱校的人來負起責任，誰在這段歷史中犯錯，誰就付出代價。他並指責總務長作為行政人員缺乏擔當，此段話引發兩方嚴重的語言衝突，最後總務長憤而離席，餘留現場

一陣錯愕（洪世謙，1994）。

由於東海始終提不出郵政總局能夠接受的方案，雖有校友、立委的斡旋、學生強烈的反彈意見，但最後郵政總局還是將該片相思林地收回。

8 月份，郵政總局開始派員在電腦備援中心用地清理雜草及設置簡易地界。並在 9 月間去函東海大學，表示將整理相思林用地，對建物未來之規劃會盡可能與東海密切協調配合。（東行，民 83.9.1）

為祭悼失去的相思林地，人間、台研、女研、東風、國樂社、民俗舞蹈社、口琴社、熱音社和攝影社等九個社團，在校內舉行為期一週的「相思林週」，表達同學對護林行動失敗的無奈與沈痛。並在 10 月 19 日由 20 餘名學生，塗綠了臉，身上穿著綠色塑膠袋，手持海報在校內進行化妝遊行開場。在一連串活動中，有為期一週的攝影社影片展，星期三的「東海今昔--幻燈片展」，星期四晚上的「東海巡禮--談校史」演講，以及星期五晚上的「相思夜音樂饗宴」活動。

1995 年 10 月 13 日，東海校方邀請郵政總局有關人員來校參加「相思林郵政總局規劃用地說明會」，以希望郵政總局各項規劃能配合東海教學、環境景觀、交通安全等因素。因有東海學生至現場拉起白布條表示抗議，甫上任不久的王亢沛校長於行政會議中表示，對部份同學的非理性行為至感遺憾！！

1997 年 2 月 22 日，中區郵政管理局「電腦備援中心」興建工程正式動工。

「銀貨兩訖」的迷思

從一次、二次、到三次相思林事件，參與運動的學生在試圖釐清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地提升他們對校園問題的認識：從聲討失職人員到要求更多決策權，提升到對整體高等教育發展的批判。不過從「第三次相思林事件」最後無奈的結局來看，在「相思林事件」背後還隱藏著公共性和商品交易原則間的衝突。

純粹從郵政總局的角度來看，相思林地的轉讓過程其實已是「銀貨兩訖」。在東海提不出對等、替代性的補償時，依據原先交易的契約將土地收回運用並無不可。這種對於商品交易和私有財產權的尊重，是資本主義社會運作天經地義的原則。不過問題是當交易涉及的是土地，而且是具有公共性質的土地時，可以適用這樣純粹的商品交易原則嗎？

在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發生後，《人間札記》第 3 期刊載的〈你的，就是你的？--從相思林事談私有制的侷限性〉一文中，已經初步的碰觸到這個問題。

毫無疑問的，假使站在法律的立場來看，我們在整個事件當中都是不合「理」的，根據民法 773 條，土地所有權之範圍及于土地之上下。也就是說，在現行

私有制這套制度底下，土地上的附著物是屬於擁有土地的人，而既然如此，相思林當然是隨著那兩千坪土地屬於郵政總局，所有權在於郵政總局，當然郵政總局有權將之處分，要將之砍掉或賣掉是郵政總局的當然權力。誰也管不著。

（陳政亮，1990b）

銀貨兩訖、等價交換的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如此的天經地義，無怪乎總務長會表示郵政總局於法站得住腳，校方在交涉過程中也難以理直氣壯。而學生只能憤怒的要求當年賣地辱校的人負起責任。在 80 年末期的社會氣氛下，挑戰不當的權力運用還算是容易的，但是如果要去挑戰資本的運作乃至商品交易的原則，則還是無法想像的。

當然在「相思林事件」中，「所有權絕對論」不是那麼暢行無阻。從校方和郵政總局間迂迴使用「交互贈與」的形式掩蓋實質的商品交易行為，就可以看出國家對此還是有所限制。在現代社會中國家經常扮演著（常常也是唯一的）制衡資本、商品生產關係對土地、勞動力、公共性進行破壞的角色。而郵政總局做為一個公部門的單位，當然更是要受到國家權力的節制。這也是為什麼在校友、立委的斡旋下，「相思林事件」可以取得三年的暫緩的原因。

但校園內的力量仍不足以要求國家以更積極的態度介入。從 90 年代的反高學費運動和東海的反工業區聯外道路運動來看，要求國家進行對資本運作、商品交易的干預，需要的不只是一校師生的力量，還必須結合其它的社會力量。但三年的保衛相思林的過程，證明了東海學生還沒有足夠的能力進行這樣深刻而廣泛的動員結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時台灣的社區運動也才剛起步，因此除了校友之外，在校園外是否可以找到這樣的社會力量結盟也不無疑問。

從三面埋伏到三方交戰

在「綜合大樓事件」和「第三次相思林事件」發生期間，圍繞著相思林還有另一場看不見的戰爭在發生，即「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

「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是自 1980 年以來，東海大學和台中市府間糾纏 20 餘年的老問題（參見第八章第二節）。但在 1993 年 3 月，由於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提報省都委會審議，要將原設定為綠帶的相思林區變更成 40 米道路用地，引起東海學生強烈的抗議行動。學生除張貼海報、散發文宣告知校內師生訊息外，並發起連署簽名活動，透過媒體對工業區聯外道路計畫表示譴責。

郵政總局、綜合大樓、聯外道路三個事件在 1993 年間同時發生，帶給「保衛相思林」的學生強烈的危機感，如若三個計畫都實現，則東海大學的相思林必將消失殆盡。

「二千坪相思林地換上高樓」

「聯外道路橫切過相思林地」

「綜合大樓蠶吞最後相思林」

這三大危機的夢魘壓著我們，而只有學生自覺力量抬頭才能揮散他們。

…站在愛校、護林、保地的立場，我們有著對大學教育精神的堅持，絕不向政治派系操縱的聯外道路計畫，和校方與郵政總局「建教合作」功利取向的腹案妥協（廖雅嵐，1993）

但另一方面「三面埋伏」的危機，也使得校方和學生的關係複雜化，而不像在「綜合大樓事件」表面上看起來那麼截然對立。學生的保林行動不論是針對哪一方，都會引起媒體輿論對相思林的關注，並將相思林的問題擴大化，這增加了在「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上，東海校方在制度內進行斡旋的籌碼。但同時反對聯外道路的聲音越大，保衛相思林的氣氛越強，學校必須收回郵政總局相思林地的壓力也越大，甚至「綜合大樓興建案」也有可能翻案，或者最起碼的，學生對校園規劃提出異議的正當性也越高。事實上圍著繞相思林地，不同的行動者各自有不同的計算，並在相互之間產生了非常複雜的關係（參見第八章第二節）。

1993年10月，內政部都委會審議，工業區聯外道路計畫遭擱置，使得相思林的危機暫時緩解。但同時因郵政總局砍除兩千坪相思林地，引發「第三次相思林事件」，並因學校開闢穿越東海牧場的聯外道路，毀壞畜產系學生的實習玉米田而發生「農牧場事件」（參見第七章）。真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經過五年的努力，還是無法挽回相思林的悲劇性命運。但在這數年驚濤駭浪的運動過程中，一個新興的力量在校園內逐漸成長，代表著近半數東海成員的聲音，挑戰著國家和資本的力量之外，另一個深刻支配校園的權力關係。

第七節 性別問題的發軔

東海女研社成立與「女研社海報事件」

東別地區環境問題的惡化，引起了對於校外住宿女同學人身安全的注意。長期以來只要每逢寒暑假，必會傳出有女學生在東別遭受性侵害的傳聞，雖然事件的女主角和地點總是無法確定，但類似的傳聞始終沒有消失。而在 1990 年間，89 學年度下學期開學之初，校內有女同學張貼海報，表示自己曾經在相思林中受到暴露狂的性騷擾，希望經過相思林的同學小心。其後夜間部的一位女同學失蹤，家長在東別貼滿尋人啓事，但是未有下落。這使得女性安全問題逐漸成爲校內重要的公共議題，間接地促使女研社誕生。

在女研社成立之前，校園內原來由東風社的幾位社員，加上人間、大度山社的若干成員，一起參與女性主義讀書小組，當中某些女同學有感於校園中一般的學術性、實踐性社團仍以男性成員居多，而這些社團雖以學術性、實踐性自居，但所關注的事物和焦點畢竟無法以女性爲主體；或貼近女性經驗來思考。另一方面也覺得校內的許多女同學，認爲具有較高的學歷和知識背景，可以使女大學生免於遭受社會上對於女性的歧視和限制，但是這種虛矯或不經意的自信心，卻經常成爲阻礙女性自覺成長，真正認識女性自身所處情境的最大阻礙。

有了這樣的意念萌發，幾位較積極主動的同學便四處奔走，籌辦女研社。社團一開始在命名上頗費心思，原先是使用像：「XY 社」、「兩性關係研究社」，最後決定定名爲「東海女性研究社」，成爲國內大學中繼台大、清大之後第三個成立的女性研究社團（邱炫元，1991b）。

女研社成立後，首先針對校內女性安全問題貼出一系列海報，這一系列海報共分四式：首先是在一張東海地圖上，畫出紅線區域，表示爲「危險區」，並提醒同學經過這些地方要小心，因爲這些地方多半燈光不明或較偏僻。其次貼出前述的夜間部女同學的尋人啓事，呼籲同學關心這件事。用「心情故事」的方式，描述校園內流傳的耳語，以凸顯女同學恐懼與焦慮。最後一份是女研社對全校同學及校方的訴求：

- 一、要求學校公布年來發生的事情及處理方式。
- 二、要求學校成立專責機構，並多設路燈及種種可以防止這類事件再度發生的措施。
- 三、女同學要學習保護自己，知道危險的地區以及所在，以免在暑假時，因爲孤立而發生不幸事件（東海女研社，1991）

這一系列的海報引起了學校激烈的反應，首先是女生指導室的教官和課外活動組人員擅自撕去海報（根據學生會章程，海報管理是學生會新聞部的權責），

接下來教官室以及訓導長先後約見女研社的成員面談。

校方指責女研社散布謠言。但女研社回應：這些根本不是女研社造的謠，而是在校園內流傳已久的耳語，同時：

校方以「謠言」來看待這件事，根本無法使我們心中的陰影消逝。我們不是要知道那是否為謠言，而是要知道怎麼辦：我們不欣賞校方迴避主體的解決方式

如果你想免於性暴力的恐懼，不說妳是希望「嚴加保護」或是「自力救濟」，至少妳應該思考一下：為甚麼是妳？為甚麼每一個女性都是性暴力的準受害者？

（前揭文）

因應校內性別意識的萌發，第三屆學生會新聞部邀集人間、女研、東風等數個學生社團舉行座談會，針對「女研社海報事件」以及校園中的兩性關係、性別問題以及婦女研究、女性主義及婦運的關係等議題進行討論。並根據討論的內容，於1991年10月5日出刊的第27期《東海新聞》中製作「女性主義--創造新兩性關係」專題。

女舍管理問題

《東海新聞》第27期的「女性主義專輯」中，有約略提到校園中以安全為前提，加諸在女同學身上的限制，特別是由女舍管理問題所顯現的「空間-權力」關係，但主要內容仍放在人身安全問題以及女性主義理念的闡述。

但在其後第28期《東海新聞》的「言論廣場」中，刊出了〈女指室王國〉、〈女子監獄--對女指室的一些意見〉兩篇讀者投書，對負責管理女生宿舍的女生指導室的作為進行抨擊。女生指導室主任劉麗華隨即在264期的《東海大學校刊》上發表〈也是心聲--答覆兩名女生投書〉回應。

由兩方的對話所引發，人間工作坊於第9期《人間札記》，刊出由社員陳雅芬撰寫的〈女舍奇譚〉一文，對女舍管理問題中顯現的「性別-空間-權力」關係進行系統性的闡述。

長期以來，對女指室的管理方式，怨聲載道，然卻未見具體的改變行動，細究其原因：「要接受保護就必須接受管理」的邏輯似乎成為隱忍不發的最大理由。

…女生的安全問題實際上是一社會問題，然掩蓋問題的的代價卻是由女孩們放棄部份自由及自我的道德束縛來擔負（陳雅芬，1992）。

文中對於女舍管理方式的批評，從原本讀者投書中對開鎖、親友留宿等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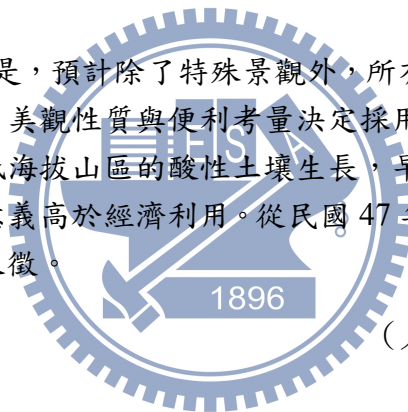
面的質疑，指向基進的要求廢除女舍門禁和點名制度。

門禁和點名制度，作為一道德觀對女生行動的設限已扼殺了太多女生開拓自我的可能，將其廢除將是個具體的開始，一個從「好女孩十一點後不出門」的道德制約中掙脫至獨立自主人格重建的開始。即便這些束縛宰制的突破仍然不足以保證女同學能完全免于父權社會的差別待遇與由之而來的可能傷害，但這是第一步——由女性推動改造不合理的兩性關係的第一步（同上）

在 1992 年 4 月進行的第四屆學生會會長選舉中，「廢除/修改女生門禁」也成為候選人重要政見之一。同時有學生以投書報社方式，揭露校內的性騷擾問題，其後在校方明快的辭退教師、對外說明後，事情獲得解決。而在一連串關於校外人身安全、女舍門禁管理、性騷擾問題的討論中，性別問題開始進入校園空間運動的議程。

第八節 結論

東海校園的基礎設計是，預計除了特殊景觀外，所有其餘土地皆種植樹木。然而基於考慮存活特性、美觀性質與便利考量決定採用相思樹種。相思樹耐酸性強，特別適合在台灣低海拔山區的酸性土壤生長，早年多為經濟利用，對於東海大學來說卻是景觀意義高於經濟利用。從民國 47 年種植以來，已經成為東海大學的特色與精神的象徵。



（人間/台研，1999c：48）

混亂與堅持

1991 年 10 月甫出版的《東風》第 60 期，以竹林七賢圖做為封面圖案，並在封頁附上說明：「竹林七賢/一羣在混亂的年代中/混亂地尋求堅持與執著的問題人物」

處於前後三次「相思林事件」中的東海校園，其內部衝突之劇烈恐怕不亞於 1970 年間的「校園轉型爭議」時期。以致於梅可望校長還責成相關人員，研擬制訂「輔導校園和諧與安寧實施辦法」、支持校內發起「重建自尊運動」，以提振東海人的精神和言行修養，合乎第一流大學生的標準。而阮大年校長面對校園內外的種種變局，只能不停呼籲校內師生要以「愛東海」的精神，共謀學校的和諧發展。

東海學生並未在混亂的年代中慌亂了手腳，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一場又一場地論辯中繼續堅持和尋求解答。在「東海是誰的？」論戰中，探求民主和公共的意義。在「綜合大樓事件」前期的論戰中，初步的討論專業技術與民主參與間的關係。而在「綜合大樓事件」後期的討論中，則重新檢討了大學教

育的本質。這群學生一樣被校園管理者視為問題人物，只不過孕育他們的並不是魏晉清談的玄風，而是大度山頭的東海風。

如同第三章所述，東海的校園空間論述乃是奠基在 70 年代東風社對校園轉型問題的一系列討論上，而透過「相思林時期」多次的衝突、辯論後，新的問題意識加入了校園空間論述中。東海的創校者曾以清楚而完整的構想，指引了這所學校的發展，並引導了日後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論辯。而「相思林時期」所提出的大量理念、論述，也對往後的校園空間運動起著同樣的作用。

對抗性的公共領域

東海的校園公共領域的發展，或可追溯至創校時期不甚成熟的榮推會的運作，東風社則在 70、80 年代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 1987 年至 1995 年間，可以稱為東海校園公共性轉變、深化的重要時期。言論自由的開放、各種學生社團的成立、大量校園刊物的湧現，以及公聽會、說明會等制度的建立，這些都促進了對於校園公共事務的討論。而自「新宗教中心事件」、「相思林事件」以降的校園空間議題，在過去歷史和當下現實的交互作用下，成為校園公共事務討論的焦點。

不過仔細觀察自「東海是誰的？」論戰以來的各種校園中的論戰，可以看出在當時的討論中，仍然存在一些侷限性。這種侷限性有部份是和台灣社會市民社會發展的歷程相關的。李丁讚曾在其研究中指出，由於台灣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市民社會是在威權體制的脈絡下，而不是市場（競爭）邏輯的運作下產生，這造成了台灣的市民社會強烈的政治性格。在 80 年代出現的民間社團要對抗的是整個威權體制，這種對抗基本上是善惡分明，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李丁讚，2004b：50-51）。

這種二元對抗的性格同樣出現在東海校園內對公共事務的討論中。在二元對立性格的作用下，論辯雙方所要進行的是集中最大的力量，吸取更多的資源以打倒對方，因此不存在在公共領域中進行相互對話、轉化、學習的可能。同時由於學生的行動是為挑戰既存權力機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威權體制與校園控制體系，經常以「客觀中立」之名掩蓋其實質的權力運作過程，或以「不理性、不客觀」之名否定學生的抗議行動，這使得學生的論述內容經常具有強烈的批判、解構的性格。例如在「綜合大樓事件」中，台研社社員洪世謙對學生會和校刊所做出的批判：

我們完全可以推翻學生會或校刊扮演公共論壇的角色。它必須做為意識型態的機械，發揮其顯性/隱性的教化、說服的功能；又有時必須宣稱自己做為校園公共生活領域之公共論壇。刊物有這樣功能上的分野與衝突，在媒體上扮演校園公共生活領域之公共論壇角色，徹底的崩潰了（洪世謙，1994）

由此對「客觀中立」的批判，更推向極致的是：

認知到媒體所謂客觀性的荒謬，對於校園刊物的思考，便應回到問題的最原點出發，所謂團結同心，破壞校園和諧皆是模糊問題的方法，我們不強調自己的客觀、公正，而強調自〔己〕對校園公共事務的反省，進而提出我們的批判，只有關心並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你才可能成為校園的一份子。

（同上，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在這段話中所顯現的問題是：如果沒有一個可以遵循，可檢驗的立場，人們要如何在不同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見、群體中進行抉擇呢？深受左翼思潮、社會運動理念影響的異議性社團成員，不可能會接受「多元主義」或「凱撒主義」式的解決方式，事實上這種解決方式正是既存權力機關合法性的來源。但在激烈的解構「客觀中立」神話的同時，不知不覺間連自己的立場也模糊了。

雖然異議性社團強調校園師生「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但在解構既有代議民主機制的合法性的同時，卻沒有發展出有效的解決校園師生內部矛盾的機制。在「相思林時期」由於當時反威權的社會氣氛，這個問題看起來並不嚴重。但隨著威權政治的轉變、校園管理體系的改革以及自主性群眾的出現，「如何化解內部矛盾」將成為下一階段校園空間運動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為此關心校園空間議題的師生發展出許多新的行動策略與論述，但是仍未能有效解決此一問題。



相思林的遺產

整個「相思林事件」從行動、抗議到失敗的歷史，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歷史記憶，變成了學生日後行動時重要的資源。「相思林時期」的歷史賦予學生介入校園空間問題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提供了理念與社會分析的論述武器，甚至還包括了行動策略手段的運用。

直到「相思林事件」落幕將近十年，在 2003 年「東海保衛戰」中，首先發起連署簽名的「東海精神團結陣線」，仍是以相思林之名號召同學加入捍衛校園的行動：

回憶起以前為了相思林奮鬥的諸多學長姐，今天的我們是否繼承了那份勇氣與榮譽？

但這個召喚的背後有著共同體想像的作用。如同前文所述，在「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發生過程中，包含著聲討共同體背叛者的情感，而整個「相思林事件」悲劇性的結局又強化了這個共同體的想像。悲劇性的情感與對共同體成員的召喚，在「第三次相思林事件」的文宣中就已混合了這兩個元素：

只因為在我們心裡，我們仍然相信同學們對於東海仍有不可割捨的深情；對東海的人文精神仍有不可抹去的堅持，仍有縱然在功利社會的價值觀的衝擊下，堅持為捍衛東海精神而的勇氣。

…請別忘了 東海是我們的東海

而權力是絕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我們不喊 誰喊！

我們不幹 誰幹！

（人間/台研，1993.10.5）

在不斷同義反覆的詞句中，「家」和「自己人」的身份認同被強化，某種又是哀傷又是激憤的情感也被渲染開來，需要的只是更多關於校園環境、歷史細節的描述，以填補這個想像的內涵。縱使異議性社團一直試圖很小心的避開這種社群主義的誘惑，但在動員「相思林事件」的歷史記憶時，共同體想像總是不時的會被挾帶進來。尤其當東海校園民主實踐的侷限性已日益凸顯，這種情感性的召喚就越發顯得強烈，但相對的也讓運動不知不覺的陷入了「地域主義」的泥沼中。

回首整個「相思林時期」的歷史，無疑地讓人深覺扼腕而嘆息，但這是一段悲傷卻閃耀著雷電般光芒的歷史，它照亮了後來東海的校園理想主義者的路徑，成就了一個有別於台大「自由之愛」的學運傳統。「相思林時期」悲壯的歷史使得原本做為水土保持、景觀維護之用的相思林被賦予新的意義。「相思林」代表著東海學生為捍衛校園完整性、追求校園民主的學生運動歷史，更象徵著在「自由及不斷尋求」的精神指引下，對大學教育的意義與實踐的不斷追問。

陳政亮在「綜合大樓事件」發生時，於《思想枝》上發表的那篇長文，或許早已為人所遺忘，但文章結尾那段鏗鏘有力的字句卻值得後人再三玩味：

大學不應再降格為對社會的一種適應，不應再屈從於工具與技術這個層次上的理性，而應當有一個更具創造性的人文空間；創造而非適應，批判而非盲從，改造而非臣屬；相思林正是此信念的象徵。

學生要它長久的存在於東海大學，靜看東海別墅商業氣息的媚俗，以及日益屈從於功利社會的大學教育；學生要它長久的存在，讓它永遠的質問：甚麼是大學教育？學生要它成為一個問號，讓所有人面對它時要謙卑的反省以及永無止盡的真理追求。

第七章 最複雜的訓練：校園民主重創時期

(1993—1999)

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 來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這是最最複雜的訓練 引向曲調絕對的單純

你我須遍叩每扇遠方的門

才能找到自己的門，自己的人

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 來到以前出發的地方

這是最後一個上坡 引向家園絕對的美麗

你我須穿過每場虛幻的夢

最後才能走進自己的門，自己的田



——胡德夫〈最最遙遠的路〉

在 1994 年東海大學確定無法從郵政總局手中要回相思林地之後，整個「相思林時期」也就宣告結束。其間工業區聯外道路開發案雖然仍覬覦著相思林，但校園空間運動的焦點，已從相思林地轉向校內各項重大工程建設：開路、景觀美化、新建大樓等各種不同的空間議題。

除此之外，在「東潮時期」所建立的學生政府體制其侷限性已經全然顯露，幾乎只剩下一個軟體動物式的空殼，承擔著「超大型服務性社團」的功能，甚至是上演校園政治鬧劇的舞台。80 年代學生運動中「校園民主」的實踐在此時遭遇到嚴重的打擊。

而由於校園自主性群眾的出現、議題的多樣化，使關心校園公共事務的學生必須尋找新的運動形式、策略、論述，以爭取同學的支持，化解學生群體內部的衝突。包括校解社的成立、《東海風》的出版，也可以視為是以一種社群主義

的方式，企圖透過召喚出「家」和「自己人」的認同，以激發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的手段。雖然這裡面存在著「運動美學化」或「政治美學化」的問題，但從激發公共參與的角度來看，這其實也是在進行校園民主的再造工作。我取「重創」的諧音具有的雙重意涵，將這段時期命名為「校園民主重創時期」。

這段時期以 1993 年 10 月的「農牧場事件」為開端，終止於 1998 年 6 月行政會議決議，不再於學費四聯單中代收學生會會費，正式宣告了東海學生會的死亡。由於「農牧場事件」和「德耀路大石頭事件」在議題的焦點、動員方式、論述上都和「第三次相思林事件」有很大差別，因此在時間上雖然和「相思林時期」有重疊之處，但我仍將其視作兩個不同階段的運動。

第一節 新國家、新教育、新運動！？

新國家建構工程中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1993 年李登輝完成對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收編整合（部份要拜「三月學運」之賜），開始自 80 年代末期面臨重重的正當性、合法性危機的國家機器進行大幅度的重構。新的國家機器在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體制的基礎上，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等數方面的「霸權計畫」，企圖製造全民共識，正當化新國家的統治基礎（台社，2003）。

在國家機器的文化霸權統合工作中，「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同黃麗玲所描述的，從 1990 年開始全台灣籠罩在一片「社區學」的熱潮中，從大眾媒體到地方社團，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都圍繞著「社區」的主題在發言，從基進的草根民主到保守的道德教化等各種不同的論述充斥著，形成了奇異的景象。

這股「社區熱」的形成來自兩個相反的動力，一個是草根的新興自治社區如雨後春筍般的冒起，抗爭型的社區因抵抗國家不當規劃或資本的入侵行動而形成組織，長期經營的社區蹲點及社區歷史重建則是以地方認同為動員基礎。另一個動力則來自國家的倡議，在新國家建構過程中為尋求新的文化意識型態以召喚不同的群體，國家領導以「生命共同體」意識做為民間力量的語言論述，同時以文建會的社區文化建設為主體，透過行政資源的分配，試圖在社區的議題取得領導權，建構新國家的文化主調（黃麗玲，1995）。

透過美學化的修辭以及國家機器資源的大筆灌注，社區總體營造連結了本土化的意識型態，雖然激起了民眾對周遭環境的關注，但也收編了在過去經濟主導的發展論述下台灣社會對文化/經濟、城市/農村發展失衡的不滿。

頑鬥主義與運動美學化

關於頑鬥主義 (Vandalism) 的討論，始於 1990 年「無住屋團結組織」的「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行動，這在當時引起了輿論及學界的討論。何方認為「無住屋團結組織」的行動充分表現了頑鬥主義的精神。

無住屋團結組織在論述策略上，相當特別的便是幽默及嘲諷風格，不論其運動形式及內容都充分表現出這一點。例如：該組織號召無殼蝸牛以電話干擾仲介公司、散布消息以降低房價等。讓我們先把這種策略的精神稱為「人民頑鬥主義」(何方，1990：74)

何方認為這種運動策略強調邊緣性、迂迴側攻，雖然具有「輕微的」恐怖主義意味，但往往也能帶給參與者一種逾越界線的快感。頑鬥主義的核心精神即在於對日常生活事物、文化事物的意義的爭奪，藉著集體頑鬥重新改變或詮釋意義，顯示原有意義系統的矛盾。

凡此種種均是利用語言意義的不確定性，以富創造性及想像力的論述實踐重新詮釋語言。在極致的頑鬥主義中，沒有任何神聖不可侵犯或不可戲弄的意義，也絕無任何骯髒不宜運用的意義。可是正由於這種策略（也可稱為「後保守主義」）的「六親不認」及「有奶便是娘」，也可能自我顛覆、解構，所以全然擁抱極致之頑鬥主義的團體並不常見。尤其是那些不斷累積、集中權力於一身者，為了晉身主流、正統中心地位，更不屑運用頑鬥主義（同上）

相較於何方對於「無住屋團結組織」行動中呈現的頑鬥主義風格表示肯定，趙剛卻認為這種運動的風格，有將「運動美學化」，迎合「中產階級式的壁上觀」的危險：

運動的參與者沒有一個輪廓鮮明的群體認同感，也沒有內部的社會溝通網絡，因此運動「動員」成功，也不過只像是戲劇的叫座。你不能說演員的動員能力很強，最多只能說媒體和宣傳配合得好罷了。而媒體的角色，在無住屋運動以往的大型的群眾抗議活動中，恐怕要比在其他社運的集體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還要重要（趙剛，1990：67）

而在學生運動中類似頑鬥主義實踐的則是劇場運動（或說行動的劇場化）

學運的劇場運動是指劇場成為學運的一種行動方式，它包含了劇團的戲劇表演直接成為學運的行動方式，及學運社團採用劇場的型式做為行動，學運中的劇場運動與藝術界的小劇場運動彼此是有相重疊的部份，但兩者間不能相互化約，做彼此的從屬關係（鄧丕雲，1993：234）

劇場運動在 80 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出現很早，在 1989 年 6 月 14 日，東海人間工作坊即曾在校內信箱間演出「重現天安門」報告劇，同年 9 月 27 日東吳大學蘇菲亞社在校內演出「歷史如何變成傷口」為大學法遊行造勢。其中 1989

年5月台大「反幽靈劇團」，為蔣介石銅像戴上高帽子的行動，還引起台大校方對參與的學生羅文嘉、許世杰記申誡處分。

1993年9月28日，TVBS無線衛星電視台第一道訊號發射，台灣本土第一個衛星電視頻道正式發聲。在TVBS的先導下，各個衛星電視台也如雨後春筍的成立，加上有線電視頻道的發展，政府對媒體管制的鬆綁，台灣的媒體發展進入一個多元的時代，媒體在社會運動實踐中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由此頑鬥主義、學運行動劇場化和一種媒體前的表演主義（performance）越來越分不清楚，以致於陳信行提出這樣的批評：

多少各個部門的社運工作者時時想著：只要媒體宣傳做得好，群眾就會被動員起來——就像當年野百合那樣。於是群眾越難動員，行動劇的道具就要做得更大、鏡頭前的畫面就要更精心設計，這樣才能對我們要抗議的政府部門造成壓力，進而獲得我們要爭取的政策改革（陳信行，2004：275）

教育改革與高等教育市場化

在90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中，「教育改革」是一個受到極高度社會支持的議題。1994年，由70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410教改聯盟」，於4月10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教育改造萬人聚會和大遊行，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等四大訴求。

強大的民間壓力，使得行政院立即在9月間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負責推動教育改革的相關事項。經過兩年的討論研究之後，於1996年12月2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其中和高等教育密切相關的部分包括：廣設高中、大學，發展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學府、公立大學法人化，多元入學方案等。

在這波民間和政府的教育改革聲浪中，極為強調「教育鬆綁」的理念，表現在高等教育上，則為強調透過運用民間資源，進行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擴充。此舉縮減了國家對各高等教育機構的控制，同時增加了現有大專院校在外部環境上的競爭壓力。為了力求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環境下生存，各大學對於外部評鑑的訊息變得十分敏感，並對於招生活動投注更多的心力。

以東海大學來說，在1997年1月9日，由於教育部公布補助各私立院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結果，東海大海在25所私立大學中院校中名列第九名。雖然教育部解釋該項排名只是對教育部補助計畫的執行成果的考察，但仍被外界解讀為教育部對各私立院校的評鑑，甫上任的王亢沛校長因此遭到部份校友的攻訐。王亢沛校長除對外表示對於評鑑標準甚難苟同，另一方面表示學校硬體建設受限很多，特別是硬體空間，希望以後大家多尊重專家意見（東行，民86.1.15）。

而在次年的行政會議上，王亢沛校長指示：國內大學急速增加，各校在招生方面無不卯足全力！本校為加強 87 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宣傳工作，除寄發海報至全國 26 個補習班及全國各大專院校。另請校內同仁設計網頁，於報紙媒體刊登廣告（東行，民 87.1.21）。這些都事例顯現了高等教育日趨市場化之後，東海大學在招生上所面對的壓力。

由於戒嚴時期國家對高等教育資源的低度投入⁹⁷，80 年末期的跨校性學運組織「民主學生聯盟」（簡稱民學聯），即曾在 1989 年 3 月間發起「補助工農子弟學雜費」的運動，以改革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鄧丕雲，1993：223）。

在 1994 年間，學生運動除了參與「410 教改聯盟」的行動外，並曾發起「319 反高學費運動」。各校學運團體於微風細雨中在教育部廣場前集結，要求教育部 1. 檢討學費政策，學費上限不得超過國民所得一定比例。2. 制訂單位學生接受教育資源之下限，以保障每位學生的受教品質。3. 補助下層階級的工農子弟學雜費。4. 公私立大學財務透明化，建立健全的會計制度（王維菁，1994）。

在政府的教育改革行動開始執行後，由於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影響，學費問題愈益成為學生運動的關切的焦點。在 1998 年間由輔仁大學的「黑水溝社」發起，數個公私立大學的學運社團組成了「反高學費聯盟」。並由於媒體報導有關行政院預備刪除原本教育部長吳京承諾撥給大專院校的十六億補助經費，由北部數個學運社團串連，於 3 月 6 日在台北新莊輔大校園內舉行「聖美善真--反高學費」⁹⁸遊行。之後並在 4 月 18 日以聯盟名義到教育部前抗議，4 月 30 日在行政院前抗議，並參與當年五一勞動節的工運遊行。

從此以後「反高學費」成為北部學運重要的跨校性議題。而在 2000 年之後，又增加了數個關注學費議題的跨校性學運組織。

文大美術系事件

反高學費議題的興起及在 1998 年後的持續推動，顯現了 90 年代中葉後，由於台灣高等教育日趨市場化所產生的結構性矛盾，除了高學費問題外，這個矛盾還表現在私立學校的教育品質、管理方式、教學資源等問題上。

這個市場化的力量，其實是在過去黨政國家機器管控校園的歷史經驗下，藉著民間要求「自由化」的聲音被帶進來的。「黨國」和「資本」兩股力量在此時呈現著互有消長但又相互勾連的複雜情況，由此觸動了大學校園環境以及學生

⁹⁷ 參見本論文第十章第一節

⁹⁸ 輔仁大學校訓為：「真善美聖」，參與遊行的學生故意把校訓倒過來念，暗示在教育商品化情境下，高等教育價值的倒錯。

運動議題的變化。這其中最具有指標性的事件，就是 1994 年發生於台北陽明山上私立文化大學的「文大美術系事件」。

1994 年 2 月，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生秦政德，因和同學發起成立「藝術法西斯」畫會，提倡自由獨立的創作精神，卻成了系主任整肅的對象。系主任聯合其他老師，讓秦政德在大四上學期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被迫退學。美術系學生在經過多次強烈抗議、爭取當事人權益不成功之後，於 4 月 28 日發動美術系罷課，在 5 月 5 日成立「小草藝術學院」，並於 5 月 25 日宣布接管美術系系辦公室。在學生長期罷課的壓力下，教育部開始介入調查，學業成績頗佳的秦政德才獲得平反，破例復學。當時的文大美術系系主任並因為這個事件而下台，震撼了教育界和文化界。

雖然因為教育部介入，使得長達 34 天的罷課行動在 6 月宣告落幕，然而文大校方對參與事件學生的處分（所謂「秋後算帳」！）卻不曾停歇。10 月時，文大訓育委員會決定：美術系學生林靜怡、中文系學生學薛淑麗因「言行不當，侮辱師長」勒令退學，使得學生發起校園公投進行反制。而參與行動的學生社團「草山學會」的幹部也分別遭到大小過不等的處分，並要面對校方隨時找理由欲將其退學的壓力。

1996 年，由於已遭「兩大過兩小過兩警告」處分的學生會長林志鴻，遭文大校方以細故記警告一支欲將其三大過退學。北部跨校學運團體「四校例會」⁹⁹串連中部東海、中興的學生社團組成「世紀末賭爛聯盟」，於 5 月 15 日前往教育部抗議。在高教司介入下，文大校方重新討論對林志鴻的退學處分，林志鴻最後順利畢業。

李重志曾於《野百合評論》上為文指出「文大美術系事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從歷史來看，文化大學的創立具有濃厚的黨政背景和政治任務，而不似一般私立大學有著相對開放的大學氣息。而在進入 90 年代之後，新的經營者引進高雄幫等財團資本經營學校：

對內不顧生態負荷力，大量招收學生，培養人脈，卻造成師資學生素質大幅下滑；對外則以威權時期殘留的性格挾帶資本的力量不時反抗教育部的監督，與黨政勢力既聯合又鬥爭，既依附又作亂。然而不管是黨領資還是資領黨，從黨校到學店，對學生而言都是獨斷一元的黨國資本主義意識型態。

（李重志，1994：30）

⁹⁹ 「四校例會」是在 1995 年間由淡江「福爾摩沙」、輔大「黑水溝」、東吳「蘇菲亞」、文化「草山學會」所組成的跨校性學運組織，以每兩週或一個月舉行例行性會議、組訓活動，發行內部刊物「聯合通訊」進行跨校性串連。後來又加入了世新「群際動態」、台大「狂潮」、師大「人文學社」等社團。「四校例會」曾參與反核、反高學費、私校法修訂、「504 萱花學運」等多起運動，是 1995--1998 年間北部學運非常重要的團體。1999 年後，「四校例會」運作停擺，部份成員則在畢業後繼續協助推動「反高學費聯盟」的運作。資料來源：《聯合通訊》合訂本，人間/台研工作室檔案資料，前輔大「黑水溝社」社員張菊芳提供。

這種「黨國」、「資本」力量交錯的痕跡，流露在整個「文大美術系事件」的過程中。秦政德被惡意退學，及學校對參與學生的秋後算帳，顯現了威權時代黨國教育的暴力。而教育部介入為秦政德、林志鴻等人的平反，顯現了「自由化」的力量對「黨國教育」的挑戰。黨國的力量在「自由化」的過程中逐漸讓位於資本的力量，或者更糟的，藉資本的力量借屍還魂。

從舊（男）學運到新（女）學運！？

文大美術系長達一個月的罷課行動結束後，陳光興於《島嶼邊緣》第 10 期中為文指出，「文大美術系事件」在台灣學運發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大美術系「小草學院」的建立是學生運動史上的轉捩點，不是與政治權力與虎謀皮，而要發展出自主性的學運形勢，將學運從政治議題拉回校園民主，企圖改變不均衡的、不民主的師生權力關係。這種具體的實踐象徵著社會運動在學生運動場的中的再出發，為人民民主社會抗爭注入強心針。

（陳光興，1994：3-4）

從陳光興的這段話來看，「文大美術系事件」意味著從 80 年代發展起來的台灣學運，其戰場開始由中正廟移向各個學校校內，新的矛盾來自於校園內各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不再只是對抗威權政治的幽靈。而在這過程中大學的體制改造與校園民主將會是核心的議題，換句話說「文大美術系事件」象徵著整個「野百合」學運模式的死亡。

陳光興並在文中語帶樂觀地表示，由「文大美術系事件」及其後的「522 女性騷擾大遊行」活動來看，女性議題表現出遠較主流學運更多改變校園師生關係以及和校外社運團體結合的可能，如此看來，新（女）學運不無可能逐漸取代舊（男）學運。

不過陳光興的〈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一文發表後，立即遭到「文大美術系事件」參與者的批評：一方面從參與者和運動策略來看，草山¹⁰⁰上的抗爭行動是否能以性別二分邏輯思考，不無疑問。另一方面，從文化大學的學運歷史來看，遠在「三月學運」之前，「草山學會」等社團就汲汲於華岡房價、私校學費...等校園經營議題，並提出大學社區生態主張，只是媒體和觀察者們都從未掛心這些「貓狗小事」。「文大美術系事件」其實可說是校內異議學生團體長期對校園經營與催化的成果，因此並不存在新學運與舊學運的斷裂（小草包，1994：34）。

¹⁰⁰ 文化大學位於台北陽明山上，陽明山舊稱「草山」。

第二節 農牧場事件

我們的玉米田不見了！？

1993年10月21日，東海畜產系學生發現他們位於牧場的實習玉米田被怪手破壞。經追查之後發現是校方「為便利東大附小家長接送子女」，要在牧場開闢一條約8米寬，700公尺長的聯外道路。由於實習玉米田為畜產系二年級學生，於修習「飼用作物學」課程時種植。校方雖表示已經過校園規劃委員會和行政會議詳加討論，卻完全沒有考慮到學生的「玉米田」，讓他們數星期的心血被怪手摧殘，因此引發畜產系學生強烈的不滿。除貼出海報抗議外，10月22日及26日並有約30至40名學生以身體阻擋怪手進行新闢道路工程。校內的異議性社團也貼出海報聲援畜產系學生的行動，譴責校方再次破壞校園民主的行為。

10月27日，正為「工業區聯外道路」和「第三次相思林事件」而煩惱的阮大年校長，於行政會議上表示：為突破校園交通瓶頸，解決目前車輛壅塞問題，特自企業講座崗哨處沿乾河溝西行繞鹿舍南下至農牧場牛舍，開闢一條長約700公尺的道路。此案經校園規劃委員會詳加研究規劃，並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不意日前動工時卻又發生阻撓事件。

曾騰光訓導長表示，對極少數學生不顧校園倫理、亂發黑函、擅貼海報、傷害學校行為感遺憾，認為對於事件發生之源頭應予檢討、澄清，對蓄意滋事違犯校規之學生決議法議處，絕不寬恕。

但出席行政會議的法學院高承恕院長則認為：受社會環境風氣影響，學生抗爭事件時有發生，但極端偏激不講理性的學生實在少之又少，在師道和學校立場言，對此類學生雖然應予多加關心與溝通，卻也不必疲於奔命，而更應將心力專注於提昇學術水準，學校建設，及廣大師生之服務與利益等多方面。同時東海是一所具有特殊性格密度高的小社區，易於以訛傳訛，散播謠言，為消弭及處理此類事件之發生，建議學校除了平時應建立多種溝通管道外，也宜定時提供正確的資訊（東行，民82.10.27）。

針對「農牧場事件」，東海學生議會在11月5日的臨時會中，通過兩項臨時提案：1.校方在行政會議未對本案進行討論、決議之前聯外道路工程立即停工。2.立即對此事召開公聽會與校內師生進行溝通。

學生議會在11月8日將臨時會提案呈送訓導處後，並於11月10日由議長陳奕祥、畜產系議員張傳聖出席學校行政會議說明提案內容，並要求學校針對提案進行討論（東行，民82.11.10）。

11月15日，東海校方於波錠廳召開「農牧場闢路事件」溝通說明會，出席師生代表約百餘人，與會人士雖對學校開路的目的已有瞭解，但對開路技術層面上尚未產生共識（東行，民82.11.24）。

11月19日，校方再次針對「農牧場事件」召開說明會。學生議會與畜產系學生，雖提出修改原案部份施工細節的要求，但牧場道路的工程仍持續進行。而學生受破壞的實習玉米田，則在經過數週劇烈的爭執後，由學生自行於牧場另覓土地重植作物了事。

自主性群眾的出現

據根據「農牧場事件」的參與者張傳聖¹⁰¹表示，在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畜產系學生表現出很強的自主性，以「這是我們系上的事情」，排拒外人的介入。因此人間、台研等社團雖然十分關心，認為這是自「相思林事件」以來的校園規劃問題的延續，但只能透過畜產系轉哲學系的台研社社員洪世謙，以及學生議會的提案間接的提供協助，在行動上十分低調。主要都是畜產系學生在校內張貼海報，並在學生議會的協助下，透過各種管道向學校抗議。

幾乎完全沒有運動經驗的畜產系學生，必須在行動過程中自行摸索，面對各種人際、派系的衝突、學校行政單位的口惠不實，釐清整個行政決策過程以及開路的理由。張傳聖認為雖然整個過程十分艱辛，卻也讓畜產系學生在過程中獲得學習和成長。

鄧丕雲認為，三月學運之後校園草根群眾的大量出現，為既有的學運團體帶來新的挑戰。由於這些草根群眾自主性高，會形成自己的行動方式，因而和學運團體間又有著微妙的關係。「農牧場事件」可說是這種自主性群眾行動的現象在東海的表現。這種現象其實在「相思林時期」就已經出現，但在「農牧場事件後」表現更為明顯：

1996年5月20日，東海女研社發起「新520W.C.學潮」，包括了全校廁所評鑑、行動劇、廁所觀摩等活動。20日當天並在綜合教學大樓前表演「憋尿超人」行動劇，以突顯校內女廁問題。

1996年5月25日，東海政治系舉辦「總統大選後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學術討論會時，會場外有政治系學生靜坐抗議。抗議學生將寫著「要學術、要知識、不要填鴨」，「要真大師，不要假教授」的布條鋪在地上，並向記者表示「政治系以前擁有的博大精深學術殿堂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拉關係、搞人情的教授」等等（東行，民85.5.29）。

¹⁰¹ 感謝張傳聖接受電話訪問。

1996年10月，由於總務處決定科技路禁止通行機車，校內研究生反應激烈，要求學校暫緩執行，待召開公聽會後形成共識方案再予執行。總務處起初表示拒絕，而後在研聯會、學生會的要求下，於10月29日晚上七時，在V104教室召開「研究生車輛通行證問題座談會」，校長和總務長均出席與研究生做面對面溝通（東行，民86.10.29）。

1997年9月，由於東海大學新生人數膨脹過快，加上行政單位對新生報到率估算錯誤，造成女生宿舍不足106個床位，以致發生部份中部地區新生於報到時被強迫退宿事件。二十三個系學會會長對學校處理方式表示不滿，遂聯合學生議會要求學校妥善處理被強迫退宿的新生的問題。學生議會於9月24日，學生會於10月8日分別舉辦公聽會，要求學校說明，陳述解決方案（東行，民86.9.24）。

在東海校園的公共事務討論中，開始出現更多元的聲音，而不再像「東潮時期」、「相思林時期」那樣，依循著「國民黨 VS 改革派」那樣的軸線呈現的二元對立。

異議性社團的難局

做為80年代台灣學運先鋒的台大，曾經發展出80年代學運的第一個抗爭策略--「事件化理論」，認為在校園戒嚴體制下，一般學生無法清楚認識校園結構中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所以必須製造事件，形成與體制的衝突，以突顯結構的不合理，由此來喚起校園群眾對問題的關心，進而達到改造不合理結構的目的（鄧丕雲，1993：51--54）。

至少在東海大學，1993年之後的校園狀況，則可說是對「事件化理論」的反諷。現在不只學運社團或少數基進份子在製造事件，連一般的學生都在製造事件。這固然實現了當年部份學運團體「遍地烽火」的期待，但也為學生運動在校園內的實踐帶來新的難題，

這些獨立的自主群眾的出現，除了台灣社會環境的改變之外，異議性社團之前對於校園體制的衝撞，也產生某種示範作用。但是異議性社團慣常把問題討論深化、行動基進化的實踐方式，又容易讓同學感到卻步，不願和其合作。雖然在跌跌撞撞的過程中，學生也可能慢慢弄清楚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但也容易把問題零碎化、個別化，或是在壓迫無法忍受的時候，「靜坐」、「遊行」宣洩一下了事。

女研社與性別議題的出現，更突顯了即使在基進的校園行動者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單純的反國民黨、反威權、反體制的要求，是無法應對新出現的眾聲喧嘩的情況，即使每個聲音存在時間可能只有五分鐘。異議性社團必須

尋找新的實踐方式，一方面有效的連結、深化各種個別、偶發的事件，另一方面擴大校園群眾對反體制行動以及公共事務的參與。

1994 年發生的「德耀路大石頭事件」，顯示了異議性社團對這問題的思考 and 嘗試，不過它也證明了學運團體最大的問題其實是他們自己。

第三節 德耀路大石頭事件

還我大學路！！

1994 年 1 月 19 日，行政會議決議通過：為紀念吳前校長對本校之貢獻，將自中正紀念堂前至蔣公銅像這段路命名為「德耀路」(東行，民 83.1.19)。

1 月 28 日，東海大學第九次董事會議，蔡順福董事提臨時動議，表示為表彰前校長吳德耀先生對東海的貢獻，提議將本校中正堂至行政大樓停車場段道路(原名大學路)，命名為「德耀路」，此案獲在場人士通過。

4 月 17 日，東海前校長吳德耀先生病逝，使得現任校長更積極於「德耀路」的更名、美化工作。

6 月中旬，第 12 屆建築系校友孫宇立先生，來校討論捐贈「東海人」雕塑一事：

孫宇立表示早在兩、三年前，即與同屆的吳清邁、張大平、黃沂成三位校友，共同設計完成一件連底座高約三公尺，名為「東海人」的青銅雕塑，其並藉抽象形式、符號來詮釋東海的校訓——求真、篤信、力行。孫宇立指出，「東海人」的素材——「銅」能散發出溫馨、親切的質感；而抽象的造形則代表一種精神，而非具體形象；「東海人」應是包括過去、現在及未來一脈相傳的優良傳統。吳校長逝世後，四人即商議將此雕塑作品捐贈給學校以紀念吳校長…。

(東海風：118)

總務處藉機探詢請孫先生為德耀路做景觀設計的可能性，之後孫宇立與楊奉琛兩人於 8 月間來校實地勘察，提出設計理念、構想和設計大綱。

9 月 1 日的行政會議通過孫、楊兩人之設計構想及設計大綱，並通過成立景觀設計協調小組。同年 10 月 9 日開始施工，並於 10 月 23 日完工。在 10 月 30 日東海三十九週年校慶時剪綵、奉獻。整個「德耀路」的更名、美化工程，就在 10 個月的時間內定案、討論、完工。

東海學生原先只對工程中暫時置放在校門口的大石頭感到困惑不解，待景觀工程結束後，整個「大學路」(德耀路)的景觀變化，造成視覺和心理上劇烈的

衝擊。長的像義大利麵，名為「東海人」的雕塑，完全看不出和東海的關連，路名的變更與沿路擺設的各色石頭更讓校園師生覺得突兀。校內學生社團開始張貼海報，對德耀路的景觀變更工程提出質疑。

同時阮大年校長曾在「綜合大樓事件」中，保證未來重大工程必先辦公聽會說明。學生社團認為整個大學路的路名、景觀變更過程中，校長並沒有遵守承諾，於是再度發起新一波的校園空間運動（《采風》第三輯：138-139）。

11月7日，東海學生議會召開期中大會。學生議會議長邱宏忠因在10月9日參與行政會議時，未能對大學路更名及購買巨石一事提出質疑，造成該案目前在校內喧騰不已，自認有負同學託付，未能善竟監督學校行政的責任，因此向議會及學校請辭。議會秘書長劉維鈞也與議長同進退，遞出辭呈。學生會會長林佑憲亦在期中大會中，也以未能為替同學爭取權益，向在場議員及全校同學道歉。

11月9日，阮大年校長於行政會議中表示，「德耀路」更名、景觀設計工程，都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決策過程也分別刊登於校刊上，並未見諸異議，待竣工落成之後，卻又引起部份師生不滿與指責，深感做事難為！但仍希望校園師生在愛校的前提之下，彼此以愛心、理性、尊重、寬容建立校園之和諧，發揮團隊精神，一致為東海而努力（東行，民83.11.9）。

11月10日中午，由東風社、人間、台研、女研、客家等五個社團的學生，發起「彩繪大學路」的行動，將擺設在德耀路沿線的石頭套上塑膠袋，再準備粉筆、噴漆，讓經過的同學，在塑膠袋上噴漆，或以粉筆直接在石頭上塗畫，以表達抗議。部份學生並以粉筆在地上寫字，要求校方把大學路還給師生。而螺旋形的「東海人」青銅雕塑也被套上塑膠袋，噴上「愛用保險套」五個大黑字。由於時值學生下課時間，有許多路過學生均參與彩繪行動表達意見。不過也有學生對彩繪活動表示負面看法，雙方並當場辯論起來，但整個活動過程尚稱平和（中時/自由，1994.11.11）。

11月11日晚上，有學生自行在校園內各個角落噴漆，工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夜間部大樓等建築物以及校內蔣公銅像，均被以藍色顏料噴漆、塗鴉，使校園遭受畢業校友口中「創校以來，最大一次的噴漆破壞」。

由於前天才剛進行彩繪行動，校園內有人批評係主辦單位所為。發起彩繪行動的學生社團立即緊急貼出海報。對於以噴漆破壞校園景觀的作法予以譴責，同時澄清噴漆與這些社團無關。東海學務長廖勝雄，則表示相信不是發起彩繪行動的學生所為，並指噴漆事件是「沒品味的惡作劇」。

翌日，有社科院學生自行購買粉刷工具，將被塗污的校園恢復原狀（中時/自由/台時，1994.11.12）。

在校園內一片譴責的聲音中，未參與彩繪行動的另一異議性社團--大度山社卻表示聲援與贊同「1111 噴漆事件」中自發性彩繪各個學院的行動。

該社社長黃同霖對媒體表示，身為一個學生組成的主體，自發性彩繪應受到保障，校方一味威權式的審美觀及霸權心態，基本上是一種違反民主、潮流的過時觀念。

他指出，校園做一個學術研究及生活空間，其環境景觀與建築模式本就應由生活在此一空間的師生一同決定，所以當校園景觀均只操控在少數師長手中，學生就有權自發創造一種屬於自己的校園景觀與校園建築模式（台時，1994.11.15）。

但發起彩繪行動的人間幹部經調查後，發現「1111 噴漆事件」其實就是大度山社成員所為，並立即貼出海報指明噴漆者就是大度山社，與「彩繪大學路」行動無關。此舉造成人間/台研和大度山社兩造之間劇烈的衝突。

11月18日，東海學生會在V104舉辦「德耀路公聽會」，包括東海董事、學務長、總務長等師生共兩百餘人一起參與討論，會中達成共識，由學生會廣徵各方意見彙整之後，委請校園規劃小組與道路原設計人孫宇立溝通，變更設計。

校園規劃的再反省--東海是誰的？

從「新宗教中心事件」以降的校園空間運動，都是針對校內大型建築物的工程而起，「德耀路大石頭事件」則是首次針對環境景觀工程而發的運動。事件發生後，阮大年校長再次強調一切程序合法，希望師生秉持「東海是大家的」的精神，共謀學校未來的發展。

但對參與抗議行動的學生來說，如果東海真的是大家的，那為何這個「家」的路名、景觀變更，不能尊重實際使用者的感受，不需經由使用者的同意，而是僅憑贊助者的意向？更讓學生憤怒的是，校方曾以爭取教育部經費為由搶建「綜合教學大樓」。但在高喊財政困難的同時，如今卻要花費近百萬進行毫無意義的景觀設計！？

這裡面反映的是，在台灣高等教育環境逐漸變化下，市場或捐款人的力量對於校務發展的影響。戴曉霞引用美國的研究指出，在過去數十年來，由於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影響，捐款人透過饋贈來影響美國的大學，使其改變決策和調整優先順序的情況屢見不鮮：

捐款人代表的是社會的需求，他們所重視的是大學的績效(accountability)，這和學校所堅持的自主未必相容。使績效和自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的主要原因在於，大學的主要捐款來自少數大額捐款人，而且這些捐款項多有指定用途。

（戴曉霞，1999：249）

由「德耀路大石頭事件」看來，相同的矛盾也在 90 年代的台灣發生。即便捐款者是校友，並贈送象徵「東海精神」的公共藝術作品，依然無法掩蓋其中蘊含的結構性的衝突。而在這次事件發生後，對於捐款者對校園景觀變更影響的關注，開始出現在東海學生心中。

例如：1996 年「綜合教學大樓」完成後，根據「東海大學捐款答謝辦法」，校方依捐款者建議將中間樓層定名為：「家淦樓」，並加裝金字。立即有學生在「家淦樓」懸掛布條，並貼出匿名海報諷刺批評學校的捐款命名辦法（大學報，1996.3.9）。

學生議會議長楊琇雁也於行政會議上發言：

同學們均歡迎並感謝外界對本校之捐贈，但大樓之正名，應以學校主體考量，以不影響整體景觀考量為原則。

不過校友聯絡室陳瑞洲主任隨即表示：

此係依據本校募捐辦法所定，不可失信於人，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請同學多能瞭解學校立場，也請學生會、學生議會對同學們多加宣導（東行，民 85.2.28）

在「相思林時期」關於「東海是誰的？」的問題，曾引發校園刊物上激烈的論辯。而在「德耀路大石頭事件」中，學生以彩繪石頭的行動，再次發出了相同的提問：到底東海是誰的？

美學的對話：公共藝術與民眾參與

在「彩繪大學路」的行動中，學生們用垃圾袋、塑膠袋包裝石頭，以在上面噴漆或塗抹的方式，來凸顯視覺景觀被破壞問題，間接暗喻著這些了花了上百萬的金錢購買的石頭有如垃圾。許多路過的同學欣然的拿起油漆刷、粉筆，在雕塑上或地面上寫下他們的不滿與質疑，加上現場的抗議布條和海報、傳單，深刻的挑戰了這個雕塑的公共藝術的地位。

乍看之下「公共藝術」這個詞彙是矛盾的，因為藝術（就像德耀路的雕塑所展現的）一向是被視為是非常個人、難以被公眾討論、理解的事物，這似乎和「公共」的精神有所違背。不過西方藝術理論家蘇西·蓋伯利克(Suzi Gablik)認為，這種視藝術和外的事物完全無涉的觀點，其實只是現代主義藝術的表現而已，而非藝術的唯一可能。

蘇西·蓋伯利克在其《藝術的魅力重生》一書中，對現代主義的藝術提出批評：

現代主義的特徵是它讚美藝術完全的自主性，以及它所展現出與社會聯結的意味。這種至高無上的特殊性和分離性是由藝術家浪漫的（自我）放逐和保持一種叛逆、抽離以及敵對社會的生活所彰顯。(Suzi Gablik, 1998: 5)

她認為現代主義的「隔絕」，並非是藝術表現唯一的可能，藝術同樣可以透過有意識的和觀眾一起創作和關懷我們是如何與別人相連，創造一種社區的感覺。經由將對話包含在創作的元素中，藝術作品可以變成創作者和觀眾間的「有彈性的界面」(同上: 169)。而這種強調對話、溝通的精神，正是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所念茲在茲的。

從蘇西·蓋伯利克的觀點來看，由校友製作象徵東海精神的名為「東海人」的作品，和真正生活在校園裡的東海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反而是學生為了抗議校園景觀遭到破壞，而在原本的作品上進行的彩繪、留言的行動，因為有著對話、溝通的內涵，而更具有公共藝術所要求的公共性。「彩繪大學路」這個另類的藝術創作行動，激起了師生對於校園景觀的關注，關於私立學校的捐款人的權限等問題的反思，成為東海校園公共論述的養料。

在「德耀路大石頭事件」發生四年後，校解社的社員做出這樣的總結：

在剔除了大眾與藝術品之間的藩籬後，雕塑物所能提供的價值是否仍止於純視覺上的欣賞，是否仍只是所謂的貴族藝術，刻上深奧難懂的標示牌而已？亦或會有其他諸如人的行為活動、地標性的建構等文化因應而生？雕塑物的座落的環境是否相得益彰？人們對這樣的公共藝術能不能發生互動進而視她為生活中的一部份？我們認為唯有真正融入當地的精神，並且由民眾參與的地景設計，才算得上成功的公共藝術（《采風》第3輯：146）

而部份畢業校友對整個「美化」景觀工程成果的印象，仍然是負面的：

十二點整，任任坐在校方刻意擺置的醜陋石頭上。

大學路上的路燈突然熄滅，兩旁的建築和高聳的松樹，成了徒具輪廓的黑影怪物（郭映君，1997：143）

十年後，東海學生已淡忘大學路的原名，而以德耀路之名稱呼這條上下學的必經之途。學生們多半以「義大利麵」或「螺絲釘」等暱稱，來認識位於道路盡頭的公共藝術作品，卻很少有人注意到放在作品正面，一般通常會有的解說作品意圖、創作者、捐贈人的碑文，始終是空白的。

「五四衝突事件」¹⁰²東海版！？--1111 噴漆事件

¹⁰² 「五四衝突事件」：1988年3月，由於立法院通過違憲的教科文預算，當時的跨校性學運團體「學生刊物編輯研習會」（簡稱：編研會），決定針對這個議題舉行活動。但「編研會」內部

據參與「德耀路大石頭事件」的人間幹部徐文彥¹⁰³表示，「彩繪大學路」的運動策略的提出和規劃，主要是由當時社團的美術系成員周仲芳和張蕙貞進行的。現場執行時除了發起行動的學生社團成員外，也有相當多的美術系學生參與。會使用這樣的策略，是因為在這之前人間/台研推舉的第六屆學生會長候選人吳錚¹⁰⁴，以 75 票極微之差落選。為了爭取更多校內同學的支持，因此採取較和平、藝術化的運動策略，以引起同學共鳴，為參選下一屆學生會會長鋪路。

「彩繪德耀路」的行動引起校內的好評，曾參與過「相思林時期」多次校園運動的徐文彥表示，這是他印象中社團進行過的運動中，校內師生反應最正面、最多人支持的一次。

這並非意味著參與「彩繪大學路」行動的學生，只是在進行一個無害的藝術展演而已。根據當時參與者之一，台研社的美術系成員林聲洲¹⁰⁵表示，由於美術系館內有很多石雕工具，因此行動之初並不排除類似敲掉石頭、打碎作品等更激烈的行動，噴漆當然也在考慮中。只是發起彩繪行動的團體希望可以透過持續的彩繪過程，和校園師生對話，慢慢擴大與加深對象的質疑。

不過大度山社突如其來的舉動，使得整個行動嗑然而止。雖然校園噴漆的舉動和「彩繪大學路」的行動，在論述和策略上有連結性，但「1111 噴漆事件」發生後，發起運動的學生首先擔心的是會引起校內同學負面的聯想。事實上噴漆所造成的效果是很有限的，當第二天社科院部份學生自行購買清潔工具，將校園回復原狀的時候，這個行動的正當性就已被群眾否定了。但發起運動的學生也完全不知道要如何繼續下去。只能對外發表聯合聲明，指責大度山社的行為是在破壞學校公共討論的空間：

對於大度山社所主辦，導致的學院噴漆行為，我們認為，私人、隱密、情緒化的噴漆行為，無法營造一個校方和同學討論的共同空間，而這樣的方式，也無法聚集同學的意見，達到共同參與的目的（彩繪大學路發起社團，1994）

這樣的詞語看似義正嚴詞，但其實和事件發生之初阮大年校長要求同學以愛心、理性、寬容、尊重的態度建立校園的和諧，只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差距。撇開大度山社做為異議性社團的一員不談，狂亂的噴漆不也代表著校園同學的另一種意見嗎？雖然也許是一種「不理性」的意見，但在歷次校園空間運動中的學生意見又何嘗被歷任校長視為「理性」過？更遑論在「彩繪大學路」行動之

的台大與「民學聯」（民主學生聯盟）的學運份子，因為運動路線問題發生爭執。最後由於編研會中未參加「民學聯」的團體，看到自己學校的名稱列在民學聯舉辦的活動中，但卻未獲事先的告知，因此聯名發表聲明，表示拒絕參加民學聯在 5 月 4 日舉辦的活動。因為衝突是因 5 月 4 日的活動而起，故稱為「五四衝突事件」。鄧丕雲認為「五四衝突事件」象徵 80 年代台灣學運整合的失敗，並形塑了持續到 90 年代，台灣學運的自我認識，即「台大 VS 民學聯」、「台大 VS 非台大」的學運派系史觀。（鄧丕雲，1993：192-204）

¹⁰³ 感謝徐文彥接受訪問。

¹⁰⁴ 感謝人在美國的「人間鬥陣」版主吳錚，對本論文給予的支持和鼓勵。

¹⁰⁵ 感謝林聲洲（阿洲）於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訪問，以及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我的精神支持。

初，發起社團內部就已經在考量採取更激烈的行動的可行性。這裡暴露的是在異議性社團內部，不同的群體和個人之間的不信任，使得原本可能相互協力的社團，變成口角相向，怒目以責。也讓向來反對科層/父權管理的人間/台研，忽然間變成了校園「和諧」、「安寧」的守護者。

「1111 噴漆事件」宛如當年 80 年代台灣學運的「五四衝突事件」的東海版，都意味著學運團體內部整合的失敗。對於性質相近的學運團體之間，反而很難以合作的原因，鄧丕雲歸咎於台灣學運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小團體性格」：

台灣的學運團體是在各校園中自主產生的，雖然它們之間有著高度的同質性，但在各校的區隔下，每個團體是不同的，而且並沒有互屬關係。剛萌芽的學運團體在各校中都是絕對少數，因此小團體的性格相當濃厚，內部的凝聚力高，對外的排斥感也強，一般人很難打進學運團體的生活圈中，由此團體認同感的強烈遂成為團體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有這種認同感，才能在孤立的處境中尋得歸屬感，也才能在校方的壓制下繼續生存（鄧丕雲，1993：201）

「1111 噴漆事件」造成的衝突，雖然和自 198 年東潮分化以來，人間和大度山社在人際關係、意識型態、運動實踐上不斷衝突的歷史有關，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相同的背景下獲得理解¹⁰⁶。由於 80 年代台灣學運源起於控制嚴密的校園，核心小團體的領導方式成為突破這種控制行動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這種領導方式一直在學運中沿用下來。前述台大學運「事件化理論」行動策略的提出，也和這種小團體領導方式有關。但當行動不再成為禁忌，學運團體和自主性群眾的數量增加時，小團體的領導就會出現問題。而過去小團體領導方式形成的「小團體認同」，則阻隔了更進一步的討論和合作的可能。

當學運幹部試圖努力爭取更多自主性的群眾加入行動的時候，卻發現最大的阻礙來自他們自己，這無疑是種強烈的諷刺。但緊接著在「科技大樓事件」中，

¹⁰⁶鄧丕雲將的觀點提出後，曾遭到三月學運其他成員的強烈質疑。例如周奕成批評鄧丕雲：「因為只用心理歸因，不做政治主張、意識型態的考察，所以只能看到派系鬥爭，看不到路線歧異。因為只用權力途徑，不做歷史的、結構性的觀照，所以只能理解線性因果，而不能理解各種因素的辯證關係。」（野百合通訊，1993b：29）

楊添圍更具體化了前述周奕成的評論，他批評鄧丕雲的觀點：「完全忽略了運動經驗對學運團體的影響…以派系來看學運的確是便宜之計，而且永遠可以自圓其說，派系既可以是爭執和矛盾的原因，同時又可以是結果。因為，以派系來看學運，可以省略當時台灣政治經濟環境對社會運動乃至學運的影響。可以忽略社會運動在運動過程中，經由參與和抗爭而引發的反省和再教育作用。」（野百合通訊，1994a：22）

筆者認為大度山社和人間工作坊之間長久以來的衝突，其實也有著意識型態、運動路線和實踐經驗上的差異的基礎，需要做進一步歷史和理念的考察。但由於筆者的時間和篇幅有限，無暇對相關人等進行訪談，同時對於大度山社方面的文獻資料取得甚少。另一方面專就「德耀路大石頭事件」和「噴漆事件」的衝突來說，意識型態、路線上的差別其實比較小（雖然不可否認的，過去互動的歷史經驗的確影響了他們對對方行動意圖的理解），因此在此只針對「小團體性格」這個團體動力的結構進行考察。事實上這個事件也顯示了，當整個台灣社會都在呼求「公共領域」、「公共化」的同時，關於學生運動內部的「另類公共領域」其實還是有待形成的。

新的挑戰又來臨了！！

第四節 科技大樓事件

興建科技大樓「異見」多

1994年6月8日，行政會議中，徐武軍總務長報告，已委由張學敏建築師事務所進行科技大樓新建工程之預定地之規劃。

1995年1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成立科技大樓籌建委員會。

1996年2月7日，總務長於行政會議上表示科技大樓興建地點，原則上通過為在校友會館北面附近地區。

科技大樓規劃案在媒體及校刊上披露後，人間、台研立即於校內貼出海報，指責校方再次忽視同學意見，進行草率，欠缺整體性的規劃。第七屆學生會亦在媒體上對科技大興建安提出批評。

4月17日，由於前一天聯合報報導，東海學生會認為「科技大樓藍圖欠缺遠見」。王亢沛校長指責學生會發言不實，有損學校形象，希望日後對外發言能先求證理解。並表示校內溝通管道暢通，經常舉辦各項師生座談會，同時學校各種重要會議，也均有學生代表參與。若學生能據理直言，充分發表意見，學校一定會尊重（東行，民85.4.17）。

5月1日，校長於行政會議上表示，董事會通過支持學校興建科技大樓與學生宿舍。總務長表示，經勘查後仍認為以校友會館以西、德耀路以北一段地較為理想，後續工作是將基本資料送建築師規劃設計後送回專業委員會、校建會、行政會議、公聽會後成報董會核准後興建。校長裁示，仍請科技大樓興建等重要工程，在適當時機開說明會以增進共識（東行，民82.5.1）

校方對異議性社團行動的質疑並不意外，但在人間、台研的海報貼出後，理學院六科系系學會也在校內貼出海報，支持科技大樓的興建，並以相片、文字說明目前理學院狹窄擁擠的空間，表示興建科技大樓確有其實際需要。

東海大學理學院六個科系系學會昨日首度在科技大樓興建爭議中發表聲明，學生表示，目前東大理學院的教學空間十分擁擠，部份實驗室被迫轉入地下，物理系會長趙國勝指出，以該系為例，雖擁有教育部獎助的儀器，但受限

於空間不足，系上學生明明是同班同學，還得分組輪流進實驗室學習。

趙國勝說，有部份社團學生認為科技大樓興建規劃過於草率，但學校已經校務會議多次討論，才達成目前共識，他希望持反對意見的同學能將心比心，傾聽校園不同聲音，讓大樓早日完成，讓理學院學生不必再忍受空間不足之苦。

（自由，1996.5.6，第11版）

5月7日，東海召開「校園規劃暨環境保護委員會」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興建科技大樓，新建學生宿舍地點及相關事項。

5月9日，人間、台研兩社於校友會館旁，校方預定興建科技大樓的建地上，為現場的相思林繫上黃絲帶，並向來往同學散發傳單，表達希望校方重視校園整體規劃一致性，不要再急就章的進行校內大型建設的意見。同時指出科技大樓的規劃欠缺妥當考量，可能學生交通動線、體育用地以及校園綠地等都可能造影響。

1997年5月4日，「校園建設暨環境保護委員會」通過「科技大樓」基地配置及建築設計，該建築大約為地下二層，地上六層，總造價約二億元，施工期兩年，如一切進行順利，將於10月中發包，校慶日破土動工興建，89學年度開學即可完成（東行，87.5.6）。

參與式規劃概念的提出

在「科技大樓事件」中最大的挑戰是理學院六系系學會的海報和對外聲明。在「綜合大樓事件」中雖也出現過濁水溪社這樣挑戰異議性社團的意見，而引發了一場短暫的筆戰。但和濁水溪社以「理性、客觀」自居，又和黨國校園控制體系有著曖昧的關連不同，理學院六系系學會最起碼在形式上代表了學校六分之一同學的聲音，而除了「科技大樓」問題外，他們對異議性社團的政治理念與實踐方式也沒有任何意見。如果採取「相思林時期」對待校方和濁水溪社的態度，無異是在製造校園學生的對立。這對一直期望凝聚學生力量，對抗不合理的校園體制的異議性社團來說，當然是不容許的現象。

為了化解理學院學生的質疑，人間/台研合作編印了《校園規劃，停、看、聽》手冊（台研/人間，1996：9-10），並在4月間於校園中散發。手冊中首先說明社團質疑「科技大樓」興建的立場，並非反對校內建設，而是反對粗糙的規劃過程：

我們無意反對任何校園內的建設與開發，只是在東海這有限又不足的資源裡，更嚴謹且宏觀地加以規劃。在這當中。尤其不應忽略與學生溝通的過程以及缺乏理念的粗糙規劃品質。

我們相信，任誰也不願柏油、鋼筋、水泥！毫無止境及規劃地充斥在東海自然、綠意的景觀中吧！！（台研/人間，1996：1-2）

手冊中接著將自 1987 年「新宗教中心事件」以來，一連串校園規劃的爭議事件予以歷史性的敘述。以凸顯「科技大樓」並非單一、個別的事件，而是整體、長期的東海校園空間問題的一環。而促成這樣的問題持續的原因，除了自「相思林事件」以來強調的缺乏長期、整體的校園規劃計畫外，這本手冊認為校園使用者的聲音未在制度設計和決策過程中被重視，也是重要的原因：

而做為校園空間使用者之一的學生，意見似乎從未被重視過。

「校園規劃委員會」成立了這麼久，除了成為每次校園規劃爭執中的擋箭牌之外，究竟提出了甚麼長程的計畫和思考？尤其校園景觀的任何變動，同學往往是最後知道的。

在資訊不充足，討論不充分的情況下，所謂「公聽會」也不過是校方的「說明會」、「說服者」而已。同學的失望和無奈，最後只有以「反對興建 XXX」來抗議，校方動輒指責部份同學「太過激進」、「意氣用事」，但是在抗議聲的背後，目睹校地日漸支離破碎後的悲憤，校方卻視而不見！（台研/人間，1996：14-15）

文中首先質疑了「專家至上」的環境規劃迷思，並強調「使用者參與」的重要性：

有一個流行的迷思，認為環境的規劃應該交由專家和行政人員來決定，一般人缺乏足夠專業來處理規劃問題。我們認為規劃工作的確需要專家來執行，但，這不應排除過程中使用者的參與。

只有空間的使用者，才能真正瞭解其需要；只有空間使用者，才知道什麼是「美麗」、「獨具風格」的設計，專家的技術，在於配合使用者的需求，而不是意見的主導（16）。

並用略帶浪漫、感性的語氣，提出「參與式規劃」的願景：

我們有一個理想，我們提出了一個和現在完全不同的校園規劃程序。

這個理想中，沒有流於形式的公聽會，而是從東海的回顧中，引導大家表達出自己心中未來東海的面貌。

這個理想中，沒有閉門造車的專家，而是不停的聽取、收集意見的專業諮詢者。他能用圖畫、各種媒體、模型將各式方案具體呈現，陳列於公開場合，供校內師生進行瞭解、溝通及選擇。

這個理想中，沒有高高在上的行政單位做急就章式的規劃，而是和所有東海人不斷地對話；討論之後，構築出東海完整的未來。透過長期的規劃，循序漸

進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18）。

文末提出這次行動的訴求：

1. 訂立校園規劃基本原則
2. 確立參與式規劃的程序

爲了更詳細說明「參與式規劃」的理念與操作方式，人間工作坊於 1996 年 6 月出刊的《人間札記》第 17 期中，再次說明社團對「科技大樓事件」的立場，以及「參與式規劃」的內容。在刊物中引用文獻介紹了「中和 21 號公園」的經驗，以證明「參與式規劃」是可行的，且在當前的台灣社會中已被許多社區營造工作者、都市環境規劃者所採用。

從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來看，「科技大樓事件」中「參與式規劃」理念的提出，其實是延續了「綜合大樓事件」前期中，關於專業技術與民主參與的關係的辯論。但是在《校園規劃，停、看、聽》手冊中則加入了「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語彙，較爲強調技術性的操作，而關於高等教育的價值與方向的反思卻比較隱而不顯。這裡面反映了「農牧場事件」後校園環境的變化。

相較於之前連續三次的「相思林事件」，在論述上拉到對高等教育的商業化、功利化傾向的批判。在「科技大樓事件」中提出的「參與式規劃」偏於技術層次的構想，明顯的在討論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侷限。然而「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變成物質的力量」，同「德耀路大石頭」事件中的「彩繪行動」一樣，提出這樣偏於技術層次的論述，都是爲了設法拉近理論和群眾的距離。但是不只校方行政人員，即使是校內同學對「參與式規劃」的內涵也很難理解。例如當時校解社製作〈今昔之間--續吹東風〉專題的學生，就提出這樣的質疑：

如果學生都可以自己設計房子了，那又何必要有建築師執照的考試呢？每一個被建築系專業訓練的人都可以當建築師了（《采風》第 2 期：24）。

諷刺的是，當人間/台研汲汲於讓校內師生接受「參與式規劃」的理念的時候，東海建築系、景觀系也提出了「參與式規劃」的想法，並見諸於《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以及相關論文中¹⁰⁷。而甫成立的校解社，也正嘗試進行校園空間環境歷史的建構，但是在「科技大樓事件」發生時，這些力量都沒有相互整合。也許這 143 甲的校園真的是太過寬廣了，使得往共同方向前進的人，都聽不見彼此的腳步聲。

¹⁰⁷ 可以參考東海景觀系老師王小璘、翁秀貞撰寫的《使用者參與大學校園整建規劃之理論與應用》一文：「本研究係針對國內大學校園整建規劃之現況及問題加以探討，並藉由民眾參與實質環境規劃相關理論及大學整建規劃之應用加以分析，進而研擬出一套使用者參與大學校園整建規劃模式。最後，以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計畫為例，以驗證本模式之可行性，並提供有關單位及類似案例之參考。」（王小璘、翁秀貞，1996，底線強調爲筆者所加）

如同筆者在第三章提到的，做為一個現代的綜合型大學，東海校園內充滿著不同的聲音來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而雷蒙威廉士、哈伯瑪斯等學者也早已指出，在一個日益專門化、多元化的社會裡，只能透過「持續性的民主實踐」來重新建立社會整合的基礎（Raymond Williams, 1989、Habermas, 1994）。

不幸的是，在當時的東海校園中，於 1988--1989 年間建立起來的「校園民主」機制正經受著嚴重的考驗而瀕臨崩潰。

第五節 學生會與校園民主的困境

人間/台研放棄參與學生會選舉

不管最後實踐的結果如何，「學生政府」的成立是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重要成果之一。學生透過成立三權分立形式的學生政府，表達了對理想大學的追求。並以此對抗校園行政官僚的特別權力關係，父權式的傳統師生倫理，爭取校內言論自由空間，捍衛學生權益，進行校園批判意識的啓蒙等。「學生政府」反映了 80 年代學生運動追求「校園民主」的成果，但其實踐上的問題，也反映了當時學生運動「校園民主」論述的侷限。

如同第五章所描述的，東海的學生政府--東海學生會，幾乎在成立的同時就在運作上出現嚴重的瓶頸。事實上對當初訴求成立學生會的東潮等學運團體來說，東海學生會的制憲成立過程，本身就是有問題的。但是不管學生會的出身再怎麼污穢，學校行政單位如何矮化，學生會畢竟代表全體學生，並握有制度、人力、經費的龐大資源可以運用。從學生運動在校園實踐的角度來看，東海學生會不啻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制高點」，可以進行「工具性利用」。

因此從學生會成立之初，縱使不斷的在社團刊物上對其行抨擊，但異議性社團仍然積極鼓勵社員或友好同學，投入學生議會各系議員的選舉中。而在 1991 年第三屆學生會，人間、大度山社，都分別推派人選參與學生會會長選舉。此後各次學生會、學生議會選舉，人間/台研、大度山社等都分別有推派人選參與，甚至因此發生許多衝突。

但在持續性的參與學生會選舉的過程中，學生會本身的侷限性也逐漸顯露，甚至變成社團在運作上很大的負擔。人間/台研於第七屆學生會選舉時，幸運的同時拿下學生會長、學生議會議長的位置時，社團內部也發生對於是否要繼續參與學生會選舉，發生激烈的爭執。

就反對的一方來看，社團參與學生會選舉、運作是弊多於利的。首先是由於學生對校園公共事務的參與不夠，造成學生會、學生議會在運作上的困難（例

如流會問題)，社團的角色看起來到像是在「支撐」學生會的運作，消耗了社團的人力和時間。

其次如果這些消耗的精力，如果是用在基進的改變校園現狀倒也無妨。但學生會的運作大半是在處理社團活動、舞會等日常行政事務。而對一般學生來說，學生會把耶誕舞會辦好，遠比突破校園政治禁忌、捍衛學生權益來得重要，這不免讓很多異議性社團幹部感到氣結。

而在 80 年代學生運動中，學運團體極為強調「反體制」的理念或者說態度。但隨著社團介入學生會運作越深，不免就會有人對此提出質疑：社團似乎已經開始遠離了這樣的堅持。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可笑，因為學生政府的成立就是當年東潮反體制運動的成果之一。這裡反映的是雖然校方行政單位把學生會矮化成一個「社團」，但它依然是一個「超大型服務性社團」。運作這個「超大型」的社團過程，會為異議性社團內部帶來許多協調、溝通上的困難，擴大內部的衝突。如果再加上實踐中面對外界反應的挫折感。在人間/台研內部會出現質疑的聲音其實並不意外。

但就社團內支持繼續參與學生會的成員來說，除了前述「戰略制高點」的考量外。由於學生會、學生議會議長可以出席行政會議，可以藉此獲得關於學校決策的第一手資訊。同時在參與學生會選舉的過程中，社團必須主動接觸各系學會、班代乃至各系所的意見領袖、「樁腳」等，這對一個強調社會運動理念的社團來說，具有拉近社團成員和一般學生群眾關係的作用，因此不能僅以表面的成果來論列。

決定這場爭執最後結果的關鍵，並非兩方中有一方在論證或實力上壓倒了另一方，而是自 1995 年以來社團人數明顯減少的狀況。在這樣的危機底下分出人力去參與學生會選舉，當然更是分散社團的力量。因此人間/台研並未派員參與第八屆學生會長選舉，甚至連議員都沒有。此後雖然社團人數有增有減，但是內部未再有人重提參與學生會選舉一事。

除了人間/台研之外的其他異議性社團，如女研社向來對參與學生會選舉的意願不高，甚至有點接近排斥。在第八屆學生會選舉時，女研社內還有人計畫以「廢除學生會」為訴求，推派人選參與學生會長選舉。但是大度山社則一直未放棄參與學生會選舉，並在 1997 年 5 月由社員陳成詮當選第九屆東海學生會會長。

四二公聽會事件

東海學生會的運作，由於大學法修訂後，校方不再於註冊學費四聯單中代收學生會會費，使得學生會頓失支持其運作的物質基礎，這對學生會的運作是一

大打擊(東行, 民 87.6.17)。但如果學生會獲得學生支持, 仍可透過學生主動繳納會費, 而獲得運作的物質基礎。因此問題是出在: 學生會在學生心中的合法性、正當性已逐漸削弱的問題。這是個從第一屆學生議會的頻頻流會, 就可以看得出來的老問題。但筆者認為在第九屆學生會時發生的「四二公聽會事件」, 卻是真正的給予學生會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乃至合理性重大打擊的關鍵因素。

「四二公聽會事件」的起因, 源自陳成詮當選第九屆學生會長後的強勢作風。對陳成詮不滿的學生議會議員, 在探詢學生社團資料後, 接下自 1994 年後久未運作的濁水溪社。並以濁水溪社名義印行文宣、張貼海報, 對學生會的施政進行批判。

事件的導火線出在 3 月 19 日學生議會期初大會上, 議會認為學生會的上學期的決算以及本學期的預算帳目不清, 經討論後全數退回, 要求學生會重編。但學生會認為議會退回結算、預算的理由太過牽強, 無法接受。學生會和議會(濁水溪社)兩方遂不斷透過文宣、海報等方式相互攻訐, 越演越烈。到後來學生會長陳成詮指責濁水溪社以不實文宣進行人身攻擊, 雙方衝突更形劇烈, 學生會的年度預算審查遂就此停擺。

預算審查停擺的結果, 是使得校內大型活動無法舉行。特別是已經行之有年, 在中部地區頗負盛名的「東海表演藝術月」, 還包括第十屆學生會會長、議員的選舉也無法舉行。這使得學務處不得不出面, 於 4 月 2 日於校內舉行公聽會, 尋求解決辦法。

然而 4 月 2 日公聽會的舉行, 反而造成學生會和濁水溪社兩方直接的衝突。兩方除在公聽會上相互叫罵外, 並在公聽會結束後於場外發生肢體衝突。其後學生議會及濁水溪社指責學生會幹部使用暴力, 要求學校對施暴學生予以校規處置(東行, 民 87.4.15)。但學生會方面則指責濁水溪社及少數議員, 散發不實文宣, 事後也不出面解釋及對質, 盼學務處譴責此種言論暴力(東行, 民 87.5.6)。

兩方的爭執延燒到行政會議中, 學生會及議會都要求學校出面解決, 處分違反校規學生, 但校長和學務處只能要求雙方尊重, 顧全大局, 心平氣和, 以理性協商方式解決(東行, 民 87.4.15/民 87.5.6)

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爭執, 使得預算審查停擺, 甚至在議會討論時上演全武行, 這樣的戲碼不只是在東海校園內, 即使是在台灣的中央和地方民意機關, 類似的事例都經常在發生。不過行政院和立法院的爭執, 尚可以透過大法官會議釋憲來調解。當東海的學生政府發生府會衝突時, 依據學生會組織章程尋求代表司法權的「評議委員會」進行調解時, 卻發現評議委員根本自第三屆學生會以後即未改選。第三屆學生會的評議委員此時大多已畢業離校, 只剩當時是碩士班學生, 九屆是社研所博士班學生的侯念祖一人, 根本不能依法召開評議

委員會。這件事情才充分凸顯了東海學生政府運作的荒謬性與侷限性。

法理上的仲裁機構既然無法運作，學生會的內部衝突只好在持續性的府會鬧劇中輪迴。學校的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雖然負有輔導之責，但又不敢介入太深，以免惹來「干預學生自治」之名，只能在行政會議中不斷聽取府會兩方的訴「怨」！「四二公聽會事件」就變成一場拖棚的爛戲，到下一屆學生會長改選才中止。然而第十屆學生議會議長選舉時，又發生了選舉爭議，同樣也因為評議委員會無法運作，變成不能解決的懸案，再度影響到學生會預算的審查

不斷頻繁發生的內部爭議，最終會引起學生對「學生政府」運作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更深刻的質疑。在 1998 年 6 月 10 日行政會議上，蔡琪芳議員表示：

東海的學生自治將要邁入第 10 年，但我們所看到的卻是一年不如一年，同學的參與度越來越低，學生會會的得票率也越來越低，甚至不到一成，可是每年學生會卻可以動用至少二百五十萬以上的款項，而且有些系的議員，已連續好幾年無人參選，當一個產品已不再受歡迎時，不是需要再改良就是要被淘汰，而今學生自治已一年不如一年，病入膏肓，學校是否應該要重視這個問題，不要再讓民意基礎薄弱的學生代表，代表同學參與各項會議，動用大筆的代收會費，否則這個學生政府很容易會產生衝突（東行，民 87.6.10）

1994 年 5 月，第五屆學生議會提案「建請學校繼續代收會費案」，行政會議決議應由 83 學年度新任議員半數必上連署同意，並由 83 學年度新任會長於 6 月底前按正式程序提出申請辦理（東行，民 83.5.25）。

1997 年 8 月 4 日，行政會議同意 83 學年度學生會會費宜學校代辦（收）。為學生會應正式提出申請，並經學生議會附署同意，夜間部自治會會費比照辦理。

1998 年 6 月 17 日，行政會議決議，自 87 學年度下學期之後，本校不再代收學生會、學生自治會會費。

為什麼學生政府會失敗？

東海學生會、學生議會幾乎是在一開始運作後，就發生了困難。為了解決議會運作不彰的問題，學生議會甚至提案建議暫時停辦「師生座談會」，以免因師生座談會和學生議會的功能多有重複，造成了議員職責的萎縮（東行，民 79.1.22）。

不過東風社等校內的異議性社團，在學生會成立之初，就已指出整個東海學生政府的問題是出自其由上而下的成立歷史過程中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而不是單純的選區劃分、師生座談會等技術性的問題。如同第六章第三節所提到的，

人間、大度山社認為「學生會位階太低」是主要問題，東風社則認為制度設計和日常生活的配當性沒有仔細探討，以及沒有在學生生活中促生許多草根性的議題小團體是兩個重要的原因。當學生會運作已超過十年之際，這些意見是否有正確的掌握到實質的問題呢？

首先就位階不夠的問題來說，在1999年5月，第一屆東海學生會會長，也是學生會制度設計者的公行所校友郭達鴻，在接受校解社的訪問時表示，在學生會創立時，位階就是個引起很多討論的問題：

有人說就算你提升到跟課外活動組是同樣的位階！可是基本上上面還是有一個管你的單位，這個也是學生會的一個盲點，因為學生裡面你不可能直屬學校，不可能直屬校長，那事實上是不是有機會變成說假設學校最富〔高〕領導者是校長，那學生會的最高領導者是學生會會長的話，是不是校長跟會長的權力是一樣大的，這是我們當時在談的問題…。

（郭達鴻口述，陳信宏、陳葆光、陳彥伯訪問，1999）

從郭達鴻的話來看，「位階問題」確實是學生會制度設計上的一個盲點，造成其運作上的困境，但是從學生會成立的歷史來看，在學生會制憲時，東海學生參與的意願就十分低落，更不用說後來大度山社還退出制憲過程了（參見第五章第二節）。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位階問題」確實是學生會運作的盲點，但並不是學生對於參與意願低落的主因。

那麼為什麼人間、大度山社極為強調「位階問題」的重要性呢？在這裡比較重要的可能是爭取解決位階問題時，造成的對校方的權力位置的挑戰，透過位階問題引發的衝突、爭議，引起校園師生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提升參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意願。事實上從學生會運作的歷史來看，當異議性社團介入學生會選舉時，例如第三屆、第五屆、第六屆，往往也是選舉投票率最高的時候，而其一旦執政，往往會引發議會乃至校內持反對意見的社團（如：濁水溪社）的出現，而使得校內輿論出現更多樣的聲音。

而從制度設計和學生日常生活的配合來看，郭達鴻指出他擔任學生會長時發現的一個問題：

這個剛剛我講學生會會長基本上他是要辦修〔休〕學的，他要做全職的，所謂全職是說他跟全校同學作息是不一樣的…所以質詢時我說我不幹我不要做了可以吧！我沒有被約束的地方，可是當你換成一個全職的學生會會長的時候那就不一樣了喔！你是有領獎學金的，獎學金是說你這一年的生活費學校養你了嘛，…就變成一個例行性工作所以在我們到史丹福大學去的時候，他們學生會的主席團有四位，四位有一個是全職要修〔休〕學的，一個是半修〔休〕學的，半修〔休〕學是他一半工作是上課另一半是在學生會…。

鄧丕雲指出 80 年代末期透過學生運動爭取成立的各校「學生政府」，都依照西方民主政府三權分立的原則，來改革既有的學生代表性組織（鄧丕雲：241）。但只從郭達鴻指出的學生會長應否是全職的問題，就可以看出把一個用於國家的政府體制套用在大學校園中，其實存在著許多扞格不入的地方。如果除了舉辦大型活動之外，學生會和活動中心不同之處在於它還負起保衛學生權益的作用，那麼是否可以從「學生工會」的角度，而非「學生政府」來思考學生會的制度設計¹⁰⁸？

這種制度上的單一想像，表現了 80 年代台灣學運對於民主的單一化、形式化的想像，普選、制衡確實是民主制度運作中的重要成分，但其運作的保證在於具有主動參與、進行對話討論能力的公民。民主制度應是為了生活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的公民，能夠實現民主的價值而設計，而非一廂情願套用國家運作的機制。在 80 年代末期各校沸沸揚揚的爭取成立學生政府的同時，幾乎沒有人思考到，將用於管理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動的搬到大學校園中來是否適當？

這裡馬上衍生出一個問題，在 80 年代末期乃至現在的大學校園中，存在著做為民主實踐主體的公民嗎？這牽涉到東風社當時提出的「促生許多草根性的議題小團體，讓同學能在團隊工作中逐漸把『政治參與的無力感情結』轉化成『維護自由、尊嚴與權益的公民意願』」的主張。從公共領域的角度來看，這個主張其實就是透過成立許多草根的社團，連結成一個具批判性的公共領域，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石。這小團體一方面對外進行相互對話討論的作用，同時對內進行公民意識的養成。

確實從 1990 到 2000 年間，東海校園內存在著不少具批判性與行動力的社團，但必須注意到的是這些社團的人數往往相當稀少，不足以形成一個由多元、豐富的社會關係構成的公共領域。而且在第六章中也指出，至少在「相思林時期」這個公共領域仍帶著強烈的二元對立性，無法產生學習和轉化的作用。而在 1995 年之後，這些有組織的社團的數量還不斷減少，學生的組織也顯得更流動而碎裂（參見第九章三節）。缺乏堅強的公共領域支持的學生政府，自然無法在學生日常生活中生產出支撐其運作的「合法性」，做為東海校園民主表徵的東海學生會，就無可避免的要走向衰微。

如果學生政府在學生心中早已失卻了合法性，那麼只有學生代表參與的校園規劃制度，要如何能說代表同學的聲音？這也是自「新宗教中心」以降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制度上的原因之一¹⁰⁹。

¹⁰⁸ 這是第八屆學生會會長吳明孝，某次和筆者於東海書苑門口聊天時提出的構想，特誌於此，並以此紀念那段和明孝經常在書苑門口殫精竭慮，共同思索、討論學生會的未來的時光。

¹⁰⁹ 感謝奇摩「學生運動」家族的網友 Brahams6，建議筆者對於學生會在校園空間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多加著墨，也感謝師公、firstsociology 等人在網路上共同的討論。

蔣公銅像遷移

東海學生政府的困境，當然不是個別學校的問題，也不只是台灣的高等教育的問題，它反映出的是整個台灣社會從 80 年代末期開始，戮力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對於民主的過度單一、形式化的想像。東海校園在 1997 年遷移蔣公銅像的事例，或許可以做為這種空有形式的民主的一個具癥候性的案例。

蔣公銅像原本位於東海約農路與大學路口之三角草坪上，是在 1975 年由東海學生募款興建，並於同年 10 月 31 日舉行揭幕儀式。1997 年行政會議提議將銅像遷移至學校中正紀念堂中。後由秘書室提案，配合東海圓環改建案進行遷移，決議通過，原處改置前校長曾約農先生的銅像。

在 1997 年，解嚴後的第十年，遷移一個被視為威權時期政治圖騰的銅像，看起來是一件十分合理又合宜的事情。不過這座銅像當年既是由學生募款集資興建，依照過去學校處理「舊宗教中心」使用¹¹⁰，以及「德耀路大石頭事件」的立場，對於校園景觀的變更必須尊重原捐款者的意見，那蔣公銅像的遷移為何沒有徵詢當年捐款者或是學生的意見呢？只因為這是一個大家都公認的「威權政治圖騰」嗎？這裡的「大家」又是指哪些人呢？如果「蔣公銅像」真是一個公認的「威權政治圖騰」，那麼當整個台灣社會儼然視「去除威權，走向民主」為共識的時候，為何這個銅像的遷移不是透過學生的提案、海報、甚至是一場運動來發動的呢？而是透過行政會議中的教授和秘書室的提案？這個在當時連校內異議性社團都未多加關注的事情，其實深刻的顯露了東海的校園民主，乃至台灣的民主政治實踐內在的侷限。

往往，最後的決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決定的過程。「東海人」，長久以來有人要求你認同學校，但又同時要求你疏離於校事，你願意長期處於這種分裂下去嗎？或許你是不在乎的，因為我們從來是這樣子地去政治化我們的各種「認同」問題，包括「國家認同」。

…東海校園曾讓蔣介石銅像豎在哪裡達二、三十年之久，對於這個事實，大人先生們總可兩手一攤，說：「時代使然」。但如果由於整個政治社會大環境的改變，今天我們認為我們可以選擇不要它繼續杵在哪裡的時候，如何處理這件事的過程本身則是考驗我們是否在過去二、三十年當中在民主上有成長。如果我們只因校園外的改朝換代而如響斯應地改換校園文化與歷史面目的話，那麼今天廢「蔣介石銅像」和當初立「蔣公銅像」又有什麼差別呢？

¹¹⁰ 在「新宗教中心事件」時，因應學生強烈的反彈壓力，東海校方曾應允舊宗教中心，作為提供學生社團活動使用，後來以必須尊重原捐款者對建物使用用途的理由，又收回給教會使用。「…當然在整個東海歷史之中，有幾年舊宗曾被學生會拿來當作社團辦公室用，那是違反捐款人的意願，如果當時的捐款人追究，他可以收回整棟建築，所以學生會用了一陣子之後，學校把舊宗收回，…」(黃業強、鄔錫芳口述，杜欣怡、楊佳蓉訪問，《東海采風》第八輯：134)

(趙剛，1998：342-343)

在「東潮時期」建立起來的東海校園民主，大致可以分做兩個形式在發展，一個是由「新宗教中心事件」發端，不斷針對校園重大工程建設、景觀變更而起的運動。另一個則是由於學生訴求，在校方支持下成立的三權分立形式的學生政府--東海學生會。

這兩個校園民主的實踐形式，在 1993 年之後都遇到難以克服的問題，其背後連結的則是台灣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參見第十一章第三節)。而當學生政府已經被宣告死亡，當人間/台研苦於無法讓校內師生理解何謂「使用者參與」的同時，校園內另一群也關心東海的未來的人，正嘗試著另一種形式的實踐……。

第六節 《東海風》與校園社區意識

第一本校史--東海大學校史

東海大學第一本完整而有系統的校史--《東海大學校史》，是 1980 年 3 月梅可望校長為慶祝東海建校 25 週年紀念，於行政會議上提案通過，由歷史系主持成立編輯委員會，經過近兩年的編輯工作，才完成這本有 500 餘頁，正文字數約 20 萬字，全書約 39 萬字的全國第一部大專院校的校史(東海風：94)。

這本書採取分段敘述的方式，將東海大學二十五年的歷史分成了：開創時期(民國 44 年—46 年)、成長時期(民國 46 年—55 年)、爭議時期(民國 55 年—61 年)、轉型時期(民國 61 年—67 年)、擴展時期(民國 67—69 年)。各期的分段點，大致和歷任校長的更替時間相吻合，暗示著東海大學的發展和校長的領導密切相關，也凸顯了這份校史基本上是針對東海校園內部事物與發展的紀錄，而非將東海視為台灣社會環境下的一個縮影來看待，因此對於東海發展和台灣社會變遷的關係甚少提及。

二十五年浩大繁複的歷史沿著開創→成長→爭議→轉型→擴展的軌跡，形成一個有秩序的發展過程。而在書中東海的發展是以校舍、師生人數的不斷增加來衡量的。這裡面暗含著一種直線的、物質取向的發展觀，和 70、80 年代主導台灣社會的「現代化」主義的發展意識型態，有某種程度的合拍。

除卻提及和台中市府、懷恩中學或地方農民的土地糾紛外，整本校史的歷史敘述過程，基本上是單音而直線進行的。唯一出現比較多元的聲音的時段，是 1966-1972 年的爭議時期。然後是 1972-1978 的轉型時期，由於失去聯董會的經濟支援，而使東海校園在物質、文化、師生關係上面臨諸多調適上的困難的時

期。但緊接著在梅可望校長上任後就是東海的擴大發展時期，是一連串學校在設備和師生人數的長足進步。前一階段的爭議和困難，在東海人（或梅可望？）的努力下獲得解決，使東海由衝突混亂中走向另一個發展的高峰。在喜劇般的歷史敘事結構裡洋溢著一種樂觀和自信的情緒。

校園社區意識的種籽

《東海大學校史》於 1981 年 10 月印行出版後即未再版，部份存書至今仍存放在東海歷史系系辦的倉庫中。同時在東海圖書館特藏組中，還存放著大量年代久遠的校史文獻資料，長久以來無人問問。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由於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對校內師生的啓蒙，才為這批史料賦予了新生命。

校解社創辦人張志遠，在 1995 年 2 月受邀回校在總務處保管組工作。進入保管組工作不久，因學校希望保管組可以將其負責的十餘個倉庫進行整理，移出多餘空間移撥其他單位使用，張志遠遂受命進行清理倉庫的工作。

在 3 月 11 日進行整理男生宿舍第 14 棟的倉庫時，發現了大量東海創校時期的文獻，例如：第一屆的學生簡章（當時部份已被白蟻蛀蝕）、用英文打字的東海大學籌備時期建築興建計畫、曾約農校長手寫的施政報告、創校時期的勞作教育計畫...等。緊接著又在男舍第 12 棟倉庫，發現十六釐米的〈今日東海〉紀錄片、兩三千張東海老相片...等珍貴的影像資料，以及存放在舊圖書館（現美術系館）芳威廉紀念室的古董、字畫等。曾接觸過九份、淡水等地文史工作者的張志遠，很快的就理解到這些文物資料的價值。並和圖書館特藏組黃文興主任討論，計畫於校內舉辦「東海老照片展」，並從食衣住行育樂等方向去規劃。

1995 年 5 月，東海大學因適逢創校 40 週校慶，委由歷史系林載爵老師主編一本東海創校 40 週年特刊，在黃文興介紹下邀請張志遠一起參與編寫工作。張志遠當即向林載爵建議，創校四十週年特刊的內容、討論面向可以更豐富：

東海除了食衣住行育樂之生活史可以做以外，不是只有人文歷史而已，應該擴大其領域，讓這本特刊更豐富。另外我也提出這本特刊應該跟人有互動，而不應該只有整理文獻文字方面的死板介紹，應該從生活出發，從小人物身上去著手，透過田野調查方法及影像呈現，使這本書更加鮮活，

我們的歷史常常只有有頭有臉〔的人〕才有歷史，一般常民是沒有自己的歷史，只要對學校有貢獻之人，那怕是種樹之人，蓋房子的工人，我們都應該報導出來。

（張志遠口述，林佳臻/王映涵，2004：17）

這個建議馬上被採納，並委由張志遠、黃文興兩人負責「東海校園建築景觀」

章節的編寫。

黃文興為東海歷史研究所畢業生¹¹¹，求學時期便在圖書館打工，研究所畢業後先在圖書館流通出納部門工作，而後轉到負責保管整理學校重要文獻的特藏組服務。歷史學訓練的背景，又負責校史文獻整理，使得他對東海校園的變化具有一種長期性的視野：

二十五年來，不同的領導者，有不同的認知與規劃。從謝明山校長的「五年發展」、梅可望校長的「邁向社會」，到阮大年校長的「企業經營」。東海，已歷經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學校領導者面對不同的挑戰，有著不同的認知，對校內成員也存有不同的期許。然有一項不可否認的事實，那就是校園成員對東海的未來，已日趨冷漠。我們每天都面臨新的挑戰，充滿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想法。我們追求著每天、每週事務的常規。不管表面上是如何的忙碌，而內裡卻仍然是漠不關心，而已經失去了當年創校師長哪種直接的、個人的投入感覺（黃文興，1996：145）

黃文興期望能透過校園社區意識的建立，激發學校成員參與的熱誠，促進相互的對話，凝聚東海校園發展的共識：

維持理想教育環境是一種公共空間的營造活動，從各種實踐經驗看，護持理想教育環境的行動主體，必然是校園社區中的人。唯有校園社區中人明白並策勵自己，才能持久與有意義。因此護持理想教育環境所關注的，不是聘請專家規劃出更多美好的藍圖，反而是如何激勵社區成員的參與熱誠與鑄造傳統的成就感（同上：149）

1995年11月《東海風》出版，原本計畫作為慶祝40週年校慶印行的非賣品，後在工作人員建議下改由東海校友聯絡室以及敦煌書局經銷代售，到2003年1月為止共印行四版，總計4,500本。

在記述體裁上《東海風》採取的是「編年體」的方式。每一年以大事記方式，記載該年度發生的大事。其中重要事項再以專文介紹。這種形式主義的紀錄方式，反映了在80年代社會日趨多元化之後，傳統一元、直線的歷史觀點被打破，著作者在缺乏具中心性的歷史觀點的支撐下，採取了最簡便的記錄形式。

除此之外，書中花了甚多心力在介紹東海的建築美學、環境生態，並以十分浪漫的方式介紹了創校初期的生活點滴。除了東海校園內發生的事情外，還摘引了許多校友、作家以東海為題的文學作品。黃文興認為這種生活化的歷史記述形式，具有凝聚校園社區意識的作用：

¹¹¹沒有黃文興學長的協助，筆者不可能對東海校史文獻，掌握得如此靈活。這本論文能夠完成，東海圖書館特藏組以及黃文興學長的協助，絕對居功厥偉。雖然我已經在緒論中表達過謝意，然而再多的文字也都無法表達筆者衷心的感謝。再次感謝黃文興學長於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的協助。

《東海風》以「生活」為出發點，透過文字和影響的鋪陳，有系統地紀錄東海的點滴，這些在校史中可能不受重視的地方、事物與人，相反地，在重視具體、重視共同記憶與意識社區生活的圖像歷史中，就顯得彌足珍貴，因為它們，才讓我們新舊東海人有了共同的話題。才使新舊東海人的認同聯在一起（同上：150）。

校園社區意識與共同記憶的凝聚，必須要有一個具體的標的物做為核心。東海的校園建築雖然頗為特出，但是稍嫌龐大。國際級的著名建築師貝聿銘在台灣的少數作品，造型獨特的路思義教堂就成了最佳的象徵物。書中用了四頁的篇幅專門在介紹路思義教堂的建築結構。而書的封面就是一座路思義教堂的圖片。

「未竟的探討」與校解社

《東海風》的出版，鼓舞了張志遠等人的士氣。而後由於台鄉社校園解說員人數增加，因此而獨立成「校園解說員社」。在2000年7月校解社開始策劃《東海校園建築步道》一書，經過兩年的撰寫、修改、補拍相片、查詢求證...等編輯工作，於2002年4月定稿、確定付印、出版。該書由貓頭鷹出版社出版，為「步道系列」叢書中的第18冊。在此之前「步道系列」曾出版了《台大校園自然步道》、《中興大學生態步道》兩本書，但都是以校園生態環境為主題，《東海校園建築步道》則是第一本以大學校園建築為主題的步道解說手冊。

在第三章討論東海校園空間論述的形成過程中，已略為說明了校解社的成立過程。雖然是東海校園於90年代中期新生的事物，但如同東潮、人間、大度山等社團的實踐，校解社的實踐也和過去東海的歷史之間有著幽微的聯繫。

如前所述，張志遠之所以嘗試創立校解社，部份原因來自於對「相思林時期的校園空間運動的反省，試圖透過持續的教育，以深化師生對校園歷史環境的理解。但對如何進行這樣一個教育的過程，張志遠的選擇和70年代的榮推會、東風社進行「未竟的探討」時的切入點是一樣的：

我也思考如何切入東海大學，讓大家能馬上進入狀況，我認為從東海建築與環境空間切入是最適當不過，因為如果從創校理念來說的話，因為過於抽象並不見得大家都可以感覺的到，而東海校園建築與景觀，名聞遐邇，建築卻是最實在的，真實的可以看得見，可以體會的。

（張志遠口述，參見林佳臻/王映涵，2004：15）

而在社團的定位上，他也深受東風社所代表的東海人文批判傳統的影響：

在新社團籌備期間，也有師長建議「校園解說員培訓班」直接附屬於學校的

研發處或是秘書室底下？可是我們並不認為在行政的編制底下是一件好事，因為一個團體來就應該要有自己獨立的性格，不需唯唯諾諾地擔任學校的傳聲筒，校園解說員應本著「東風」刊物所提出之理念：

「一個學校的校風，一個學校精神之建立，決不在乎成文的校規，也不在乎校長或教授先生之訓詞，而在乎這學校學生的自覺。——一個學校校風的建立，學生責無旁貸的。」

因此校園解說員對校園應有反省、批判精神。

（張志遠口述，參見林佳臻/王映涵，2004：21）

如同在本論文第三章中提到的，校解社並不只是個為東海的外賓導覽校園美景的服務性社團，它也參與了東海校園空間的論述建構與運動實踐，這並非純屬於歷史的偶然，而和東海校園空間論述的特性有關。

東海的校園空間論述並不只是個美學的、景觀的、情感的論述，而從其形成的過程中就不斷呈現出一種對自身的歷史和價值持續進行反省批判的精神，為校園內重要的公共論述。任何對東海校園空間景觀變化的深入探討，必然要上升到對校園發展方向乃至台灣高等教育的檢討的層次，進而採取各種不同的行動形成公共討論，介入校園環境的變化。而在 90 年代又吸收了台灣社區營造運動的論述，豐富了「未竟的探討」的內涵。



第七節 東海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

校園規劃工作小組

爲了避免校園景觀遭到破壞，在 1969 年時，教授會即建議成立「校園管理委員會」以美化校園、防止林木不當砍伐。這是目前文獻上能找到的最早成立維護校園環境的專責機構。而後因應校園建設發展的需要，又成立了「校園規劃委員會」。

1990 年 5 月，「校園規劃委員會」與「環境保護小組」合併爲「校園規劃暨環境保護委員會」（簡稱「校建會」），邀請校內行政人員、教師共 13 人擔任委員，成爲東海校內建設、環境規劃的最高諮詢機構（東行，民 79.5.29）。

從「相思林事件」以來，東海校內對於「校園空間問題」的關心，已從單純個人的關心，轉變爲更形積極的行動，「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的劇烈衝突，更凸顯了問題的嚴重性。面對這樣的情勢，東海建築系在 1991 年 4 月即向校方提案，建議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以對校園決策性的問題，提供專業上的建議。校方雖然接受此提議，但是實際工作並未正式展開。

阮大年校長上任後，建築系再度提出成立工作小組之建議，體認到校園整體規劃的重要性，校方這次的態度轉趨積極。1992 年 8 月，「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正式成立，由建築系與景觀系師生在「校園規劃委員會」的監督下共同執行規劃工作（東海校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1995：2）。

而在處理校園規劃政策的校級專門委員會方面，1992 年 9 月 24 日，「東海校園規劃委員會」正式成立，主要負責擬定校園規劃之原則、舊校園改造計畫及新校園計畫之審議，此可以說是東海建立初具規模、專業性的校園規劃機制之始。不過在 1995 年之後，這個校級委員會及常設工作小組就已停止運作，校園工程的討論與建議，還是由行政會議下的「校建會」負責（袁興言，2000：II-12）。

第一本校園整體規劃報告書

雖然運作時間不過三年，但是「東海校園規劃工作小組」，透過校方委託、專案研究、論文發表等方式，對校內建築、環境、景觀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及規劃作業，而最後最完整的成果則爲 1995 年 2 月出版的《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

袁興言在其研究中，指出這是東海大學創校至今唯一一本成文，而且品質相

當優秀的整體規劃報告書，但在客觀環境影響下，仍有許多侷限：

而以今日的觀點來研究此報告，則可發現以下的問題和價值：

1. 代表性問題：此本報告書雖是校方正式委託的工作小組經過數年的調查和審議而完成，但最終結果並沒有受到決策單位的認可，近年各項工程的執行結果也並無遵循該計畫建議。是故，其在合法的代表性和實質空間的延續性上可以說是存在著很大的疑問與挑戰。但另一方面，校方正式出版品仍大量引用其中的文字，甚至擬為政策面討論的基礎，如發展白皮書有云：『三年前本校校園規劃小組，已完成校園整建規劃報告，將來校園建設及第二校區的規劃，均應依此報告內容作為討論的基礎』可知其仍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2. 實際影響問題：由於並未受到認可，近年來校內各項空間計畫及工程並未參照該報告的建議，是故，不過五年後的今日，這本報告所調查及論述的空間主體-東海校園已有許多重大的變異，使得此報告的價值將很快成為歷史，而無法對現實空間提供任何參考。是故，實際上若需落實此本報告的各項建議，由於時空的變異，必需進行相當程度的修正。

3. 內容完整性：該報告本質上是全校性的校園整建計畫，雖然最後認可的手續並未完成，但純就內容而言，相較於其他學校的校園規劃論述，這本報告書除了包含校園系統的各项分析及建議之外，對於既有的配置型態與建築風格也有比較深入的分析，完整性上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做為創校至今唯一一本成文的整體規劃報告書，與其他參考資料相較之下，在唯一性上仍具有相當的價值

(袁興言，2000：II-13，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由於在現實的執行上存在許多的侷限，袁興言認為就對校園區域性規劃工作的作用上來看，應是以「研討而非服從」的態度，看待這本內容深入且完整的《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將其視為「準上位計畫」：各個區域性計畫與此報告書的聯結，應是觀念上的延續而非支配性的遵循（同上）。

投下大量人力、物力完成的《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只能成為「準上位計畫」的命運，其實是規劃與設計過程的本質使然。在1985年後國內的建築學者在論述上，開始將大學校園規劃比擬於都市計畫，而非只是從屬於學校建築研究下的一個分門。這意味著大學校園規劃也和都市計畫一樣，必須面對社會中不同權力、利益、意識型態的角逐：「由於都市意義的界定，是一個衝突過程，不用說，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也如此」（Castells，1999：248）。

雖然相較於都市計畫，大學校園規劃有著土地產權較單一、政治經濟變數較少的優勢，但往往必需面對如何和既存環境、設施協調的問題，是一種類似「穿

著鞋子改鞋子」¹¹²的設計規劃過程，而不能像都市計畫一樣，一切從零開始規劃。大學校園規劃也要面對校內不同部門、系所利益的折衝，以及外在環境劇烈的變化，這些都限定了這方面的規劃和設計計畫，對於實質環境變更所能具有的影響力。

校園發展的基本課題

雖然有著結構性的限制，但是這本報告書仍然對東海校園空間的變化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東海創校時期校園規劃及建設成果的經典價值，和國內其他學校的規劃報告書相較，這本報告書中有相當大的篇幅，是對於校園內既有空間型態的研究與分析。詳盡的資料，使其成為關心東海校園景觀及參與校園空間運動的師生重要的參考資料。同時這份報告也指出了東海校園規劃中的基本課題，例如報告中首先揭櫫「校園規劃」的本質為：

- （一）校園不只是提供大學教育所需的土地、設施，校園本身就是教育的一環，也就是「環境教育」。
- （二）校園規劃是一件公共事務，它涉及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不同活動性質之間的共通需求與差異需求間的協調工作。
- （三）校園規劃是一件持續的過程，它沒有真正完成期限，許多不可預測的變數促使規劃成果要不斷的自我修正。
- （四）校園規劃工作是在學校發展政策和實質校園建設間之橋樑，使政策品質落實於空間架構中，同時控制空間與建築的品質。

（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1995）

並且指出東海大學校園規劃的特質：

東海大學校園以往是一個國內具有獨一無二特色的校園，目前這個中途性規劃的主題不是像一些其他的大學，試圖在雜亂不相協調的校園建築群中整理出一個空間秩序，而是有關於在規劃的新需求下對這已有的校園特質要用何種態度去處理的問題。東海校園的價值認定不是一個單純景觀的問題，而且是一個事關學校的認同感（identity）的問題，它的意象資產價值甚至超過它的土地資產價值，根據統計，第一志願選擇東海的學生，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因為東海有這樣一個美的校園。這樣的事實多少影響規劃校園空間發展的決策觀點。

（同上：6，底線為筆者所加）。

而在第五章第二節「東海校園土地開發相關問題探討」，則指出在歷次校園空間運動中很少被注意到的「地籍問題」的嚴重性：在看似完整的校區內，仍

¹¹² 這個生動的譬喻來自於東海建築系郭奇正老師。同時也感謝他於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筆者的支持和鼓勵。

有許多地權不明或非屬校方所有的土地，而造成了「校區不等於校地」的狀況，對東海土地開發造成限制。這些問題包括：

1. 土地權屬問題：都市計畫使用單純，但地籍（所有權）及地目複雜。
2. 山坡地開發問題：全部校區均在山坡地相關法令之適用範圍內。
3. 建築基地地籍問題：因山坡地開發許可以及本校地籍分割複雜，使得申請建照產生困難。

在最後未來發展分區配置的替選方案上，則提出了甲乙丙三個方案。

甲案的主要基本構想和發展策略是依照原本的使用分區，向鄰近地區擴展，而不試圖跨越另一使用分區。唯一的例外是教學區部份可被分離出來的設施獨立出來安置，大致的擴充是均質的往東（路思義教堂以下、教職員宿舍、農牧場區）發展。

乙案的規劃構想顧及學校在財務與設施建物遷移上的困難，嘗試在最少變更現況的前提下解決校園問題，並盡量遵行規劃原則所制訂方向。

丙案的規劃構想，則建立在生活圈與開放空間系統的理念上，將整個東海分成四個生活圈。

此外在附錄之中也提出了「意象保留區計畫」，包括景觀保留區以及歷史意象保留區。景觀保留區主要以當時進行的大量問卷調查的結果為依據。而歷史意象保留區，則是考量到東海創校時期校園以及建築物的文化資產價值，將 1963 年以前完成的教學區、活動區、及學生宿舍區建築物視為一完整的東海傳統風格區域。

校園空間論述的新語彙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未來發展分區配置的替選方案，都強調東海校園應逐漸往東發展，這使得農牧場「第二教學區」開闢的問題，逐漸在 1997 年後成為校園空間問題討論的核心。如同袁興言所言，雖然這本創校以來第一本校園整體規劃報告書，對於實質環境發展並沒有制度上的絕對拘束力，但是仍做為校方對於校園空間發展政策討論的基礎，同時做為面對學生質疑時，提供政策正當性的來源。而參與校園空間運動的學生社團，例如校解社在創社之初，即將這本報告書列為解說員培訓課程的重要參考資料。在 1999 年的「118 事件」中，學生也以這本報告書中對於相思林地的空間規劃建議，批判校方決策的不當。

如同袁興言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現代的大學校園規劃：

總配置圖不再是鐵則或定律，在發展決策上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新的公共意識

形成的過程，總配置圖及設計產品應是在進行公共討論及紀錄一種具象而可靠的溝通用媒體工具，而非無法再加以修改的藝術品或空間法令（袁，2000：I-23）

因此這本整體規劃報告書，雖然只具有「準上位計畫」的地位，但仍為後來東海校園規劃以及校園空間運動的參與者，提供了鬥爭、對話的語彙與平台，更進一步的深化了原本空間問題做為東海校園公共論述的作用。

第八節 結論

這就是過去那場辯論的繼續，人們表現出同樣的抱負、同樣的恐懼和同樣的緊張衝突；但現在它是在新的背景中，使用新的語言和新的論點，力量平衡也發生了變化。我們應設法理解雙方——既理解持續的傳統，也理解變化的背景。寫歷史總要有開頭，人們於是就常常只看見新的東西。

--E.P.Thompson，《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在對待 90 年代台灣的學生運動上，人們也常常只看見新的東西，不過卻有不同的態度。有人雖然認為由於大環境的變化，學生對社會的關懷自然會有變化，社會各界自難以此苛責「一代不一代」：

但是，當前大學生對於社會實踐熱情的大幅降低，對於公共議題的缺乏想像力，乃至於僅以個人權益為主軸的思維模式，則終究是在描繪台灣社會發展願景時，不容輕忽與令人憂慮的社會現象（何榮幸，2001：74 底線為筆者所加）

不過如果從東海學生運動校園實踐的經驗來看，這樣的提法未免有美化過去，貶低現在的嫌疑。以東海學生會的歷史來看，從制憲過程學生就缺乏參與意願，更不用說校方在其中的介入扶植，這樣一種「由上而下」的成立過程，種下了日後學生會運作出現困難的伏筆。同時從事後的反省可以看到，當時幾乎是一廂情願的把全校普選、三權分立的架構搬進校園來，而嚴重忽略了制度設計和學生生活的連結。這些事例能夠說明「學運世代」的學生比較有實踐的熱情？比較有公共議題的想像力嗎？

同時就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來看。「相思林事件」基本上是對外的衝突，「綜合大樓事件」中除了濁水溪社外，學生內部衝突的聲音並不明顯。但是從「農牧場事件」、「科技大樓事件」開始，學生群體內部不同的聲音變成異議性社團必須努力克服的問題。

就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學生的公共性在下降」（郭正亮語，參見何榮幸，2001：71）的說法中的「公共性」指的是什麼？是否對國家體制問題義無反顧的獻身，或者不加思索地把社會問題歸諸於威權政黨的國家機器（或是資本主義制度），

就是比較有「公共性」？而當學生費盡心思努力尋找可以和不同意見對話的機制，可以擴大結盟的語彙論述，就叫做耽於「自我權益受損」問題嗎？

筆者願意在此舉出一個粗略的數據觀察，依據鄧丕雲的紀錄，東海學生參加「三月學運」的人數最多達 261 人。而之後的「相思林事件」、1998 年的「小惠事件」遊行、1999 年的「118 事件」、乃至 2005 年的「平安夜，救東海」遊行的參加人數也都維持在 200 人以上¹¹³。如果參加遊行的人數並沒有大幅減少，那麼所謂學生的熱情降低是指什麼呢？亦或在 90 年代台灣的學生運動逐漸失去力量的時候，東海的學運卻始終維持不墜？¹¹⁴

確實如同後面章節的分析，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實踐囿於「地域主義」的限制。但這其中存在著歷史的結構性原因（參見第八章）。與其說當前的學生熱情消褪，耽於個人權益問題。不如說是學生運動實踐場域回歸其日常的生活世界，不再呼喊著打倒黨國大怪獸，而要啟動一個日常生活乃至自我的改造過程，面對存在於環境乃至自我內在的各種衝突。而「三月學運」也不過才剛為這個改造過程建立了正當性的基礎而已。

因此與其把「三月學運」之後的學生運動歷史，看成是一個不斷墮落退化的過程，不如視三月學運開啓了一個新的空間。而看起來一事無成的「後野百合時期」的學運，正在這個新空間中進行各種探索與修正，並承受因此而來的希望與挫折。

陳光興的〈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的觀點，掌握到當時具體出現的一些現象，但如同「文大美術系事件」參與者的批評，他的觀點在新和舊之間，做了過度武斷的區分。而就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來看，他對性別運動的期待也太過樂觀了。

確實在「農牧場事件」後（或說「綜合大樓事件」後），東海校園開始出現更多元的聲音。對於某些「後民論」的支持者來說，或許會歡慶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已經到來。但是當喧嘩的眾聲彼此內耗，或是針對著某個議題的發起者而來的時候，那麼事情恐怕就不是那麼好玩了。這裡必須設法創造一個「團結形式」，但這個團結形式看來並非是透過高喊「反資本主義」就可以形成的。而性別團體雖然開啓了很多新的空間，並沒有提供產生這個「團結形式」的基礎。從「後 118 時期」的運動實踐來看，比較具有團結作用的文化符碼，還是奠基在過去的歷史實踐基礎之上的「校園空間論述」，而且其作用正透過 90 年中期台灣社區運動在校園內開啓的新的實踐而逐漸在強化中。

在高聲歌頌「新」與「多」的時候，「後民論」的支持者卻忘記去思考一個問題：新如何持久？多如何聯結？而最起碼在東海校園裡，這是「三月學運」

¹¹³ 依筆者個人記憶，「118 事件」當晚可能有 300 人聚集在校長室前。

¹¹⁴ 感謝蔡建仁（小蔡）老師於論文寫過程中，給予筆者的支持與鼓勵。

之後的學運幹部所要努力面對解決的問題。學生會等校園民主機制的失敗，又更加強了創造一個新的「團結形式」的必要性。基於歷史提供的機會/限制或者柯司特所說的「別無選擇」¹¹⁵的情況下，校園空間問題在 1999 年之後，仍然成爲最有可能集結東海學生力量和引起公共討論的議題。

對照風起雲湧煙，遍地烽火的 80 年代末期，1994-1999 年的東海校園，實在是個讓人感到失望的時期。

當年東潮等社團戮力爭取建立，讓東海校方對外大力宣揚的校園民主機制，已變成中部地方媒體上的鬧劇。校園規劃制度雖經過多次的修改，仍未能阻止「德耀路大石頭事件」、「科技大樓事件」的發生。這兩個事件的發生也充分證明了學生雖然長於對抗外敵，但是卻拙於應付自己內部的矛盾，更多的時候，學生是以小團體的游擊戰的方式在對抗他們眼中的巨靈，而不是以他們所期待的統一戰線/擴大結盟的方式，接合校內不同的反宰制群體。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個充滿希望的時期。

更美學化、生活化的行動策略在「德耀路大石頭事件」中被採用。社區營造、參與式規劃的理念，頭一次出現在「科技大樓事件」的文宣中。訴諸傳統人文意象的校園組織方式被實踐，甚至連校方也承認校園景觀是東海是最大的資產，而出版了圖文並茂的《東海風》，參與整個校園空間記憶形塑的過程。

現實的困頓讓人感到失望，然而新的實踐所帶出的可能的未來，卻又鼓舞著學生向前挺進。如同過去東海的歷史，他們在希望和絕望，吶喊與嘆息之間，曲折地前進。

馬克思曾經說過：那種宛如被五色繽紛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滿極樂狂歡的革命，總是爲時短暫，很快的就會達到自己的頂點。相反地，真正的革命

--

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彷彿已經完成的事情上，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們十分無情的嘲笑自己初次企圖的不徹底性、弱點和不適當的地方，他們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裡吸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們面前挺立起來一樣；它們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地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狀況時為止，哪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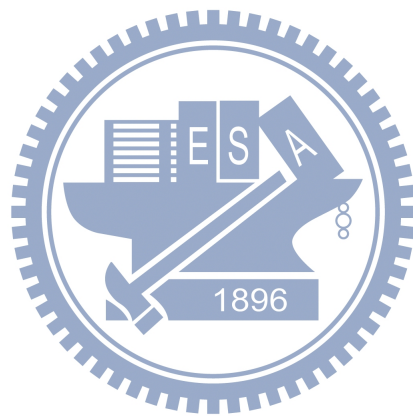
這裡是羅托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Marx，1992：607）

¹¹⁵參見第十章第二節。

再次回到起點的東海學生，正為著下一場舞會的開幕而準備，卻沒有看到他們腳下的土地有一道長達兩公里半的圍牆。能在大度山巔、相思樹梢跳著火焰之舞的戰士們，卻從來也沒有想過要跳出那道圍牆...。



第八章 嘆息之牆：從小惠事件談起

一所學校，假如對四週的社會和環境毫無影響作用的話，這所大學便將失去她存在的價值了。要記住大學的門不要開向象牙之塔，而是直接開向社會

——東海工作營創辦人 亨德教授¹¹⁶

以往我們將東海的孤立歸罪於地理因素，然而事實證明，我們的閉鎖是來自於心靈方面，環顧四周，就有很多直得我們就近服務的地方，譬如對我們校園周圍的鄰居們的生活，我們了解了多少？

——《東風》41 期



不論是從事件發生的原因、場合、過程來看，「小惠事件」都和自「新宗教中心事件」以降的校園空間運動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很難被歸類在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小惠事件」似乎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的意外，甚至根本就是例外！！然而正是這個難以被歸類的事件，鼓舞了自「科技大樓事件」受挫後，暫時沈寂的校園空間運動，間接促成了後來「118 事件」的發生。而促成事件發生的社會結構性因素，也和千禧年之後的「2003 年東海保衛戰」、「東大路拓寬事件」遙相呼應。環視九〇年代中期後，許多讚嘆、歌頌、保衛東海校園美景的論述，「小惠事件」的重要性，或許就在於它顯露了這所全國最美麗的大學，不為神聖之光¹¹⁷所照耀的月之暗面。

¹¹⁶ 亨德教授是東海創校時的社會學講師，他不但創辦創校時期三大社團之一的「工作營」，並在東海任滿退休後，將 60 幾萬的退休金全數捐出，以建立大度山頂的「簡易自來水」供水系統，解決山頂居民的飲水問題。其事蹟可以參考司馬中原的小說《啼明鳥》，以及白李秋蜜著的第三屆台中縣文學獎報導文學獎作品〈亨德教授與他的紀念公園〉。

¹¹⁷ 聖·奧古斯丁：「理智靈魂的本質就是如此，它由造物主炭進可理解的實在物之自然秩序之中，借助一種特定的、在本質上與它類似的、非肉體的理性之光，這種可理解的實在物就能被發現，正如肉體的眼睛能借助肉體的目光看見周圍的東西那樣。」(D. J. O'Connor, 1998: 236)

第一節 女人來了，烏龍滾開--小惠事件

1997年4月間，東海大學學生小惠（化名）在東海別墅住處，遭歹徒闖入房內進行性侵害未遂。調查及訴訟進行至1998年3月，被害人赫然發現警局竟沒有留下案發當日任何的報案記錄，懷疑警方有吃案之嫌疑，而當日歹徒留下的重要證物（眼鏡、衣物等）也因警方疏失而遺失。甚至包括DNA比對記錄呈送過程都有瑕疵。導致現場雖有目擊證人，受害者小惠卻仍陷入極為不利之情勢，甚至被反指為誣告。

這樁警方的「烏龍事件」發生後，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女研社等社團決定串連為受害人小惠爭取權益，立即於校內張貼海報，向媒體發佈消息，譴責負責管理東別地區治安的犁份派出所警員的失職，並計畫發起「女人來了，烏龍滾開」遊行，要求警方負起責任，並改善性侵害事件報案的處理過程。

人間工作坊、女性研究社、台灣文化研究社、濁水溪社¹¹⁸、客家文化研究社、學生議會議長洪萱芳、社會系系學會會長蘇聖峰等，並對外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支持受害者勇敢站出來澄清案情，並要求：

- 一、 警方應向該名受害同學道歉，並改善蒐證、偵察之程序，不再以輕忽草率態度處理學生之報案。
- 二、 警方應研擬性侵害案件的處理過程，確保受害人之權益。
- 三、 為證明警察終止性侵害事件之決心，警方應定期公佈報案件數及破案比例，並接受公開監督。
- 四、 校方應負起監督警方破案之責任，要求警方定期會報，並成立性侵害事件處理小組，協助受害者處理相關報案、應訊及對外發言之事項。

消息披露後，東海校方亦十分重視此事，除組成「專案小組」處理此事外，並表示盡全力支持受害學生在法律和各方面的支援，並研究改進未來有關性侵害防治的處理和作法。而對學生的抗議行動，認為事關正義及同學安全，學生此項作為，學校必然予以支持與協助（東行，民87.3.4）。

3月5日上午10點半，在東海女研社等社團的號召下，東海大學學生約200

¹¹⁸ 如同本文第六章第四節所描述，「濁水溪社」原為由一群政研所學生組成的社團，並在「獨台會事件」、「綜合大樓事件」上，抱持和異議性社團完全對立的意見。但在停止運作數年後，於1997年為一群反對九屆學生會長陳成誼的的議員接掌。新的濁水溪社除了第七章第五節和學生會的衝突外，並在校內發起「平安夜打掃校園環境」活動，同時在一些校內公共事務議題上和人間、台研、女研有密切的合作，包括這次的小惠事件。

餘人，於校內 T 大樓（綜合教學大樓）廣場集合。遊行隊伍於上午 11 時出發，抗議學生手持鈴鐺，高呼口號：「警察擺烏龍，學生滿肚火」、「警察要辦案，不要吃案」、「小紅帽當家作主，大野狼滾出別墅」等，並高唱改編過的諷刺歌曲。在穿越相思林，走出東海大學後門之後，在放著約翰藍儂(John Lenon)的「Power to the people」歌聲的吉普車¹¹⁹前導下，沿新興路、遊園路到達坪頂村的犁份派出所，表達對警方的「烏龍」造成性侵害受害人的二度傷害的憤慨。

學生來到犁份派出所廣場後，首先高呼口號，演出行動劇，諷刺警方草率的辦案方式。在行動劇演完後並提出四項公約，學生要求警方簽署公約，並為遺失證物道歉：

- 一、 確保證物及報案紀錄遺失之烏龍事件不再發生。
- 二、 改善蒐證及偵查程序。
- 三、 研擬性侵害案件的處理程序。
- 四、 定期公布報案件數及破案比率等。

隨後學生推派代表進入派出所。所長鄭清忠表示，此案發生時尚未到任，但願為遺失證物致歉。負責處理此案的副主管陳作豪則到外面向學生說明，強調會改進偵查技巧，並在學生提出的公約書海報上簽名。最後東海學生在高呼支持警察維護治安、感謝警察的辛勞後離去（中央/中時/聯合，中部地方版，1998.3.6）。

3 月 5 日下午，「小惠案」一審辯論庭終結，台中地方法院審理後，裁定紀姓涉嫌人以 30 萬元交保。東海大學校方及參與聲援小惠行動的學生社團，在校內舉行記者會。王亢沛校長對紀嫌獲交保表示疑惑與不認同，校方非常遺憾，已決定正式聘請律師為受害學生爭取權益，同時要求警方對小惠提供保護。學生社團代表則要求警方對失職員警予以處分。

負責偵辦的台中縣警察局，在對此次「烏龍事件」進行內部專題研究報告後指出，警方處理確有疏失，並已議處相關人員。日後對於刑事偵查人員將加強訓練，利用科學方法偵辦刑案，避免因證人指證錯誤，冤枉他人，縱容嫌犯繼續犯案（中時，1998.3.16）。

3 月 16 日，小惠遭性侵害未遂案宣判前夕，東海女研社、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濁水溪社等社團，於晚間 9 時 30 分在 T 大樓廣場發起「聲援小惠，同來守夜」活動。除東海學生外，另有靜宜大學浪淘沙社、中興大學黑

¹¹⁹ 這台吉普車是學校附近書店「東海書苑」老闆廖英良提供的。附帶一提，書苑的職員，東海社研所畢業生，東海女研社學姐馮小非在「小惠事件」中亦扮演重要角色。然因論文篇幅所限，無法多做描述。在此感謝東海書苑的廖英良、吳孟如，於筆者研擬論文計畫書時給予的建議。

森林工作室及兩校女研社的學生參與守夜活動，靜宜大學學生議會並於當天中午在校內發起「聲援小惠，拒絕性侵害」連署簽名活動。東海大學校方除學務長及課外組、教官室人員到場表示關切外，並提供 50 人份的宵夜，讓學生在寒夜補充體力，也表示學校的支持。至於受害學生小惠則隱身在人群中。與大家一起守夜，表達爭取安全無虞環境的心聲（1998.3.17，中時/聯合/自由）。

3 月 17 日，台中地方法院宣判，紀姓嫌犯以性侵害未遂求刑。

3 月 18 日，王學務長於行政會議上報告：

1. 紀案於 3 月 17 日宣判，工作小組將在討論之後決定後續各項必要措施。

2. 本校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女研社、濁水溪社等社團於 3 月 16 日晚 9 時在 T 大樓發起「聲援小惠，同來守夜」活動，過程理性平和，期間代表學校準備夜點慰勉參與學生，總教官、葉主任教官、生輔組陶組長、課外傳組長等師長均到場深表關切，活動至翌晨三時圓滿結束（東行，民 87.3.18）

「小惠事件」發生後，東海校格外重視東別地區的學生安全問題，除和地方行政、警政機關舉行多次座談會外，並在 4 月 16 日舉辦「中區大專院校處理性侵害事件工作研習會」，藉以整合中部地區資源與人力，研議有效之實務作法，以建構處理網絡，提供學生必要之協助。

「小惠事件」是台灣學運繼 1994 年「文大美術系事件」之後，另一起校園內的大規模遊行抗議活動，也是東海在 1990 年「相思林事件」後再次的學生遊行抗議事件。巧合的是，3 月 5 日「女人來了，烏龍滾開」遊行結束後次日，北部輔仁大學也在跨校性組織「四校例會」的協助下，聯合北部數個學校學生社團在校內發起「反高學費」遊行。

第二節 非正式部門作用下的東海別墅

逼走孟東籬

在所有曾以東海為題進行創作的作家中，孟東籬是唯一一位提到 80 年代以後東海校外居住環境的人。

生性淡泊的孟東籬，雖然熱愛鹽寮的海與在茅屋的生活。但沒有建築，沒有綠樹，只有苛烈的冬風與夏日的鹽寮，讓他沒有地方散步，讓他感覺到自己被封閉在鹽寮的海邊。於是他決定「衝」向東海大學---一個有優美建築和大片綠樹，有文明，有文化，更且充滿著晴天的地方。

但是在搬到東大附近的國際城（國際街）後不久，敏感而細緻的孟東籬立刻感受到許多困擾，首先是周邊環境的各種噪音：摩托車、卡車、小販的叫賣，還有噴射戰鬥機的飛行聲。接著是國際街和東海別墅的巷弄角落、空地裡，開膛破肚、濕臭腐爛、堆積如山的棄置垃圾袋。甚至連唯一的一塊淨土--東大校園，在從東大到東別間的小徑兩旁，由於管理不善：

未設垃圾箱時固是到處垃圾袋，設箱以後，更是箱裡箱外都是垃圾（孟東籬，1986：103）

惡劣又每下愈況的環境問題，使得孟東籬忍不住大喊：

生活在台灣的人怎麼可以這樣！生活在台灣的人，有這麼多這樣的人，台灣怎麼救？（105）

於是在搬到東海半年後，他們一家決定搬回鹽寮居住。儘管孟東籬個人非常喜歡東大校園，儘管鹽寮有那麼多文化上的缺點，但至少在偏僻封閉的鹽寮，他們可以快快樂樂的過日子，不用忍受惡劣環境的勒索。

台灣奇蹟之東海別墅

創造出發生「小惠事件」和逼走孟東籬的惡劣環境的元兇，乃是在「非正式部門」作用下的東別地區空間發展結構。

關於「正式部門」和「非正式部門」的界定一直是個有爭議的概念。柯司特建議應從歷史的現實考察非正式經濟的形成，並將其理解為一種過程，而不是一個清楚的對象、物體。他認為非正式經濟的重要特性為：「在一個同樣的活動是納入管制的合法的與社會的環境中，它卻不受社會制度的管制。」因此「非正式部門」的界定，涉及國家或地方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管制的制度性邊界的任

何改變，而國家或地方政府經常刻意容忍甚至刺激非正式經濟活動的發展，做爲一種解決潛在的社會衝突或是促進政治擁護的方式（Castells and Portes，1999）。

夏鑄九認爲非正式經濟的蓬勃是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色，由於國家的縱容以及都市的公共服務不足，促進了台灣都市發展過程中「非正式部門」的持續擴張。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國家未能滿足的「集體消費」需求，透過「非正式部門」來填補，由此造成了台灣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的急遽惡化。台灣社會非正式經濟的擴張，同時造成了勞動關係的非正式化，助長了個人化的投機主義，使得人們無法有能力組織自己，給予國家政治壓力而得到公部門提供的服務（夏鑄九，1995：72-73）

東海別墅（簡稱：東別），東海師生多半稱爲「東別」。東別在行政區域上原本屬於台中縣龍井鄉新庄子村，至 1982 年由於該地區人口過多，又由新庄子村再劃分出一新東村，新東村的行政區域大致上涵蓋了整個東別地區（林育群，2001：11）。

這個區域原本只是一大片甘蔗園，在 1960 年以前僅有一條產業道路（現在的遊園路）穿越其間，當時東海校門口的中港路也僅是一條不平坦的黃泥道路。後來之所以會被稱爲「東海別墅」，是因爲在 1974 年間「北屋建設」公司配合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完成前進行搶建，由葉條輝規劃，在該地興建了一系列的兩層樓鄉村別墅住宅群，名爲「東海別墅」。而在文字宣傳內容上，其宣傳封面就是以東海大學約農路的林蔭大道以及校園綠地爲賣點。

初期由於該地地處偏遠，加上公用設施不足，經常斷水斷電，因此銷售情況不如預期。然而 1974 年後由於東海大學擴大招生，加上廢棄全體住校制，使得每年有大量學生必須在外租賃房屋居住，學生的生活和這裡的聯繫變得十分緊密，東別遂成爲東海大學的腹地，變成近似大學城的生活形態（東海大學生會/學生議會，2005）。

學生的大量湧入，使得東別的居住型態產生改變，除了私人興建的學生宿舍外，也包括一部份原本的舊別墅改建。80 年代後隨著台中市區的發展，鄰近東海大學的國際街以及「瑞聯天地」（1992 年完成）等住宅區也先後完成，原本來此地購屋者主要是做爲投資用，但在幾波房屋市場不景氣的衝擊下，部份住宅區也開放爲組賃空間。

根據林育群¹²⁰的研究，早期（1974--1976）東別的空間以家庭居住爲主。其後由於學生大量湧入，在學生所需的空間與活動和原先生活居住機能相異的情形下，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致使空間的架構發生變化。例如餐廳、廚房

¹²⁰ 感謝林育群提供他的畢業論文，以及幫我尋找賴志彰的博士論文，對我的論文寫作幫助甚大。

空間消失，客廳成爲臥室等等。而較晚期興建的私人出租學生宿舍、學生套房，除了反應學生對於生活空間的需求之外，也反應市場針對藉由空間租賃獲利傾向所發展出來的空間類型。例如：採取中央空間廊道式的配置方式，單一制式的空間分隔方式等等，都呈現了追求基地空間內部最大獲利性的空間發展邏輯。

但不論是由原本的家庭住宅改建，或是新起的學生套房、學生宿舍，主要參與營建或環境規劃的並非使用者和公部門，而是地主或是以購買房屋做爲增值交易的投資者，以遊走於法律邊緣的非正式部門的營造方式進行的，因此：

由非正式部門所經營的住宿空間，在成本考量與利益的計算上均有缺漏，在這種空間商品化的經營底下，住宿空間類型受制於出租利潤，致使學生生活與學習、交誼空間的不足，但卻矛盾的負起提供教育部門不足的住宿空間。

（林育群，2001b：37）

因此東別地區的空間發展，必然沿著台灣非正式部門的空間發展邏輯進行，造成生活環境品質的嚴重惡化，然而也因爲東別地區的住宿空間是經由非正式部門的運作發展出來的，使得公共環境的問題更難透過公共資源的灌注予以解決。

「龍目井文化協進會」的理事長林松範先生即曾在座談會中表示：

我們這裡是屬於台中縣的龍井鄉，龍井鄉一直都沒有都市計畫，建築很多卻又亂蓋，變成大家都違法，如此以來，經營也就不可能不出現問題了；既然經營出了問題，大家也都不敢去問，「誰都不肯去問」，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在東別這個地方要求生存，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問題，就是要合法、要安全…〔但是〕真的〔碰到〕問題也不敢去問。

（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5）

如此畸型的發展歷程下，東別的環境之每下愈況自是不難想像，無怪乎前東海建築系系主任詹耀文會表示：

東別算是台灣的一個奇蹟，也是個特景，也就是說，在東別住的學生是在學歷方面在水準以上，但住的環境是水準以下。

（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5）

白錫旻與藝術街坊

和東別的情況類似，隔著中港路，位在東別對面的國際城、富貴城，在興建完工後也因爲公共設施不足、治安不佳等問題，住屋率僅三成。但在1987年「台鼎建設」決定以「理想國」爲名，進行此地區的社區更新工作，而賦予這個地

區在 90 年代後有著和東別不同的面貌。

「台鼎建設」首先以國際街二巷爲主軸，收購與承租原來舊公寓的一樓，加以改裝成 17 個店面，配合環境綠化以及「青銅時代」、「銀河世紀」等新建社區的完成，將國際街二巷經營成「藝術街坊」，企圖在大度山上創造一條具有文化特色的商店街。

1994 年 4 月，理想國售出「藝術街坊」的店面，表示街坊自主發展階段的來臨，而「藝術街坊自治會」也跟著產生。由於店家開始擁有土地的產權，因此重新大幅裝修，使街道、店面景觀爲之一變。咖啡店、藝文文化精品店集中的「藝術街坊」，成爲中部地區著名的觀光景點，每逢假日遊人如織，因此吸引了台中縣政府等公部門的資源引入，進行美化「藝術街坊」的工程，包括路面重鋪、路燈、街道景觀重設等，並於 1999 年 12 月 25 日完工。

雖然「台鼎建設」後來因爲財務問題而宣告倒閉（有人說是因爲「理想國」計畫投資過鉅所致），但是「藝術街坊」的成功，卻成爲後來台灣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楷模。

規劃建設「理想國」的「台鼎建設」公司有大量東海建築系的畢業生在裡面工作，事實上「台鼎建設」公司董事長白錫旻本身就是東海建築系校友。不過除此之外，東海學生對「理想國」的改造過程的參與是非常少的。除了偶而有學生協助「藝術街坊」的社區藝文表演活動外，東海對「藝術街坊」最大的貢獻，或許就是以消費者的姿態維持該地區的經濟活動。

1995 年，黃敏禎在其堪稱是先驅性的對台灣私立大學學生住宿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論文中表示：

事實上，校園發展與都市計畫的脫節而扭曲了都市功能、意義的現象，已經在其他大學發生，例如：文化、逢甲、東海、輔仁等。假如，都市計畫仍忽視私立大學設校後的影響，以及校園無視都市計畫的限制而大肆擴張，我們可以預見這兩者之間空間衝突的昇級（黃敏禎，1995：112）

這段話宛如預見了三年後東海「小惠事件」的發生。然而在東海大學，校園與都市發展之間的逐漸升級的空間衝突，並不只顯現在校外非正式部門的房屋租賃市場，還有正式部門失效的都市計畫機制。

第三節 失效的都市計畫與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

對應於完全透過非正式部門運作建立起來的東別，台中工業區以及聯外道路問題，則顯現了台灣的國家機器、地方政府在正式部門的都市空間管理機制的侷限。

失效的都市計畫機制

都市計畫做為一綜合性、長期性空間管理工作，對於都市區域發展，乃至人民權益影響甚鉅，因此對於相關單位所擬定的都市計畫，必須藉由一套嚴謹機制的運作來確保都市計畫的合理性。不過至少在台中市的都市計畫審議機制的運作中，展現了若干制度性的問題。王光旭在其研究中，以台中市的都市計畫審議機制為例，指出台灣都市計畫機制在運作上的幾點問題：

第一、都市計畫體系呈現的是鬆散的國家結構，雖然名義上都市計畫必須聽從國家的上位計畫、國土計畫以及中央機關的指導。但一方面在大架構的國土計畫體系上，國家並無事權統一之專責機構，也沒有長期導向的策略與發展目標。另一方面上級政府對於都市計畫的核定僅止於原則上的核定，如非案件內容發生重大爭議，計畫大都不會遭到更動或否決。因此：

都市計畫體系最重要的運作機制並非掌握在國家及制度的規範下，而是掌握在握有地方政經資源的民選首長及派系成員（王光旭，2002：109）

第二、都市計畫是菁英集團的權力運作，地方政經菁英取代市民成為都市計畫最主要的參與者。由於市長對於都委會的人事聘任權、利益迴避制度的缺乏以審議過程的不透明化，使得都市計畫擬定或審議過程過程中，充滿非正式的關說與利益輸送者的通路，缺乏民眾有效的監督，穩固的連結政經菁英與土地投機者的利益共生關係。

第三、政治決策過程中政治力影響因素大於專業性的考量。由於上級政府對都市計畫的約束力不足，加上制度環境因素有利於私部門透過各種管道，滲透到都市計畫體系公共政策的權力機制。因此專家學者的專業性考量，在都市計畫決策的網絡結構中其實是被邊緣化的。

因此

台中市都委會的權力運作機制，呈現了一種穩定而非正式的網絡互動關係。這樣的關係更深入的探討可說是建立在地方政經菁英為了掠奪土地利益所呈現的資源依賴關係，在當中行動者所交易的是土地利益及政經權力的資源…決策

有如是菁英分子權力遊戲下的產物，制度不過是其合法化土地利益最有力的工具。

(王光旭，2002：110-111)

這個宛如掠食者樂園的都市計畫機制，帶給東海的是一個數十年揮之不去的夢魘---工業區聯外道路！！

台中工業區開闢與聯外道路問題

在台中市的都市發展中，大度山台地在 1971 年之前是被邊緣化的非都市計畫地區，空曠的台地上只有一些原本世居在青埔及大埔和龜山地區的農民¹²¹，還有坪頂地區的居民以及東海大學。除了 1955 年因為東海大學建校，對此地空間使用造成衝擊外，並未受到歷任市長的重視（同上：120）。

由於台灣經濟發展、社會轉型，政府於 1958 年 9 月制訂了「獎勵投資條例」，以提供私人投資諸多誘因，加速我國邁入工業發展國家之林。然而當時的台中市由於原本的「東南工業區」（在台中市東區和南區）面積不夠，大型廠商設廠不易，同時由於工業用地不足，使得都市空間分區使用管制困難，違章工廠林立，影重環境及地區經濟發展甚鉅。於是台中市府會一致以輔導設置違章工廠，創造優良投資環境，並建立中部精密機械工業生產重鎮為由，要求設立「台中工業區」。

「台中工業區」原本計畫的地點是設在南屯，因為遭到經濟部及內政部反對，於 1971 年配合十大建設中的南北高速公路與台中港的興建，選定大度山麓做為新的工業區區位。1972 年工業區第一期開發由中央全權規劃，之後由台中市政府委託省政府事業單位「台灣土地開發公司」（簡稱：台開公司）辦理台中工業區的開發事宜。台開公司於 1973 年到 1976 年間，徵收了兩期的工業區用地，東海校園周遭的環境開始改變，櫛次比鄰的工廠取代了原本的農村田園景觀。

初時台中工業區不過五、六十家廠商，且都集中在一期工業區，而後由於工業區第二期的開發，使得工業區對外交通不足的問題慢慢浮現。在 1975 年 6 月台開公司於《台中工業區後期開發計畫書》中，設置了區外道路¹²²的規劃：

於本工業區北端邊界設一區外道路，寬 24.5 米，長約 200 公尺，與台中港

¹²¹ 青埔、大埔及龜山是大度山台地的舊地名。東海西北側的山坡就是青埔，南側山坡舊名虎寮埔，然而因其面積大，是今日工業區第一、二期用地的主要部份，也有人將其稱為大埔。南邊溪南側，即現今工業區第三期的用地，舊名龜山，顧名思義是因其山形，神似一直爬山的龜而得名（王光旭，2002：120）。

¹²² 「區外道路是台開公司後期開發計畫書中所使用的名稱，與後來所稱之工業區聯外道路、工業十六路聯外道路一致」（王光旭，2002：122，注 58）

路銜接，使全區道路系統與台中港陸成一環狀連線，以利交通流暢（同上：123）

由於這條路穿越東海大學西側校地，台開公司於 1977 至 1979 年間，即不斷委請台中市政府與東海大學協商，希望能獲得東海大學首肯。

1979 年台中工業區開發聯繫小組第 31 次代表會議中，東海大學代表提出道路用地的徵收希望以地易地或相當於市價的價格收購，以用以建造學生活動中心工學生活動之需要，但因徵收成本過高遭到台開公司否決（同上：125）。

1980 年 8 月 29 日，台中市政府又召開一次協調會，東海大學於會中提出區外道路可由人煙稀少的坪頂地區連結遊園路進出的替代方案，該案並得到台中縣坪頂地區地方人士的支持，認為東海大學所提之建議有助於當地發展。

但在同年 10 月 23 日的另一次協調會中，台市府與台開公司，以道路寬度與距離過短為由，否決東海大學所提的替代方案提案，並強烈希望東海大學接受規劃單位的方案。另一方面東海代表在會中的態度趨於強硬，表示除了撤銷原計畫另謀出路之外，若要從東海大學校園進出礙難辦理。東海大學與台中市政府、工業區之間關於「工業區聯外道路」的長期衝突從此展開（同上：127）。

大度山不可承受之路

1981 年，「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完成，在公告的通盤檢討計畫中，劃定 25 米寬之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東海大學西側校園。但東海大學仍持異議，故本案暫時保留，提請省都委會裁決。

在這段期間，1979 年郵政總局與東海大學商定以「交互贈與」方式，由東海大學贈與郵政總局西側兩千坪土地，郵政總局則自與東海大學四千萬，做為東海當時興建圖書館的基金，並於 1983 年完成「交互贈與」手續。然而東海所贈與的郵政總局的土地，恰好正是「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中，台中市政府所規劃之工業區聯外道路的預定用地，使得更多的行動者介入這個空間的衝突中，也增加了該案的複雜度。

1985 年 3 月，省都委會決議「工業區聯外道路」一案暫時保留，但東海大學不得在此興建校舍。

1986 年，「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正式公告實施。

由於東海大學對開闢聯外道路穿越校園一事反彈甚烈，1988 年台中市長張子源受邀出席東海大學「師生座談會」時（參見第五章），也曾討論到工業區聯外道路的問題。

1990 年，「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開始，懸而未決的「聯外道路

問題」，再度成為檢討、討論的焦點之一。同年 6 月東海大學爆發「相思林事件」，學生的抗爭行動也影響了東海校方對於聯外道路問題的態度。為免爭議再起，校方於行政會議中決議利用「第二次通盤檢討」的機會，提案從制度上廢除工業區聯外道路的規劃。

東海大學積極的動作，產生了正面的效果。1991 年 2 月，台中市政府召開「台中市第二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都委會大會」，會中一致同意，將聯外路預定地變更為綠帶，並呈請省都委會及內政部同意。但此舉也激起了工業區廠商進行連署，並串連地方議員及中央民代進行遊說。

1993 年 3 月，台中市第二次通盤檢討審議案提報至省都委會審議，省都委會決議再將綠帶變更為 40 米道路用地，引起東海學生在校內發起抗議行動，並在媒體報導下，形成「保衛相思林」的氛圍。在上下一致、同仇敵愾的氣氛下，新任的東海大學校長阮大年、董事長周聯華及相關人員等，列席 1993 年 10 月的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在東海大學代表力爭之下，聯外道路一案遭到擱置。

1994 內政部都委會第 377 次會議決議：聯外道路一案「維持原計畫，似地方政府與東海大學協調後再議」

1995 年 2 月，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佈實施，聯外道路案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延擱再議。

1996 年，台中市政府委託逢甲大學規劃工業區及工業住宅區細部計畫，並將工業區聯外道路納入細部計畫範圍。

2000 年 10 月 17 日，台中市長張溫鷹與工業區廠商座談，會中允諾將工業十六路聯外道路，納入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中。

同年 12 月 5 日上午，台中市政府業邀及台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協和社區發展協會代表，以及交通局、建設局、工務局官員、規劃單位逢甲大學與東海大學相關人員至相思林地會勘。東海大學除當場表達反對意見外，並在行政會議決議成立對策因應小組，行文台中市政府瞭解全案進度，隨時密切觀察、掌握，並請總務處著手蒐集十餘年來與「工業區聯外道路案」相關之公文檔案資料，製作完整圖表與說帖（東行，民 89.12.6/12.13）。

12 月 7 日，台中市政府發佈新聞稿指出，台中市政府擬開闢工業十六路之聯外道路，勘查意見將送請都委會審議。這個新聞激起東海大學校內強烈的反應，東大校方於 12 月 15 日舉行記者會，除表達反對意見、提出兩替代方案之外，並表示將發動師生公開連署陳情。工業區廠商針對東海大學的反彈，提出「上天入地」的方案，建議市府採取工程地下化或立體化。雙方仍然各說各話，沒有任何共識。

2001年9月，台中市政府計畫於9月27日在東海大學舉辦說明會，東海學生社團如大度山社等表示將集結校內師生，於會中表達反對開闢聯外道路的心聲。後因颱風過境，說明會臨時取消。

2002年5月，在長久和東海大學溝通討論未果的情況下，工業區部份廠商憤而在媒體上揚言：「工業十六路不打通，永不錄用東海人」，引起校內師生強烈反彈。王亢沛校長在詳閱媒體報導後於行政會議中表示：

此種言論應為少數私心自用的廠商所發表，以東海大學既定立場，未來也不致於鼓勵畢業生前往毫無環保概念、漠視文化、不尊重大學高等教育之廠商或機構謀職，本校亦必不予理會其偏頗意見（東行，民91.5.1）

學生會長及部份學生社團亦在媒體上指責工業區的粗暴言論，除此之外校內師生並無其他行動。但是工業區要求開闢聯外道路的強烈企圖心，以及市府搖擺不定的態度，埋下了之後爆發2003年「東海保衛戰」的伏筆。

相思林扮演的角色

王光旭在其研究中，依據台中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順序，將整個聯外道路事件的發展分為三期，在1975--1985第一次事件中，東海大學完全是憑仗著校內教授擔任台中市都委會委員的制度性位置，以及當時梅可望校長本身黨政軍的社會關係，來對抗台中市府和工業區廠商、土地資本的利益集團（王光旭：137）。

在1990--1994的第二次事件中，由於阮大年校長沒有梅可望那樣的黨政關係，學生的抗議行動對校方在制度內的斡旋、遊說，產生支援的作用。由於1990年「相思林事件」，使得「相思林」成為東海校園、東海學生運動的重要象徵，附著於相思林之上的情感和歷史記憶，對校內產生極大的動員效果。同時也易於吸引媒體注意，爭取社會大眾支持。

學生當時針對聯外道路事件所引發的抗爭行動，最終的目的在於凝聚學生保林意識，並取得社會大眾的支持。當時學生團體透過抗議海報的製作、連署行動及抗議遊行等方式，引起媒體注意，並透過新聞媒體的宣傳，將東海大學師生保護相思林地的環保訴求公諸於社會輿論公評，以取得訴求上的合法性。

（王光旭：152）。

而東海校方除了制度內的斡旋外，也嘗試以「搶建」的方式來阻止聯外道路的興築。例如梅可望校長將相思林地以「交互贈與」方式，讓郵政總局在其上興築大樓，使得聯外道路問題複雜化。而在1999年「118事件」發生後，王亢沛校長也曾向學生表示，砍伐相思林興建學生機車停車場，部份原因是為了建

立學校在聯外道路問題上的優勢¹²³。

但是台中市府相關業務單位以及工業區廠商的觀點，卻認為由於相思林西側贈與郵政總局，所謂開闢聯外道路將把東海大學剖成兩半的說法已不成立。在王光旭論文中，一位曾任職於市府業務單位的受訪者表示：

其實這條路從東海大學的最西側經過，西邊的校地都已經賣給郵局了，這條路對於東海來說。其實不是將東海一分為二，就如同中港路一樣，是東海大學校區旁的道路，這是一樣的情形（王光旭：155、250）

「相思林事件」對東海校內師生動員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 2000 年，由於工業住宅區細部計畫以及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所引起的第三次事件¹²⁴。王光旭在其研究中注意到，贊成與反對兩方的對立，環繞著兩個衝突點而展開：一方面是關於聯外道路是否可以達成經濟效益的爭執，另一方面子則是交通問題和護林問題的意識對抗（王光旭：163）。但在東海校內，如同前面數章所述，學生也因為相思林地的問題而和校方發生數次劇烈的衝突，包括「相思林事件」九年後在原地發生的「118 事件」。「相思林」變成東海學生、東海校方、台中市府、工業區廠商之間多方力量角逐衝突的戰場。

第四節 共同體想像下的校園/社會關係

共同體想像與抵抗性認同

如同第二章所描述的，關於東海校園的共同體想像起自 1970 年代處於內外環境丕變時，東海師生對當下環境的不滿與批判。東海校園的「共同體想像」的形成，近似柯司特所說的「抵抗性認同」的建構--嘗試建構一個能抵抗外界的壓迫或衝擊的集體，而且通常建立在歷史、地理、生物等能夠清楚界定，並使抵抗的邊界本質化的基礎上（Castells，2002：9）。

在「抵抗性認同」建構的過程中，有心的東海人運用過去的歷史，召喚校園師生、校友進行校園改革的工作，並樹立起東海大學在台灣社會高教市場中的獨特性宣稱。在共同體想像的作用下，東海校園內部被想像成是純潔而同一，或者本來是純潔而同一的，但因著內部的背叛者或外來的入侵者，使其失去原

¹²³ 「去年初學校擬興建『學生機車停車場』之際，曾向少數持反對意見同學說明市府是項計畫及對學校深遠影響，惟未獲認同且區等仍舊堅持反對立場，當時若『學生機車停車場』於預定原址動工，建成後對爭取校地完整性勢必更具優勢保障。」（東行，民 89.11.29，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¹²⁴ 按王光旭的論文的研究時間只到 2001 年 9 月，不過依照他對工業區聯外道路事件分期的標準來看，這個第 3 次事件的期間，涵蓋了發生於 2003 年 10 月為期一個月的「東海保衛戰」。

本美好的特質。聲討背叛者、防禦入侵者就成了改造/重建共同體的重要目標之一。

但是柯司特也強調「抵抗性認同」的建構過程並不必然導致「部落主義」，它也有可能透過延伸個別社區的利益，建構出「不同的生活計畫」，再以這個計畫延伸向社會的轉化，筆者特別將這個轉化的路徑稱做：「認同的基進轉化」。

就 90 年代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來看，如同第三章所言，雖然在「相思林事件」後異議性社團一直企圖將校內空間議題的討論帶離校園圍牆的視域，但是整體看來內外界限分明的共同體想像，依然支配著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最具體的檢驗，就是東海大學對待東別問題和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完全不同的態度。

神聖之光照耀不到的角落

東別地區環境問題，如同第五章所描述的，可以以 1987 年的「東大學生十大罪狀」事件為開端，是「東潮時期」校內學生運動關注的重要議題，也是「相思林時期」女研社成立後第一個關注的議題。

除了文字的討論外，異議性社團最早有組織的介入東別環境問題的行動，應是在 1991 年暑假，由第三屆東海學生會、人間工作坊、環境生態社共同進行的「東海別墅社區調查」。三個團體的成員組成十五人的工作隊，分成三組，第一組負責電玩、茶藝館、租書店等休閒娛樂行業的調查，第二組則針對房租、交通、空間做探討，第三組則負責環境衛生，生活安全等部分。以兩星期時間，進行實地勘查以及拜訪鄉公所、派出所等相關單位（羅雅美，1991）。在 1992 年並曾派員參與、觀察新東村居民的「新東村反納骨塔事件」¹²⁵。

東海學生會方面，改善東別環境品質幾乎是每次學生會選舉中，候選人都會提出來的政見。而學生會生促部因職責所在更是對東別問題保持關注，但是多半在處理房屋租賃的問題。在第四屆學生會時，曾提出過一個構想龐大的「別墅問題整頓計畫」，計畫成立一個委員會，由新東村村長擔任委員，本校校長或訓導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執行委員則由弘光護專、靜宜大學及本校幹部共同擔任，整頓範圍大約致是以國際街、遠東街、東園向及新興路地等處為範圍的別墅地區。並成立「清潔工作隊」、「交通問題處理委員會」、「別墅交通工作隊」等，以維護東別的環境整潔、交通問題，並和相關單位溝通研擬交通解決方案（東新第 38 期，1993.3.12）。但是後來這個計畫並沒有持續運作，而之後的學生會除了房屋租賃問題外，也未再針對東別問題提出過有組織的行動計畫。

¹²⁵ 1991 年 12 月東海大學附近新東村居民，為反對台中市第七信用合作社於該處興建納骨塔，發起一系列陳情、抗議行動。當時東海學生社團人間工作坊，有派幹部前往參與、瞭解居民的抗議行動，並將事件過程發表於社團刊物上，參見《人間札記》第十期（人間工作坊，1992c）。

東海校方除了第五章所描述的，成立「新東社區學生服務中心」外，並曾在 1995 年間由學務處致函台中縣政府縣警局等有關單位，對本校附近學生密集租居之新東社區安全予以重視，實施安檢，促請限期改善違規設施或拆除。並以阮大年校長名義函請新東社區各房東，改善租居環境，檢視消防安全，以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另外在 1996 年 3 月，台中縣政府曾函請本校輔導學生勿租賃違建物，以維護學生住居之安全。校方並將新東社區違建物的詳細地址，刊登於校刊上，公布給校內學生（東行，民 85.3.20）。

另外爲了改善校園和周邊社區的關係，學校偶而也會透過課外組發動學生社團進行清掃社區環境的活動。例如在 1996 年 10 月 29 日，爲慶祝創校 41 週年，東海發起「敦親睦鄰淨街活動」，分 16 區同時進行，動員學生匯集校內師生、服務性社團學生約千人，清掃包括校內退休宿舍區、校外榮總醫院至東海別墅地區（東行，民 82.10.30）。

東別和東海學生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但是細數東海校方和學生會、學生運動的行動，往往都是斷裂而缺乏持續性的。這些行動的未竟全功當然和東別地區的非正式部門的空間發展結構有關係。非正式部門的運作使得空間的管理單位變得十分複雜，林松範理事長曾描述過一個令人感到十分驚奇的經驗：

那時我們和社會系的王崇名老師就有個想法，想先針對東別的一條巷子來做新的規劃，我們當時先想到的是 4 弄（何媽媽冰店那裡），而東園巷 4 弄商家們也都簽名同意了此想法…後來等到我們一切準備就緒，商家們也都簽署完成，結果公文送到鄉公所那裡，卻發現那條街不是屬於台中縣政府的，而是屬於澎湖縣政府的土地。也許是以前財務上的問題拿去抵押…。

（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5）

除了這個極端性的例子之外，東別的地主多半是房東，未必皆居住在當地，店家的店面也多半是租來的，空間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混淆不清，使得運動不易找到具體的負責對象。同時居住在東別的不只是東海學生，還包括附近靜宜大學、弘光技術學院的學生，也增加了運動動員的困難。

不過相較於也是非正式部門運作下發展出來的淡江、文化等校學生外宿區，都還曾經發生過抗租運動與遊行，然而同樣空間結構下作用的東海卻不曾發生過。而如果對比於因校內重大工程建設而持續不斷發生的運動，這個差異就更加明顯了。對於校園內景觀十分敏感的東海學生，卻對於每天要生活最少八小時，環境景觀更加惡劣的東別完全沒有感覺。這裡面觸及到的已不只是資源動員難易的問題，還有學生對於校園內外的感覺結構、文化想像的形成。

東別並非是個完全不存在於東海校園空間論述中的「看不見的城市」。在 90 年中期的《東海風》，還有大量的學生刊物都曾經介紹東別，甚至是專輯的介紹，然而大部分的內容多半是針對東別地區的消費、休閒景點的介紹。隨著週休二

日制推行，國民觀光旅遊風潮的崛起，東別更是作為「東海大學」與「都會公園」區之外，大度山麓另一個重要的觀光景點，特別是東別的小吃：彎豆冰、仙草凍、副包...等等。學生和遊客在副包的攤位前大排長龍，卻對身旁混亂吵雜的交通與沖天的廢氣視若無睹。

在《東風》61 期刊載的一篇文章中，曾生動的描繪出校園和東別之間的關係：

圍牆內，進行的是知識的生產與積累；圍牆外，則是商品的消費和商家的營利。兩個空間雖然如此緊鄰，但是卻有各自的社會邏輯，在它們之間唯一流通的是學生口袋中的貨幣。學生與當地社區居民的互動，似乎僅有貨品的消費與販售（丘麥可，1993：8）

如果對比於東海大學對工業區的態度，這種文化想像上的差異就更為明顯。

捍衛君父的城邦

如同第三章所言，在 1970 年前後東海大學發生「校園發展方向爭議」初期，《東風》即以學生的立場積極參與討論，持續關心校園轉型時期的變化。不過一直到 1979 年工業區第二期開發後，才開始注意到學校周圍環境的變化

由於東海大學設有環境中心，因此對於工業區設立所可能引發的公害污染問題格外注意。在 1979 年的〈轉變中的東海〉專題中，即已提到必須以學校名義行公文給市政府，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對整個台中工業區做統籌計畫。特別是關於污染公害的防治問題，東海可以事先作調查研究，「如果其可能污染的程度超過法令規定，那麼我們全體師生都將抗議！」（《東風》49 期：46）

對於即將進行的中港路拓寬工程，與會人士多認為從東海的立場來說其實並不適當：

問：是否可以談談台中港的興築對東海大學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馬先生：單純以東海的立場而言，台中港路的拓建對我們的影響是壞的，東海並不需要一條較寬的馬路，原來的馬路對我們來說，已經夠了，拓寬只給我們許多危險和不便而已。

江所長：站在政府的立場而言，台中港路的修建是必要的，而對東海大學來講，卻是一種相當大的衝擊（《東風》49 期：47）。

江所長認為從壞的方面來說，中港路拓寬會製造交通安全、空氣污染以及噪音干擾等問題。但從好處來說，可以提高東海大學校地的土地價值，同時增加學校與外界的接觸，他建議可以以設置綠帶等人為方式來改變壞的影響。東海

對於工業區所造成的環境問題，整體態度上仍顯溫和。

但是在 1980 年後，由於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東海對於工業區的態度轉趨強烈。東風社在 1980 年 12 月 2 日舉辦了「台中工業區發展對東海校園環境之衝擊」之座談會，邀請莊濟安總務長、江玉龍、林俊義、吳介英、王俊秀等師長列席報告，以增進校內同學對工業區問題的瞭解。

莊總務長於開場報告聯外道路問題時即表示，聯外道路問題實際上只是問題的表面，真正問題癥結在於工業區完全啓用後，將替我校帶來更嚴重的影響。工業區之區位選擇，原擬在中興大學附近，後改於現址，當局並未通知我校，直至聯外道路欲徵用我校土地，而我校不允始發生爭端。東海雖提出多項替代方案，但台中市府不予接受並妄言我校「受恩不報」，雙方關係始正式表面衝突化。

其後發言的王俊秀、林俊義兩位教授則針對工業區設置可能造成的污染問題提出意見，其中林俊義教授的態度尤其強烈：

台中工業區在先天上規劃已非健全，一個工業區除了顧及內部影響外，還必須替區外設想，而將一個工業設立在負有教育功能的大學之旁，僅一溝之隔，在區位規劃已犯了絕大之錯誤，且原先擬為無污染之工業區，竟在第二期宣布為機械工業區，內中包括了電機、塑膠、化工、造紙、鋁業都是造成公害污染最大的工業。

…今天東海之環境，不可漠視的，已逐漸有嚴重破壞之傾向，無論工業區內再如何監督、防範也無法消弭。所以我們當謹慎的注視著台中工業區之步驟，對每一變遷提出我們的看法。否則今天的我們都變成二十年後東海之罪人，相信這絕非在座的各位所願意承擔的（《東風》51 期：13）

The Wall

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中對待東別問題以及工業區問題的差異，可以有很多社會結構性的原因可以解釋，例如前面提到的非正式部門發展造成的管理權責混亂，組成份子複雜造成的動員困難，但是僅只以此很難完全解釋。筆者認為必須引入文化想像的問題，才夠能完全解釋運動實踐在校內/校外、東別/工業區對待上的差異。

共同體想像的支配性作用，在做為校園空間運動重要的歷史記憶與正當性來源的「相思林事件」中就可以看到。這個共同體想像建立起校園師生特殊的感覺結構，對於校園景觀的劇烈變化感到不適，但是對東別狹隘、污穢的生活空間卻視若無睹。

從 1980 年代開始，東海師生就對工業區的污染問題十分關注，但 80 年代中期逐漸惡化，性質上也屬於環境問題的東別問題，卻沒有引起同樣強度的關注，最早的討論還是由於社區居民對於東大學生的聲討而產生的。對於工業區污染問題的關注，反映的是對於純潔、同一的共同體本質被破壞的恐懼¹²⁶。侵犯、混淆內外界線的行爲如果會引發這麼強烈的情緒，那麼分割、切斷共同體的行爲當然就更不可想像了，開關聯外道路的計畫勢必會遭受到校園師生的強烈抵制¹²⁷。

事實上工業區聯外道路的開闢，牽連到的不只是東海和工業區兩造，還有附近的社區居民，例如：第三期工業區社區、龍井鄉鄉民等等。但在兩造劇烈的拉扯角力中，完全沒有這些居民的聲音，東海也從沒有想到要去爭取社區居民的支持（王光旭：156、157）。

而在 1995 年 8 月間，由大度山地區居民發動的持續一年的「反大肚山鄉街計畫事件」¹²⁸中，東海學生會雖曾經提出鄉街計畫完全沒有考慮當地為數眾多的大學生，計畫案的大學生活特定區的公共設施還是不夠，但是這個聲音除了見報一次外，並沒有組織化成為運動（蕭名宏，1987：98）。換言之，學生並沒有參與進這個當時大度山上最激烈的社會運動中。

由這兩件事情看起來，東海學生之所以在東別問題上缺乏行動，恐怕不只是資源動員上的問題而已，而是在既有的文化想像、感覺結構中，東海師生根本沒有想到：東海校園和圍牆外的世界都是大度山的一部份。

東海校友，建築師白錫旻，曾以自己推動「理想國」計畫的經驗表示，只要有有心人，要改善東別的環境非常容易：

太容易了，只要有有心人。真的！為甚麼我說有心人就能做？妳聽說過理想國這個狀況吧？三戶一百萬沒有人要，門窗都沒有，有的全都是不良少年，它這樣都能救活，妳說為甚麼〔東別〕不能救活呢？

（白錫旻口述，林作修、陳明志等訪問，1999：253）

¹²⁶ 與此相關，但很少被討論的問題是，師生對於外勞進入校園的恐懼，「廖學務長報告：近來校內海報指稱本校一名女學生遭受外勞騷擾辦理休學，校園安全堪慮等字樣，經查並無其事。惟為安全計，本處除請總務處加強各處照明設施，並請校警隊加強相思林駐勤及校區巡邏」（東行，民 83.12.14）

¹²⁷ 研二時選修劉紀蕙老師的「神聖與賤斥」課程的所學，對這部分的分析幫助甚大。在此感謝 Joyce 老師於當學期的課程上，將繁難的巴塔耶、克莉絲蒂娃的理論翻譯成我們這些研究生可以理解的語言的努力，

¹²⁸ 「反大肚山鄉街計畫事件」：1995 年 8 月由於台中縣府公告「大肚山鄉街計畫」計畫圖，大肚山區居民認為計畫內容有官商勾結，圖利特權，犧牲多數當地地主及民眾權益的問題，因此組織了「大肚山居民護產自救會」進行了持續的抗議行動，期間大大小小的抗議與陳情事件不下 20 多次，並曾發生多起暴力衝突事件。直到 1996 年 8 月 22 日，台中縣府正式宣佈終止大肚山鄉街計畫，事件方才落幕。可以參考蕭名宏，1997，《草根動員--大學城與大肚山反規劃運動之分析》，東海大學社研所碩士論文，1997 年 6 月

但是他也承認，願意為改善東別環境而付出行動的人太少了，幾乎沒有！！

我對這東別已經興趣缺缺了，每年有那麼多的學生來問我，我實在不知道他們做甚麼事去了，我的氣力有限，像離島、小島，很多地方需要我去服務，可是東海的同學們不再奮起。

第五節 結論

處在這個時代許多人對身旁周圍的事似乎都只能感到無能為力。

我覺得與其把這次事件稱為一場「運動」，不如把它稱為一場「運動的練習」，活在這個年代的我們對於早期的「運動」都有一些想像，但事實上中間有著很大的斷層，有人過度美化「過去」，有人則充滿質疑，但我們都不知道如何去搞運動，從「五〇四」一直到現在，連社團本身的經營都很困難，我們一直沒有找到出路，要「徹底顛覆」還是「適可而止」？但不時的、零星的冒出一些火花是必要的練習，是培養自己的力量，讓沈睡的校園動一動，這是必要的刺激，我想，而這個事件也的確號召了一些新的人進入社團，尤其是大一。他她們十分積極，事件過後主動自己去信箱間擺攤位替社團招生，參與社團的演講及讀書會。

社團注入新血讓我們更加清醒地敏覺「延續」的重要性，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變世界的，才是運動的開始。

在事件的過程中我們看見自己的無能、懦弱、虛無，事件並不如媒體所報導的那般如火如荼，事實上是一連串的疲憊及厭倦，人與人間的關係緊密接連的川流不息，稍一不留神就又幹錯了事情，媒體、學校、群眾、警局的反應往往令人措手不及，即使前一天已經花一晚的時間沙盤推演。

這樣就算實踐了嗎？事實上我們也很懷疑。不過至少累積了一些經驗及群眾，接下來又得回到社團日常的經營，等待下一場搏鬥的來臨。

---皮果，〈之後呢？〉

如同本章開頭所述，在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中，「小惠事件」具有非常獨特的位置。它是第一樁因為校外住宿社區問題而產生的大規模抗議行動，也是第一次以地方政府警政管理單位為目標的運動。它是迄今東海校園因為性別議題而產生的最大規模抗議活動，也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第一次走出校園圍牆，在東別的新興路、遊園路上行進的遊行。

這麼說來，「小惠事件」突破了校園共同體想像的界限了嗎？嚴格的說，並不完全是。在事件中與其說學生是基於對警方行政疏失的不滿，不如說是基於

「義憤」而行動更為貼切。而這個義憤的情緒背後仍然不脫共同體想像的作用--無辜遭受二次傷害的性侵害未遂受害者，其實應合著對校園共同體本質的想像。不要忘記，漢寶德教授早就說過：「東海大學是一個女性味很重的學校。」。

而即使「小惠事件」涉及主管機關對東別地區的警政管理，但是在事件過程中，也沒有學生想到去動員、聯結東別的居民或店家，而後來地方政府和校方雖進行多起關於東別地區管理，乃至防制性侵害問題的會議，但是學生也沒有藉此持續進行任何社區的運動。

這麼說並非否定「小惠事件」的積極意義。事實上從「新宗教中心事件」以來的校園空間運動，從來也沒有挑戰過這條界線。而「小惠事件」則因事件發生的特殊性，更加的凸顯了運動的侷限性。

但是對於女研、人間、台研等社團的新生幹部而言，「小惠事件」不啻為一次集體行動的演練。在之前多半是參與社運團體活動的學生，有機會在這次事件中親身參與聯繫媒體、開記者會、規劃遊行...等具體工作，並要隨時應付層出不窮的突發狀況。在過程中累積的這些寶貴的經驗，為後來「118事件」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皮果和她的同志們並沒有等待太久，下一場搏鬥來的很快，而且不管是參與的規模、議題深度、廣度上都讓人耳目一新。經過多時的蓄積，相思林中再度吹起呼嘯的東海風...。



第九章 雲豹躑躅：後 118 時期（1999—2005）

今夜我要走進這片山林
 去搜索那失去的版圖
 今夜我要走進這片山脈
 走進 美麗 曲折 古老的山國裡
 如果愛這片山有罪
 我情願變成那雲豹
 追逐著山林裡的邪神們 戲耍
 我的心嚮往著明日的太陽
 透過密林照耀每條溪流
 我的心嚮往著明日的太陽
 透過雲海溫暖每對手足



關於這時期的定名，筆者考慮了很多，由於時間精力有限，無法對於這段歷史進行更細致的分析以做為分段分期的依據，同時歷史還在進行中，姑且援用學界的慣例以「後 118 時期」定名之。

顧名思義「118 事件」在這個時期中具有非常關鍵性的作用。由於「118 事件」的成功，為當時低迷的校內學生運動帶來一絲新的活力，而有後來「東海希望聯盟」等更擴大的連結。其後雖然由於內外主客觀因素，使得校園空間運動暫時沈寂了兩年多。但是長久東海空間運動歷史遺產的繼承與延續，使得學生可以在 2003 年的「東海保衛戰」中，於短短一個月內做出那麼多的活動。而之後發生的「第二教學區爭議」、「東大路拓寬」，則又考驗著這個運動是否有可能突破己身歷史的侷限，而邁向新的可能。

第一節 公共化、全球化、教育市場化

公共化

2000 年 3 月，戰後長期掌控台灣國家機器的國民黨在總統大選中落敗，實現了台灣戰後政治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但是 80 年代末期的政治反對運動以及社會運動參與者所期待的美好民主社會卻並未到來。如同許多學者所指出的，這時期台灣社會的民主政治形式是建立起來了，但是民主社會的公眾卻未出現。一般的社會大眾除了在認同政治、民粹政治、族群政治的口號中激情地吶喊，並無力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任何具有批判性的反省思辯，形成主導社會變遷的力量。這時期的台灣政治、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依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所有關於社會現實的討論，大多被消融在藍綠政黨對立的政治結構中（台社，2003）。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於「公共性」、「公共領域」的討論，就成為許多學者注目的焦點，並由此進行對於戰後台灣社會發展的另一重反思。不過李丁讚在其研究中指出，這些討論雖然都十分關注公共領域在台灣遲遲難以開展的問題。但是往往將焦點偏重在威權統治的遺緒、文人知識圈的對話場域或是高層政治菁英利用「國族/民粹/省籍身份認同」召喚的政治操作，但對於民間的日常生活政治經驗往往缺乏說明（李丁讚，2003：1-2）。

而就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來說，在頻繁的流會和府會衝突後，學生會已失去其做為校園民主機制的作用。而「德耀路事件」、「科技大樓事件」也顯示了建立新的論述與實踐以整合校園內不同利益的學生群體的必要。在校園規劃制度方面，1999 年的「118 事件」重挫了既有校園規劃制度的正當性。使得東海校方必須進行更大規模的校園規劃制度改革，開放更多的參與管道。雖然東海校方和學生是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去思考重建「校園民主」的問題，但是超越既有缺乏作用的校園民主形式，重建民主參與的可能，是和當前台灣社會對「公共性」的討論有相應之處。而也正是「公共性」的薄弱，使得兩方的實踐雖然都得到一定的成果，但也出現嚴重的侷限。

全球化

除了「公共性」、「公共領域」之外，「全球化」也成了 2000 之後討論台灣社會的重要關鍵字。關於全球化的相關研究著作，不論在國內外都可稱得上是汗牛充棟，但就東海校園空間問題來說，全球化的影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個是伴隨著全球經濟網絡形成而出現的資訊技術產業的擴展，另外一個則是台灣加入 WTO 後，教育自由化、國際化的趨勢對現有大學的衝擊。

柯司特在其研究中指出，1990 年代開始出現的所謂「新經濟」，是圍繞著資本、管理與資訊的全球網絡而組織起來的，而其獲取技術知識的能力，乃是其生產力與競爭力的根源。而伴隨這個網絡出現的先鋒產業則是資訊技術產業以及金融資本市場（Castells，2000：169、521）。

而在中台灣，這個全球經濟網絡的擴張刺激了中部科學園區（簡稱：中科）的出現以及台中市成為網絡中的「節點」的慾望（以「國際化」、「超高趕北」之名），並由此使得台中工業區和東海大學間由於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產生的衝突，上升到之前 20 年從未有過的層次。同時中科發展帶來的空間地景的急遽變化，也使大度山地區居民的社區運動開始萌芽。

2002 年 11 月 1 日在經過十幾年的努力，與三十餘會員國進行雙邊諮商後，台灣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義正式加入 WTO。因為高等教育在 WTO 中被列為對等開放的教育服務業，透過教育市場的直接接觸，引發高等教育市場自由競爭時代的來臨（顏美玲，2003：26）。在之前由於教育改革「廣設高中大學政策」而在招生上備感壓力的東海大學¹²⁹，在 2002 年後又要面對國外大學的競爭，因此更急於進行校內硬體建設改進工程，使得校園空間問題的衝突，達到自 1990 年「相思林事件」以來最嚴重的程度。

精鍾商專事件

在台灣高等教育面臨空前競爭的同時，國家對於大學教育經費的補助卻逐年下降，但是大學數量卻又逐年的增加，致使部份大學出現招生不足的問題。雖然一些學者所憂心的大學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的事件還未出現，不過 2001 年 2 月發生在花蓮的「精鍾商專事件」倒是對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提出了警訊。

2001 年 2 月，花蓮「精鍾商專」爆發學生夜宿校園，抗議學校亂收費的事件。有四、五百名精鍾商專的學生，2 月 21 日在學校靜坐罷課，抗議校方多年來巧立名目、強迫收費，卻又沒有改善教學設備品質。消息傳出後，由輔大、世新、東海、台大等七校參與「反高學費運動」的學生社團組成的「民主學生聯盟」籌備處表示聲援。「民主學生聯盟」在和「精鍾商專」學生聯繫後，發現該校的情況惡劣到難以想像：

精鍾商專的學生繳交的學雜費已經比一般私立專高出許多，但是教學及生活環境卻沒有絲毫改善：他們要在電腦實習費以外繳交網路費，但是電腦設備不

¹²⁹1999 年 6 月，王亢沛校長於參加「私立大學院校協進會及公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會」聯誼餐會後，於行政會議中憂心忡忡的表示：下學年（88）申請籌設的大學有十多所，經核准後全部大學院校將超過一百所，相反地高中畢業生卻會漸行減少，因此各校必將面臨激烈競爭之局面，甚至一些學校會面臨招生不足之威脅。在此狀況壓力下，希望全體師生應有一致的共識，那就是必須未雨綢繆，積極改善現有教學研究環境並提升教學以及研究品質以資因應（東行，民 88.6.9）。

足，甚至兩人共用一台電腦：住宿費高達七千元，但是房間光線不足，三千多人使用四、五台飲水機，洗衣機、脫水機缺乏適當清理，冬天還洗冷水澡，住宿生要繳網路費，但宿舍根本沒有網路，校方強迫學生購買餐券，學生食用低劣的食物，學生繳交清潔費，但是同時要進行大規模的勞動服務，這些林林總總的費用，加起來一學期竟要七萬多元！（（新）《東潮》，第 4 期：4）

在「鬆綁」¹³⁰（deregulation）名義下進行的教育市場化過程中，國家逐漸減少對大專院校的教育資源補助以及監督管理責任，使得在高等教育末端的私立專校，在運作上出現嚴重的困難，更惡質者，乾脆完全放棄所謂「教育」的任務，把學校當成詐財工具。「精鍾商專事件」顯現了台灣高等教育市場化之後，最負面最極端的案例。

而在中部的東海大學，因著歷史和環境的作用，全球化、教育市場化所造成的衝突正以校園空間的問題顯現著，就連做為學校象徵的路思義教堂也被捲入其中，並引發了兩次最劇烈的校園空間運動事件。

第二節 啼明鳥的叫聲：118 事件

聽！樹哭的聲音

1998 年 12 月，東海大學校方為了製作耶誕樹，將生物系館前方屬保育類植物的「台灣肖楠」砍去，引起生物系學會的連署抗議。這件事情並沒有引起沈浸在耶誕狂歡氣息的校園太多的注意，不過當一棵肖楠變成是一片相思林的時，問題就變得不一樣了。

1999 年 1 月 14 日，東海大學學校期末考前夕，有人發現綜合教學大樓後方的相思林地被校方派員圍起，並有告示寫著「將於 1/12~2 月間動工完成停車場的興建」。

1 月 15 日下午，已有部分學生前往相思林地要求工人暫停砍伐相思林的動作。學生的動作非常快速，在「小惠事件」中已有運動操作、結盟經驗的台灣文化研究社、人間工作坊、女研社等社團，立即於校內張貼海報，向校外媒體發佈新聞稿，要求校內師生重視此事，校方停止動工。

¹³⁰在台灣 90 年代的教育改革聲浪中，深受各界矚目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簡稱教改會）所接襲的主要理念即是：鬆綁。鬆綁的英文是：deregulation，這個來自經濟學的名詞，一般翻譯做「解除管制」，或是當作「自由化」的另一種說法。意思是要放任市場根據供需關係決定商品價格，減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預。

教改會在《第一期諮議報告書》裡把 deregulation 這個經濟學名詞翻譯成「鬆綁」。「雖然在這份報告書中，教改會也進一步說明人畢竟不是商品，因此教育改革不宜完全以經濟的解除管制為範本，教育的管制也不能以追求極度的自由化為鵠的。但是無疑的，教改會還是肯定以市場力量取代政府干預以引導教育發展的價值。」（戴曉霞，1999：235，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人間、台研兩社團並製作一份名為〈聽！樹哭的聲音〉的文宣，於晚間動員社團成員在校內男女生宿舍散發。文宣中提出六大訴求：

- 一、停止砍伐樹木，在未經校園公投決定前，不得動工。
- 二、校園景觀變更更需經公聽會、公開評圖等過程，並由校內成員公投決議。
- 三、發展第二教學區，合理規劃校園。
- 四、減少招生人數，訂定長遠並符合東海創校理念之長期計畫。
- 五、規劃學生設置校園的公車運輸系統，減少對於私人交通工具的依賴。
- 六、王亢沛校長需為破壞校園景觀的錯誤決策、漠視校園民主道歉！

(台研/人間, 1999)

1月16日上午，包含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協會東海分會（簡稱：環工分會）、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女研社、東風社等社團共20多名學生，手持「沒有建樹，只會砍樹」、「耶和華說：這是我的土地，你當好好看顧」等抗議海報，以及象徵召回相思樹林的引魂幡，展開抗議校方砍伐相思林，興建停車場的活動。學生首先前往相思林地砍樹現場阻止砍樹行動，並在相思樹上繫上黃絲帶。接著前往校長室，要求校方提出解釋，並取消不合理的決策。由於王亢沛校長不在校內，其他行政人員也無法正面回應，學生在高呼口號後離去，並表示將集結校內同學，在下星期一（1月18日）發動更進一步的抗議活動。

面對學生的抗議聲浪，東海校方則透過媒體表示：興建停車場是基於學生強烈要求，並經多次校園規劃委員會討論，選在郵局旁邊的相思林地興建，預計將多出一千一百個機車停車位。和過去歷次的校園空間運動事件一樣，校方強調調整個決策過程完全依據正式程序進行並有學生代表參與，不是學生指控的黑箱作業。希望學生有任何意見，循正規管道和學校溝通，不要動輒向校外媒體發表（以上參見：中時，20版/自由時報，4版/台灣日報，19版/聯合報，17版，1999.1.17）。

1月17日，有東海校友在報紙和網路電子媒體上發表〈老東海和相思樹〉、〈大學生，妳學會『鬧事』了嗎？--從東海相思林事件看校園學生地位〉等文章。在校園附近的「東海書苑」書店中，有人放上了一疊署名「建築系學生」，名為〈東海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自印文章。校園的網路、BBS對這次事件的討論更是沸騰！

在東海學生爲了相思林進行首波抗議的時候，王亢沛校長正在日本參加第七屆亞太地區大學校長會議，於1月17日返國，在得知消息後，因1月18日又需上台北參加私校協進會會議，於是在當晚商請學務長妥爲處理（東行，民88.1.20）。

學運史上頭一遭

1 月 18 日上午 11 點，期末考第二堂考試結束。約有一百多名東海學生向校長室門口聚集，校長室外的牆上及柱子上，已被較早到的學生掛滿了「哀悼校園民主」、「砍樹不對，造反有理」、「根除代表制的假民主神話」等布條。一開始由一位學生代表唸出哀悼「東海精神及樹之亡靈」的祭文，祭文中訴說著東海的歷史、創校理念以及過去發生的相思林抗爭。

今天，我們為了相思林而聚集在這裡，來為相思林的歷史作見證；不僅如此，我們同時也是在為東海過往的歷史作見證。

東海曾是一所如此不同的大學，這不是因為東海較之其他大學多了幾棵相思樹，而是因為東海對於「大學」有著如此不同的想像與實踐。是的，東海不是台大、成大，東海就是東海。每一位東海人都能驕傲地認知到這一點。因而我們聚集在這裡，我們就是東海驕傲的見證者，同時也是東海悲悽的送葬人，我們聚集在這兒，因為我們在校方為了興建停車場而粗暴地砍去相思林的過程中，聽見了東海的喪鐘，我們是悲泣的，但同時卻更是忿怒的…（人間/台研，1999a）。

天空開始飄下了雨滴，學生們撐著傘在雨中默默的聆聽，更難掩悲憤的情緒，祭文在最後以要求學生展現憤怒和力量的呼求中做結：

聽！聽樹哭的聲音，這是東海教育理念與創校精神的喪鐘！我們不僅要暗自警省，我們更要追問，追問在這鐘聲中新生的東海何去何從？因而我們來到這裡，我們要透過對東海的歷史追尋來指引未來，而同時，我們更要對這些敲響東海喪鐘的劊子手，集結我們的憤怒、展現我們的力量！！（同上）

祭文唸完後，學生再朝校長室門口前進，進行公共論壇的活動，數位東海學生慷慨激昂的表達了他們對於校方趁期末考期間動工的憤怒，接著有兩位老師表示對學生主動站出來表達自己聲音的支持，以及對學校專斷紊亂的規劃程序的質疑。

由於一直到中午 12 點，都未見校方派人正視學生的聲音，在學生先後大聲喊出：「主秘出來！」、「總務長出來！」，都未見到人之後，學務長王振寰出面向學生說明：「校方決定於星期三再開會一次，和同學溝通。」，現場立刻有人問在場同學：「星期三要考試的人舉手。」在場幾乎所有的人都舉起手來。學生立即對校方卻避不出面，卻又挑選學生無法到場的時間開會，又派出對校內工程沒有決策權的學務長來安撫學生，表示極度不滿。

王亢沛校長雖委託學務長和學生溝通，但由於學務長沒有決定停工的權力，加上「安撫」的意味太強烈，反而激起了學生的憤怒！在極度的憤怒下，在場學生和學務長王振寰發生激烈的口角。一名學生在忿怒的敲打玻璃表示不滿

時，不甚用力過度敲破了一塊玻璃，竟成為當天所有電視媒體報導這次事件的焦點。

當時的社運電子媒體「苦勞網」¹³¹，透過和場中學生的手機聯絡，為當天的情況進行了完整而詳實的紀錄：

1999.1.18. 下午一點三十分

百餘東海學生進入校長室，等候校方做出回應

東海人間、台研兩社團發動的反對校方砍伐相思林抗議活動，雖正值期末考期間，仍出乎意外地得到熱烈的支持，今天上午，一百多位東海學生齊聚校長室，提出停止動工、公開討論、公投等六點訴求。由於校長王亢沛目前不在國內，由學務長王振寰代表接見。

由於學務長對於校內工程的施工並沒有決策權，面對學生的訴求，無法做出承諾，在溝通不成之後，王學務長拂袖而去，於是學生就進入校長室，一直到目前為止，這一百多位學生仍然在校長室中，等候校方做出回應。

(人間/台研，1999c：8)

另一名在現場的學生也記錄下當天的狀況：

中午時分，行政人員一如往常作息下班休息吃午飯。留下飢餓的學生和壓在他們肩上的期末考負擔。憤怒的學生開始醞釀行動。不願被敷衍的學生於是進佔了校長室。這是台灣學運史上的第一遭(佚名，1999)。

抗議的學生魚貫進入了校長室，等待校方做出回應。這種「佔領空間」的運動策略，不只在東海歷史上，甚至台灣的學運史上都是頭一遭。這種策略所具有的強烈衝突性和挑釁意味，使得校方必須正視學生的聲音：

學生在校長室內展開討論，在那兒開始進行真正的溝通、相互培養力量。學生所創造出來的壓力，終於使校園官僚開始感到窒息。

下午兩點三十分，總務長到場以「溝通」做著漂亮的開場白。但是，三言兩語報告了他所知的過程，並對學生提出的要求表示無法承諾後，立即意圖離去。學生關上了門，困住總務長。總務長陪著笑臉坐著，一再重複先前的內容，同時述說他的無辜(同上)

由於總務長再三無奈地表示，他沒有權力更改學校做出的決議，學生最後還是讓總務長離開了校長室。但在校長室外面，宣傳的活動仍然持續進行。現場

¹³¹ 感謝國內最重要的社運媒體之一的苦勞網，長期以來對於東海學生運動的支持。尤其是 2005 年「平安夜救東海」遊行時，竟還專程派記者南下前來採訪。在此借論文一角對於孫窮理等人長期的堅持，表示尊敬和謝意。同時向卞中珮說聲抱歉，因為我的論文寫作的關係，使得原本說好要一起進行的學運記錄計畫食言了。

的學生趕製了現場的紀錄以及新一波的文宣，透過大量影印後，分頭向校園內各教室、宿舍散發，號召同學聚集到校長室來。

校長室外的欄杆上掛著紅布條，表達著他們的希望。這一次也不再是像徵悲情的白布條，而是象徵熱情的紅布條。校長室外的文理大道上，主動前來的學生幫忙散發傳單，幾個鐘頭下來，卻絲毫不感疲倦地向著往來的同學傳達理想。

在總務長離開後，學校的主任秘書也到場：

四點，主秘到場，幾句官僚話表示著，決議程序通過，自然得依程序廢除，他也無法承諾。學生們上了一堂課，親身體驗甚麼是官僚

雖然一樣無法得到具體的承諾，然而學生們卻得到消息，王亢沛校長承諾晚上九點會出現。在場學生立即趕印新一波的文宣，呼求校內同學在考試結束後，加入在校長室的抗議行動。文宣上用斗大的黑體字寫著：「拯救相思林！今晚 9 點與校長有約」、「我們還在校長室，期待你的加入」。

五點，學生們依舊停留現場，準備等待應允在九點半歸來的校長。因次節有考試的學生雖然離去，但是他們說，還會再來，而且會帶更多的同學一起來。

對學生行動最友善的網路媒體「苦勞網」，仍持續透過電子郵件和網站，向關心事件發展的人，傳送最新的訊息。

1999. 1. 18. 下午五點三十分

東海學生持續進佔校長室，校長已決定今晚出面溝通

由於目前東海學生持續進佔校長室，且人數仍有三、四十人之多，已帶給東海校方極大的壓力，據了解，東海大學校長王亢沛已決定在今天晚上出面與學生溝通（人間/台研，1999c：9）。

媒體的扭曲報導

不過，影響力勝過「苦勞網」數百倍的主流電視媒體，對學生就沒有那麼友善了！一位在當時協助抗議學生進行現場攝影記錄的同學，回憶她當天面對媒體記者的狀況：

118 相思林事件那天我帶著攝影機到了集合地點的校長室，對攝影並不十分熟悉的我，小心翼翼的捧著機器，不斷的留意自己的步伐努力紀錄著我能觸及的一點一滴。

大約幾個小時之後，有數個記者陸續趕到，當時校長室外的抗爭已經轉移至校長室內。

「同學！」有一個剛到的記者叫助背著攝影機的我，「你剛剛有沒有拍到砸破玻璃的畫面？我想跟你借帶子，我是 X 視」

「砸破玻璃的畫面？」

我被這幾個字弄得很不舒服，「希望你多考慮一下學生的立場…」猶豫之中我仍拿出了帶子…

「學生至校長室抗議，學校見大批學生湧入便要把校長室門關起來，引起學生不滿，有學生以石塊砸破玻璃…」

「而校方幾次試著和學生代表溝通，都被拒絕；」

「校方表示學生固然護樹心切，但採取向今天粗暴的抗爭行動方式，校方絕不接受。」

「東海學生暴力霸佔校長室」

「………」

我們在後來，仍見到了這樣的新聞………。(人間/台研，1999c：43)

一位關心相思林事件的東海校友在看完電視新聞後，憤怒的投書給「苦勞網」：

1999.1.18 下午八時三十分

網友來函：

中國電視公司今天晚上形容東海大學抗議校方擅砍相思林的事件為：「台中東海大學下午發生一起校園鬧劇，五十多名學生不滿校方砍伐相思林，闢建學生停車場，霸佔校長室並砸破玻璃，不過校方已經加以疏導說明。」

這一種報導方式充分顯示出主流媒體在新聞處理上面粗糙、不尊重當事人的現象，將學生參與校園公眾事務，表達意見的動作稱之為「鬧劇」。對於整個事件的原委完全不加以了解，片面地就枝節問題，對於學生進行惡意的「抹黑」，這充分顯示出主流傳播媒體與既得權力集團沆瀣一氣的現象。

我要在此呼籲社會大眾不要人云亦云地接受主流媒體的「洗腦」，認真了解事件的真相，並且以東海大學師生關心自己生活環境、珍視自己歷史的態度為榜樣。

東海大學校友 Kiven

(人間/台研，1999c：10)

熱情的「苦勞網」管理者，除了刊登出東海校友的來函之外，並號召網友監

看主流媒體：

目前在校長室持續抗爭的同學擔心媒體的片面報導下，將焦點模糊甚至抹黑為「學生無理抗爭」，所以我們希望支持東海學生的苦勞網網友們，能替我們監看各大電子媒體的新聞，並回信告知我們狀況，謝謝

同時為表示聲援在場的東海學生，還在晚間八點三十分發函給中視新聞部：

主題：東海校園學生抗議事件絕對不是「校園鬧劇」

日期：Mon, 18 Jan 1999 20:33:43+0800

送件人：苦勞網管理者

收件人：news@mail.chinatv.com.tw

東海學生的校園抗議事件已經醞釀很久了，校方不是相應不理，就是拿校規來壓人，會發生衝突的事件校方要負起大部分的責任，其實事情的始末都刊登在苦勞網上面 <http://192.192.148.27/>，希望貴公司新聞部能在完全瞭解本次事件的始末後再加以報導。謝謝！！

希望的火苗

晚間六點過後，許多學生湧進了校長室，把校長室前廣場擠得水洩不通，估計約有兩百多名學生。學生社團在廣場舉行了「公共論壇」，讓在場學生自行上台發表自己的意見，表達出對校園景觀以及校園民主問題的想法。

公共論壇進行至約九點多，東海校長王亢沛趕至現場，不過學生社團希望等公共論壇結束後，再讓他發言。到十點多王亢沛校長向學生表示：學校興建停車場實基於學生代表多次訴求，過程均經行政程序通過辦理，一切均有紀錄可查，絕非任何個人所能專斷。但為聽取對此事不同之意見，答允暫緩興建停車場，待三月間舉辦此項公聽會，聽取同學意見。公聽會的意見學校會很重視，但不可代替經行政程序所作之決策，若有任何變更，亦必循一定行政程序處理（東行，民 88.1.20）。

不過現場學生聽到的，和王亢沛校長在行政會議上回憶的，似乎略有出入：

經過十二小時漫長的等待之後，校長終於出現在大家面前，在同學的強烈的要求與質疑之下，校長做出三點承諾：

- 一、在三月份之前，絕不動工。
- 二、在召開公聽會等公開的過程後，再決定是否繼續動工。
- 三、今後有重大的校園景觀變更案，一定會經過公聽會等公開討論的過程，再做出決策。

由於大部分的同學明天還有考試，在大家大喊：「我們會記得校長的承諾，請校長不要忘記。」之後，大家在場彼此互相鼓勵並相約持續監督校方，以維護東海美麗的校園景觀與可貴的校園民主（人間/台研，1999b）。

「苦勞網」在晚間立即將這個讓人興奮的結果傳達到網路上，但是也提醒正為勝利而歡呼的學生，這場戰鬥並還沒有完結：

1999.1.18 晚間十一時三十分

東海學生訴求獲校長王亢沛具體承諾

一月十八號晚間九點三十分，東海大學校長王亢沛出面與東海大學人間、台研及其他關心相思林事件學生協商，已經達成重要的協議。

…這件情的落幕，應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們呼籲東海的師生密切注意今後校方對相思林的動作，並嚴格監督王校長與學校行政官僚遵守他們的承諾，持續的組織、關心、對於問題立即反映與團體行動，是這次相思林事件能較好的結果的原因，這也是在校園裡居於弱勢地位的學生唯一的武器

（人間/台研，1999c：8-12）

雖然開學後還有一場硬仗要打，然而能夠在期末考期間這樣一個緊迫的時刻，在不到一個星期內的運動過程中，獲得學校先「暫停施工」的承諾，這樣的成果十分難得。「118 事件」創造了許多東海學運、乃至是台灣學生運動的新紀錄，然而更重要的或許是：這次的勝利振奮了整個東海校園內繼續執著於校園空間運動的師生，使得他們有繼續堅持下去的能量。

正如那份佚名作者的文章結尾所說的：

這個學校已經沈悶太久，而學生們正以他們的行動燃燒出希望。

從相思再出發

「118 事件」被視為是東海再次的「相思林事件」，也勾起許多人對於過去校園空間運動歷史的回憶。在事件結束後，東海校友楊婢育、陳秀曼，化學系教授林碧堯，社會系教授趙彥寧等人分別於報紙發表文章，聲援學生的行動，認為學生的行動反映的是整體校園環境制度的問題：

東海的相思林事件也正反映著東海的興衰：物腐而蟲生，檢討生蟲的背景才是主題，斥責「喊蟲」抗議的學生，徒顯病情沉重。如果學生連「看到蟲」都無動於衷的話，東海再也不會有「相思林事件」發生，東海精神因而消失，大

度山將只剩下「寂靜的春天」了！（林碧堯，1999，1.20）

對現在許多學生而言，承載回憶的竟只成為過去十年數次的「保衛相思林運動」。運動多是粗暴的，故這種回憶本質亦含暴力的層面；但這種暴力性，其實是拔除樹木、改變人文空間、縮減溝通管道等等更暴力的行動所造成的，所以護樹行動內在是非常悲哀的（趙彥寧，199.1.20）。

這些校友、教授的聲援，以及在期末考前夕，在 1 月 18 日當天展現出的動員力，再度顯示出 1990 年「相思林事件」歷史記憶的巨大力量。而從東風社「未竟的探討」以來建立的校園空間論述的特性，也一樣在「118 事件」中重現。例如那份署名「建築系學生」的〈東海人你為什麼不生氣？〉自印文宣中，就以自 1970 年代以來不斷重複的語氣悲嘆著：

我們也不是責怪校長、責怪董事會。只是我們感嘆，在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這一個曾經是那麼美好的地方，竟也擋不住外在的衝擊，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中，竟一點一點地流失掉它可貴的特質。是不是，美好的事物在台灣總是難逃一劫？是不是，台灣人真的那麼沒有遠見，也沒有勇氣去承擔遠見所帶來的世俗輿論？（建築系學生，1999：25-26）

而在惋惜消逝的美好過去的同時，這篇文章也和當年的《東風》一樣，鼓勵校內師生積極投入創造未來的行動：

沒錯，東海是今非昔比。但是，我們不希望學生就妄自菲薄，渾渾終日。沒錯，我們在大學聯考一仗是打得不好，但我們身為台灣的知識份子的責任是一樣的重，我們必須關心我們周遭的世界，並且從身旁即將消逝的美好環境做起。

事件結束後，參與「118 事件」的人間/台研，編輯了《從相思出發》一書，於開學後在校園內散發。除了整理事件發生當時的文宣、苦勞網的現場報導、報紙讀者投書、意見評論以及近十年重大校園景觀爭議事件之外。另外加入了一篇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的〈女人、相思林與危險事物〉，以對抗校方除了以學生急需停車場、經費不足等理由之外，還說是因為大片相思樹林造成女同學上下學不安，常有性騷擾傳聞，因此必須砍伐相思林的主張。

這篇文章認為女同學會對相思林產生不安恐懼的想像，來自整個父權社會製造恐懼以嚇阻女性進入公共空間的企圖。從小時候的「小紅帽與大野狼」的故事，一直到媒體上各種關於公共空間的性犯罪新聞，都不斷地把女性置於恐懼的狀態中，限制她們的移動，並影響他們的經濟生活。事實上不只是相思林，只要女性置身於不是「家」和「私領域」的地方，幾乎都被社會視為是危險的。但是根據《台灣刑案統計》的資料卻顯示，台灣地區的性犯罪的發生地點卻大多以受害者的住家為主，多半為熟識強暴。這不意味著所有的公共空間對女性都是安全的，但是公共空間的安全問題也絕不是光靠砍樹就能解決的。

這篇文章並同時反駁了外勞會製造校園犯罪問題的刻板印象：

在即將邁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大家卻還是以尋找代罪羔羊來作為解決事情的手段。於是，相思林開始變成一個可怕的地方，外勞開始被塑造成犯罪可能性最高的形象；他們莫名其妙地被貼上標籤、被歧視、被認為應該消失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裡。問題是他們消失了，女人的恐懼就會跟著消失嗎？問題是誰在製造恐懼？

多麼希望在未來的每一天，我都能和我的朋友在東海相思林散步，聽見外勞彈著吉他唱歌…（骨頭，1999：35）

另外對應學校為解決學生機車停車問題，而砍伐相思林興建停車場的作法，這本書中也翻譯了英國「收復街道」(Reclaim the Street)¹³²運動團體成員麥克·大衛 (Mike Davis) 與交通部長對談的文獻--〈因為汽車不能跳舞〉。文中認為應從檢討交通運輸系統來根本解決問題，而不是因應不斷增加的汽機車，大肆破壞綠地開築馬路、停車場。這篇文章可說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從硬體建築、景觀問題，擴大關注校園交通問題的開始。到了四年後 2003 年「東海保衛戰」、「第二教學區爭議」、「反東大路拓寬」事件發生時，關於交通運輸問題的討論就已經成為東海校園內的重要公共議題了。

正如同《從相思出發》首頁上寫的那句話

整個相思林事件的爆發，清楚的暴露出校園民主的崩壞，教育資源的缺乏，以及整體校園景觀長程規劃的闕如（人間/台研，1999）

「118 事件」再度證明了現有校園民主制度、校園規劃制度的侷限，因此參與運動的學生社團在事件結束後，於校內信箱間廣場舉行數次的公共論壇活動，企圖透過露天的肥皂箱演講方式，進行對校園重大公共事務的討論。由於過程中有建研所學生袁興言的加入，使得討論的內容更具專業性。

3 月 4 日，學生社團舉行第一次的公共論壇，針對學生機車停車場興建地點，提出其他的替代方案。

3 月 8 日晚上 7 點半，於學校綜合大樓教室 T109 內，放映由現場學生拍攝的「王校長的寒假作業--118 相思林事件現場紀實」的紀錄片，以對抗「118 事件」當天主流媒體的扭曲報導。

3 月 11 日，舉辦第二次東海公共論壇，討論「V 大樓改建案」。

3 月 12 日中午，學生在相思林集合，舉行「植相思樹苗」活動。

¹³² 1994-1995 年間，英國民眾為了反對英國政府開闢道路而砍伐樹林，因此展開了一項「Car Free」運動，並且擴大至全英國。「收復街道」(Reclaim the Street) 是當時參與運動的一個團體。該文翻譯自英國衛報，1995 年 7 月 19 日。

校園規劃制度再改革

雖然校長表示一切仍須依照行政程序，但是「118 事件」確實對校方造成很大震撼。1999 年 2 月 3 日的行政會議上，王亢沛校長針對新建的科技大樓工程表示：基於萬全考量，避免無謂抗爭，請主任秘書會同學務長、總務長相商，將該樓興建規劃及各項決策過程，於本週作系統完整性之上網（東行，民 88.2.3）。

3 月 16 日，東海大學學務處，於晚間七時在銘賢堂舉辦「興建機車停車場」公聽會。東海學生議會於公聽會中，公布開學後對校內同學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在收回的約 1,200 份問卷中，有 70% 多數贊成興建停車場，但不贊同在相思林興建，而應另行擇地興建。學校表示：基於尊重一般同學意見，學校同意不在相思林興建停車場，另外根據學生提出的建議，請總務處規劃，可以在男生宿舍 11 棟北方空地興建約 500 輛機車之停車場，另外配合校門口改建，可增建約停放 300 輛機車的停車場。

3 月 30 日，東海「校建會」決議通過，有關學生機車停車場案，地點變更為沿中港路機車停車場與學生宿舍第 11 棟及 21 棟間區域優先規劃興建機車停車場（東行，88.3.31）。

3 月 16 日的公聽會具有很重大的意義。首先雖然校方一再強調興建機車停車場是基於學生強烈要求，並經過多次校園規劃委員會討論決定。但學生議會的問卷結果卻顯示，學校冗長的行政程序規劃出來的結果，和真實的學生意見是有重大落差的。

另外在公聽會上出席的異議性社團成員指出，校方在 1995 年制訂的《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中，設定相思林優先做為學校和外圍環境間的綠帶使用，其次是做為備用的校舍用地，而停車場規劃則不在其中。雖然這份報告書只具有「準上位計畫」的指導作用，但是校長和總務處人員對於計畫和現實的落差也未提出合理說明，只含糊的表示：計畫和現實一定會有落差。因而在會後遭到異議性社團在海報上的強烈抨擊。

這兩個事例充分顯示了：既有的校園規劃制度無法充份表達學生意見，也不是依照真正專業理性的準則在運作。校園規劃制度的正當性，在這次公聽會中被徹底質疑了。這當然不是東海的校園規劃制度第一次被挑戰，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但是就東海校方的角度來看，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是勢在必行的了。

因此在 6 月 3 日中午，學務處舉辦「東海校園工程參與與程序規劃草案」公聽會，召集學生會、議會、學生社團及系學會負責人等討論「東海校園工程參與與程序規劃草案」，以研擬校園規劃制度改革的方案。學務處提出的草案是在

既有的校建會架構之下增加專案小組，對特定校園的建設專案做先前研究，專案小組必須在不同階段進行公開展示、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以擴大師生參與，強化共識（東行，民 88.6.2）。

5 月 4 日，東海校方針對 V 大樓、校門口、第二教學區規劃案等舉行「校園重大新建工程公聽會」。6 月 10 日再度舉行「校門口新建工程公聽會」。同時總務處預定 6 月 8 日起，將校門口等三工程建設案的計畫，置於圖書館前廳公開展示。頻繁的公聽會顯現了「118 事件」的衝擊以及東海校方改革校園規劃制度的決心。

在東海校方急切的想要改進校園規劃制度的背後，有著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競爭壓力在推動。在 1999 年 7 月 15、16 日於八仙山召開的「一級主管工作研討會」中，王允沛校長表示：由於高等教育市場開放，在 90 學年度國內大學院校將增至一百所以上，同時國外及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市場也都將開放吸收國內學生，但相對的，高職畢業生人數都以每年減少約一萬人的趨勢逐年減少，顯見未來各大學必然是處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局面。但因科技進步，設備汰舊換新速度加快，促使高等教育的成本不斷提高，但國內大學院校增加而社會資源有限，各校籌措經費將更加困難。面對外部環境的挑戰，「東海必須努力加速改革，加緊建設，建立特色。」學校在過去雖不斷致力於改善教學研究環境，但仍有多處亟待改善，其中尤以教學研究空間不足，影響延攬優秀師資最為嚴重：

增建校舍目前所遭遇到之最大阻礙是來自少數人因不願改變學校環境所做之不斷抗爭。因此怎樣建立溝通機制，凝聚師生共識，加速學校建設應是當務之急。

（東行，民 88.7.15/7.16）

會中首先討論第一案：「如何建立本校師生參與討論學校重大工程建設或公共事務的民主程序，以落實校園民主？」，經討論後擬出了初步的新校園建設規劃程序草案，於開學後提交行政會議討論。

而第二案：「如何規劃、整建或新建學校硬體設備？」經過討論後訂定的結論是：

1. 規劃優先順序：學生宿舍、科技大樓、V 大樓改建、第二教學區規劃。
2. 設立興建重大工程評估委員會。
3. 推動興建重大工程一經正常管道溝通定期舉辦公聽會獲得共識，如仍有少數人執意抗爭，得視實際情況作必要之處理（同上）

根據八仙山「一級主管工作研討會」的結論，東海大學行政會議於 10 月 27 日經討論後決議通過了「東海大學校園建設暨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東

海大學營繕工程作業實施規則」修正案及「東海大學重大工程公告參與程序辦法」¹³³三項提案。

除了「興建重大工程評估委員會」在行政會議討論中，因與公告參與程序中的「校建會及專案小組可行性評估」程序重疊，而被否決外，「八仙山一級主管會議」中對未來校園規劃制度的設計，都被行政會議通過執行（東行，民 89.1.20）。

愚人節的學運玩笑

在「118 事件」發生後，東海學生和校方都充分意識到現有校園民主制度運作的侷限性，並各自採取公共論壇和校園規劃制度改革的方式來進行校園民主的重建。但陷入沈疴的校園民主恐怕不是這樣容易就可以挽救起來的，這可以從當年 4 月 1 日王丹訪問東海時的荒謬場面看得出來。

1999 年 3 月，前中國大陸天安門學運領袖之一的王丹應邀訪問台灣，並在吾爾開希的陪同下，於 4 月 1 日來到東海大學，預計在東海 V 大樓的茂榜廳舉行座談會，和東海學生對談。

王丹的座談會舉行前半小時，人間、台研等社團的學生正在信箱間廣場舉行公共論壇，但和前兩次一樣，參與者寥寥可數。公共論壇草草結束後，人間、台研幹部好奇的前往 V 大樓，卻發現現場有近千名東海師生聚集，欲一睹王丹的面目。由於人數太多，使得座談會臨時改從茂榜廳內移至戶外廣場舉行。甚至在會後，意猶未盡的王丹迷還一擁而上，要求簽名，讓主辦單位爲了維護秩序而傷透腦筋。

東海師生對於過去的、對岸的學運領袖懷抱著如此高的熱情，卻對校園內正在進行的學生運動冷若冰霜，這種極端的對比，不由讓剛離開信箱間廣場的學生感到氣結。

一名人間的幹部在座談會中舉手提問，首先表示真希望剛才可在信箱間廣場的公共論壇看到這麼多東海學生，接著詢問王丹他當年在大陸，是如何進行學生運動的實踐，可以發展成六四天安門學運這樣的規模？王丹表示他在學校一

¹³³ 「本校重大工程依下列程序辦理：

- 一、行政單位提出需求→行政會議通過→校務會議通過。
- 二、校建會專案小組可行性評估、規劃報告→校建會專案小組空間需求說明（圖說公告）→公聽會反映意見→校建會（專案小組）討論決議→規劃定案、競圖→設計圖、模型公告展覽→公聽會反映意見→校建會專案小組修改設計、定案→校務會議通過（圖書館記錄典藏）。
- 三、總務處辦理建築執照申請→經費稽核委員會審議工程招標→施工。」
（東海大學重大工程公告參與程序辦法，民國 88 年 10 月 27 日第 31 次行政會議通過）

開始只是想舉辦讀書會、討論會，並沒有想太多，沒有想到持續半年後，人數會越聚越多，甚至連外校學生也來參加，更沒有想到會有一場天安門學運。

「王丹來訪事件」凸顯了校園空間運動以及校園規劃制度改革的瓶頸。東海學生或許會在類似「118 事件」等個別事件中參與，但卻不能把運動履行至日常生活的實踐中，進行公共政策的討論，成爲一個民主社會的主體。而東海校方雖企圖透過開放更多的公告、參與的程序，以建立校園規劃決策的合法性。但如果學生沒有在日常生活中，履行民主實踐的意願和能力，類似 316 公聽會這樣規劃過程和師生真實意向的重大落差還是會出現，決策程序的正當性一樣會遭受到挑戰。

相思林保衛戰的啟示

從「佔領校長室」對既有的空間權力秩序的挑戰，到「316 公聽會」後成功的改變了校園規劃的決策，「118 事件」可以說是東海學生運動繼 1990 年「相思林事件」後又一個里程碑，也再度強化「相思林」做爲東海學生運動象徵的意義。「118 事件」促成東海學生更積極的行動、更廣泛的結盟，也迫使東海校方進行「校園規劃制度」的重大改革。這些運動實踐和制度程序的變化，將引發出新的衝突，表現在之後「東海希望聯盟」發起的一系列運動中。

而除了校園景觀/相思林的情感記憶召喚和對校園民主的反省以外，「118 事件」同樣繼承了自「未竟的探討」以來的探問。這其中東海校友、文化評論家陳昭如在中央日報上所發表的〈東海大學相思林保衛戰的啟示〉一文，最清楚的點明了這一點。

陳昭如這篇文章中指出，東海校園早期細膩的規劃，搭配上歷史悠久的勞作制度，一直讓很多東海校友以身爲東海人自傲。然而曾幾何時，新式機能性的大型建築，取代了原本意象豐富的校園規劃，讓相思林遭到三度的砍伐。站在校方的立場或許會認爲，做爲一個財政短絀的私立學校，東海在面對實際經營的問題時，不得不將「無用的」相思林砍掉，多蓋一些校舍招徠學生。但這裡面牽涉到一個關於「大學教育」的目的何在的問題。

陳昭如認爲，如果大學的目的只是讓老師傳授知識給學生，那台灣各大學根本不必有校園，只要像補習班一樣租棟大樓，讓學生繳學費上完課就走即可。但如果我們認爲除了「老師發講義，學生抄筆記」之外，大學還應該製造一個環境讓學生能認真地思考自我與知識的關係。那麼校園的規劃就不應該純就商業性的、功能性的角度來衡量，而應該從人本的立場來思考。因此「相思林保衛戰」代表的不仅是「開發」與「保育」的角力：

所以，這次東海校園的相思林保衛戰，一如前幾次的情況一樣，不僅是一場

保育之戰，更是一場大學教育理念之戰，雙方各就其對校園空間的規劃與概念，意圖取得詮釋「大學教育為何」的主導權。至於最後究竟會「鹿死誰手」，我們不妨拭目以待（陳昭如，1999）

如同本文第一章所述，這場「大學教育理念之戰」在東海大學的歷史已經綿延許久，而在「118 事件」之後，戰場將從相思林轉移至路思義，這裡面存在著東海的希望，也突顯了東海的困境。

第三節 東海希望聯盟

V 大樓事件

位在路思義教堂附近，德耀路入口的 V 大樓，正式的名稱是視聽大樓，不過東海學生多半以校內校舍代號的 V 大樓稱呼。該棟建築於 1972 年 12 月動工，於 1973 年 11 月落成啓用。V 大樓由前東海建築系主任漢寶德設計，由於當時漢寶德深受紐約「白派」風格影響，特別強調建築的純淨，加以東海面臨財務危機，學校沒有財力在建築的細部裝飾上多下功夫。因此使得整棟建築完全以白色、簡潔的線條構成，表現出典型的紐約「白派」風格。

1999 年，東海校方決定拆除老舊的 V 大樓，興建人文大樓。由於規劃使用面積約 3,000 坪，若以 V 大樓原有佔地面積來計算，可能會需要一棟樓高達七層的建築物。由於 V 大樓位在德耀路入口，距路思義教堂後方不到 100 公尺，如此勢必會衝擊到路思義教堂周邊之景觀。在「118 事件」發生之後，學生舉辦的公共論壇即首先針對「V 大樓改建案」進行討論。

10 月 16 日，東海大學第 141 次校務會議中，徐武軍委員亦針對 V 大樓改建視聽大樓的量體提出意見。

11 月 24 日，行政會議中總務長報告，新教學大樓興建地點，之前由建築師初步規劃五處，嗣經校建會委員投票決定，最後擇定 V 大樓現址做為興建基地為佳。

12 月 22 日，東海校方於晚上六時在銘賢堂召開公聽會，針對本校教學行政綜合大樓新建工程案，由校建委會委員進行說明，收集師生反映意見。建築所碩士班研究生袁興言在會中表示，從量體空間、使用人數、開發時程等因素分析，「V 大樓改建案」有許多必須檢討之處。

由於校方已開始進行「V 大樓改建案」的競圖，並預計在 11 月初動工，關心該案的人間、台研等學生社團以及部分建築系、景觀系師生，共同組成了「東

海希望聯盟」呼籲師生校友注意該案可能對校園景觀尤其是路思義教堂天際線造成的破壞¹³⁴。

2000年1月6日，校建會舉行會議，綜合討論「籌建教學大樓公聽會」（12月22日公聽會）中校園師生提出之意見，並研商「校門口改建」、「學生機車停車場立體規劃案」以及「大學路路幅改善」等工程規劃進度。

1月26日，行政會議中決議工程名稱暫訂為「教學大樓」

「V大樓改建案」造成的衝突在2000年4月間達到最高點。由於4月1日的中國時報以「東海起大樓，遮損教堂映象」報導東海校內關於「V大樓改建案」的意見。其後數日各報紙媒體紛紛可見東海校友投書，要求校方暫緩「V大樓改建案」。同時「東海希望聯盟」亦發起連署行動要求學校重新評估。4月10日當天學生社團並在校內貼出「你願意畢業後，再也認不出東海嗎？」海報，表達學生的關切及憂慮。

由於媒體、輿論對的報導，甚至還有多位校友打電話給校長表達關切。4月10日東海校方於4月10日中午邀集近20家中部地區媒體召開緊急記者會，將學校既定之重大工程進程序以及V大改建計畫等，逐一詳予說明。

王亢沛校長並對媒體說明整個「V大樓改建案」之內容。表示東大學生目前多達一萬三千七百餘名學生，同時加上夜間部部改制第二部成後，學生也要在白天上課，使得學校教學研究空間嚴重不足。

王亢沛說：學校要邁向卓越不能光憑景觀美感，師資及學術風氣更有待提升，校舍增建勢在必行。

東海大學校長王亢沛說：東海大學畢竟不是公園，更非建築博物館，既然改建大樓有實際需要，再難都要推動，他要對得起東海歷史（自由，2000.4.11）

但在記者會現場，包括校友以及「東海希望聯盟」的學生亦在徵得校長同意下一旁聆聽，並有學生上前發表意見，一度和校方發生言語的摩擦。

面對校內外輿論對於「V大樓改建案」的質疑。王亢沛校長除再三強調在去年一級主管工作研討會及第141次校務會議，已通過修訂「東海大學重大工程公告參與程序辦法」，而且整個「V大樓改建案」都依規定嚴謹程序縝密進行。同時外界質疑的「十層大樓」、「勢將破壞天際線」等說法實屬「空穴訛傳」。並表示：

台灣高等教育正面臨新的變局，「東海」所承受之競爭壓力較前愈大…「東

¹³⁴ 感謝東海圖書館特藏組提供的新聞剪報資料，以及陳慧中接受我的電話訪問，補足我手上關於「東海希望聯盟」的運動實踐上欠缺的資料。慧中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的鼓勵與協助，亦在此深深感謝。

海」實難再獨藉路思義教堂、文理大道等「景點」做為訴求主體；「東海」不啻非為森林公園，更非「建築博物館」，必需具備良好教學與研究環境，全面提升競爭力（東行，民 89.4.12）

學生議會議長曾煥程則表示，支持本校整體發展建設的各項方案。並建議學校以後各項公關宣傳，海報製作應多參考教堂或景觀以外的各項主體，作為本校新的象徵。言下之意似乎認為，由於過去東海對外太過強調「校園景觀」、「路思義教堂」的象徵意義，因此才會有這麼多關切質疑「V 大樓改建案」的聲音。

同時參加行政會議的李校牧立即發言表示：

本校路思義教堂除了是本校重要的歷史性建築之一外，亦是本校基督教的精神堡壘，應予重視。現今雖為兼顧本校未來發展之需要，亦不宜改變不以路思義教堂做為本校之代表性象徵記號（同上）

王亢沛校長立即出面緩頰，建議之後學校對外宣傳文案圖片，能視不同場合與訴求，多嘗試其他可能，以展現學校各領域豐富特色。從這段行政會議上的插曲，可以看得出在高等教育發展更加市場化之後，東海大學由於壟斷地租的作用所產生的矛盾¹³⁵。

媒體輿論以及王亢沛校長對於「V 大樓改建案」的理解，都放在「景觀 VS 建設」的衝突上，但是許多投書媒體，深諳學校歷史的校友，都深刻理解到這其實是一場在東海歷史中互古的辯論。例如東海校友、文化大學社福系副教授王順民即在媒體投書中表示，東海面對其的其實是在「辦學福音化 VS 辦學世俗化」的抉擇的兩難，而這是台灣所有私立大學共同面對的發展議題：

問題的真義就不全然是再將焦點放在教學大樓的興建與否，而是去思索：在快速變遷的校園文化與知識建構過程當中，老師與學生，以及師生與人文自然環境彼此相互之間的內在關係將如何地被孕育與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連帶地，如何正視各種高等教育發展的難題並且加以制度化的紓困，這才是校園學術發展與既有景觀維護這項貌似兩難的基本思考。

總而言之，側重道德人格的培養、強調基督教的宗教主體性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的生存壓力，這三者相互交叉地為東海大學深植、鋪陳了一種外弛內張的發展格局。不過，擴大來看「興學福音化」這項標舉宣揚真理、引人歸主、發揚基督博愛的精神；以及培養具有基督精神品格之專業人才之終極關懷，勢必要面臨著教育政策、經費財援以及高等教育市場競爭所謂「興學世俗化」的結構性挑戰。只不過，這也是包括東海在內的所有私立大專院校所必須共同面對的發展議題。

（王順民，2000）

¹³⁵ 參見論文第十章第一節

4月15日，雖然正值期中考，但是「東海希望聯盟」在學校校務會議舉行時，在場外拉起「不反對建設，反對無理規劃」、「捍衛東海景觀」、「立即停止大樓改建案」等黃布條，並於會場外花木掛上黃絲帶，在會場入口懸掛看板、海報並向與會的校務委員散發傳單，向校務會議遞交請願書，要求校方重視「V大樓改建案」所可能對東海校園景觀造成的影響。

當天校務會議中並無討論「V大樓改建案」議程，但由於聯盟學生在會場外請願，建築系主任羅時瑋要求提臨時動議討論「V大樓改建案」，但因無人附議使臨時動議無法成立。

羅時瑋遂在校務會議上發言，表示V大樓改建的區位和面積都有問題，校內很多師生和校友的看法一致。他個人雖然在出席校建會時投票反對，但因為只是「一票」，沒有人重視。他認為校建會成員有半數是行政人員，對專業的建築規劃能否正確判斷，以及及會議代表性都有問題。但羅時瑋的發言卻未引起現場校務委員的共鳴，甚至王亢沛校長還有意「清場」，引起到場關切的學生譁然。

校務會議結束後，「東海希望聯盟」及請願的學生和王亢沛校長溝通，最後在得到校長承諾，暫緩舉行改建競圖評審的進行，靜待校務會議選出的六人小組針對規劃案進行評估，以及舉行公聽會後再進行相關事宜結論，整個學生的抗議行動方才結束。

在學生請願同時，東海教授會亦在校務會議場外散發新一期通訊月刊。教授會會長徐武軍表示，東大教室荒，增建教室勢在必行，但是校方表示目前規劃地點是唯一適當的說法，他們絕對不能接受。

但另一方面。東海文學院七個系的系主任發表聯合聲明書，希望大家「給東海一點成長的空間」。聲明中表示：長期以來全校教學研究空間嚴重不足，文學院仍有許多老師是二人共用一間研究室，如果沒有新的建築物出現，此問題注定無法解決。文學院的系主任們強調，一定會在嚴格監督品質的立場，在不妨礙東海完整景觀的前提下，來看待與支持新建物的空間（聯合/自由，200.4.16）。

「V大樓改建案」引起的衝突，使得前東海建築系主任、台南藝術院校長漢寶德也透過媒體呼籲東海行政當局，為學校發展應儘速規劃第二期校區，以都市型校園發展來因應。他表示，一棟大樓就讓學校對立成這樣，但東海絕非一棟房舍就解決校舍不足的問題，今天衝突過後，不能解決難題，難道未來都要藉由繼續衝突，來建構校園發展嗎？（中時/聯合/自由/台日/中央，2000.4.16）

4月30日，第11期《東海大學校訊》刊載了整個「V大樓改建案」相關事務、過程、公聽會記錄、改建進度作業一覽表等。

東海大學教學區整建規劃建議案

5月5日，東海校方於晚上7點，在銘賢堂再次召開「V大樓改建公聽會」¹³⁶，而「東海希望聯盟」則在當晚舉行「燭光行動」的會前遊行，表達學生對東海景觀的守護之心，希望為校園環境的惡化點亮一盞希望的燭光。

雖然公聽會現場仍有不同的意見爭執，但會中針對整體校園規劃之議題與方向，達成若干共識：包括委請建築系就教學區現有範圍，負責研擬規劃可能之建設，規劃內容涵蓋現有教學區可供建築用地勘察、量體大小、建物用途、交通動線等。建築系羅時瑋主任於公聽會中同時承諾，該系願意承擔是項規劃工作。並於今年暑假完成，以解決當前教學和研究空間急迫的需要。王亢沛校長表示，此一「共識」確為推動長程校園規劃良好且重要開端（東行，民 89.5.10）。

這個由建築系羅時瑋老師擔任召集人，阮偉明、侯錦雄分別擔任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組成的工作小組，於暑假期間進行東海大學教學區的規劃，並於9月底完成期末報告，提交校建會、行政會議討論。

在工作小組提出的報告中，強調這個計畫的性質屬於校區的分區規劃。希望在不破壞固有的架構與景觀的前提下，盡力解決目前最急迫的空間需求，對建築景觀提出適當的規劃。在計畫中首先界定出「意象保留區」和「管制發展區」，將文理大道兩側至上方相思林及申正堂一帶，定為限制開發的校園「意象保留區」。但同時針對教學區內可用的土地（發展區）訂出七個分區，依據不同的基地條件和現況，訂出管制的管轉則及規範。

這個被建研所學生戲稱為「東海七塊論」的計畫，具有很強烈的「分散式」的規劃構想，即透過現有教學區內，七個大小不等的可發展區塊，分期、分區解決教學空間需求的問題。由於分散解決，可以因地制宜，減少建築量體空間，達成整體秩序和個別需求之間的巧妙平衡。避免以往集中式的單一巨大量體，造成建築和景觀上巨大衝擊的弊病（參見圖2）。

雖然具有這樣先進的構想，但是這份規劃還是遭到行政單位、相關系所以及校內學生的質疑。總務處人員的意見主要是針對規劃區域內的地權、建築執照申請，以及交通動線設計的問題。相關系所的考量則集中在個別的空間需求上，例如文學院李立信院長，在行政會議中先表示，希望增加A1區（即V大樓改建區）的樓底板面積，以增加改建後的使用面積。後來又建議：

¹³⁶ 該公聽會原訂於5月4日舉行，後由於該時間與「東海表演藝術月」開幕活動及大陸南京大學國樂團表演撞期，應同學要求延期，「為讓更多師生同仁參與，形成校內共識，茲將公聽會順延一天」（東行，民 89.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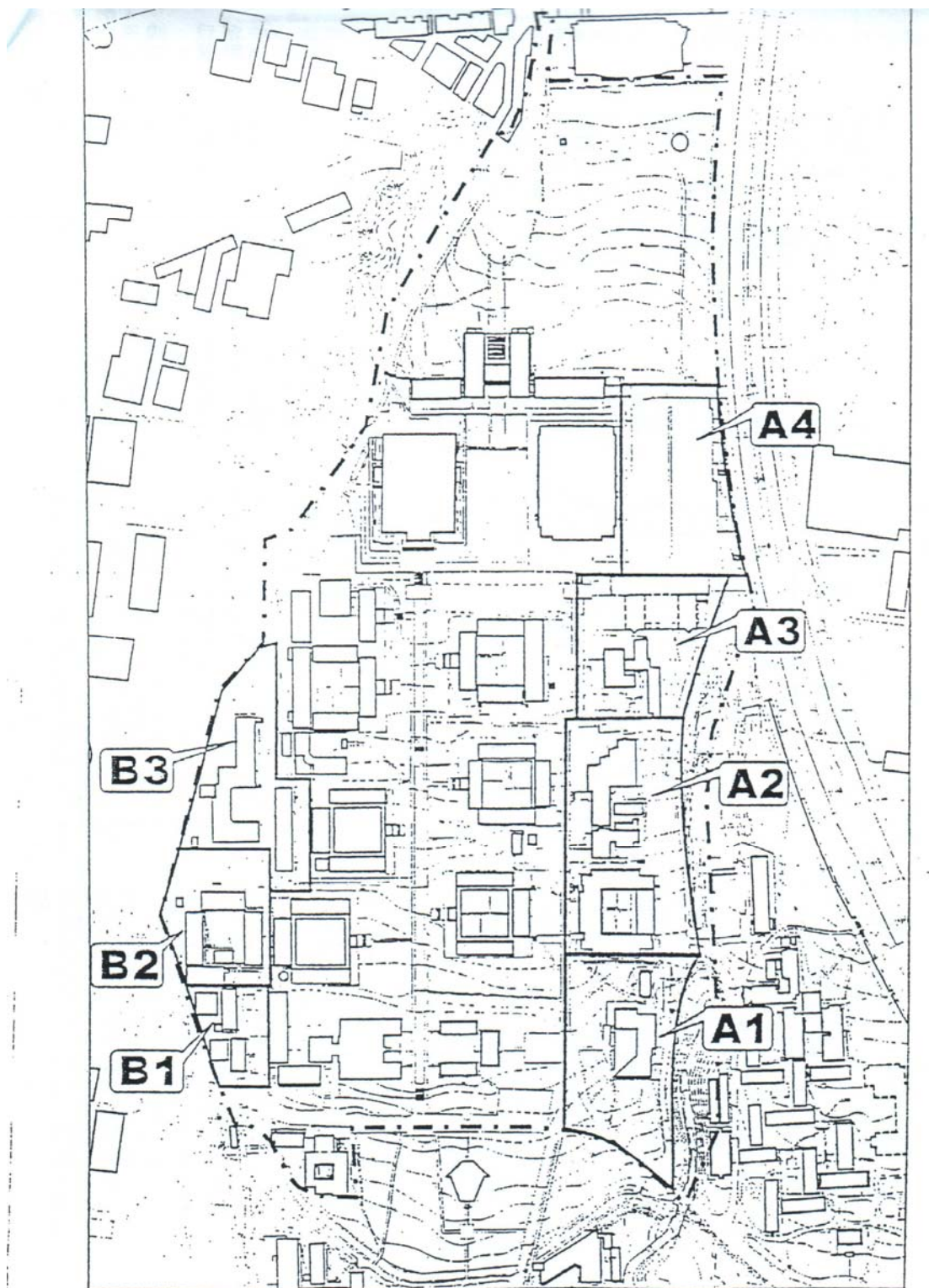


圖7-6分區發展計畫


 東海大學
教學區校園規劃 2 0 0 0 0 25 50 100

圖 2：東海大學教學區整建規劃建議案（資料來源：東行，民 90.3.14）

為了大樓能順利改建，本人建議規劃報告在 A、B 各區所列之坪數全數刪除，以免日後引發不必要的爭議。…據總務處的資料 A1 區空地面積超過兩千坪，在不破壞天際線及周圍景觀的考量下，在建蔽率容許的範圍內，希望能做最大利用，目前規劃的坪數，顯然不能符合上述的要求，希望能再增加建坪。

（東行，民 89.10.4）

同時出席的沈維雄館長也表示：

是否因為 A1 區基地的建築物設限條件過於嚴苛，而導致樓地板面積減少，可否考量使用單位之需求，降設限條件放寬，增加建坪以解決教學空間嚴重不足之燃眉之急。

對這樣的要求，負責規劃的阮偉明老師則表示：

針對 A1 區基地為何訂出較多的管制規範，或者該基地能增加空間量的問題，因為該基地在區位上有其特殊性，在避免景觀衝擊的原則上，依據前述的分區發展建議，訂出不同的準則。也因此不能完全用一般建蔽率、容積率或土地效益的觀點來衡量東海的基地

學校師長和行政人員對於 V 大樓改建的爭執，集中在樓版面積、景觀衝擊等技術考量上，但是學生則從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在思考這個問題。例如同時出席的學生會會長林德宇表示：

校園整體規劃應把全校皆放入考量，而非僅侷限於現有教學區…同學不是非理性的反對校園建設，而是反對在現有高密度的教學區。在座的各位師長所考慮的是各單位的使用效益，然而在此也懇請各位師長「將心比心」想想同學的想法，了解輿論的意見（同上，底線為筆者所加）

如同本論文第一篇所述，這種反對從個別需求、技術面向考量校園空間問題的立場，在東海校園歷史中其來有自。在報告完成，學校於 10 月 18 日再次召開公聽會前夕，「東海希望聯盟」對校內同學發出的一份文宣中，再次強調了相同的主張：

圖書館總是借不到需要的書，學校一直喊窮，卻到處在蓋大樓。東別的交通會不定時癱瘓，就像下課時的東海校園。我們已經不知道東海何以是東海，不知道大學和補習班到底差在哪裡，除了目前尚存的程度上的差別，他們看起來正朝同一方向前進（東海希望聯盟，2000）

「東海希望聯盟」認為「題目出錯了，運算得再精確也得不出對的答案」，要求學校先做出校園整體規劃報告，邀集全校師生召開校務發展大會，東海的問題絕對不是規劃得夠不夠謹慎專業的問題，學校不應針對個別建築物進行討論，而是要針對整體校園發展政策與治學方針進行檢討。

不過在 10 月 18 日公聽會的現場，主要還是由「東海大學教學區整建規劃報告」工作小組進行專業上的報告。雖然這些專業者針對教學區現狀，提出了多面向且具專業水準的分析，但是對於「東海希望聯盟」所提出的整個規劃所依循的校務發展計畫的內容、東海校園空間發展方向等問題，專業者完全沒有辦法回答。而校方行政單位則始保持沈默，不論與會師生如何質疑與要求、勸說，則一概以「帶回去參考」來回答（林育群，2000：3）。

王亢沛校長則在行政會議上，怒責「東海希望聯盟」學生提出的召開校務發展大會等訴求「明顯背離合理正途」：

凡為校務重大決策，實際上俱需經由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等「合法之程序與機制」充分討論形成共識，才能加以制訂並落實推動…倘若整個國家社會任何事務俱依該等少數同學所持「見解」從事，所有政策無論大小均須經全台二千三百萬民眾共同開會討論決定，則國家立法、行政機制何需存在？法制基礎無異蕩然！（東行，民 89.10.18）

由建築系、景觀系殫精竭慮完成的「東海大學教學區整建規劃案」，在經行政會議、公聽會討論，及「校建會」和董事會會議報告後，再彙整各方意見修正規劃內容，於 2001 年元月提交總務處及行政會議討論後結案。至於校內外嚴重關切的「A1 區基地」規劃，除依校內一級主管建議，以 A1 及 A3 區（科技大樓及建築系館區）為優先考量之興建區外，並對 A1 區建築的基地範圍、允建高度、建蔽率等做出嚴格的規範（東行，民 90.1.3）。

春天的吶喊-宿舍床位不足、校門口改建、成大 MP3 事件

「V 大樓事件」暫告一段落，緊接著在隔年（2001）的 3 月、4 月間，先後發生了「學生宿舍床位縮減」、「校門口改建」、「成大 MP3」等事件，反應快速的「東海希望聯盟」也立即針對這些事件，於校內發起連續的抗議行動，甚至逼使學校採取「新白色恐怖」的手段壓制。這一年大度山的春天，真是一點也不寂靜！！

2001 年 3 月下旬，東海大學學務處生輔組男生指導室貼出公告，表示為進行老舊宿舍整修，將六人房改成四人房，必須縮減床位，預計九月份開始實施。因此下學期將有三百多名住宿生被迫遷出宿舍。「東海希望聯盟」認為這是讓學生在高學費外，還要負擔高房租，因此在校內散發「不要搞學店，還我住宿權」的傳單、海報，要求學校正視這個問題。

3 月 27 日，東海大學學生生活輔導組主任陶樹義對媒體表示，東海提供學生的宿舍床位在全國數一數二，更居中部地區各大專院校數量之冠，此次改變，真正減少的床位僅一百多床。預計下學期登記住宿的舊生約在 400-700 人之

間，在宿舍抽籤結束後，校方將舉辦租屋博覽會，提供校外租屋手冊，讓抽不到床位的學生選擇（中時/自由，2001.3.27）。

3月28日行政會議上，學務處表示，本星期二中國時報以及其他報紙報導東海學生抗議宿舍減少問題，學務處說明如下：本校一向重視學生住宿問題，因此東海至今仍是全國各私立綜合大學學生住宿比例最高者。但是為了維持一定的住宿比例，至今我們的部份學生宿舍必需以六人房居住，嚴重影響生活品質。為改善學生宿舍生活品質，決定先將設施較差宿舍每間住宿人數由六人降至四人，以紓解擁擠。同時學務處也提案討論未來三學年度（民國90-93）學生宿舍改善專案計畫，加速推動更新設施與維修工程。學校並收集印行校外租屋資訊，舉辦租屋博覽會等，以減少縮減床位所可能帶來的衝擊。（東行，民90.3.28）

不過「東海希望聯盟」指出，生輔組貼出的公告上明明裁減了三百五十八個床位，同時指出同為私校的長庚大學學生與床位比是百分之百，同在中部的中興大學學生床位比則是百分之四十，而東海只有百分之三十點六，認為學校並未照顧學生權益，並有對外粉飾太平的嫌疑。希望學校重視學生的住宿權益，一但大量學生前往東海別墅租賃房屋居住，只會增加現有東別的住宿人口，產生環境品質下滑、學生校外安全等問題。（自由，2001，3.29）

在「東海希望聯盟」針對學生宿舍床位縮減問題，對學校提出抗議的同時，又接到學校消息，預計從4月1日起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校門口改建工程。「東海希望聯盟」認為，校門口是東海重要的出入口，但學校在之前只開過一次的公聽會，還未召開第二次公聽會就要開始動工。同時一直到動工前三天，才在BBS上出現佈告，學校的動作明顯違反了自己訂定的「重大工程參與程序」。

「東海希望聯盟」遂定於3月31日週一上午十點，於校門口以搭帳棚、鋪睡袋方式，抗議校方縮減宿舍床位及校門口新建工程。

對於學生的抗議行動，校方對外解釋：「校門口新建及週邊工程」從1994年3月起即由「校建會」決定規劃設計，經多次行政會議討論，並舉辦公聽會，歷近七年，過程一切公開，皆具記錄資證（東行，民90.4.11）。

緊接著在4月13日，南部成功大學發生檢察官搜查違法MP3下載，並進入學生宿舍帶走學生電腦的事件，引起全國大學輿論譁然。教育部在緊急開會後，決定在各校進行宣導發起「學生自清運動」：對於未經授權的非法軟體勿擅自下載，已下載者應自行刪除。東海校內亦由學生會發起「尊重智慧財產權，東海人請自律」宣導活動，並透過刊物《生活促進快訊》表示，MP3下載是否合法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在問題合法性未釐清前，東海人應自重自律，以免觸法而不知（中時/聯合/中華/中央，2001.4.18）。

不過由台大、東海、中興、世新大學的學生社團組成的「台灣民主學生運動

聯盟」，卻指責教育部「未審先判」，在下載 MP3 是否違法仍不確定之際，就要學生認錯和解，等於向 IFPI 背後代表的跨國財團低頭，教育部根形同「財團專用的警備總部」。並於 4 月 19 日由 20 餘名學生代表前往教育部抗議。

4 月 27 日，由於各大學調漲學雜費引起社會輿論重視。同時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抽籤作業結束，全校有 1,956 人申請，僅有 700 多個床位，中籤率偏低，尤其是男生宿舍申請者達 747 人，卻只有百餘個床位可抽，中籤率更低至 15%。「東海希望聯盟」認為學校一方面調漲住宿費，又縮減宿舍床位，逼迫同學到校外租賃，等於是變相調整學雜費。因此發起：「還我住宿權，不要 A 我錢」連署活動，希望喚起校方重視學生住宿問題。

「東海希望聯盟」並發起「510 替我們辛苦的媽媽請命」活動，預計在 5 月 10 日中午 12 點，集合在校長室前草坪，向校長表達「共同捍衛受教權，反對變相高學費」的聲音，要求校方不得任意調漲住宿費、學雜費，暫停縮減床位，宿舍補行抽籤，提供低收入戶學生校外租賃津貼以及不得淪為教育部和跨國財團幫兇，在校內外搜查學生電腦或影印書籍等（東海希望聯盟，2001）。

校園新白色恐怖！？

「東海希望聯盟」密集而持續的行動，對東海校方造成極大的壓力。3 月 31 日「東海希望聯盟」學生於校門口靜坐事件發生後，4 月 11 日行政會議上，王亢沛校長認為學生的言論不按程序、不符事實且嚴重破壞校譽，要求學務處研擬校規，予以嚴懲遏止。與會人士除學生會生促部長吳瑟致，表示學生會會進一步與學生溝通外，大多支持校長意見，主張必須予以嚴懲。王振寰學務長並表示，學務處將擇期於近日之內，徵詢法律系老師及獎懲委員會師生代表討論研議處理方式（東行，民 90.4.11）。

「成大 MP3 事件」以及「還我住宿權，不要 A 我錢」連署活動發起後。東海校方認為新宿舍住宿費略高於舊宿舍並無不妥，且住宿費調整研議全程，學生會代表皆參與協商。認為「東海希望聯盟」的言論行動，曲解事實，破壞校譽。王亢沛校長要求積極健全「校園倫理」機制，藉「法治」彰顯落實真正「校園民主」（東行，民 90.4.18）。

4 月 25 日，王亢沛校長於行政會議上譴責學生在 BBS、海報及新聞媒體上將東海類比、謬喻成「學店」，認為已構成誹謗，扼害校譽至深（東行，民 90.4.25）。

5 月 7 日，「510 替我們辛苦的媽媽請命」活動發起前夕，東海校方以快遞方式寄出警告信函給「東海希望聯盟」五名主要發起學生的家長。信中表示貴子弟在校內散發傳單，提出各種不合理要求，並擬於五月十日發動同學非法集會，要脅學校配合，希望貴家長能適時約束貴子弟在校行為，否則一旦有違反校規

之事發生，將嚴重影響子弟在東海大學之求學機會、未來前途云云。除此之外，並由教官打電話至學生家中聯繫家長，或要求系主任向聯盟的學生表達關切。

東海校方的這些動作造成部份「東海希望聯盟」學生很大的家庭壓力，並引起強烈的憤怒。學生指責學校可以不接受學生訴求，但這種作法根本是「新白色恐怖」，威脅學生基本人權，要求校長公開致歉，並保證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但王亢沛校長認為：「致函學生家長，促瞭解在校子弟言行，旨在提前預知，防其未然，何以能與『白色恐怖』並論？」（東行，民 90.5.9）

5 月 9 日，「東海希望聯盟」於校長室前行臨時記者會，公布學校的「威脅信件」，嚴詞抗議校方高層打壓學生民主權利的行為。台大大論社、中興大學黑森林工作室皆派學生代表到場聲援。同時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並對外發表聲明，支持學生的行動。

在學生於校長室前舉行記者會的同時，學校也正召開行政會議，討論如何處置「東海希望聯盟」的學生。與會人士咸認為學生言論誇張扭曲，不符事實，但在致函家長後，如何處置學生，則意見不一。有主張應依校規議處，但也有人認為學生反而可藉此舉擴大渲染，對立局面恐難收拾。有主張校內應訂定類似「集會遊行法」規章嚴格執行。但也有人認為，學校要應加強和媒體間連繫，以免抗爭事件利用媒體炒作。針對如何處置「東海希望聯盟」學生的問題，當天行政會議記錄共羅列了十七點意見，但並未做出結論（東行，民 90.5.9）。

5 月 10 日，「510 為我們辛苦的媽媽請命」活動照常舉行，不過又多增加了「反對白色恐怖」的訴求。約近 40 名學生集合在校長室前高呼「捍衛受教權，反對變相高學費」等訴求。另外社會系教授趙剛、趙彥寧、法律系教授林騰鶴、教授會會長徐武軍等人也表示聲援。由於校長北上至教育部開會，因此由學務長王振寰和學生溝通，表示校方不會動輒訴諸校規進行秋後算帳，但盼學生可以理性表達意見。而在學務長明確表達新學年不調漲學雜費、不秋後算帳以及不會隨便清查學生個人電腦的善意回應後，510 陳情的活動於下午兩點和平結束。

在 507「新白色恐怖」事件發生後，學生會會長林德宇表示：支持校園民主及自由，對學校發函給學生家長的行為表示遺憾，但希望校方及學生應以理性溝通取代陳情，因為東海沒有分裂的本錢。

另外校內也出現署名「東海愛校聯盟」的海報，指責希望聯盟動不動搞抗爭，大事小事都要管，逕行散播不實消息，已把東海的未來帶到最沒有希望的結果，呼籲停止非理性、無建設性的抗爭（中時/自由/中央，2001.5.11）。

從 V 大樓到人文大樓

2001 年 3 月 14 日，東海行政會議通過文學院及教務處所提之「教學區第一期新建工程興建空間需內容及地點案」。

2001 年，「人文大樓」（原來的 V 大樓）進行競圖，由東海建築系畢業、曾在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進修，並曾在貝聿銘建築師事務所工作的黃明威獲得第一名。考量到這棟建物可能對教堂景觀的衝擊性，黃明威在設計中透過地基下挖以及東面植栽保留的方式，使得總地板面積達 4,000 坪的人文大樓，從德耀路入口看起來只有四層樓的高度，以免破壞教堂的天際線。另外在東南角朝向教堂的方向，則設計出一個開口，有一片四十五度角的斜牆，使學生可以看見教堂。

2002 年 11 月 12 日，人文大樓開始動工。

2004 年 3 月「人文大樓」完工。同年 11 月 29 日，「東海人文大樓」榮獲首屆「遠東傑出校園特別獎」佳作獎。中國時報盛讚「人文大樓塑造東海大學生活與學習節點，並尊重地標路思義教堂」。評審委員指出：

人文大樓不僅重視路思義教堂的天際線，對空間的處理，不論是從學生宿舍、校長辦公室或圖書館，以及原有約農路到人文大樓的軸線都予以保留！

從 V 大樓到人文大樓，這棟建築物創下了許多「東海第一」的紀錄：

- (1) 它是東海校內第一棟「白派」建築風格的校舍。
- (2) 它是東海因為財務困難，進入轉型、調適期後興建的第一棟建築
- (3) 它是東海第一棟拆掉舊建築物，再行原地新建的校舍。
- (4) 它是東海第一棟獲得校外建築獎的校舍。

(5) 它的拆建促成了第一次有大量建築、景觀專業科系師生積極參與的校園空間運動。並使得東海校方在「相思林事件」之後，首（再）次使用嚴厲的手段壓制學生運動。

東海的希望與困境

觀諸「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從 1999 年到 2001 年間的「東海希望聯盟」的行動，在運動能量和連結規模上，幾乎達到了自「相思林事件」以來的最高度。聯盟連續而密集的行動，使得學校行政單位備感威脅，重現了自 1990「相思林事件」後不再使用的管理學生手段，而招來「新白色恐怖」的批評。

從行政會議王亢沛校長的發言中可以看得出來，東海校方的壓力來自於高等

教育市場化，各大專院校間競爭日趨激烈後，必須積極推動校園重大工程建設的壓力。而「東海希望聯盟」的行動成了過程中必須最大限度排除、壓制的異議聲音。但是學校大規模建設的結果，也抵觸了東海校園在長久歷史中形成的校園景觀認同感。「V 大樓改建案」的一波三折，特別是 4 月 12 日行政會議上的那段插曲，最足以表現其中的矛盾。這也強化了「東海希望聯盟」行動的正當性，而讓學校頭痛不已。

「校園空間」議題在東海從來就不只是個美學的問題，而是個關於校園發展方向決斷的政治問題。在「V 大樓事件」中，由於《東海校園教學區整建規劃建議案》的提出，似乎讓這個討論從價值的辯論，轉向專業的、具體的校園規劃構想的抉擇。但是具備高度專業性、創意性的「分散式」構想並未受到與會人士的青睞。各單位關心的仍然是自己系所擁有的樓版面積，而沒有能力從整體的角度對校園建設進行考量。從後來東海開發「第二教學區」的過程來看，雖然有著專業上的支持，但是「集中式」的開發還是取得了優勢。即使這種集中其實在另一程度上是在製造東海的分裂，因此使得「交通聯繫問題」變成「第二教學區」爭議中核心的問題。

這樣的結果只是再度證明了規劃的過程其實是一個政治的過程，程序的合理並不能保證實質的合理。在 1991 年的「綜合大樓論戰」中，就已指出在專業技術的考量背後，還有著主體價值層次的討論，這是任何的空間規劃過程都無法迴避的議題，但這也是純就技術面考量的校園規劃制度所無法滿足的。

「東海希望聯盟」的學生看出「短期需求 VS 長期規劃」以及「技術考量 VS 價值選擇」的矛盾，因此提高層次要求校務發展方向、整體校園層次的規劃藍圖，但這其實是行政系統無法負荷的期待。某種程度上這種期待的產生，其實也是校方開放更多參與性機制所創造出來的，而王亢沛校長的答覆就是回以 507 的「新白色恐怖」。

但即使學生的主張「明顯背離合理正途」，當東海一方面不斷以「全國最美麗的大學」來突顯自己，一面又不斷的大興土木建築校舍，這樣的一種結構性的矛盾，又要如何在現有制度內解決呢？這裡面突顯出東海校方在「118 事件」後雖然大力的進行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但是「壟斷地租」和「合法化危機」的結構性矛盾，卻不是憑著領導者個人的良善意願和制度改革就能輕易化解的¹³⁷。

東海校方積極進行的校園規劃制度改革遇到了結構性的限制，而看似聲勢浩大的「東海希望聯盟」在其行動中，也存在著難以逾越的侷限。一個很值得討論的狀況是：雖然參與了這麼多活動，但是人間工作坊竟然連續三年招收不到足以擔任幹部的新社員而差點倒社。而一直以來和人間、台研在校園空間運動

¹³⁷ 參見本文第九章

上有密切合作的女研社，卻在 2001 年因為後繼無人而倒社。雖然從「東海希望聯盟」開始，新生的校解社和人間/台研有更緊密的互動。但是從 1995 年起，環生社、東風社、女研社、大度山社等東海的「異議性社團」都接連著消失。不免讓人擔心，呼嘯的東海風是否從此將在大度山上消失？

當然不只東海的異議性社團，從 1995 年起台灣各校許多「三月學運」前後成立的學生運動團體，也紛紛面臨倒社或後繼無人的困境。不過當 2005 年，連走救國團模式的服務性社團--東海康輔社，也因後繼無人宣告倒社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有了新的面向。如果說之前學生因為覺得「不好玩」而不想加入「異議性社團」，那麼在千禧年之後，看來學生的態度變成了「不想跟別人玩」。在第七章中提到在「三月學運」之後，東海校園內的學生聲音呈現更多元、分化的狀態，而在千禧年之後資訊科技網路主導的世界，這個多元、分化的狀態，看起來更加趨向流動而碎裂。

在這種碎裂、流動的情況下，學生集結行動的可能就只能來自於「想像」(image, 或說意象)的作用了。如同柯司特所主張的，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新的社會權力的爭奪要圍繞著「文化符碼」的操作而產生。流動性、多層的溝通網絡，在某個特定象徵的作用下被組織起來，面對這種彈性的網絡組織起來的動員力量，巨大的、嚴格固定的官僚機器根本不是對手 (Castells, 2002: 395-398)。

事實上「東海希望聯盟」的核心幹部，大約只有數位人間、台研以及建築景觀系所的學生，但是在開會和行動時，經常會有許多學生、老師，進行流動性的參與。在沒有固定性的社會關係的連結下，奠基在校園景觀認同感上的「共同體想像」，成了串連協調不同行動者的重要關鍵。而在致函給學生家長，透過系主任、教官約談，不斷給學生壓力之後，如果東海校方真的以校規處分「東海希望聯盟」的學生，必然會牽動另一個更大的社會網絡，結果使得事情更加複雜化，更難以控制。

但透過「象徵」、「意象」的作用以集結力量的結果，也使得學生運動陷入了「地域主義」的窠臼。熱心參與校園空間運動的學生，不見得會有興趣參與校外的反高學費、工運、環保等議題，雖然從一個結構性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是彼此相關的。在歷史和客觀環境的限制下，地域主義式的共同體召喚似乎成為唯一的可能，但明顯的問題就是：運動很容停留在校園內部，而無法和大社會結構的問題，或是校外的社區、社會運動連結。

「東海希望聯盟」的核心成員當然警覺到這樣的問題，從「校門口事件」、「成大 MP3」、「宿舍床位不足」等事件的文宣中，都可以看出其要賦予個別的校園環境問題予以歷史社會結構的反省的努力。如同第三章所述，這一直是「相思林事件」發生後，異議性社團的「校園規劃」論述的特色。但如同陳信行所表達的：

在集體行動的層次上，一大群人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共同做一件事，絕對不是原子化的個人的「獨立思考」逐漸透過某種科學提煉過程而凝結為共識的。試金石不在於那些人們激烈地彼此不同意的東西，而是人們視為裡當然的事情。

（陳信行，2004：）

在本論文第一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東海的「共同體想像」以及「校園景觀認同感」，是一個具有更長久歷史和實踐累積的論述，其累積出來的論述效果，並非異議性社團接合其上的「相思林論述」可以完全取代的。在長久以來缺乏公共性討論的校園中，如果說學生們僅憑著短暫數年的努力，就能夠完全轉換這個封閉性的認同，毋寧是個太不現實的想法。

這裡凸顯了一個事實，即使「象徵」與「想像」在現代社會的權力爭奪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文化符碼」意涵的變更，依然有著特定時空下歷史和社會結構的限制。「想像」可以改變世界，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生活在一個「駭客任務」（The Matrix）式的世界。

事實上除了「118 事件」外，校園空間運動的訴求幾乎沒有成功過，可以說其成果主要是在校園文化的影響上，和微小的制度與環境的改造上，而非實質的政治成果。但是就在持續的實踐中，一種新的文化想像和校園空間論述也在逐漸成形，這使得東海的校園文化有一種不同的風貌。在這所高等教育的學府中，「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成果或許更多是在教育上，而非物質現實上。

第四節 東海保衛戰：2003 年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切割校園事件

東海校解社在《東海采風》第 8 輯以「2003 年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地底事件」為名稱呼這次的運動，但這個名稱實在太過冗長，恐怕也沒有人記得住。

在社運界夙有傳統的網路媒體--「苦勞網」則以「東海教堂事件」定名，雖然比較簡短，但容易讓人忽略了關鍵性的「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

由於公共電視的「我們的島」節目，曾以「東海保衛戰」為名製作關於這次事件的專輯，獲得關心聯外道路問題的師生很大的迴響，所以部份學生社團也以「東海保衛戰」之名稱呼這次事件，包括《東海采風》第 8 輯專輯的主標題。因此在經過多方考量後，筆者將這次事件取名為：「2003 年反對工業區聯外路切割校園事件」，簡稱「東海保衛戰」。

擦槍走火！？

如同第八章所述，東海大學師生和工業區聯外道路纏鬥 20 餘年，但從 2003

年起，開始有了和過去不一樣的變化。首先是校方於元月份得知，台中市府於上月（12）底公告，計畫於東海東側農牧場與台糖公司土地交界處開闢 60 米道路，貫穿東海校園銜接工業區及中港路。王亢沛校長立即責成相關人員蒐集資料，並召開緊急會議研商對策，於元月底向市府相關單位提交「異議書」（東行，民 92.1.8）。

7 月 30 日，台灣日報報導台中市長胡志強與工業區廠商舉行座談，由工業局提出三條通過東海大學的聯外道路方案。一為延伸市政路穿越東海大學牧場連結中港路，第二方案為原來在東海大學西側穿越相思林地的工業十六路方案。第三方案則為由市政路延伸至東海大學南端的東大坑溪，再挖地下道穿越東海大學中央，連結中港路。

至此「聯外道路問題」確定出現新的變化，從 20 餘年來的「相思林戰爭」，變成阻止三條要將東海掐頭去尾、開膛破肚的聯外道路的「東海保衛戰」。

同年 10 月 1 日，東海大學蕭欽篤總務長及黃啓禎主任秘書帶領相關人員列席「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的台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的第 16 次會議，會議結束後發現情勢對東海不利。由於根據都市計畫程序，如果在 11 月中旬台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小組開始開會，於 12 月底完成「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的程序，並在翌年呈送內政部的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一但通過，那就完成所有程序，無法挽回了。

10 月 4 日王亢沛校長在校內召開「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因應小組」會議，會中研擬出東海的反制方案，強調創造東海與中科的雙贏關係，以及東海的教育文化機能，以對抗工業區的開路論述。由於考慮到新聞熱度大約只有一週左右的時間，東海校方認為以 11 月 2 日校慶前後將此事披露，最可以使新聞的能量，影響到正在開會的台中市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希望透過校慶時媒體對東海校園的關注，以及各項研討會的舉辦，駁斥此次道路規劃的失當，以製造輿論壓力，引起社會討論。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0 月 9 日由於中國時報記者陳洛薇提前報導「工業區聯外道路」的相關訊息，隔天蘋果日報也報導了相關新聞，之後各大媒體都跟進大幅報導工業區廠商計畫興建道路穿越校園一事，引起東海校園強烈震撼。特別是預計會穿越校園中央的第三方案，很有可能會損及路思義教堂，更是引起校內師生和校友的關切。

10 月 9 日王亢沛校長以：「這簡直是國際級笑話！」形容市府荒謬絕倫的決策。但另一方面由於消息提前報導，使得校方原本計畫的「媒體戰」，有可能因為消息太早曝光，新聞熱度降低而失去作用。因此 10 月 10 日校長又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延長輿論的方法與步驟（溫舜光、陳培梅，2004：206-207）。

憤怒的東海人

雖然 10 月 10 日台中市長胡志強在媒體表示，該案尚在討論中還未定案，請東海人不用緊張。然而學生們已經因為這則新聞而騷動起來，在學校的網路上熱烈討論。畢聯會、研究會和四個系學會立即組成了「東海精神團結陣線」，架設網站，號召同學加入網路連署，捍衛校園。

同時東海校友劉希文、黃信勳、吳宗昇等人，也先後在各媒體發表文章批評開路穿越校園決策的不當。

10 月 14 日，東海大學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開始在校內定點擺設連署簽名攤位，並在各處張貼海報、發送文宣。次日「東海精神團結陣線」也加入定點連署簽名的活動中，同時連結校園解說員社、東海學生會等校內社團，聯合進行反對興建聯外道路穿越校園的行動。東海人間/台研並在校內舉辦數場說明會，向校內同學書說明聯外道路案的來龍去脈以及宣傳後續行動。

10 月 27 日，在發起運動的學生社團號召下，東海學生發動「網路快閃族」行動，以大量電子郵件癱瘓台中市府五個重要局處的信箱。

接著在 11 月 3 日東海學生團體代表，以及附近社區民眾聯袂前往台中市政府前抗議，並舉行記者會、表演行動劇。次日中午，百餘名學生在校園內舉行遊行，喊出「愛台中，請別傷害東海」、「砸錢幫財團開路，沒錢救大眾運輸」等口號，要求市府以建立大眾捷運系統，取代粗暴的聯外道路方案，來解決工業區的交通問題。

不知是有意還是偶然，著名的作家黃凡也加入了學生的遊行隊伍，不過參與遊行的學生卻沒有人認出他來，包括三名就讀中文系的人間/台研社的幹部。黃凡在次年出版的小說《大學之賊》中，描述了這場遊行：

隊伍接近二十公尺時，方才發現這批人壓根兒不是來歡迎我們。這是支超迷你的抗議示威隊伍，他們訴求的口號也聽清楚了。

愛台中，請別傷害牧場

反官商勾結、反圖利財團、反不當開發

規劃太唬弄，害慘大台中

砸錢幫財團開路，沒錢救大眾運輸

…我們目送這群年輕人和聽著他們逐漸遠離的歌聲：

我們要克服難關

夢想在我們心中

努力實踐，終有一天會成功¹³⁸

在這一刻，我內心泛起一陣酸楚，孩子們的吶喊是如此的天真，如此的可憐，他們受困於現實與理想的夾縫中而不自知，可是因此激發的熱情越發令人感動。

（黃凡，2004：44-45）

東海學生一波接著一波的行動，成爲一整個月媒體的焦點，以爭取在台中設立「古根漢美術館」分館而聲名大噪的台中市長胡志強，因爲這件事而毀掉了「文化市長」的美名。並連同稍後發生的「台中客運罷工事件」，被議會批評爲危機處理能力太差。媒體對 2003 年「東海保衛戰」的持續報導，使得校方原先擔心的「新聞熱度降低」的問題不存在。

戰火一直延續到 11 月 5 日，東海學生會聯合各系學會在校園內舉行公投，就市府提案希望開闢穿越東海校園的聯外道路一案，讓同學們圈選贊成或反對意見。共有八千九百人參與投票，總投票率七三·六一%，創下東海學生自治史上最高的投票率。其中反對票八千八百四十人，贊成者僅二十六人，另有三十四張無效票。東海學生以近乎一致的聲音，表達了堅決捍衛校園完整性的決心。

東海校方和學生的行動，可以說到「校園公投」之後暫時告一段落。11 月 9 日，台中市政府成立「大肚山科技走廊交通產業評估委員會」，並表示將依據委員會討論結果決定聯外道路之開闢。不過一方面台中市政府和工業區都沒有鬆口表示放棄開闢聯外道路，另一方面媒體上的戰火還一直延燒。

11 月 13 日，東海大學化學系林碧堯教授，於自由時報發表〈切割東海大學，掏空路思義教堂〉一文，對台中市一方面極力推動文化建設，卻又坐視工業區開路穿越東海大學的行爲提出批評。此文引來台中市政府工務局以及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進會理事長歐正明等人先後爲文回應。由於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工業區廠商一直默不作聲，歐正明的文章可說是代表廠商首次發聲。

11 月 22 日，前東海社會系教授、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朱元鴻，將「文化研究學會」第 25 場的「文化批判論壇」，以「古根漢與路思義」爲題，在東海大學銘賢堂舉辦，由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王振寰主持。會中的討論主要環繞在「古根漢美術館」的問題上，但也提到了這次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東海大學和台中市的關係等問題¹³⁹。

¹³⁸ 這是遊行時學生唱的〈We Shall Overcome〉的中譯，該首歌原爲 60 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及反種族運動場的歌曲。原文是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Oh! Dream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¹³⁹ 關這次會議的內容可以參考---文化批判論壇第 25 場：古根漢與路思義，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製作小組，由小組成員中的東海景觀系校友林佳穎進行採訪，訪問市府官員、王亢沛校長、東海學生等，並拍攝遊行和公投的畫面，製作了 15 分鐘的「東海保衛戰」專輯，於 11 月 24 日的節目中播出。

長於文史記錄的校解社，則在 2004 年 5 月初版的《東海采風》第 8 輯，以 62 頁的篇幅製作了〈東海保衛戰--「2003 年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地底」事件之省思〉專題，介紹整個「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的歷史淵源，以及這次事件校內師生及行政單位的行動過程，為這個事件留下一個完整的紀錄，延續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將個別事件「歷史化」的運動傳統。

在學生公投結束後，曾參與「相思林事件」的東海大學校友侯念祖，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對於台中，東海做了些什麼〉文章。文章中將這次的「反工業區聯外道路切割校園運動」，扣連上 1990 年「相思林事件」、1999 年「118 事件」的歷史，並呼籲東海人在捍衛校園完整性同時，不要忘記反省自身和校園外的社會環境的關連。

路思義的召喚

如同第八章所述，東海師生使盡渾身解數力抗工業區聯外道路二十餘年，為甚麼這一次竟會引起校內師生和校友這麼大的反應？

在過去聯外道路的爭執中，焦點都集中在穿越東海相思林的工業十六路延伸案，然而這次卻多了個穿越牧場案，同時還有穿越校園中央可能會損及路思義教堂的方案。最後一案直接挑戰到東海人的精神象徵，引起爭議最大，也是強烈反彈的主因。

胡志強市長雖然極力撇清：「絕對不會破壞教堂」，然而一條穿越校園中央的道路，帶給同學將校園一分為二的恐怖想像。即使是採取地下化施工，也難逃褻瀆路思義教堂（要如何想像神聖的教堂底下，竟有無數的卡車在穿越？）之嫌。更不用說即使是地下化施工，也可能毀壞部分校園建築所產生的疑慮了！¹⁴⁰

這裡面再度顯示共同體想像對校園空間運動的支配作用，在事件背後的文化邏輯近似的情況下，搶救相思林的那段歷史也被召喚出來。例如聯外道路消息剛見報時，由非異議性社團成員組成的「東海精神團結陣線」，立即訴諸路思義和相思林的歷史：

相思林、路思義教堂、東海牧場為東海人之精神指標，東海人為維護其完整性，勢必反對到底！！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41/forum_j41.htm

¹⁴⁰ 東海大學所處的大度山地質是屬於含大量卵石的礫石層，堅硬的地質會損傷潛盾機鑽頭，因此如果真要進行地下化工程，一定得使用明挖法，無法使用潛盾法施工。感謝建築系郭奇正老師提供這個資料。

回憶起以前為了相思林奮鬥的諸多學長姐，今天的我們是否繼承了那份勇氣與榮譽？（苦勞網，社會運動資料庫）

在學生社團於 10 月 21 日針對東海同學發出的第一份文宣中，更是充份顯露出「純潔」的東海共同體可能遭受邪惡外力破壞的想像。

1995 年東海大學在美麗的大肚山台地建校，正式開啟了一所立志要為台灣人民服務的大學和大台中、和整個台灣社會一起耕耘教育、共生共榮的歷史

在這段話裡存在著一個美好的，過去的烏托邦，暗含著我們在第四章所分析的，自從 70 年代以來關於「共同體」喪失的感受。但緊接著是對污染者的指控：

然而打從 1971 年台中工業區確定要緊鄰著東海大學設立時，惡夢從此揭開序幕，各種工業區和某些居心叵測的財團的幽靈，從此便不停的在東海的上空流連、揮之不去！工業區的設立，造就惡臭薰天的東大溝以及夜夜難以成眠的東海人（特別是緊鄰工業區的女生宿舍和教師宿舍區），高污染的工業廢水以及高分貝的工業噪音，從白天上課一直到深夜，始終與東海的教職員生長相左右，不得安寧。（苦勞網社會運動資料庫，2003/10/21）

工業區的廠商在這段文字裡，被塑造成一個破壞東海共同體的「邪惡他者」。本來純潔、完整的共同體，現在被工業區帶來的污染弄得烏煙瘴氣。而現在這個邪惡他者，要繼續染指東海共同體的核心——路思義教堂，同時要興築道路把這個完整的共同體穿腸破肚。這怎能不激起東海師生和校友的義憤呢？而在強烈的義憤背後，是嚴格的內外疆界將被混淆打破的恐懼。

如同「相思林事件」、「V 大樓事件」一樣，共同體想像的作用同時召喚了大量東海校友參與行動。在學生建立的連署網站上，各屆校友紛紛連署表達對此案抗議。而當學生社團在文宣中表示希望能有義工協助時，許多校友紛紛來信表示希望能成為志工¹⁴¹：

小蘭：「環教所，環境教育！因為他一開始只有跟我講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就是師大環教所所長，我就一直跟他說是是是，他就說我現在在師大教書，然後我就說喔——（尾音拉高），然後他就說我是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然後我真的就嚇一跳，真是嚇一跳。然後他就說，我打電話來，是表示畢業校友對這個事，真是非常的關心呀，就問我們說有沒有可以幫忙的，不用客氣，然後說之後事情有甚麼發展可以告訴他，然後就留 E-mail，他說他現在所上有好幾個將來出去也是要當教授那種人，有好多學生都是東海大學的，如果有甚麼訊息要散發出去的，他可以幫一些忙這樣。後來我說我們預計會有一個連署的網站啦，後來我就把網站寄給他，可能就這樣傳出去，蠻多人上網連署的。」

¹⁴¹ 以下關於此次事件的受訪記錄，取自筆者於 2004 年，選修「神聖與賤斥」時的期末報告——〈社會運動、認同建構與基進轉化——2003 年東海教堂聯外道路事件案例研究〉。訪問內容應受訪者要求，姓名全用假名。

（訪問記錄：2004/01/09）

最足以表達校友的影響力的，應是 10 月 27 日發動的「網路快閃族」活動。參與的學生幹部小蘭表示：

我事先有上去那個（台中市府）網站，上去操作，後來發現我要留言，要先填一堆資料，雖然那些資料你就隨便辦無所謂，可是還是有個相當的程序，還是很麻煩，我們本來想說，他可以留言嘛，上去我就寫幾句話就下來，就這樣子，結果要填很多很多資料，後來我們回來討論就覺得不妙，這樣子，同學上去會很懶惰...（訪問記錄：2004/01/09）

由於網路留言的繁複程序以及發起「網路快閃族」的行動時間和一般學生的作息時間相反，小蘭及其同伴小馬原本對「網路快閃族」的效果預期不高，然而事後的反應卻出奇驚人：

小蘭：「我們有一直做宣傳啊，後來也沒多少同學反應很熱烈啊，那我們也沒有想到會...結果當天晚上（27 日）就真的沒事啊，因為他們知道..」

小馬：「因為他們（台中市政府）收到消息，事先啟動防火牆」

小蘭：「對啊！而且早上起床要起那麼早（凌晨零點到早上九點），根本就沒甚麼同學會上去，結果就不知道是哪些好心的仁兄，就在隔天（28 日）的早上才開始發動攻勢....」（訪問記錄：2004/01/09）

在 27 日早上台中市各大報紙還報導：東海學生的「網路快閃族」行動失敗，台中府各局處網站安然無恙。不過到了第二天（28 日）卻傳出災情慘重的消息。由於台中市府事前已啟動防火牆，針對任何發自東海大學位址的郵件予以阻截，因此造成台中市政府局處信箱癱瘓的郵件，明顯是來自於非東海大學的位址。這其中恐怕有大量的電子郵件是來自憤怒的東海校友¹⁴²。

文宣內容的轉向

然而在隨後發出的文宣中，強烈的被迫害的意象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事件來龍去脈的詳細說明，如：「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分割東海校園事件」問答集，而在口號上也從「捍衛東海校園」轉向「砸錢幫財團開路，沒錢救大眾運輸」等口號，將東海的問題連結上大台中地區市民的交通問題。

關於這個轉向的原因，小蘭表示：

畢竟東海這邊，它基本上算是台中市的財產嘛，不是東海校園的，如果大家

¹⁴² 根據筆者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朋友表示，當時他人在國外進修，用了半天的時間連續發電子郵件給台中市政府，類似像這樣的例子想必應該不少。

關在裡面，喊說我們的學校怎樣怎樣，一方面那個團結面不可能拉大嘛！而且也剛好那時候台中這邊的運輸業，台中客運的事情，可大可小，所以想說可以這樣談嘛！

...我們本來一開始喊那個口號，喊那個捍衛校園完整性喊得很順口嘛！到後來都一定要換，為了台中市的大眾運輸怎麼怎麼，為了消費者的安全怎麼怎麼，然後剛好可以跟我們搞台中客運的朋友¹⁴³做連結（訪問記錄：2004/01/09）

學生們在一開始是爲了捍衛東海共同體的文化和價值，基於共同體遭遇危機的威脅感而行動。但是很快的爲了讓行動能夠持續和產生效果，勢必得把個別校園的利益連結上社會的公共利益，才有可能讓東海的問題進入公共討論，而不會被視爲「鄰避」的自利行爲。

要讓整個論述跳脫原有的格局，必需將在地的個別問題，連結上「整體社會結構性的知識」與「較長時期的歷史分析」（趙剛，2000：216、220）。這裡的論述構成，不是簡單的透過共同體受威脅的情感以及控訴不義的他者就能完成的。在這方面建研所都市計畫組的老師郭奇正，從個人的專業提供了大量台中市都市計畫運作的知識。而在總務處庶務組工作的張志遠，提供了從 70 年代以來東海校方跟台中市府就聯外道路問題交涉折衝的紀錄。他們的介入提供了學生們大量知識和歷史分析上的協助。對於學生嘗試跳脫「受迫害」的情緒，而想把問題「搞清楚」的過程中，有很大的幫助

但中後期文宣內容風格的轉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東海榮總社區團結聯盟」的參與。這些社區民眾大都是住在東海校門口對面的東大路旁的店家或住戶。由於工業區提出的拓寬東大路的方案，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居住權益，因此很早就注意市府的動向並曾向市府陳情多次。

訪問者：「所以是台中客運事件¹⁴⁴，讓你們警覺到要開始調頭，還是早就準備好要調頭？」

小馬：「都有吧！」

小蘭：「那個（台中客運罷工事件）跟和社區的人剛聯絡上差不多都同時間。那你跟社區聯絡上，那種文宣人家一定會那個啊。而且我們在跟他們談事情的時候，他們也是說啊，學生的眼光，不能那麼窄啊，學校裡面當然怎樣，可是不能怎樣怎樣」（訪問記錄：2004/01/09）

這些社區民眾有著和東海學生完全不一樣的生活經驗和關注焦點，提供了不一樣的視野。在「團結力量大」的前提下，東海學生勢必得要和不同的群體展

¹⁴³ 指和東海人間/台研同爲「新社會學生鬥陣」的加盟團體的中興大學「黑森林工作室」與健康管理學院「田中央文藝工作室」，這兩社團當時都在協助台中客運司機的罷工行動。

¹⁴⁴ 台中客運罷工事件發生在 10 月 15 日

開對話，修正自己的立場。整個「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切割校園」運動的文宣方向也開始有所轉變。

我們的力量來自於我們的多元

對於東海學生、校友的行動，東海大學校方除王亢沛校長一再強烈表示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校園的立場外，主任秘書黃啓禎也於媒體表示：東海學生自由夙有傳統，學校面對學生自發性的辦理公投行動，不可能制止，校方亦未加干涉或提供任何協助，只能透過學務處希望學生能夠和平理性處理（中時，2003.11.5）。學務長傅恆德也表示：這次公投活動完全由學生發起，是難得的民主學習（聯合，2003.11.6）。

不過如同「電鍍廠事件」、「相思林事件」中，由於學生積極參與護校行動，產生賦予校園空間運動正當性的非預期效果。因此聲勢浩大的學生護校行動，也讓學校擔憂是否會影響未來「第二教學區」等重大工程建設的進行。如同學務長傅恆德雖在媒體上表示校園公投是很好的民主學習，但在課堂上卻不免顯露出他的憂慮：

小馬：「我這學期修他兩門課，就是因為有修他的課，所以才會聽到這個，聽到快吐血了！他說啊，最近公投吵得很熱，聽說我們東海最近也要辦一個公投，就有記者跑來問我：學務長，這個公投你們校方的態度怎樣？我就說：我能怎樣，校方就態度尷尬啊！為甚麼尷尬，想想看要是今天學生可以搞公投，那學校以後要做甚麼建設，學生也來反對也來搞個公投，那我們怎麼辦？所以這個東西呢，我們只能採取三不：不鼓勵、不禁止、不介入」

（訪問記錄：2004/01/09）

另一方面在 10 月 29 日，參與運動的台研社社員鍾瀚樞接到一通自稱是教育軍訓處的關切電話，表示為了維護學生安全，希望鍾瀚樞向教育部報告遊行時間、連署人數、參與人數等相關資料。由於之前「東海希望聯盟」遭受王亢沛校長校園「新白色恐怖」的經驗，台研社立即聯合中部的學運團體「新社會學生鬥陣」發佈〈抗議政府動用教育部軍訓系統進行校園情蒐〉的文宣，寄給各媒體、張貼海報及 BBS 上。其後雖在學校教官室主動和學生聯繫後，表示此事並非教官室與軍訓處所為，因此事態沒有擴大，但也顯示了在「東海保衛戰」中，學生和學校之間其實還是存在某種緊張關係。

回顧自 1987 年以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長久歷史，校方和發起運動的學生團體之間，經常是處於勢成水火的對立關係。那麼為甚麼雙方可以在 2003 年「東海保衛戰」合作的如此有默契？

答案很簡單，也很弔詭：正是過去長久的對立和衝突經驗，促成校方和學生

團體之間，可以有如此密切的合作。

首先，如同本論文在前面各章所述，「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是一個綿延十餘年，累積了大量的歷史記憶與情感的實踐。從 1987 年「新宗教中心」事件開始，各種各樣的論述、實踐、策略一一的被參與的學生所嘗試運用。而歷任校長和學校行政單位也不是省油的燈，種種的反制策略、新的論述和管理作法也一一被採用，以確保「校園安寧」和「學校發展」。

在長久的歷史實踐中，東海學生陣營擁有像人間/台研社這樣長於社會運動論述與實踐的社團，也有像校解社這樣社區人文的歷史記憶傳承者，更有像景觀、建築等專業科系師生的加入。而類似連署簽名、媒體造勢、校園公投等策略，其實或多或少都在過去的運動中被使用過。這些由過去的歷史實踐，形成的「批判性的地方智慧」和「文化氛圍」¹⁴⁵，使得學生和校方都培養出快速而熟練的反應能力。相較於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多變而彈性的實踐，胡志強以及台中市府的反應儼然像隻恐龍。

其次，由於關心校園空間議題的力量日趨多元，彼此間的社會位置、人際關係、論述實踐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網絡連帶，在這個網絡中傳遞著各種的訊息，形成一種「集體學習」的氛圍。例如建築系副教授郭奇正以及長期擔任校解社指導老師的保管組職員張志遠，他們身為行政人員，但又和學生保持緊密的聯繫，給予論述和資訊上的協助。過去參加過「相思林事件」等運動的畢業校友，也透過人間、台研等社團，而和運動的發展保持密切的聯繫。

東海校方人員例如：校長、主秘、學務長等雖然從未和參與運動的學生開過會，但是透過「運動網絡」的連結，確保了校內外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訊息傳遞。弔詭的是，長久的衝突也在不知不覺間促進了對立雙方對彼此底限、實力的理解，因此面對共同的敵人時反而更容易相互合作。

「運動網絡」做為校內不同行動者間傳遞訊息的物質載體，而共同體想像和相思林論述則成為連結彼此的接著劑和潤滑劑。如前所述，最早發起連署簽名行動，從未有何校內運動經驗的「東海精神團結陣線」，在首次的行動文宣中就訴諸「相思林事件」的歷史記憶。許多東海校友也因為「校園景觀認同感」和「相思林事件」的召喚，而參與進這次的行動中。而「路思義」教堂做為東海的共同體想像的核心，更是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以上三點來看，工業區協進會理事長歐正明，在事件結束後語帶嘲諷的指出：

東海大學一直以「維護校園完整性」百般阻擾十六路聯外道路之開闢，但卻可以大砍相思林，賣校地給郵政總局做轉運站。維護校園完整性的神話，早已

¹⁴⁵ 參見第十一章第一節結尾的註釋。。

不攻自破。林教授所謂黃花閨女之高貴情操已經沒有了（歐正明，2003）

某種程度上確實是事實。真實歷史中的東海大學，並未像在「東海保衛戰」的媒體宣傳中展現的那麼團結一致，而是充滿著各種多元、不斷相互衝突的聲音。不過歐正明錯估了一點，東海之所以能夠力抗台中市政府和工業區廠商，正是由於校內多元多樣的力量產生分進合擊的作用。而這些平時相互衝突、互扯後腿的力量，之所以能夠在「東海保衛戰」中合作對外，正是來自於 1990 年「相思林事件」中校地出賣給郵政總局的傷痛。

「維護校園完整性」的巨大召喚力量，正來自於過去「校園完整性」被破壞的歷史記憶，沒有人想再看到歷史重演，更不會再有任何一個校長或行政人員，會想承擔「出賣校地」的罪名。同時以「相思林」為象徵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歷史實踐的經驗，培養出這所學校驚人的戰鬥力。如果說「路思義」教堂已成為東海大學的象徵，那麼在這次事件中，正是綿延不盡的「相思林」保護了「路思義」的存在。「相思林」已經從一個創傷的歷史記憶成為守護東海的力量。

當然，如同侯念祖文章所批評的，在東海人風起雲湧的捍衛「校園完整性」的行動中，隱藏著界線分明、閉關自守的共同體想像，這也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長久以來的內在侷限。但這種近乎再次走入「象牙塔」的意識型態，也使得東海在整個台灣社會，不加思索的走向經濟利益壓倒一切的風氣中，成為少數有些許微弱的反抗力、批判力的學校。東海大學當然不可能出現，黃凡在其小說中描繪的「成就大學」¹⁴⁶的情境：

不過——說來可笑，「開馬路」這種事要是落到咱們「成就大學」身上，董事會不樂歪了才怪。尤其是開條大馬路，兩旁就成了商業區、住宅區，學校大不了再找塊地成立第二校區、第三校區（黃凡，2004：49）

在歷史和「校園空間運動」實踐的作用下，即使是東海的董事會和行政會議，在面對「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趨勢，也多了幾分猶豫。例如在 2002 年元月 9 日的行政會議上，王國明董事應邀蒞會發表專題演講。會中「研究發展委員會」蘇正德執行長提出，就行政單位與會計室評估，東海招生人數應至二萬人規模，才能獲得較高學費收入，以因應發展建設需求。質疑董事會將學校未來人數訂在一萬五千名上限，對學校整體發展並非正面方向。

但王國明董事認為，若從「教育品質」角度觀察，增加學生人數同時學校也要投入相當的教育投資（例如增聘師資、購置設備、充實空間），反而可能讓學校入不敷出，學校必需對未來發展做出明確規劃，積極通盤思考如何確保「質」、「量」的兼顧與平衡（東行，民 91.1.9）。

¹⁴⁶ 「成就大學」：黃凡《大學之賊》書中故事發生的場景，一所由於台灣的大學過多，招生不足，面臨生存危機的大學，使得該校教授們不得不為了保住飯碗極盡花招招徠學生。

創校初期的理想已成過去，當時東海人的自傲和自信，卻隨著獨特的校園建築風格而傳留下來。不願向權貴低頭的東海人，更不會願意看到推土機隆隆地向路思義教堂開來。校園景觀一受到破壞，馬上就會觸動埋藏在學生內心深處的敏感神經，引發激烈的抗議。然而在成爲象牙塔和服從商業邏輯之外，東海的未來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

「2003 東海保衛戰」雖然暫時告一段落，然而在 2004 到 2005 年間，新一波的「校園空間運動」又在大度山頭發起。這兩個事件剛好一個是對內，一個是對外，充分顯示了這所基督教大學，在第三千禧年時代，必須面對的挑戰。

第五節 第二教學區爭議

規劃第二教學區

在第七章第七節中已提到，1995 年完成的《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中對於校園未來發展的替選方案案，都強調校園應逐漸往東發展。在「118 事件」及「V 大樓事件」中，包括前建築系主任漢寶德、學生，都曾提出過規劃「第二教學區」以抒解現有教學區壓力，避免破壞原有校園景觀的主張。在東海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校方積極進行硬體教學設備的改良，以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的趨勢下，開闢原有的農牧場用地，規劃建立第二教學區，就成爲 V 大樓改建人文大樓後，東海校園下一個重要的大型建設。

2000 年 12 月 27 日，東海校方於晚間七時，在學校「茂榜廳」舉行「第二教學區規劃」公聽會，聽取各方對於第二教學區設計的意見。初步規劃中未來第二教學區完工後，主要將供管理學院、農學院，及未來預計要成立的藝術學院使用。會中負責規劃的黃國豐建築師向現場師生講解其已設計完成的四個方案，皆有其階段性不同的發展。

由於之前「V 大樓事件」引起校內師生對學校空間發展問題的高度關注，因此「第二教學區」規劃案，也引起校內輿論的討論。校內對「第二教學區」規劃案的主要爭議點在於其和原有舊教學區的連繫。在 12 月 27 日的公聽會上，學生會長林德宇表示，在大學裡學生本就應進行多方面的接觸，因此新舊教學區間應該保持密切的互動。然而現場出席的建築系主任羅時瑋表示，基於交通的因素，兩個教學區之間的互動「根本就不可能」。而對於兩個教學區之間的交通安排，公聽會現場並沒有達成共識（《成報》2001.4.10）。

2001 年元月，由人間、台研共同發行的校園刊物《東潮》第 3 期刊出〈新校區、老問題--學生的權益在哪裡？〉一文，批評校方的「第二教學區」規劃

方案中，只針對不斷增加的學生人數做考量，並規劃了大量的教學、研究所需的空間，卻明顯缺乏學生活動和住宿所需的空間。《東潮》批評：一個不顧學生真正的教育和生活問題，一昧的只想蓋教室收學生，出賣學生權益換取高額的學雜費收入，這樣的新校區能被期待嗎？（林育群，2001）

另外在元月間召開的東海董事會議，也邀請王亢沛校長及黃國豐建築師簡報「第二教學區」規劃進度。與會董事大都認為規劃相當周詳，並原則同意興建「管理學院大樓」及「藝術中心」兩案。但也有部份董事認為學校不宜再繼續增加人數，同時東海「未來發展區域」應仍限於現有校區，依建築系研擬之「舊學區增建新教學空間建議案」¹⁴⁷為主軸加以充實，解決教學空間需求。

但王亢沛校長認為，考量因應新世紀學術發展領域趨勢，學校必需成立新系所、適度增加學生，尤其「管理學院」之發展，攸關學校甚鉅，限於現有校區建地不足，確難於其中覓得適當地點興建足夠量體大樓，「第二教學區」之規劃與興闢，實有其必然性與殷切需求（東行，民 90.1.17）。

同年 4 月 10 日出刊的《東海成報》¹⁴⁸的社論--〈成報觀點〉中則認為，交通動線的聯絡問題，將是第二教學區計畫成敗的關鍵。如果學校不注意處理兩校區間的交通聯繫問題的話，第二教學區的興建將使得東海校園的整體性和資源共享遭到破壞，加重了校內各學院「閉門造車」的現象，有違東海「綜合型大學」的自諷。同時兩教學區都建立自己獨立的公共設施、宿舍區，但在沒有充分聯繫的情況下，變成校內存在兩個生活圈，容易形成公共資源的浪費（《成報》2001.4.10）。

2001 年 4 月 13 日，東海董事會第 29 屆第一次會議於東海校內召開，會中決議確認將推動開發「第二教學區規劃案」，並同意依「校建會」議決通過之規劃建築師報告辦理。

5 月 30 日晚上七時，東海大學學務處及總務處在茂榜廳舉辦「第二教學區第二次公聽會」，由負責規劃的黃國豐建築師就各方意見及規劃方案作說明。

2003 年元月 3 日，「第二教學區規劃案」中的「管理學院大新建工程」競圖評選作業完成，由「張樞建築師事務所」得標。

2 月 26 日，東海校方於晚間七時在銘賢堂，召開「管理學院大樓新建工程」公聽會，由張樞建築師事務所說明工程規劃設計內容。

¹⁴⁷ 即 2000 年暑假，由建築系、景觀系老師組成之工作小組完成之「東海大學教學區整建規劃報告」中，透過分散式規劃，解決教學空間需求，避免單一巨大建築量體對景觀造成的衝擊的構想。參見本章第三節。

¹⁴⁸ 《東海成報》於 1998 年 3 月創刊，由校內的學生社團「東海成報新聞社」編輯發行，該社由一名曾就讀世新大學的學生所創。在 1999 年之後，是除學生會發行的《東海新聞》外，重要的校內新聞性學生刊物。

5月5日，依據「校內重大工程公告參與程序辦法」規定，「校建會」針對第二教學區之主要建築物「管理學院大樓」，進行整體規劃之最後審查，對大樓內部空間、洗手間配置、管理員室等皆作廣泛討論（東行，民 92.5.7）。

校解社則在 2003 年 6 月初版的《東海采風》第七輯，刊出由第九期校園解說員撰寫的〈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規劃之反思〉（蔡瓊瑩、江淑君，2003：48），從位址、景觀與環境生態、第一與第二教學區的交通、學生互動交流、教學排課等問題，全面性的檢討整個「第二教學區規劃案」。

最後的晚餐！？

對質疑第二教學區規劃的校內師生來說，其最大的質疑點來自於未來學生人數的降低，以及新舊校區間的交通聯繫問題。

就未來學生人數降低的問題而言，校解社引用了內政部的「台閩地區人口統計」資料，指出：

台灣未來學齡人口無論小學、中學及大學均面臨入學人數減少的問題，未來十年進入國小、國中及大學人數將分別減少一至二成；五十年後國小、國中生亦將減少約四成以上，大學現階段人數，更將面臨減少近二分之一的情况…人口出生數急速下降，15 年後，台灣之高等教育環境，將面臨嚴峻之挑戰及淘汰賽

…以九十一年的人口來講好了，20 歲至 24 歲之間的人也就是在就讀大學的這個階段，人數就已超過 2,000,000，根據內政部統計出處的資料正確數據是 20,0004,871，但是 15 歲到 19 歲的人口卻減少了 323,744，只有 1,681,126 人，少了這三十幾萬人，也就是說將來全台灣的大專以上的學生數，會減少這三十多萬人。更嚴重的問題是九十一年 0 到 4 歲人口只有 1,350,829 人，跟 19 至 24 歲比之下竟少將近六十多萬人（蔡瓊瑩、江淑君，2003：64-65）

同時相較於出生人口與就學人口的不斷減少，國內的大專院校卻不斷增加，91 學年度全台灣共有 154 所大專院校。在未來學生人數勢必大幅減少的趨勢下，第二教學區的新建校舍，很有可能變成巨大的資源浪費。

《東海采風》第七輯中並未明確計算出興建第二教學區所需經費，但從 2000 年開始，東海即已進行人文大樓、理學院大樓、研究生宿舍等重大工程的興建，現在加上第二教學區的開闢，如果考慮到未來 20 年學生人數的下降，以及現有學生學雜費佔學校收入近七成的比例，那麼未來這些建設的貸款償付對東海而言將是筆不小的負擔。

就交通問題而言，由於「第二教學區」和東海原本以文理大道為中心的「第

一教學區」相距甚遠，兩邊的交通聯繫勢必成為問題。對這個問題，在「第二教學區規劃案」中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接駁公車。但一方面由於東海的校園道路路幅不夠寬，其實不太適合接駁公車行走。此外，校方規劃中的接駁車停車地點是路思義教堂後方，但是學生下課時間只有短短十分鐘，而從農牧場的聯外道路到教堂後方的停車場約 1.5 公里，接駁車行駛時間（包含上下車的時間）需要 5.5 分鐘，而從文理大道上方即使用小跑步，跑到路思義教堂最少也要 10 分鐘。如果有一位學生是在綜合教學大樓（位在相思林旁，東海大學最上方，簡稱 T 大樓）上課，接下來要到第二教學區上課，則他下課後根本趕不上在路思義教堂後方的接駁車，更不用說萬一老師延遲下課，或是接駁車行進途中發生問題。

同時質疑「第二教學區規劃案」的校內師生，更精細的計算出設立接駁車所需的費用，無論是採取租車或自行購車的方式，對學校而言都將是筆龐大的開支（參見圖 3）。

交通問題--接駁車

◆租用東大附中校車所需費用？

8 : 00--16 : 20	8 : 00--18 : 00
5,500*182 天*8 台 = \$ 8,008,000	8,000*182 天*8 台 = \$ 11,776,000

◎兩教學區各四輛對開，共計 8 輛車

◎182 天 = 已扣掉寒暑假、星期六、星期日及國定假日

◎以 194 人運輸量概估，未來增建學生宿舍運量會增加

◆自行購車？以管院 3878 人，如有 5% 學生需至原教學區（194 人），且原教學區亦有 194 人第二教學區上課？需要多少車輛？

1. 購車成本：500 萬元*8 輛車 = 4000 萬元
2. 司機薪資（1 年）：3.5 萬*8 位*13.5 個月 = 378 萬元（未含勞健保）
3. 油料費（1 年）：0.8 萬元*8 輛車*12 個月 = 38.4 萬元
4. 保養費（1 年）：0.6 萬元*8 輛車*12 個月 = 57.6 萬元（不含大保養）
5. 保險費（含第 3 責任險及乘客意外險）：10 萬元*8 輛 = 80 萬元
6. 另需設置停車場

（圖 3：第二教學區交通接駁問題，資料來源：東海新聞，2005：4）

2004 年 8 月，香港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系主任程海東先生擔任東海大學新任校長。

2005 年 1 月 4 日，由東海大學學生會、學生議會、人間/台研社、校解社等數個社團，在校內舉辦「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規劃說明座談會」，邀請甫上任的程海東校長，以及負責第二教學區規劃的黃豐國建築師出席。在座談會中學生

社團仍針對經費及交通聯繫問題對「第二教學區」規劃案提出質疑，並表示「不反對建設，反對無長遠規劃的建設」，要求校方應該提出校園整體發展的藍圖，不是單針對第二教學區投入上億資金發展，否則「東海生活圈」可能會瓦解。

雖然出席的校長及建築師對於學生所提出的問題，尤其是交通聯繫問題，並沒有做出明確可信的回答。但程海東校長在現場表示，「第二教學區」既然已依照學校規定，完成一切規劃設計程序，並準備進行動工，則沒有繼續討論或更改的必要。

3月16日，「第二教學區」第一期工程開始施工。

11月24日，「第二教學區」規劃案中的管理學院大樓動工。

第六節 Leviathan 的伏筆：反東大路拓寬到「平安夜救東海」遊行

反東大路拓寬

2003年「東海保衛戰」中，台中市府荒謬絕倫的三條穿越東海校園的工業區聯外道路計畫，其實顯現了在資訊技術/全球經濟的擴張下形成的「流動空間」，對地方人文、地景、生態的劇烈破壞¹⁴⁹。但受到這股全球化的力量衝擊的不只東海大學，還包括了整個大度山的社區聚落。

因應工業區開闢聯外道路接通中科的計畫，台中市府規劃將東海大學校門口的東大路由現有的25米拓寬為60米，影響道路兩側的住戶、商家甚鉅。當地社區居民遂於2003年1月間組成「東海榮總社區團結聯盟」，積極地游說地方民意代表，多次向市府相關單位陳情抗議。該組織發起人之中有一位是東海大學的畢業生陳信佑¹⁵⁰，他曾經擔任過第四屆東海學生會新聞部的幹部，也是榮總社區當地居民以及一家便利商店的店長。

2003年「東海保衛戰」發生後，「東海榮總社區團結聯盟」即主動聯繫發起運動的學生社團，並同學生一起前往台中市政府抗議。如前所述，他們的加入對後來學生的文宣內容風格轉變影響很大。

除了東大路拓寬之外，配合中科的開發，民間的春龍開發公司亦向台糖承租大度山台地土地，租期為50年，開發卅二公頃面積為「大度山工業區」，以吸納無法進駐中的一部分科技和傳統產業。其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歐正明的環隆科技公司營運總部亦設在此，並計畫開闢成「環隆科技園區」。由於環隆科技公司在台中工業區內亦設有廠房，歐正明又積極推動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

¹⁴⁹ 參見本論文第十章第二節

¹⁵⁰ 感謝陳信佑提供「榮總社區團結聯盟」的文宣、新聞稿等相關資料。對本論文的寫作幫助甚大。

開發案。因此在 2003 年「東海保衛戰」時，學生以此強烈質疑興建穿越路思義教堂的聯外道路，有犧牲東海以圖利少數人之嫌。

對「大度山工業區」、「環隆科技園區」產生質疑的不只是東海師生。2005 年 1 月 11 日，來自西屯區福安、福雅、福林、福瑞、福聯、福和、福中、福恩和台中縣龍井東海村等八個區里的居民，到台中工業區內的環隆科技公司舉白布條抗議，要求市府將台糖卅多公頃土地興建成綠帶。社區居民對開發過程中居民一直被矇在鼓裡表示不滿，並質疑可能會引進高污染廠商進駐，影響地方環境生態。

3 月 8 日，內政部都委會對東大路拓寬案進行審議，東海學生會、人間工作坊亦派人參加，同榮總社區居民對東大路拓寬案提出異議，都委會遂決議此案延至下次會議再議。

3 月 20 日，福瑞社區發展協會聯合社區規劃師與東大路沿線社區，於上午舉辦「量身打造東大路」活動，封閉 100 公尺東大路東側兩線車道，舉辦兩人三腳、直排輪與腳踏車接力賽。此次活動是爲了凸顯東大路完全沒有考慮行人安全的不良設計，並對東大路拓寬案表示質疑。

相較於西屯路、東大路社區居民的結盟，東海校內對於校門口的東大路拓寬一事反應十分冷淡。3 月 8 日都委會審議之前，學生會和校內學生社團雖曾利用海報、網路呼籲同學前往聲援，但即便在網路上回應的人也是寥寥無幾。而在學生會幹部積極的游說後，東海校方才決定派人出席 8 月份東大路拓寬案的再次審議。

8 月 23 日內政部都委會再次審議台中市府提出的「東大路拓寬案」。雖然「東海榮總社區團結聯盟」提出另闢延伸西屯路穿越都會公園南側，銜接中二高龍井交流道，供來往中科的重型車行駛的專用道做爲替代方案，但是仍不爲台中市府及都委會採納，正式通過東大路拓寬案。正對校門口左右各五線道的 60 米大道，將成爲未來往來校門口的東海師生的夢魘，同時加重了中港路的車流，擴大了開闢穿越校園的工業區聯外道路的壓力。

「平安夜救東海」遊行

經歷過 2003 年「東海保衛戰」之後，東海師生一直以爲穿越校園的工業區聯外道路，還在「大肚山科技走廊交通產業評估委員會」的討論中。但是在 12 月中旬，部份校內師生由在媒體及工程界的校友消息，得知 12 月 27 日將進行「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的內政部都委會審議，其中包括了 2003 年東海師生強力反對的穿越東海牧場的聯外道路計畫案。

一方面對於台中市府未經協議、暗渡陳倉的行爲表示憤怒，同時也對校方處

理此事的態度感到疑惑，關心校園景觀的師生和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等社團，立即組成了「手（守）護東海行動聯盟」¹⁵¹，並製作了名為「東海校園即將面臨『割地賠款』的命運！！」的海報，於 12 月 19 日張貼於校內海報牆及 BBS 上。除告知校內師生此一嚴重事態，要求校方明確表達對此事的處理態度。並計畫在 12 月 24 日平安夜晚上，於校內發起遊行，呼籲校內師生和社會大眾注意此事，並要求校方對外表達明確反對開闢聯外道路的態度。

東海校方在次日，立即於學校網頁上公布「本校對於台中市都市計畫『市政路延伸路段通過本校農場東側案』之處理情形說明」，並在當天下午的校務會議中，提出臨時動議對此事進行討論。

「手（守）護東海行動聯盟」的行動其實延續了自阮大年校長以來，東海學生面對聯外道路問題的一貫策略，即王光旭論文中所說的：凝聚學生意識，吸引媒體注意，取得社會大眾支持，以支援校方在體制內的斡旋折衝。而其對校方的施壓，除了吸引媒體注意外，也是為增加學校面對外界壓力的籌碼（王光旭：165、166）。

但程海東校長及其幕僚明顯缺乏面對學生運動的經驗，不論對內對外都以減少衝突為目標。甚至還由課外組和公共關係室出面，聯繫人間工作坊社長王俊凱¹⁵²，表示可邀請台中市府及工業區廠商代表和其當面溝通，或在校內聯合舉行說明會向校內同學說明等等。參與行動的學生在校園的 BBS 張貼「學生的本份是唸書」一文，嘲諷校方遲緩的態度：

老實說，我們並不是很喜歡這句話，因為校方經常用這句話，來阻止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關心各種社會議題——甚至是這次的聯外道路穿越牧場事件！不過，現在我們倒想用這句話來提醒學校：學生的本份是唸書，請校方高層人員，認真監督台中市府在聯外道路案的舉動，並作好危機處理。

從不久前得知 12 月 27 日內政部都委會最後審議的消息後，卻遍尋不著校方關於這次會議的因應方案。直到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和守護東海行動聯盟的海報貼出後，校長卻向學生會表示：一切交給主秘處理，反正內政部還沒開會，不用緊張！學校的態度似乎一直都顯得漫不經心！所幸 12/20 下午的校務會議，臨時加入了關於「聯外道路事件」的討論，我們看到學校蒐集了關於市府計畫的各項文件，以及目前處理情況的報告，讓我們知道原來學校還是有準備的。

但我們還是忍不住要懷疑：為甚麼最早告知我們內政部審議消息的人是校友，而不是校刊呢？如果當時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和守護東海行動聯

¹⁵¹ 在事件初期的海報上，聯盟的署名是：「守護東海行動聯盟」，不過在 1224「平安夜救東海」遊行後，改成「手護東海行動聯盟」，本文則以「手（守）護東海行動聯盟」稱呼。

¹⁵² 感謝俊凱提供「平安夜救東海」遊行以及目前校園運動的資訊給我。

盟沒有主動貼出海報、提出質疑，這項臨時動議是否就不會出現在校務會議上？是否就不會讓我們有機會讀到這些文獻和報告？是不是要一直等到 12 月 27 日內政部審議通過聯外道路案，甚至是怪手已經開到校園來了，才由東海的學生再像 1990 年相思林事件那樣，用肉身去抵擋怪手？我們想提醒大家的是：經過五年的抗爭，那塊相思林地，還是沒有要回來，變成現在矗立在校園一角的郵政總局大樓。

套這句校方常說的老話：學生的本份是唸書——我們確實沒有太多的時間和能力，去注意台中市府的一舉一動。基於愛校護校的立場，我們願意利用課餘，關心聯外道路的問題。只是如果整件事情，都是學生跑在學校前頭，學生比學校還認真。那我們就不禁要問了：到底東海大學是誰在當家？如果學生的本份是唸書，校方高層是否也應該扛起緊盯市政府的護校本分？

東海大學學生會、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守護東海聯盟 聯合聲明

（東海大學學生會等聯合聲明，2005.12.21）

由於媒體對於這次的行動，並未像 2003 年「東海保衛戰」那樣大幅報導。加上從告知、宣傳到遊行的時間只有一個星期，「手（守）護東海行動聯盟」的成員，在事前對遊行的狀況不表樂觀。然而當天晚上八點鐘竟有超過兩百名的師生校友集合在校長室前，在略微整隊後，遊行隊伍一路高喊著「規劃太呼攏，害慘大台中」、「牧場多條路，東海沒出路」、「東海開馬路，死傷太恐怖」、「校長 in 起來」等口號，走文理大道、從校友鐘樓轉入德耀路、經過女生宿舍門口最後到達校長公館，創造了東海大學歷年來最特別的一個平安夜！讓程海東校長首次親身感受到東海學生運動的力量¹⁵³。

八點不到，程海東已經在校長公館前等候遊行學生，在隊伍一齊準備唱校歌前，更迅速主動要求參與合唱，充分展現親和身段。

面對學生質疑校方在審議程序的角色，程海東先強調，面積高達 150 多公頃的東海校園，有 30 多公頃土地屬於國有財產，「政府有權收回去，學校不能說怎麼就可以怎樣」。程海東說，上週校務會議也對市政府漠視東海師生而進行聯外道路規劃表示抗議，校方已經準備動員校友立委在 27 日內政部審議會上發表四點聲明，要求規劃案退回市政府，依照正常程序再議。一校之長的回應即使態度懇切，但話中之話，聰敏的學生立刻緊緊扣著再問，遊行學生紛紛慷慨直言，無法接受校方以地權做藉口，消極不作為，有學生以台大的舟山路和雲科大為例，證明地權問題絕對不是癥結。學生們還質疑，難道審議程序合法，學

¹⁵³ 關於 2005 年「平安夜，救東海」遊行的文宣及過程，可以參考下列網站：

1. 守護東海行動聯盟網誌：<http://www.wretch.cc/blog/archthu>
2. 反對聯外道路，捍衛東海價值 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luce.liu/thu>
3. 平安夜，救東海行動紀實：<http://photo.xuite.net/luce.liu/493793>
4. keatsli 與李賀的對話：http://www.wretch.cc/blog/keatsli&article_id=2812009

校就任憑市政府「割地賠款」嗎？「學校太軟弱了，我們應該有志氣，證明校園空間的價值」一個女學生與程海東校長共勉。

遊行隊伍準備了大張書面聲明，列出三點訴求，包括要求校方表達反對聯外道路立場、檢討聯外道路規劃處理程序，以及積極檢討改善東海交通狀況。東海校長程海東除了再度強調 12 月 27 日內政部審議會上，校方一定有所行動，讓規劃案重回市政府，他從善如流在列出上述訴求的文件上簽名。同時見證簽署的，除了學生代表王俊凱，還有東海榮總社區工作者陳信佑（苦勞網，2005/12/25）¹⁵⁴

12 月 28 日，程海東校長和學生代表共同北上參加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於會中對「市政路延伸案」表達強烈的異議，都委會決議先退回市政府的「市政路延伸」規劃案，並要求提反對意見的東海大學於三個月內提出替代方案，待下次會議時再行審議。

從交通問題到走入社區

「平安夜救東海」遊行出人意料的成果，展現了校園空間運動長久以來的累積，但對比於學生對「東大路拓寬」事件冷漠的反應，可見共同體想像創造的內外界限仍然牢牢束縛著運動的實踐。另一方面，除卻面對台中市府及工業區的共同敵人外，東海和周邊社區之間也缺乏完整的論述以延伸各自社區的利益相互扣連，難以進行深刻的連結。

在「第二教學區」以及「反工業區聯外道路」事件中，交通問題都是核心的議題。在關於第二教學區規劃的爭辯中，二個校區間的交通聯繫問題一直是討論的焦點。由此延伸出來的是對於校內師生平日騎乘汽機車上下學，對校園及週邊環境造成超高的交通環境負載量的討論。

根據統計東海學生的機車總數約為 9,000--10,000 輛，龐大的機車數量不只是影響到人行道出入、東海圍牆的景觀（機車長城！！），也影響到了交通顛峰時期東別及中港路一帶的交通。同時不只是學生的機車停車成為問題，也因為系所增加，校內教職員宿舍無法充分的供給，專任老師必須居住校外、兼任教師數目的成長、推廣教育的擴充等等，都使得使用汽機車出入校園的族群大幅增加，這些在在地都挑戰著東海校園及鄰近社區的交通狀況（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2005：3）。

另外一方面，為了化解開闢工業區聯外道路的壓力，東海大學必須對大度山地區乃至整個大台中地區的交通運輸系統提出新的構想。這使得東海有可能延伸校園自身的利益，連接周邊社區，朝向促成整體的都市環境轉化的目標，在

¹⁵⁴ 請參考：<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08598>

這過程中同時隱含著改善校內交通問題的可能。因此由中部科學園區興建、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引發的對都市交通環境問題的反省，變成校園空間運動向上提升、對外結盟的契機。

2005 年，關華山、郭奇正兩位老師計畫於東海建築系所開設「可持續環境規劃設計學程」，企圖從「生態社區」、「生態都市」的觀點對校園環境乃至大台中地區都市環境進行反思。關華山另草擬〈東海大學校園可持續性紀事〉，從「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 之角度檢視東海大學校園的變遷歷程，以為東海校園的可持續性發展奠基（關華山，2005）。

更積極的行動則是在 2005 年 10 月間，由校解社以及學生會、學生議會、人間/台研等學生社團，舉辦的「東海週-從六個角度看東海」系列活動。其中的「從社區的角度看東海--談東海的人、文、地、產、景的另一種想像」，邀請了學生會長以及學者、建築師、地方社區協會理事長等，針對東別社區的發展歷程、問題與願景進行討論。會中曾規劃「理想國」、「藝術街坊」的白錫旻建築師以自身的經驗表示，只要有心、有行動，要用社區營造的方式提升東別地區的環境品質絕對是可能的。

另一場「從交通的角度看東海」的座談會，則邀請了鄰近「榮總社區」的社區規劃師以及建築系郭奇正老師，嘗試反省、重構校園內外的交通系統，以改善校園內外的環境品質。郭奇正於會中提出透過建立「單車通行系統」來重新思考學生校外租屋群聚的生活圈，限制低承載車輛進出校園，獎勵「腳踏車及公車優先使用路權」等構想。

在 12 月 24 日「平安夜，救東海」遊行之後，參與「手（守）護東海行動聯盟」的建研所都市計畫組學生厲卓正、林麗蓉、簡心昱、顧崇信¹⁵⁵等四人，則於 2006 年 1 月 5 日於校內舉辦「東海十字路--校內外交通議題討論」座談會，嘗試向校內師生具體的說明以單車接駁機制為核心的校園生態交通系統的構想。可惜因為宣傳問題，校內師生參加人數並不踴躍。然而西屯區福興里里長及社區規劃師也出席了這次座談會，並和部份「手（守）護東海行動聯盟」的學生交換了對於大度山交通運輸問題以及反聯外道路運動的看法。

此外厲卓正並以〈綠色城市交通系政策的形成過程--市民社會主體性的空間實踐〉為其建研所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除研究歐美日及台灣的綠色交通政策形成的過程之外，並嘗試以東海大學反工業區-中科聯外道路事件為例，提出在城市綠色交通的改革中，一條由下而上、嶄新的可能途徑（厲卓正，2006）¹⁵⁶。

¹⁵⁵ 感謝「手（守）護東海行動聯盟」的厲卓正（小厲）、林麗蓉、簡心昱、顧崇信，邀請我參加這次的座談會，並因此有了和曹里長等人見面討論的機會。更要感謝小厲將他的碩士論文計畫書寄給我作參考。

¹⁵⁶ 這種論文研究和校園空間議題的扣合在東海並不陌生，例如本文中引用到的景觀所鄭禎樺、建研所袁興言、公行所王光旭的論文皆是如此，其中還有部份的論文是在校解社的協助下

就目前的狀況看來，這些實踐在東海校園中都還是很微小的努力。雖然在「平安夜救東海」遊行時，程海東校長向學生簽下的三個承諾中，第三條即是：「校方應積極檢討、研究東海校園內外之交通問題，謀求根本的解決之道。」，但是東海校方在汲汲營營成立「專案小組」以應對工業區聯外道路的問題時，也不曾多去注意這些微小的努力中所可能蘊藏的潛力。然而對長久以來受困於共同體想像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來說，這不啻為一個新的可能。

第七節 結論

我決心堅持「此項待續」以為我自己的生存和文學的課題。至於「續」下去的方法，我現在已經自覺的意識到，和自己有聯繫的死去的人們的關係上，比較清楚，然而和新一代的聯繫方法就比較不清楚了。因此，我想在這裡更加認真的地寫下「此項待續」

—大江健三郎，〈生的定義〉



運動形式的變化

對比於「相思林時期」、「校園民主重創期」兩個階段，可以發現「後 118 時期」的校園空間運動，有比較多的制度內的行動，例如：參與公聽會、提出專業性的分析論述等等，特別是「第二教學區」的爭議，校方和學生間的爭執，幾乎完全是在文字論述和公聽會上進行，而沒有大規模的群眾動員。

這種現象的形成，除了建築、景觀專業科系師生加入了校園空間運動的行動的影響外，從前兩個階段建立起來的豐厚校園景觀論述，也使得學生有能力在制度內用專業能力挑戰校園官僚，「118 事件」後 316 公聽會的狀況，就是個顯明的例子。另一方面在「118 事件」後，校方針對校園規劃制度進行的大幅度改革，給予校園師生更多的制度性參與空間，這雖然讓校園的重大建設決策過程更耗時，但也讓學生必需花費更多力氣在制度性的專業遊說上，而不能輕易使用大規模群眾動員的手段。

這種轉變有點類似李丁讚與林文源對台灣環保運動中的「社會力」變化的分析。李丁讚與林文源指出：「遊行示威」的運動形式容易發生困境：人少沒力量，人多難指揮，容易發生非預期的暴力或衝突，使得運動被污名化，或領導人官司纏身的負面效果。在台灣環保運動的實踐中，解決這種問題的一個辦法，是

完成的。

將具體的群眾化為抽象的權利論述、民意統計、法令規範，加以運用，讓運動走向「專業遊說」的路線。

「專業遊說」的操作使得環保問題的解決，更有效率、更例行化、便於集中力量，減少挫折，但其危險性是：產生一種社會公領域的去組織化現象，讓公領域變成少數專家的論述場域，社會大眾被排除在整個過程中。當大部分民眾因此失去參與和學習的機會時，一種新的社會冷漠油然而生，民主的社會基礎也因此被淘空，社會力的活水泉源也就逐漸枯竭了（李丁讚與林文源，2003：99、112）

那麼校園空間運動也會走上類似的困局嗎？以李丁讚與林文源的觀點來看，校園空間運動在 2001 年後，雖然較之前的階段有更多「專業遊說」的操作。不過從「東海希望聯盟」發動的一連串讓校方十分惱火的抗爭，以及在 2003 年「東海保衛戰」、2005 年「平安夜，救東海」遊行中學生的表現來看，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說運動目前兼容這兩種運動形式。而如果從促進社會力發展的角度來看，把社會運動為一個「培力政治」（The political of empowerment）的過程，而非侷限在某種政治或物質利益的取得的話，那麼更重要的問題應是去提問：這過程中能否形成一個 Nancy Fraser 意義下的「從屬-反公共領域」（Subaltern Counter Publics），或者巴西的學者 Sonia E. Alvarez 所說的「另類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aces）¹⁵⁷，讓參與者在其中學習與成長，而非是在兩種運動形式中的抉擇。

從「後 118 時期」的運動發展來看，東海校園的學生運動網絡已初步的形成這樣的「另類公共領域」，但是仍然承受強烈的地域主義的限制。如同第三節所言，這種地域主義的形成有其台灣和東海的社會歷史因素的作用，當歷史給予東海一份龐大的資產的同時，後人也同樣要背負一筆龐大的債務。

認同轉化的契機

在本文緒論中提到，在柯司特對當前社會運動的分析中，「抵抗性認同」如何可能轉化成「計畫性認同」，是運動能否持續發展，產生促進社會改革作用的重要關鍵。就「後 118 時期」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來看，這個基進轉化的契機，來自於「經濟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趨勢下，東海校園內外環境的不變，特別是由於「中部科學園區」促成的，強烈興建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東海校園的壓力，使得學生必需把校園的問題，放在一個更寬廣的社會脈絡中省視。同時為了避免被既得利益者打成「鄰避」（NIMBY）運動，以及「團結力量大」的前提下，必須主動跨出校園和周遭社區居民建立論述、行動上的連結。

¹⁵⁷ 參見第十一章第一節

說老實話，校園空間運動這個認同轉化的契機，更多是來自現實環境逼迫下的被動反應，而較少是來自於校園師生的主動抉擇。而且從 2005 年「反東大路拓寬」和「平安夜救東海」遊行，學生幾近兩極化的反應來看，這個轉化的力量看來還是相當的微弱。

根據夏鑄九、黃麗玲等人對台灣社區運動的研究，主動或被動地，尋求與疆界之外的地域展開對話、合作，是使得社區組織能夠維持運動力量的要素。這個過程會帶來許多內在的衝突、不安與困惑，但也由此蘊育了更深層的自我反思的契機，產生讓社區中的個人變成能促進社會轉化的「主體」的可能。這是台灣的市民社會成長的必要過程，即使做為高等教育學府的東海大學，依然不能免於相同的挑戰¹⁵⁸。

歷史淬煉出來的力量

許多研究台灣社會變遷的學者主張，80 年代是台灣「社會力」萌發的時代，這股發自民間的自主性力量，對過去政治力、經濟力造成的扭曲現象，進行一連串的回應與挑戰。李丁讚與林文源認為，雖然存在著許多侷限，80 年代這股新萌生的社會力還是非常珍貴的，至少它讓台灣社會在長久政經力量的獨/寡佔下，提供創造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可能性。至於究竟甚麼是社會力？李丁讚與林文源主張可以從三個面向去界定社會力：

1. 社會力隱含了至少一個能積極動員的行動者，採取行動影響社會變遷。
2. 這些行動受到社會多數成員的認知與情感上得支持與共鳴。
3. 這些行動促進社會溝通、反省，是重構社會道德、情感的創新力量。

（李丁讚與林文源，2003：135、109）

在「後 118 時期」的各個事件中，東海學生所展現出來的力量著實叫人驚訝。雖然仍然存在著許多限制，但持續不斷的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拖延了市府開闢工業區聯外道路的計畫，喚起了校友、師生強大的情感和認同，並創造了許多具有反省力、批判力的論述。從前述「社會力」的界定面向來看，一股微小的社會力正在東海校園裡面形成，並有可能取代奄奄一息的「學生政府」，成為「校園民主」繼續發展的基石。如同本文前面各章所分析的，這是在歷史中逐漸淬煉出來的力量，縱使參與運動的學生未必能深刻理解到他們和過去的東海人之間的聯繫。

因此看起來令人咋舌的全新事物，不過是過去的辯論在今日的延續，那讓人民的父母官膽戰心驚的影武者，也只不過就是歷史的幽靈罷了！在此不妨稍微改寫一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 Keynes)的那句名言：歷史的實踐不論對錯，

¹⁵⁸ 參見第十一章第二節

都比人們想像的有力量，那些自以為自己超越了某個歷史階段的人，其實可能就是某段歷史的奴隸。

無可否認的在現今的東海校園乃至整個台灣社會，有許多人都高喊著「往前看，不要往後看！！」，以為可以就此揮別過去的陰霾，走向全新的康莊大道。但至少在海東的經驗中，筆者所看到的是：歷史所能給予、啟發我們的東西，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

在本文的第一篇、第二篇中，嘗試對持續十餘年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進行歷史的分析。以下在第三篇中，則試圖分析促成校園空間運動發生的結構性問題，並分別從學生運動以及社區運動的角度，分析這個運動的性質、潛力以及其所面對的限制。



第三篇 無盡相思

學生要它長久的存在，讓它永遠的質
問：甚麼是大學教育？學生要它成為一
個問號，讓所有人面對它時，要謙卑的
反省以及永無止盡的真理追求

----陳政亮





第十章 相思三嘆：形塑校園空間問題的結構性因素

你從什麼時候沉默的？

從恐龍統治了森林的年代

從地殼第一次震動的年代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裏了麼？

死？不，不，我還活著——

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



——艾青，〈煤的對話〉

由於 1990 年「相思林事件」對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重要歷史及象徵意義，本文將以「相思林運動」來統稱自 1987 年起，發生於東海大學校內的一系列以校園為主題的學生運動。

東海的相思林雖然侷促在大度山上，但仍然深植於島嶼的土地上，持續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問題，聯繫的是整個台灣社會結構內含的問題，從東海大學做為一個位居台中的高等教育機構來看，引發校園空間問題發生的結構性因素，乃是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變化以及台中市的都市空間發展結構，在兩者的交互作用之下，因著東海校園特殊的歷史環境，產生校園的合法化危機，而以校園空間問題的形式表現出來。

以下三節分別說明：台灣高等教育政策、台中都市空間發展、校園合法化危機的歷史過程以及其具體形塑東海校園空間問題的機制。

第一節 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嬗變

戰後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階段

作為一個高等教育的實施場所，東海大學自不能外於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的發展之外。關於戰後台灣高等教育發展變遷的階段，由於國內並無一致性的區隔，這裡主要參考陳昭穎的研究（陳昭穎，2001），將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分為五個階段。而在 1994 年之後轟轟烈烈的教育改革過程，則參考顏美玲的研究（顏美玲，2003），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一、創立時期（1945—1953）：這段時間從台灣光復至 1953 年為止，在此期間台灣的大學院校數量增加很少，主要以日據時代的教育機構為主。同時社會上僅有少數菁英有機會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又由於當時國家發展的重點在於軍事國防，政府少有餘力投注高等教育，因此整體的發展十分遲緩。

二、成長時期（1954—1972）：這段時間由於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有了新的變化，因此高等教育機構大幅增加，尤其在 1960 年代增加最為迅速，特別是專科學校的成長，部分原因來自於中等教育的成長。直至 1972 年中央決定限制設立私立學校為止，大學院校從 4 所增至 23 所，專科學校則增加了 70 多所。

快速成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配合經濟發展政策，亟需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勞動力，但政府由於缺乏經費，因此大幅開放、獎勵私人興學。同時在 1960 年教育部聘請史丹福研究所來台進行調查研究，其報告中指出台灣地區工程技術人員與工程師比例太低，建議成立五年制專科學校培育更多工程人員，因此大量興設專科學校（郭俊銘，2001：58）。

東海大學成立於這個時期，聯董會的原意是希望東海成為專注於人文和基礎科學研究的學校，但明顯的教育部和整個社會的期待，是希望東海朝向理工技術方向發展。甚至包括首任校長曾約農，也認為此時應以工業報國、科學救國，而努力推動工學院的成立。

陳昭穎注意到在 1963 年以前私立院校的發展十分快速，但之後就呈現停滯狀態（陳昭穎：55）。以東海的發展來看，1965 年之後校務的發展就逐漸出現危機，危機的起因一方面是因為聯董會逐漸撤除資金援助，但也和這段期間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外在競爭壓力變大有關係。

三、整頓與停滯時期（1973—1985）：由於私立院校擴充太快，又缺乏輔導，產生許多問題。因此在 1972 年政府為整頓既有的私立院校，決定大學院校應採取重質不重量的政策，暫緩私立學校之申請籌設，而以整頓現有高等教育機構

與相關制度法令為主。另一方面政府引進人力規劃概念，依據經建計畫所需的人力來引導高等教育政策，這些都促成了高等教育發展速度趨於緩和，使這段期間大學院校只增加了 5 所，而專科學校幾乎呈現零成長的現象。

外界的競爭壓力雖然趨緩，但是東海內部的危機並未因此減緩。此時期的東海正處在爭議與轉型的調適中，加上《大學》、《夏潮》等雜誌創刊，其中都有為數不少的文章，呼籲大學與青年應在台灣社會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¹⁵⁹。東海也在內外環境的刺激下，對自己在台灣社會的定位以及校務的運作，開啓了一連串「未竟的探討」。

1978 年梅可望擔任東海校長，他有效的爭取和運用這時期政府對私立院校的補助，加上由於高等教育發展趨緩，外在競爭壓力變小，從而創造了東海的擴大發展時期。從這角度來看，梅可望治校期間東海能夠擺脫之前的陰霾，除了是在他領導下東海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有外在環境開啓的機會。

四、擴充時期（1986—1993）：實施十餘年的大學限量政策，在 1985 年之後有所轉變，台灣高等教育在此時進入開放和擴充的時期。總計此時期共增加了 39 所大學及獨立院校，其中還有部分是由原來的專科學校改制升格。專科學校方面雖然新成立了 20 多所，但由於部分學校改制之故，1993 年時數量反倒比 1984 年時減少三所（郭俊銘：69）。

關於這段時期高等教育數量快速擴充的原因，陳昭穎認為首先當初的高教限量政策制訂與當時的政經環境並無太大關連，但是在 80 年代後台灣社會經濟富裕、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和能力都相對提昇的背景下，這個政策已經很難再維持下去。同時 80 年代末期的解嚴、呼求自由化的浪潮，帶動了各項社會改革的潮流，這其中以教育改革匯集了最多社會的聲音，促使高等教育政策加速的發展（陳昭穎：57）。不過雖然過去政府以經濟發展為依據，用行政手段引導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受到民眾質疑。但是這時期社會、人文類科的學生人數的增加，仍然是為了反映社會逐漸走向服務業的市場型態（郭俊銘：68）。

五、變革時期（1944--）1994 年大學法完成修正程序，公佈實施，明確賦予大學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的自治權，象徵過去由政府完全主管高等教育時期的結束。高教政策雖然不再限制高等教育的發展，讓各校建立自己的特色，但基本上仍然不脫經濟引導的模式。只是過去是透過國家行政手段中介，現在則是更直接面對市場的趨力。市場取代國家，成為引導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力量，而在 2002 年後由於台灣加入 WTO，更需面對全球教育市場的挑戰。各私立院校無不絞盡腦汁，用各種手段，以求在競爭激烈的高教市場中存活下來。

¹⁵⁹ 以大學雜誌為例，依據秦鳳英的研究，從 1971 年 1 月到 1972 年 12 月，共有 44 篇文章是和「青年與政治」的主題相關，佔全部篇數的百分之九點一。這些文章的議題分為要求青年關心國是、國家要重視及信任青年、開放學生運動三大重點（秦鳳英，1992：55）。

另一方面 1994 年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簡稱：教改會），以積極從事教育改革的研議，檢討改善教育現況與問題。台灣自戰後建立的教育制度，開始產生巨大的變革。這個變革的階段可以再依政府的施政方向，以及不同的教育部長所推動的高教改革政策，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教改啟蒙期（1994--1996）—即郭為藩部長時期；教改執行期（1996--2000）—吳京、林清江、楊朝祥等部長時期；教改反饋期（2000--2003）—曾志朗到黃榮村主政時期（顏美玲，2003：78）。

在教改啟蒙期，1994 年「410 教改聯盟」成立，提出民間對目前教育現狀的不滿以及改革訴求，為了回應民間的壓力，當年 9 月行政院通過成立「教改會」以推動教改，並於 1996 年 12 月 2 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其中和高等教育密切相關的部分包括：廣設高中、大學，發展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學府公立大學法人化，多元入學方案等。強調透過運用民間資源，進行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擴充，這是當時參與研議教改的各方，幾乎是完全一致的共識。

而在其後的教改執行期，由於前一階段的政策執行，大學數量以及入學機會都有明顯的增加。但同時國家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卻明顯減少，1997 年 7 月國民大會修憲取消教科文預算下限，是個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歷史事件。大學數量的激增使高等教育市場的競爭更為激烈，而吳京長任內推動未果的開放採認大陸學歷的政策，雖然因為政治因素而暫緩執行。但已預示了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下，台灣各大學即將面對的挑戰。

在教改反饋期，2000 年政黨輪替對高等教育的衝擊，其實還不如 2002 年 1 月 1 日台灣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義正式加入 WTO。因為高等教育在 WTO 中被列為對等開放的教育服務業。在 2001 年教育部為加入 WTO 而和紐西蘭等國進行雙邊諮商後，發布的「我國有關高等教育服務業達成之共識」中，已指出將開放外國人來台設立高中、高職以及以上之學校與教學機構，同意外國學校可針對國內學校之需要進行遠距或函授教學，同意外國人來台設立短期補習班以及留學服務公司等。這項協議明確宣示了高等教育的自由競爭市場時代的來臨，台灣的高等教育要開始面臨招生與國際化的壓力（顏美玲：26--27）。

國家對教育資源的低度投入

綜觀台灣戰後高等教育政策的嬗變，在 1980 年代以前明顯的國家對高教發展的影響，遠大過市場直接的壓力。但必須注意到的是，國家對高教政策的引導，乃是基於經濟發展建設的人力需求，這可見於成長時期專科院校數量的急遽暴增。但同時國家對於高等教育的資源投入又是嚴重不足的，必須仰賴大量的私立院校，來提供社會發展所需的高等勞動力。

根據黃敏禎的研究，以公共教育經費所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與總投資額來說，60年代有78%的國家比台灣還高。70年代有六成的國家超越台灣，即使到了80年代還是落後在58%的國家之後。而如果從教師與學生的比例來看，台灣不但遠遠落後於已開發國家，還遠低於其他開發中國家，在162個國家中，台灣名列倒數第11名，即便到了1990年仍排名倒數第20名（黃敏禎，1995：82）。

在教育資源嚴重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國家卻對私立學校的學費標準進行設限，這一方面有為符合憲法規定的「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同時避免學費過高，提高社會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影響經濟發展，以建立統治正當性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國家預期經濟發展後，將會帶動社會捐助私人興學的風氣，減少私校及國家的財務支出壓力。不過就實際的情勢發展來看，這個預期完全落空。使得各私立院校幾乎都有七成以上的財務支出，必須仰賴學雜費來彌補，有些學校甚至到達九成（前揭文：83-84）。

以東海大學的發展過程來看，創校初期由於擁有國外聯董會的資源灌注，除了在課程和人事安排上會受到些微政治的干擾外，學校的財務狀況和台灣本地的政治社會情勢幾乎全然無涉。但從1972年開始，由於聯董會資源的逐漸撤出，東海的發展也捲入了台灣社會整體的變化之中。在國家資源低度投入，必須仰賴學雜費收入填補財政空缺，原有的小班制、全體住校制都必須放棄，並成立研究所、夜間部以廣納社會資源。這個方向的轉變起自謝明山校長任內，而梅可望可說是成功的將東海帶至轉型之路的校長¹⁶⁰。

即使如此，國家及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資源投入不足，以及教育商品化的結構性矛盾仍然糾纏著東海。持續增加的學生人數或可說是為了回應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但是在教育商品化的壓力下，一方面利潤回收低的學生宿舍等集體消費的支出，往往是學校建設中最後考量的，或是交由校外的房屋租賃市場去吸收。而為了容納激增的學生人數，所急遽興建的各類校內建築，又破壞了校內師生由各種論述和日常的生活實踐所產生的校園景觀認同感。從柯司特的都市社會運動理論來看，這裡面顯現著校園空間中的集體消費不足與文化認同受威脅的雙重問題。而隨著1990年代台灣高等教育更加市場化的趨勢，這些問題不但沒有緩解，反而被進一步的激化。

高等教育市場中的壟斷地租矛盾

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控制力逐漸鬆動，市場轉而成爲

¹⁶⁰ 謝明山校長任內即積極努力爭取社會資源，擴展東海的發展，以致於聯董會秘書長勞比（Dr.Lauby）評論謝明山校長：就中國傳統的意義上來看，他更像是個企業經理人，而不太像是個教育家（Chang:155）。

引導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如前所述這並非表示在之前的階段，市場就對高等教育部不起作用，或是在 1990 年之後國家完全對高等教育沒有影響力。戴曉霞在其研究中已指出，國家權力、學術寡頭以及市場是三股影響各國高等教育形貌，以及教育發展的主要力量。而所謂的高等教育市場化，只是意味著國家與高等教育的關係，由原本的國家控制模式轉變為政府監督模式而已（戴曉霞，2001：322）。只是台灣國家對教育資源投入不足的情況，卻因市場化的趨向而變本加厲。憲法規定的教科文預算 15% 下限，在戒嚴時代從沒有被履行過，而在 1997 年更直接由國民大會修憲廢除這個條款，引起了眾多社會團體尤其是教育團體的不滿（《人間》第 18 期）。

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已指出，在市場力量主導下，可能造成高等教育的商品化與工具化。一些基礎性、理論性、長期性的科系與研究範疇，因為耗費人力、物力，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回收，而被應用性、短期、回收快的研究所取代。同時由於大學過度仰賴私人財源，容易造成私人過度干預學校決策，影響大學的自主性（戴曉霞，1999：249）。東海大學在 1994 年發生的「德耀路大石頭事件」，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校園自主性和捐款人之間的矛盾。

但就東海大學校園空間問題來說，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來自高等教育市場化之後，因為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的運作而產生的矛盾。David Harvey 使用這個抽譯自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指稱社會行動者透過佔有在某些關鍵面向上，具有獨特而不可重複性的資源，例如：可出產頂級美酒的葡萄園或是位於市中心的房地產，而在歷經一段時間後，得以實現利益，增加所得。

Harvey 認為目前越來越多的「文化商品化」現象，其實是一種透過壟斷地租獲取利潤的表現。由於掌握壟斷地租能力的基礎，是建立在某種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的宣稱之上，但是這些宣稱的內涵、基礎，本身就是個論述鬥爭的場域。而壟斷地租背後的資本積累邏輯，又會使得這場象徵意義的鬥爭更形尖銳。

以西班牙巴塞隆納為例，隨著有計畫而成功的建立起城市的獨特風格後，（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為表彰其建築成就，曾頒給整座城市獎章），當地房地產價格一飛沖天，創造出豐富的汲取壟斷地租的機會，吸引了跨國公司的投資。資本的湧入帶來龐大的利潤，也帶來了嚴重的交通阻塞，導致開闢穿越舊城區的大道的壓力；多國公司的商店取代了具有地方風格的小店；具強大經濟力量的外來菁英，排除了長期居住的在地人，這些都破壞了原本的都市紋理，使巴塞隆納面臨失去它原本的獨特性的危機，還引發了無法平息的關於應保存甚麼樣的集體記憶和美學品味的辯論（David Harvey，2003）。

在競爭日趨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場，特別是在台灣加入 WTO 之後，一般咸認為，台灣各大學應努力發展自己的特色，才不會被開放的教育市場所淘汰。但是實際的情況反而是激烈的競爭迫使各大學向「一致性」靠攏，不敢發展沒有

把握的特色。甚至因為各校過度朝向「綜合型」大學發展，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陳昭穎：88、102）。

而在這方面東海大學憑藉歷史的遺產，卻能夠自豪的以校園景觀、勞作制度等建立起壟斷地租的競爭優勢，但這同時為自身帶來不可解的矛盾。例如：梅可望校長曾在行政會議中宣示本校今後將不砍樹，如有建設可將樹移植他處（東行，民 77.11.28）。1989 年時還再次強調，以後如需砍樹必須先登記或提請行政會議決定，最後卻因要擴充硬體爭取經費，而背上「出賣校地」、「相思林殺手」的罪名。

而王允沛校長面對校內強烈的質疑「人文大樓」興建的聲浪時，憤怒的指責學生：

「東海」不啻非為森林公園，更非「建築博物館」，必需具備良好教學與研究環境，全面提升競爭力（東行，民 89.4.12）

卻忘了在他任內頒佈的《東海大學發展白皮書》還強調，面對大量新起的私立院校，東海的競爭優勢在於：

唯本校校地廣大，環境優美。位居台中市交通便利之處，此為他校所欠缺者。
（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1998：45）

在國家對教育資源嚴重投入不足，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結構性因素影響下，再有為的東海校長也要因著壟斷地租的矛盾拉扯，變成裏外不是人的豬八戒。而東海校內因空間問題引發的衝突、辦論也因為壟斷地租的作用，而難有終止的一天。

第二節 投機城市：台中市都市空間的轉變

東海大學位於台中市境內，台中市雖然在都市規模和影響力，未必能超越台北、高雄兩個院轄市，但仍然是台灣人口最密集、家庭收入最多、就業素質最高的省轄市。除此之外還是未來兩岸直航最近的港口，還曾是台灣火災最多的「火城」，以及歷任市長遭起訴最多的「官非之城」，也是色情最氾濫、刑案發生率最高，但是破案率最低的「風化城」。台中也是全省空屋率最高的地方，並擁有全國最貴的公車票價和計程車費，市政府還曾多次因財政空虛，面臨發不出員工薪水的窘境（賴志彰，1997：0-01）¹⁶¹。位在這樣一個充滿劇烈衝突的都市境內，東海大學自然不可能外於整個台中市戰後空間轉變的過程之外。

戰後台中市都市發展的過程

根據賴志彰和詹明憲的研究（賴志彰，1997，詹明憲，2003），戰後台中市的都市空間發展可約略分為下列數個階段：

一、接收復原期（1945-1955）：這段期間主要是承繼日據時代的都市計畫，進行街道更名、空間擴充等工作，另外地方上的政治勢力也在進行重組，一個威權體制下，黨國國家機器和地方派系的政治聯盟正逐漸成形。

二、地方自治與市區建設期（1955-1966）：這段期間開始進行市中心的區域改造，尤其1959年的「八七水災」和1960年的「八一水災」發生後，透過大量來自外界的金援，進行了地方道路、溝渠、水利工程等的更新。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市政府與議會基於「建設文化城」、「誘置學校可繁榮本市」、「設一個學校有數百個學生，消費與增產比較起來，犧牲三四甲地土地完成一個學校，可謂可說得能獲償失」等構想，積極拉攏多所高等教育機構在台中市設校（賴志彰，2-18）。

因此東海大學創校之初，台中市府即表示積極爭取的態度，甚至由於設校地點遲遲未定，台中市議會乃要求楊基先市長需積極勸誘聯董會。但在設校地點確定，校園規劃設計完成甚至破土施工後，有關土地取得的糾紛卻仍未解決，加上週邊道路的配合不夠，使得東海原擬於1954年7月先行招生，不得不延後到1955年7月，而土地問題則循法院訴訟途徑解決。

在積極爭取東海設校時，台中市府本來表示東海所需校地可以完全贈送，不需任何費用。但後來限於法令，未獲省府許可，以致東海花費新台幣四百餘萬

¹⁶¹ 這裡特別感謝東海建築系畢業的台大城鄉所碩士林育群，提供了賴志彰這份論文給我做參考，對我的研究幫助甚大。

元，支付國有土地及台中市地的土地租金及後來的購地費用。而放領公地的土地糾紛問題，則在纏訟 20 年後，至 1973 年才由台中地方法院經強制執行收回（東史：44）。

東海大學之設立可謂一波三折，其雖凸顯市政府的行政缺失與處理事情的能力不足，然卻為高等〔教育〕機構在台中市設校的開路先鋒，所謂「萬事起頭難」東海大學可也備嚐艱辛（賴志彰，2-19）

在東海大學設校後，中國醫藥學院（今中國醫藥大學）、逢甲工商學院（今逢甲大學）、中山牙醫專科學校（今中山醫學院）、靜宜女子英語專科學校（今靜宜大學）等校紛紛在台中設校，同時市府也曾極力爭取文化、輔仁等校在台中設校未果。至 1963 年結合原有日據時代改制的院校，台中市中心區週緣各屯區，幾乎都分配到一或二所高等教育機構，這些學校其實負擔著台中市周邊地區開發先鋒的角色。

在忙於透過各種手段繁榮地方之際，台中市的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卻相對緩慢。雖然早在 1950 年 10 月台中市首屆市議會，就已經通過由市政府籌辦「市營公共公車」，但是市政府不斷以經費不足、計畫核辦中等理由消極面對，經過府會之間多次衝突、協調，一直到 1958 年 2 月 18 日市區公共公車才開始營運。「一步走八年」，如此一件關乎大眾運輸的交通工具，竟需要八年才上路，是對台中市府行政效能的嚴重諷刺。

三、邊屯地區試探改造期（1966-1979）：由於台中市在 1963 年以後，市區內工商業快速蓬勃發展，加上省府遷移南投後，台中市變成省府出入門戶的影響，使得台中市的舊市區發展呈現飽和，因此有重新制訂、擴大都市計畫的必要。於是從 1963 年起至 1979 年，先後制訂了四期的都市計畫，並進行了三期的市地重劃，台中市的都市發展開始逐漸向外圍的屯區擴張。

但與此同時台中市府的財政收支卻呈現嚴重的不平衡發展，從 1966 年開始市府幾乎每年都需向外賒借款項，才能應付財務支出。最嚴重的是 1975、1978 兩年，賒借金額達上億元（賴志彰：3-13）。

人口和經濟的快速擴張，帶來嚴重的都市問題。從 1966 年 1979 年的 11 年間，台中市竟然每年平均發生 111 場火災，而在這之前（1955-1966）每年也才平均 11 起（賴志彰：3-24），足證都市空間問題之嚴重性。

在整個台中市向屯區擴張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東海大學所在的西屯區的發展。1971 年台中市政府開始規劃中港路以南、東海大學東側一帶約五百多公頃的地區，集中開發為「台中工業區」。配合 1978 年中山高速公路通車，其中大雅、台中兩個交流道都在西屯區，加上台中港的建設，使這其間的聯絡網絡

成爲台中市的重要交通動脈。而中清路以及東海旁邊的中港路的拓寬工程，也就勢在必行。兩條路皆在中山高通車的隔年完成拓寬工作，對於連通台中市和海線地區有莫大助益，但也爲東海大學帶來了幾乎每年皆有師生在車流頻繁的中港路上，因交通意外死傷的夢魘。

四、空間擴張期(1979--1990):1979年高雄市繼台北市之後升格爲院轄市，台中市一躍爲全省第一大都市，以及省府出入的門戶。在省府及台中市府會的合作下，台中市積極的朝向以百萬人口爲目標的都會中心建設。在大量就業機會，持續的土地重劃提供的環境條件以及各項建設的準備投入下，大量外籍人口湧入台中市謀生，1987年台中市外縣市人口首次超過本籍人口，以後外縣市人口數量還不斷攀升。

這種人口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帶來對都市集體消費的強烈需求。但是在市府長期而嚴重的財政危機的背景下，如何應付龐大的市政建設支出，是個嚴峻的課題。於是台中市府乃使用市地重劃爲手段，由參與規劃的業主，提供或損失部分土地做爲公共設施用途，同時重劃後的抵費地，在標售償還債務後，若有剩餘，還可編列追加工程預算，做爲紓解財政危機的重要手段之一。

特別是在1982年之後，台中市府每年都要賒借上億元才能度過財政危機，因此從1979--1990共11年間，台中市府共推出了九期的市地重劃。在1988一年間台中市府竟一口氣公告了第七到第十二期的市地重劃計畫(賴志彰：4-22)。這種嘆爲觀止的速度，促成了台中市土地價格狂飆和房地產的炒作。

快速而粗糙的市地重劃，並沒有徹底解決嚴重的都市集體消費問題，舊市區的火災年平均數達到526.5次的新高峰，幾乎一天就有1.4次以上。治安、交通、違建、垃圾等問題也日益嚴重，「文化城」之名也因爲特種行業雨後春筍般的成立，而讓位給「風化城」。反而市地重劃帶來的龐大利益，促成了嚴重的政、官、商勾結以及政風問題，例如楊天生爲「衛道新世界」的房地產開發，竟由省都委會通知台中市都委會，將學士路尾端腰斬成「斷頭路」。台中市民對民意代表明目張膽的集體參與土地炒作，早已見怪不怪，甚至民間還傳言「議會不炒地皮的不超過三分之一」(賴志彰：4-55)。

五、國際港市規劃期(1990-2000):由於台中市的人口和經濟快速發展(部分是拜之前的市地重劃帶動的房地產買賣投資之賜)，加上1990年國是會議後台灣南北中區域的平衡發展被重視，以及兩岸直航的可能性不斷被討論，台中市的府會之間，即有一連串關於「發展國際港市」、「爭取升格直轄市」的議論出現。一方面積極爭取清泉崗軍事基地闢建國際機場、台中港開放直航大陸、成立台中「世界貿易中心」等，另外從1987年起擬定以台中港路與文心路、西南惠來路段的500多公頃土地進行「副都市中心專用區」發展計畫，以紓解市中心的擁擠，並引導都市發展，強化都市意象。並於1994年5月進行該區域內的「新市政中心」的國際競圖工作，由瑞士籍建築師Juerg Weber的兩棟玻璃帷

幕式建築奪魁。之後「副都市中心專用區」更名為「新市政中心專用區」，以確定該地區的功能定位。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發展計畫顯示著台中市的都市發展，逐漸往靠近高速公路中港路交流道的西屯地區擴張。中港路兩側長榮桂冠、永豐棧麗緻酒店等五星級觀光飯店，以及 1994 年廣三 SOGO 等超大型百貨公司的進駐，又更帶動此地區的發展。原本位於台中市邊陲的東海大學，慢慢有成為都會型大學的可能。

但同時台中工業區持續進行第四期的開發工作，國建六年計畫在東海大學西側的台糖用地，興建「中部軟體工業研究園區」，讓東海大學兩側為工業區包夾。作為文化象徵的路思義教堂，要如何和台灣競爭力象徵的軟體園區共處，將是千禧年後台中市都市發展的嚴肅課題。

種種利多消息帶動了房地產的炒作，但在都市人口成長率以及工商業發展跟不上的情況下，卻創造了台中市連續十年高達 22% 的空屋率。總計有近四萬五千到五萬五千戶的空屋（賴志彰：5-35），這數據還不包括閒置的辦公空間，以及正在營造的大樓。

都市發展帶動的消費風潮，雖然形塑了泡沫紅茶、超大型 KTV、啤酒廣場、理容院等獨樹一幟的消費文化，背後卻隱藏著嚴重的公共安全問題。1995 年 2 月 15 日「衛爾康」西餐廳大火，奪走 64 條人命。接著大規模的青少年飆車事件連續在台中市雙十路等鬧區上演，都成為國內重大新聞事件。

接著由於兩岸政治關係變化，直航遙遙無期。升格直轄市的期待，也因行政院在「行政區域調整方案」中堅持「一省二市」的構想而破局（賴志彰：5-36）。2000 年「新市政中心」附近的「七期重劃區」抵費地標售，僅標出一筆，並以僅高於底價一元的價格標出。使得龐大的「新市政中心專用區」，面臨開發經費不足的困局（詹明憲：2003：3-18）。這些現實中存在的種種難題，使得「國際港市」的夢想需要一個新的標的物來充實它。

六、新市政中心發展期（2001-）：2001 年自諷「沒吃過豬，也看過豬走路」，擁有豐富國際外交經驗的胡志強，以「超高趕北」的訴求當選台中市長。這意味著儘管現實中困難重重，台中市仍堅持要往「國際港市」的方向上走。

胡志強當選市長後，先設法讓「新市政中心」預算在驚險中過關，使其能在 2002 年正式動工。同時仍努力爭取「三個第三——第三個直轄市、第三個國際機場、第三個科學園區」。這其中第三個科學園區與第三國際機場的基地（原清泉崗機場），皆在東海大學所在的大度山台地上，配合修訂台中綜合發展計畫中生產區的規劃（結合第三科學園區、軟體工業園區、台中工業區及機械工業科技園區），使此區域將成為台中市生產基地的重鎮。再結合中部國際機場及台中港的對外運輸設施，一個中台灣區塊與全球接軌的基礎架構儼然成型（詹明憲：

2003：3-23)。

這兩個計畫皆在 2002-2003 年間獲得政府正面回應，中部科學園區基地開發建設工程於 2003 年 12 月展開，台中國際機場也於 2004 年 4 月在總統大選前，於四方的爭議聲中啓用。

胡志強同時積極爭取「古根漢美術館」在台中市設立分館，期望藉此打開台中市的國際知名度，從而有利於台中市的國際招商及產業轉型。2002 年 6 月胡志強市長在西班牙畢爾包與古根漢美術館基金會執行長湯瑪斯·克倫士簽下可行性評估協定書。並在次年 7 月展示古根漢台中分館的模型。

不過相應於「三個第三」計畫所需的公共設施，即使不是付之闕如，也是乏善可陳。大度山台地的生產區塊，嚴重缺乏相關的金融中心、會議中心、展覽中心等基礎設施(詹明憲：3-23)。即將擁有全台第一座國際美術館分館的都市，卻擁有全台服務品質最差的都市公車。為此胡志強雖嘗試以「高潛力公車」暫時紓解台中市嚴重的大眾運輸問題，不過 2003 年爆發的「台中客運司機罷工事件」，卻充分突顯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作法的侷限性。

而古根漢美術館台中分館超過 100 億新台幣的建設經費要從何而來，也一直是輿論關注的焦點。在 2004 年 12 月由於擔心拖垮市府財政，議會決議退回古根漢美術館台中分館簽約及預算案，並建請中央接手興建，使得台中市政府不得不宣佈放棄古根漢申請案，胡志強三年來的努力遂成泡影¹⁶²。



投機城市邊陲的東海

賴志彰在其論文結尾，總括性的分析了戰後台中市空間發展的結構：

細數整個台中市的歷史變遷，以縣市為主的「地方自治」成就了地方主導的空間規劃，而放任的地方自治又為地方派系孳生的溫床，於是派系影響政治生態，甚至控制空間規劃，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所引帶的土地投資又為派系資源的命脈，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受土地投機所左右的地方政治。

(賴志彰：6-201，底線為筆者所加)

由於面臨地方政府財源不足的困境，台中市政府乃透過都市計畫、市地重劃等工作，藉著土地重劃帶來的收入平衡市庫的收支，但同時也為地方政治派系帶來可觀的利益。土地投機的利益既然是主導台中市空間發展的動力，因此都市計畫、市地重劃等工作，也就偏向於以「交換價值」的利潤邏輯在運作，而非以空間的「使用價值」為考量，進行服務市民的公共建設。台灣最大省轄市

¹⁶² 〈古根漢效應與中台灣文化產業發展：以私人開發的彰化台灣民俗村翻轉與發展策略為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台中學研究小組，台中學網站，<http://www.taichung.fcu.edu.tw/>

的市民的集體消費需求，只能透過市場來滿足。

而在政官商集團聯合的土地炒作下，土地的價格往往超越投資的資本，回收快速的的高價餐飲、特種色情行業，就成了重劃區內發展速的產業。而由土地炒作產生的「田橋仔」（土地暴發戶），更刺激了地方消費，超特大型的百貨公司（中友、新光三越）、高價餐飲、色情行業等的霓虹燈，照亮了中台灣的夜空，凸顯著台中市--一個台灣典型的「投機城市」的性質。

位在這個投機城市邊陲的東海大學，起先是做為地方政府利用高等教育機構設校以開發屯區的先鋒而存在。由於東海大學位處縣市交界的邊陲地區，台中市原本就不多的公共建設資源，當然更少投注在東海及其周邊地區。但相對的台中市空間發展的結構，對東海的影響也不大。

一直到 70 年代末期，由於高速公路開通、中港路拓寬以及台中工業區的開發等外在環境的劇烈變動，開始對東海校園造成衝擊。在市府行政效能低落，公共投資不足的背景，缺乏審慎規劃的工業區開發，並未帶來「產學合作」的效益，反而成為東海人的夢魘。台中工業區開發完成後，立即有外籍東海教職員表示不堪工業區惡臭污染，希望校方向市府要求改善¹⁶³。為了解決工業區交通問題而擬定的「聯外道路計畫」，更成為東海師生與其纏鬥 20 餘年的九頭妖蛇。

但是同時東海大學從 70 年代開始，到 80 年代持續增加的外宿學生人口，卻沒有在台中縣市的都市計畫中獲得重視，而由校園周邊的租賃市場以「非正式部門」的運作機制來滿足大量外宿學生的集體消費需求。在缺乏公部門資源投入及基層草根民主介入的情況下，創造了逼走孟東籬的惡劣環境。甚至連女學生遭受性侵害未遂，都可能遭遇承辦員警遺失物證的行政疏失。如詩如畫的東海校園，和牆外雜亂無章的東海別墅，猶如「天堂」與「地獄」的對比。

流動空間 VS 地方空間

台中市在 1990 年代以後的空間發展，特別是胡志強擔任市長後的市政建設，其實可以放在全球化時代下的城市競爭的背景下來觀察。

由於資訊技術/全球經濟的擴張，全球化時代下的產業關係，變成透過交通運輸系統和電子迴路的連結，形成的全球分工、全球合作的關係。第三千禧年時代的世界大城，必須戮力成為「鉅型城市」(megacity)，搶佔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節點 (node) 的位置，成為管制、指揮、生產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之一 (Castells, 2000:452)。

¹⁶³音樂系馬邁克教授報告：「代表外籍同仁等反應對受工業區及附近機關、工廠等排放廢氣及排泄廢物引起空氣污染之困擾，請由學校向其交涉設法改善。」(東行，民 74.11.5)

但是鉅型城市在和全球網絡扣連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網絡化、非歷史化、以工具邏輯為主導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流動空間隔絕、斷裂於地域性的生活和經驗之外，服從的是全球的資本流動、管理菁英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符碼。相對於此則是大多數人都生活其中的，其空間的形式、功能與意義都包容在一定的地理界線內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地方空間具有歷史性，賦予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與意義。「兩種空間邏輯的結構性精神分裂」構成了千禧年時代的主要空間衝突之一。

在土地投機動力導引下的台中市都市發展，在還未進入全球化競爭時代之前，其空間的脈絡與意義，就在快速而粗暴的土地開發過程中不斷的被拔除。在這個過程中，東海大學和路思義教堂由於居於邊陲的位置，免於像中興大學、中國醫藥學院一般，因都市發展招致校園被切割的命運。台中市不甚發達的大眾運輸系統，「社區型大學」的空間區位，讓東大和周邊地區成為自成一格的生活圈，再加上豐富的歷史和人文意涵，使東海大學成為台中市少數殘存著的「地方空間」據點。

台中市府會在進入 90 年代後，不斷喊出的「國際港市」、「三個第三」的發展口號，潛藏著的是想成為全球化時代中的「節點」的企圖心。從國際機場、兩岸直航中的國際交通運輸節點想像，以及「第三科學園區」的代表全球高科技製造業生產空間的想像中，台中市試圖走出島嶼中部的地理限制，而積極和全球化的「流動空間」接軌。

由於之前「投機城市」的發展模式，已習於拔除忘卻任何地景的文化意義，台中市在投入這個想像的過程中，幾乎不存在任何來自文化、歷史記憶的抵抗。要面對的反倒是由於畸形的公共建設發展，形成進入全球化競爭網絡時在物質基礎上的障礙。然而當發展過程進至台中市西屯區的邊陲地帶時，「流動空間」的邏輯就遇到了路思義教堂代表的「地方空間」邏輯的反抗。

乍看之下 2003 年東海大學和台中市府/工業區的衝突，只是台灣社會「文化 VS 經濟」戲碼的再次上演。不過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麼我們就很難解釋古根漢美術館台中分館計畫的意義。其實古根漢也是「流動空間」發展邏輯的產物，因為進入全球化的「流動空間」，也意味著和全球流動的管理菁英，共享一套超越地域性的空間形式和生活方式的設計（前揭書：465）。而古根漢正是這種「流動空間」的文化符碼之一，和「第三科學園區」一樣潛藏著台中市晉身國際的慾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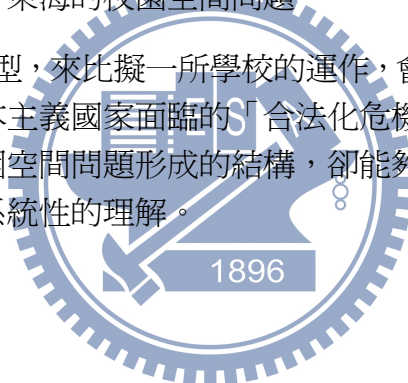
正如進入千禧年後的東海學生，將校園宿舍問題拉到「全球化」的層次來討論（台研/人間，2000a）。進入千禧年之後的東海校園空間問題，也必須放在全球競爭時代的「流動 VS 地方」的空間邏輯中來考量。當「第三科學園區」的夢想成為現實，新一波的戰鬥將會讓東海學生發現，他們要對抗的不只是島嶼上的顛預政府和校園官僚，還有全球流動的跨國資本。

第三節 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

如同本文第三章所述，東海師生對校園景觀具有高度的認同感，咸認為這是東海大學的重要資產，東海大學並擁有建築、景觀、環境科學等空間方面的專業科系。從這兩方面看來，東海大學在處理校園空間議題上，具有非常雄厚的資源，同時在學生運動的壓力下，校園規劃制度也進行了多次的改革，為何十餘年來關於校園空間問題的衝突，始終無法獲得徹底的解決呢？

在前面兩節中，筆者已指出東海的校園空間問題，和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與台中市都市空間發展兩個結構性的矛盾密切相關，因此很難只依靠東海校內的力量，進行根本性的解決。另一方面參與「相思林運動」的學生，一直都強調校園空間問題是「校園民主」問題的一部份。校園空間問題的發生，除了外在環境的影響外，也反映出東海「校園民主」機制的侷限。在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變化、台中市都市空間的發展以及大學校園的校園民主實踐之間，應該是有個結構性的關連，引發了東海的校園空間問題。

雖然用國家運作的模型，來比擬一所學校的運作，會有些引喻失義。但透過哈伯瑪斯所說的晚期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合法化危機」(Habermas, 1994)的視角，來分析東海校園空間問題形成的結構，卻能夠幫助我們對三個結構性問題的相互牽連，有個系統性的理解。



經濟危機

從「經濟危機」的角度來看，由於台灣國家機器長久以來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資嚴重不足，加上台灣社會私人捐助學校的風氣不盛，使得私立大專院校大量仰賴學雜費收入來平衡開支。而在 90 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對公共資源的投注更形減少，使得高等教育發展更加市場化、商品化。

但是不論教育做為「公器」的概念有多麼淡薄，台灣的國家機器為了維持低廉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以及統治的正當性，仍必須對學雜費收入給予一定的上限。而且教育機構的運作不可能像私人企業一樣，完全依照成本效益利潤法則行事。這些因素都造成了東海大學等私立大專院校在經濟資源募集上的困難。為了解決困難，增收學生人數以促進學校發展所需資源，就成了必要的手段。但增收學生也會帶來龐大的教學設備投資（興建校舍、增聘老師、購買新設備）壓力，產生嚴重的如何以最理性的方式分配資源的問題，促成了校園發展管理的「合理性危機」。

合理性危機

就「合理性危機」來看，在資源有限又必需進行建設以吸收更多學生的矛盾下，學校行政單位必需設法透過最理性、最有效率的方式來進行資源分配。就校園規劃問題來說，東海大學擁有在學界和業界具盛名的建築、景觀專業科系，應當是可以在這些問題上的解決上表現出更為理性的作為。不過在外部環境上對校園發展具有影響的高等教育政策與都市空間發展，都不是單一個私立院校所能完全掌控的。這為行政單位理性規劃的企圖帶來了強烈不可控制的變數。這可從東別逐年惡化的生活品質以及 20 餘年不間斷的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表現出來，也許還可以加上由於當年台中市政府撥給東海校地時的疏失，造成校內土地地籍地權不清，影響校園規劃的問題。

在內部環境上，校園規劃與重大建設的計畫必需調解各個院系之間利益的衝突角力，這種衝突角力絕對是帶有政治性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考慮校外捐款人的影響力，這都對學校行政單位理性控管學校發展的能力和企圖設下嚴重的限制。常見的問題是必需面對短期、個別的需求，以及長期、整體的規劃間的矛盾。在每個個別單位都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情境下，形成「個別有理性，整體無理性」的弔詭，表現為新起的大樓和既有校園空間意象的衝突，由此萌發出校園師生對學校環境急遽變化的不適與不滿。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在 80 年代末期，即首先以對校園規劃的非理性、無理性作為的反彈而產生。

而在面對外部環境的威脅上，東海校方一方面利用奠基在歷史與校園景觀之上的壟斷地租優勢，以應對高等教育市場的激烈競爭。同時又利用「共同體想像」動員校內師生團結一致，對抗台中市府在電鍍廠、聯外道路等問題上的蠻橫作為。這兩種作法同時強化了校園師生介入校園空間問題的正當性，使得行政單位的決策必須面對更多不確定因素的干擾。

由於以上種種因素，在 1990 年「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校園規劃的決策越來越不能以閉門造車的科層理性方式來進行，東海校方因此透過改革校園規劃制度、擴大師生參與決策機會以解決「合理性危機」，但此舉使得問題最終以「合法化危機」和「動機機制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合法化危機

就「合法化危機」來看，東海大學不是大度山上的伊甸園，且不提 90 年代持續發生的校園空間問題，東海從創校之初就蒙受外在政治干預、「兩個董事會」的人事行政糾葛以及綜合型大學內部多元異質成份的衝突所苦惱。而 1970 年代由於校園內外環境的不變，產生的一系列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爭議」以及東風社的「未竟的探討」，更是對校園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為了有效解決內部的疏離與衝突，校方亟思透過行政手段建立師生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管道。這個嘗試可以追溯至 1978 年梅可望擔任校長後的一系列行政改

革措施，在 1987-1990 年間由於東潮發起的學生運動的衝擊，更積極建立公聽會、說明會等機制，並大力協助成立東海學生會。而在校園空間問題上，則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持續進行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

不過在外部的大環境不變的情況下，行政機制的理性化以及擴大師生參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各系所間的猜疑和不信任，但同時也帶來了行政運作介入自發性的文化生產的問題。

哈伯瑪斯認為：「意義從來不會在行政生產中產生。」(Habermas, 1994: 95)對文化象徵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畫，會使得文化傳統喪失原本具有的穩定、解釋社會秩序的功能。雖然行政機制可以透過獎勵補助或擴大參與等方式，來設法維護文化傳統的更新與運作，並藉此建立自己權力的合法性。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會產生將來原來屬於私領域的文化領域予以爭議化、政治化的非預期後果。於是：

計畫者們在計畫過程中越把自己置於共識形成 (consensus-formation) 的壓力之下，就越可能產生一種倒退到兩種相反動機的壓力的張力：一種是謀求合法化而引起的過份要求，而行政機構在一種不對等的階級妥協條件下無法滿足這些要求；另一方面是對計畫的保守抗拒，這就縮小了計畫的範圍，降低了創新的程度。

(Habermas, 1994: 97)

由於行政系統干預了原本應該是需要時間成長、自我培力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形塑，反而對日常生活形成了干擾。1997 年由於東海學生會的府會衝突，造成行之有年的東海表演藝術月停辦的事件，就是個顯明的例子。而在校園空間規劃上，制度性的參與機制創造了大量行政系統無法負荷的需求和期待，反而使東海捲入了「市場經濟」(以擴大發展之名)與「社群文化」(以維護校園景觀之名)的劇烈衝突中。

而行政體系創建校園民主制度以及校園規劃的參與機制，其目的都在於設法盡快尋求最大共識以解決問題的技術考量上，部份還包含著預防校園動亂的目的。由於沒有反省到師生在日常生活參與和監督的可能，缺乏學生在生活世界的主體反思與溝通，讓建成的校園民主機制變成徒具形式的花瓶。超級低的學生會選舉投票率，超級高的議會流會次數，表達出學生政府和學生群眾間的疏離，校園公共事務決策的合法性因此往往不為學生接受。同時由於制度性的參與程序，使得任何校內大型建築的興建，都可能變成具爭議的公共議題，這同樣也削減了校方決策的合法性，樹立了抗議行動的正當性。

而在主體以及校園文化的層面上，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冷漠以及基進的抗議行動，反映的都是校園的「動機機制危機」。

動機機制危機

就「動機機制危機」來看，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現代大學經常夾在兩種矛盾的社會角色中：大學被視為是社會精神價值的殿堂，同時也是勞動力的生產基地。這種角色上的矛盾，雖然勉強可以透過教育水準和未來經濟地位的連繫而緩解。但隨著台灣社會往資本主義方向的不斷推進，以及 1990 年以後「經濟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趨勢，將台灣捲入整個全球市場的競爭壓力中，還有教育改革推動的「廣設高中大學」政策，在在都使得這樣的連繫越來越不能被維持。

當念得越高、賺得越多的教育功績主義意識型態由於社會變化而瀕臨破產，學生就會對高等教育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產生質疑。這種質疑可以是一種直覺的、反射性的對過去黃金時代的懷念，也可能是基進的反對教育走向功利化、實用化、商品化的聲音，當然更有可能的是（就如同在東海的案例中看到的）兩者籠統模糊地混合。這是深藏在持續不斷的「相思林運動」，甚至是 1970 年代東風社「未竟的探討」背後深層的動力。如同哈伯瑪斯對 60 年代歐美學生運動的描述：

These students want neither th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elitist and classically humanistic, nor the mass university as a mere school for experts--nor, above all, a combination of the worst elements of both. (Habermas, 1971: 22)

（翻譯：這些學生既不要傳統的、精英的、古典人文主義的大學，也不要大量生產的專業人員製造所，當然更不會要兩者最壞的元素的結合）

參與「相思林運動」的學生，在行動過程中也自覺或不自覺的被相同的期望所推動著。

這種對現狀的質疑，除了基進的抗議行動之外，還表現在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的退縮與冷漠。哈伯瑪斯在其《合法化危機》一書中就已表示，校園青年的積極抗議與消極退縮，都是「動機機制危機」的表現（Habermas, 1994: 119）。如果教育的發展不能再履行其原先的承諾，如果個人日益感覺到社會、教育乃至個人的生活不存在任何意義，那麼採取冷漠退縮的態度以對，也是很自然的選擇。就如同英國電影《猜火車》（trainspotting）的旁白：「選擇未來，選擇生活，…我幹嘛做這些事？」

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大量的非正式經濟部門所形成的文化經驗。這種夏鑄九所稱的「脫落」（disarticulation）的空間文化經驗，鼓勵了「自求多福」的投機心態，表現為一種體制所不能接受的「粗蠻」，阻礙了有組織的運動的形成，只能變成對國家、資本的運作產生某種干擾的草

根壓力（夏鑄九，1995：252-254）。

這種「脫落」的文化經驗同樣也束縛著大學校園，它表現為對各種正式的公共制度運作的不信任，同時也對公民的組織結社、集體行動缺乏信心和經驗。個人雖然可能對於公共事務有很多不滿，但既不會參與正式的制度，也不會透過集會結社過程將個人的苦惱變成公共議題，在長期「習得無力感」的情況下，不滿最後變成對公共事務的不關心。而消費文化下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又更助長了這種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自求多福的投機心態。

東海校方在面對校園空間運動時，經常表示出對決策過程中學生不發表意見，等工程開始進行後卻又大聲抗議的無奈。從「動機機制危機」的角度來看，這並非完全是推託之詞。但是如果把公共事務決策參與的機制，以一種多元主義的各方角力協商方式來運作，而不從民主主體的基進教育歷程去思考的話，這樣的問題永遠無法獲得解決。不有效解決「動機機制危機」，再多的制度改革也只會不停地在「合法化危機」的惡性循環打轉。

正是在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的意義上，才有可能真實的理解：所謂「校園空間問題」始終都是一個「校園民主」問題的意義何在。雖然爭取參與校園公共事務決策權力，建立校園民主運作的程序，一直是運動的重要主題。但更重要的是透過對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討論，去重造民主社會的主體，或者反過來，由重造民主社會主體的過程，根本性的解決對於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探問---這個自 70 年代東風社「未竟的探討」以來，就一直迴盪在東海風中的問題。

也正是在環環相扣的校園合法化危機的背景上，才能理解為何十餘年來東海校方針對校園規劃制度進行的多次改革，始終是事倍而功半。事實上相較於國內各大專院校，90 年代東海大學投注在解決校園規劃問題的努力可說是相當巨大且獨特的，如果不是因為背後糾結著這麼深刻的結構性問題的話，這些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應該會有更顯著的成果。

黃敏禎在其論文中已指出，國家高等教育政策及都市空間發展脈絡是形塑台灣各私立大學學生住宿問題的重要機制（黃敏禎，1995：110）。鄧丕雲也已指出，80 年代成立的學生政府，很少有學校的普選率超過 50%，而且到 90 年代甚至有繼續下降的趨勢（鄧丕雲，1993：241）。由此看來，纏繞東海大學十餘年的校園空間問題，並非只是屬於這個學校的「苦惱」，而是台灣各大專院校共同的結構性問題的表現。東海不過因其獨特的歷史文化經驗，形塑出較敏感的免疫機制，因此表現出更劇烈明顯的病徵，並以校園空間問題的形式呈現。

但和真實的人體不同，更敏感的免疫機制不必然保證能根除這種瀰漫在台灣各大學的「校園文化黑死病」，解決問題的答案永遠存在於具體實踐的過程中，沒有任何的捷徑。但如果總是以「校園林木扶疏、人文氣息濃厚…」或是「背

後的影武者站出來…」之類的說詞來模糊問題的焦點，不願去正視實踐過程中的衝突、抉擇與挫折，則可以確定的是：歷史絕對會懲罰那些遺忘歷史的人！！



第十一章 燃燒的荊棘---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之意義

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摩西說：「我要過去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耶和華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我在這裡。」

—舊約〈出埃及記〉第三章

你知道嗎？社會現實的發展總是一直在跟我們社會科學開玩笑。柏林圍牆倒塌之前，有誰知道它會發生？不是嗎？現實能夠被我們大部分人發現並且清楚言說它，往往是因為體制已經弱化了。就像男性霸權在它最強勢的時候，其實我們是無從知覺到它的存在。所以，社會科學者如果要逼近現實，就要開放地去思考可能性。否則我們永遠是過時的科學家，永遠在幫死的歷史做後知後覺的註腳而已。

— Fred Block



第一節 相思林做為一種學生運動

甚麼是「主體性」？

如同本文緒論中所提到的，1990 年的「三月學運」為台灣學生運動建立了「正當性」，但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則是如何透過草根經營建立學生運動的「主體性」。

「主體性」一詞和「論述」、「詮釋權」等詞彙，都是在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中，使用得十分廣泛的概念¹⁶⁴。「主體性」指涉的乃是個人的意識與潛意識的思想與情感，對自身的認知以及瞭解個人與世界的關係的方式。西方傳統的人

¹⁶⁴ 「1980 年代的學生運動各派系最喜歡的一個字眼就是『主體性』。學校老師教官校園特務把學生當小孩管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聯盟運動的場子中我們的聲音被壓下來、旗號不夠鮮明、訴求被忽略也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學運社團裡的學長壓學弟妹更是嚴重的侵犯『主體性』」（陳信行，2004：）

道主義 (humanism 或譯：人本主義、人文主義) 哲學傳統，預設了存在於人類內心深處的一種本質，它是獨特的、固定並聯貫的，並且這個本質使個人成為他/她所是 (is) 的那個人 (Chris Weedon, 1994: 38)。不過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這種獨立、自主、和外環境界線分明的主體觀點，已被阿圖色 (Louis Althusser) 在其〈意識型態和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一文¹⁶⁵中徹底批判。阿圖色認為作為主體的個人其實是透過意識型態的作用而建構的：

一切意識型態都是通過主體範疇的作用，把具體的個人呼叫或建構成具體的主體的... 意識型態是通過我稱之為建構 (interpellation 或譯：召喚、命名) 或呼叫 (hailing) 以及按照日常最瑣碎的警察 (或其他人) 呼叫：「喂！喂！」的方向可以想像的非常精密的操作，利用在個人當中「招募」(recruits) 主體 (招募所有的個人) 或者把個人「改造」(transforms) 成主體 (改造所有的人) 的這一種方式來「行動」(acts) 或產生作用 (function) 的。

(Althusser, 1990: 191)

意識型態經常被視為是個人腦中的觀念，但阿圖色認為人的觀念是存在於人的行動中，而人的行動是受到產生觀念的意識型態機器的「物質儀式」所支配，意識型態透過社會生活的各種制度、設施以及物質實踐/儀式對個人產生作用，因此意識型態是物質的存在。

另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葛蘭西 (A. Gramsci) 則認為，社會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群體以及意識型態，而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會利用其意識型態，對其他的社會群體進行統合、聯結，這種用以結合不同的利益/團體，以生產出對統治階級的認可，以及符應統治階級需要的「主體性」的意識型態，就是「文化霸權」(hegemony 或譯：主導權)。

葛蘭西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不能只有政治和經濟的鬥爭，還必須透過在市民社會的文化霸權鬥爭來進行。透過建立新的文化霸權，批判既有的文化霸權，傳佈新的文化--道德和世界觀，教育群眾，建立可以挑戰權力中心的「歷史集團」。

任何一種歷史的行動只能由「人的集體」來完成。這一點預定要達成一種『文化—社會』的統一，在這種統一之下追求各種目的的分散願望，在同樣的和統一的世界觀的基礎上，為了同一個目的而結合在一起。正因為這一切都會是這樣發生的... 關於集體製造同樣的文化「氣候」的一般問題的重要性就很明顯了... 每一種「文化霸權」的關係，必然也是教育的關係 (葛蘭西, 1988: 31-32)

¹⁶⁵ 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會接觸到這篇文章，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文化社」(80年代學運中第一個標舉左翼的團體) 編輯、出版《路易·阿杜塞》一書，書中收錄了這篇文章。鄧丕雲認為〈意識型態和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一文，對從大革會到民學聯這一標榜左翼的學運傳統，產生很大的影響(鄧丕雲: 72)。由「主體性」這一抽象的學術名詞在學運圈中被廣泛使用，就可以想見這篇文章的影響力。

文化霸權不是重覆的概念宣傳，而是「文化氣候」的塑造。透過「文化氣候」的創造才能把各個不同目標、利益的個人和集團，連結在統一的世界觀之下，產生對抗宰制的「權力集團」，具有改變歷史力量的「人的集體」，也就是「歷史集團」。

不過新的信念、世界觀由於和正統的意識型態相矛盾，因此在人民群眾中具有極端的不穩定性。新的、革命的意識型態因此不是將舊有的意識型態全部掃蕩，而是透過拆解舊有的意識型態元素，重新進行轉換、連結，形成新的智識--道德倫理。英國的文化研究學者霍爾(Stuart Hall)、拉克勞、穆芙等人，因此提出「接合」的概念，說明這種新/舊意識型態的連結關係，以及對人民群眾所產生的作用。

「接合」(articulation) 在英文中具有表達、陳述等語言學的意涵，但是同時也具有「聯結」的意思。霍爾認為使用接合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文化霸權/意識型態鬥爭的過程中，某個意識型態元素如何在一定條件、以及某個論述內部統合的方式，瞭解意識型態如何發現/建構其主體

接合理論促使我們思考意識型態如何賦予人民力量，使他們能夠對自己的歷史情境有所瞭解(陳光興/Stuart Hall, 1998: 126)

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學生身份(或者更具體的：學生證)本來就是一種主體性的表現。不過這種既與的、自在的(in itself)的主體性，反而比較傾向阿圖色所批判的，由意識型態機器所建構的主體性。學生運動想要創造的，是透過葛蘭西、霍爾等人所說的接合實踐，產生批判性的反-文化霸權的過程，將「自在」的主體性，轉化成「自為」(for itself)的主體性。

大學校園的批判教育學實踐

阿圖色認為在今日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是教育的意識型態機器。過去教會作為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角色，已被學校所取代。校園因此是主流文化霸權的生產基地，企圖把教育服膺於市場和國家的需要，訓練學生成為順從的好公民和優質勞動力。而在公共生活中，則將學生疏離化、原子化，將其生活經驗中感受到的問題個人化，以避免產生任何可能改變社會現狀的批判意識。

但是拉克勞和穆芙認為，任何文化霸權的接合與收編的企圖，都不可能完全成功，一定會有其無法吸納的矛盾存在。這使得具有批判意識的校園師生，可以利用主流文化霸權的矛盾，進行「對抗性的文化霸權」(counter-hegemony，或譯反-文化霸權)的建構。從這個角度來看，校園就變成了意識型態鬥爭的場域。

對立於主流文化霸權的學校教育，拉丁美洲的學者 P. Freire、H.A. Giroux 則提出「批判教育學」的理念。P. Freire 認為主流教育制度的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會麻醉、壓抑創造的力量，試圖一直維持意識的沈淪(submersion)。相反地批判教育學的實踐則要不斷揭露現實，致力於意識的浮現(emergence)，對現實進行批判性的介入(Freire, 2003: 119)。

另一位學者 Giroux 認為：批判教育學的目標是要培養學生成為批判和解放的公民，增進學生的批判知識、習慣與技巧，使其有能力挑戰和轉變現行社會與政治形式。批判教育實踐應該要能幫助學生找回自己的聲音，使得弱勢的個人與團體得以在教育中說出自己的記憶、故事和歷史，挑戰哪些企圖使他們沈默的權力結構。因此課程發展必須重視學生的經驗與文化資本，使其成為學生進行社會和自我分析的概念與工具，但是同時也應讓學生學習批判地使用不同經驗的符碼和字彙，並擺脫自身沈澱的歷史和經驗中不良的強制力量(周珮儀, 2001: 12-13)。

然而批判教育學並不只是一種課程或教學方法的理論，學者 Adriana Hernández 認為，批判教育學是任何民主話語(language)的核心，它並不只是具有政治意涵的教育實踐，更重要的是它能創造一個情境，使人民可以把其私人的經驗轉化成公共議題(Hernández: 3)。

綜合這三位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我們可以把東海的相思林運動，視為一種大學校園內的批判教育學的實踐。在正規的大學教育體系在主流文化霸權的限制下，無法生產批判性的公民的時候，部分學生只有透過批判教育學的實踐進行自我教育。參與校園空間運動的學生們，取用來自校園生活經驗中的各種傳統/文化的元素，接合成新的符號(sign)和意象(image)，變成對抗宰制「權力集團」的武器和彈藥，以及聯結校園內外不同群體的「接合劑」。在這個過程中學生覺察、批判、轉化自己的主體性，而在歷次運動中作為對立面的東海校方、行政單位、台中市政府、教育部等等，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學生建立自己的主體性的媒介。或許在相思林運動中，學生真正要對抗的其實是學生自己。

1990 年以後 Giroux 吸收後現代主義差異政略的理論，提出「邊界教育論」(border pedagogy)。主張跨越學科、政治、與文化的邊界，打破不同知識和權力配置的領域，將教育的概念聯結到為民主社會做出更實質的鬥爭。Giroux 提出了三個「邊界教育論」的核心政略：對抗性文本(counter-text)、差異政略(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對抗性記憶(counter-memory)(周珮儀: 15-16)。以下試著從邊界教育論的三個核心政略，分析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中的批判教育實踐。

批判性歷史的生產

受到後結構主義的影響，Giroux 等批判教育學者非常重視論述(discourse)、

文本(text)的作用。法國學者傅柯認為論述製造了話題，界定了我們知識的各種對象。它控制著一個話題能被有意義地談論和提問的方式，它還影響著各種觀念被投入實踐和被用來規範他人行為的方式。由於批判教育學關心知識/意義的形成，嘗試創造生產另類知識/意義的可能，因此格外重視論述的作用。

必須注意的是，雖然論述的概念來自於語言學，但是論述並非只是文字、符號的連結而已。還包括一連串的物质實踐：各種多樣的制度設施、儀式、社會實踐...。換言之，論述涉及到的是關於使事物產生意義的各種實踐。有些學者會以論述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 來凸顯論述形成的規則，這些規則主宰哪些是可以說的以及不能說的，誰有權可以發言，誰必須聽話。很明顯的這些規則不會是單純的思想體系，而是體現在語言、制度設施、儀式上面的。因此論述和意義的生產，也不是存在於個人的腦海裡，而是具有社會性的，如同 Macdonell 所言：

一切論述和書寫都是社會的..論述隨著論述在裡頭成形的各種制度設施與社會實踐有所不同而不同，也隨著那些說話的人的立場和那些被他們說教的人的立場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的問題變成是要說明人們說話的「立場與觀點」，以及支撐人們說話和...儲存與配置要說甚麼的那些制度設施 (Macdonell, 1995: 11)

透過論述理論來看待歷史，主流的歷史其實是社會的宰制群體，所建構的一套歷史論述。這套論述往往是一種連續性和累積的線性的歷史觀，訴諸規範性的情感和權威，以「過去都是這樣做」來掩蓋形成現狀的結構性原因。處於這種歷史觀中的人，並不會反省他生存的物质和社會條件、權力關係，而是產生固定不變的知覺和重覆的動作。這種歷史論述建構符應主流歷史觀的主體，單方向地的傳遞和繼承知識與社會實踐。

相對地，在 Giroux 的邊界教育論的「對抗性記憶」政略中，則是希望透由對歷史的重組與批判性的閱讀，修復公共生活的語言與個人日常生活經驗的斷裂，讓人們一方面結合在公共生活的記憶形式中，另一方面經由自己特殊的歷史和聲音發言。讓不同團體重新在歷史中找回自己的立場，將自己定義為具有改變現狀能力的歷史主體，去呈現無法被表達的事物，恢復不該被遺忘的事物，並為重寫歷史而奮鬥 (周珮儀, 2001: 19-20)

如前所述，由於台灣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使得東海大學的校園環境在 90 年代蒙受巨大的衝擊。校園景觀快速而劇烈的變化雖然會引起師生的注意，但是如果沒有透過論述將事件歷史化和結構化，則問題將被個人化或特殊化，變成只是個人生活中的「苦惱」而已。

在「相思林運動」中，重述創校時期以及 1990 年「相思林事件」以來的校園運動經驗，是整個運動實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例如 1996 年「科技大樓事

件」中編印的《校園規劃，停、看、聽》手冊，在「118事件」後編印的《從相思出發》的小冊子。包括2003年抗議台中市政府的「東海保衛戰」發生時，在印行的文宣以及公聽會活動中，過去校園空間運動以及校園景觀變遷的歷史都不斷的再被重述。學生們透過「對抗性記憶」的建構，和校方直線、現代化、偏物質取向的歷史觀進行對抗，並使個別事件被公共化、議題化。

但如果只是把問題的結構顯現出來，個人並不見得就會因此而採取行動。拉克勞和穆芙因此強調「烏托邦想像」在變革行動中的作用，認為

沒有烏托邦，沒有否定一個體系的可能性，那麼構思一種基進的計畫也就完全沒有可能了，不管這種計畫是民主的或是其他類型的構想（Laclau and Mouffe, 1985: 190）

由於東海在創校時，聯董會即對東海的教育及發展方針做出完整的構想，並一定程度體現在東海的校園規劃上。這些原則性的理念即成為學生運動批判現狀、構想未來的立論基礎，提供運動對未來的想像力。同時由於對於過去的重述帶著濃厚的情感，特別是「相思林事件」悲劇性的結果，推動著學生為改變現狀採取行動。重述創校時期的歷史、校園規劃設計的理念，因此具有建立指引行動的「烏托邦想像」的作用。

如同洪裕程¹⁶⁶對9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論述的觀察：

構成「美好的過去」和「夢幻的未來」的論述，做為一種召喚的神話，打造出一個令人想望的意義世界，進而召喚運動者的心靈與身體，產生改變現狀的能動力（洪裕程，2000: 138）

這些對於創校初期的歷史，乃至於校園抗爭經驗的描述，不免會和現實有差距，甚至因為挾帶運動者個人的主觀期待，而具有些許羅蘭巴特（Ronald Barthes）意義下「神話」的成分。不過洪裕程認為就算關於抗爭經驗的歷史成為「運動神話」，這無礙於其做為一種心理治療，改變單向度世界，重現生活世界的豐富性的正面意義：

若說「語言乃是存有之屋」，那麼緊貼在親身經驗、發乎於真情流露的「運動神話」就不會祇是鬼話；相反地，運動神話乃是我們詩意地浪居於世的暫歇之處。在此單面向、同一化的社會體制中，生活的豐富性被壓縮成日常例行性循環，而運動者正是透過運動的遭遇、逢異而身心顫動，進而感嘆發聲，敘說出「運動神話」。運動者的生命歷程是一段回歸「本真」、脫離異化、尋找屬己、掌握自主性的生命歷程（洪裕程，2000: 141）

這一套「對抗性記憶」的生產也接合了東海的校園景觀論述。基於種種理由

¹⁶⁶ 感謝林純瑜提供給我洪裕程的這本論文，並建議我從「批判性的公民教育」的角度來思考學運，對這本論文的完成幫助甚大。

東海校方不能否認校園景觀對東海大學的重要性，事實上如同第七章所言，東海校方也參與在建構東海校園景觀和創校初期歷史神話的實踐中。學生的「對抗性記憶」論述，則是在既有的論述基礎上，再接合上相思林抗爭的歷史經驗以及社會結構的反思。但這種接合的操作賦予了「相思林運動」以「維護校園景觀」之名而行動的正當性。在共同承認校園景觀是東海的重大資產的前提下，校方不能輕率的直接鎮壓學生的行動，而必須先在制度上、形式上給予學生一定空間，甚至如同 1999 年「118 事件」發生後，進行大幅度的校園規劃制度改革。但制度性的公聽會、說明會等制度，也給予學生更多和校方對話、向校內師生宣傳的空間，有助於運動的推展。

反霸權的文化實踐

除了「對抗性記憶」之外，邊界教育論還提出「對抗文本」的政略，希望破除主流文本的權威及其封閉的意義，讓學生經由批判的閱讀，重寫文本來定義自己與他人。Giroux 認為文本是教育和政治鬥爭的場所，學習過程是一個重新書寫文本的過程。教師不能只是傳遞訊息，而是要教導學生以多重參照批判性的閱讀、參與和建構不同的文化符碼和表徵，同時要重視其中的情感、愉悅與慾望的投入。（周珮儀：17）

和論述一樣，文本在後結構主義和批判教育學的實踐中，也突破原來單純文字意義的層次，而泛指任何產生意義的實踐。因此任何物質制度、儀式、空間的設置與個人的社會行爲，都可以作為文本來分析。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抗文本」的生產其實也包括了空間意義、文化展演與社會實踐的重塑。

如同傅柯、列菲伏爾等學者指出的，空間其實也是銘刻著權力的文本。符應著主流文化霸權對校園權力關係的形塑，校園空間也展現著相應的權力秩序。但在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中，校園空間中的權力秩序卻一再被改寫。1990 年「相思林事件」將文理大道變成了學生表達異議、遊行抗議的走廊。校長室做為校園權力最高頂點的象徵意義，也在 1999 年「118 事件」佔領校長室的行動中被徹底顛覆。

這種持續性的對校園文化秩序進行顛覆的行動，突顯出俄國文化理論家巴赫金（M. M. Bakhtin）所說的「狂歡節」的意涵。巴赫金認為中世紀的狂歡節在表面的詼諧表演、幽默作品與粗俗言語的形式中，蘊含著深刻的理想與世界觀——對立於官方中心的、層級的、直線式的社會秩序，狂歡節展現出對於權力秩序的嘲諷：

狂歡節的語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徵都洋溢著更新與交替的激情，充溢著對佔統治地位的真理和權力的可笑性的相對性的意識（Bakhtin，1998：13）

對立於日常單一、疏離而乏味的日常生活，狂歡節的文化形式，展現出了藝術和生活的結合：

它處於藝術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線上。實際上這就是生活本身，但它被賦予一種特殊的遊戲方式...在狂歡節，人們不是袖手旁觀，而是生活在其中（8）

從巴赫金的觀點來看，持續不斷的相思林運動其實也是一種校園內的另類文化展演。透過平均每兩年到三年一次的抗議活動，打破日常生活中森嚴的權力關係以及原子化的同儕關係，沈睡中的集體連帶被喚起，運動的參與者重新體驗了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認同與投入。這其中最戲劇化、最典型的例子，或許就是 1999 年「118 事件」當晚，聚集在校長室前的群眾進行的「公共論壇」。

跳脫日常生活規範，挑戰既有權力秩序的行爲，不免會讓參與者感受到失序、狂亂和迷醉的節慶氛圍，然而這就像是古代宗教儀式中的恐懼感會帶來神聖感受：

運動過程和日常例行生活的極大差異，總是會讓運動的初參與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詫異」，因為「詫異」，才給運動者發聲，帶來不斷的神話泉源，召喚著運動者堅持理念、獻身運動（洪裕程：128）

「相思林運動」中的學生行動因此帶有一定程度的劇場化的性質。從為樹木繫上黃絲帶，到在文理大道上高歌「We shall overcome!!」，甚至是說明會上的慷慨陳詞，都具有一種「行動-劇場化」與「劇場-行動化」並進的形式轉換模式，利用戲劇形式的張力帶給親臨現場者深刻的體認，擴大運動訴求和政治理念的渲染力。這是一個沒有舞台、沒有腳燈、沒有演員、沒有觀眾，沒有任何藝術特點的演出，這是學生自由地展現自己存在的形式，也是再生與更新自己的「主體性」的儀式。

「相思林運動」利用校園文化支持運動的實踐，然而運動本身也在重造校園文化。從 1990 年「相思林事件」中的郵政總局電腦備援中心到綜合大樓、科技大樓乃至動工中的第二教學區，除了 1999 年的「118 事件」之外，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並沒有成功阻止任何一棟新的建築物在校園內興建。即使是纏鬥多年的「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也只是不斷爭取到拖延再議的機會而已。然而學生持續的行動，卻一再的重寫了校園的文化符碼和空間意義。東海校內大型建築物的興建，無法再由校長或少數行政人員拍版定案，而必須經過冗長的公聽會、說明會等過程，並必須隨時注意學生可能有的反彈意見。校園景觀的價值和意義，也在十餘年持續的行動中被凸顯。甚至成為東海校方在 90 年代競爭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場中，繼續維持東海的競爭優勢手段之一。

而從亞蘭杜漢的角度來看，透過更新文化以重造主體就是社會運動的目的之一：

社會運動所涉及的，都遠遠不只是某種經濟利益與政治壓迫的工具問題，還涉及到社會利用文化資源與文化模式的方法問題（Touraine，2003：123）

亞蘭杜漢認為社會運動發生的過程，是和「文化」密切相關的。而社會運動過程中的對立兩端，也是由對文化模式和文化資源的搶奪所確立，而非某種先驗性的社會關係的再現。而在作為教育文化霸權鬥爭場域的校園，這種改變文化符碼意義的實踐當然更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豐富了邊界教育論的「對抗性文本」的內涵。

差異政略與另類公共領域的形塑

在後現代主義的政略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分乃是對於「普遍性」、「中心性」的質疑。傳統的現代主義解放論述，往往預設某種具普遍性的社會或人性的本質，以此作為批判或解放行動的基礎。但在後結構主義看來，這些普遍性的假設背後總隱藏不自覺的歐洲中心或男性中心主義，或對於邊緣群體的排除。

為避免現代主義解放論述的問題，因此後現代主義強調多元性、差異、局部和偶然性，以表達多種社會運動的需求，堅持社會立場的多元性。不過這樣的論述和政略有時會變成一種自由的多元主義、一種多樣性無盡繁衍的拼貼或語言遊戲，或是一種無政府的虛無主義，忽略如何以批判的觀點解釋差異，或是不同差異之間建立團結的可能，而在理論和行動上陷於無能。

Giroux 認為：我們可以將現代主義的民主和解放的方案，結合各種新社會運動和在後現代浮現的新的政治理解，以「差異政略」質疑公共政治、挑戰本質主義，開啓多元性、異質性、不確定性的民主傳統，創造允許共同連結的新主體立場，展開多樣性的民主鬥爭，以免差異和多元淪為虛無和失敗（周珮儀：18）。

Giroux 的「差異政略」的理論，指出了後現代的「認同政治」的問題：如何能夠不在一個普遍性的本質的假設上，促成具有不同的認同的群體相互合作呢？

義大利籍的新社會運動理論家 Alberto Melucci 認為：個人的文化認同本身就是當代社會運動的重要目標，而為了要讓各種自我認同都能成立，便需要「公共領域」以供互有差異的文化認同者協商與互動，並讓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顯現出來（Melucci，1989：73-80）。

另一位學者 Calhoun 在評析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時，也主張認同的建構應被理解為公共生活過程的一部份，而不是在個體進入公共領域之前，便可於私人空間中解決的問題。參與公共領域不單有原本哈伯瑪斯所認為的，解決紛爭或策劃行動的可能，更有改變身份認同的可能（Calhoun，1997）。

從 Melucci、Calhoun 等人的理論來看，「公共領域」不但是社會運動所追求的目標，也是不同的運動團體建立連結，構築對抗宰制的「權力集團」的認同的手段。巴西的學者 Sonia E. Alvarez 就從巴西民主化歷史經驗的分析中，提出了「另類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aces) 的概念。Alvarez 認為大部分研究巴西政治社會民主化過程的學者，都忽略了各運動團體或行動者間形成的社會運動網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這個由各種力量、社會關係複雜糾結的「社會運動網絡」(social movement webs) 空間裡，產生了某種「另類的公共性」(alternative publics)，形成一個或多個「另類公共領域」，進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大眾利益的再現以及形塑弱勢群體的認同/利益/需求等任務。

綜合 Melucci、Calhoun、Alvarez 等學者的理論，我們可以將邊界教育論的「差異政略」在實踐上予以具體化，即透過建立起由彈性、多層次的運動網絡形成的「另類公共領域」，以避免普遍主義的暴力和後現代主義的虛無，建構具有包容性和對抗宰制的權力集團的主體立場。

如同第十章所述，校園空間議題在東海校內是個具有歷史傳統和情感渲染力的公共論述。當學校正規、行政、制度性的公共領域，由於諸多原因變得父權、官僚、形式主義的時候，學生們建立起自己的「另類公共領域」，一起為深化校園民主而付出。

這個公共領域的參與者並非是眾多獨立而匿名的個人，或是界線分明的團體所組成（雖然從外表看起來很像是這樣）。它其實是一個複雜的由人際關係、論述連結、政治立（力）場所連結成的跨組織網絡，在一個由意識型態，運動願景與集體認同形成的脈絡中，進行著各種的合縱連橫和相互對話。即使不在運動的高峰期，這些網絡中的人際互動，以及理念資訊的交流仍然持續的進行著。

只有由一個跨組織的網絡（Webs）的角度，我們才能理解，為甚麼每學期人數很少超過 10 個人以上的異議性社團可以促成有上百人參與的大規模的校園抗議行動。而在 2003 年「東海保衛戰」中，這種多元力量相互連結支援的現象，表現得更為明顯。

這些團體、個人的結合最初可能只是個人情感或人際關係的動員，以壯大運動的聲勢。然而隨著運動的不斷推展，慢慢衍生出「相互奧援」¹⁶⁷的同志義務，逐漸跨越個人與組織的界線，進而開始討論運動路線、政治規劃、整體局勢研判等普遍性的問題。如同洪裕程用武俠小說的語言所描繪的社運世界，這是一個由貼身的「肝膽相照」和「運動情義」，漸漸衍生成具有政治功能的「資訊交換中心」或「合議制黨中央」的過程。

¹⁶⁷翻譯成工運界的語言，也就是遊行中時常聽到的口號：「工人鬥陣，車拼相挺」（閩南語）。

公共修辭的作用

必須注意的是，至少在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經驗中，這個「另類公共領域」的運作和社會運動的實踐，和哈伯瑪斯的理解--將言談共識（consensus）視為集體行動的目標以及運動團結性的源頭是有所差異的。李丁讚曾對哈伯瑪斯過度理性主義的公共領域想像提出批評，他認為：

公共說理，作為一種政治生活的型態，需要扎根於一個社區內部成員互相信任的基礎，而社會信任的情感面向在人們的溝通對話之中產生著關鍵性的作用…忽略了共通感受、情感的層次，會使得公共領域變成以一個理念化而且抽象的方式，在運作著理性的對話（李丁讚，2004a：25、26）

李丁讚因此提出公共修辭（civic rhetoric）的概念：

公共修辭是將一個社群中個體之間、或團體之間殊異的生活經驗串連起來，召喚起來，成為某種共同經驗、集體記憶以致形成某種公共感的重要行動環節

（李丁讚，2004a：7）

如果沒有融合情理辯證的公共修辭做為相互溝通的媒介，參與公共領域的個體之間、或團體之間會缺乏相互傾聽的意願與能力，則公共領域調解私人利益衝突，凝聚弱勢群體的認同/利益/需求的作用就不容易達成。如果沒有某種公共修辭承載的「公共感」、「共同感受」促成個體間或團體間的會合（come together），只是抽象的說理或是個別利益的加減乘除，則很難促成具有公共性的集體行動。

在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中，校園景觀和相思林抗爭歷史的文化論述，形成一種「公共修辭」，扮演傳遞/建立情感與共通感受的作用。透過「公共修辭」的作用，不同的個人、團體才可能建立起一個彈性的跨組織網絡。而校方也願意適度開放校園公共工程決策程序，聽取學生及師生的意見，雖然當學生的行動太過激烈時校方還是會採取各種手段鎮壓，但至少在各方之間還存在著會合交集的區域。

公共修辭的作用還表現在校園空間運動實踐中，行之有年的「跑宿舍」的傳統。乍看之下「跑宿舍」宣傳，只是異議性社團因應「大一全體住校制」產生的校園宣傳方式。但純粹以宣傳效果來看，在運動過程中頻繁的於晚間進行一間間寢室的拜訪、發送文宣，其付出的努力和實質效果是不成比例的。但是透過發送過程中直接接觸學校同學，建立起參與運動者的理想性的形象，對建立校園同學對於運動的信任具有莫大的幫助。同時在這過程中也可以接觸到一兩位有心參與運動的新生，成為運動的新血。因此看似投資報酬率極低的「跑宿舍」，其實具有形成「共同感受」促成不同的個體和團體會合的作用。

從學校的主體到主體的學校

「主體性」的建立意味著一種自由成熟，免於異化與宰制的解放旨趣。人的主體性建構，意即「人的自我完成」實際上是一個複雜而充滿變數的過程，絕非只是主觀的自由意志或是抽象的理性思維所能實現與完成（李文富，1999：31）。主體性的建立因此也就連結著「社會改造」的課題，但是在今日的全球化時代中，主體性究竟如何可能？又該如何去建立主體性呢？

亞蘭杜漢認為今日世界的「主體」，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克服現代社會生活中市場經濟和社群文化相互衝突的危機。超克兩者的衝突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護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的個人主義，而是為了加強社會行動者干預公眾生活的能力。在今天的社會，主體的認同只有透過下列三者方式互相補充才有可能形成：1.在經濟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劇烈拉扯中，強烈地維持個人統一性的願望 2.集體和個人對把文化變為封閉社群，勞動變為商品利潤的權力進行的鬥爭 3.個人之間和社會機構之間對「他者」做為主體的承認。

杜漢認為在現代社會建立主體的過程中，學校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學校不能再為了滿足在政治上訓練好公民，經濟上訓練優質勞動力而存在，而必須成為今日民主政治實踐中的重要環節，致力於提高個人成為主體的能力。因此相較於建立在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功績主義原則上的「傳統的學校」，杜漢呼籲應該積極建立「主體的學校」。在主體的學校中：1.教育應培養和加強個人主體的自由 2.重視文化多樣性與學習對他人的承認 3.積極實現社會變革與社會的民主管理¹⁶⁸（Touraine，2003：368-398）。

學生做為學校的主體，是東風社在70年代關注東海轉型問題時，一向堅持的立場：

教育的種種措施無非是為了幫助學生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因此，我們對東海轉變的思索便是在肯定底下的原則而展開的，這個原則就是：學生是教育的主體（《東風》44期：6）

由這個立場出發，東風社在當時要求學校應重視學生社團活動、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應以普選方式產生、廢除學生刊物審稿制等。80、90年代的學生運動也以此要求學生參與校園事務決策的權力，質疑校園規劃制度的不民主。但在「相思林運動」的實踐中，學生已不只是努力奪回成為學校主體的權力，透過自我的批判教育學的實踐，在重構「對抗性記憶」、「對抗性文本」與「另類公共領域」的過程中，他們也在重新建構自身的主體性。如同杜漢所言：

¹⁶⁸但這並非意味著學校應忽視學生對於科學知識、理性運用乃至表達能力的訓練，杜漢認為能保證「思想交流」的學校才是主體的學校，而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理解能力和運用科學知識進行邏輯的思考的能力，對進行思想的交流十分重要，有助於培養個人成為民主社會的主體，參見 Touraine，2003：386-389

那裡的個人或團體致力於把個人的文化經驗對工具性活動領域的參與結合起來，我們未來的行動者就將出現而且已經在那裡

那裡的人們具有既回憶過去又展望未來，既發展文化又加強行動的意志，那裡就會出現主體；反之，哪裡的人們的感情受到壓抑，過去的事實被掩蓋，紀律（理性的紀律和法律的紀律）得到了加強，哪裡就沒有主體

（Touraine，2003：406、407）

從這個角度來看，學生的行動不只在要求、重構學生做為學校的主體的地位，同時也是試圖在大度山上建成一所「主體的學校」。狹義的來看，這所主體的學校指的是「相思林運動」中所逐漸建構出來的「另類公共領域」。圍繞著校園景觀的論述和過去的運動經驗，不同的個人和團體建立起一個聯繫的網絡，形成運動動員的社區網絡，也加深了社區認同的形成。過去的歷史經驗，不但成為現在動員的基礎，同時透過歷史的反省和對照，幫助參與者在運動過程中進行學習，提升其做為主體的能力。

廣義的來看，不論是出於主動或被動，東海校方不斷針對校園規劃制度進行改革，開放校園師生參與校園重大公共重建決策的討論，並回應學生的質疑進行的過程，也是建成主體的學校的實踐之一：

被選入管理委員會的學生的代表性太薄弱，因此某些代表和他們所屬的組織就會越權行事。相反，學校應採取主動，公開討論學校的運作和重大的社會問題，如果這些問題與學生生活有關的話，學校還應做出相應的決定。

（Touraine，2003：395）

同時十餘年喧喧嚷嚷的校園空間運動，在持續性的歷史經驗累積以及運動動員的過程，產生了一種帶有批判性的地方智慧（critical local wisdom）和校園文化氛圍¹⁶⁹，這裡面存在著使「個人」轉化為「主體」，使「抵抗性認同」轉化成「計畫性認同」的機會。就目前的狀況來看，這個轉化仍存在很多限制，例如：無法放大視野望向校園圍牆外，無法有效處理內部的矛盾和分歧。不過

內部的分歧，以及社區建設的動力降低，都是社區本身亟需克服的自我障礙。這有賴於社區組織成員的反思性/反身性的自覺能力，以對話與溝通化解不必要的分歧…社區運動才有可能再次升級與轉化…抵抗性的認同與計畫性的認同之間，本來就需要深刻的反思/反身與自覺加以連結，這是台灣市民社會成長的關鍵能力（夏鑄九等，2002）

¹⁶⁹ 「在常日的都市生活中的都市問題與危機是社區動員的必要元素，有些社區短期的挫折也不表示長期必然失敗。學習能力與集體經驗創造了批判性的地方智慧或文化氛圍之空間…這種地方文化的氛圍並不只是一種限制了人們可能性的結構性條件而已，而且是積極主動的人類作用者的土壤。」（夏鑄九，1999）

東海此刻所面對的問題，也正是台灣的市民社會發展與民主化過程能否更前進一步的關鍵。學生運動正在改變這所學校的風貌，而這所學校也由此而可能對整個台灣社會做出不同於一般大學所能做出的貢獻。

第二節 相思林做為一種社區運動

東海做為一個社區

社區/共同體 (community) 和社會的二分法，在社會學中有悠久的傳統，從德國社會學家涂尼斯、韋伯，到美國的結構功能論大師帕森斯，包括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開創者費孝通在其名著「鄉土中國」中，都不能免於這種二分法的影響。社區與社會、鄉村與都市的區分，形成一個傳統與現代、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立，這是對現代工業社會的匿名性的、孤立、異化的生活的反抗，由此產生出對過去的鄉愁。社區被想像為凝聚情感與傳統的「美好生活」，在現代化的巨輪下被無情的摧毀，於是在當下大量的社會資源被動員起來，以重建/重現過去美好的社區。甚至在某些場合，社區成為政治人物、規劃師、建築師，以公共利益之名正當化其政策的措辭。

然而鄉愁式的認定鄉村才具有社區/共同體的想像，可能與歷史的事實並不相符。曼威柯司特認為不論在鄉村、城市或市郊，人們都會在地方環境中社會化、相互影響，並與鄰居建立起社會網絡。另一方面由於地方性的認同是以高度分歧的模式與其他意義來源與社會認知交錯的，所以地方性認同可以有多樣的詮釋。地方環境本身並不能導致特定的行為，因此也不能產生特定的認同。社區文化認同的形成，需要經歷一個社會動員的過程；

人們必須參與（不是那麼革命性的）都市運動，而在其過程中發現並守護彼此共同的利益，並以某種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那麼，新的意義也就有可能產生。

(Castells, 2002: 69)

特別在都市社會運動中，經常可以看到的現象是，由於某種共同的危機，使得存在鄰里間的社會網絡被動員起來，人們透過運動的過程發現共同的利益，分享生活中的不安、委屈、憤怒與歡欣的共同經驗，產生新的意義。國內學者夏鑄九因此認為：人們對地方社區的領域性認同的力量，是使得都市社會運動得以形成的動力之一。而鄰里間的社會網絡，則是社會運動過程中，個體轉化為社區主體時，形成團結網絡、進行社區動員、建立社區認同的基礎（夏鑄九，2005）¹⁷⁰。

¹⁷⁰ 感謝南華大學環藝所的曾心怡，提供夏鑄九老師在嘉義社區規劃演講的參考資料給我，使

在 1980 年代，柯司特根據他在 1970--1980 年間所做的經驗調查，認為都市社會運動是當前對抗城市生活的商品化（成為交換價值），單向邏輯的資訊流通以及集權國家組織的決定性來源。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傳統的抗議運動與政治（勞工運動、政黨）在對抗經濟剝削、文化支配、政治壓迫上遭遇失敗，使得人們別無選擇，若不想放棄，就只得以構成自我肯定和自治組織的最基本來源—地域性（locality），作為基礎進行反抗。

柯司特認為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必須滿足下列五個條件，才有可能對都市環境意義的變化，產生最大的衝擊：

1. 為全然實現都市意義在政治及文全部意涵中的轉化，都市運動必須在實踐上連結集體消費要求、社區文化、以及政治上自治等三個目標。

2. 它必須自覺於都市社會運動的角色。

3. 它必須透過一系列組織運作者，連結到社會，特別是媒體、專業者和政黨三者。

4. 一個必要的條件：都市社會運動應連結政治體系，以最低限度實現它的目標之同時，它們也必在組織與意識型態上自主於任何政黨...

5. 第一個條件必須統轄其他條件，倘若這三個基本目標在運動的實踐上不交互相連，則沒有其他元素可以實現都市意義的重大變遷（Castells, 1999:288）

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說明為何東海人容易把自己的學校當成一個社區，社區型大學的區位環境，美麗突出的校園景觀...，但是這樣的談法往都建立在柯司特所批評的，把空間結構和文化表現視為一種線性連結的認識論基礎上，忽略了社區運動、社區動員的過程對形成社區意識的作用。東海的社區意識並不是起自於創校初期精誠團結的「東海大家庭」，如果那個大家庭真的存在的話，也不過只是「自在」階段的社區意識。

真正東海社區意識的萌芽，應是起自於 70 年代初期由於內外環境巨變所產生的「未竟的探討」。在這個討論過程中，一個圍繞著校園空間議題為中心的公共論述逐漸形成，在 80 年末期逐漸其脫離純粹文字討論的層次形成具體的學生運動，而 90 年代持續的校園空間運動，更是直接促成這樣的社區意識由「自在」（in itself）逐漸轉向「自為」（for itself）的重要關鍵。

因此作為一個社區型大學的東海，其所以成為一個社區，不只是由於其獨特的空間區位，更是由於自 80 年代以來持續不斷的校園空間運動。是「相思林」的存在，使得東海可以理直氣壯的承擔「社區型大學」之名，從而創造出一種有別於台北都會中心的學生運動模式。

在本文第三章已經提到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具有都市社會運動的性質。那

麼東海做爲一個社區，做爲台灣都市社會運動(社區運動)的一個極具特殊性的案例，是否足以達成柯司特所期待的基進的轉化都市意義的任務呢？

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限制

1.完全涵括三個目標的典型都市社會運動

就柯司特所提出的集體消費、草根民主、文化認同，三個都市社會運動的目標來看，持續十餘年的相思林運動不論在論述上或實踐上，都能徹底的滿足的這三個目標。

以集體消費層面來說，柯司特認爲這是以強調空間爲使用價值，以對抗將城市生活視爲交換價值，予以商品化的趨向。這在 1990-1995 的「相思林時期」中表現得最爲明顯，純粹以「交換價值」而論，保留一片樹林的利潤絕對遠不及蓋一棟大樓。正如當時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論述所顯示的，學生要反對的其實是整個教育日趨商品化、功利化的趨向，並進一步的要求生活資源的公共化。在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校園的運動中，也可以看到對相同目標的追求。

而在草根民主的層面上，歷次運動中學生都要求建立參與式的校園規劃制度，要求具有長期性、整體性的校園規劃，不斷的抨擊校方決策的「黑箱」都表現了對這個目標的追求。校方在這個層面的運動上，做出很多制度上的改革。但除了科層官僚決策的根本侷限外，更大的問題其實是草根民主的主體反思與參與意願的提升。如同第十章所提到的，這裡面觸及的是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與「動機機制危機」。

在文化認同的層面上，如同上一節提到的，「相思林運動」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校園文化，東海校園景觀的意義也不斷被突顯，過去的歷史並一再被重述、建構。這可能是「相思林運動」的實踐中做得最成功的目標。但也許這個層面做得太成功了，反而使得運動在其他兩個層面的推進上出現侷限。

不論是促成運動發生的結構性因素，或是實踐過程的操作，「相思林運動」都充分連結都市社會運動的三的目標，不過問題是：參與者有否意識到他們在參與的是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呢？

2.缺乏做爲都市社會運動的自覺

就柯司特所提的第二個條件來看，雖然十餘年來「相思林運動」持續不斷的在進行，但參與者很少自覺到他們是在進行一個「都市」社會運動。且不提爲了保衛相思林、校園完整性挺身而出的學生，卻很難被「反高學費」或是「台

中客運罷工」等議題所動員。光從東別環境問題之惡劣，相對於學生對其關注之稀少，就可知道學生在運動實踐的想像上依然跳不出校園圍牆的界限。

「相思林運動」是個不折不扣的學生運動，卻沒有人注意到它其實也是一個「都市」社會運動。這種缺乏對於自身做為都市社會運動角色的自覺，使得東海大學在聯外道路問題上，頻頻窮於應付「鄰避」的大帽子。正如 2005 年「平安夜救東海」遊行後，程海東校長的公開信中所說：

有關本校用地及周邊開發建設的問題，歷來本校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基本上稍偏於應急的、被動的反對，日積月累的結果不免被貼上為反對而反對的標籤…東海大學乃中部地區學術研究的重鎮，也是社區的一員，關於鄰近地區的發展及建設，實有必要從更長遠、整體及專業的方向，積極參與…。¹⁷¹

如同第一章所言，「走入社會」幾乎是參與 1970 年代「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各方最大的共識。但正如東風社一再強調的，這其實是一個心態的問題。事實上從 1981 年《東海大學校史》到 1995 年的《東海風》的內容來看，不由讓人懷疑東海是否有真切認知到它其實是台灣社會的一部份。1950 年韓戰爆發使得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協防台灣，而在 1951 年聯董會開始認真考慮在台灣設立基督教大學的可能，1954 年台灣發生震驚中外的「孫立人事件」，1955 年東海正式設校招生，隔年台灣發生「劉自然事件」…，但在既有的校園歷史論述中，這些事件間可能有的關連完全不被討論。

人們往往相信事物在起點上最完美，它們光彩奪目地出於造物主之手，現身於第一個清晨毫無陰影的光芒中。然而主題和背景總是並存在一副圖畫中，就如同黑線與白線交織在一起，當黑線斷了，織布者當仔細察看整匹布，也應檢查織布機。東海的歷史與現實處境，又何嘗不是一副黑白交織的圖畫？

3. 專業者的角色

東海的異議性社團以及校解社等學生社團，無疑地在「相思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東海校園師生對學校環境的變化十分敏感，但不見得有足夠的經驗和知識來推動運動，大部分的人其實是以模糊而籠統的「常識」的方式，在理解和接受關於校園空間的歷史記憶、文化論述。而關於校園空間運動的知識，特別是有關於運動實踐的「共同知識」(mutual knowledge)¹⁷²，主要是集中在這些持續關心校園空間議題的社團中，並透過校園的人際網絡與社團日常運作進行傳遞和擴散。

¹⁷¹ 東海大學公共關係室，〈關於「市政路延伸路段通過本校農牧場東側案」之校長公開說明信〉，參見 2006 年 1 月 3 日東海新聞網

<http://www.thu.edu.tw/thunews/detail.php?newsID=324&prevID=38>。

¹⁷² 「在日常接觸中包含了大量舒茨所說的『知識庫存』(stock of knowledge)，我更樂意把它稱為『共同知識』(mutual knowledge)。行動者的意識無法直接覺察到這種共同知識。這樣的知識絕大多數是實踐性的，人們要想能夠在社會生活中持續完成各種例行活動，它們也是必不可少的部份。」(Anthony Giddens, 2002: 5)

以社區運動或都市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由於規劃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因此建築景觀專業科系師生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格外值得注意。雖然專業科系的老師能夠參與校園規劃制度的運作，但在「相思林時期」除了出席公聽會、說明會外，專業科系師生並沒有直接的參與整個運動。而在隨後的「校園民主重創時期」中，除了透過《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以及校建會機制繼續進行制度內的專業監督外，也開始有透過校解社的校園解說員培訓課程等方式，參與校園空間論述的建構。但是最直接的參與則是在「後 118 時期」的公共論壇以及之後東海希望聯盟發起的一系列運動。2005 年末發起「平安夜救東海」遊行的「(手)守護東海行動聯盟」中，建研所的學生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近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累積了大量參與式設計的知識與實踐經驗。雖然東海的校園規劃制度在「相思林運動」的刺激下，歷經多次重大的改革，但是東海的校園規劃設計，卻沒有看到這些經驗/知識的使用。每棟新建的教室、大樓，依然是在傳統的公聽會、說明會等形式的參與過程中達成協議。包括近年來甚為流行的工作坊、模式語言，乃至師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實質空間營造的作法，都未曾在東海的校園規劃過程中被使用過。

目前大專校園整建規劃之使用者參與方式多為「安撫」及「諮商」模式，且限於規劃流程中資料收集的階段，使用者參與的角色缺乏主動參與；而校方或規劃單位對於參與的不重視、參與使用者的界定過於狹隘；使用者未能有周詳的參與計畫；參與策略運用上的不夠純熟，各方對意見表達相互溝通的方式及技術之不足，宣傳、公告方式的不夠普及、暢通，造成使用者參與機會的喪失；以及使用者對環境改變的漠不關心，對資訊的不敏感，皆為校園事務及使用者參與工作推動之障礙（王小璘、翁秀貞，1996：272）。

仍停留在「安撫」與「諮商」模式的參與，事實上無力克服校園的「動機機制危機」與規劃決策的「合法性危機」。這裡面其實也關連著對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校園民主」實踐的總檢討。

當然由於路思義教堂、文理大道等「校園歷史景觀意象保留區」的重要性，因此東海大學在校園規劃上會有更細緻的考量，V 大樓改建的「人文大樓」得到「遠東傑出校園特別獎」就是一個著名的案例。但這只能說是由於東海具有建築景觀專業科系，以及特出的校園景觀，使得學校在遴選建築師和設計藍圖上更為小心認真而已，和目前台灣社區營造的參與理念仍然相去甚遠。

4.非政治化(non-political)或去政治化(de-political)！？

自從 2000 年以後，「藍綠對決」的態勢幾乎席捲了台灣關於公共政策、社會改革的討論的可能，也使得社會運動相對於政黨政治的獨立空間縮小。目前看起來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仍然保持著和政黨政治間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讓曾參與遊行的黃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死定了，」系主任從那張傳單中抬起頭來，「小孩子不懂事，把執政黨和反對黨同時得罪了，你看看傳單上這些話……。」

我湊近臉，讀著傳單上的句子：「工業區理事長，政商關係良好，藍綠通吃，消滅牧場、此路打通，公司股票必定大漲，光是股價上漲就賺不完。反對黨的本市市長，混淆視聽，繼續推動分屍東河¹⁷³的謀殺計畫。」

「所以我說死定了吧。」系主任說（黃凡，2004：45）

雖然推動運動的學生社團，尤其是人間、台研，具有很強烈的左翼批判與社會運動的理念。但須注意到的是，在「後 118 時期」之前，「相思林運動」基本上是以發生在校園內部的衝突為主，和大台中地區的地方政治關連很少。這在 2003 年「東海保衛戰」後才開始有些轉變。不過在這次事件中，東海大學雖然沒有因為同時得罪藍綠政黨而「死定」。但是由於「共同體想像」促成的地域主義的限制，使得運動也一直停留在「愛校、護校」的層次，而沒有辦法將自身遭遇到的問題，和巨大歷史社會結構的變遷加以連結，更遑論介入地方政治運作。因此看起來「相思林運動」其實是在「非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之間徘徊。

柯司特曾根據歐、美、拉美地區的都市社會運動的實踐經驗，認為這些運動最好的狀況是：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進地方政府的政治運作中。不過筆者認為：一個成員大部份是學生的社區運動，要如何達成這樣的可能，其實是一個理論和實踐上都很值得挑戰的問題。



由城市學園邁向邁向學園城市

東海大學原先是以一種與世隔絕、超脫塵俗修道院的形式存在，隨著台中市的都市發展逐漸向西屯地區挺進，以及縣市邊陲地區的發展，東海已有逐漸成為都會型大學的傾向。然而這所為服務台灣人民而成立的大學，是否只能跟隨著周遭的環境起舞，而不能主動的對周圍環境的變化有所影響？

從歷史上看來東海大學的設立，原先承擔著開發繁榮台中市邊陲地區的任務。在經過十餘年的經營之後，大度山從黃沙漫天、寸草不生的紅土丘，變成綠草如茵、如夢似幻的神話仙境。學生人數的增加，更使得龍井鄉新東村、遠東街一帶地區，成為有萬餘人口聚居的聚落。甚至東海校園的大片綠地，還成為拉抬附近房地產價格的誘因之一。

中部科學園區的設立，帶來了另一種「產學合作」的想像。然而以私立大學有限的研究資源、竹科/矽谷的群聚效應、以及台灣代工模式的科技產業發展，

¹⁷³ 《大學之賊》書中發生遊行的學校是「東河」大學：「東河大學位於台中市郊，校園大得驚人，因此校區裡頭難得看到幾個學生。」（黃凡，2004：43）

東海之於中科是否能扮演類似清交兩校之於竹科的角色尚在未定之數。眼前可以看得到的，是連結國際街藝術街坊、台中市都會公園與東海大學，形成一個提供台中市民和工業區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休閒消費基地。

相較於投機城市的台中市，以及全球流動資本象徵的中部科學園區，路思義教堂具有某種傅柯、索雅(E. W. Soja)等人所提出的「異質空間」(Other Spaces)的意涵。然而祥和的路思教堂大草坪，是否也有工業區的外勞、校園內的同志社群、乃至附近聚落居民的空間？在「超高趕北」的呼聲中，台中市急切的想走和台北市一樣，建基在「社會隔離」上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城市發展想像¹⁷⁴，而東海大學和這樣的城市意象要保持甚麼樣的關係？

在1999年柯司特總結他對都市社會運動的觀察，認為這些運動最終只有四種變化的可能：

1. 直接或間接地整合進地方政府的結構及業務當中。
 2. 成為防衛性及反應性的鄰避(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 不要在我家後院)運動。
 3. 變成一種本質上是宗教性社區的「公社主義」(communalism)，在其中人們以互惠的方式相互扶持。
 4. 變成黑道幫派，一種帶著自毀傾向的「末日公社」，這是最黑暗的結果。
- (Castells, 2002: 69)

對於柯司特的悲觀論點，夏鑄九等人認為：「我們的都市有不同的社會系統與文化構造，確實有值得與西歐城市經驗對話的意義」(前揭文)，並樂觀的認為不斷發生的都市社會運動，有可能在台灣創造「市民的城市」。

研究台灣社區運動的黃麗玲也認為，台灣社區運動的戰力正來自於在現實情境中不斷地經由主動或被迫地，尋求與本身疆界之外的地域展開對話。因為在變遷快速的台灣政治情境中，只有處在動力狀態的社區組織才不會如泡沫般消失。她樂觀的認為：

(在台灣)不能否認粗暴的社區自利行動的存在，然而反動式的社區主義卻沒有辦法得到太多的共鳴。我認為，吊詭的是，這也許正是前一階段的社會運動所強調的社會性目標及公共價值為今日社會留下的遺產(黃麗玲, 1999: 154)

那麼東海校園做為一個社區，東海大學的校園空間運動做為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中最特殊的一個個案，最終是要成為大度山上的孤島？還是有可能發動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帶動整個大台中地區的都市再造，不只讓東海成為一

¹⁷⁴ 關於台北市的發展想像可以參考趙剛的〈為什麼反全球化？如何反？〉一文的第82-86頁，(趙剛, 2001)，以及黃孫權的論文〈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黃孫權, 1997)

個「主體的學校」，同時讓台中市成為一個「市民的城市」？

亞蘭杜漢認為在以前的時代，民主是出現在大街上，在街壘中和國會中展現的，哪裡的人民起來反對統治他們的少數人，哪裡的勞動者起來反對他們遭受的剝削和爭取社會權利，哪裡就有民主，「而在今天，民主被界定為主體的政治，它的命運首先是在學校和城市中的決定的。」(Touraine, 2003: 394)

擺脫修道院格局的東海大學，在逐漸轉化成「城市學園」的過程中，是否有可能將西屯地區乃至台中市變成一個「學園城市」？開創出台灣的社會民主與都市發展的另類可能？

提出這樣的想法，或許會有很多人認為是在做白日夢。然而紀伯倫筆下的先知阿穆斯塔法，曾如此問過歐非理司城的人們：

不是你的呼吸使你的骨骼直立而強固了它的結構嗎？

不是一個你們都不記得的夢造了你們的城市，

並造成了其中所有的東西嗎？

(紀伯倫，1988: 170)

是否還有人記得，在 1955 年，是一個甚麼樣的夢想建成了這所全國最美麗的大學？在 1970 年前後，大度山上的多事之秋，又是甚麼樣的期望帶動了這所學校的轉型？



第十二章 結論

大肚深似海，水清可見底
大肚山不是臥龍崗，黃袍在故宮
我們要好好的學挖地，要深深的挖下去
好讓根群能紮實，從現在就要學挖地
你是臭皮匠，我是臭皮匠
我們都是臭皮匠，要團結幹下去

——楊逵，〈愚公移山〉

校園空間運動的發展歷程

本論文緒論中即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想透過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經驗，和台灣主流的學運論述對話。卡維波等人曾指出，晚近台灣的學運論述幾乎不約而同地將台灣學運史終結於野百合前後的 1991 年，然後跳接到 2004 年的孤挺花學運，中間十餘年的台灣社會政治整體的真正狂飆，卻只留下學運的空白紀錄¹⁷⁵。

關於這種學運論述的「選擇性失憶」產生的原因，還有待有心的研究者予以發掘。但筆者認為以「三月學運」和「中正廟」為中心的學運視角，忽略了「三月學運」（或說 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內部的多樣性，也忽略了 90 年代不同性質的學生團體，在校園內推展運動時所面對的挑戰。這種視角使得台灣學運的內容只剩下對於國家民族的愛戀情仇，也無法充分解釋「三月學運」之後，後續在中正廟前進行的學生運動所遭遇到的侷限。

筆者在本論文中，將研究焦點放在從 1987--2005 年間在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校園內所發生的一系列以「校園空間」為主題的學生運動，本文將其定名為「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並嘗試將其放置在整體社會結構變遷與較長時期的歷史分析架構中檢視。本文認為這個肇始於 1987 年間的學生運動，雖然和 80 年代末期

¹⁷⁵ 台社論壇，「慾望、青年、網路、運動：從反假分級運動談台灣社運的新形式」，2005 年 3 月 26 日於台北紫藤廬。

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過程有相關，但和 1980 年代之前的東海校園歷史仍有著幽微而緊密的聯繫。特別是東海大學在 1970 年前後，由於內外環境變化，所產生的一系列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討論，建立起東海大學校園文化中對校園的「共同體想像」、以校園空間問題為核心的公共論述、學生的批判行動傳統等，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形塑了 1987 年後持續發生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或稱：「相思林」運動）的面貌。

另一方面將東海大學校內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問題，放在整體社會結構中來檢視，本文認為東海校園的空間問題，並非單獨東海大學的特定問題，而是和戰後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扭曲的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台中市都市空間發展模式，以及大學校園內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校園民主」與公共領域結構有著密切的關連。這些結構性的矛盾，在東海大學特殊的歷史情境下，則以校園空間問題的形式被表現出來。

而且仔細檢視 1987-2005 年間的東海校園運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在「野百合」到「孤挺花」之間，台灣的學運並沒有中斷，也沒有空白，同時隨著內外環境變化，學生運動團體不斷地要解決各種新的挑戰，也由此展現出豐富而多樣的運動、組織形式。

在 1987--1989 的「東潮時期」，由於威權政治對大學校園的控制，這時期的運動主要是以地下的秘密行動團體的形式，以爭取言論自由、設立學生會等民主化、自由化的主張為核心，衝撞威權政治的校園控制體系。由於東海校園歷史的影響，關於校園景觀的變更、重大校內公共建設的進行，成為當時抗議的主題之一。東海大學校方則在內外環境的壓力下，主動進行各種校園民主制度的改革，例如建立公聽會、說明會制度、協助成立學生會等等。隨著校園民主空間的開放，學生運動團體轉變成地上化的正式學生社團，並產生組織、議題、路線上的分化。

在 1990--1994 的「相思林時期」，由於 1990 年「相思林事件」的發生，使東海的學生運動產生一個非常獨特的性質——一個以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討論、校園民主程序的建立為中心的運動模式，並由這段期間的運動所強化。當然如同本文第一篇所述，這種運動模式並非完全是由於「相思林時期」的運動所創造，而是奠基在東海自 1970 年來的歷史與校園文化之上的。「相思林事件」以及其後的運動，不過是把原有的「共同體想像」、「校園景觀認同感」，予以擴充、接合上社會運動的批判論述。但是整個爭取、保衛相思林的過程，也構成了有非常大的情感與力量的歷史記憶，這使得「相思林」成為東海學生運動的象徵，召喚東海人投入一波波的校園空間運動。

「相思林時期」創造了東海學生運動的獨特性質，但緊接著在 1994--1999 的「校園民主重創時期」，則凸顯了學生運動在「三月學運」後，於校園內所面臨的挑戰。這個挑戰來自於前一個階段爭取自由化、民主化的努力後，校園內

各種多元、自主性的聲音的出現。這些聲音可能是非參與過「三月學運」的學生運動組織（例如：性別運動）、個別而偶然的抗議事件的參與者，也有質疑或挑戰學運團體主張的學生群體。東海校內的異議性社團不能以對待國家機器、校園控制體系的方式來對待這些群眾，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而學生會等既有的校園民主機制，由於制度設計與實踐上的侷限日益顯現，也無法在實質上統合、領導學生的聲音。爲了重新建立學運的「主體性」，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各種新的策略和論述一一被嘗試¹⁷⁶。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校園空間論述」的重構，這同時和東海校方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壓力下，積極建立東海的壟斷地租優勢，以及進行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有相互關連。

因而從 1999 年「118 事件」到現在的「後 118 時期」，由於開始有大量專業系師生加入結盟，以及東海校方大幅改革校園規劃制度，這個階段的運動有較過去更多的「專業遊說」、「制度性參與」的層面。但學生的基進行動仍引起了校方使用近乎威權政治時代的管理手段進行壓制。而長久歷史累積形成的校園空間論述與文化符碼，成了連結分散而流動的校園力量的重要象徵。而在「全球化」趨勢推動下興建的中部科學園區，使得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從「解決內部矛盾」逐漸轉向「聯合對抗外敵」，並開始有跳出校園圍牆和校外社區結盟、對話的可能。

從本論文中對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分析中，筆者認爲可以和台灣對於學生運動、公共領域以及西方學者曼威·柯司特對於「認同轉化」的討論，有一些對話和補充之處。



為何「三月學運」不再重現？

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說明了台灣的學生運動不只存在於台北中正廟的廣場，它們在規模上或許比不上 1990 年的「三月學運」，但更接近真實的校園情境。台灣學運的可能與限制必須在這些實踐中去找尋。

「學生，做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份，做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群體，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才出現的社會屬性。」¹⁷⁷由於現代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需要大量受過一定的文化知識、勞動紀律和專業技能訓練的勞動力，並灌輸具有支配地位的意識型態，以確保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這兩個因素使得以普遍化、技能化和社會化爲特徵的現代教育體系誕生，從而產生出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

¹⁷⁶ 除了東海以外，北部地區的學運團體，似乎也面對到類似的問題。例如在 1998 年四月「反高學費運動」發生後，當時輔大黑水溝社的幹部丁穩勝發表一篇名爲「尋找學運新核」的文章（丁穩勝，1998），將反高學費運動視爲學生運動再建立自己主體性的嘗試。顯示在校園內外情勢丕變的情境下，學運社團必須尋求新的議題和實踐方式，進行校內多元的群眾的組織，並設法和不同性質的社團（甚至是跨校）進行連結。

¹⁷⁷ 陳福裕，〈從反帝的人民運動到右傾機會主義〉，刊於夏潮聯合會網站。

力的學生群體。

法國六八學運領導者之一的龔本第 (Daniel Cohn-Bendit) 認為，現代大學具有兩種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必須大量生產資本主義需要的勞動力，使得教育實踐越來服從於工業上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大學又被當成是社會精神價值的廟堂和永久的儲存所。由於現代的大學生夾在這兩重矛盾之中，同時又是社會中少數比較不用為自己的經濟生活擔心，擁有較多個人自由的群體，龔本第期望學生運動會由大學校園內的抗議運動出發，變成足以改變社會的革命力量。(Daniel Cohn-Bendit, 1987: 172--179)

但在經過 1949「四·六事件」與 50 年代的白色恐怖撲殺之後，台灣的大學校園卻日漸疏離，甚至落後於整個台灣社會。鄧丕雲明確指出，80 年代末期的政治自由化政策並沒有及於校園，社會的開放沒有同時帶來校園的開放。台灣的學生是在受到外在社會環境變化的鼓舞後，才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校園抗議行動。台灣的學生並沒有負擔起龔本第等人所期望的，做為社會革命的引爆劑的角色，而是急急地在追趕整個社會前進的步伐，或者更常見的，封閉在校園的圍牆內，對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無動於衷。

因此鄧丕雲會界定三月學運的性質為「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其實是很合宜的。在學生意識和行動遠遠落後於社會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成為表達整個社會對推進民主改革、建立合理政治結構的期望的工具，而無法利用自己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訴求，以影響台灣社會前進的方向。學生在中正廟的廣場上發揮的是做為符號的功能，而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實質力量。是一個因著學生缺乏特定社會屬性，而表現出超然於現實利益鬥爭，代表純粹的理想與道德的符號。

這種以學生的道德形象優勢為立足點的運動，其最好的情況乃是 80 年代末期部份學運團體所提出的想像--讓學運成為各個社運團體之間的「接合劑」。但從 90 年代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經驗來看，台灣大部分的學生都還沒有能力走出校園圍牆之外，提昇自己對周遭環境的認識。同時不只是一般學生，甚至是學運團體之間，都不見得能透過公共性的機制調解校園內部的矛盾，遑論去「接合」不同的社運團體。事實上從 80 年代末期以來，學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經常是對學運團體的組訓功能遠超過組織底層人民抗爭的功能(鄧丕雲:260)。

沒有能力走出校園圍牆，又缺乏「公共性」的台灣學生，一但置身於中正廟的廣場之上，由於缺乏足夠的能力，只能發動一場註定「被綁架的學運」¹⁷⁸，

¹⁷⁸ 「這是一場被綁架的學運！」(楊祖珺主編, 2005: 103), 可以比較鄧丕雲對三月學運的描述:「學生只是搭起一座供別人表演的舞台, 自己卻無法粉墨登場...最後變成三月學運在不自覺中為李登輝背書。」(鄧丕雲: 350)。同時感謝楊祖珺老師於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的鼓勵和支持。

在這一點上 1990 年的野百合和 2004 年的孤挺花¹⁷⁹並沒有任何的差別。一群學生靜坐在中正廟的廣場上，雖然可以滿足社會大眾與媒體的期待，然而對於整體台灣社會，甚至對於學生運動本身來說，只不過是重複演出歷史的肥皂劇而已。

即使無法主動引導社會變遷，1990 年的三月學運起碼為台灣的學生運動掙得了正當性，讓學生運動在台灣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但如何充實強化學運的「主體性」，卻是三月學運以後，台灣學生運動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台灣社會媒體大眾或許會為「三月學運」的盛況不再重現而感到惋惜，但是從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角度來看，離開三月，離開中正廟，面對真實的校園實踐場域的問題，恐怕才是學運的正途。與其去問何時能夠重現野百合，不如去問：台灣的學生運動還要在中正廟廣場上停留多久？

「共同體想像」與「公共性」的矛盾糾纏

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歷程中有一個特徵，即關於校園的「共同體想像」與校園公共領域（不論是「主要公共領域」或「另類公共領域」）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連。

在高壓的威權政治時代，建基在對校園的「共同體想像」上的「校園空間論述」，是東海在 70、80 年代間最重要，可能也是唯一的公共論述。建基在「共同體想像」上的「校園景觀認同感」，則是學生介入校園空間問題的正當性基礎之一，而後在「相思林時期」再被強化。基於對「共同體想像」與「校園景觀」的認可，校方必須對於學生的行動有所回應，而學生也以此做為象徵，連結校內師生以及校外校友的力量，這在後來學生力量日趨流動、多元的情況下，變得更加重要。不同利益、不同社會位置的群體在共同的象徵的召喚下，以彈性而流動的方式和巨大而僵硬的官僚體系對抗。

在校園內公共領域的產生上，「共同體想像」以及「校園空間論述」還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修辭」，以調解私人利益的衝突，凝聚了反抗群體的利益/認同/需求，讓公共領域不致變成全然抽象的說理，而能建立起內部成員相互信任、對話的基礎。

雖有其正面作用，但是這個「共同體想像」卻也製造了嚴格的內/外區分，使得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很難跳出地域主義的侷限，延伸社區的利益以對抗擁有資本與權力的壓迫者。

柯司特曾在其著作中，解釋為何人們會以地域主義或都市社會運動的形式來

¹⁷⁹ 或許還包括早已被社會遺忘的，發生於 1997 年的「菅芒花」。

對抗壓迫：

之所以會如此，基本上是因為主動性(proactive)運動及政治（如勞工運動、政黨）在對抗經濟剝削、文化支配、政治壓迫上遭遇失敗，使得人們別無選擇；若人們不想放棄，就得以構成自我肯定與自治組織最直接的來源——地域性（locality），做為基礎進行反抗。…突然地未加防衛地面對全球化的風暴，人們不知所措，而只能緊靠在一起；而他們過去所擁有的，他們過去的作為，成為了他們的認同（Castells，2002：70）

如同前文所述，台灣的左翼學生運動傳統在 50 年代就已消失殆盡，80 年代末期再起的學生運動和之前的左翼，乃至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在思想和行動上的連結都非常小。缺乏充分思想行動資源的東海學生運動，援引自身的文化論述和歷史想像做為對抗的資源，也是一種別無選擇下的選擇。甚至如同第二章所述，這個「共同體想像」都是起源於 1970 年代東海校園內外環境的巨變，而未必是對於創校初期歷史的真實描述。

這種「共同體想像」對公共領域以及社會運動的糾纏，雖然看起來和台灣市民社會發展的過程十分近似，但筆者認為地域主義式的認同，未必是台灣學生運動必然要經過的歷程。事實上北部學生運動中「反高學費運動」的持續實踐，也證明「共同體想像」未必是學生進行反抗時唯一的資源。但從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持續實踐和發展來看，可以確定的是：學生運動必須以校園內的歷史、文化、環境的結構性問題為基礎，透過持續而有歷史感的實踐，去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而不是在中正廟前模仿前人的演出。

從「抵抗性認同」向「計畫性認同」的轉化

在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歷程中，「認同」的形成和轉化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柯司特將認同界定為：社會行動者在單一文化的特質或相關的整套文化特質的基礎上建構意義的過程，「認同」是行動者意義的來源，也是行動者經由個別化的過程所建構的。他並認為，由傳統民族國家的制度建構的「正當性認同」，其根源已日益枯竭。具有潛力建構新社會的「計畫性認同」--一種關於另類的生活的計畫，並由此延伸向社會整體的轉化--只能來自圍繞著「抵抗性認同」而建構的社區共同體的實踐中。

在東海校園民主的實踐中，仿照民族國家三權分立代議民主體制建立起來的「校園民主」機制--東海學生會，幾乎在誕生的同時就被刻上詛咒的印記，議會頻頻流會，議員選舉經常性的投票人數不足…。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部分的時候其最好的情況就是扮演好「超大型服務性社團」的角色。

但在資「新宗教中心事件」以降的歷次運動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積極而主

動的參與者，他/她們對生活環境保持關注和敏感，而不是冷漠或逃避於逸樂的消費文化中。爲了思考、分析問題，在歷史和結構性知識的支援下進行持續性的探知活動，並勇於採取各種行動以解決問題。如果東海大學的「校園民主」有值得稱頌之處，那麼應是在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過程中，展現的活潑、多元、能動的「公眾」，而非杜威所嘲諷的「軟體動物式的組織」的運作¹⁸⁰。

東海的案例似乎印證了柯司特對於「計畫性認同」只能由「抵抗性認同」中浮現的觀察。但「抵抗性認同」並不必然走向「計畫性認同」，柯司特認爲「抵抗性認同」也可能形成一個對外防衛得很好的社區，或是變成一個利益團體，參加個人化的計畫以及無顯著特點的協議，實際上是符應於支配者的邏輯。除非社區共同體能夠以社會整體之轉化爲目標，延伸產生在抵抗社區內的利益與價值以對抗資本、權力與資訊全球流動的支配利益（Castells, 2002: 392）。

在東海的經驗中也有類似的問題。雖然從「相思林事件」以來，校園的異議性社團做出了許多努力，但看起來地域主義想像所形塑的內/外界限仍然束縛著學生。比較有可能的出路，是在 2003 年之後由於聯外道路問題促成的壓力，基於結盟的需要迫使學生走出校園圍牆，和地域外的社區民眾進行對話、連結。並設法在論述和實踐上，把東海校園個別的利益扣連上整體社會的轉化的可能，以化解「鄰避」(NIMBY)的質疑。這還需要後來的校園行動者在前人的基礎上，投注更多的努力。

學生運動做為批判性的公民教育



在本論文中有多處都提到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具有學生運動和社區運動(都市社會運動)的雙重性質。做爲一個學生運動，它必須面對鄧丕雲所說的，在「三月學運」建立起學運的正當性之後，台灣學運如何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的問題。做爲一個社區運動，它必須面對柯司特所說的，從圍繞著「抵抗性認同」而建立的社區共同體，透過「計畫性認同」的建構而轉化成主體。校園空間運動的雙重性質都共同指向以建立主體爲目標，讓我們再度想起亞蘭杜漢對當代民主政治的界定：

在我看來，「主體政治」這個提法，比任何其它的提法都更能更好地界定今天的民主政治：承認文化的多樣性，拒絕排斥他人、每一個人都有譜寫一部生活史的權利，以便實現一或至少能部分實現一個人和集體的計畫，這就是「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大原則在今天採取的形式（Touraine, 2003: 348）

在當前的社會中「主體性」已不再是先驗必然地存在，而必須透過個人和集

¹⁸⁰ 關於「公眾」與「軟體動物式的組織」，請參考〈甚麼是「民主」？甚麼是『公共』？杜威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與重建〉，趙剛，1994。

體不斷反思和實踐的過程去建立。主體必須透過積極的動用、轉化各種可能的文化資源來形成，而非訴諸於先驗性的社會結構位置。面對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各種形式的社群/民族的統合主義的威脅，民主政治只有包容「主體政治」的意涵，才有可能在各種法西斯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挑戰中存活。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目標的同時，也是為實現這個目標的教育實踐、主體化實踐。

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因此具有一種公民教育的意義，但不是威權政治時代乏味的政治教條背誦，也不是目前國家文化政策中帶有社會整合意圖的公民意識的培養，而是 Giroux 所強調的以培養批判和解放的公民為目的的「批判教育學」實踐。透過建構「對抗記憶」，修補公共生活和個人日常生活的斷裂，讓個人將自己定義為具有改變現狀能力的歷史主體。透過建構「對抗文本」的文化實踐，批判性的閱讀、參與和建構不同的文化符碼和表徵，並展現個人被壓抑的情感、愉悅與慾望。透過「另類公共領域」的形塑，連結分散的個人與群體，創造更新民主政治的力量，讓學生從爭取成為「學校的主體」進而將學校改變為「主體的學校」。這也是杜漢所強調的創造民主社會真正的主體的實踐

從學運作為創造公民的批判教育實踐的來看，如果台灣要想成為公民社會，則應鼓勵學運的發展，讓學生透過運動過程學習參與、學習擴大視野、學習面對他者，成為民主社會的主體。從這個角度來看，學生運動的目的應該在於培力、在於學習和他者對話，而不是隨政黨政治起舞，抱著彼可取而代之的心態成為政黨的青年軍，也不是在中正廟的廣場上為民請命，而是學習如何透過校園生活的日常實踐和文化鬥爭，成為 Giroux 所稱的具有批判意識的公民，或是亞蘭杜漢所念茲在茲的一能在市場經濟和社群文化的夾攻之下，提出自己的生活計畫的主體。讓我們謹記著亞蘭杜漢的名言：

而在今天，民主被界定為主體的政治，它的命運首先是在學校和城市中的決定（Touraine，2003：394）

對比於沸沸揚揚十餘年已經取得一定成果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鄧丕雲在 90 年代初所描述的校園落後於整個社會的情況，今天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的改變。如果負擔文化再生產功能的高等教育機制，竟然是民主和社區意識的蠻荒地，那對於這個據說已經民主化的島嶼，真可說是一種強烈的諷刺。

從持續性的反高學費運動到新起的反假分級運動，在「三月學運」之後，在今日的台灣社會裡，仍有無數的年輕學子，為了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而鬥爭。只是把眼光專注在廟堂之上的台灣社會媒體大眾，總不肯把視角從中正廟的廣場移開，反而動輒對這些人貼以「草莓族」的標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年的「三月學運」既是一場擦槍走火促成的運動，誰又能料定這些侷限在各自的角落裡的運動，不會孕育著未來希望的種子？

相思樹總是生長在最貧瘠的土地上，沒有醉人的香氣，也沒有悅目的顏色。

唯一的用途只是在辛苦的捱過一生之後，被砍下來製成木炭。生長在大度山上的相思林，不若野百合、杜鵑花那般受到眾人的關愛。它們在紅土丘上孤獨的生長，或許在未來也將孤獨的死去。如果這是相思林的宿命，期望這本書能夠燃起一些火花，溫暖那些在他處無人聞問的角落裡，咬牙堅持著的年輕心靈。¹⁸¹

2005 年 1 月 13 日（正月初五）酉時動筆

2006 年 4 月 17 日午時全文初稿完成

6 月 14 日完成碩士論文口試



¹⁸¹ 寫過碩士論文的人應該都有類似的經驗，越接近完成的時候壓力越大也越難熬，我在初稿完成前一兩個月的心情正是如此。感謝東海校友林芳如、Eno 陳、poetics 於網路上給我的支持與鼓勵。

跋

好多好多相思樹，好多好多小黃球。

爲甚麼不改種楓樹？到了秋天，一片的紅，接下來又是聖誕紅，至少可以紅半年。

也許。

相思樹實在不好看，不像松樹那麼硬挺，胡亂長的，一點也不受約束。

它就是這副德性，不想裝裝樣子。人家欺負它，也不說什麼，就自顧自的，不管人家對他怎麼想。

你看它真不成材，人家只顧撿它的枯枝當柴火。一怒下來，統統砍個精光，它就發更多更多的芽，也不到水邊自個兒照照模樣，學楊柳俯仰，跟人家報春報喜，討人歡心。

它的葉子，多麼小，它的花，像小絨球似的，古腦兒都是，沒幾個人喜歡碰他、摸他，免得兩手都是花粉。它的氣味，雖然不錯，卻天生不討人歡心。

就是嘛，誰都不願意理會它。

人家也不大管它落葉，反正嫌都懶得嫌它。它的小夾果，更没人要。

它大概只配種來防風、防洪。

是啦！種楓樹實在是好主意。

這樣我們就可以寫好多好多詩。到了冬天，葉子落得光禿禿了，我們就可以葬葉。不過，只能用火葬。

我們可以看著枯枝，在寒風中瑟縮，看大地蕭條景象。風可以吹走老教授的帽子，我們便去追回來，在空中飛舞，跟風賽跑。

我們也可以懷念那段有好多好多相思樹的日子。

參考文獻

- Althusser, Louis, 1990, 《列寧與哲學》, 杜章智譯。台北: 遠流。
- Bakhtin, M. M., 1998, 《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 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 教育出版社。
- Bendit, Daniel Cohn, 1987, 〈學生與社會〉, 譯者不詳, 刊於《1968--法國學生大革命》, 文化社編輯。台北: 出版社不詳。
- Block, Fred, 2004, 《後工業機會: 一個批判性的經濟社會學論述》, 鄭陸霖、吳泉源校譯。台北: 群學。
- Calhoun, Craig, 1996, "Introductio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IT Press.
- 1997, 〈民間社會與公共領域〉, 梁穎詩譯, 葉蔭聰校, 刊於《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論文集》。香港: 牛津。
- Castells, Manuel, 1999, 〈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 陳志梧譯, 刊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 明文。
- 1989, 《文化與社會: 1780 至 1950 年英國文化觀念之發展》, 彭淮棟翻譯。台北: 聯經。
- 2000, 《網絡社會之崛起》, 夏鑄九、王志弘等校譯。台北: 唐山。
- 2002, 《認同的力量》, 夏鑄九、黃麗玲校譯。台北: 唐山。
- Castells, Manuel and Alejandro Portes, 1999, 《底層的世界: 非正式經濟的起源、動力與影響》, 夏鑄九、王志弘譯, 刊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 明文。
- Chang, Chung-Ping, 1982,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Education in Asia in Development of Tunghai University in Taiwan, 1955-1980*, Carbondale: The Graduate Schoo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 Chiu, Yen Liang, 1991, *The Moral Politics of Industry Conflict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Located in Hong Kong: a Anthropological Case Study*. Chicago: Illinois.
- Davis, Mike, 1999, 〈因為汽車不能跳舞〉, 譯者不詳, 刊於《從相思出發》第 36-39 頁。東海大學: 人間台研自印。
- Fraser, Nancy, 1996.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IT Press.

- Freire, Paulo, 2003, 《受壓迫者教育學 (30 週年版)》, 方永泉譯。台北: 巨流。
- Gablik, Suzi, 1998, 《藝術的魅力重生》, 王雅各譯。台北: 遠流。
- Gibran, Kahlil, 1988, 《先知》, 王季慶譯。台北: 純文學。
- Giddens, Anthony, 2002, 《社會的構成》, 李康、李猛譯。台北: 左岸。
- Gramsci, Antonio, 1988, 《獄中札記》, 譯者不詳。台北: 谷風。
- Habermas, Juergen, 1971, "Student Prote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13-30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translated by Jeremy J. sb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 1994, 《合法化危機》, 劉北成譯, 嚴敏蕙校閱。台北: 桂冠。
- 2004,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曹衛東等譯。台北: 聯經。
- Harvey, David, 2003, 〈地租的藝術: 全球化、壟斷與文化商品化〉, 王志弘譯, 《城市與設計學報》第 15、16 期。台北: 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
- Hernández, Adriana, 1997, *Pedagogy, Democracy, and Feminism: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Hobbes, Thomas, 1981, 《利維坦》, 朱敏章譯。台北: 商務。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ies: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Lefebvre, Henri, 1999, 〈空間: 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 王志弘譯, 刊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 明文。
- Macdonell, Diane, 《言說的理論》, 陳璋津翻譯。台北: 遠流。
- Marx, Karl, 199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集,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北京: 人民。
- Mills, C. Wright, 1995, 《社會學的想像》, 張君玫、劉鈴佑譯。台北: 巨流。
- Melucci, Alberto,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Nancy, Jean-Luc, 2003, 《解構共同體》, 蘇哲安譯。台北: 桂冠。
- O'Connor, D. J., 1998, 《批評的西方哲學史 (上)》, 洪漢鼎等翻譯。台北: 桂冠。
- Porta, Donatella della and Mario Diani, 2002, 《社會運動概論》, 苗延威譯。台北: 巨流。
- Richard Fox and Orin Starn(eds.), 1997, *Betwe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 Cult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Protes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aid, Edward W. , 1999 ,《東方主義》, 王淑燕等譯。台北：立緒。

Sonia, E. Alvarez, 1997, "Reweaving the Fabric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hallenges to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Brazil" *Betwe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 Cult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Protest* , 83-117, ed Richard Fox and Orin Star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P. , 2001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錢乘旦譯。南京：譯林。

Touraine, Alain, 1984, *Return of the Actor: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rans by Myrna Godzic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行動者的歸來》, 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台北：麥田。

--2003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 : 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異》, 狄玉明、李平瀾譯。北京：商務。

Weedin, Chirs , 1994 ,《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 白曉紅譯。台北：桂冠。

Williams, Raymond, 1988, *Key Word*, Fontana Press.

丁穩勝, 1998 ,〈尋找學運新核〉,《石皮客》雜誌試刊四號。

人間/台研, 1993 ,《給東海同學的一封信》, 自印。

---1999a ,〈相思林祭文--聽! 樹哭的聲音〉, 自印,《1999 相思林事件》檔案資料夾, 人間/台研社團工作室提供。

---1999b ,新聞稿〈東海爭取校園民主獲具體成果, 同學相約持續關心〉, 自印,《1999 相思林事件》檔案資料夾, 人間/台研社團工作室提供。

---1999c ,《從相思出發》, 自印。

人間工作坊, 1990a ,《人間札記》試刊號, 1990 年 1 月 12 日。

---1990b ,《人間札記》第 1 期, 1990 年 4 月 12 日。

---1990c ,《人間札記》第 2 期, 1990 年 6 月 16 日。

---1990d ,《人間札記》第 3 期, 1990 年 10 月 12 日。

---1991a ,《人間札記》第 4 期, 1991 年 1 月 16 日。

---1991b ,《人間札記》第 5 期, 日期不詳, 依內容推定在 5 月出版。

---1991c ,《人間札記》第 7 期, 1991 年 10 月 13 日。

---1992a ,《人間札記》第 8 期, 1992 年 1 月 10 日。

---1992b ,《人間札記》第 9 期, 1992 年 4 月 9 日。

- 1992c,《人間札記》第10期,1992年6月18日。
---1992d,《人間札記》第11期,1992年10月10日。
---1993a,《人間札記》第12期,1993年1月9日。
---1993b,《人間札記》第13期,1993年6月9日。
---1993c,《人間札記》第14期,1993年10月14日。
---1994,《人間札記》第15期,日期不詳,依內容推定在5月出版。
---1995,《人間札記》第16期,1995年3月20日。
---1996,《人間札記》,第17期,1996年6月。
---1997,《人間札記》,第18期,1997年9月20日。

人間雜誌社,1988,《人間》雜誌第37期。

大江健三郎,1995,《廣島札記》,李立倫等譯。北京:光明日報。

大度山社,1991a,《大度山》第9期,1991年4月發行。

--1991b,〈社論--論興建綜合大樓與公民投票〉,刊於《大度山》第10期,1991年6月出刊。

小草包,1994,〈蒼蠅貪甜--駁「男」「國立大學教授」陳光興「先生」〉,刊於《野百合評論》第7期:32-36。

文化社,1987,《1968--法國學生大革命》,譯者不詳。

王小璘、翁秀貞,1996,《使用者參與大學校園整建規劃之理論與應用》,刊於〈第二屆建築理論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系所。

王光旭,2002,《制度、網絡與政策產出--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之個案研究》,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順民,2000,〈東海興建大樓的兩難--辦學福音化 VS 辦學世俗化〉,聯合報,12月15日。

王榮文,1989,〈勵志館--出版緣起〉,載於《永不屈服的靈魂--貝多芬傳》。台北:遠流。

王維菁,1994,〈從來,立足點就不是平等的--對學費政策的幾點批判〉,刊於《人間札記》第15期。

王錦堂,1995,《大學學術研究與寫作》。台北:東華。

王巖鴻、黃雅崎、吳桂芬,1998,〈一股來自森林的思潮--對第一期相思林事件的反思〉,《東海采風》第3輯。

丘延亮,1991,《跨國企業中工業抗爭的道德政治學--一個在香港的工業人類學個案研究》。台北:唐山。

- 1992，〈通識、另類現實觀與社會抗爭〉，《台社》季刊第 13 期。
- 司馬中原，1987，《啼明鳥》。台北：皇冠。
- 台研/人間，1996，《校園規劃停看聽》，自印。
- 2000a，《東潮》創刊號，2000 年 11 月。
- 2000b，《東潮》第 2 期，2000 年 12 月。
- 2001a，《東潮》第 3 期，2001 年 1 月。
- 2001b，《東潮》第 4 期，2001 年 3 月。
- 四校例會，1998，《聯合通訊》合訂本，自印。人間/台研工作室檔案資料，輔大黑水溝社張菊芳提供。
- 皮果，1998，〈之後呢？〉，刊於《石皮客》雜誌試刊 4 號。
- 石皮客雜誌社，1998，《石皮客》試刊 4 號。
- 何方，1990，〈人民頑鬥主義—從無住屋組織的幽默風格談起〉，《當代》雜誌 53 期。
- 何榮幸，2001，《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
- 余光中，1981，《五陵少年》。台北：大地。
- 1988，《余光中詩選：1994--1981》。台北：洪範。
- 佚名，1999，〈東海學生護林行動的空前意義〉，自印，《1999 相思林事件》檔案資料夾，人間/台研社團工作室提供。
- 李丁讚，1997，〈公共論述、社會學習與基進民主：對『食物中毒』現象的一些觀察〉，《台社》季刊第 25 期。
- 2004a，〈傳遞共通感受：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發表於「自由主義與新世紀台灣」學術研討會。殷海光文教基金會主辦，9 月 16、17 日，台北。
- 2004b，〈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刊於《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
- 李丁讚、吳乃德、吳介民等合著，2004，《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
- 李丁讚與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歷史形成：1970--86〉，《台社》季刊第 38 期。
- 2003，〈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社》季刊第 52 期。
- 李文富，1998，《台灣原住民教育改革的分析--一個批判教育學的觀點》，國立

-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孟浩，1991，〈學生議會反省，議會流會事件的深層原因--調查權的漠視與新聞權的衰微〉，《東風》60期第1-3頁。
- 李彥旻，1991，〈校園民主的一齣戲--談學生會學生自治的侷限性〉，刊於《人間札記》，第5期。
- 李重志，1994，〈九四年文大美術系抗爭模式分析〉，刊於《野百合通訊》第7期。
- 杜欣怡、楊佳蓉，2004，〈三叉路的識別標誌--舊宗教中心〉，刊於《東海采風》第8輯。
- 沈發惠，1991，〈邁向人民民主實踐之路--「後現代人民民主論」之反省及人民民主之實踐意義〉。
- 周珮儀，2001，〈追求社會正義的課程理論---H.A. Giroux 課程理論之探究〉，教育研究集刊第46輯。
- 孟東籬，1986，《素面相見》。台北：爾雅。
- 東風社，1958，《東風》第4期，1958年6月出版。
- 1959a，《東風》第5期，1959年1月出版。
- 1959b，《東風》第7期，1959年3月出版。
- 1959c，〈East Wind〉(英文版東風)第1期，1959年3月出版。
- 1959d，《東風》第8期，1959年6月出版。
- 1959e，〈East Wind〉(英文版東風)第2期，1959年6月出版。
- 1960，《東風》第11期，1960年6月出版。
- 1961，《東風》2卷1期，1961年1月出版。
- 1964，《東風》3卷1期，1964年6月出版。
- 1970a，《東風》3卷12期，1970年1月出版。
- 1970b，《東風》4卷1期，1970年6月出版。
- 1972，《東風》4卷4期，1972年6月出版。
- 1973a，《東風》第40期，1973年1月出版。
- 1973b，《東風》第41期，1973年6月出版。
- 1974，《東風》第43期，1974年5月出版。
- 1975，《東風》第44期，1975年3月出版。
- 1976，《東風》第45期，1976年3月出版。
- 1977，《東風》第46期，1977年5月出版。
- 1978，《東風》第47期，1978年3月出版。
- 1979，《東風》第49期，1979年6月出版。
- 1981，《東風》第51期，1981年1月出版。

- 1982,《東風》第 53 期,1982 年 6 月出版。
- 1988,《東風》第 58 期,1988 年 4 月出版。
- 1989,《東風》第 59 期,1989 年 6 月出版。
- 1991,《東風》第 60 期,1991 年 10 月出版。
- 1993,《東風》第 61 期,1993 年 6 月出版。

東海大學,1964,《東海大學創立十年畫刊》,東海大學編印。

- 1975,《東海二十年--東海大學建校廿年特刊》,馮滬祥主編。
- 1982,《東海大學校史:民國 44 年—69 年》,東海大學出版社。
- 1985,《東海三十年》,東海大學出版。
- 1995,《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東海大學出版社。

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1998,《東海大學發展白皮書》,民國 86 年 6 月初訂,87 年 10 月增訂。

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1995,《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民國 84 年 2 月。

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1996,《東海采風》第 1 輯,張志遠/台灣鄉土文化社策劃,黃文興/張志遠/謝鶯興編輯,1996 年 6 月初版。

- 1998a,《東海采風》第 2 輯,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張志遠策劃,謝鶯興/東海圖書館特藏組編輯,1998 年 6 月初版。
- 1998b,《東海采風》第 3 輯,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張志遠策劃,謝鶯興/東海圖書館特藏組編輯,1998 年 6 月初版。
- 1999,《東海采風》第 4 輯,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張志遠策劃,謝鶯興/東海圖書館特藏組編輯,1999 年 11 月 30 日初版。
- 2000,《東海采風》第 5 輯,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張志遠策劃,謝鶯興/東海圖書館特藏組編輯,2000 年 6 月 9 日初版。
- 2001,《東海采風》第 6 輯,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張志遠策劃,謝鶯興/東海圖書館特藏組編輯,2001 年 5 月 27 日初版。
- 2002,《東海大學校園建築步道》。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 2003,《東海采風》第 7 輯,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張志遠策劃、編輯,2003 年 6 月 4 日初版。
- 2004,《東海采風》第 8 輯,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張志遠策劃、編輯,2004 年 5 月 30 日初版。
- 2005,〈如何使東海成爲友善的校園—從校園交通談起〉,2005 年東海週系列活動「從交通角度看東海」座談會記錄,刊於《東海新聞》,2005 年 10 月 13 日。

東海大學學生會,1988a,《東海新聞》第 7 期,1988 年 10 月 24 日出版。

- 1988b,《東海新聞》第 8 期,1988 年 12 月 8 日出版。

- 1989，《東海新聞》第10期，1989年3月28日出版。
- 1990a，《東海新聞》第17期，1990年3月21日出版。
- 1990b，《東海新聞》，1990年9月出版。
- 1990c，《東海新聞》第23期，1990年12月22日出版。
- 1991a，《東海新聞》第24期，1991年3月22日出版。
- 1991b，《東海新聞》第25期，1991年5月25日出版。
- 1991c，《東海新聞》第27期，1991年10月5日出版。
- 1991d，《東海新聞》，1991年11月18日出版。
- 1992，《東海新聞》，1992年1月11日出版。
- 2005，《東海新聞》，2005年10月13日出版。
- 東海大學學生會/學生議會，2005，〈從社區的角度看東海—談東海人、文、地、產、景的另一種想像〉座談會記錄，刊於《東海新聞》，2005年10月13日。
- 東海女研社，1991，〈從海報事件解讀男女權力的暗盤〉，刊於《東海新聞》第27期，1991年10月5日。
- 東海台研社，1993a，《思想枝》第3期，1993年3月22日。
- 1993b，《思想枝》第4期，1993年10月。
- 1994，《思想枝》第5期，1994年3月23日。
- 東海成報新聞社，2001，《東海成報》，2001年4月10日出刊。
- 2003，《東海成報》，2003年12月22日出刊。
- 東海希望聯盟，2000，〈我們還要忍受下去嗎〉文宣，自印。
- 2001，〈510替我們辛苦的媽媽請命〉文宣，2001年4月，自印。人間台研工作室檔案資料。
- 東海環境生態社，1990，《綠色大地》第5期，1990年10月。
- 東潮（吹浪之鯨社），1987，《給你大一---兼給中區所有的大學新生》，1987年10月。
- 1988，《東潮》第4期，1988年5月25日。
- 林本炫，1997《教育改革的民間觀點》，林本炫主編。台北：業強。
- 林作修、陳明志、黃小真，1999，〈東海別墅的前世今生--談別墅區的景觀變遷〉，刊於《東海采風》第4輯。
- 林育群，2000，〈應該召開校務發展大會--從1018公聽會談起〉，刊於（新）《東潮》創刊號，2000年11月。
- 2001a，〈新校區、老問題--學生的權益在哪裡？〉，刊於（新）《東潮》第3期，2001年1月。

- 2001b,《東海大學校外住宿空間建築類型發展之研究—以東海別墅區為例》,2001年6月,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論文。
- 林佳臻與王映涵,2004,〈探討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創辦及演變--就組織、制度、課程規劃與結業學員意見來討論〉,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第十期報告,刊於《東海采風》第8輯。
- 林碧堯,1999,〈相思林,東海的相思--第三次相思林事件〉,自由時報,1月20日。
- 2003,〈切割東海大學,淘空路思義教堂〉,自由時報,11月13日。
- 花松村,1996,《台灣鄉土全誌--第一冊(台灣總說、台灣省)》,花松村主編,周而親等編輯。台北:中一。
- 邱炫元,1991a,〈「學生自治」的探尋—歷史的回顧與省思〉,刊於《東海新聞》第24期
- 1991b,〈校園中的女性主義〉,刊於《東海新聞》第27期。
- 侯念祖,1993,〈又有一個賊要來了〉,刊於《思想枝》第4期。
- 2003,〈對於台中,東海做了些什麼?〉,「蜂報」部落格
<http://www.cyberbees.org/blog>,2003/10/18。
- 南方朔,1991,《「反」的政治社會學》。台北:久大。
- 建築系學生(署名),1999,〈東海人你為什麼不生氣?〉,自印。刊於《從相思出發》第25-26頁。
- 柳琬玲,1993,〈教育內容公私不分!教育資源公私有別--從相思林看公私立大學分配不均的問題〉,《人間札記》第14期。
- 洪世謙,1994a,〈對校園刊物的反思〉,刊於《思想枝》第5期。
- 1994b,〈前人種樹,後人砍樹--相思林土地問題近況報導〉,刊於《人間札記》第15期。
- 洪裕程,2000,《運動—安身立命於無以為家》,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昌智,1988,《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
- 胡德夫,2005,《匆匆》(音樂CD),野火樂集製作。台北:參拾柒度製作有限公司。
- 范雲、吳介民等,2003,〈青春懷胎的理想主義—探懸歷史洪流中學運世代的軌跡與痕跡〉,《當代》雜誌188期。

- 范雲等，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1993年初版一刷。台北：前衛。
- 夏鑄九，1970，〈台灣的大學建築〉，刊於《建築與計畫》雙月刊第10期，建築與計畫雜誌社出版。
- 1995，〈全球經濟中的台灣城市與社會〉，刊於《台社》第20期。
- 1995，〈都市過程、都市政策和參與性的都市設計制度〉，刊於《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1987--1992》，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1997，〈重構公共空間—理論的反省〉，刊於《身分認同與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論文集》。香港：牛津。
- 1999，〈市民參與和地方自主性：台灣的社區營造〉，《城市與設計學報》，第9/10期，1999年9月。
- 2005，〈全球化下對社區營造的理論再思考〉，刊於九十三年度「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嘉義縣社區規劃師培訓進階班課程之學員手冊，2005年2月16日。
- 夏鑄九，成露茜，陳幸均，戴伯芬，2002，〈朝向市民城市：台北大理街社區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6期，頁141-172。
- 孫治安，1990a，〈東海是誰的一對最近校務問題之省思〉，刊於《東海新聞》第21期。
- 1990b，〈另一個角度看「東海是誰的？」〉，刊於《東海新聞》第23期。
- 1991a，〈學術的歸學術，人民的歸人民—並答你的名字人民〉，刊於《東海新聞》第24期。
- 1991b，〈再論知識份子與中國社會-並答「知識學生與人民民主」〉，刊於《東海新聞》第25期。
- 秦鳳英，1992，《知識菁英對威權體制民主化之影響研究—台灣「大學」雜誌個案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袁興言，2000，《大學校園設計—以東海力行路地區為例》，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
- 財訊雜誌社，1998，《財訊》雜誌11月號。
- 骨頭，1999，〈女人、相思林與危險事物〉，刊於《從相思出發》第34-35頁。
- 張芳玲，1990，〈老少東海〉，《人間札記》第3期，東海大學人間工作坊發行。
- 彩繪大學路發起社團（女研社、東風社、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1994，《聯合聲明》，自印。
- 梁實秋，1978，《遠東英漢大辭典》。台北：遠東。
- 梅可望，1985，〈東海與我—東海三十年代序〉，刊於《東海三十年》。台中：東

海大學。

---1998,《從憂患中走來：梅可望回憶錄》。台北：天下遠見。

莊雅仲, 2003,《社會運動做爲一種志業—199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網絡的形成》,發表於「重理想象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文建會主辦,12月20、21日,台北。

許達然, 1982,《含淚的微笑》。台北：遠景。

郭俊銘, 2001,《政府遷台後我國高等教育政策演變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映君, 1997,《不可告人的愛情紀事》。台北：九歌。

郭紀舟, 1990,〈你的名字叫人民〉,刊於《人間札記》第4期。

--1991a,〈知識學生與人民民主—簡答「學術歸學術,人民歸人民」〉,刊於《東海新聞》第25期,。

--1991b,〈東海的校園規劃〉,《東海新聞》第27期。

--1999,《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野百合通訊, 1992,《野百合通訊》創刊號,1992年11月。

--1993a,《野百合通訊》第2期,1993年2月。

--1993b,《野百合通訊》第3期,1993年3月。

--1993c,《野百合通訊》第4期,1993年9月。

--1993d,《野百合通訊》第5期,1993年12月。

--1994a,《野百合通訊》第6期,1994年5月。

--1994b,《野百合通訊》第7期,1994年9月。

陳光興, 1994,〈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刊於《島嶼邊緣》第10期。

陳光興/Stuart Hall, 1998,〈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唐維敏編譯。台北：元尊文化。

陳信行, 2004,〈我的野百合〉,《台社》季刊第54期。

陳信宏、陳葆光、陳彥伯, 1999,〈校園民主先驅者--東海學生會〉,刊於《東海采風》第4輯。

陳政亮, 1990a,〈論東海生活品質之惡化〉,刊於《人間札記》,第2期第3版

--1990b,〈你的,就是你的?--從相思林事談私有制的侷限性〉,刊於《人間札記》第3期,。

--1993,〈阮大年的第一場仗〉,刊於《思想枝》第3期。

陳昭如, 1999,〈東海大學相思林保衛戰的啓示〉,中央日報,1月22日。

- 陳昭穎，2001，《從菁英走向大眾：台灣高等教育擴充過程之政策分析》，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柏偉、周倩而、顧家銘，〈大學社區運動：校園運動長期經營的進一步思考〉，《野百合通訊》第3期：41-42。
- 陳雅芬，1992，〈女舍奇譚〉，刊於《人間札記》第9期。
- 陳鍾文惠，1992，《陳錫恩傳》，自印。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提供。
- 舒詩偉，2003，《拉美地誌，魔幻行腳》，自印。
- 馮朝霖、薛化元，1997，〈主體性與教育權〉，刊於《教育改革的民間觀點》第69-122頁，林本炫主編。台北：業強。
- 黃凡，2004，《大學之賊》。台北：聯經。
- 黃文興，1996，〈後記--校園社區意識的種籽〉，刊於《東海采風》第1輯。
- 黃武東，1989，《黃武東回憶錄》。台北：前衛。
- 黃敏楨，1995，〈台灣私立大學學生住宿問題之政治經濟學分析—淡江大學個案〉，《台社》季刊第19期。
- 黃新高，〈先鋒隊、校園群眾與校園運動—思考校內長期經營的面向〉，《野百合通訊》第2期：19--21。
- 黃麗玲，1995，〈新國家建構過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社區共同體論述分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99，〈從文化認同轉向區域治理—921地震災後重建工作對「社區總體營造」論述的挑戰〉，《城市與設計學報》，第九、十期。
- 搶救相思林遊行發起人，〈紛亂的告白〉，1990，刊於《東海新聞》第22期。
- 楊明敏，1992，〈學運的精神分析〉，《島嶼邊緣》第3期。
- 楊牧（葉珊），1998，《葉珊散文集》。台北：洪範。
- 1999，《柏克萊精神》。台北：洪範。
- 楊祖珺等，2005，《我在凱達格蘭等你：2004年320--520抗爭紀實》，楊祖珺主編。台北：桂冠。
- 溫舜光與陳培梅，2004，〈東海保衛戰--「2003年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地底」事件之省思〉，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第十期報告，刊於《東海采風》第8輯。
- 解構群，1991，〈從空間結構談綜合大樓〉，《東海新聞》1991年11月18日。

- 詹明憲，2003，《多核心都市空間轉化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1986-2002）》，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碩士班碩士論文。
- 廖敏達，1993，〈一曲相思夢未了〉，《人間札記》第13期。
- 廖雅嵐，1993，〈三面埋伏--綜合大樓、聯外道路、郵政總局〉，刊於《人間札記》第14期。
- 榮譽制度推行委員會，1969，《大度風》第1期，1969年10月出版。
- 1970，《大度風》第6期，1970年1月出版。
 - 1971a，《大度風》第7期，1971年5月出版。
 - 1971b，《大度風》第8期，出版日期不詳，依內容推斷應在1971年9月。
 - 1972，《大度風》第9期，1972年6月出版。
 - 1977，《大度風》第10期，1977年6月出版。
- 漢寶德，1970，〈教育精神之象徵-學校建築所傳達之訊息〉，《大學》雜誌第31期：9--14。
- 趙彥寧，1999，〈當相思林不成林--追尋原來的東海〉，聯合報，1月20日。
- 趙剛，1990，〈論現階段無住屋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社會學的批判〉，《當代》雜誌53期。
- 1994，〈甚麼是「民主」？甚麼是「公共」？杜威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與重建〉，《台社》季刊第25期。
 - 1998，〈關於一場春雨後消失的蔣介石銅像〉，刊於《四海困窮：戰雲下的證詞》第340--343頁。
 - 2000a，〈如今批判還可能嗎？---與汪暉商榷一個批判的現代主義計畫及其問題〉，《台社》季刊第37期。
 - 2000b，〈社會學要如何才能和基進民主掛勾？---重訪米爾士的「社會學想像」〉，《台社》季刊第39期。
 - 2001，〈為什麼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台社》季刊第44期。
 - 2005，《四海困窮：戰雲下的證詞》。台北：唐山。
- 厲卓正，《綠色城市交通政策的形成過程--市民社會主體性的空間實踐》研究計畫書，自印。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城鄉規劃組碩士論文研究計畫書。
- 歐正明，2003，〈回應「切割東海大學，掏空路思義教堂」〉，自由時報，2003年11月17日。
- 歐保羅，2000，《尋找印記》，歐保羅口述，東海校牧室錄音/訪問，黃文興編寫、

- 自印。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收藏。
- 蔣勳，1987，《大度·山》。台北：爾雅。
- 蔡其昌，1991，〈打造美麗島的新圖象--從「民間社會」到「人民民主」的歷程〉，刊於《人間札記》第4期。
- 蔡瓊瑩、江淑君，2003，〈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規劃之反思〉，刊於《東海采風》第7輯。
- 鄭禎樺，2001，《東海大學校園景觀的變遷》，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碩士論文
- 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風華》。台北：聯經。
- 鄧丕雲，1993，《八〇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
- 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1991，〈回應濁水溪「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一文--誰的理性？那一門子客觀？〉，刊於《東海新聞》1991年11月18日。
- 濁水溪社，1991a，《濁水溪》第1期，1991年5月3日出刊。
--1991b，《濁水溪》第2期，1991年10月14日出刊。
--1993，《濁水溪快訊》，1993年3月16日出刊。
- 蕭名宏，1997，《草根動員--大學城與大肚山反規劃運動之分析》，東海大學社研所碩士論文。
- 賴人碩，1999，《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的構築性探討》，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 賴志彰，1997，《投機城市的興起--戰後台中都市空間轉化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論文。
- 錢永祥，2004，〈公共領域在台灣：一頁論述史的解讀與借鑑〉，刊於《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李丁讚等著。台北：桂冠，。
- 戴曉霞，1999，〈市場導向及其對高等教育之影響〉，教育研究集刊，第42輯，頁233--254。
---2001，〈全球化及國家/市場關係之轉變：高等教育市場化之脈絡分析〉，教育研究集刊，第47輯，頁301-328。
- 顏美玲，2003，《台灣高等教育政策與實施成效研究：1994年教改政策與WTO效應之分析》，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 羅雅美，1991，〈東海別墅社區調查之實踐意義〉，刊於《人間札記》第7期。
- 關華山，？，〈東海大學校園可持續性紀事〉，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社提供。

護林者，1992，〈刀下留林〉，《東海新聞》第 28 期。

顧憲成，1991，〈東海「土地公」傳奇〉，刊於《大度山》第 9 期。

網站資料

1. 台中學網站，<http://www.taichung.fcu.edu.tw/>

2. 東海大學公共關係室，〈關於「市政路延伸路段通過本校農牧場東側案」之校長公開說明信〉，東海新聞網

<http://www.thu.edu.tw/thunews/detail.php?newsID=324&prevID=38>

3. 東海校牧室 β 計畫網頁，<http://mail.thu.edu.tw/~better/english/e-better.htm>

4. 侯念祖，〈對於台中，東海做了些什麼？〉

<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144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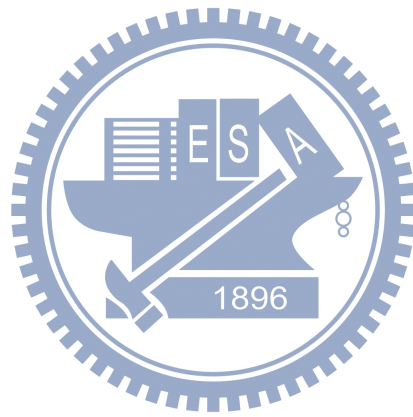
5. 苦勞網社會運動資料庫，<http://www.cooloud.org.tw/>

6. 陳福裕，〈從反帝的人民運動到右傾機會主義〉，刊於夏潮聯合會網站

<http://www.Xiachao.org.tw/>



附 錄



附錄一 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事件年表

年份	月份	事件	備註
1987	2	約農河加蓋事件	約農河加蓋事件
	5	5.29 興建「新宗教中心」說明會	
	6	6月中旬發生遠東街、國際街居民張貼「東大學生十大罪狀」海報及投書媒體事件 6.17 興建「新宗教中心」第二次說明會	
	9	9.29 《東潮》創刊	東潮成立
	10	東潮—「給你大一」專輯出刊	
	11	11.4「東潮說明會」於郵局信箱間廣場舉行	
1988	1	東海大學得悉工業區設立電鍍廠消息，校內發起抗議行動	電鍍廠事件
	3	3.3 課外組舉辦「電鍍工廠專業區」說明會	
	4	4.18 興建「新宗教中心」第三次說明會	
	8	8.17/8.18，谷關研討會，決定成立東海學生會	
	9	大度山社成立	
	11	《東潮》第4期出刊	
	12	東風社「校園事務觀察小組」成立	
1989	1	新學生自治制度代表大會（制憲大會）	
	2	新宗教中心動工	
	4	4.18 工業局宣布廢止「電鍍專業區」計畫	
	5	5.18 第一屆東海學生會正副會長及議員選舉投票	東海學生會成立
1989	9	9.21 人間工作坊成立暨第一次社員大會	
1990	1	1.12 《人間札記》試刊號出刊	
	3	3.16--3.22 「三月學運」	
	5	由於東海別墅房租上漲，幾千名學生在男女生指導室前大排長龍，爭取一千兩百個床位	
	6	6.11 郵政總局開始砍伐東海相思林引起學生注意 6.14 第一篇搶救相思林海報貼出 6.16 由環生社、野鳥社、食科系、生物系數名同學組成「搶救相思林聯盟」 6.19 信箱間說明會 6.20 相思林遊行 6.22 東海九名師生代表北上至郵政總局洽談相思林地處理事宜。	相思林事件

	7	7.9 校方訓育委員會研討懲處參與遊行學生方案，要求侯念祖繳交報告書並公開道歉。 侯念祖表示：無法以個人名義做出任何說明。 7.30 校方、交通部、郵政總局等達成共識，同意東海收回所贈與的相思林地，並由東海購回等值台糖土地交換。 7.31 行政會議通過興建「綜合教學大樓」	
	8	8.25 東海校方召開「訓育委員會」決議：侯念祖、陳政亮、史哲、郭紀舟等四名學生應予嚴厲糾正，交由師長嚴正開導，務盼徹底反省，改正錯誤，永不再犯。	
	9	《東新》刊出政理所孫治安的文章，引發「東海是誰的？」校園論戰	「東海是誰的？」論戰
	10	10.12 <人間札記>第 3 期出刊，二版「相思林專輯」	
1991	5	5.25 《東新》刊出孫治安和郭紀舟兩人的對話文章，「東海是誰的？」論戰結束 (日期不明)東海女研社成立，發生「女研社海報事件」	
	6	6.14 「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公聽會	
	10	10.14 《濁水溪》第 2 期出刊，內有〈興建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一文 10.31 國民黨中知青黨部以及孔識孝辦公室，在學生壓力下正式遷出東海校園。行政會議決議。以後任何政黨都不得在校內設置辦公室。	綜合大樓論戰
	11	11.18 「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發表〈回應「興建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一文於《東海新聞》	
1992	6	6.18 《人間札記》第 10 期出刊--「社區運動專題」	新東村納骨塔抗爭事件
1993	3	3.2 「校刊」報導綜合教學大樓即將興建，地點位於中正紀念堂與圖書館後方的相思林。 學生社團貼出海報，質疑學校在未公開說明的情況下，動工興建綜合大樓。 3.9 社會系、資訊系及部分化學系同學，於全校升旗時拉白布條，抗議校方執意興建綜合教學大樓 3.11 「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公聽會 3.12 東海學生成立「保護相思林聯盟」 3.22 「保護相思林行動聯盟」特刊出刊	二次相思林事件 (綜合大樓事件)
	4	4.1 聯盟舉辦哀悼相思林說明會	

	5	綜合教學大樓正式動工，學生於相思林繫上黃絲帶，表示對校方執意興建綜合大樓的不滿	
	8	8.26 郵政總局派員砍伐相思林，準備興建「電腦備授中心」，引發學生於校內張貼海報抗議，並組成「保林聯盟」 「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正式成立	三次相思林事件
	9	9.10 「保林聯盟」北上陳情 9.15 郵政總局允諾停工六個月 9.20 「保護相思林行動特刊」出刊 9.25 台中市府通過「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案」決議穿越東海校地。校方召開「校產保護及處理委員會」會議，決議函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廢除此計畫。	工業區聯外道路事件
	10	10.21 畜產系同學發現實習玉米田被開挖，計畫興建八米寬的聯外道路，引起學生抗議	農牧場事件
	11	11.5 學生議會臨時提案要求學校停止穿越農牧場的道路施工，並召開公聽會 11.15 「農牧場闢路事件」溝通說明會 11.19 「農牧場闢路事件」第二次說明會	
1994	1	1.6 台灣鄉土文化社成立 1.28 東海董事會臨時動議提案闢劃「德耀路」 1.29 行政會議通過闢劃「德耀路」	
	4	4.1 「收回相思林地」說明會	三次相思林事件
	8	郵政總局電腦備援中心開始整地	
	9	9.17 「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第一期培訓班開始上課	
	10	10.19 學生社團舉辦「相思林週」活動，悼念消失的相思林地 10.30 三十九週年校慶，「德耀路」落成剪綵	德耀路大石頭事件
	11	11.7 學生議會議長及秘書長因「德耀路大石頭事件」請辭，學生會會長亦於議會中向全校同學致歉 11.10 「彩繪大學路（德耀路）」活動 11.11 噴漆事件 11.18 東海學生會舉辦「德耀路公聽會」	德耀路大石頭事件
1995	2	「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完成《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為創校以來第一本具專業性與整體性的校園規劃報告書	
1995	10	10.13 召開「相思林郵政總局用地規劃說明會」，有	

		學生社團於場外拉白布條抗議	
	11	「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出版	
1996	4	4.16 學生會、人間、台研等社團對興建科技大樓一事提出質疑，不久後理學院六系系學會貼出海報，表示支持興建科技大樓。 4.29 台研、人間「校園規劃停、看、聽」小冊子出版	科技大樓事件
	5	5.20 女研社發起「新五二〇 W.C.學潮」，要求校方重視校內女廁空間。	
	6	《人間札記》第 17 期出刊--「科技大樓事件」專題	科技大樓事件
	10	10.29 由於科技路禁止通行機車，引發校內研究生抗議，舉辦「研究生車輛通行證問題座談會」	
1997	2.	2.22 郵政總局「電腦備援中心」動工	
	9	開學後因新生報到人數過多，造成女生宿舍欠缺 106 個床位。 9.24 學生議會召開宿舍床位不足事件公聽會	
	10	10.8 東海學生會召開宿舍床位不足事件公聽會	
1998	3	3 月初校內學生社團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聲援小惠，並要求警方負起行政疏失的責任 3.5 小惠事件遊行，約有三百人參加 3.16 「聲援小惠，同來守夜」活動	小惠事件
	4	4.2 「四二公聽會事件」學生會幹部和部分議員於茂榜廳外發生嚴重衝突 4.16 東海大學舉辦「中區大專院校處理性侵害事件工作研習會」	四二公聽會事件
	6	6.17 行政會議通過，自 87 年度下學期之後，不再於註冊四聯單中代收學生會、學生自治會會費	
1999	1	1.15 東海學生發現工人在砍伐相思林 1.16 人間、台研、女研社學生在相思林地集合，要求校方停工。隨後至校長室抗議。由於校長出國，學生決定 1.18 日再至校長室前抗議。 1.18 「118 停車場事件」上午東海學生在校長室前集合，佔領校長室達十個鐘頭，晚間得到校長延遲動工的許諾	118 事件
	2	科技大樓動工	
	3	3.1 《從相思出發》出刊 3.4 公共論壇	

		3.8 紀錄片「王校長的寒假作業--118 相思林事件現場紀實」放映會 3.11 第二次公共論壇 3.12 相思林植樹活動 3.16 學生機車停車場公聽會	
	4	4.1 第三次公共論壇。大陸六四民運領袖王丹訪問東海。	
	5	5.4 「三大新建工程」公聽會	
	6	6.3 「東海校園工程參與程序規劃草案」公聽會	
	7	7.15/7.16 「八仙山一級主管會議」通過新校園建設公告程序草案	
	10	10.27 行政會議通過涉及校園規劃制度改革的三項提案	
	12	12.2 「V 大樓改建公聽會」	V 大樓事件
2000	1	1.6 校建會討論 V 大樓改建事宜	
	4	4.1-4.10V 大樓改建案經媒體報導，引發外界及廣大校友關切，校園中湧現反對聲浪。 4.15 學生於校務會議外陳情，會議結束後，在和學生溝通後，校長允諾停止進度，留待公聽會討論後決定。	V 大樓事件
	5	5.5 「V 大樓公聽會」，決議由建築系師生規劃「東海大學教學區整建規劃案」後，依規劃案內容進行討論後，決定未來校園長程規劃之內容。	
	10	10.4 行政會議討論「東海大學教學區整建規劃案」內容 10.18. 「V 大樓公聽會」討論「東海大學教學區整建規劃案」	
	12	12.27 召開「第二教學區規劃」公聽會	第二教學區爭議
2001	3	3.14 行政會議通過「教學區第一期新建工程興建空見需求內容及地點案」正式決定改建 V 大樓，興建人文大樓。 3 月下旬，東海學務處公告，將裁減三百多個床位，緊縮學生宿舍容量，引起學生強烈反彈。 3.28 「東海希望聯盟」發出新聞稿，要求校方正視學生住宿權利 3.31 「東海希望聯盟」學生在校門口抗議，要求停止校門口改建工程，解決學生宿舍床位不足問題。	宿舍床位不足事件 校門口事件

	4	4.13 發生「成大 MP3 事件」 4.27 「東海希望聯盟」發起「還我住宿權，不要 A 我錢」連署活動，反對「變相高學費」	成大 MP3 事件
	5	5.7 東海校方函給「東海希望聯盟」學生家長，要求家長注意學生在校行為。學生強烈反彈，認為是新白色恐怖。 5.9 「東海希望聯盟」及各皆聲援的社運、學運、學術團體，在校長室門口外記者會，譴責王亢沛校長及校方的行為。 5.10 「510 為我們辛苦的媽媽請命」活動在校長室前舉行。 5.30 「第二教學規劃」第二次公聽會	507 東海校園新白色恐怖
	12	12.27 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規劃公聽會	
2002	4	貓頭鷹出版社《東海大學校園建築步道》一書出版	
	11	11.12 人文大樓新建工程開始動工	
	2	2.26 召開第二教學區「管院大樓」興建公聽會	
2003	1	因應東大路拓寬計畫，東大路兩側住戶組成「榮總社區團結聯盟」進行持續的陳情、抗議、遊說活動	反東大路拓寬
2003	5	媒體報導，工業區廠商因東海大學屢次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案，憤而揚言：『路開不通，永不錄用東海學生』。東海校長王亢沛及學生會長、學生社團對工業區部分廠商的非理性言論表示不滿與遺憾。	
	6	《東海采風》第 7 期出刊，對第二教學區規劃案在交通、資源運用上的問題提出質疑。	
	10	10.8 東海學生在網路、BBS 熱烈討論教堂聯外道路問題，學生團體「東海精神團結陣線」在網路上張貼公告，號召同學加入網路連署，捍衛校園 10.9 各大媒體持續台中工業區廠商提案台中市政府，興建穿越東海校園的聯外道路東海校友、教授紛紛發表文章於媒體批評台中市政府決策。 10.14 東海人間/台研社於校內張貼海報、擺設連署簽名攤位，並至各教室進行宣傳，晚上召開第一次說明會。 10.15 東海精神團結陣線加入連署簽名活動 晚上東海人間/台研社幹部，開始至學生宿舍發送刊物，宣傳連署簽名活動 10.21 召開第二次說明會 攤位簽名結束，改由各系、各班級傳送連署單	2003 年「東海保衛戰」

	<p>輔仁大學黑水溝社發表「輔大黑水溝聲援東海師生捍衛校園行動聲明」</p> <p>10.28 「東海快閃族」網路遊行行動開始</p> <p>晚上召開第三次說明會</p> <p>東海人間/台研、東海精神團結陣線、學生會及各系學會會長共同開會討論下一波行動</p> <p>10.29 快閃族行動餘波蕩漾，仍有部分學生或校友繼續對台中市府網站進行攻擊，造成台中市府多個局處信箱故障。</p> <p>東海人間/台研開始至中文、社會、外文、法律等系課堂，宣傳校園公投。</p> <p>中午在東海外文系廣場舉行露天說明會</p> <p>活動發起人之一的鍾瀚樞接到一通自稱是教育軍訓處的「關切」電話，表示為了維護學生安全，希望鍾瀚樞向教育部報告遊行時間、連署人數、參與人數等相關資料。新社會學生鬥陣立即發佈「抗議政府動用教育部軍訓系統進行校園情蒐」文宣</p> <p>10.30 媒體報導，台中市府多個局處信箱被「東海快閃族」抗議郵件塞爆，晚上於社會系舉行說明會</p>	
11	<p>11.3 東海學生社團及榮總社區民眾至台中市府前舉行記者會，表演行動劇</p> <p>11.4 東海校園百人遊行中午 12:30 由綜合大樓出發，經相思林、文理大道、路思義教堂、教職員宿舍區，最後至農牧場舉行哀悼活動結束。</p> <p>11.5 校園公投，共有八千九百人參與投票，總投票率七三·六一%，創東海學生自治史上最高的投票率。其中反對開路票數達八千八百四十人，贊成者二十六人，廢票三十四張</p> <p>台中市議會數位議員發表聲明，呼籲東海學生保持理性</p> <p>11.13 東海化學系林碧堯教授於自由時報發表「切割東海大學，淘空路思義教堂」</p> <p>11.17 台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歐正明，於自由時報上發表『回應「切割東海大學，淘空路思義教堂」』，對工業區開路提案進行辯護</p> <p>11.22 文化研究學會舉辦的第 25 次文化批判論壇--「古根漢與路思義」於東海銘賢堂舉行</p> <p>11.24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播出「東海保</p>	

		衛戰」專輯	
2004	3	人文大樓完工	
	11	東海人文大樓榮獲首屆「遠東傑出校園特別獎」佳作獎	
2005	1	1.4 學生會及數個學生社團聯合舉辦「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規劃座談會」 1..11 西屯地區八個村里的居民，向環隆科技公司表達抗議	
	3	3.8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東大路拓寬案，決議延至下次會議再議。 3.16 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第一期工程動工 3.20 福瑞社區發展協會及東大路兩側居民，舉行「量身打造東大路活動」	反東大路拓寬
	8	8.23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東大路拓寬案	
	10	校解社、人間/台研及學生會等數個學生社團於校內舉辦「東海週--六個角度看東海」活動	
	12	12.9 人間/台研及「手（守）戶東海行動聯盟」於校內張貼海報，呼籲師生注意「市政路延伸通過東海農場案」 12.24 「平安夜·救東海」遊行，有 200 多名名師生從校長室出發，遊行至校長公館前，要求學校對「市政路延伸案」不可退讓 12.28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決議「市政路延伸案」延擱再議	「平安夜救東海」遊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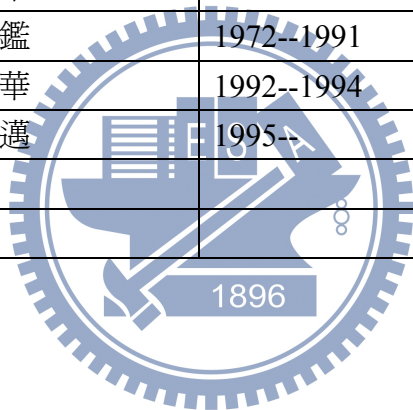
附錄二 東海大學相關人員任期

一、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秘書長：1953—1980

姓名	時間
芳威廉 (William P. Fenn)	1951--1970
勞比 (Paul T. Lauby)	1970--1980

二、東海大學董事會歷任董事長

	姓名	時間	備註
第一任	杭立武	1953—1956	
第二任	張靜愚	1957—1959	
第三任	周聯華	1960--1961	
第四任	蔡一鏗	1962--1969	
第五任	周聯華	1970--1971	
第六任	查良鑑	1972--1991	
第七任	周聯華	1992--1994	
第八任	吳清邁	1995--	



三、東海大學歷任校長：

	姓名	時間	備註
第一任	曾約農	1955—1957	
代理校長	吳德耀 (文學院院長)	1957—1958	
第二任	吳德耀	1958—1971	
代理校長	唐守謙 (教務長)	1971—1972	
第三任	謝明山	1972—1978	
第四任	梅可望	1978—1992	
第五任	阮大年	1992—1995	
第六任	王亢沛	1995—2004	
第七任	程海東	2004--	

四、1986—1988 年東海行政會議之學生代表

時間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	生促會會長	研聯會主席
1986	李美華	方孝鼎	
1987	李若蘭	黃郁雯	鄭中堅
1988	王國翹		郭達鴻

五、東海學生會歷任會長、議長、生促部長

	時間	會長	副會長	議長	副議長	生促部長	備註
1	1989	郭達鴻	蔡百誠	林建成	吳國鑫	張元正	
2	1990	林仲亨		李清源			
3	1991	蕭武昌	趙仁方	葉慶天		李佳振	
4	1992	莊國秋	莊夏晶	趙延德* 鄧道鴻	廖昱楨		* 因故中途去職
5	1993	蔡森源	張益祥	陳奕祥			
6	1994	林祐憲	吳俊毅	邱宏忠	楊琇雁		
7	1995	劉維鈞	石露露	楊琇雁			
8	1996	吳明孝					
9	1997	陳成詮	詹宏彬* 曾煥程	洪萱芳		林海平	* 因故中途去職
10	1998	施榮龍	廖慧如				
11	1999	彭雋屹	石毓菁	曾煥程		林德宇	
12	2000	林德宇	魏富祺			吳瑟致	
13	2001	蔡明烝	蕭芬芳	魏普聖		辜國展	
14	2002	李偉立		陳建龍	沈煥松	郭誌雄	
15	2003	賴鈺泓		陳永哲			
16	2004	吳思怡	林東毅	洪順堂			
17	2005	施志昌	李璟芳*	王萬斌	賴冠宇	金致涵* 陳弘鳴	* 因故中途去職

註 1：時間指上任時間，學生會任期一般為當年 5/6 月至次年 5/6 月

註 2：空白處為資料不足，無法查出人名，並非無人擔任該職。

附錄三 〈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芳威

廉

芳衛廉 (Dr. William P Fenn) 1952 年 4 月 2 日

文庭澍 譯 何佳燕 打字¹⁸²

我建議聯董會對於台灣基督教團體欲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我認為這所大學不應只是大陸任何一所大學的翻版，台灣需要的是不一樣的大學，既然是從無中生有，我們大可有機會創立一所不同形式的大學。我了解心想因襲過去大陸傳統大學的念頭很強，但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抵制這種想法，我們註定會失敗。以下是我心目中一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的特色：

一、這所大學應依籌備委員會上所說的：「造就具有特殊視野與終生奉獻精神的人，希望他們中的大多數將來以服務教會及國家為職志。」雖然我們應以最好的教育設備培育每一位學生的領導才能，但是我們不只以培育領導人才為唯一的目的，我們同時也希望造就一些「僕人」。

二、這所大學應與其所屬的環境密切連繫。雖然長久以來這些環境一直維持農業的形態，但是我們並不打算把這所大學建成一所農業大學，也不打算訓練這方面的畢業生，或造就一大批回農村工作的人。但畢業生不論將來在都市或在鄉村工作，他們應該不要忘記整個台灣至少有 80% 以上農村人口的利益。以最廣泛而又最富意義的話來說，這所大學應以服務台灣島上的居民為目的。

三、這所大學的課程設計雖以專業的性貫穿整個課程，但不應以技術性的專業為取向。大學教育不應只是某些工作或職位的訓練班，而是訓練出可以馬上適應社會、服務人群的人才，它以不限制一個學生未來的發展為目的。

四、這所大學使學生生活在各種觀念刺激的氣氛中，許多課程可以為適應台灣社會需要而設計，但所有課程可以為適應台灣社會需要而設計，但所有課程都應涉及基本的以及充滿挑戰的觀念。科學的課程要以文化為背景，而人文、社會學科的課程應賦予實質的意義，不可自限於象牙塔中，應由校外真實範疇提供的活動中達到此一目的，課程所應著重的是通才教育。

五、這所大學不是白領階級的養成所，不論男女同學都要養成勤勞的習

¹⁸² 感謝佛教大學的南華環藝所學生何佳燕，幫忙我繕打這兩篇基督教大學的重要文獻。

慣，有朝一日他們出了社會了才不會怕髒物沾身。勞動意味著學校用最少的服務人員、師生過著最儉僕的生活，勞動同時意味著對校外社區提供實際的社區服務，我認為貝利亞（Berea）和安提克（Antioch）兩所學院的獨特理論可以部分在台灣採行。

六、 民主觀念在行政上以及師生關係間都應有實際的表現，全體教職員都應投入。這意指學生儘管有成熟度的限制，但仍可決定他們自己的活動並在教育上參與行政與學術事務的討論。也意指教員有責任參與學校的基本決策，此為教育過程中學校逐步成長的要素。

七、 這所大學應避免各系自己閉門造車，教員追求的是真理而非自築高牆。學校應幫助學生了解狹隘本科系中更廣闊的關連性與其涵義，學校同時應鼓勵教師從事集體研究而非只埋首於個人計畫之研究。

八、 這所大學將是一所不超過五、六百人的小型大學，因為人數太多會危及基督教理想氣氛的發展與維持。雖然學校應維持學術上的高水準，但入學資格除了學業成績外，也應在學生性格與志向上與以充分了解。學費應從學生平均財力中核定，合於資格而無力繳交學費者不應摒除門外。

九、 為了配合學校的目標與資源，科別的設置應有限制，不是應有盡有而是有選擇性的幾個科目不斷的予以加強。適合設置的科目包括社會科學（理論與實際並重）、教育（理論盡可能少、實際內容盡可能多）、英語（實用與了解西方文化並重）、基礎科學（既不是不實際的純科學，也不是僅以職業為導向的應用科學）另外全體學生應修哲學與宗教課程。

十、 這所大學的校舍樸實，但並不是一無特色，事實用而不虛飾。此一校舍不僅由目前的條件所決定，且希望有一天這所大學能得到本地的支持。此校舍應與周圍景觀及所屬的環境相配合。

十一、 教員必須專任，因為只有全心奉獻教學與研究工作，才能充分以其理想與理念貢獻學校，長遠看來，這正是一所大學成形的基本要素。每一位教職員都可獲得較佳的生活待遇，這並非意味著高薪，而是指較公立學校待遇為優。薪資的給付也應顧及家庭的大小，譬如只有一個孩子的主任薪資與兒女成群的雇員薪資差別不大。

十二、 這所大學的教職員應是基督徒。我知道要求教師學術與基督教資格並列並不容易，可是過去在大陸的基督教大學十分強調這個條件的重要性。

十三、 這所大學雖具有國際性，但強調國際性並不表示抹煞其台灣的特性。國際性的合作在開始的階段有其重要性，西方人士的參與也在歡迎之列，不過我們需要的是一所真正為台灣人辦的基督教大學，所以西方人士與中國大陸人士應為從屬地位。

十四、 這所大學一開始即與教會保持連繫，因聯董會代表教會，所以應與其合作無間。爲了防止因用人不當而使學校管理脫軌，教會組織對學校的事務應有最高的決定權。這所大學不只是基督教大學，而且是與基督教會相連繫的大學，它不以狹隘的意義爲教會服務，應支持並強化對台灣教會的貢獻。

總之，我希望申明我的信念是——只有以上的十四條或其他要項共同成爲台灣某些人及某些團體的想法時才有意義，如果有任何與聯董會的目標不相符的計劃，加上共同合作的人無法全心全意地參與其事，聯董會參與的意願都會大大降低，因爲這種合作並非明智之舉。最後，我們應認清楚，聯董會面臨的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任務乃是教育。





附錄四 〈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東風》第40期社論

《東風》第40期社論，1973年1月

打字：何佳燕

多年以來，同學們一直在議論著學校的前途，認為必須要以新的活力，新的想像力，把創校的理想通過時代的需要重新賦予意義，隨著新學年的開始，新東海在新的領導、新的政策之下，正隨著廣大新生的腳步踏遍了整個校園，就在這樣一種新的氣象裡，我們樂於表示對新東海的熱烈期望。

無疑的，東海當然是朝著進步、發展的方向進行，但是什麼是進步、什麼是發展呢？是蒸蒸日上的「業務」嗎？是大班制、小班制嗎？是學校之大小、學生之住不住校嗎？我們完全承認諸如此類問題的重要性，但是我們無寧認為這些都是表面的問題，都不足以讓東海以教育的名義在社會上建樹偉大的貢獻。真正的關鍵是東海如何以一個現代大學的身份在現今世界的潮流和台灣現實的脈絡裡生存發展，只有以爲這樣的考量，一所大學才可能對它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作出有意義的貢獻，也才可能建立它本身的價值，請讓我們謹記著大學的先驅性對社會的重要，並藉此顯現出大學之社會性存在的價值，精神上的守殘抱缺，理想的忽視才是一所大學破落的根本。

例如，最近學校指出東海以後將在環境科學方面努力，以求貢獻社會，創造學校的價值，許久以來，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校方對東海底未來的嚴肅構想。這件事的本身就代表了一種活力和想像力，因而就值得寄予最大的期望，不過我們卻要進一步指出：這只是一步而已，只是新東海可以致力的一個途徑而已，就公佈的設計來說，還是不能建構東海的理想，還是不足以表達一所現代大學所面臨挑戰的本質，我們對東海的期望是什麼呢？以環境科學作楔子，我們願意站在青年的立場提出兩個建構現代大學教育價值的方向：「大學民主化」以及「大學社會化」。

最近十年以來，因爲科技壓倒性的進步，知識累積的「不連續」，經濟面底生產力的急劇更張，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卻受到了新人文主義、新理性主義之新思潮的既大且深的影響，它對社會意識的肯定，對個體平等自由的肯定，又挾著所涵蘊的龐大改革動力，深沉地震撼了整個西方社會，自人生觀、道德觀、宗教觀以至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的所有現存制度，都因而有各種程度的修正，並且這種改變還在方興未艾之中，這整個思潮所帶來之劃時代的改變的特性，完全由一件事情上反映出來：即青年人對一切既存制度的反省並努力創設出一套新的價值體系，而感受這種現象最深，衝擊最大也最早的，就是大學，

我國的教育因為升學主義的保護，其僵硬二十年如一日。或則說外國的例子不足以為訓，或則說本國的條件自成一格。請容許我們坦率地指出，本國社會會要求教育民主化、教育社會化的客觀條件是早已存在了，只不過是還有一些人習焉不察，仍然封閉在傳統的禁忌裡而已。台灣在物質生活方面是早已西化了，所以這些物質面的變化所帶來的文化上的改變，不論程度、型態如何，是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社會的——事實上由大家對污染、勞工、農民等等社會問題的關心，以及髮式、服飾、性等等態度方面的轉變，一個新興的時代早已揭開序幕了，豈是用傳統態度以「時髦」、「虛榮」等等代表無根移植的說法所能解釋得了的，大學必須具有前瞻性，必須掌握社會前進的潮流，必須如國父對付社會問題那樣，在病症還沒到積重難返之前，及早將自己貢獻給社會，以應合社會的需要，這樣的認識是改革必備的先決條件，在這樣的想法裡，我們所提出的「大學社會化」，是指大學以對社會的貢獻作為其存在的價值；而「大學民主化」是指現代大學在本質上所表現出來的共同參與精神。

限於東海所處的環境，我們以為環境科學正是東海對現實社會作出貢獻的一個好例子。不過正如上面所討論的，社會化是一種態度、一種認識、一種莊嚴的使命；而不僅僅是一種形式。在一種為社會貢獻的心態下，即使運用目前的資源面對目前的限制，大學的知識及人力仍可以作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結合，課程及設施的配合也必如水到渠成般解決。讓我們舉出學術層次的實例：民國歷史上，所有大學對本國社會的參與可能要以金陵大學農學院最為認真也最為成功。這樣的精神東海應該要繼續發揚光大，例如文學院對東西文化科際性的探討，就可以有助於本國近代巨變的認識和掌握，又如政、經、社三系對台灣社會基本資料，基本行為以及過去二十五年變遷軌跡的調查研究，再如理工學院各種型態的建教合作包括規定並安排學生下工廠實習等等，每一院系都可以緊密地與本國社會結合起來，都可以幫助學術在社會上生根，而社會的需要又轉化為學術上的發展，上面所舉也只是幾個例子而已。我們不必陳義太高，在目前就有許多極具意義的工作等著我們去做，我們必須認清，大學社會化不只是口號，它必定會變成大學存在的根本理由，能認清這些，能具有活力，不管多困難，不管多小的一步，我們是必定能開始邁步的，在學生方面，社會化在現階段可以透過實習、透過半工半讀、透過鼓勵學生社團對外服務等等來進行。

關於「大學民主化」的問題，歷年以來，數不清的學生刊物討論過它，鼓吹過它，也曾提出過若干可行的辦法，所以對這個問題，我們所要指明的，只是它的一個性質：這是一個心理建設的問題，不能認清時代的特質、潮流的導向、先進的經驗、問題的根本，不能覺悟到青年對現存制度的反省、教育意義的寄託，任何民主化形式都不會具有意義。在這裡，我們把過去的建議中，摘其歷久彌新者，重新提出：如鼓勵學生參與校內決策，（最近校長宣布歡迎學生就學生宿舍一事表達意見，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事實上，在現代機構中，隔離

感 (Alienation) 是最大的傷害，更不用論教育機構了，試回想同學們以往針對諸如校景的破壞，圖書館開架制的維護，榮推會的地位等等問題上反應出來的對於學校的關心，在國內是很少見的，十二年前榮譽制度的發起可說是學生與學校打成一片的最動人的例證。這是東海創校時代特具的風格，是至今猶影響及東海的校風，是至今猶令人津津樂道，引以為傲的。其他如保障學生的權益，讓學生組織（課外活動）有更大的自治權，又如讓學生在課堂裡能積極參與課程內容之商定等等，都是「大學民主化」必要的內涵。

只有透過新思潮的掌握、理想的追求，價值才得以成立，在此一現代化的新東海的契機中，我們以開創性的生命力勇往邁向社會化和民主化的大道，不僅可以開拓東海的新機運，抑且更能表現基督教大學的特質與精神。



附錄五 〈阮大年的第一場仗〉--陳政亮

陳政亮，1993年3月22日，刊於《思想枝》第3期

打字：陳慧中¹⁸³

在東海校園，平靜無事的三月最近又掀起了洶湧的學運波濤，在短短的一個禮拜之內，校園內舉辦了一次升旗典禮的抗議活動，兩場的戶外說明會，一場室內說明會；海報牆上、教室黑板，以及校園裡的許多角落到處看到許多的海報與傳單，記者們到處拍照訪問，要一探究竟：為什麼號稱民主開放的阮大年校長，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面對如此難以處理的學生抗議？是爲了什麼議題使得學生又開始集結，難道阮大年不比剛剛被學生趕下台的梅可望好？或者是東海的學生真的如此強悍，絕對不讓阮大年有些許喘息的機會，要對阮大年下下馬威？當我們走入東海校園，閒情的步道與兩旁的鳳凰，的確令我們難以想像是在這種地方有如此雄渾的反對力量。而在隨手拾來的傳單上聳動的標語說：搶救相思林！

當三月三日，由校方的機關刊物校刊發布了一個消息說：綜合教學大樓即將於四月動工，位置在東海僅存的相思林地。此一新聞一發佈馬上引起許多同學的注意。一開始在三月八日由人間工作坊首先以人間快訊的名稱製作了一份傳單，廣泛的宣傳此事，並且攻擊了校方的決策過程的問題，同時發布了一份由人間工作坊、台研社、環生社、女研社、野鳥社、多媒體社、辯論社以及東風社共同連署的聲明。聲明中嚴厲的批判校方整個決策過程的黑箱以及校務發展計劃的付之闕如。他〔她〕們問到：請問東海校務發展的原則何在？除了不斷加蓋建築物之外。同時提及兩年前在東海有史以來的第一場遊行——搶救相思林的歷史。

毫無疑問的，經過上次搶救相思林遊行之後，相思林已經變成了東海學生的象徵；這不僅僅是因爲它是東海學生運動有史以來最壯大的一次，同時對許多從事學生運動的同學來說，正是透過那次的遊行將校方決策黑箱的問題一舉提出抬面，並且將校方的顛預集中在梅校長身上，以此凝聚了東海校友的力量，而在一年後逼使其下台。當然，決策的黑箱對於學生運動來說一直是個議題，從有學生運動以來此議題便如影隨形的緊跟著每一次的抗議，不論是學生權的確定，反對特別權力關係，乃至於所謂學生政府的成立，這些聽來龐大的題目其實最先標舉出來的也不過是校方的決策不能獲得學生的認同罷了；只是對於『什麼是教育？』這個問題，運動事實上也無能提出一清楚的原則性對案，更

¹⁸³ 感謝陳慧中幫忙我繕打這篇文章的全文。

遑論對教育改革具體的內容了。而浮上檯面的總是『決策公開！』運動的口號與激昂的呼聲總是『學生權！』不管它用什麼曲折的方式提出。

然而運動的形式是不容我們的朋友們有太多的想像，就在三月九日，也就是社團發出聯合聲明的隔天，由社會系與資訊系的同學在升旗典禮時，拉起了白布條抗議校方的專斷。三月十日中午，上述社團舉辦了一場戶外說明會，公開於群眾面前指責校方，阮大年則與同學席地而坐，發表看法並與同學叫罵後離去。只是三月十日的報紙上，僅僅記得阮大年以校長之尊，席地而坐的民主風範，以及他純純的對東海的愛。

形勢急轉直下，阮大年誠懇的臉龐一下子吸引了許許多多熱愛看起來有長者氣度的校長的朋友。況且阮大年說，要在哪興建綜合大樓，他無權過問，因為這是建築設計專家的權利，尊重專家的設計才是對的。正如同訓導長在升旗典禮上對拉布條的同學說，此事應該要有良好的溝通，而他也無權過問此事；也正如學生會說，他們完全不清楚此事一般，整個東海大學的校方行政單位就剩下幾個建築專家，『專家治校』而且就僅僅剩下專家，在這幾天成了東海最佳的寫照。沒有人敢說教學大樓要蓋在相思林地，但同時也沒有人敢負責說：不會蓋在相思林地。

說明會隔天，三月十一日晚上，由學生會邀請了校長、建築專家、教務長、訓導長以及總務長等人，舉辦了一場室內說明會，同學們蜂擁而至，準備許多的問題要請益各『長』們。只可惜阮大年一開始說了一些話之後便離去了。只剩他愛東海的詞句仍不斷流傳，以及專家長們達一個半鐘頭的專業說明。從建築技術的眼光來說，專家總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同學們反對的意見仍然旺烈，聽不下所謂專家的話語。

專家說，其實他也不想蓋在相思林上，而且本來對於校園長期規劃的方案他也從不喜歡此事，只不過阮校長爲了申請教育部的一億九千萬經費，一定要趕在六月開工，所以不得不趕出一份『假的』設計圖，交給教育部以便應急，同時東海教室實在不夠用，於是要有一個地方能夠『假的』給教育部，又能『真的』對東海的教學空間有所幫助。而便在真真假假之中，專家兩天之內應急趕出設計圖，同時符合教育部最後期限，加上多嘴的校刊編輯，牽扯一齣荒謬大戲。

但是同學卻問，校園規劃到底能不能與整個校務發展配合？還是每次都是爲了應急亂幹一通？學生的人數到底要不要控制？還是每次學校沒錢就擴大招生，就成立夜間部，乃至於販賣學位給省政訓練班、企業家們，美其名社會服務，其實卻將大學教育的精神——非爲需求而授課，乃爲理想而教學——棄如蔽屣。同學繼續問道：好吧，東海到底將來要往什麼方向走？是要教育什麼東西呢？或是說，大學到底要是要幹啥？同學硬是不從技術層次去計算每一個東海學生要有多少平方公尺的教學空間，偏偏從教育的理念性的、原則性的角度

質問『什麼是教育？』

歷史縱使總是弔詭的，但此次卻不只是弔詭，而是上下顛倒；是學生關心什麼叫做教育的理念，而不是辦學的人在思考教育的理念，當然更不可能要這些辦學者實踐其教育理念了。由一個從不反省什麼是教育的辦學者來教育已經開始反省什麼叫做教育的學生，當然只好不斷強調要『愛』東海了，或者瞪眼看著學生在抗議，除了束手無策之外，恐怕便只能強調自己的苦處，以使用痛苦的臉龐博取學生的同情。一個大學，是學生在思考上走在前面，只好一切都相反過來，用頭在走路，而荒謬的用腳在思考。

但是，用腳思考也罷，用頭走路也罷，學生們這次可認真的反省，我們究竟要什麼大學？不僅僅像以前一樣只會嚷嚷：決策權！

當我們翻開東海的校史，裡面寫道，一開始建校時，原來景觀上的設計是要求要將所有的建築物全部置於樹木的環抱下，聞名的文理大道的盡頭原先就是相思樹林，人走到路底便要全然隱沒在樹林之中，所有的建築物皆要是平房，以便人可以在樹的覆蓋之下謙卑的學習。創校的人說：『這所大學不是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我們的課程不是爲了技術性的職業，而應著眼於各個範圍；我們要學生生活在思想的氣氛中，要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這所大學要有民主的觀念的實際表現……』因此東海的創立，一開始便不是爲了需求而建校，而是爲了一個超越性的教育理念才建校，所以東海是小班制；所以東海上至校長，下至學生每一個人皆要勞動教育，以便在勞動過程中『生活』，而不是生活在書本裡；所以要有通識教育，以便每一個人能成爲『全人』，而不是訓練有素的狗；所以創校的人說：『我們要純樸而不虛飾的校舍。』

這一連串的動人的信念，而今安在？當初創校的人無論有多少宏大的理想終究也是擋不住時代的洪流的；因爲在今日的任何一所大學裡，沒有任何一所是如此做，包括東海在內。今日的大學要培養的是有專門技術的人，是要徹徹底底的白領階級，要造就能夠爲各大公司所用的人，而非能夠投入生活的人，今日的大學越來越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就愈是像一所超級的補習班，或是職業的訓練所；而也不管訓練所中有多少談情說愛的故事，學生終究是要進入社會的大火爐，但是學生只是要學習如何降格去適應社會，而不是學習如何創造新的理想。

東海創校的精神宛如昨日之夢。

有些學生們卻仍然往此夢想艱苦的挺進。

專家說明會的隔天，三月十二日的中午，由台研社舉辦了第二場戶外說明會吸引了許多的人潮。他〔她〕們細數東海的轉變，他〔她〕們標舉了什麼是教育的問號，而校方沒有一人到場說明。

有人在報紙寫說，東海的相思林真是倒楣，有些校友打電話回來說：媽的！又要砍相思林。有些人說：東海教室真的不夠用了。有些人說：我們就是徹徹底底的功利主義。像是要不斷的反省相思樹林存在的意義一般，東海一個禮拜之內人聲鼎沸，熱鬧非凡，相思林成爲一個分不清真假的象徵物。

但是我們將此一事件放在歷史的長河中一看，我們才能逐漸理解它存在的意義。如果說兩年前的保衛相思林遊行是學生對校方強悍的爭取：學生對於校內任何事務要有一原則性的決策權的話，那麼此次相思林事件正是學生反省教育是什麼的開始。同時學生提出一原則性的教育理念，如同當年東海創校時的理想一般的堅定：大學不應再降格爲對社會的一種適應，不應屈從於工具與技術這個層次上的理性，而應當有一個更具創造性的人文空間；創造而非適應，批判而非盲從，改造而非臣屬；相思林正是此信念的象徵，學生要他長久的存在於東海大學，靜看東海別墅商業氣息的媚俗，以及日益屈從於公利社會的大學教育；學生要他長久的存在，讓它永遠的質問：什麼是大學教育？學生要它成爲一個問號，讓所有人面對它時，要謙卑的反省以及永無止盡的真理追求。

3.13 寫於大肚山



索引

ㄅ

巴赫金, 284, 285, 309
 白錫旻, 188, 200, 252
 貝聿銘, 1, 20, 43, 44, 58, 172, 229
 保護相思林行動聯盟, 125, 126, 131, 326
 畢律斯, 24
 邊界教育論, 281, 282, 284, 286, 287

ㄆ

跑宿舍, 288
 批判教育學, 7, 8, 10, 11, 280, 281, 289, 306, 313
 平安夜救東海, 12, 248, 249, 252, 253, 255, 293, 332
 評議委員會, 83, 165

ㄇ

馬克思, 31, 36, 40, 54, 115, 116, 180, 264, 279, 310
 梅可望, 9, 20, 23, 26, 27, 28, 33, 34, 35, 38, 39, 40, 41, 71, 78, 80, 82, 83, 84, 85, 86, 87, 90, 93, 94, 95, 96,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8, 120, 124, 138, 170, 171, 193, 194, 261, 263, 265, 274, 318, 333, 341
 孟東籬, 47, 185, 186, 271, 314
 夢谷, 46
 民學聯, 4, 146, 156, 279
 民主學生運動聯盟, 227
 牧場, 13, 14, 42, 94, 135, 143, 149, 150, 177, 233, 235, 237, 244, 246, 249, 250, 251, 294, 295,

323, 327, 331, 332

ㄇ

非正式, 10, 185, 186, 187, 189, 190, 196, 197, 199, 271, 276, 309
 反大肚山鄉街計畫事件, 199
 反高學費, 3, 5, 134, 146, 147, 185, 204, 232, 293, 301, 304, 306
 方孝鼎, 82, 89, 100, 109, 334
 芳威廉, 18, 21, 22, 29, 34, 171, 333, 335
 福瑞社區發展協會, 249, 332
 傅柯, 281, 284, 296

ㄏ

大度風, 22, 32, 40, 49, 50, 51, 52, 53, 61, 62, 63, 64, 66, 129, 321
 大度山工業區, 248
 大度山社, 54, 67, 69, 86, 89, 95, 100, 109, 110, 111, 112, 113, 118, 131, 136, 153, 154, 157, 158, 163, 164, 166, 167, 193, 231, 312, 325
 大革會, 1, 55, 96, 279
 大學之賊, 235, 243, 320
 大一全體住校制, 58, 59, 70, 288
 德耀路大石頭事件, 1, 57, 87, 143, 152, 154, 155, 156, 158, 169, 180, 264, 327
 鄧丕雲, 3, 40, 55, 69, 70, 81, 86, 88, 92, 95, 99, 100, 101, 106, 107, 108, 144, 146, 150, 151, 156, 158, 167, 179, 277, 279, 302, 305, 306, 322
 抵抗性認同, 6, 7, 8, 11, 195, 255, 290, 304, 305
 地籍問題, 120, 177

352 索引

- 地域主義, 10, 11, 141, 179, 232, 255, 296, 303, 304, 305
- 第二教學區, 12, 58, 109, 177, 202, 206, 214, 215, 216, 230, 240, 244, 245, 246, 247, 252, 254, 285, 329, 330, 332
- 第一屆學生會, 88
- 電鍍廠事件, 77, 81, 92, 93, 96, 104, 105, 240, 325
- 都市計畫, 10, 13, 58, 94, 134, 175, 176, 17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233, 234, 239, 249, 251, 253, 266, 267, 270, 271, 320, 327
- 都市社會運動, 6, 10, 52, 53, 55, 56, 263, 291, 292, 293, 294, 296, 297, 303, 305
- 東別, 10, 14, 40, 54, 58, 93, 94, 118, 136, 183, 185, 186, 187, 188, 189, 195, 196, 197, 199, 200, 201, 225, 227, 252, 273, 293
- 東風社, 9, 23, 26, 27, 29, 31, 32, 33, 38, 52, 54, 58, 59, 62, 63, 64, 65, 66, 67, 68, 72, 82, 83, 84, 86, 93, 100, 110, 111, 131, 136, 139, 153, 166, 168, 173, 198, 206, 213, 231, 274, 275, 276, 289, 294, 314, 318, 325, 341
- 東大路拓寬, 12, 182, 202, 214, 248, 249, 252, 255, 330, 332
- 東海保衛戰, 1, 10, 12, 58, 87, 140, 182, 193, 194, 202, 214, 233, 235, 236, 241, 242, 243, 248, 249, 251, 255, 282, 287, 296, 320, 330, 331
- 東海別墅, 10, 40, 53, 54, 70, 78, 81, 101, 131, 141, 183, 185, 186, 187, 195, 196, 227, 271, 316, 322, 325, 344
- 東海風, 19, 20, 23, 29, 46, 54, 56, 60, 73, 80, 83, 84, 101, 108, 139, 142, 152, 153, 170, 172, 173, 180, 197, 201, 231, 276, 294, 315, 328
- 東海大家庭, 31, 33, 34, 35, 36, 37, 38, 51, 57, 61, 72, 104, 292
- 東海大學校史, 20, 21, 26, 29, 32, 35, 59, 92, 106, 170, 294, 315
- 東海女研社, 86, 100, 136, 150, 183, 184, 316, 326
- 東海精神團結陣線, 13, 140, 234, 237, 242, 330
- 東海希望聯盟, 58, 68, 109, 202, 218, 219, 220, 221, 222,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41, 255, 295, 316, 329, 330
- 東海新聞, 54, 65, 82, 88, 89, 91, 95, 111, 112, 113, 118, 119, 121, 137, 245, 247, 29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2, 323, 326
- 東海學生會, 14, 69, 73, 85, 86, 88, 89, 94, 95, 107, 109, 110, 125, 143, 154, 159, 163, 164, 166, 168, 169, 178, 195, 196, 199, 234, 235, 248, 274, 275, 304, 319, 325, 327, 328, 334
- 東海週, 29, 58, 65, 252, 315, 332
- 東海成報, 245, 316
- 東海是誰的, 99, 109, 111, 112, 114, 119, 123, 138, 139, 154, 155, 318, 326
- 東海書苑, 167, 184, 206
- 東海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206, 213, 317
- 東海榮總社區團結聯盟, 240, 248, 249
- 東海采風, 56, 57, 169, 233, 236, 245, 246, 312, 314, 315, 316, 317, 319, 320, 322, 330
- 東潮, 55, 68, 69, 73, 77,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1, 95, 104, 105, 108, 111, 158, 163, 164, 173, 180, 205, 244, 274, 313, 316, 325
- 東潮時期, 9, 77, 90, 96, 104, 105, 107, 142, 151, 169, 195, 300
- 董事會, 18, 19, 21, 22, 23, 24, 25, 27, 34, 35, 78, 89, 101, 103, 108, 124, 132, 152, 159, 213, 226, 243, 244, 245, 274, 327, 333
- 動機機制危機, 274, 275, 276, 293, 295

去

- 台大, 4, 18, 43, 48, 49, 53, 55, 70, 81, 82, 89, 93, 99, 101, 106, 108, 136, 141, 145, 147, 151, 156, 158, 173, 204, 207, 227, 228, 251, 265
- 台中工業區, 13, 14, 23, 46, 54, 58, 66, 72, 80, 90, 93, 189, 190, 191, 197, 198, 204, 233, 234, 236, 237, 239, 248, 267, 268, 269, 312, 320, 327, 330, 331

台中市政府, 3, 79, 92, 191, 192, 193, 235, 236,
238, 239, 242, 248, 267, 269, 270, 273, 281,
282, 330

台研, 3, 54, 55, 69, 100, 119, 124, 125, 126, 131,
132, 133, 139, 150, 153, 157, 159, 160, 161,
183, 201, 206, 208, 212, 217, 219, 231, 232,
241, 242, 244, 252, 272, 296, 309, 313, 316,
328, 341, 343

台灣文化研究社, 69, 100, 183, 184, 185, 205,
206, 234, 249, 250, 318

投機城市, 265, 270, 272, 296, 322

田中央文藝工作室, 71, 239

聽！樹哭的聲音, 205, 206, 311

ㄝ

農牧場事件, 14, 135, 143, 149, 150, 162, 178,
179, 327

女舍門禁, 137, 138

女研社海報事件, 136, 137, 326

ㄝ

勞作制度, 58, 59, 95, 115, 218, 265

李孟浩, 110, 111, 314

李丁讚, 8, 40, 41, 58, 63, 79, 139, 203, 254, 256,
287, 288, 313, 322

李彥旻, 109, 110, 124, 314

理想國, 54, 188, 200, 252

理學院, 17, 24, 159, 160, 246, 328

廖敏達, 127, 321

廖雅嵐, 135, 321

劉坤鰲, 95, 110, 118

劉欣恆, 69

劉維鈞, 153, 334

柳琬玲, 128, 317

聯董會, 18, 19, 20, 21, 22, 24, 29, 34, 44, 50, 59,
78, 170, 260, 263, 266, 283, 294, 335, 336,
337

練馬可, 26, 27, 32

林碧堯, 212, 236, 317, 331

林德宇, 225, 229, 244, 334

林聲洲, 157

林載爵, 68, 85, 171

林育群, 39, 186, 187, 225, 244, 265, 316

鄰避, 239, 255, 293, 297, 305

另類公共領域, 7, 8, 158, 255, 286, 287, 289, 290,
303, 306

路思義教堂, 13, 14, 20, 37, 42, 43, 44, 49, 51, 58,
59, 108, 172, 177, 205, 219, 220, 221, 229,
230, 233, 234, 236, 237, 238, 243, 246, 248,
268, 271, 272, 295, 296, 317, 320, 321, 322,
331

羅時璋, 221, 223, 244

壟斷地租, 221, 231, 263, 264, 265, 274, 301

綠色大地, 86, 316

ㄝ

葛蘭西, 11, 279, 280

高等教育, 1, 2, 6, 9, 10, 17, 18, 21, 25, 28, 44, 51,
53, 55, 59, 71, 72, 122, 128, 129, 130, 133,
145, 146, 154, 162, 168, 174, 193, 204, 205,
216, 220, 221, 230, 233, 243, 244, 246, 255,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70,
272, 273, 274, 275, 277, 285, 300, 301, 306,
319, 322

郭達鴻, 88, 166, 167, 334

郭紀舟, 12, 99, 103,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9, 123, 319, 326

郭奇正, 237, 239, 241, 252, 253

郭映君, 44, 127, 156, 319

管理學院, 18, 71, 153, 239, 244, 245, 247

工業區聯外道路, 10, 72, 87, 134, 135, 142, 14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8, 199, 204,
233, 234, 236, 237, 240, 248, 249, 252, 253,
255, 256, 273, 285, 293, 327, 330

公民, 8, 10, 40, 58, 63, 110, 111, 118, 119, 124,

167, 168, 276, 280, 281, 289, 305, 306, 312, 318

公聽會, 82, 87, 90, 92, 96, 104, 107, 108, 118, 119, 121, 125, 126, 128, 139, 149, 151, 153, 154, 159, 161, 165, 206, 211, 215, 216, 217, 218, 219, 222, 225, 226, 227, 244, 245, 254, 274, 282, 284, 285, 294, 295, 300, 316, 326, 327, 328, 329, 330

公共領域, 7, 8, 11, 38, 40, 41, 58, 63, 66, 67, 119, 139, 156, 158, 168, 203, 255, 256, 286, 287, 288, 300, 301, 303, 304, 309, 310, 313, 322

公共論述, 40, 41, 63, 79, 156, 174, 178, 287, 292, 300, 303, 313

公共修辭, 58, 287, 288, 303

公共藝術, 154, 155, 156

共同體, 9, 10, 30, 33, 36, 72, 104, 105, 140, 141, 143, 195, 199, 201, 232, 237, 238, 239, 242, 291, 303, 304, 305, 310, 319, 320

共同體想像, 7, 9, 10, 30, 34, 36, 37, 51, 57, 104, 105, 140, 195, 199, 201, 232, 238, 242, 252, 253, 274, 296, 300, 303, 304

ㄎ

柯司特, 5, 6, 8, 10, 11, 52, 53, 55, 119, 180, 186, 195, 204, 231, 255, 263, 291, 292, 293, 296, 297, 301, 303, 304, 305

科技大樓事件, 158, 159, 160, 161, 162, 178, 180, 182, 203, 282, 328

苦勞網, 208, 209, 210, 211, 213, 233, 237, 251, 323

ㄏ

哈伯瑪斯, 5, 7, 63, 66, 67, 108, 156, 162, 272, 274, 275, 276, 286, 287

合法化危機, 10, 169, 231, 259, 272, 274, 276, 293, 310

黑水溝社, 3, 146, 147, 301, 313, 330

黑森林工作室, 71, 184, 228, 239

侯念祖, 30, 71, 102, 103, 106, 128, 129, 165, 236, 242, 317, 323, 326

後民論, 98, 99, 179, 180

漢寶德, 46, 48, 49, 50, 51, 59, 201, 219, 222, 244, 321

亨德教授, 182

胡志強, 14, 233, 234, 235, 237, 241, 269, 270, 271

火葬場事件, 77, 79, 80

環隆科技園區, 248

環生社, 86, 91, 101, 102, 105, 117, 124, 231, 325, 341

黃敏禎, 28, 189, 262, 277

黃凡, 235, 242, 243, 295, 296, 320

黃麗玲, 143, 255, 297, 309, 320

黃國治, 68

黃新高, 4, 5, 320

黃絲帶, 126, 160, 206, 221, 285, 327

黃武東, 18, 19, 107, 320

黃文興, 171, 172, 315, 320, 321

洪世謙, 133, 139, 150, 317

洪裕程, 283, 285, 287, 317

ㄏ

基督教大學, 1, 17, 18, 19, 22, 24, 29, 34, 35, 44, 90, 243, 294, 333, 335, 336, 340

計畫性認同, 6, 7, 8, 11, 255, 290, 304, 305

交通聯繫問題, 230, 245, 246, 247, 252

教學區整建規劃建議案, 222

教育改革, 145, 146, 204, 205, 260, 261, 262, 275, 313, 316, 320, 341

教育市場化, 145, 154, 205, 264

九屆學生會, 164, 183

建築系, 33, 46, 56, 57, 91, 94, 117, 125, 127, 152, 162, 174, 188, 206, 213, 219, 221, 222, 223, 226, 229, 237, 241, 244, 245, 252, 253, 265, 312, 316, 317, 318, 329

蔣勳, 48, 321
 精鍾商專事件, 204, 205
 景觀系, 121, 162, 174, 219, 226, 232, 236, 245

◀

七屆學生會, 159, 163
 搶救相思林大遊行, 101
 搶救相思林聯盟, 101, 102, 325
 全球化, 7, 55, 203, 205, 248, 255, 262, 271, 272,
 273, 275, 288, 297, 301, 303, 310, 318, 321,
 322

ㄊ

夏鑄九, 41, 49, 50, 59, 186, 255, 276, 290, 291,
 297, 309, 317, 318
 謝明山, 22, 27, 34, 78, 171, 263, 333
 蕭武昌, 100, 119, 334
 小惠事件, 10, 179, 182, 183, 184, 185, 186, 189,
 201, 205, 328
 小眾媒體社, 124
 校門口事件, 232, 329
 校解社, 56, 57, 58, 142, 156, 162, 166, 170, 173,
 177, 231, 233, 236, 241, 245, 246, 247, 252,
 253, 294, 332
 校長室, 1, 28, 65, 78, 92, 102, 104, 179,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8, 227, 228, 229, 251,
 284, 285, 328, 330, 332
 校園民主, 2, 6, 10, 37, 40, 41, 55, 68, 71, 73, 84,
 87, 88, 106, 108, 109, 110, 112, 114, 116, 117,
 119, 126, 141, 142, 143, 148, 149, 162, 163,
 168, 169, 180, 203, 206, 207, 211, 214, 216,
 217, 218, 228, 229, 254, 256, 272, 275, 276,
 287, 295, 300, 301, 304, 311, 314, 319
 校園民主重創時期, 10, 142, 143, 294, 300
 校園發展方向爭議, 20, 24, 28, 29, 30, 49, 55,
 107, 197, 274, 294
 校園規劃, 6, 20, 43, 45, 54, 55, 56, 57, 58, 59, 90,

94, 119, 120, 121, 122, 123,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5, 149, 150, 154, 160, 161,
 162, 174, 175, 176, 178, 203, 206, 215, 217,
 218, 222, 230, 231, 232, 266, 273, 274, 275,
 277, 282, 283, 293, 295, 313, 319, 327, 328,
 342

校園規劃·停、看、聽, 160, 162, 282
 校園規劃工作小組, 43, 174, 175, 176, 315, 327
 校園規劃制度, 10, 168, 180, 203, 214, 215, 216,
 217, 218, 231, 254, 256, 272, 274, 276, 284,
 289, 290, 293, 294, 295, 301, 329
 校園空間論述, 52, 54, 55, 56, 57, 58, 59, 71, 139,
 173, 174, 177, 180, 197, 213, 232, 294, 301,
 303

校園解說員, 20, 44, 56, 57, 68, 90, 92, 173, 188,
 197, 234, 245, 252, 294, 315, 317, 320, 322,
 327

校園交通, 149, 214, 315
 校園景觀認同感, 42, 43, 59, 107, 130, 230, 232,
 242, 300, 303
 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 162, 174, 175, 215, 230,
 244, 294, 327

校園社區意識, 170, 172, 320
 新 520W.C.學潮, 150

新白色恐怖, 228, 229, 230, 231, 241, 330

新東村反納骨塔事件, 196

新社會學生鬥陣, 3, 239, 241, 330

新宗教中心事件, 77, 82, 87, 90, 91, 104, 105,
 110, 139, 154, 160, 169, 182, 201

相思林, 1, 13, 14, 42, 43, 45, 54, 95, 96, 97,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8, 111, 117, 118,
 120, 121,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9, 140, 141,
 142, 160, 178, 184, 192, 193, 194, 199, 201,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2, 213, 214,
 215, 218, 223, 230, 232, 233, 236, 237, 242,
 246, 250, 259, 265, 272, 275, 276, 278, 281,
 282, 283, 285,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300, 306, 311, 317, 318, 319,
320, 321, 325, 326, 327, 328, 331, 341, 342,
343, 344

相思林時期, 10, 97, 117, 139, 140, 141, 142, 143,
150, 151, 155, 157, 160, 168, 173, 195, 254,
293, 294, 300, 303

相思林事件, 1, 2, 6, 10, 14, 54, 57, 82, 86, 87, 92,
95, 97, 100, 101,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1, 117, 118, 119,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8, 139, 140, 141, 150,
160, 162, 174, 178, 179, 185, 192, 193, 194,
195, 199, 204, 206, 209, 210, 212, 213, 214,
218, 230, 232, 236, 238, 240, 242, 250, 259,
274, 282, 283, 284, 285, 300, 305, 311, 312,
313, 325, 328, 344

徐文彥, 156, 157

許達然, 46, 319

學生活動中心, 39, 50, 64, 68, 69, 72, 80, 82, 83,
85, 86, 87, 88, 91, 92, 93, 94, 109, 191, 289,
334

學生政府, 6, 55, 81, 86, 87, 88, 89, 96, 109, 111,
116, 14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256, 275, 277, 341

學生議會, 88, 89, 110, 111, 125, 126, 131, 132,
149, 150, 151, 153, 155, 163, 164, 165, 166,
183, 184, 187, 215, 220, 247, 252, 314, 316,
327, 328

學生運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7, 22,
29, 33, 53, 55, 56, 66, 69, 70, 71, 73, 77, 81,
86, 87, 89, 95, 96, 97, 99, 100, 104, 105, 106,
109, 111, 112, 129, 141, 142, 144, 146, 148,
151, 158, 163, 167, 178, 179, 193, 195, 196,
202, 212, 217, 218, 230, 231, 232, 235, 250,
251, 255, 256, 259, 261, 272, 274, 275, 278,
279, 280, 283, 289, 290, 292, 293, 295,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22, 341

學園城市, 296, 298

出

趙剛, 144, 169, 229, 239, 297, 305, 321

趙彥寧, 212, 229, 321

周仲芳, 157

周奕成, 158

周盈成, 112, 113

詹耀文, 33, 91, 94, 117, 188

張芳玲, 32, 33, 318

張志遠, 43, 56, 68, 170, 171, 173, 239, 241, 315

張肇康, 20, 43, 44, 47

張傳聖, 149, 150

正當性認同, 6, 304

鄭禎樺, 20, 39, 43, 51, 71, 253, 322

朱逸恆, 67

主體, 4, 6, 41, 53, 56, 66, 69, 72, 73, 98, 99, 100,
112, 113, 114, 116, 125, 136, 137, 143, 153,
155, 168, 172, 175, 217, 220, 231, 255, 275,
276, 278, 279, 280, 281, 282,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3, 297, 304, 305, 306

主體的學校, 288, 289, 290, 297, 306

主體性, 4, 67, 73, 109, 221, 253, 278, 279, 280,
281, 285, 288, 289, 301, 303, 304, 305, 306,
320, 321

濁水溪社, 119, 120, 121, 122, 123, 125, 128, 160,
164, 165, 167, 178, 183, 184, 185, 322

中科, 204, 234, 248, 249, 253, 296

中知青黨部退出校園, 108, 120, 121

鍾瀚樞, 241, 330

重大工程公告參與程序, 216, 220, 245

入

陳柏偉, 4, 5, 320

陳其寬, 20, 43, 44, 47, 49, 50, 52

陳信行, 98, 145, 232, 278, 319

陳昭如, 218, 319

陳政亮, 94, 103, 126, 128, 130, 134, 141, 319,
326, 341

陳成詮, 164, 165, 183, 334

陳雅芬, 137, 320

長老教會, 18, 24, 107

城市學園, 296, 298

程海東, 247, 250, 251, 253, 293, 333

畜產系, 135, 149, 150, 327

尸

施威全, 83

師生座談會, 38, 39, 40, 83, 92, 159, 166, 192

事件化理論, 151, 158

社科院, 34, 153, 157

社區, 3, 5, 6, 7, 10, 14, 20, 26, 36, 53, 54, 55, 56,

57, 58, 70, 79, 80, 81, 92, 93, 94, 143, 148,

149, 155, 161, 172, 174, 180, 188, 189, 192,

195, 196, 197, 199, 201, 204, 232, 235, 240,

241, 248, 249, 251, 252, 253, 255, 288, 290,

291, 292, 294, 295, 297, 301, 303, 304, 305,

306, 316, 318, 320, 322, 330, 331, 335

社區型大學, 55, 70, 271, 292

社區總體營造運動, 5, 6, 56, 58, 162, 170, 295,

297, 306

社區運動, 4, 5, 6, 10, 56, 59, 134, 180, 255, 256,

290, 291, 292, 294, 296, 297, 305, 318, 320,

326

手(守)護東海行動聯盟, 249, 250, 251, 253

沈發惠, 83, 99, 117, 314

生促部, 120, 196, 228, 334

生促會, 82, 87, 89, 91, 93, 94, 334

生物系學會, 205

說明會, 13, 82, 83, 84, 86, 87, 90, 91, 92, 96, 100,

101, 102, 107, 108, 117, 125, 126, 129, 132,

133, 139, 149, 150, 159, 161, 193, 215, 234,

250, 274, 284, 285, 294, 295, 300, 325, 327,

330, 341, 342, 343

日

人民民主, 98, 99, 113, 114, 115, 117, 148, 314,
318, 319, 322

人間, 2, 28, 46, 48, 54, 55, 69, 73, 102, 103, 105,

109, 110, 111, 115, 119, 124, 125, 131, 132,

133, 136, 137, 138, 141, 147, 150, 153, 154,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6, 167, 169, 173, 183, 196, 200, 201,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7,

219, 231, 232, 234, 235, 239, 241, 242, 244,

247, 252, 264, 272, 296, 309, 311, 312, 313,

316, 328, 330, 332, 341

人間/台研, 2, 69, 138, 141, 147, 154, 157, 160,

162, 163, 164, 169,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31, 234, 235, 239, 241, 247,

252, 311, 313, 330, 332

人間工作坊, 54, 55, 67, 68, 69, 86, 94, 99, 100,

102, 112, 124, 137, 144, 158, 161, 183, 184,

185, 195, 196, 205, 206, 231, 234, 248, 249,

250, 311, 318, 325, 341

人間札記, 54, 55, 69, 86, 94, 99, 109, 112, 117,

125, 133, 137, 161, 196, 311, 312, 314,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5, 326, 328

人間雜誌, 312

人文大樓, 219, 229, 230, 244, 246, 265, 295, 329,

330, 332

認同, 6, 7, 8, 10, 11, 23, 26, 30, 32, 33, 35, 40, 43,

53, 55, 57, 62, 99, 107, 141, 143, 144, 158,

169, 172, 176, 194, 195, 203, 232, 238, 255,

256, 263, 272,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3, 301, 303, 304, 305, 309, 318, 320,

341

阮大年, 103, 108,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8, 149, 153, 154, 157, 171,

174, 192, 193, 196, 250, 319, 333, 341, 342

榮推會, 9, 37, 49, 50, 52,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71, 72, 85, 87, 139, 173, 340

榮譽制度, 9, 22, 60, 61, 62, 63, 64, 65, 321, 340

P

綜合大樓論戰, 123, 124, 231, 326
 綜合大樓事件, 95, 97, 108, 114, 117, 120, 124,
 128, 129, 130, 131, 134, 135, 138, 139, 141,
 153, 160, 162, 174, 178, 179, 183, 326

Q

蔡其昌, 98, 99, 322
 草山學會, 4, 147, 148
 參與式規劃, 55, 160, 161, 162, 180
 曾約農, 18, 19, 24, 34, 60, 63, 68, 168, 171, 260,
 333
 從相思出發, 1, 213, 214, 282, 309, 311, 317, 318,
 328

R

司馬中原, 45, 46, 182, 313
 思想枝, 69, 126, 141, 316, 317, 319, 341
 四校例會, 147, 185, 313
 四二公聽會事件, 164, 165, 328
 三屆學生會, 109, 113, 118, 119, 121, 137, 163,
 165
 三次相思林事件, 10, 95, 131, 133, 134, 135, 140,
 143, 149, 317, 327
 三月學運, 2, 3, 4, 5, 6, 11, 69, 70, 86, 99, 100,
 101, 104, 107, 143, 148, 150, 158, 179, 180,
 231, 278, 299, 300, 301, 302, 303, 305, 306,
 325
 宿舍床位不足, 226, 232, 328, 329
 孫治安,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23, 318,
 326

S

歐保羅, 24, 88, 321
 歐正明, 236, 242, 248, 321, 331

T

二次相思林事件, 108, 117, 124, 174, 326

U

一級主管工作研討會, 216, 220
 異議性社團, 54, 55, 56, 57, 58, 64, 68, 72, 73, 99,
 100, 110, 112, 117, 119, 121, 122, 123, 140,
 141, 149, 151, 152, 153, 157, 159, 160, 163,
 164, 166, 167, 169, 178, 183, 195, 215, 231,
 232, 237, 287, 288, 294, 301, 305
 藝術街坊, 188, 189, 252, 296
 亞蘭杜漢, 285, 289, 297, 305, 306
 野百合, 2, 3, 4, 5, 145, 148, 158, 179, 299, 300,
 302, 303, 306, 314, 319, 320
 野百合評論, 147, 312
 研聯會, 95, 110, 118, 151, 334
 楊牧, 47, 66, 320
 楊琇雁, 155, 334

V

吳德耀, 21, 22, 24, 29, 34, 121, 152, 333
 五四衝突事件, 156, 158
 外勞, 199, 213, 214, 297
 未竟的探討, 9, 23, 30, 31, 59, 66, 73, 104, 173,
 174, 213, 218, 261, 274, 275, 276, 292
 頑鬥主義, 144, 145, 313
 文大美術系事件, 146, 147, 148, 179, 185
 文理大道, 14, 42, 43, 68, 102, 103, 209, 220, 223,
 246, 251, 284, 285, 295, 331, 343
 文學院, 222, 223, 229, 333, 339
 王丹, 217, 329
 王光旭, 189, 190, 191, 193, 194, 199, 250, 253,
 312
 王亢沛, 133, 145, 159, 184, 193, 194, 204, 206,
 207, 208, 209, 211, 212, 214, 216, 220, 221,
 222, 223, 225, 228, 230, 231, 233, 234, 236,
 240, 241, 244, 245, 265, 330, 333

王順民, 221, 312

王維菁, 146, 312

口

余光中, 45, 313

約農河加蓋事件, 81, 86, 90, 104, 325

袁興言, 174, 175, 177, 178, 214, 219, 253, 318

